

走向多极世界丛书

# 两霸

# 争雄

美苏冷战及后冷战时代

陈思

杜正艾

主编

程广中

汪徐和

编著

知识出版社



## 引言 冷战：又一个历史迷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之间长达 40 余年的冷战，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曾高悬在包括美苏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头顶，使整个地球都笼罩在想像中世界核大战的阴影下。

1989 年的资料显示，美国战略核弹头运载工具约 2260 件，核弹头 1.4 万个，战役战术核弹头 1.5 万个，总当量 50 亿吨；苏联拥有战略核弹头运载工具 2494 件，战略核弹头 1.1 万个，战役战术核弹头 5400 个，总当量 100 亿吨。如果美苏用其核武库的十二分之一进行核战争，那么全世界将有 20 亿人死亡。核爆炸引起的城市和森林大火会在大气层中形成一个厚厚的烟层，挡住太阳对地面的照射，使整个地球被黑暗笼罩数星期之久，陆地的温度会猛降到零下 20 度，从而形成可怕的“核冬天”。

“超级大国”这一美国影视界不太严肃的用语，却恰如其分地概括了美苏两国的国家性质。人类历史上的古罗马帝国、查理曼帝国、大英帝国都未曾达到美苏这样的超级规模。美苏两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扩展到了这个星球的陆地、海洋和空间，渗透到了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思维习惯里，甚至普通百姓饭后茶余的谈笑中。

美苏之间世界霸权之争夺是全方位的，从地缘争夺到意识形态的对抗，从常规军备竞赛到核军备竞赛，用尽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各种国际政治斗争的手段。

美苏之间的冷战又是一个历史迷宫，留给后世许多待解之谜：

为什么美苏之间会发生冷战并持续那么长时间？

为什么美苏拥有超级核武库，冷战期间却从未使用过核武器？

为什么美苏足以发动新的世界大战，而大战却没有打起来？

为什么以美苏为首的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在欧洲壁垒分明，却没有发生过两大军事集团成员国间的战争？

为什么由美苏操纵或支持的局部战争曾在很长时期里成为局部战争的主体？

冷战过后思考冷战，我们不能不看到：冷战是国际舞台上一出滑稽但却真实的活剧，粉墨登场的人物、拙劣卖力的表演等应有尽有。冷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全面战争”的替代物，是两极均势中敌对双方强烈的对抗形式。

这场冷战的始作俑者是美国。美国虽然在进行冷战时打出了各种各样美丽的“世界主义”的旗帜，但掩盖不了美国的世界霸权梦。美国自立国起凭借自己的地缘优势埋头发展，早已具备了争夺世界霸权的实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一家独大，霸主榻上，岂容苏联来卧？俄国的历史虽然远比美国悠久，但苏联却是世界舞台上的新面孔。它一方面要致力于发展国力，一方面要应付美国发动的冷战。但苏联的血液中流淌着老沙皇地缘蚕食的毒素，愈到后期便表现得愈明显。

历史在前进，时代在进步。在这个日益缩小的“地球村”里，称之为“人类”的数十亿生灵面临着越来越多需要通力合作才能克服的共同威胁。可惜有些霸权国家仍然摆脱不了冷战思维的怪圈，不断制造国家间的对立和事端，甚至酝酿发动新一轮冷战，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爱好和平国家和人民的憎恶和警惕。

## 序 言

当我们跨越新世纪的门槛，立足现实，展望未来的时候，我们不由得会回首过去。5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的确短暂，然而，战后50年在世界历史的漫漫长河中却显得格外耀眼。战后50年的发展是多样化的，从手段和结果看，在两方面带有历史性的意义。

一是世界格局的重大转型，经历了由两强鼎立向多极发展的转变。战火熄灭时，昔日世界力量的中心西欧，变得羸弱，美苏两国成为超级大国，世界格局出现了两强争霸局面。然而，世事沧桑，世界格局的发展就像万物的发展一样，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各种力量的作用、制约，使世界力量此消彼长。总体而言，战后50年里，主要有两股力量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即美苏两国出于独霸世界的目的，实施冷战的力量；西欧、日本以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为摆脱困境，实现民族复兴的力量。这两股力量既自成体系，又相互交织。两股力量的交汇、碰撞导致美苏力量的相对削弱，西欧、日本以及中国等第三世界国家力量相对增强，世界格局由两强鼎立向多极发展。

二是世界各国在谋取世界大国地位时，除了继续因袭军事战手段外，日益使用更加隐蔽的经济战手段，军事战逐步让位于经济战、外交战。综观近代以来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国的兴起，多起于经济和科技的发达；大国的衰落，多衰于经济和科技的相对衰退，以及过度的军事扩张。德、日等国痛定思痛，深切感到运用绝对手段、谋取绝对目的的军事战手段只会导致绝对的失败，在谋取大国地位的历程中立足于内涵更加丰富且具有建设性的经济战手段，实现了经济的复兴和政治地位的提高。相反，美苏两强出于独霸世界的目的，将军事战这种暴发户式的扩充手段置于重要位置，结果国力发展的速度放慢了，其在世界总体力量中的比重下降了。早在300年前，德国一位商业理论家冯·霍尼希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当前富强与否不取决于它本身拥有的力量和财富，而主要取决于邻国力量的大小与财富的多寡。”如果超级大国继续奉行过时的军事战手段，超级大国要想维护住“超级”王冠，只能是天方夜谭。

“走向多极世界”丛书的目的，旨在解析这两种发展趋势，并希望通过描绘这段帝国沉浮，沧桑巨变的历史，向人们传递一些仍显粗陋的信息，推动国内外读者对历史进行更为广泛、深刻的认识，进而以史为鉴，使人们能够更科学、更准确地预测未来，增强人们对未来的责任感。

为达到上述目的，丛书在写作风格上，不是平铺直叙地描绘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的过程，而是将重点放在各国领导人在重大挑战面前，如何分析时局、如何决策、如何化解矛盾，及重要人物所作的重大决策对本国乃至世界格局产生的影响，从而将一个整体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真实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鉴于有关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的书籍或偏重于学术性，不易为一般读者接受，或避重就轻，散见于人物传记之中，缺乏一定的思想深度，不利于读者对世界战略格局变化形成整体认识，本丛书希望能另辟蹊径，在写作手法上，以重大历史事件、重大决策为经，以发挥重大作用的人物活动为纬，在追求思想性的同时，力求语言生动流畅，增强其可读性。

世界走向多极的步伐愈益加快，人们正昂首走向21世纪。我们推出这套丛书，希望能带给读者一些思考、一些启发。

杜正艾 陈 思  
1997年3月20日于北京

## 内容提要

本书以纪实性笔法描述了近半个世纪的美苏冷战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为了在全世界进行争夺而卷入了长期的较量。它们进行大规模的军备竞赛，组成两大军事集团进行对峙，并且把世界各地的地区冲突纳入它们彼此间的斗争。两国一直互为对手，进行冷战，长期处于紧张、敌对之中，曾数度濒临战争边缘，又因斗争的需要三次出现缓和。50年代末，赫鲁晓夫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最高级会晤后产生了“戴维营”精神，美苏关系出现了第一次缓和，但这次缓和持续了一年便因U—2飞机事件而夭折。70年代，“尼克松主义”和苏联缓和政策的推行，导致了美苏关系的第二次缓和，这次缓和持续时间比第一次长，却因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而告终。从1985年下半年起，美苏关系开始出现第三次缓和，并导致美苏建立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和伙伴关系。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苏冷战的终结。全书紧紧抓住美苏攻守态势、紧张与缓和的转化谋篇布局，展示了美苏斗智斗勇斗力的生动场面，并预测了未来多极化格局的走向。

## 两霸争雄：美苏冷战及后冷战时代

## 第一章 盟友仇敌

世界上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美苏合则以利，分则以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两国合作的基础是打败轴心国，一旦共同敌人被打倒，合作就失去了共同的利益基础，而原来处于次要地位的关于战后世界安排上的对立便上升为决定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伴随着同盟国军队胜利进军的脚步声，西方特别是美国与苏联不和谐的杂音越来越大。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全方位的。

### 一、美苏由战时盟友变成冷战对手，缘于深刻的战略目标、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分歧

德·托克维尔是一位惊人的预言家。他在 100 多年前就预言说：“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大国，它们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却似乎朝着同一目的前进，我指的是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国家都在不被人们注意的时候成长起来。当人类注意力已贯注到其他地区时，它们突然的把自己排列到世界各国的前列，几乎在同一时间人们认识到它们的存在和伟大。

“所有别的国家似乎都已发展到自然的极限，它们只能维持现状，而这两个国家却正在成长，所有别的国家已经停止前进，或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缓慢移动；唯有这两个国家正在以轻快而迅速的步伐沿着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道路前进。

“二者似乎都在天意的安排下各自支配着半个地球的命运”。

美国是个大陆型的岛国，东西分别以大西洋和太平洋为天然屏障，陆地上南北分别与弱小的墨西哥和加拿大为邻。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使美国立国后能够埋头积聚国力，并以“门罗主义”为挡箭牌阻止欧洲这个“旧世界”对其的侵扰。19 世纪末美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实行了“门户开放”政策，开始参与国际政治，由于遭到欧洲列强的抵制而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回到孤立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的衰落为美国谋求世界霸权提供了良机。

俄国的发展远没有美国那样顺利。罗曼诺夫王朝的历代沙皇通过不断的领土蚕食把小小的莫斯科公国发展成一个地跨欧亚大陆的陆地强国。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把欧、亚、非三大洲称之为“世界岛”，把由俄国叶尼塞河、中亚高原地带、黑海与波罗的海所环绕的东欧平原和西部西伯利亚平原地域称作世界“心脏地带”，认为谁控制了心脏地带谁就能够控制世界岛乃至全世界。罗曼诺夫王朝的沙皇们虽然控制了心脏地带的大部，但他们却是不太聪明的资产经营者，其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严重阻碍了俄国的经济发展，使俄国长期摆脱不了落后。1917 年十月革命后，苏联致力于在本国内建设社会主义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与西欧和中欧接近的地缘条件使俄国多次卷入欧洲列强间的战争，苏联也难以避免这样的命运。1812 年拿破仑的入侵和 1941 年希特勒的侵略都曾给这个国家带来沉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是带着战争的满目创伤进入冷战的角斗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国际关系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德意日被打倒了，英国从世界霸主的宝座上跌落下来，在欧洲和亚洲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成为世界两强的美苏都想以自己的方式填补真空。美国总统罗斯福认识到，美国的战争目的和对战后世界政治的支配的实现依赖美苏合作，美国主张的门

户开放的世界经济只有在苏联和东欧大量吸收美国商品和资本的情况下才真正是全球性的。这样，罗斯福所设想的战后世界秩序的基础，恰恰是美苏这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存在巨大差别的国家不仅在战时，而且在共同敌人被打倒后的持久合作。这一政策本身就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大战尚未结束，罗斯福便撒手而去，他的继任者很快就开始推行独霸世界的计划了。

苏联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的直接目的是彻底粉碎希特勒德国侵略，这与美国的目的是一致的。但苏联的战争目的并不限于此，它力求通过战争实现能够保证本身安全的战后局面，即把针对苏联的未来侵略战争的可能性减至最小程度，并在这种侵略战争一旦发生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曾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受到英法的祸水东引阴谋的危害。斯大林从历史经验中得出不能信任西方国家的结论。1945年4月，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他还警告说，德国“很快会恢复元气，只消12至15年时间，他们又会强大起来的。因之，斯拉夫民族的团结至为重要”。斯大林当时主要是通过国界领土变更和控制苏联的邻国使之对苏友好来保证苏联的安全。随着战争的进展和胜利，苏联的要求超出了东欧地区，以参加对日战争为由，要求恢复1905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大部分权益。这是典型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总之，美苏关于战后世界的战略目标发生了尖锐分歧。

地缘条件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前提，该国的国家利益也深深植根于其地缘条件中。

由于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美国人的地理知识本来是十分贫乏的。1898年美国因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而进行战争时，大多数美国人还不知道菲律宾究竟是一个群岛还是一种果品。当美国人睁眼看世界时，美国的地理特别是地缘政治研究很快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早在1943年，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就提出所谓“边缘地带”理论。他认为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是“中间地带”，它处于作为世界心脏地区的欧亚大陆和海洋之间，是海上强国与大陆强国发生冲突的主要地带。他特别重视欧亚大陆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地位，认为美国在地理上被欧亚大陆以及非洲和澳洲包围着，美国的战略宗旨是维护欧亚大陆的均势，决不允许欧亚大陆出现一个统一的压倒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中心。为此，他主张美国必须积极干预欧亚大陆的事务，控制大陆的边缘地带。他提出：“谁支配着边缘地带，谁就控制欧亚大陆；谁支配着欧亚大陆，谁就掌握着世界的命运。”美国当局对斯派克曼的建议十分重视，美国战后果真沿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带建立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对苏联进行围堵。苏联虽然成为世界两强之一，但与美国相比力量仍然略逊一筹。苏联雄居欧亚大陆，本质上是一个陆地强国。苏联要沿着自己的边界建立安全和缓冲地带。陆上和海上强国从各自的地缘条件出发，追求着不同的地缘利益。这种差异是美苏冲突的根源之一。

美苏之间在地缘方面的竞争逐渐形成了三条线：即欧洲、欧亚南部人口密集地区和远东地区。一是在欧洲这条线上，美苏的分歧集中在东欧和中欧。东欧问题主要是波兰问题。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曾经说过：“对于苏联人民而言，波兰问题不仅是一个荣誉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安全问题。”苏联西部边界绵延千余公里，历史上多次遭到来自其欧洲邻国的入侵，最严重的就是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入侵，这些入侵往往又是以波兰为跳板的。所以斯大林



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美国方面虽然承认苏联在波兰乃至东欧其他地区具有特殊利益，但指望通过自由选举建立一个亲西方的至少是中立的波兰政府，以便把波兰作为阻止苏联的力量和影响向西推进的前哨阵地。中欧问题主要是德国问题，这是美苏对抗中的又一个热点。1945年6月4日由美苏英法四国驻德占领军总司令组成的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在对德国的处理上存在一系列分歧，特别是美苏两方都想将德国问题的处理纳入本国的战略轨道，求得有利于本国的解决。早在战争时期，美国就有人批评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会议上制定的要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政策，认为这会过分削弱德日，将来会失去以这两个国家抗衡苏联的筹码。美国在战后的对德政策的核心就是通过把德国纳入西方阵营，既可使德国再不能在欧洲为非作歹，又可使德国成为对付苏联的坚强堡垒。苏联的目标正好相反。苏联要彻底清除德国的军国主义和战争潜力，使它再也不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苏联虽然原则上不反对重建统一的德国，但却希望德国至少应该是中立的。

二是在欧亚南部即所谓近东这条线上，主要涉及的是伊朗、土耳其和希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苏美曾根据战时需要，分别驻军伊朗，日本投降后，英美军队相继撤离，而苏军却继续维持其在伊朗的军事存在，并支持伊朗北部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分子进行反政府活动。伊朗是英国的势力范围，苏联想乘英国衰落之机，把英国势力赶出伊朗，建立一个屈从于苏联的伊朗政府。美国则想取英国而代之。1946年2月伊朗政府就要求苏联从伊朗撤军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斯大林说，苏联的利益要求苏军留在伊朗，“我们不在乎美国和英国怎么样，我们不怕他们”；在伊朗这件事上有个“苏联尊严”问题。苏联还在苏伊边界部署重兵，目的是建立一个屈从于苏联的伊朗政府。伊朗寻求美国支持，美国积极支持伊朗反对苏联，并让伊朗向联合国安理会控告苏联。苏联在美英的压力下，最后同意将军队撤出伊朗，但提出要联合开发伊朗北部的石油。这样一来，问题就更加复杂化。伊朗问题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并使美英苏三国关系更加复杂。

美苏在土耳其和希腊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俄国自彼得大帝时代起就一直想控制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两海峡，以便把从黑海进入地中海的锁钥掌握在自己手中。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曾说过：“领土租借是土耳其和俄国之间的争端，得让他们自己去解决。但是黑海海峡问题跟美国和全世界都有关系。”斯大林则把黑海海峡和直布罗陀做了比较，他说后面这几个地方都有军队保护。斯大林要求对关于黑海海峡的现有公约进行有利于苏联的修改。他还要求土耳其租借给苏联黑海海峡基地和将卡斯和阿达汗两省交给苏联，理由是这些地方曾属于俄国。1946年初，苏土两国因领土纠纷关系日益恶化，这年8月和9月，苏联先后两次发出照会，要求由苏土两国共同管理海峡。美国国务院则发表声明，谴责苏联要控制土耳其、威胁希腊和近东地区的企图，并命令当时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通过海峡显示武力。美苏在希腊的斗争后来成为杜鲁门主义出笼的直接导火线。

三是远东问题。远东问题的核心是日本问题。依照1945年7月英苏美三国发布的《波茨坦公告》，对日本将实行盟国占领。然而这一文件墨迹未干，美国就决定了独占日本的方针，这自然遭到苏联的强烈反对。苏联向美方提出驻日本的盟军最高统帅应“由美苏将领各一人担任”，遭到美国拒绝。1945年8月18日，苏军以军事方式登陆千岛群岛，包括南千岛的国后岛和择捉岛，同时占领了南库页岛和本来属于北海道的色丹岛和齿舞岛。苏联此后就占领

日本的方式问题同美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尖锐斗争，但丝毫没有改变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事实，苏联的愤怒有增无减。

美苏之间的矛盾因意识形态方面的争端而变得更复杂、更危险。美国是当时的世界首富，把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文明看成是上帝能赐予人类的最好的东西。这种以自己的文明为文明、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的优越感使美国的决策者们有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般的狂热，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充满傲慢和霸主心态。

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充满自信，而看不到这一模式业已存在的种种深刻矛盾。当时整个世界形势发生了向左转的总动向。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自我牺牲精神引起了人们对苏维埃国家的深切同情。甚至于许多流亡知识分子、完全“落魄的人们”，也都开始倾心于苏联了。世界上苏联的拥护者和朋友明显地增多了。殖民帝国开始瓦解了，世界听到了民族解放运动脉搏的频频跳动。斯大林认为，资本主义的死期已经不远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将在全世界取得最终胜利。

这样美苏之间的斗争就成为一场制度之战，涂抹上一层厚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表面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冲突更加突出，实际上根子里还是基于不同地缘条件之上的战略利益争夺，这种战略利益当然也包括意识形态因素在内。

## 二、密苏里的乡下娃继任美国总统，加速了历史拐弯

伴随同盟国军队胜利进军脚步声，在 1945 年 2 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之间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便出现了分歧。美国决策层关于对苏政策发生了激烈争吵。美国总统罗斯福所坚持的与苏联合作的方针受到对苏强硬派的严厉批评。罗斯福在他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向斯大林发出的最后一封信中说道：

“感谢您解释苏联对伯尔尼事件的观点。此事看来已成过去，并未获至任何有用的结果。

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应该互相猜疑，今后不应该再发生此类小误会。我确信，当我们的军队在德国会师，在充分互相配合下发起联合攻势时，纳粹军队必将瓦解。”

伯尔尼事件是指在意大利战线美英军与纳粹就在意大利的德军向美英投降之事进行秘密谈判的事件，苏联对美英把苏联排除在外十分不满。

上述信件是罗斯福最后的态度。4 月 12 日他即去世。杜鲁门副总统接任为美国第 33 届总统。而作为理想主义者的罗斯福的突然去世，对处于摇摆中的美苏合作更是雪上加霜。

哈里·杜鲁门（1884—1972）的背景、思想、性格与罗斯福截然不同。他于 1884 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巴顿县拉马尔镇一个农场主家庭，没有上过大学，完全凭自我奋斗发迹。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2 年进入当地政界，曾要求加入三 K 党未成。1934 年以民主党身分当选为参议员。1944 年罗斯福决定第四次竞选总统时，民主党党魁们知道健康每况愈下的罗斯福难以完成第四个任期，便决心把被称为“亲俄派”的原副总统华莱士拉下马，推举杜鲁门竞选副总统。杜鲁门在接任总统前并无多少外交经验。如果说他有过什么外交见解的话，那就是 1941 年 6 月 23 日，即德国进攻苏联后的第二天，他曾公开宣称：“假如我们发现德国在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就应该帮助俄国，假如发现俄国打赢，我们就应该帮助德国，就那样让他们去相互残杀，杀得

愈厉害愈好。”

由于出身低微，杜鲁门是个性格很犟的人，并且在与大人物的交往中有一种压抑感。他曾对丘吉尔和斯大林说，像他这样的密苏里乡下娃能与首相和元帅两位大人物在一起，真是不胜愉快。

杜鲁门虽无外交经验，但他明确意识到美国的力量以及苏联成为对手的必然性。1945年继任不久他就公开宣称美国要统治世界，并以此标榜自己忠于美国“命中注定的”命运。他说：“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已经赋予我们今后领导世界的责任。”7月24日，杜鲁门在与斯大林第一次会见的波茨坦会议上，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对斯大林提到“一种破坏力特别巨大的新武器”。首开了美国对苏联的核讹诈。杜鲁门和丘吉尔极其注意斯大林的面部表情，没想到斯大林竟然没有“表示异乎寻常的兴趣”。关于这段插曲，朱可夫在回忆录中作了如下补充：“实际上，当斯大林会后返回住所，就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跟莫洛托夫谈到与杜鲁门这次谈话的内容。莫洛托夫听后说：‘他们是想抬高身价。’斯大林发笑说：‘让他们抬高身价好了。应该告诉库尔恰托夫加快我们工作的进度。’我知道，他指的是原子弹。”

当时杜鲁门周围谋士如云，在对苏态度上有强硬派和主和派之分。杜鲁门当时还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彻底打败日本，故动摇于两派之间，但他在许多问题上已在悄悄改变罗斯福的与苏联合作政策。

### 三、谋士们躲在密室里悄悄草拟冷战宣言

**凯南的八千字电报**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演说。斯大林说，战争的发生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世界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结果。如果各国能够采用和平的协商解决办法，根据它们的经济实力来定期重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那也许可能避免战祸。但这在目前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发展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斯大林指出，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次危机，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第二次危机，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斯大林谈到苏维埃国家和红军经受了战争的考验，证明了自己的生命力。

斯大林的演说在美英等国的当权派中引起强烈反响。美最高法院威廉·道格拉斯说，他的印象，“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美副国务卿艾奇逊引用了斯大林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起因的话说，“他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苏联必须作好准备以防万一，要增加重工业生产”。

美国国内部关于对苏政策的争论更加激烈。国务院关于这个问题征询驻外使节的意见。同年2月22日，美驻苏大使馆临时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秘密发回一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和做法”以及美国应采取的对策，提出了全面“分析”和建议，为美国即将采取的强硬政策提供了“完美的逻辑依据”。

凯南在这份电报中认为，苏联始终感到它生活在敌对的资本主义包围之中，“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天生对外部世界的恐惧心理”。他在具体分析苏联政策时认为，苏联将“在一切认为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作出努力来推进苏联政权的正式疆界。在目前，这种努力暂限于某些邻近的、被认为战略上直接需要的地点，如像伊朗北部、土耳其，也许还有（丹麦）的波恩

荷尔姆岛”。

凯南提出对策说，“苏联听不进理智的逻辑，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因此，如果对方拥有足够的武力，并清楚地表明它准备使用武力，这就几乎用不着真的动武。如果正确地处理形势，就不需要有影响威望的摊牌”。这一对策综合了美国政府前一时期对苏政策的实际做法和主要决策人的一些设想，并予以理论上的说明，提出了一整套遏制苏联的“冷战”政策。这份电报正投美国决策者所好。美海军部长福莱斯特谈到它时，欣喜若狂，如获至宝。他立即下令复印这份电报作为几百名高级军官必读文件，国务院为此还表扬了凯南，并立即调他返回华盛顿就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司司长。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 在美国国务院收到凯南这份“不迟也不早”的电报前后，杜鲁门正为接待丘吉尔访问、由丘吉尔说出杜鲁门此刻还不便公开说出的话而忙碌着。

温斯顿·丘吉尔 1874 年 11 月出生于英格兰牛津郡。其祖先曾为大英帝国的霸业立下过汗马功劳。丘吉尔的青少年时代，正是英国强盛到顶点之时。当他步入政坛之时，又是这个“日不落帝国”开始衰落和瓦解之时。丘吉尔自然而然地把保卫帝国遗产作为自己的终身使命了。丘吉尔是一个反共老手，曾积极主张和支持干涉过苏联的十月革命。他又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战略家，当法西斯主义猖獗时，他坚决反对张伯伦之流的“绥靖政策”，积极主张联苏抗德。当战争胜利在即，丘吉尔从维护英国的遗产和整个西方世界的利益出发，又把反苏放在首位。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写道，这一时期“战略和政策的决定性的、实际的要点”应是：

“第一、苏俄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第二、必须立即组成一条新的战线来对付它的迅猛挺进。第三、这条战线的欧洲部分应尽可能东移。第四、柏林应是英美军队首要和真正的目标。第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和美军进入布拉格有重大意义。第六、维也纳，实际上即奥地利，必须由西方大国管制，至少应与苏俄有同等权力。第七、铁托元帅对意大利的侵略性的要求必须予以制止。最后，最重要的是，东西方在欧洲的一切重大问题上（的争执）必须在（英美）民主军队复员前获得一项解决的办法。”

但丘吉尔自知英国力量单薄，便希望借助美国抗衡苏联。不过，在德国投降以前，美国不愿为了英国的利益和苏联发生冲突。到了 1945 年底，美国觉得可以利用英帝国日趋没落而恐惧苏联的心理，在国际上进一步散播反苏烟幕。

1946 年 1 月 16 日，已在大选中失去首相宝座的丘吉尔，以知名人士的身分应邀访美。他抵美后便多次发表谈话，主张英美联合，恢复世界均衡以及美国应长期驻军欧洲，抵销苏联军队的影响。美国政府再次掀起一阵“苏联扩张”的宣传。3 月 5 日，丘吉尔在杜鲁门陪同下，到达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演说前，杜鲁门向在场的听众介绍说，丘吉尔“是当代伟人之一”，“丘吉尔先生和我们都信仰言论自由。我知道丘吉尔先生即将作关于‘和平砥柱’的演讲。我知道他将在这篇演说中提出一些建设性的东西”。据说当时有 4 万人挤在校园内、公共场所和街道上听丘吉尔演说，并用无线电在美国全境广播，也向英国转播。

丘吉尔先作了一番自我剖白，说“此行并无官方任务”，演说“只代表自己”，只是根据自己的想法和一生的经历，谈点看法。丘吉尔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顶峰。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拥

有最大的力量，也就是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

“没有我所称之为各英语民族同胞手足一样的联合，有效地防止战争和继续发展世界组织都是办不到的。这种联合就是以英联邦与帝国为一方和以美利坚合众国为另一方建立特殊的关系。……兄弟般的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国增长的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以便共同研究潜在的危险，武器的协同，训练的教材，以及在军事院校互换军官和学员的问题。它还应包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空军基地，使现有的设施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

接着丘吉尔借用前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的“铁幕”说，不无夸张地强调了当时形势的严峻性：

“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亚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坐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苏联不希望战争，他们所希望的是得到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的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

丘吉尔提出的对策和凯南的建议如出一辙。他说，苏俄“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假使西方民主国家团结一致，严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那么，它们推行这些原则的影响力将是巨大的，没有人会来冒犯它们。不过，假使它们四分五裂，在自己执行职责时手软，假使让这紧要关头的几年白白混过去，那么，我们大家确实都要在浩劫中被毁灭了”。

在丘吉尔演说的过程中，杜鲁门多次带头鼓掌喝彩。丘吉尔的确说出了杜鲁门想说而在当时的情况下又不便说出的话。

尽管美国政府多次制造关于苏联“扩张”威胁的舆论，但丘吉尔的演说还是震动了美国朝野。3月6日，美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大加赞赏者虽有之，但批评者更为猛烈。《纽约先驱论坛报》称丘吉尔的演说是“向市民居住的杂乱无章和破败不堪的街头掷去的一束炸弹”。《芝加哥太阳报》则认为丘吉尔是想要美国为英帝国火中取栗，说：“紧随着这位伟大而盲目的贵族所高举的大旗，就会使我们投入这个世界最恐怖的去。”一时舆论大哗。美国政要们矢口否认与丘吉尔演说有任何关系。3月11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宣布“英国的政策只表现在英王及其诸大臣的声明中”，从而澄清了英国政府和丘吉尔富尔顿演说的关系。3月13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给予批驳。

**克利福德的报告** 丘吉尔发表富尔顿演说后，美国政府并未立即与苏联公开决裂，因为杜鲁门认为国内外时机还不成熟。为了进一步排除干扰，统一思想，杜鲁门指示其白宫主要助理克拉克·克利福德起草了一份长达50页的报告：《美国与苏联的关系》。1946年9月24日，杜鲁门指示在美国政府统治集团中传阅这份报告。

同凯南的电报和丘吉尔的演说相比，克利福德的这份报告更加全面地分析了美苏关系，更加系统地阐述了对苏方针。关于苏联的目标，该报告称，“苏联把控制斯德丁到的里雅斯特这一条线以东的欧洲，看作是对他们现今

的安全必不可少的，在这个地区内，他们决不容忍出现对立的势力”，同时，“企图沿着它的中、东部边界建立一个政治上屈服于苏联，无力对苏联采取敌对行动的保护地区”。但报告明确指出，“由于苏联没有远程战略空军以及几乎没有海上力量，苏联迄今不可能对美国发动战争”。

基于上述判断，报告提出美国的方针：

一是美国政府“必须首先采取步骤，制止苏联进一步的扩张”，以保证“至少在近几年中，西欧、中东、中国和日本将不落入苏联范围之内”。

二是“美国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抑制苏联，使苏联的势力范围限于目前它（所控制）的地区”。“军事力量的语言，乃是强权政治信徒们唯一能理解的语言”。

三是“一切在目前尚不处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国家，在他们反抗苏联的斗争中都应得到（美国）慷慨的经济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支持”。

四是美国政府应与苏联“摊牌”。“只有使公众充分了解情况，才能使他们支持因苏联的行动而迫切需要美国政府采取的严峻的政策。应该使美国人民充分了解与苏联相处所发生的困难，苏联在推卸责任、歪曲事实、侵略扩张以及奉行军国主义等方面的情况应公之于众”。

克利福德的报告全面勾画了美国在以后一个时期将推行的以军事抑制为主的遏制战略。杜鲁门将这一报告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传阅，表明他已决心“摊牌”了。

#### 四、美国借英国“禅让”霸主宝座之机抛出以“遏制”为核心的“杜鲁门主义”

杜鲁门政府要推行同苏联对抗，“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政策，在当时还要克服来自美国政界内部的阻力。加迪斯在《美国与冷战之起源》一书中透露：1946年夏秋之间，杜鲁门在推行对苏强硬方针时，遭到“内部两股力量的挑战”。这两股力量中的一派以前副总统、现任杜鲁门政府商务部长的华莱士为代表。他主张在政治上不与苏联公开破裂，甚至承认苏联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在经济上服从美国“门户开放”政策，以称霸世界。这实际上是要继续推行罗斯福的对苏政策。1946年9月随着华莱士被撵出政府，这一派的力量便难成气候了。

另一派是以共和党参议员塔夫脱为代表的“孤立主义”分子。

这一派虽赞同对苏强硬，却要求在军事上和经济上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孤立主义的做法上去。1946年国会中期选举时，共和党人自30年代以来第一次占据了两院多数席位。按照美国宪法，拨款权和征兵权属于国会。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坚决主张削减政府开支和军费，能否获得足够的财力和军力来“遏制”苏联，成为杜鲁门政府面对的关键问题。国会和公众不愿为冷战承担负担的情绪使杜鲁门政府深为忧虑。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向公众宣传苏联威胁的严峻性和美国必须摆脱孤立主义的重要性。主张对苏强硬的杜勒斯，则以共和党外交政策顾问身分，对《生活》杂志记者发表谈话：“苏联政策的范围是世界性的。它的目标是要在任何接受苏联共产党基本教义的地方建立统治，压制违背这些教义的政治和宗教思想。苏联便从而完成了世界大国——苏维埃帝国统治下的和平。”杜勒斯提出，美国的对策必须是“强大的军事力量加上有效的表明美国意志的行动”。杜勒斯的后台、共和党参议院领袖范登堡则说：“美国必须表现出它本来就是世界头等强国的气概。”

我们一定要当全世界精神上的领袖——不然，世界就没有头了。”当时，美国政府的逻辑是，要取得进行冷战所需的实力，就要制造冷战舆论，以“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危险和美国捍卫整个“自由世界”的使命刺激吝啬的国会。不久，希腊事态的发展使杜鲁门找到了这样的机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腊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曾是希腊境内抵抗德国占领军的主力。但希腊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丘吉尔认为，希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使之成为英国地中海生命线的关键和英国地中海政策的基点。1944年5月，英国支持下的希腊流亡政府回国改组成全国民族团结政府，并以让出少数席位给希共为代价，诱使希共取消了自己解放区的政权，不久英军和希腊政府军就开始对希共领导的武装进行大规模镇压。1946年3月，希共游击队揭开了新的革命战争的序幕，至1947年春希共武装已达13万人，且控制了大片山区和农村。

财政极度困难的英国政府已难以负担在希腊的战争费用。以财政大臣休·道尔顿为首的一批高级官员坚决主张大幅削减海外开支特别是在希腊的开支，并警告说，在面临空前严重的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停止把英国纳税者的钱无休止地为希腊人消耗”已成为当务之急。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照会美国国务院，声称由于国内经济困难，3月31日之后，英国无法再给希腊和土耳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希望美国挑起这副担子。

杜鲁门政府兴奋至极，“立刻意识到，英国此刻已将领导世界这一任务，连同其全部负担和全部光荣，一齐移交给了美国”。这正是抛出全球扩张政策的大好时机。从得到英国照会这一天起，美国联邦政府这架机器，上自总统、国务卿和海、陆军部长以及军事要员，下至政府各部有关司处的文武官员，全力以赴，为从英国手里接管希腊、土耳其而开足马力地转动起来。25日下午，副国务卿艾奇逊召开国务院内执掌政治、经济、法律、情报事务的官员会议，从各方面估计可能发生的问题。会后，官员们在艾奇逊主持下开夜车写成“国务院关于立即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立场和建议”的最后一稿。文件提出了一系列“行动建议”，敦促国会赶紧进行立法活动，授权政府通过长期财政贷款和进出口银行信用贷款，供应军事装备以及派遣美国官员等，从英国手里接管希腊和土耳其。

2月27日上午，杜鲁门邀请国会两党领袖，包括参议院临时议长、外交委员会主席，众议院议长和两院一些显要议员来白宫商讨。会上先由马歇尔把与英国外交上交换意见和局势情况说明了一番。接着艾奇逊作了长篇发言，他回顾了战争结束18个月来的美苏对立，说苏联正企图控制土耳其和希腊，以便控制东地中海和中东，从那里向南亚和非洲渗透；土耳其虽顶住了苏联的压力，但希腊的局势十分糟糕，几个星期就可能出现全面崩溃的局面。艾奇逊在纵谈了欧洲和中近东形势后，回到美苏对立的主题说：“世界上只剩下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我们已经面临自古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局面。自从罗马和迦太基对峙以来，地球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两极对立。……很清楚，苏联是侵略扩张的。因此，美国采取步骤以加强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或共产党颠覆威胁的国家，就不是什么为英国火中取栗，这是保护美国的安全——这就是保护自由本身。假如苏联成功地扩大它的控制到包括世界三分之二的土地和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那末，美国就没有安全可言，世界上任何地方的自由也都要保不住了。”艾奇逊最后强调说：“我们要么采取有力的行动来对付这一局面，要么就袖手旁观而听任失败。”

艾奇逊的发言有力地刺激了国会领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表示：既然美国和“自由世界”面临严重危机，他支持行政当局向希土两国提供援助，条件是杜鲁门必须亲自以艾奇逊适才说的主题以同样坦率的语言向国会和全国公众说清楚。

1947年3月12日下午，杜鲁门来到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会议厅，宣读了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咨文。其主要内容如下：

“世界上一批国家人民的头上，最近都在违背他们意愿的情况下，被强加上了极权主义政体……在其他一些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

“在世界历史的目前这个时刻，几乎每个国家都必须在两种有待抉择的生活方式之间进行挑选。这种挑选常常不是自由的。

“一种生活方式是以多数人的意志为基础，它突出表现为自由制度、代议制政府、自由选举、个人自由之保障、言论和宗教自由以及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

“另一种生活方式则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为基础。它依靠恐怖和压迫、受控制的报纸和广播、事先安排好的选举以及对个人自由的压制。

“我认为，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正在抵抗武装的少数派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行的征服活动的自由人民。”

1947年4月至5月，援助希土两国的法案先后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并经杜鲁门签署生效。美军和希腊政府军至1949年扑灭了希共领导的武装。

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是遏制战略。杜鲁门主义的提出具有重要影响：它将美国统治集团内部酝酿已久的反苏反共政策作为基本国策第一次公之于众，这是美国在谋求建立世界霸权的过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它的提出标志着美国政府正式放弃了罗斯福的拉拢和整合苏联的政策，而改采遏制战略；它的推行是美苏关系的一个分水岭，美苏由战时同盟发展为全面冷战；它的推行也深刻影响了战后的整个国际关系，为战后世界的发展罩上了一层深深的阴影。

## 五、面对扑面而来的阵阵冷风，苏联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

在1946年3月丘吉尔富尔顿演说时，斯大林望着窗外的3月漆黑的夜空，尽管春天正悄悄降临人间，但他仍感到寒气逼人。当时苏联的处境比较艰难。那时美国拥有原子弹，其工业潜力在战争年代增长了50%，武器装备增长了3倍，运输工具增长了6倍，农业生产增长了36%。美国的实力远远强于苏联。当时的苏联情况却完全相反。成千上万的居民点变成瓦砾，苏联西部弥漫着游击战争的战火，加之1946年又发生了可怕的饥谨，国内面临许多困难。在联合国里，苏联非常孤立，幸好在安理会内有“否决”权。斯大林感到一种严峻的、不平衡的对抗局面开始了。苏联认为丘吉尔演说是西方对苏联的严重挑战。不出一个星期，斯大林就回敬说，丘吉尔活像希特勒，也迷信“种族主义理论”，即操英语的民族“应该统治全世界”。斯大林警告说，这是在“策划战争，这是号召和苏联作战”。

斯大林在丘吉尔演说后不久就开始采取一系列新政策。1946年夏季，苏联拒绝了谈判15个月之久的10多亿美元的贷款条件，并决定不参加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想以美元为诱饵，换取苏联退出东欧，参加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想法破灭了。苏联牢牢控制东欧远比从西方得到10多亿美元重要得多。



斯大林在国内宣布执行新的五年计划，重点加强重工业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加强社会主义宣传，清除西方文化和思想意识的影响。

1946年6月，美国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代表巴鲁克发表讲话，提出美国控制原子能的计划：由国际统筹必要的原料，由国际机构进行监督；对控制和核查不得否决，一切按多数票通过的决议办理。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成立一个原子能发展机构，同样不得否决，这个机构将根据地理和战略准则来建立原子能工厂。由于美国在这个机构里掌握了多数，也就等于控制了苏联境内用于工业的核能。

苏联认为这项计划是美国要使其核垄断地位永久化的阴谋。苏联的回答是要求销毁全部原子弹，禁止生产这种武器，列强决不使用原子武器，然后再协商控制问题。当苏联讨价还价时，美国则反击说，苏联要么接受美国的方案，要么就什么方案也不要。结果什么也没有搞成。杜鲁门以苏联支持希共为由而抛出杜鲁门主义，但实际上，苏联对希共的态度却是十分暧昧的。斯大林同丘吉尔曾就英苏两国战后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达成协议：英国默认苏联在东欧的优势，而苏联则默认英国在东南欧的优势。所以在英国镇压希共武装时，苏联保持沉默；在美国宣布杜鲁门主义和大规模援助希腊时，苏联虽然猛烈抨击美国的政策，但仍未给希共以实际援助。1948年2月10日斯大林同东欧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会晤时曾说：

“希腊的起义必须放弃。他们完全没有成功的希望。你认为英国和美国——美国，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会允许你去切断他们在地中海的交通线吗？胡说。而且我们没有海军。希腊的起义必须停下来，而且越快越好。”

美国发动冷战后，斯大林一方面命令加快原子弹的研制步伐，一面谨慎地追求苏联的地缘战略目标，并以必要的妥协和让步缓和与西方的矛盾。希共不过是为苏联一国利益而牺牲的卒子罢了。

## 六、“X先生”的文章引起美国国内一场战略大辩论

1947年乔治·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重申他的秘密的八千字电报的观点，说明美国为什么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

文章一开头就说，斯大林的政策是由两种东西形成的：一种是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它要打倒世界上一切资本主义势力；另一种是独裁者一心想利用“资本主义包围”为理由来加强苏联对自己人民的控制。还说苏联外交“像一个开足了发条的玩具，定下方向以后就径直往前走，直至遇到无法应付的阻力才停下来。”因此，美国“在一系列经常变动的地区和政治问题上既严峻又巧妙地对它组织对抗，就能遏制瘟疫似的苏联侵略”。

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美国内部对冷战问题的激烈辩论。美国资深记者李普曼不接受“一个核桃两半边”的论点。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后来汇集成册，起名《冷战》。他不同意凯南对苏联动机的分析，说苏联的政策来自传统的俄罗斯扩张主义者多，来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者少。“斯大林不仅是马克思和列宁的继承人，也是彼得大帝的继承人和俄罗斯历代沙皇的继承人”。苏联红军在1945年席卷中欧的胜利，使斯大林一举完成了历代沙皇向往的事业。基于这个观点，李普曼认为苏联确实对自己的边界有一种不安全感，如果美国建议美苏都从中欧撤出军队，苏联可能愿意考虑。

李普曼认为如果美国采取杜鲁门主义，将会引起严重后果。“在我们‘遏制’苏联的国家里，我们都没完没了地大加干涉”；美国硬要把东欧的农民、

中东和亚洲的地主改造成“杰斐逊式的民主主义者”，这完全是白费工夫；美国会背上沉重的经济负担，美国军队会被派到苏联周围进行战争。李普曼警告说，一遇到情况就反击，那就会使苏联在冷战中有了主动，爱到哪里打就到哪里打，爱用什么武器打就用什么武器打。

李普曼主张在德国与苏联脱离接触，说那样是没有意义的。美国国务院否决了他的建议。事实上李普曼对杜鲁门的强硬政策是不以为然的。他是主张缓和美苏之间的僵硬关系的。但他的意见并未被重视，更谈不上被接受了。

李普曼的观点不仅仅代表他自己，而是代表着美国政界和民间的一部分人的主张。但是这种主张在当时那个形势下处于非主流地位。

## 第二章 一个核桃两半边

自杜鲁门主义提出后，美国一方面通过加强泛美联盟稳定自己的后院；另一方面以自己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为后盾，利用西欧国家的困难和普遍存在的“恐苏症”，组织起一个以苏联为敌的西方阵营。苏联则积极展开反击，督促东欧各国清除政权内部的异己分子和对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而奠定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础。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基本处于欧亚大陆，是传统的陆地国家。资本主义阵营各国有不少是海洋国家，尤以美国、英国最为典型。

### 一、美国通过组织西方阵营在欧亚大陆西端建立了反苏堡垒，世界从此形成泾渭分明的阵营对抗

美国是世界霸主也是海洋霸主，它惧怕苏联全部控制欧亚大陆，便联合处于欧亚大陆边缘的各国，组织对苏联的围堵。美国利用西欧国家的困难建立起反苏的基地。

**马歇尔计划** 为了实现对苏联的遏制，美国竭力从经济、政治和军事上将西欧置于自己全面控制之下。而战后初期的西欧国家出于克服经济、政治危机的需要和对苏联的畏惧，也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持和帮助。

战后初期，西欧各国的社会经济状况十分险恶。战争的破坏尚未得到医治，1946年又遇上百年罕见的严寒。燃料和粮食严重匮乏，人民饥寒交迫。1947年形势更加严峻。称霸世界近两个世纪的英国，一半以上的工业完全瘫痪。正如路透社的金融编辑所说，“这不是因为几场暴风雪而发生的事，这是由于极度的虚弱”。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忧喜参半他说：“大不列颠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已经完蛋了。”法国和德国的情况也不比英国好。1947年，一条香烟几乎等于德国工人一个月的工资。西柏林工人清除马路上的瓦砾，一天所得，还买不到半支香烟。统治阶级忙于转嫁经济危机，人民群众更苦不堪言，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有增无已。1947年3、4月间在莫斯科进行的讨论德国和奥地利问题的四国（美苏英法）外长会议不欢而散，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在回国的飞机上总结了会议情况，认为苏联正在采取拖延战术，以利用西欧各国的困难策动共产主义革命，所以美国必须加速复兴欧洲。他回国后即指示凯南负责研究和提出美国援助欧洲的报告。

5月23日，凯南把政策设计司关于“欧洲复兴”的具体建议交给马歇尔。这份建议从美国全球战略着眼，分析了“欧洲复兴”与“杜鲁门主义”的关系，提出美国只需表明它关心复兴欧洲，具体计划应由欧洲各国在共同合作前提下达成一致，再向美国提出。凯南认为这样处理“可以迫使欧洲人在处理本洲的经济问题时，以欧洲人的立场思考问题”，欧洲国家因为经济困难不可能对美国的意图提出质问，只能迅速接受美国的援助；援助的重点应是德国，德国的重建可能对欧洲力量均衡起决定性作用，援助德国应是美国对欧洲援助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在援助欧洲时还要给英国以特殊地位，在与欧洲各国接触前，先同英国进行秘密讨论；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它必须以这样的方式行事：使俄国的卫星国或者是对所提的条件不愿接受而把自己排除在外，或者是同意放弃他们经济上的排外方针”。几乎与此同时，马歇尔还收到助理国务卿克莱顿题为“欧洲危机”的备忘录。5月28日，马歇尔召开国务院会议，决定了马歇尔“援欧”演说的基本方针。

1947年6月5日下午，马歇尔趁出席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接受名誉学位之机，向在场的八千名听众发表演说。他的演说总共不到15分钟，首先强调了欧洲的经济困难，接着指出补救的办法在于美国的援助：“事实的真相是，欧洲在今后三四年内需要从外国，主要是从美国进口粮食和其他必要产品，其需要量比它目前所能偿付的能力大得多，因而它必须获得大量的额外援助，不然就得面临性质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恶化。”关于美国的方针，马歇尔说：“我们的政策的目的是应该是恢复世界上行之有效的经济制度，从而使自由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社会条件能够出现。由于危机的发展，我们决不能把这种援助放在零星付给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将来给予的任何援助应该是根治疾病的药品，而不应该是暂时止痛的镇痛剂。任何愿意协助完成恢复工作的政府都将得到美国政府的充分合作。任何图谋阻挠别国复兴的政府，都不能指望得到我们的援助。此外，任何为了政治或其他目的而企图延长人类痛苦的政府、政党或集团，都将遭到美国政府的反对。”马歇尔坚持先由欧洲国家提出一项受援计划。为了避免舆论谴责和苏联的反对，他在演说中闭口不谈德国，只在演说的末尾含糊他说：“就美国方面说来，任何行动获得的成功主要在于美国人民了解问题的性质以及应该予以挽救的办法。政治情绪和偏见是没有份的。”至此，美国趁西欧之危，为复兴和控制西欧及遏制苏联的计划，经过三个月精心炮制，由马歇尔故意用笼统、一般建议的形式向国内外正式发表。

尽管马歇尔不是一个惊人的演说家，其演说干干巴巴、毫无色彩，但还是很快引起欧洲国家的关注。6月5日下午马歇尔演说完时，伦敦已是晚上9时。英国《每日电讯报》接到驻华盛顿记者马格里奇的电话记录稿后1小时，就派信使骑着自行车把马歇尔的演说全文送到外交大臣贝文家里。贝文电告英国驻美代办，明确表示支持马歇尔演说。6月13日，贝文在对外新闻协会发表演说中对马歇尔演说大加赞扬，并呼吁美、英、法三国联合起来，“法国、英国和美国——地理上几乎是在一条直线上——有着巨大的共同利益”。法国外长皮杜尔也表示欢迎马歇尔计划。英法两国并向苏联发出邀请。

苏联《真理报》早就把马歇尔计划斥为杜鲁门主义加美元，妄图独霸欧洲市场以挽救美国经济。可当接到英法的邀请后，苏联的态度就缓和下来了。6月22日，苏联照会法国政府，表示苏联接受英法邀请。这使美国政府忐忑不安。美国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莱顿于6月24日飞往伦敦，与英国首相、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举行磋商。克莱顿不同意给英国另外的贷款，坚持把英国视为欧洲同盟一员的看法。当贝文问美国对苏联参加持何意见时，克莱顿说，在美国人民批准给予俄国财政援助之前，俄国必须在对待欧洲复兴及其他有关问题上，作出根本的立场上的转变。

1947年6月26日，莫洛托夫带了89位经济专家和工作人员来到巴黎。苏联对马歇尔计划是经过认真考虑的。6月27日，英法苏三国外长正式在巴黎讨论马歇尔建议。法国外长皮杜尔在第一次会议上首先提出法国的提案：由英法苏三国为主，组成一个指导委员会，在欧洲各国提出各自的国内经济资源报告的基础上，拟就欧洲国家统一的经济复兴计划大纲。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则在次日发言中指出：首先应查明美国对欧洲实行经济援助的可能性、性质和条件；制订欧洲统一经济计划需要各国泄露其本国的经济情报，会导致由某些国家干涉另一些国家的内部事务，其可能性是不大的；参加欧洲范围的经济合作不只是英法苏三国之事，还应该包括中立国和前敌国；但德国

是例外，在其赔偿问题悬而未决前，应在专门的外长会议上讨论。英法根据美国的旨意要撇开苏联“单独干”，便利用报纸制造舆论，说苏联在有意破坏会议达成结果。7月2日莫洛托夫根据苏联政府指示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企图把东欧国家变成自己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英法两国的做法“结果将不是欧洲的统一和重建，而是把欧洲分裂为两个集团”。在贝文声称英国决不因“威胁”而“退缩”之后，莫洛托夫从椅子上站起来，卷起他的文件，宣布苏联立即退出。苏联不仅自己不参加马歇尔计划，而且迫使东欧一些国家和芬兰也不参加该计划。

美国对苏联退出是非常高兴的。7月4日下午，马歇尔致电贝文和皮杜尔说，在排斥了苏联之后，西欧应该迅速制订复兴计划。

1947年7月12日，巴黎经济会议重开，西欧绝大多数国家参加。会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于8月底提出了一个要求美国提供282亿美元的援助计划，美国认为这是漫天要价而予以拒绝。经过多次讨价还价，9月22日，巴黎会议16国代表签署了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的总报告并提交美国政府。报告承认：“参加国完全认识到，没有美国对某些欧洲国家的慷慨而充分的援助，欧洲的复兴不可能达到目前的进度。”并向美国提出了四年内提供224亿美元援助的要求。9月24日，马歇尔把这份报告转呈杜鲁门。

马歇尔讲话之后，美国政府方面就开始进行大量的舆论和国会工作，以便为通过巨额拨款作准备。杜鲁门、马歇尔以及政府有关人士在各种场合演讲，宣传援助欧洲的重要性，说这一计划涉及西方文明及美国现存生活方式的生死存亡。在苏联退出巴黎会议后，美国更加公开点名批评苏联威胁和平和自由。美国政府的某些人物还组织了“公民支持马歇尔计划委员会”，由前陆军部长史汀生任名誉主席，刚辞去副国务卿职务的艾奇逊负实际责任。史汀生在《外交季刊》上撰文要美国人充分认清：不能既想当霸主又舍不得花本钱，因为“这种便宜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其结果只能是招致失败和伴随而来的产物——战争”。杜鲁门在7月向国会作的经济报告中更把马歇尔计划提到“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的高度。在广泛造势的同时，杜鲁门任命了三个小组委员会，其任务是研究本国资源情况，调查美国对外援助对本国经济的影响及美国对外援助的最佳限度。其中由商务部长哈里曼领导的19名专家组成的“哈里曼委员会”最为重要。

11月7日，哈里曼委员会提出了“欧洲复兴和美国援助”的报告，全面论述了援助欧洲和美国的利害关系，援助欧洲的数额及如何通过援助而控制西欧等问题。报告对欧洲国家报告中提出的援助要求进行了逐项削减和调整，提出美国在今后四年内可以援助欧洲的数字在127亿至172亿美元之间。报告强调美国援助欧洲抗击共产主义的“人道、经济、战略、政治利益”，并用了“冷战”字样。说“极权主义国家及其卫星国早已向信仰个人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宣布进行公开的思想意识上的战争。它被称作‘冷战’。冷战的第一个重大战斗现正在西欧进行。之所以称它是冷的，只是在枪炮没有冒烟，炸弹和定向飞弹尚未爆炸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在其他一切方面，共产党（发动的）意识形态的战争，同它决心要统治世界的热战一样残酷无情”。这等于明确承认，马歇尔计划是进行“冷战”的工具。

1947年12月19日，杜鲁门正式向国会提出一项特别咨文，要求国会批准170亿美元的援欧拨款，为期四年；专门成立经济合作署负责与欧洲联络；受援助国分别与美国签订双边协定，同时相互之间签订保证合作的多边协

定，每个季度向美国经济合作署作出报告；美援部分是赠予部分和低利贷款，受援国则以“合理价格”售给美国战略物资。1943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1948年对外援助法”。4月3日，经杜鲁门签署，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关于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数额，该法案改为头15个月拨款53亿美元，并坚持逐年审批，不确定为期四年的总数。到1952年该项计划结束，援助总数为132亿美元。受援助最多的依次为英国（包括属地）32亿、法国27亿、意大利15亿、西德14亿。

凯南日后曾就当年提出马歇尔计划的战略目的作过这样的说明。他说，除美国外，“从全世界战略实况（即军事和工业潜力）的观点来看，只有四家称得上是大国。两家在欧亚大陆之外，即日本和英国。一是苏联，另一个是中欧……从绝对的意义上说，我觉得对美国安全最大的威胁是，中欧和俄国军事工业潜力联合起来与我们作对。他们真的会连成一体，……从战略上说，甚至会超过我们的力量。当然，我认为他们做到这点也不容易，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似乎办成了。我看俄国人不一定有全面控制那一地区的才干。……但是，他们有政治思想，有共产党政治扩张思想作基础”。凯南这里所说的中欧即是指德国。马歇尔计划巧妙地把援助欧洲与重建德国问题联系起来解决。马歇尔曾对国会说：“重建欧洲，就必须重建德国。不先恢复德国的生产，就不可能恢复欧洲的经济。但是我们必须十分小心，不能再让德国威胁整个欧洲社会了。”马歇尔计划从美国与西欧国家关系角度讲，无疑是成功的。它奠定了此后西欧走向统一和繁荣的基础，也使美国从中获得巨大实利；“使美国有了一个更为凝聚的势力范围，这些都是华盛顿政府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追求的目标”，达到了巩固西欧各国资本主义制度，削弱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和使西欧唯美国马首是瞻的目的；它为美国建立针对苏联的军事联盟奠定了基础；它同时加深了西欧与东欧的分裂，加剧了双方之间的对抗。不过随着西欧各国力量的增强，也逐渐凝聚了一股反对美国控制的力量。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1947年9月，在美国的纠集下，拉丁美洲各国在里约热内卢举行会议，签订了里约热内卢公约，规定了西半球实行集体防卫制度。此前美国曾感叹：自从出现共产主义高潮，西半球就分裂了。里约热内卢公约签订后，美国人感到放心多了，有位参议员说：“这简直是黑暗世界里见到阳光啊！”稳定了自己的后院后，美国就开始推动欧洲国家成立集体防卫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美国的又一“杰作”。北约是由布鲁塞尔条约组织发展而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面临的严酷现实是，经营了几个世纪的殖民帝国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下去了。1946年9月19日，丘吉尔继富尔顿演说之后在苏黎世大学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欧洲的悲剧”的演说，号召重建“欧洲大家庭”，成立“欧洲合众国”。1948年10月9日，丘吉尔在英国保守党年会上正式提出了“三环外交”的总方针。他说“第一个环自然是英联邦和英帝国及其所包括的一切。其次是包括我国、加拿大和其他英联邦自治领在内，还有美国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英语世界。最后就是联合起来的欧洲。这三个大环同时并存，一旦它们联接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或力量的结合足以推倒它们，或敢于向它们挑战。……我们是在这三环的每一环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的一家。”英国工党政府组阁后，其外交大臣贝文公开说：“革命不能改变地理，革命也不能改变地理上的需要”，接受并实行了“三环外交”。

这样英国就改变了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传统政策，积极推动西欧联合，并特别重视法国的作用。而法国当时惧怕德国复兴，希望得到英国的帮助。早在1947年3月4日，英法就签订了表面上针对德国的敦刻尔克同盟条约。此后随着美苏冷战全面展开，英国便以苏联威胁增大为口实，谋求扩大西欧合作的范围。

1948年3月17日，英、法和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五国外长签署了为期50年的《布鲁塞尔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将在“维持国际和平和安全以及抵抗任何侵略时，彼此提供援助”；在德国侵略政策复活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等。条约规定设立由五国外长组成的协商委员会和由五国国防部长组成的西方联盟防务委员会等组织。显然，该条约组织不仅反映了西欧国家对苏联的恐惧，而且反映了对德国军国主义势力复活的担忧。

当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将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有关布约的函件交给杜鲁门时，杜鲁门立刻叫绝。在布鲁塞尔条约组织签字的当日，杜鲁门就在国会表示支持。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决定在“自助与互援”的原则下，缔结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共同防务协定。不过，他们认为，布约的范围太窄而义务太宽，不符合美国的需要，必须加以修订。经过反复考虑，杜鲁门政府确定了一项可称为大西洋联盟的政策，即由北大西洋西岸的美国、加拿大和东岸的西欧国家缔结一项避免布约固有弱点的区域性集体防务协定。1948年3月22日到4月1日，美、加、英代表在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会谈，通过了政策性的“五角大楼文件”。文件写道：“美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使得1948年3月7日在布鲁塞尔签订五国条约的签字国家按下述方式同意条约的处理，通知它们拟定一项北大西洋区域集体防务协定的计划，具体细节如下：

美、英、法三国征得比、荷、卢三国同意，并立即征求挪威、瑞典、丹麦、冰岛和意大利的意见，是否愿意在最近将来加入布鲁塞尔条约组织以及参加讨论北大西洋防务协定。

美国总统应发表一项声明，声明对布约签字国任何一国的武装进攻，均被认为是美国发动的进攻。

美英两国还要发表一项声明，即两国不能容忍针对希腊、土耳其和伊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进攻。

北大西洋区域防务协定应规定本协定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本地区的“西方文明”，实行集体防卫等。

条件成熟时，应邀请德国或德国的三个西方占领区、奥地利和西班牙参加布约和北大西洋区域防务协定。”

这个实际上反映美国意图的“五角大楼文件”经会议通过后，美国政府即指派马歇尔等人与美国国会领袖进行磋商。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对这个文件浇了一盆冷水，说这个文件难以取得国会三分之二的同意。因为如按该文件去做，西欧很可能走两个极端，“一是合着双手，让山姆大叔包办一切；二是……使

它们造成一种安全的错觉，导致采取更坚定的立场，变得易于激动，给人以一种好斗的印象。”接着，范登堡端出他的方案，把问题分成两部分：短期计划，立即向西欧提供某种合理而有效的保证；长期计划，把北大西洋区域防务与加强联合国为维护和平的工具联系在一起。4月27日国会与政府的联席会议最后决定：协定的参加国先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国家一致同意的北大西洋地理概念的范围内；希腊、土耳其和伊朗是否参加，总统

的声明中可说得笼统些；请国务院起草两个文件，一是参议院决议案；另一个是送杜鲁门的，即关于签订北大西洋区域防务协定的建议修正草案。范登堡表示第一个文件由他起草。后来他到处吹嘘所谓“范登堡决议”出自他一人之手，连打字也不劳他人。

6月11日，美国第80届国会第二次参议院会议就范登堡的议案（即第239号决议案）进行辩论和表决。当时，美国国会正对苏联在联合国多次使用否决权阻挠美国提案的通过大为不满，要限制否决权的使用范围。所以，当老谋深算的范登堡把建立北大西洋区域组织和要求联合国在和平解决争端等问题上不使用否决权放在一个决议案提出时，立即得到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当天即以64票赞成4票反对获得通过。这一文件规定，在持续与有效的自助和互援的基础上，以及在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下，美国可以通过宪法程序，参加区域性的或其他的集体防务协定。这一决议为实行大西洋联盟政策清除了法律障碍。

7月6日，美国、加拿大与布约组织代表在华盛顿就建立大西洋联盟一事举行会谈，为时长达8个月。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起草关于建立北约组织的备忘录，供参加国讨论；第二阶段推敲北约条款。根据会议议程，首先讨论欧洲形势。欧洲代表一致认为，西欧普遍存在“不安全感”，但这种“不安全感”并不意味着苏联威胁迫在眉睫，而是因为在美苏对峙中，西欧成了两个铁锤之间的砧板，一旦两家发生冲突，苏联第一个目标便是大西洋以东的西欧。美国既已同舟共济，就应对西欧安全作出明确担保。美国很清楚西欧诸国是想把美国拖在西欧，减轻自身的防务开支负担，利用马歇尔计划恢复经济，巩固在海外殖民地的地位。美国的意图则是既要利用西欧的“恐苏症”向西欧扩展，又不能因此而被拴在西欧的战车上，因而重申“自助与互援”原则。英法代表反对美国代表泛泛而谈，强调北大西洋区域国家利害一致，关键是西欧遇到进攻时美国怎么办？会谈陷入僵局后，8月20日，西欧诸国邀请美国代表洛维特进行了一次重要的场外会谈，以摸清美国的底牌到底是什么？美国代表强调，无论长期计划还是短期计划都得经国会同意，除非欧洲大陆受到实实在在的进攻，如苏联在德国动手，否则，美国不会卷入。9月9日，与会代表通过了一份通称为《华盛顿文件》的备忘录，对即将成立的组织的性质、范围、成员国的义务等作了详尽的规定。尽管有了《华盛顿文件》，在美国应对欧洲承担的军事义务问题上，在意大利等是否可以签约的问题上，美国和其他国家仍存在很多争论。美国和法国主张应让意大利加入。美国认为意大利虽在地理上不是北大西洋国家，“然而从政治观点来看，一个无依无靠的意大利则是危险的源泉”，“这可能使它产生一种孤立感；并且由于它有强大的共产党，有可能成为东方诱惑的俘虏”。法国极为重视和意大利共同防卫阿尔卑斯山道的军事战略意义，在地中海的安全问题上，法国也需要意大利支持。英国出于对其传统的势力范围的关心，则不赞成意大利加入。在拉挪威、丹麦加入问题上就更费了一番周折。不过在美国的极力拉拢下，挪威、丹麦、冰岛、葡萄牙和意大利等五国都先后决定加入北约，并得到加拿大和布约国家的认可。1949年3月18日，会议终于正式颁布了《北大西洋公约》全文。

1949年4月4日下午，以上12国外长们在华盛顿的国务院会议大厅举行了北约签字仪式。杜鲁门出席了签字仪式并致辞说：“这个公约是一个反侵略、消除侵略恐惧的盾牌，是一个能够使我们进行真正的正义工作和社会



工作的屏障。”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则在签字后对其助手说：“与美国共事是种冒险，因为美国对所有其他大西洋共同体国家占有巨大的力量优势。”该约于同年8月24日生效，实际上是无限期的。它包括序言和14条条款，其中以规定集体武装防卫、协商共同行动和协助受攻击缔约国的几条最为重要。缔约国应以不断而有效的自助及互助方法，“维持并发展其单独及集体抵抗武装攻击之能力”。第4条规定：缔约国中任何一国的领土完整、政治独立或集体安全遭受威胁时，“各缔约国应共同协商”。按照第5条，缔约国“应单独并会同其他缔约国采取视为必要之行动，包括武力之使用，协助被攻击之一国或数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

9月17日，签署北约的各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会议，决定设立以下机构：一是由各成员国外长组成的北约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二是由各成员国国防部长组成的防务委员会，负责制定统一的防务计划；三是由各国参谋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负责向防务委员会提供建议；四是由美英法三国在军事委员会的代表组成的小组委员会；五是地区性军事计划小组。

为了证明北约的有效性。在美国国会批准北约后，杜鲁门立刻要求国会拨款14亿美元，对北约成员国和像希腊、土耳其和菲律宾等国家，进行军事援助。这个计划中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援助。第一，美国需要帮助与美友好的国家增加它们自己的军事生产。第二，美国将把某些必不可少的军事装备移交给这些国家。第三，美国将派出专家到这些国家帮助训练并装备它们的军队。

杜鲁门对军事援助计划的目的解释说：

“军事援助计划的目的是防止侵略。我们的北大西洋公约伙伴们今天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有效地进行自卫的地步。战争结束以来，他们一直重建被战争破坏了的的经济。我们把某些军事装备移交给他们，并和它们组成一个共同防御计划，既加强它们，同时也加强我们自己。军事援助计划是以自助和相互支援原则为基础的，它也是欧洲复兴计划和北大西洋公约的基础……”

这个计划所要付出的代价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它是对安全所作的投资，这笔投资的收益比它本身的价值不知要大多少倍。这是和平代价的一部分。为了拯救和平而付出一些开支，或是把我们的全部资源和财产投入另一次战争，作孤注一掷，究竟是哪一条道路好呢？”

1952年希腊、土耳其正式加入北约成为第13、14个成员国。第15个成员国联邦德国于1955年加入。

西欧防务的架子已经建立起来了。它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美国打破了自己孤立主义传统，在和平时期就加入了针对别国的军事同盟；美国不仅承担同盟一员的责任，而且在联盟部队中起领导作用。

北约与希一土援助计划、马歇尔计划等等一样，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大措施和步骤。北约的成立加深了东西方之间的对立，加剧了美苏之间的冷战，并为美国提供了遏制苏联的重要工具，同时也奠定了美国和西欧相互依赖与控制及反控制的关系。

冷战蓝图杜鲁门主义出笼后，美国除采取了实施马歇尔计划、组织北约等重大措施外，还开始勾画与苏联进行冷战的蓝图。

关于与苏联的全球性对抗，1948年11月一份经杜鲁门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密文件，对苏联作了这样的估计：

⑭在可预见的未来，对美国安全最严重的威胁来自苏联的敌意图谋和可

怕的威力以及苏维埃制度的本质。

⑮苏联目前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心理战具有危险的潜力，除非美国对苏联或其他共产党国家的政策给以足够的抵制，否则它足以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相对地位，并打乱它的传统机构。

⑯与苏联开战的危险已足以有理由使美国按照常理采取有备无患的措施。

1950年1月杜鲁门指示美国国务院、国防部重新审议整个美国防务及外交战略。以上两个部门提出了一份极长的文件，于1950年4月由白宫安全委员会分发各有关部门讨论，编号为NSC68，成为美国冷战时期整个全球战略的蓝图。

这个文件一开始就提出了指导文件中其余部分的两种假设：第一，自19世纪以来，世界力量的均势已有了“根本改变”，因此美国人和俄国人现在已主宰世界：“新的因素，即不断产生危机的因素，是世界力量的极化，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奴隶社会与自由社会的对立。”能与苏联对抗的只有美国。第二，“苏联与以前谋求霸权者不同，支配它的行动的是一种同我们完全对立的狂妄野心”，它企图先在“苏联，然后在它所控制的地区行使绝对权力”。为此“苏联努力的目标是要统治欧亚两洲的大片陆地”。

文件提出美国现已采取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并说：“本纲要的成功全赖美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全体自由国家的人民认识到冷战实际上是一场关系到自由世界存亡的真正的战争。”

为了赢得这场战争，该文件最后建议：一是反对与苏联谈判，因为迫使克里姆林宫迅速改变政策的条件据说还不具备；二是发展氢弹，以抵消苏联到1954年可能实际拥有的原子武库；三是迅速建设常规军队，以维护美国利益而不必进行原子战争；四是大量增加税收，以支付扩大常规部队的费用；五是对美国社会实行动员，使美国人民在作出牺牲和团结方面保持一致；六是在美国领导下建立一个更为强大的同盟体系；七是从苏联内部破坏其制度，主要是进行心战攻势。

至此，美国今后长时间内的冷战蓝图和全面扩军备战的计划已经制定出来了。

## 二、苏联通过组织东方阵营控制了东欧，也就控制了几乎整个“心脏地带”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为东欧国家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大体分三种类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属于第一种类型。战争期间，它们被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所占领。两国共产党领导本国人民建立了革命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在苏联红军配合下，两国分别获得解放，建立了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波兰、捷克属于第二种类型。战争时期它们被德国法西斯占领，战争后期，随着苏联红军越出国界追歼敌人，它们从法西斯的奴役下获得解放，进而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则为第三种类型。大战期间，它们的反动统治者追随法西斯德国侵略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在盟军，特别是苏联红军迅速推进的形势下，它们分别与盟国签订了停战协定，随后在苏联的支持下走上人民民主的道路。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政权，一般是以无产阶级政党为主，同时吸收了某些资产阶级或其他政党的成员参加组成的。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在实行

民主改革时引起了国内反对势力及其在民主政权内部的代理人的不满和反对。同时随着美苏矛盾的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千方百计向东欧渗透和扩张，内外敌对势力的结合，使东欧各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1947年美苏冷战全商展开后，在苏联的支持下，东欧国家先后对国内反民主政权的力量进行反击，而最激烈的斗争则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

捷共要在国内推行议会民主政治，在对外政策上则一方面通过支持苏联，换取苏联减少对捷内政施压，另一方面积极谋求西方的合作。当马歇尔计划提出后，捷克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曾积极争取参加。当苏联退出巴黎三国外长预备会议，并发动了对马歇尔计划的揭露和谴责后，在苏联的反对下捷克打消了参加马歇尔计划的念头。

1947年7月至1948年2月，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捷克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激化了。一向敌视共产党的国家社会党人，战后虽然参加了以捷共为主导的联合政府，但在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支持下，总想把共产党从政府中赶走。1948年初，资产阶级政党利用上一年发生的自然灾害，急忙制造政府危机。2月13日，捷政府召开例会，原拟讨论国民保险法。但国家社会党人、司法部长德尔蒂纳突然发言，对共产党人掌管的内政部发起猛烈攻击，并联合各资产阶级政党在会上以多数票通过如下决议：对内政部和司法部同时进行调查，撤销内政部长关于调换警官的命令，政府应于17日再次开会，由内政部长汇报执行上述决议的情况。17日的政府会议一开始就充满了火药味。18日晚，捷共向全国发出宣言，谴责资产阶级政党制造政府危机；号召全体劳动人民起来保卫政权。捷克的内部危机引起苏联和西方国家的普遍关注。19日美驻捷大使斯但哈特表示美国政府愿向捷提供2500万美元信贷。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前驻捷大使佐林也于该日到达布拉格，并对捷克外长发出警告：“贵国当前发生的事件是不能容忍的，我们决不会容忍它。”20日资产阶级政党的12名部长向支持他们的总统贝奈斯提出辞呈，共产党人总理哥特瓦尔德在与贝奈斯总统会谈时，拒绝了总统要他同辞职的部长谈判的建议。根据捷宪法，在多数部长留任的情况下总统无权解散政府，当时全部26名政府成员中辞职的仅12名，于是捷共发起反击，动员群众保卫政权。结果支持与反对现政权的力量都进行了游行示威。在工人群众力量压力下，资产阶级政党内部发生了分化，贝奈斯总统终于屈服。25日下午，哥特瓦尔德拿着经总统签署的新政府成员名单，宣布新政府成立。6月7日，贝奈斯辞去总统之职，国民议会一致通过哥特瓦尔德为共和国总统，后萨波托茨基被任命为总理。

通过清除政权内部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东欧各国共产党、工人党政府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在此基础上，东欧各国普遍进行了新的议会选举，组成了新政府，对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巩固了政权，这就为东方阵营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早在1945年间，铁托就曾向斯大林建议，在各国共产党间建立一种协商性质的国际会议。斯大林表示赞赏。1946年6月，铁托访问苏联期间，斯大林询问铁托是否仍认为有建立一个具有情报性质的新的国际的必要，铁托做了肯定的回答。斯大林在宴请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领导人时，曾表示完全没有必要去复活任何形式的第三国际，但有必要建立一种情报机构，以便经常开会，交流一般的经验和作出各种决定。不过这个机构的决议不能束缚任何对决议持有异议的党。斯大林当时的设想还是很正确的。

1947年美国发动全面冷战后，苏共中央于当年夏天写信给波兰工人党第

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要波兰工人党出面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讨论加强欧洲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问题。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西南部西里西亚什克拉尔斯卡一波伦巴的小温泉场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除苏、南、波、罗、保、匈、捷的党代表外，还有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

会上，苏共代表日丹诺夫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会议根据这个报告，通过了关于国际形势的宣言。其中提出：世界已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一个是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建立美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和摧毁民主；另一个是反帝国主义民主阵营，它的基本目的是摧毁帝国主义、巩固民主和根除法西斯残余势力”。“两个完全相反的阵营——帝国主义阵营和反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总危机进一步加深、资本主义的势力日益削弱和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力量更为加强的情况下发生的”。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是美国推行全球扩张政策总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欧洲部分。宣言指出，不要过高估计敌人力量，过低估计自己力量，因为西方发动战争的愿望与组织这种战争的可能性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敌人的战争叫嚣是企图用讹诈获得让步。

会议在听取了波党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关于出席会议的各国党必须彼此交换经验和协同行动的报告后，决定成立情报局。其任务为组织经验交流，并在必要时，在互相协议的基础上，配合各国党的行动。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会议期间出现了争论，波兰的哥穆尔卡好几次就波兰应走的道路问题与苏共代表发生争论。哥穆尔卡主张波兰的社会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说波兰的合作化正受到农民的反，必须慎重进行。

在东欧国家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后，苏联于1947年7~8月间先后与东欧各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西方称之为“莫洛托夫计划”）。通过这些协定，以前流向西方或其他地区的大宗贸易都转向苏联和东欧国家，从而加速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市场的形成。1949年1月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在与会国间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以进一步加强经济合作。

1949年11月，苏联宣布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试验性原子装置，美国对原子武器的垄断地位开始被打破。同时，苏联在大力裁军的同时，在东欧部署了50万重兵，在苏联西部边境部署了60个师作为后盾。此外，苏联还与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军事协定。到40年代末苏东国家间共签订了这类条约达35个，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军事同盟体系，在维护欧洲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但是无论在情报局、经互会还是苏东双边军事合作协定中，苏联都没有认真遵守有关文件确定的平等合作的原则，其典型表现是1949年6月将南斯拉夫共产党逐出了情报局，并清洗东欧国家中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模式持不同意见的领导人。1949年11月，苏联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竟然被任命为波兰的国防部长。这种情况突出反映了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本来斯大林与铁托的关系是相当不错的，只是由于铁托在筹组南斯拉夫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国的联邦问题上没有与苏联商量，便激怒了斯大林。苏联从南斯拉夫召回了军事顾问，并发出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铁托则发回了一封经过慎重考虑的信：“我们中间不论哪一个人人都热爱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但同样热爱自己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祖国。”斯大林不仅失去了现实感，甚至宣称：“我只动了一个小指头，铁托就不存

在了。他就要倒下了。” 这些做法伤害了东欧各国人民对社会主义苏联的感情，也从根本上违背了苏联人民的利益。

### 第三章 黑云压城

从 1947 年杜鲁门主义出笼到 50 年代中期,是美苏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展开了美苏之间的第一次冷战高潮,此间险象环生,美苏在柏林的冷战“冷”到极点,在朝鲜和越南则爆发了热战,美苏进行了间接的交手。

#### 一、政治和地理条件使柏林成为冷战时期导致局势紧张的最严重和最持久的根源

柏林危机源于柏林。柏林是德国首都,苏、美、英、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决定对德国实行分区占领,柏林本身也被划成四个占领区。根据事先达成的协议,在各占领区内,占领国的军事机构是最高权力机关,只对本国政府负责。在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中,四国都拥有否决权,只有四国完全一致同意才能作出决定。从对德战争结束至第一次柏林危机爆发的两年多里,各战胜国对各自的占领区实行不同的占领政策,各占领区实际上变成了独立的政治实体。美苏冷战全面展开后,德国问题日益突出和尖锐化。因为它不仅是东西方对抗的一个主要场所,也是美苏在建立和发展各自的同盟体系时竭力争夺的重要力量。这种对抗和争夺的结果之一,便是柏林危机和德国分裂的出现。

**伦敦六国会议和苏联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 1947 年,解决德国问题的专门机构苏美英法外长会议曾分别在莫斯科和伦敦举行,但未能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在此情况下,从 1948 年 2 月起,不顾苏联政府的反对,美国联合布约五国在伦敦召开六国会议。

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2 月 23 日至 3 月 6 日为第一阶段,就德国问题的各个方面,主要是建立西德政府交换意见,达成初步协议。美国代表道格拉斯强调,组建西德政府只是走向德国最终统一的临时性措施,而且主要是针对苏联的。法国代表马西格利则表示,在德国的三个西占区合并并不难,但难保合并后的德国当局不采取有奶便是娘的态度;法国希望德国成为欧洲大家庭的有用的成员,而不是战争策源地;只有对德国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法国才能同意成立西德政府。最后美国同意在西德政府成立后继续对其实行占领政策。4 月 20 日至 6 月 1 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讨论小组文件,最后拿出召开西德制宪会议,成立西德临时政府,国际管制鲁尔等 12 个文件,即“伦敦协议”,交有关政府批准通过。6 月 18 日,美英法宣布在它们的德国占领区实行货币改革,从而在分裂德国的道路上迈出了极为重要的一步。

针对西方的行动,苏联采取了相应措施。2 月 13 日,苏联驻德军政府发布第 32 号命令,宣布改组苏占区经济委员会,“使苏占区的德国民主机构更积极参加和平工业的重建与发展”。改组后的经济委员会,设常务主席一名,由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重要成员担任。3 月 6 日,即六国伦敦会议第一阶段结束的当天,苏联政府即照会美英法三国政府,强烈谴责西方国家非法开会,已经使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形同虚设。1948 年 3 月 20 日,在苏占区军事长官索科洛夫斯基主持下,由苏美英法代表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在柏林举行会议。会上,索科洛夫斯基首先介绍了东欧几国外长会议的情况,随后提出要求了解六国伦敦会议的全部协议,遭到美国代表驻德军事长官克莱的拒绝。索科洛夫斯基听后立即宣读一篇事先准备好的声明:

“美、英、法三国正式代表曾在伦敦会议中讨论并决定有关德国的问题,

这些问题与管制委员会的职权有直接的关系，而且只有在占领德国的四国协议基础上才能加以决定。可是，美、英、法占领当局不愿向管制委员会报告伦敦会议中所拟定的决议，也不愿说明它们因伦敦会议关于德国问题的片面决议所接到的指示和训令。……这几位代表以他们的行动再度证实：管制委员会实际上不复是执行四国管理德国的最高权力机关……这就是说：这几个代表团在破坏并葬送管制委员会，在破坏对德管制委员会所缔结的协定。”

索科洛夫斯基话音刚落，西方代表要求发言。但索科洛夫斯基打断西方代表的讲话说：“我认为继续开会毫无意义，休会。”苏联代表团不再发言，“就转身走出了会议室”。这样苏联就退出了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

苏联试探性封锁柏林和美国的对策商讨。1948年3月30日，苏联驻柏林代表通知柏林的美国军事长官，从4月1日起，苏方将检查所有通过苏占区的美国人的证件，并检查所有货运和除私人行李以外的一切物品。苏联开始在柏林实行一系列交通限制。

苏联所以选择柏林下手，是因为西方在保护通往柏林的通道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美国如果不能有效保护柏林交通，就会在其西方盟友中丧失信誉，西德的信心也会受到沉重打击。

美国对苏联的行动深为震动，也大惑不解。美国驻德军事当局立即向苏联提出抗议。指责苏联限制柏林和德国西占区之间的交通，破坏了1945年6月29日朱可夫、克莱和英占区前军事长官威克斯商定的关于保证美、英、法三国人员经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的地面通道的协议。但是除了1945年11月30日盟国管制委员会第13次会议关于“规定柏林和西德之间建立三条空中走廊，在这些走廊上飞行可不必事先通知”有正式文件外，有关西方三国进入柏林的地面通道协议，美国方面拿不出任何正式文字根据。美国政府内部摸不清苏联的意图，主张再瞧一下。4月10日，苏联对柏林交通限制暂时解除。苏联限制柏林地面交通的理由都是属于行政技术性的，如线路需要修缮，货物托运手续不全，西德乘客被禁止通过苏占区是因为通行证不合格或从事投机活动，等等。索科洛夫斯基曾对西方三国军事长官说，如果西方国家放弃成立西德政府的计划，因“技术困难”而造成的“封锁”将不再存在。在封锁的具体做法上，苏联只切断水陆交通，三条空中走廊仍保持畅通。苏联有时虽威胁要加强管制西方飞机的飞行，但并没有直接干扰空运。苏方担心，干扰空运可能引起美英采取护航措施以致引起冲突，那样就不会有回旋余地了。

3月30日，美国驻德军事长官克莱在接到苏联通知将在柏林实施交通限制后，还密电陆军参谋长布莱德雷，建议不理睬苏方通知，派美军随车护送，如苏联士兵动武，美军立即予以回击。克莱认为此举所冒风险虽大，但“除非我们现在就采取强硬立场，不然我们在柏林就活不下去了。依我看来，在这个时候从柏林撤退，这在欧洲引起的政治后果，如不是灾难性的，也将是十分严重的”。布莱德雷接到密电后立即与多位军事要员商谈，并向杜鲁门提出下列建议：向斯大林发出警告电文，指出限制柏林交通会造成意外事故，从而引起战争；召开国会领袖会议；指示克莱阻止苏联士兵闯入美国列车，只在自卫时才能下令开枪；和英国接触以了解其意图。但杜鲁门既没有向克莱发出指示，也没有召开国会领袖会议，更没有向苏联提出抗议，而是要布莱德雷在4月1日通知克莱，不采取此种冒险措施。4月间，苏联为时10天的交通限制解除后，对于如何处理柏林问题，美国政府内部仍然存

在分歧和争论。有的主张不惜代价留在柏林，有的坚持认为西柏林是守不住的，应在被赶走以前先行撤离。还有的主张和苏联磨下去，反正莫斯科是不想进行战争的。这些意见相互争论不休，直到柏林地面交通全被封锁时。

**苏联全面封锁柏林地面交通和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 1948年6月以前，苏联对柏林地面交通的限制时松时紧，和西方组建西德政府的锣鼓声的稀密有关。当6月18日，美英法三国宣布在德国占领区进行货币改革后，苏联立即于19日发表声明，“大柏林在苏联占领区内，经济上为苏占区的一部分”，为了“保护苏占区居民和该区经济利益，防止对苏占区货币流通的破坏”，决定对西方国家进入柏林的通路实施下列“交通限制”：停止火车客运交通、禁止西占区汽车和马匹进入苏占区；水路运输须经许可并彻底检查后始能放行；个人通行证无效；货运列车须经彻底检查始能通行。这样就紧缩了对柏林的封锁圈，全面切断了西德与柏林之间的水陆交通。

6月24日，西德和柏林之间的水陆运输中断。苏管区曾提出向西柏林居民供应粮食和用水等必需品，但被西方拒绝。美国一方面故意透露西柏林粮食库存只能维持36天，煤库存量只能维持45天，说西柏林250万居民即将饥寒交迫，煽动西柏林居民对苏联的不满。另一方面由克莱出面向记者宣称：“苏联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迫使美国放弃柏林。”英法两国相继声明，要留在柏林。与此同时，美英也对苏占区采取了封锁措施。24日英国中断了运往苏占区的煤、钢。25日，美英双占区经济委员会决定进一步限制同苏占区的贸易。克莱对于取道美管区来往于东柏林与波茨坦（在大柏林的西南角，当时有许多苏联人在此居住）之间的苏联人故意留难，以示报复。26日，当索科洛夫斯基乘车疾驰经过美占区时，被美军装甲巡逻车截止。索科洛夫斯基的武装警卫人员立刻从后面一辆车上持枪跳下来。美军“巡逻人员迅速用枪口对准索科洛夫斯基的胸膛，他的警卫人员就软下来。在美国官员到达检查身分证和放行之前，他被扣留几乎1小时”。但在当晚，克莱却又亲自登门向索科洛夫斯基道歉。

早在6月24日晚上，克莱就下决心留在柏林，并决定空运食物供应西柏林居民，当天克莱和设在西德威斯巴登的美国空军总部柯蒂斯·李梅将军通电话：

“柯蒂斯，你们能用飞机运煤吗？”

李梅给呆住了，以为电话出了毛病，过了一会才回答说：“原谅我，将军，请你再说一遍好吗？”

李梅放下电话后，立即调动他所掌握的飞机，第二天开始向柏林空运。

在华盛顿，陆军部担心克莱的做法会同苏联发生正面冲突，于25日晚指示克莱：假如存在引起武装冲突的可能性的话，西方货币在柏林可以暂缓流通。克莱当即指出为时已经太晚，因为西方货币已在柏林出笼。克莱坚持说“假如苏联人要战争，这不是因为柏林货币问题，而是因为他们相信这时正是适宜进行战争的时候。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还很遥远，当然也不能完全忽视”。

在6月26日的内阁会议上，杜鲁门下令“（空运）应在全面组织的基础上进行”，同时命令美国的“欧洲司令部能够获得的一切飞机都必须服役”。但杜鲁门和他的许多高级官员，并不相信依靠空运能够长期供应柏林的需要，空运只是为赢得较多时间以打开“外交僵局”罢了。27日下午，一批美国高级文武官员在陆军部长的办公室商讨柏林局势，提出了撤、不撤和既不



撤亦不硬守三种相互对立的办法，由杜鲁门裁决。6月28日当他们向杜鲁门汇报讨论情况时，杜鲁门表示：“我们留在柏林是有协定根据的，俄国人无权直接或间接施加压力把我们撵走”。美国必须留在柏林，这点无须讨论。根据这一基本方针，美国随后陆续采取了几项措施。

一是经英国同意，除向德国派 B—29 轰炸机外，还将有两个大队共 60 架 B—29 作为赠予派往英国。B—29 就是用于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轰炸机。实际上赠给英国的 B—29 未经改装，不能携带原子弹，但外界并不知道其中的区别。美国此时正忙于筹组北约，已大体上确定把运载核武器的战略空军作为威慑力量，正苦于没有适当的借口把核武器引进西欧。美国认为“柏林危机”正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好机会。美国利用西欧的“恐苏症”，很快取得英国同意。7月17、18日两天，60架 B—29 飞机以“远距离飞行训练”为名，在英国本土降落。这也是美国在英国建立战略空军基地的开始。美国一高级官员在日记中写道：“飞机一旦抵达英国就成为既成事实，如果丧失当前派遣飞机的机会，以后欧洲形势恶化时，英国人也许不会接受这种飞机了。”英国首相艾德礼事后说：“我们必须对付俄国可能席卷欧洲的危险，我们必须要有某种办法来阻止他们。空军是一种办法，在空军方面，由于西方拥有原子弹，就较俄国占有优势。”“英国不得不作出令人不快的然而现实的决定”。

二是下决心调动运输机进行持续的大规模空运。从6月29日起，美国便加强了对柏林的空运，包括用飞机运大量过冬的燃料。运输力量绝大部分靠美国，英国提供了少量飞机，法国则一架飞机也没提供。杜鲁门在决定加强对柏林空运时，曾担心可能因“一个偶然事件而燃起战火”，因此下令克莱等回国汇报。在7月23日召开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克莱断然否定了苏联试图以战斗机巡逻或其他办法阻止美国飞机的可能性，并说没有迹象表明苏联现在会发动战争。但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却在会上一再反对把飞机集中起来给柏林搞空运，理由是备作紧急之用的许多飞机可能在发生敌对行动时被毁：把飞机集中起来给柏林搞空运，意味着削弱其他地方的美国空军力量，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就会使美国“暴露在无法收拾的形势之下”。杜鲁门权衡利弊，认为要继续留在柏林而又不致冒全面战争的危险，“空运比陆路武装护送危险性小”。因此，他命令空军“对供应柏林问题尽量给予充分支持”。在西柏林被封锁的324天中，西方共出动了27,7728万架次的飞机参加空运，空运物资达211万吨。

三是开动宣传机器，在全世界大造舆论，说苏联为达到其政治目的，把200余万西柏林居民当作“人质”。把制造紧张气氛和分裂德国的责任全部推给苏联。

四是不放弃外交交涉，试探妥协的可能性。英法一直主张在西柏林流通货币问题上可以让步。美国勉强同意，曾对苏方提出过以此来换取取消封锁。但美国坚持要参与共同管制柏林的货币，被苏方拒绝。苏联还提出要西方停止执行“伦敦协议”关于建立西德政府的计划。

8月3日，美英法三国大使直接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的态度很和解。美国驻苏大使史密斯描述谈判临近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向椅背上一靠，燃起雪茄，微笑地望着史密斯问道：

“你想今天夜里就解决这个问题吗？”

史密斯回答说：“当然希望如此。”

斯大林说：“很好，我能满足你这项建议。在苏占区柏林发行德意志马克以代替西方‘B’记马克，的同时，解除所有交通限制。第二、苏联政府虽不再要求以暂缓实施关于建立西德政府的伦敦协议作为条件，但这点是苏联政府坚定的愿望，必须写进记录。”

根据斯大林提出的原则，苏美英法代表8月6日至16日在莫斯科进行了四次会谈。但在下列主要问题上争执不下：苏联认为只有推迟建立西德政府才能解除封锁；莫洛托夫对于“解除所有交通限制”的解释，只限于解除6月6日以后的交通限制；苏联对西方国家在柏林的地位继续持有异议，提出应由这次会议签订新协定加以规定；苏联不赞同在整个柏林流通的货币必须由四国共同管制和发行。8月23日美国大使史密斯又单独会见斯大林。斯大林的态度很和解。但是在四国外长和占领军事长官之间频繁的会晤中，在具体问题上始终达不成协议。事实是双方都不愿把谈判的大门封死，但在根本问题上立场无接近希望。

9月4日，索科洛夫斯基宣布苏联空军准备进行演习，其范围包括“空中走廊”。这样，局势更为紧张。法国特别害怕卷入战争，在冒战争风险和放弃柏林之间，它宁愿选择后者。美国在安抚盟国的同时，坚持其强硬立场，它仍然两手并用。9月13日，美国国防部长福莱斯特尔在一次白宫会议上向社鲁门转述了国会方面提出的问题：现在需要作出决定，一旦柏林发生战事，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可以使用原子弹。杜鲁门回答说，他祈祷上帝自己不必作出这样的决定，但是对他在必要时会这样做不要有任何怀疑。次日晚上，福莱斯特尔又邀请19家报纸社长和主编在家里聚会。在场者一致的看法是：如果发生战争，美国人民将一致拥护使用原子弹。这是美国统治集团在利用新闻界对苏联进行核讹诈。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继续同苏联政府进行照会战，并说服英、法，于10月4日将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10月22日，安理会六个非常任理事国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撤消柏林通道的所有交通限制及举行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整个德国悬而未决的问题。美国代表立即表示接受，苏联代表行使否决权。

**柏林封锁的解除与两个德国的出现** 在封锁柏林事件中，苏联事实上一直留有余地。到1949年1月，僵持局面出现转机。1月31日，莫斯科发表斯大林答美国国际新闻社分社社长金斯伯利·史密斯问。其中关于苏联解除对柏林封锁的条件，斯大林没有提到货币问题。美国方面立即注意到这一变化，新上任的国务卿艾奇逊指示美驻联合国代表杰塞普私下问苏联代表马立克：斯大林未提货币问题是否出于偶然，马立克答不知道。3月14日马立克突然专门约见杰塞普，告诉他这一“省略”不是偶然，货币问题可在外长会议上讨论。3月21日，马立克从莫斯科回纽约，与杰塞普达成谅解：双方确定外长会议日期，苏联即可取消封锁，西方则推迟西德政府的筹建工作。5月5日，苏、美、英、法同时发表公报，宣布自5月12日起取消东西德之间的一切交通和贸易限制；于5月23日在巴黎召开四国外长会议。

巴黎会议从5月23日到6月20日，双方相持不下。苏联坚持建立全德国务会议，作为全德的经济和政治机构核心，四国联合提出对德和约草案；西方坚持建立最高委员会，东占区接受西占区的，“基本法”与“占领法规”，在此基础上建立全德“联邦政府”。实际上双方都要以自己的方案统一德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巴黎四国外长会议终以失败告终。此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于8月20日宣告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0月7日宣告成立。从此

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东西德分别加入东西方阵营。柏林问题成为东西方磨擦和紧张的根源之一。

围绕柏林的封锁与反封锁斗争通常被称作第一次柏林危机，它实际上是美苏在中欧的一次力量和意志的较量。在此过程中双方都采取过边缘政策，但事实上都适可而止，避免了冲突升级为战争。美国坚持强硬政策，在这一回合中取得了胜利，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苏联对美国的决心、空运能力和西欧国家都估计不足。苏联虽没有把西方势力赶出柏林，但在此期间基本完成了建立东德政权的步骤。

## 二、在欧亚大陆西端两大集团尖锐对峙，而在东端则爆发了两场著名的热战

第一次柏林危机平息不久，全世界的目光便被吸引到远东。

美国在以欧洲为重点对苏联展开冷战的同时，在亚洲则扶持中国的蒋介石集团、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和日本等，以便组织一个反苏反共的同盟体系。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好梦难圆。

50年代初期，东西方在远东的对抗导致了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美国为推行霸权主义、遏制苏联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以不同方式介入了这两场战争。朝鲜战争和印支战争成为继柏林危机之后东西方在亚洲进行的新较量。所不同的是，美苏在欧洲的较量是以封锁反封锁的形式出现的，而在亚洲的较量则采取了热战形式，美军直接参加了朝鲜战争，但苏军并未进入战争第一线。

朝鲜战争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曾经说过：“谁统治了东北亚，谁就掌握了西太平洋，谁就掌握了整个亚洲的命运。”而东北亚的锁钥是朝鲜半岛。

朝鲜半岛东濒日本海，西临黄海，北以鸭绿江、图们江与中国为邻，东北角与俄罗斯接壤，东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相望。朝鲜半岛三面环海、背依大陆，处于亚洲太平洋地区和日本列岛通往大陆的“桥梁”地带，朝鲜海峡又是扼东北亚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要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20世纪初，一位朝鲜爱国志士乘坐火车时没有座位，只好蹲在火车车厢的过道里。旅客们来来往往，这位志士怎么也无法入睡。他突然眼睛一亮，“啊，这过道就是我们朝鲜！”

的确，朝鲜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16世纪日本的封建军阀丰臣秀吉就曾妄图吞并朝鲜。如果说朝鲜作为清朝强盛时期的被保护国还比较安宁的话，那么随着清朝的衰落，日本的崛起，俄国的东侵，朝鲜再没有过片刻的宁静。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或多或少与朝鲜问题有关。

日本于1910年把朝鲜沦为自己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取代了日本在远东的地位，而苏联也恢复了在远东的影响。美苏以三八线为界对朝鲜实行分区占领，实行不同的占领政策。1948年8、9月间朝鲜正式发生分裂，南北先后出现了两个政权，分属东西方阵营。1948年底苏联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撤军，美国在对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大力扶持后也于1949年6月将军队撤出南朝鲜。朝鲜的分裂局面根本不符合朝鲜人民的愿望，对于南北双方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其结果必然要加剧这一地区的紧张局势。

1950年6月25日，南朝鲜军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警备队在三八线附近发生冲突。经过数小时激战，南朝鲜军迅速溃败，朝鲜人民军乘胜大

举反击，推进异常迅速。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统治集团十分紧张，6月26日，美国国防部命令火速从日本空运军火支援南朝鲜军。6月27日，杜鲁门正式发布侵朝占台的声明，命令美国海空军参加朝鲜战争，命令美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同日，美国政府力图利用苏联抵制安理会之机为自己的侵略行动包上一层联合国外衣，操纵联合国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联合国成员国向南朝鲜提供援助，对北朝鲜实行制裁。由于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干涉，特别是美军从仁川登陆后，朝鲜战争形势急转直下。

针对美国政府蓄意扩大朝鲜战争的阴谋，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声明，提出严重警告。9月30日，即在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的前夕，周恩来总理再次严正宣布：“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传话给美国：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出兵援助北朝鲜；若只是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不采取这一行动。美国国务院收到了许多驻外使馆转发来的潘尼迦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着实紧张了一阵子。但最后认定中国出兵的有利时机已经过去，杜鲁门始终不相信印度驻华大使关于重视中国总理10月3日警告的分析。在杜鲁门的眼里，“潘尼迦先生在过去却是经常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家伙，因此他的话不能当作一个公正观察家的话来看待。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共产党宣传的传声筒罢了”。于是下令“联合国军”悍然于10月7日越过三八线。鉴于美方的骄横无理，毛泽东于10月8日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命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10月25日发起第一次战役。美国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直到在第二次战役中失败后才如梦初醒。

11月28日美军的所谓“圣诞节总攻势”惨败的消息传来后，杜鲁门急忙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商讨对策。美国政要们一方面强调要从美苏全球对抗的角度看待在朝鲜的战争，不要中了苏联调虎离山的诡计，另一方面又要对中国施加压力。11月30日杜鲁门亲自出马举行记者招待会，威胁要扩大朝鲜战争，并挥舞原子弹对中国进行讹诈。

“杜鲁门：我们将一如既往地采取任何必要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

记者：那是否包括原子弹？

杜鲁门：包括我们所有的各种武器。

记者：总统先生，你说‘我们所有的各种武器’，这是不是说正在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

杜鲁门：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我不希望有朝一日使用它。这是一种可怕的武器，不应该用来对付无辜的男女老幼，他们和军事侵略无关。可是一旦使用原子弹，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了。”

杜鲁门对中国进行核讹诈没有吓倒中国人民，却在美国的盟国中引起争吵，并激怒了亚洲国家的人民。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和罗斯福夫人谈话时说，“美国喜欢用原子弹对付有色人种”，表示了极大的不满。英国首相艾德礼于12月上旬专程赶往华盛顿与杜鲁门进行会谈。艾德礼一再强调，西方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非中国，不能因为深陷亚洲而在欧洲任苏联摆布。艾德礼还尖锐批评麦克阿瑟的独断专横，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作战。杜鲁门在坚持继续侵朝战争的同时，作了一些让步，包括允诺不因朝鲜战争而忽视西欧防务；在三八线附近实行地面停火，以及不经与英国协商就不会考虑使用原子弹，从而确立了在朝鲜实行所谓“有限战争”的政策。

1951年除夕之夜,中朝军队发动了第三次战役,并于1月4日攻占汉城。“联合国军”的防线崩溃,到1月8日战役结束时已被迫撤至37度线附近。中朝军队的攻势使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参战目标是将美军赶出朝鲜半岛。美国争取通过联合国阻止中朝军队的进攻。1月13日,联合国大会政委会通过一项解决朝鲜问题的补充报告,内容包括首先停战,外国军队分阶段撤出,停战后设美英中苏四国机构,讨论解决包括台湾和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等远东问题。美国对此案投了赞成票,并同意转交中国政府。美国政府在中国答复前已经决定,这是它让步的极限,如果中国政府不接受,美国就采取行动,使联合国谴责中国为侵略者。17日周恩来致函联合国政委会,拒绝接受联大的决议。2月1日,在美国的压力和影响下,联合国大会通过1771号决议,认定中国“已经在朝鲜进行侵略”。与此同时,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使美国政府终于定下神来。1月25日,“联合国军”开始反攻,经过50天的攻防战,“联合国军”于3月15日控制了汉城,并推进到三八线。此时,美国政府内部围绕是否再次越过三八线出现分歧。国务院的意见是希望军事形势的稳定成为政治解决的基础,军方则认为规定“联合国军”不得越过三八线是不能接受的。3月24日,不可一世的麦克阿瑟发表声明:“联合国军”失败是它受联合国约束造成的,如果允许将军事行动扩大到朝鲜境外,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麦克阿瑟的声明不仅遭到中国方面的严厉谴责,而且暴露了美国政府内部的分歧:扩大战争与使战争有限化之争。这一争论的实质涉及到美国的全球战略贯穿的“欧洲第一”的原则。美国政府决定不扩大战争时所考虑到的各种因素,无一不受到这一战略原则的制约,而麦克阿瑟正是要向这项国策挑战。4月11日,麦克阿瑟突然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1951年中朝军队第五次战役结束,双方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双方开始谈判。然而,美国虽然在战场上遭到失败,但仍然充满了世界霸主的骄横之气,最初在谈判中并无诚意,试图在谈判桌上获得在战场上不能获得的东西。为此,美国代表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三八线以北18~50公里的朝中阵地之内。这意味着朝鲜北方将丧失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代表还在战俘问题上提出了“自愿遣返”、“一对一交换”主张,以求达到强制扣留朝中被俘人员的目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妄想通过施加军事压力迫使中朝方面屈服。1951年它先后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在地面部队无法打赢时,1952年它又利用自己的“空中优势”,对中朝军队的阵地及后方的交通设施实行狂轰滥炸。中朝方面针锋相对,在谈判桌上进行了有理有利的斗争,在战场上一再粉碎了美军的军事冒险。1953年初上台的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同意实行停战。

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美国政府侵朝政策的失败。为了进行侵略战争,美国投入了巨大的军事力量,包括陆军兵力的三分之一,空军兵力的五分之一,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舰艇,以及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新式武器。它因此付出的军费高达200亿美元,消耗的物资达7300万吨,被消灭军队109万,其中美军39万。直到签署停战协定时,美军仍然停留在三年前发动武装进攻时所处的三八线附近。连接替李奇微出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美国将军克拉克也承认,他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停战胜利的停战协定上签字的将军”。美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在亚洲遭到有力的打击。

**印支战争** 印度支那是法国传统的势力范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日军

占领。日本投降后胡志明宣告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1946年12月法国以10万侵略军对越南发动全面进攻，妄图一举占领河内，重建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越南抗法战争开始，印度支那人民英勇作战，但直到新中国成立之时，他们的处境依然十分艰难。

1950年中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同年1月，根据秘密访华的胡志明主席的请求，中国政府作出了全面援越的重大决定。中国政府派出了以陈质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发起边界战役并取得了胜利，使越南北部的中央根据地通过1000公里的中越边界与中国连成了一片，后来又在奠边府战役中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政府重新看待印度支那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在此以前，美国把蒋家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看成美国在远东遏制苏联的城墙的一部分。而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苏联的影响一下子南移了几千公里，并且很有可能经由中国向东南亚继续获得发展。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和建构反华包围圈，便朝着积极支持法国的战争努力的方向移动。到杜鲁门下台前夕，美国几乎承担了法国在印支战争费用的三分之一。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他信奉“多米诺骨牌”理论，认为如果任凭越南落入共产党之手，那么就会产生连锁反应，东南亚许多国家也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美国的战略利益和国际威望就会遭受巨大损失。他和以反共强硬派著称的国务卿杜勒斯一起继续执行前任的印支政策，不仅继续增加对法国的军事援助，而且参与了法国军事计划的制订。

1954年4月至7月日内瓦会议召开，中苏美英法五大国外长、朝鲜问题当事国、越南南北方及老挝、柬埔寨的代表出席了会议。美国企图极力阻止关于解决越南问题的协议通过，但中国政府代表周恩来对越南和法国代表做了大量工作。中国和苏联代表向越南方面指出了美国干涉的危险性。胡志明认识到这一危险，当时越共不具备与美国抗衡的实力，因此在会议上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态度。6月12日，在日内瓦会议上采取拖延策略的法国拉尼埃政府垮台，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停止在印支的肮脏战争的决议。6月17日，孟戴斯·弗朗斯受命组成新内阁。他上台时宣布，要在四个星期内实现印度支那问题的和平解决。尤其值得一提的是6月23日周恩来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同法国总理孟戴斯的会晤。

周恩来从法国切身利益出发，耐心细致地向孟戴斯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印度支那半岛的形势和法国国内形势，诚恳地说：

“印度支那战争已经打了8年，不但印度支那人民饱尝战争之苦，整个东南亚的和平和稳定都无法实现。贵国人民也受到很大损失，并且使贵国政府在政治、经济各方面都陷入了极大的困境。”

接着，周恩来进一步指出：“相信孟戴斯先生是明智的，不会让美国人牵着鼻子走。美国阻挠达成协议，受损害的不只是印度支那三国，还有法国政府和人民。”

孟戴斯听后向周恩来表示：“你讲的非常合情合理，我决心以一个月为期限实现停火。尊敬的周恩来先生，如果在7月20日不能就印度支那问题达成和平协议，我将提出辞职。”

7月20日，越南最后在会议上接受了以北纬17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并取得了在协议中明文规定的“两年内通过普选统一越南”的条款。根据会议达成的协议，法国尊重印支三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统一。印支三国停战

后将不参加任何同盟，也不容许任何外国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在会议上陷入孤立的美国代表对此协议非常不满，拒绝正式参加，但虚伪地声明，“美国将不使用威胁或武力去妨碍这些协定和条款”。另一方面，就在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刚刚缔结的日内瓦协议“包含着我们所不喜欢的东西”，美国不是协议的一方，不受它的约束。60年代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重新爆发了印度支那战争。

### 三、美苏努力壮大各自的同盟体系，扩大的东西方阵营形成全面对抗

美国扩大西方阵营的第一个行动是组织太平洋同盟体系。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国为了所谓“积极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和加速缔结片面的对日和约，就利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早先提出的缔结太平洋公约的要求，加紧筹建“太平洋集体防务”。1951年初，美国国务院提出一份《太平洋公约草案》，并派杜勒斯为特使到堪培拉进行游说，但遭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的反对。澳大利亚外长斯彭德说：关于太平洋地区防务安排，要么把这个地区所有感到受威胁的国家都包括进来，要么就先从澳、新、美三国做起。

杜勒斯：为什么不能把日本和菲律宾包括在内？

道奇（新西兰外长）：新西兰不能支持五国缔约的建议。

斯彭德：我国的观点与新西兰一样。要澳大利亚人民接受一个包括日本在内的太平洋安全体系，这个要求未免太过分了！

在此情况下，1951年4月美国政府被迫改变做法，决定在太平洋地区用“一系列安排”代替“单一安排”。即一方面与澳新签订三方安全条约，另一方面又分别与日本和菲律宾签订双边安全条约，这三个条约合在一起就相当于太平洋公约。此后美国加快了与澳新菲三国的谈判。1951年8月和9月，在美国旧金山分别签署了《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澳新美安全条约》。这两个条约虽然模仿的是《北大西洋公约》，但有关义务的提法更笼统。作为条约核心的第4条规定：“每一缔约国都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对任何一缔约国的武装攻击都将危及它自己的和平和安全，并宣布它将按照它的宪法程序采取行动，应付共同的危险。”显然这样的措辞使美国在履行义务的问题上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不久，美国又与日本签署了《安全保障条约》。

美国在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后，就想通过请和使这一占领合法化，但遭到苏联的反对。当时的蒋介石政府和英国态度也不积极。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加紧了单独对日媾和活动。1951年7月12日，美英公布了对日和约草案，遭到中苏方面的坚决反对，也引起了印度等国的严重不安。9月8日，除苏联、波兰、捷克以外的48个国家签署了所谓《对日和约》，中国被排除在条约签字国以外，中国政府在所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这个和约“不仅不是全面和约，而且完全不是真正和约，这只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又与南朝鲜当局、台湾当局缔结“共同防御”条约及东南亚防务条约，发展了美国在太平洋构筑的同盟体系。美国与南朝鲜当局的条约订于1953年10月。同年3月，台湾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缔结中美安全条约”的问题。美国政府一方面想继续控制台湾，阻挠中国统一，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被国民党拉下水，卷入一场它想避免的与中国大陆的直接冲突，因而对国民党的要求并不积极。台湾当局一面加

紧在大陆沿海制造紧张局势，一面对美国多方请求，终于于 1954 年缔结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

1954 年 9 月 8 日，英、法、澳、新、菲、泰国、巴基斯坦和美国政府的代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署了《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样到 1954 年底，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体系已经获得重要的发展，新增加了南朝鲜、台湾、泰国和巴基斯坦等地区和国家。英国和法国也通过东南亚防务条约直接卷入了美国在亚洲构筑的同盟体系。不久，美国又利用巴格达条约将它的亚洲同盟体系扩展到中东，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先后加入，这样美国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建立的两大同盟体系事实上已经衔接起来了。

美国扩大西方阵营的第二个行动是扩大北约。1950 年 5 月法国外交部长舒曼公布了一份备忘录即舒曼计划，倡议把“法德的全部煤钢生产置于一个其他欧洲国家都可参加的高级联营机构的管制之下”。这一计划得到了美国和西欧许多国家的支持。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欧担心苏联进攻，迫切需要重新武装西德。1954 年 9 月，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访问了西欧，并提出了一个得到美国政府支持的新建议。这一建议既能适应美国重新武装西德的要求，又能消除法国对西德重新武装所怀的疑虑，还能加强英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发言权。以艾登计划为基础，九国（布约五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西德）外长先后在伦敦和巴黎召开会议，最后签订了巴黎协定。这一协定与欧洲防务集团条约有显著区别，它大大缩小了这一条约的超国家权力，建立了一个比较灵活的西欧国家体制；它完成了对西德的重新武装又对其军队规模加以限制。西德和西欧联盟被纳入北约的战略轨道，法德这两个世仇消除了矛盾，英国在历史上首次同时与西欧三国（法德意）结盟。北约进一步完成了内部整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0 年间，美国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终于完成了其称霸世界的战略调整：以泛美同盟体系巩固了自己的后院，以北约和太平洋同盟体系完成了对欧亚大陆上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围堵。但是美国拼凑的这一复杂的同盟体系有着其先天的不足，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地区）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它们有的因担心社会主义革命而加入了太平洋同盟体系，但又不愿被死死绑在美国的战车上，更不想充当美国称霸世界的马前卒。这正是美国太平洋同盟体系后来破产的原因。

**东方阵营的壮大** 中国“一边倒”使东方阵营大大壮大起来。1840 年以前中国是东亚唯一的大国，在东亚有着重要的影响。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使中国沦为一个贫弱的国家，其中又以俄国和日本这两个强盗国家对近代中国造成的灾难最严重。

中国虽然大而弱，但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和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美国地缘政治学家斯派克曼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就警告过美国决策者们：中国是边缘地带最重要的国家之一，“必须警惕未来形成一个强大统一集权的中国，警惕它获得能力把它的势力影响扩张到西太平洋沿岸。但只要中国统一还未完成，中国就难以构成这种威胁，所以在日本战败后，美国在远东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必须防范中国成为这个地区最强大的国家”。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就是想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属国，防止中国加入苏联集团。眼看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美国国务院又制定了使中共与苏联分开的政策，即所谓在中国问题上等待“尘埃落定”政策，寄希望新中国与苏联决裂。苏联作出过一系列伤害中国的国家利益和人民感情的事情，并给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造成过不小的危害。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情况下，斯大林派苏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见毛泽东，建议中共停止过长江。据曾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的刘晓说，周恩来曾谈到过这件事：“当时军事政治形势都很好。我们准备南下长江，解放全中国，苏联对此有看法，要求我们‘停止内战’。实际上是搞”‘南北朝’，两个中国。”苏联实际上是不想看到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的出现。在苏共眼里，中共是第二个铁托集团，对中共是不信任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民主党派中有不少人主张新中国应在美苏之间采取等距离外交。曾做过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张治中将军就曾亲自向毛泽东建议过这样的外交方略。中共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一种意见主张跟西方在纯属经济的内容上进行温和的合作，另一种意见主张与苏联全面结盟。新中国成立之初面临着国内外敌人的严峻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新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在 50 年代那样阵营分明的国际政治现实中，中国也没有能力在美苏之间充当第三种力量。实际上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决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49 年 6 月 30 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一边倒，是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的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我们反对倒向帝国主义一边的蒋介石反动派，我们也反对第三条道路的幻想。”这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写照。

1949 年 12 月 16 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热烈欢迎。恰在此时，陪同毛泽东赴苏的苏联驻华总顾问科瓦廖夫向斯大林作了《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与实际问题的》书面报告。报告中说：中共内部有不少人是亲美反苏的；刘少奇组织和领导了对亲苏的高岗的无根据的批评；中国中央政府的组成，民主人士占了很大比例，实际上变成了各党派的联合会。这份报告，对我党高层的政治生活作了不真实的反映，起了很恶劣的作用。

毛泽东到苏联后一段时间里，苏联不够主动，毛泽东闭门不出，可能与此有关。西方宣传媒体趁机造谣说，毛泽东被苏联软禁起来了。毛泽东在苏联接待人员面前发了脾气，说：我来苏联并非专来祝寿，还有两国双边关系等重要问题要商量。

斯大林得知后，很快就同毛泽东谈判，并将科瓦廖夫的报告交给了毛泽东，从而增进了相互的了解。1950 年 1 月 2 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了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定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

2 月 14 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字。这一条约的签订使斯大林如释重负，苏联巩固了其在远东的战线，便于集中力量在欧洲对付西方的威胁。对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一条约也具有重大意义。毛泽东说，这一条约“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军，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华约的组成使东方阵营有了自己对抗北约的军事组织。苏联对于美国重新武装西德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当西方国家缔结巴黎协定后，苏联于 1954 年 11 月 13 日照会欧洲 23 国、美国和中国，对巴黎协定进行了严厉抨击，并提议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但遭到美英法等国反对。在此情况下，1954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2 日，苏联和波、捷、匈、罗、保、阿、东德等 8

国，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西方国家参加的“欧洲和平与安全会议”。会议通过的宣言强调，如果西方国家坚持批准巴黎协定，东欧国家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联合起来反对由西方国家组成的军事集团，以保障自身的安全。1955年5月巴黎协定正式生效后，苏联立刻宣布废除苏英友好条约和苏法友好条约，并于同月11—14日在华沙举行了上述8国的第二次会议，签署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即华沙条约。根据华沙条约建立的主要机构有政治协商委员会和联合武装力量司令部。前者是最高领导机构，后者统率根据缔约国各方协议拨归其指挥的军队，总司令为苏联军事领导人员。华约的出现是苏联和东欧国家对西德加入北约的公开反应，标志着欧洲正式出现了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与此同时，华约组织的建立又为苏联在东欧推行沙文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利己政策提供了新的工具。

## 第四章 空喊缓和

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美苏关系出现了缓和呼声，但并没有多少实际行动。这里先描述一下美苏呼唤缓和的情况，至于缓和呐喊中的对抗将在后面的篇幅加以介绍。

### 一、由于某种巧合，1953年美苏政坛都出现了一批新面孔，赫鲁晓夫高唱“三和”，力求打开冷战僵局

1953年3月5日，领导苏联长达30年之久的斯大林去世。晚年的斯大林一直住在莫斯科西北30公里的孔策沃别墅，生活十分孤独。他的第一个妻子早年去世，第二个妻子于1932年自杀。从此，斯大林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他的长子雅可夫死于卫国战争，次子瓦西利因1952年擅自下令空军列队飞过红场而被撤掉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职务，被送进总参学院去学习。斯维特兰娜·阿利卢那娃是斯大林的小女儿，也是他最疼爱、最亲近的人，因1944年女儿嫁给了一个犹太人，父女关系出现裂痕，斯大林坚持不让女婿上门。1939年至1952年没有召开过党代表大会，连中央全会也几乎中止了。接近斯大林的只有几名中央政治局委员。斯大林自己建立起来的体制，在斯大林周围形成了一个真空地带，使他孤独，甚至感到窒息。

斯大林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西方国家希望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内外政策会发生一些变化，4月16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为和平而变革”的演说。内中称：“全世界都知道，一个时代已随着约瑟夫·斯大林的死而结束……现在苏联的新领导有一个很宝贵的机会与世界其他国家一道认清目前局势已经到了紧要关头，从而帮助扭转历史的潮流。它愿意这样做吗？”艾森豪威尔提出普遍裁军、禁止原子武器等建议，并表示，美国希望包括苏联在内的世界各国，能将资源用于针对“穷困和贫乏”的新型战争中去。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艾森豪威尔的演说，并发表了评论。5月11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也发表了演说，他说：“苏联新领导作出的一系列和解姿态，使我们感到鼓舞。”英国政府的政策是，“不说三道四，不采取行动，以免抑制苏联可能发生的任何有利的反响，并欢迎苏联改善与我国关系的一切迹象”。斯大林逝世后两三年内，苏联领导层实行集体领导，并展开了争夺最高权力的内部斗争。苏联的新领导们一方面坚决反对西方重新武装德国，另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来调整同西方国家的关系。1954年元旦，马林科夫在回答美国记者提出的问题时说：“在1954年内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是存在着有利条件的。”

赫鲁晓夫掌握了苏联党政大权后，继续推进与西方的缓和。他代表苏共中央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主要观点。在分析时代特点时，一方面赫鲁晓夫强调不应对列宁有关帝国主义腐朽性的论断采取简单的看法。他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仍在继续加深，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和技术进步的停止。另一方面，赫鲁晓夫高度估价了当代国际舞台上和平和进步力量的增长。在分析苏联应采取的对外政策时，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三个口号。关于和平共处，赫鲁晓夫声称，那“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关于和平竞赛，赫鲁晓夫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体系必将取得胜利”，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

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内政的干涉”。同时加强对第三世界的和平渗透。关于和平过渡，赫鲁晓夫强调，有着不同的社会革命的形式，暴力和内战不是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些国家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赫鲁晓夫自己说出了这一政策的如意算盘，“你们都知道有和平共处这样一句话。我们要用和平共处来斩断我们敌人的腰”。赫鲁晓夫推行与西方缓和的政策还有着多重目的：取得西方对东欧现状的承认；将较多的人力物力从军备中转移到经济发展上以改善人民生活；通过缓和促进西欧的和平主义、中立主义和民族主义，以便分化美国与西欧的关系；指望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走上反对集团政治的中立主义道路，扩大苏联在亚非拉国家中的影响。

在军事战略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时期的军事战略进行了大量修改。一是强调未来战争必然是世界火箭核大战，完全排除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赫鲁晓夫认为，任何战争都会导致核战争。在这样的战争中苏军绝不能实行战略防御，而要实行战略进攻。因此苏军十分重视战争初期的作用，强调在战争初期就达成战争目的。

二是突出核突击的作用，放弃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原则。

三是在武装力量建设上全力争夺核优势，贬低常规兵力的作用。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 1953年1月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及其国务卿杜勒斯，上台前猛烈攻击遏制战略，指责它使美国耗费了大量金钱，却不能取得应有的胜利，因而是无用的、消极的、不道德的。他上台后便立即着手制定美国的新战略。

2月2日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所谓“解放政策”。他说：“我们接受的政策必须是一项一致性全球政策，我们在欧洲所珍视和保卫的自由，同在亚洲受到危害的自由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决不会默认对任何国家人民的奴役，以此为自己换取幻想中的好处。我将要求国会用通过一项适当的联合决议来清楚表明，本政府不承认，在过去与任何一个允许这种奴役的外国政府缔结的秘密协议中，包含着这一类义务。”这就是说，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签订的雅尔塔协议承认了“奴役”，而共和党政府则要改变这种状况。但在2月20日提出的决议案草案中，艾森豪威尔政府又大打了折扣。决议草案没有谴责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协议本身，只说苏联违反了协议的内容。决议声称美国“拒绝”苏联对协议作“歪曲的解释和引申”，“希望受苏联专制主义奴役的人民在一个能保持和平的结构中重享自决权利……”这一草案立刻引起美国内部强硬派的反对。由于斯大林逝世，这一决议草案被推迟表决，不了了之。

修订国家安全战略早已排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日程表上，5月8日，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四个得力助手在白宫的“日光浴室”举行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三个工作小组，分别审查和研究三种可供选择的战略方案。后来提出的第一种方案是“防御性的，它谋求在整个自由世界建立适当的实力地位，并以此遏制苏联力量，它相信通过力量显示能阻止苏联发动进攻，直至苏联因专制政府中的内部弱点而衰朽”。第二种方案要求明确告诉苏联，美国不允许哪些地区被共产党得到，在那些地区的任何国家倒向共产主义，美国都将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进攻性战争。第三种方案要求“采取行动，在一个或多个地区赢得成功，以此恢复西方的威望”，目的是扰乱苏联卫星国，鼓舞“自由世界”。艾森豪威尔5月10日任命了新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由阿瑟·雷

德福上将接替布莱德雷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奇微任陆军参谋长，克尼任海军作战部长，特文宁任空军参谋长。8月6日这四位新任参谋长来到“巨杉号”游艇上，经过两天激烈争论，作出了与总统要求一致的决议，由雷德福面呈艾森豪威尔。参谋长们在巨杉号上作出决议的基本内容是：1、美军的基本作用和使命不应改变；2、美国面临的基本军事问题是大陆防御和建立迅速进行大规模报复的能力；3、美军力量分散，一些驻海外部队应该撤回国内；4、地区性防御主要是当地军队的责任，美军可给予海空支援；5、美军应保持最大程度的动员；6、不是以增加战斗人员的数量，而是以效率和战备两个方面增强美国的后备力量。“巨杉号”会议报告正式把“大规模报复”概念引进美国军事战略，这表明美国在放慢发展常规武器的同时，将大力扩充核报复能力，加快核军备速度。

10月30日，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号文件——“国家安全基本政策”，这一文件成为艾森豪威尔政府指导美国安全和外交政策的基本文件。“新面貌”一词最初出现在“日光浴室计划”第一方案中，但据雷德福回忆，人们把“巨杉号”会议报告称为“新面貌”文件。这个所谓“新面貌”战略主要体现在162号文件中。与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一样，162号文件也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文件认为苏联的威胁主要表现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敌视及对亚非拉国家的渗透和颠覆上。文件强调美国要建立适当的军事力量和采取必要的联盟措施来阻止苏联，并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为缓和这一威胁而进行谈判”。“新面貌”战略坚持了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思想，提出“应付苏联对美国安全的威胁，在这样做的同时，避免严重削弱美国经济或损害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制度”。162号文件表明，在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意识到了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它并不愿意相应限制或缩小其战略利益。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实际上是希望以更小的代价来保住这些利益。“新面貌”战略的主要内容：

一是依靠大规模报复能力和后备力量的军事战略。在缩减军费的情况下，为最大限度地满足军方的要求，文件强调“以进攻性打击力量实施大规模报复性破坏的能力”，要在核武器的数质量上都保持对苏联的优势。美国当时已失去对核武器的垄断地位，但还保持着核优势。所以美国统治集团便毫无道义和责任感，声称“在敌对状态下，美国将把核武器看作是像其他军火一样能够使用的武器”。这就改变了以往在使用核武器方面的谨慎态度，采取了“非常规武器常规化”的非人道政策。不过在苏联已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认识到了进行核威慑的局限性，因此强调在裁减常备军的同时，加强后备力量建设。

二是突出联盟政策的重要性。文件承认美国的联盟政策面临着种种问题，如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西欧军事力量薄弱、某些盟国内部动荡不稳等等。尤其是西欧国家认为美国的政策太僵硬、大不灵活、太不稳定，摇摆于先发制人地发动战争和退回到孤立主义之间。最使美国担心的是“西欧越来越不愿追随美国的领导”。因此文件强调使盟国相信“美国的安全战略是集体安全战略。联盟必须扎根于对利益共同体的强烈信念，并坚信美国领导的稳定性和明智性”。

三是专门制订了对不结盟国家的政策。当时不结盟国家正在成为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的第三种势力，连一向傲慢自大的美国也不得不给予重视。美

国统治集团承认在许多不结盟国家中，敌视西方的力量很强，文件建议采取积极措施使不结盟国家意识到“它们与自由世界有共同的利益。并抵制共产主义的吸引”。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世界形势逐渐变得有利于西方。

四是重视“心理战”和颠覆活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心理战可谓情有独钟，它不仅设立了隶属于白宫的心理作战局，还把这种颠覆手段引为“新面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推翻和颠覆社会主义国家和制度，文件强调“美国应采取可行的政治、经济、宣传和秘密措施，以便利用和制造对苏联有麻烦的问题，损害苏联同中国的关系，使它控制卫星国更加困难，并阻止苏联集团军事和经济能力的增长”。历史学家加迪斯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用于秘密活动的经费直线上升，即使如此，直到艾森豪威尔上台，秘密行动才真正成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工具”。

与杜鲁门政府的扩充军备、到处派兵相比，花钱不多但影响较大的“心理战”和颠覆活动，受到“新面貌”战略制定者们的特别青睐，是不足为怪的。

1953年12月22日，杜勒斯在向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宣布了“新面貌”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上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新面貌”战略正式出台。1954年1月22日杜勒斯在纽约对外关系委员会全面解释了这一战略，他说：“对于自由社会来说，威慑侵略的方法，是愿意而且能够在它自己选择的地点，以它选择的方法作出强有力的反应。”杜勒斯这篇阐述“新面貌”战略的演讲，以这句话给人们印象最为深刻，以致后来人们几乎认为“新面貌”战略就是“大规模报复”。

“大规模报复”战略只是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该军事战略强调侧重准备打核大战；大力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对苏联实施“核包围圈”。

艾森豪威尔的“新面貌”战略的指导思想就是搞所谓的“大平衡”，即平衡对待“共产主义势力扩张”的外部威胁和国内的经济危机威胁。在国力有限的情况下，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利用美国的核优势来达到上述目标。但是这一战略很快就遭到美国内部的批评。接替李奇微任陆军参谋长的泰勒在1956年批评说：“在大规模报复政策的全盛时期，它只能使我们的领导人面临这样两种选择：“发动核大战，或谋求妥协和退却。”民主党人则批评艾森豪威尔企图“以莫斯科本身当作人质来对付世界各地共产党侵略”，说艾森豪威尔执政的八年是失败的记录，并对其领导能力提出了疑问。

## 二、为了软化冷战的“冰山”，东西方进行了一系列对话和交流

**日内瓦会晤** 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美苏英法四国外长在柏林举行了会议，会上就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和奥地利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没有取得突破。在奥地利问题上，苏联原来主张必须等签订了对德和约后，苏联才能从奥地利撤军。

1955年4月，以奥地利总理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苏、奥就奥地利永久保持中立、签订对奥和约达成一致意见。随后，苏联与美国及英法在奥地利和约问题上达成协议。美国及其盟国承认奥地利中立地位，而苏联则同意，一旦对奥和约签订，苏联就放弃重新派兵进驻奥地利的权利。1954年5月四国外长与奥地利代表在维也纳共同签署了奥地利条约。同年10月奥地利议会宣布永久中立。奥地利和约的签订解决了苏联与西方关于战后安排上的一个重要的悬案，对召开四国首脑会议起了推动作用。

关于四国首脑会议，是“苏联人提出了建议”，在英国首相艾登和法国总理富尔的推动下，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表示愿意参加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顺从了举行四大国首脑会议的意见。1955年5月苏美英法四国首脑就迅速举行首脑会晤一事达成了协议。同年7月18日，四国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美国代表团有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国务卿杜勒斯。苏联代表团有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外长莫洛托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赫鲁晓夫、副外长葛罗米柯。代表英国的是首相艾登和外交大臣麦克米伦。法国是富尔总理和外长比内。在机场举行了欢迎四国代表团的阅兵仪式，请每一个代表团的团长检阅仪仗队。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刚要站出来去检阅仪仗队时，瑞士礼宾司一个官员突然走到赫鲁晓夫面前，背向着他站定了。当时赫鲁晓夫气得难忍，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把那个人推开。后来人们向他解释，那个人的举动是按瑞士政府指示行事，使赫鲁晓夫不能站到前面去和布尔加宁一起检阅仪仗队。

会议的议程有四项：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裁军问题和发展东西方之间接触问题，而中心问题是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西方三国建议“在自由选举的基础上组成一个全德政府”，反对统一后的德国执行中立政策，实质是通过“自由选举”来合并东德，然后把统一后的德国纳入北约。苏联提出的方案是建立一个包括整个欧洲、苏联和美国在内的“集体安全体系”。布尔加宁说：“重新武装西德及其加入西方集团现在已成为德国统一的主要障碍了。”苏联的意图是消除西德加入西方军事集团的可能。会上，苏联还提出它准备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葛罗米柯说苏联的理由是：“如果北约集团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为和平事业服务的话，它就不能不同意苏联加入这个组织。”据葛罗米柯说，会后，杜勒斯向葛罗米柯问道：“难道苏联是严肃地提出上述建议的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任何正式答复。艾森豪威尔在会上提出了“开放天空”的建议，同样被苏联拒绝，赫鲁晓夫说这是针对苏联的间谍阴谋。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甚至在它开幕以前就可能注定要失败了。四国政府当时最关心的是欧洲问题。然而，《苏美英法四国外长柏林会议公报》指出：“四国外长已对德国问题、欧洲安全问题及奥地利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但是他们未能就这些问题达成协议。”作为战后西方国家顽固立场人物典型代表的杜勒斯，以美国国务卿的角色拒绝任何有利于世界和平的任何步骤。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一直左右着艾森豪威尔总统。当时美国国防部长威尔逊随团来到日内瓦，苏联代表团也包括了本国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在战争时期，朱可夫是艾森豪威尔的朋友。苏联希望两个朋友能有个单独谈话的机会，他们可以就和平共处的必要性问题交换意见。但是杜勒斯不能容忍与苏联和平共处，艾森豪威尔也持这种想法。结果，朱可夫除得到虚礼客气和一根钓鱼杆外，其他一无所获。

四国首脑会议上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针对会议高度紧张的状况，艾森豪威尔建议每次全体会议以后大家一起吃些茶点，借马提尼鸡尾酒把当天会议里引发的恶感或紧张心理冲刷掉。在一次这样轻松的场合，艾森豪威尔总统把纳尔逊·洛克菲勒介绍给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异之处，号称大名家，却如同一个普通人。赫鲁晓夫于是来了个普通农村人的玩笑方式，用手指在洛克菲勒的肋骨上捅了一下；洛克菲勒如法炮制，也用手指捅了一下赫鲁晓夫的“将军肚”，大家一笑了之。

日内瓦会议虽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但对于推动大国间的进一步对话和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赫鲁晓夫回忆说，斯大林生前曾告诫赫鲁晓夫等人：“你们看吧，我死后帝国主义国家会把你们当成小鸡一样地拧断脖子。”通过日内瓦会议，赫鲁晓夫“感到鼓舞，看到我们的敌人现在有点像我们怕他们一样地怕我们。……我们已经向人们证明，我们是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同敌人周旋的”。

**活跃的互访** 1955年9月8日，西德总理阿登纳访问苏联，9月13日双方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互派特命全权大使，从而建立了外交关系。1956年10月，苏联与日本签署了《日苏共同宣言》。双方恢复了邦交。

1956年4月，应英国政府的邀请，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英国。苏联代表团是乘一艘战列巡洋舰前往英国的，在这艘军舰上赫鲁晓夫庆祝了自己的62岁生日。军舰在英国靠岸时，受到了英国隆重的军礼和礼炮的欢迎。伦敦是阴雨浓雾之都。细心的东道主把苏联代表团安排在4月这个一年中气候最好的月份。英国是个尊重历史的国家，在这块土地上，多色彩地复现着历史传统中的光环，诸如英国上院议长穿着红法衣、红长袍，戴着极大的假发迎接远方来的客人，而这位议长的座位竟是一大袋羊毛。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平静而温和的笑容和那庄重而典雅的风范给赫鲁晓夫一行留下了深刻印象。女王对苏制图—104大型喷气客机表示赞赏的言辞令赫鲁晓夫陶醉。苏联代表团同艾登首相举行了会谈，并会晤了英国著名政治家丘吉尔。尽管苏联代表团在英国受到宾至如归的礼遇，但是在国际问题谈判上，实际上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赫鲁晓夫最感兴趣的德国问题、裁军以及和平共处等，英国政府都没有兴趣问津，英国的着眼点是诱使苏联接受西方的条件。在英国海军大臣为苏联代表团举行的一次非正式招待会上，赫鲁晓夫发表了一篇即席演说。他说：

“先生们，在坐各位都是大不列颠的代表。全世界都知道英国曾一度称霸海洋。可是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现实地看问题，一切都起了变化。你们的专家告诉我，他们是多么欣赏我们乘来的那艘战列巡洋舰。好吧，我告诉你们一些事。你们真的想要它的话，我们就很高兴地把这艘巡洋舰卖给你们，因为它已经过时了，它的武器显得落后，有更新式的武器了。再说，像我们这艘巡洋舰已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了。轰炸机也同样不行了。现在是潜水艇主宰着海洋，导弹主宰着天空——那种能从极远的地方击中目标的导弹。”

在一个素有绅士风度和海军至上的国度里，赫鲁晓夫竟然讲出如此坦率的话来，自然会引来很大的争议。他的讲话传到美国后立即引起强烈谴责。美国人通过报纸、电台猛烈抨击了水面舰队与轰炸机过时的说法。美国的传播媒介网络中浮现出一个新的“战争狂人”的模糊图像，这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说黯然失色。

赫鲁晓夫一行在英国逗留行将结束时，不愉快的事情又接踵而至。一天，赫鲁晓夫接到报告：有个人在水下绕着苏联代表团所乘的战列巡洋舰“游泳”。苏方向东道主通报了此事。后来在这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原来死者是英国情报官员克雷布中校。苏联情报部门认为，这是英国人可能想要得到巡洋舰推进机及舰体结构的有关资料。这个震动一时的大事一扫苏联代表团刚到达时温文尔雅的接待所产生的美好思绪。赫鲁晓夫决定提前回国。他所设想的和平共处之行，就这样踏在了政治磁性水雷上。



“厨房辩论”根据1959年初苏美双方商定的交流计划，双方将在对方国家举办展览活动。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将于7月去莫斯科参加美国展览会。

在尼克松访问苏联前几天，艾森豪威尔根据美国国会通过的一个决议，签署了题为“1959年被奴役国家周”的第303号公告。公告促请美国人“研究受苏联统治的国家的困难情况，再次承担义务，支持那些被奴役国家的正当愿望”。这是对国会内对苏强硬派的一种安抚，也是缓和不忘冷战的表现。这激起苏方领导人的强烈不满。

美国副总统尼克松飞抵莫斯科后，苏联领导人在展览开始之前参观了展览会。美国一户独居的标准住宅引起了赫鲁晓夫的关注，并和以“反共老手”著称的尼克松在这个住宅的厨房里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论，这就是风传一时的“厨房辩论”。这场辩论涉及到最广泛的问题，所以引起了人们的特别关注。

事实上，这所房子是美方精心建造的。在苏联举行的美国展览会，在美方看来它就是先进美国的缩影，也是临时在苏联展现个“小美国”。美国在该届展览会上展出的“美国示范住宅”，耗资达1.5万美元，建有一个宽敞的房屋，并留出一条通道，使观众能看到这所住宅的厨房。这所住宅是由美国一主顾赫伯特·萨德金出资建造的。当时他托付给一个工作小组承办，这个组是由几名精干的新闻广告员组成的。广告员的任务就是诱导尼克松副总统陪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及其记者，进入委托人的展台。

赫鲁晓夫对建筑问题是略知一二的。早在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期间，他就是学冶金的，以后又增加了建筑工程的课程。在以后的工作中，赫鲁晓夫曾在莫斯科监督城市工程建设，并结识了不少建筑学的专家和建筑工程技术人员。当然，苏联当时因资金短缺和住宅奇缺，所以主要建造造价低且比较实用的公寓式住宅。久而久之，在赫鲁晓夫的头脑里就形成了一个苏式住宅的建筑模式，即垛砖头块的“火柴盒”式的建筑样式。赫鲁晓夫又是个心直口快的粗人，并总有社会主义就是好的心理优越感。这几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使他在看到美国住宅时的第一感观，就是不喜欢美国这种房子。在尼克松的陪同下，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来到美国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了各种图片和照片。每样展品的样子都很吸引人。但赫鲁晓夫看后总觉得有些华而不实，甚至纯粹是为作广告。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说：

“有许多油画和雕塑品是美国人称为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其中大部分我感到毫无意义，甚至令人厌恶。其中有些作品纯粹是堕落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塑像特别令我感到不舒服。那可怕的丑态我简直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这是一个畸形并且巨大的女人像，一切都不成比例，硕大的屁股，各方面都显得奇形怪状。”

当赫鲁晓夫走过艺术馆时，许多美国记者赶上前去提问题，赫鲁晓夫在回答观感时说：“假如这个雕塑家的母亲看到她的儿子把一个女人刻画成这种形状，她会有什么感觉？他一定在某些方面有些变态，或是一个下流无耻的人。”

两位领导人边参观边斗智，都在着力显示本国制度的优越。当他们继续参观时，美国记者威廉·萨菲尔揪响了一辆吉普车的喇叭，并高声宣布说：“这条路通往示范住宅！”尼克松和赫鲁晓夫随声而入。尼克松看准了机会。他指出，美国能为普通工人提供这样的住宅，它显示了自由经营的优越性。而赫鲁晓夫不喜欢这种房子，因为它不牢固，是用胶合板建造的，预计只能

住 20~25 年。赫鲁晓夫说：“我们应该建造让我们子子孙孙都能够居住的住宅。”尼克松说：“但是，我们的子子孙孙的爱好和需要可能和我们不同。”赫鲁晓夫说：“那就让他们改变家具，为什么要改变房子呢？”

更主要的是，赫鲁晓夫根本就不相信美国普通工人会住这么好的房子，他认为这是美国借举办国家展览会之机在苏联作广告，纯粹是个胡吹而已。他对尼克松说，这种住宅是普通百姓不敢问津的。尼克松坚持说，美国普通工人确实住这样的住宅。赫鲁晓夫深知苏联住宅紧张，但又不能在住宅问题上丢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至于美国工人住宅什么样先不去管它，要紧的是不能让尼克松以住宅问题来大力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赫鲁晓夫走进“美国示范住宅”的厨房里，先拿起一个挤柠檬汁吃茶的自动器说：

“尼克松先生，你们怎么在苏联展出这种笨东西！你们吃茶需要的不过是几滴柠檬汁。我想你们的主妇使用这种小机器比我们的主妇切一块柠檬丢在茶杯里，用调羹挤出汁来更费时间。当我还是小孩时，我们就常用这种方法去挤柠檬……展出这种笨东西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尼克松坚持美国那种挤柠檬的方法更科学，而赫鲁晓夫根本不听那一套。后来赫鲁晓夫又直率地提出问题：

“尼克松先生，你把这件美妙的器具带来向我们展出，但你们真的在广泛使用这种器具吗？”尼克松回答说，在这里展出的东西市场上还没有。一听到这话，人们哄堂大笑起来。赫鲁晓夫顿时精神大振：“啊！原来你们在向我们夸耀许多你们国内还未使用的东西！你以为我看得出来吗，你想我们会对你们带来展出的这种骗人的东西称赞一番吗！”

至此双方的辩论开始进入白热化。辩论的范围越来越广，从生活到制度，从战争到和平；辩论的话语也越来越粗鲁，甚至马粪和猪粪何者最臭也成为两个国家级领导人辩论的一个话题。赫鲁晓夫对美国国会在尼克松访苏前通过的那个提案表示愤恨，大声喊出了几句脏话。当时的苏方译员感到十分为难，他看了看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后者通晓俄语，朝他泛泛一笑置之。无奈，这位苏方译员翻译说：“这项决议名声很臭，像是一堆刚拉出来的马粪发出的恶臭，没有别的比这个味更难闻的了！”

尼克松听后怒火中烧，并灵机一动，想起有关赫鲁晓夫背景材料中提到这个人曾当过猪倌；他自己的童年时代，一个邻居曾烧过一筐猪粪，弄得恶臭熏天，反驳的有力词句脱口而出：“恐怕主席弄错了。有一种东西却比马粪还难闻——那就是猪粪。”猪倌出身的赫鲁晓夫深知这个道理，他两侧的太阳穴的血管似乎将要胀裂，但他眼球狡猾地一转，突然大笑起来，并说：“这点你是对的。”

两位领导人的辩论表面上看只是建筑问题，实质上涉及到了苏美关系的各个方面。在争论最激烈时，赫鲁晓夫有时抓住尼克松的西服翻领，并不时用食指轻轻地碰一下尼克松。尼克松也边回敬边用手指戳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前胸。“厨房辩论”的高潮还是政治方面的内容。尼克松和赫鲁晓夫停在厨房前，只谈洗衣机，不谈别的。赫鲁晓夫说只有一台洗衣机模型就够了，为什么还要那么多的洗衣机模型呢？尼克松挑衅他说：“谈谈与洗衣机有关的优点而不谈与火箭有关的实力，岂不更好？这难道不是你想要的那种竞争？”赫鲁晓夫气得把大姆指塞进尼克松的胸口，喊道：

“是的，那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竞争。但是，你们的将军说，他们是如此强大，足可以摧毁我们。我们也能向你们显示点东西，以便你们知道俄国

的精神。我们是强大的，我们可以打击你们。”

尼克松边用手指指着赫鲁晓夫，边说：“当你把我们任何一个强大的国家置于这么一个地位，即要么不得不接受支配，要么奋起反抗而别无其他途径可循时，那么你就是在拿世界上最有破坏性的东西开玩笑。”

此时，赫鲁晓夫已失去控制，他狂怒他说：“这番话在我听起来像是威吓。我们也是巨人。你们想威胁我们，以牙还牙，我们也会以威胁回敬威胁的。”

赫鲁晓夫和尼克松还指责对方干预别国事务，但是不论是赫鲁晓夫还是尼克松，都没有正面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各自的国家当时是否正在干涉别国事务。

“厨房辩论”吸引了无数观众，成群的记者蜂拥而上。美联社的记者被挤在后面，只好请威廉·萨菲尔去抢镜头。萨菲尔对准了镜头，背景包括一台洗衣机，但是突然一个高个子的苏联官员挤上前来插进画面，在那个高个子苏联官员闭上眼睛的一瞬间，萨菲尔按动了快门，拍下了“厨房辩论”这一历史镜头。1972年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访问苏联时，当时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告诉他，那个高个子的苏联官员就是他本人。

“厨房辩论”是一场真正冷战式的辩论，反映了即使在缓和的气氛下苏美领导层间深刻的意识形态分歧。

“戴维营精神”在尼克松访苏之后两个月，赫鲁晓夫于1959年9月15日至27日对美国进行了国事访问。赫鲁晓夫访美是经过美苏两国政府共同努力促成的。这也是苏联首脑第一次访问美国。

当时的苏联实力日益增强，要争取与美国平起平坐地位。此时的美国并不像今天这样不可一世，更强调不干涉内政，不以制度强加于人，因为在美国人心中在意识形态斗争方面苏联处于攻势。赫鲁晓夫访美，想通过美苏高级会谈，争取在美苏之间建立一定的“信任”，进而争取按照苏联的设想与西方解决德国、裁军等重大问题。而艾森豪威尔邀请赫鲁晓夫来访时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就是他要作出“一番巨大的个人努力，以便在卸任之前把苏联领导人哪怕软化一点点”。艾森豪威尔要通过对赫鲁晓夫本人施加影响，促使苏联停止对西柏林的威胁。此外，还要讨论“核试验、有关裁军的更广泛的问题，以及扩大美苏之间的接触”。

不知是自然的巧合还是人为的安排，在赫鲁晓夫访美前两天，即9月13日，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二个宇宙火箭，并在莫斯科时间14日零时2分24秒到达月球表面，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从地球到另一个天体的飞行。这个壮举震惊了世界，特别是震憾了西方世界。法国《巴黎激进新闻》评论说，这是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的一个“惊人的使者”。该报还写道：苏联宇宙火箭“通往月球的轨道在天空中勾画出了特殊的挑战书”，“美国人曾说要使赫鲁晓夫惊讶。但是，目前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赫鲁晓夫乘坐的是苏联著名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设计的图-114飞机。陪同赫鲁晓夫访问的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部长叶留金、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茹科夫、部长会议原子能利用总局局长叶麦利扬诺夫、著名作家肖洛霍夫、飞机设计师图波列夫的代表即他的儿子阿廖沙（图波列夫因身体不适不能前往），等等。此外，还有赫鲁晓夫的夫人尼娜·彼得罗夫娜。斯大林历来是不赞成领导人带夫人出访的。而赫鲁晓夫带夫人出访也是他反对斯大林式的僵化的一种表示。

图—114 飞机是个庞然大物，它着陆后停在指定的停机坪上，但赫鲁晓夫下不了飞机。因为美国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开来的机动舷梯够不到这架飞机的机舱门。无奈，只得使用该机上的备用梯。赫鲁晓夫本想按照外交礼仪正式而庄严地走下飞机。此时此地，他只好用双手双脚爬下来。此情此景，令不可一世的美国颇感难堪。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赫脱等美国政要前往机场欢迎苏联客人。艾森豪威尔在欢迎词中说，我们共同的目标应该是公正的、普遍的和持久的和平。赫鲁晓夫在致答词时说，战争不会给任何人带来任何好处，而和平有利于各国人民。他最后说，我和您应该和平友好相处，就像居住在我们共同的母亲——地球上的各国人民应该和平友好相处一样。

艾森豪威尔邀请副总统尼克松出席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最高级会晤的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和尼克松握手时面无笑容。赫鲁晓夫辛辣地提到他们之间的“厨房辩论”，还抱怨尼克松反对他这次访问。尼克松则指责赫鲁晓夫在他到达莫斯科后就在讲话中攻击他。赫鲁晓夫更是咄咄逼人，说尼克松在他到达华盛顿之前拼命攻击他，并要求艾森豪威尔当场裁决，究竟谁的讲话更具有挑衅性。艾森豪威尔只好举手示意，请尼克松离开，后者只好快快而去。

赫鲁晓夫在访问的最初一个多星期里，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进行了参观，并多次发表演说，强调核战争的危险，呼吁实行和平共处和裁军。9月17日，他在纽约访问时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了一些问题。赫鲁晓夫说：“像和睦的邻居一样地和平共处，还是滚向新的战争——这就是当前苏联和美国以及全世界所面临的抉择。”有人问：怎么能够把关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论点，同科学共产主义关于共产主义思想必将在全世界获胜的论点结合起来？赫鲁晓夫回答说，当美国人民建立起共和国的时候，沙皇俄国当时是一个半封建的农奴制国家。你们的经济发展很快，沙皇俄国的经济远远落在美国经济的后面。然而在当时，共和制的美国同君主制的俄国是和平共处的。“为什么现在，当人类处在新的发展时期的时候，你们竟不同意资本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了呢？”赫鲁晓夫最后说：“如果你们所代表的事业和制度比社会主义能给人们以更大的幸福，给他们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给社会生产力以更广阔的发展余地的话，那时候我就会到你们这里来请求你们给我工作。”“但是，你们不要向我推荐‘事业’，因为我所服务的事业是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是最美好最崇高的事业！为什么我要拿它换另一个事业呢！”

最后三天，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戴维营坐落在华盛顿以北大约75公里马里兰州的卡托克廷山区东坡的一片树林里，海拔约1100米。这是一处总统夏季别墅，以艾森豪威尔孙子的名字命名。会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的看法是，“赫鲁晓夫并不要和平，除非是按照他自己的条件和有利于他扩大自己的权势”。他说，赫鲁晓夫“不是一位政治家，而是一位有权势、诡计多端、残酷无情和野心勃勃的政客”。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的看法要好多了。由于艾森豪威尔邀请他访问美国，赫鲁晓夫说，“我对他更加尊敬了”，这是“总统的英明”。在戴维营会谈中，艾森豪威尔对赫鲁晓夫说，美国“永远不会同意把西柏林让给苏联或东德”，苏联如不取消它的最后通牒，他就不参加最高级会议。结果赫鲁晓夫作出让步，表示苏联不再坚持在一定期限内签署一项苏联—东德

和约，柏林问题可以作为一个有待谈判解决的问题处理。于是艾森豪威尔表示同意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并访问苏联。9月27日会谈结束时发表了《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联合公报》，双方一致认为，“一切没有解决的国际问题都不应当通过运用武力的办法来解决，而应当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公报还提出美苏英法四大国首脑将就柏林问题举行会晤，艾森豪威尔将于1960年春季访苏。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成果。

为了强调自己的访美成就，赫鲁晓夫从美国回到苏联后大肆宣扬“破除了坚冰”的“戴维营精神”，称赞艾森豪威尔是一个“真心要消除冷战和改善美苏两个伟大国家的关系的人”。赫鲁晓夫在1960年元旦给艾森豪威尔电报中说，这次会晤将保证整个国际局势出现“会使各国人民免于新战争的恐惧的历史转折点”。在同年1月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它的军队继续减少三分之一，即减少120万人，其中包括军官25万人。苏联为纪录片《赫鲁晓夫访美》所写的解说词说：赫与艾的握手“开辟了国际关系新纪元”。

艾森豪威尔事后则说，“所谓‘戴维营精神’是一个乐观的幻想，我从来就不抱这种幻想。我在那次会谈中告诉赫鲁晓夫：‘不要试图干涉我们在柏林的权利。’”他还说：“赫鲁晓夫大谈‘戴维营精神’，这是一个我从未用过也从未认为恰当的词儿，”“和往常一样，我们还要看今后的实际行动，才能确定苏联的诺言有无诚意。”

美苏之间的第一次缓和的主要推动者无疑是苏联方面。赫鲁晓夫积极推行“三和”路线，极力想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但是，美苏两国在战略目标、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战略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美国是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一身霸气。苏联是唯一能向美国的霸权地位挑战的国家，美国对苏联的歧见是根深蒂固的。赫鲁晓夫大肆宣扬“戴维营精神”不是出于个人权势的需要就是出于一厢情愿。

事实上即使真有“戴维营精神”的话，不出一年也随着美国U—2间谍飞机在苏联上空被击落而荡然无存了。美苏的这次缓和随之烟消云散了。

## 第五章 缓和呐喊中的剑拔弩张

就在美苏两家试抛橄榄枝，特别是赫鲁晓夫卖命摇动“三和”大旗时，美苏两国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发生了尖锐冲突和对抗。

### 一、疯狂的军备竞赛是美苏冷战的重要乐章，竞相发展核武器把全世界笼罩在核阴影之下

**美国的核扩张** 美国对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后期。1945年春天，当英、美联军抵达德国边境时，希特勒为了垂死挣扎，向安特卫普和其他军事目标发射了8000枚火箭，其中有几颗没有爆炸。由于战时英、美的特殊关系，钱学森以美国军事人员的身分赶赴欧洲，亲自察看了这些导弹，并解剖了其中的一枚，获取了重要而全面的资料。美国早在1945年就研制成功了原子弹。加速开发导弹技术将会使美国的核武器插上翅膀。

美国的导弹研究，由于借鉴和拿来了纳粹德国导弹及其科学研究力量，进展很快。1945年9月，美国在新墨西哥州怀特沙漠试验场进行了“下士—1”导弹试射。导弹被安置在固定发射台上，发射中弹体沿着一条很高的抛物线轨迹飞行，试验取得了满意成果。美国科学家在“下士”导弹基础上进行了大的改进，研制出机动性、可靠性和精度更高的“中士”地对地导弹。导弹试验场是导弹研制过程中必须具备的条件，1947年美国国防部就在佛罗里达半岛中部海岸的卡纳维拉尔角建成了一个大型导弹试验场。

后来又将它改建成航天试验中心。同年3月，美国编成了以核攻击为主要任务的“战略空军”，形成了威胁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原子弹战略”体系。

美国以为苏联永远搞不出原子弹来。1946年杜鲁门总统问美国原子弹专家奥本海默：“苏联何时能研制出原子弹？”

“我不知道。”奥本海默回答。

“我知道。”杜鲁门说。

“什么时候？”

“永远也研制不出来。”

杜鲁门的看法是美国当时普遍的观点。于1949年底继乔治。

凯南担任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保罗·尼采回忆说：“我们政策设计室的人都以为苏联人需要花更长的时间。……因此，当发现他们真的进行试验时，我们都大吃一惊。”

1949年当美国决策者们得知苏联的原子弹的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后，杜鲁门赶紧召开会议。杜鲁门问：“俄国人能研制成超级炸弹吗？”这里的超级炸弹指的是氢弹。

所有的人都点头说能。

“既然是这种情况，我们别无选择，只有干下去。”

整个会议只有7分钟，杜鲁门就作出了研制氢弹的决定。

50年代是美国快速发展导弹核武器的时期。由于美国已失去核垄断地位，军方和军事工业财团强烈要求用更新式、更精良的导弹核武器来武装部队。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和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也是刺激美国加速发展导弹核武器的重要原因。1950年1月，杜鲁门决定加速研制热核武器。9月，康韦尔公司提出一种弹道导弹方案。此后，该公司的宇航部开始研究

“宇宙神”导弹。

1951年，美国研制成功小型核武器。“诚实约翰逊”地对地导弹的弹头重仅680公斤。9月27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秘密会议上作报告时说：“美国现在正开始设计战术原子弹、无线制导导弹、火星式鱼雷、火箭炮弹等10种以上的导弹核武器。”

美国军方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火箭袭击伦敦搞得人心惶惶记忆犹新，同时对苏联数以万计的坦克深为恐惧，他们希望能找到行之有效的防御方法。1953年，美国组织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到雷声公司，研究如何利用雷达遥控导弹对付坦克。其中有一名叫柏克斯的工程师，装配了一具雷达和一些导弹，安装在一架战斗机上。由这架飞机追踪一辆移动坦克。他们不断改进这套新系统，终于取得成功。1963年，雷声公司根据美国军方要求，利用柏克斯的导航系统，研制出“爱国者”导弹。

1953年艾森豪威尔竞选当上美国总统。这位军人出身的总统十分重视军队的装备和新武器的研制、生产。就在苏联呼吁缓和关系时，1954年美国战略空军一下子得到112亿美元的巨额拨款。1955年9月，艾森豪威尔又下令最优先发展弹道导弹。1953年起，美国军队陆续装备了“奈基—1”和“奈基—2”地对空导弹。1954年以后，美国加紧研制生产洲际弹道导弹和各种战术导弹，陆海空三军陆续装备了导弹核武器。

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充满了霸主心态，过高估计自己的实力，过低估计苏联在火箭技术上的努力和进步。当他们得知苏联科学家在研制“卫星”时，曾讥讽为“轻浮的异想天开”。直到1955年，美国才察觉苏联在洲际导弹研制方面走在了自己的前面。于是急忙寻找对策。1955年，美国首先把核反应堆用在潜艇上，研制成功世界上第一艘核潜艇。核燃料不需要氧气助燃。加一次核燃料可以用二三年甚至十多年，所以核潜艇可以在水下长期潜航，从而大大增加了潜艇的作战半径和战斗力，美国又率先在核潜艇上装备了“”导弹，研制成功战略导弹核潜艇。

1957年8月，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并宣称：“和平共处不仅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不进行战争，而且还意味着两种制度之间在经济方面进行和平竞赛，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进行具体的合作。”美国在惊魂未定时，1957年10月4日，苏联又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以每小时3万公里的速度围绕地球轨道运行。比卫星本身更有意义的，是那个把卫星推进地球轨道的威力强大的火箭。

美国的盲目乐观、自满，受到最无情的嘲弄和打击，一时十分惊慌。苏联人的暂时优势，使白宫、五角大楼的军政首脑产生了一种幻觉，仿佛苏联导弹即将铺天盖地般倾泻到美国。于是把战略空军部队纷纷派往各地，进入戒备状态；在土耳其和意大利安上丘比特短程导弹，对准苏联的远程导弹。美国决策者还收到一个《盖瑟报告》。该报告说，苏联将拥有大量导弹，不久美国就会降为二流国家。实际上这份报告充满了夸大其词的警告。例如：苏联的裂变材料至少能制造1500件核武器、装备4500架轰炸机和250—300艘远程潜艇。根据对苏联核能力的过高估计，该报告要求在今后5年中增加450亿美元用于发展核武器和民防。不过艾森豪威尔头脑还算清醒，没有相信对苏联核能力的夸大估计。

美国人有一种宝贵的科学态度，他们承认苏联在大型火箭技术方面走在自己的前列，甚至认为这是“技术上的珍珠港事件”。事隔5日，当了9

年罗克特·甘布尔胜公司总经理的麦克尔罗伊接替8月辞职的威尔逊出任国防部长。11月，这位新国防部长就给制造导弹的洛克希德公司的经费增加了4倍。但天公不作美，美国开发的“雷神”火箭三次失败。“宇宙神”火箭三次试射也都不理想：第一次发生爆炸，第二次只飞了4公里，第三次虽飞行了800公里，但只有原计划的十分之一。想以“大力神—1”火箭挽回败局，这年底的首次发射又再次失败。三种火箭连续7次发射，竟落得个屡试屡败，真可谓“满盘皆输”。1957年对于美国的武器研制来说，真是十分凶险的一年。

1958年可算是春光明媚了。这年元月，布劳恩用“丘比特—C”火箭，将一颗只有8公斤多一点的卫星送入地球椭圆轨道。美国人的脸上似乎多了一些油彩。不久，美国陆军又装备了“奈基—2”式地对空导弹。这种导弹重约849公斤，射程12.8公里。9月美国海军在水面进行了“北极星”导弹发射试验。从1958年9月到1960年6月，美国在海上共进行了40余次试验，约有一半成功。美国这时雄心勃勃，转入了难度更大的、军事上更有威慑力的水下发射试验。1960年7月，从核潜艇上成功发射了“北极星—1”和“北极星—3”潜对地导弹，美国在这方面领先于苏联。

战后至50年代，还是美国大力发展巡航导弹的时期，先后研制并装备了水面发射的“天狮星”导弹，地面发射的“斗牛士”导弹等。

50年代，东西方冷战形势严峻，美苏之间剑拔弩张。为了以防万一，华盛顿决定建造一座能抗御核打击的坚固地下堡垒。地下堡垒战时起“白宫加五角大楼”的作用。最后，艾森豪威尔决定把地下堡垒建在弗吉尼亚州劳顿和克拉克县之间的气象山。这里地广人稀，便于保守秘密；岩石多为结构坚固的玄武岩，抗冲击波能力强；距华盛顿只有88公里，乘直升飞机20分钟即可到达。这座堡垒1958年竣工，异常坚固，即使苏联的核武器在山上爆炸，巨大的冲击波也奈何不了“堡垒”内的人们，真是名副其实的“铜墙铁壁”。地下堡垒的作战指挥、通信、照明、办公等设施一应俱全，可容纳上千名政府、军队高级官员和工作人员。

地下堡垒真的十分可靠吗？有人表示怀疑，认为在90年代，从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核潜艇上发射的导弹只需要10到15分钟就能打到华盛顿。白宫和五角大楼的要人们还来不及飞到堡垒就可能一命呜呼了。这座神秘的地下堡垒，早就被醒目地标在克里姆林宫核打击目标的地图上了。

苏联的核赶超苏联的导弹核武器是在斯大林时期打下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苏联十分注意加强研制导弹核武器。1945年5月，苏联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攻占了纳粹德国的火箭研制、试验中心佩内明德。根据内务部副部长伊万·谢罗夫将军的命令，苏军把留下的德国技术人员、图纸资料和机器设备全部运回苏联。

1946年底，苏联在伏尔加河下游卡普斯金亚尔镇东北的沙漠区内建造了洲际弹道导弹试验基地。这个基地后来成为苏联第一个导弹航天器试验基地。

为了加快导弹核武器的研制，谢罗夫将军精心起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他将纳粹德国的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各种各样的人才弄到苏联。其中包括德国从事火箭技术研制的6000名科学家、设计师和工程技术人员。为了让这些人在苏联安家落户，安心为苏联建设出力，苏联把这些人的家属共2万余人运到苏联，有的专家的情妇也被带到苏联。1946年2月，苏军设立国土防空



军，直属于苏联武装力量炮兵司令部。国上防空军开始装备了一些防空导弹。这年底苏联的第一个原子反应堆开始运转。1947年11月苏联正式宣布掌握了原子武器的秘密。1949年爆炸了第一个试验性原子装置。在德国科学家的帮助下，苏联人很快就拥有了中程导弹。1947年10月苏联在哈萨克斯坦成功地发射了P-1导弹。这种导弹是德国V-1导弹的仿制品，射程达320公里。“犯人”科学家科罗辽夫受到殊荣，被叫到克里姆林宫，亲自向斯大林汇报执行军事导弹计划的可行性。为了把新的弹头投送到更远的距离，需要大推力火箭。斯大林对科罗辽夫取得的成就非常赞赏，从而批准了他提出的研制战略导弹的全部计划。当1948年苏联最高当局为研制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大开绿灯时，恰逢美国决定减少自己的火箭试验。1950年苏联研制成功威力更强大的P-2导弹，其射程比P-1导弹增大了两倍。1952年，苏军开始装备AA-1防空导弹，并建立了独立的防空导弹部队。1953年苏联先于美国爆炸了第一颗可运载的实战化的氢弹，从而超过了美国在热核武器研制方面领先的地位。

1954年赫鲁晓夫上台后，一方面推行与美国的缓和，另一方面加速了苏联的导弹核武器发展计划。

赫鲁晓夫修改了斯大林积极防御的战略，强调未来战争必然是世界火箭（导弹）核大战，一度完全排除了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的可能性。在这种军事战略理论指导下，苏军十分重视战争初期的作用，认为火箭核战争中战争初期的作用将大大提高，苏军主张从战争的最初几分钟起，就要充分运用平时储备起来的核武器及其投送工具，以破坏和消灭敌国全境内的最重要目标，以便在战争初期的短时间内就达到主要的战略目的。苏联认为，战略火箭军、远程航空兵和导弹核潜艇共同实施猛烈而集中的核突击，就能够一举摧毁敌人的军事和经济潜力、政治中心、战略核武器和军队集团，从而迅速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战略核力量是统帅部直接掌握的、可独立完成战略任务的力量。不是战略核力量应根据其他军种的需要来计划自己的行动，而是相反，其他军种应充分利用战略核力量的突击效果，迅速完成自己的任务。在这样的军事战略理论指导下，赫鲁晓夫对发展核武器极力支持。苏联很快组织了空间局，批准了科罗辽夫提出的洲际火箭和人造卫星计划。

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研究工作开展得较早。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中间停顿下来。大战结束后，科学家吉洪拉沃夫又重新着手这项研究。他首先解决的是火箭要达到第一宇宙速度的可能性。吉洪拉沃夫研究证实，可以使用多级火箭，使卫星达到第一宇宙速度。1952年科罗辽夫升任国防部实验设计局总设计师。随后，吉洪拉沃夫领导的研究小组也划归他领导。1955年1月苏联成立人造卫星计划研究委员会。1957年对苏联和世界各国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苏联年”。当时美国正忙于研制推力为35万磅的“宇宙神”式洲际弹道导弹。苏联的科学家们研制出推力为80万磅的液体巨型火箭。8月3日，科罗辽夫设计的苏联33—6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其速度接近第一宇宙速度。当时苏联《真理报》发表了政府公告，说洲际弹道导弹制造问题的解决，使其可以达到遥远的地区，而不需要使用战略航空兵，因为航空兵在当前容易受到现代防空武器的攻击。赫鲁晓夫也专门发表谈话说，飞机可以送进历史博物馆了。

33—6弹道导弹的出现，使美国科学权威的预言受到了嘲弄。

1945年，时任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主任、战时科学计划负责人和

参谋长联席会议新武器联合委员会主席的布什博士说：“人们大书特书这种武器。……我认为，它只有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眼下大可不必为此牵肠挂肚。”

1957年10月4日，科罗辽夫大胆采用捆绑式办法，使用33—6弹道导弹将播送无线电乐曲的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地球轨道。创下这一成就的苏联火箭发射场指挥中心首先沸腾了。世界许多知名人士纷纷向开创空间时代的科罗辽夫表示祝贺。苏联的国际地位得到提高。发射人造地球卫星还证明了苏联在电子、计算机以及其他科学领域取得的成就。1958年苏联装备有巡航导弹的W级潜艇问世。同一年装备导弹的驱逐舰编入苏联海军。

苏联在战略武器方面的领先地位，使赫鲁晓夫十分兴奋。他在莫斯科得意地宣布，苏联正像做“香肠”一样制造导弹，苏联有能力在1959年或1960年部署100枚洲际弹道导弹。这次宣布大大毒化了国际环境。1960年，赫鲁晓夫又宣称，苏联组建了战略火箭军。战略火箭军总司令涅杰林一上任就宣称，苏联战略火箭军势不可挡，可以打到地球上任何地点。

在地对空导弹方面，苏军于1952年装备了3A—1导弹。它采用无线电指令制导方式，射程32公里，射高2000~3000米。

赫鲁晓夫不赞成建造大型水面舰艇。他认为核武器的发展将使大型水面军舰成为敌人的靶子。他主张最好建造潜水艇和配备有核武器的小型舰只。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将军坚决反对上述主张，并公开对赫鲁晓夫说：“海军是不会忘记你做的事情的。”赫鲁晓夫也不会忘记库兹涅佐夫的话。1956年他借故解除了库兹涅佐夫的海军司令员职务。1959年苏联开始发展海军战略力量，先后装备了各式导弹。

在空对地导弹方面，苏联于1954年为图—16轰炸机装备空对地导弹。1956年图—95、米亚—4轰炸机也分别装备了导弹。

据统计，苏联在1960—1964年期间，洲际导弹由几十枚增加到200枚，中程导弹由200枚增加到750枚。

虽然苏联在洲际导弹方面一度居于领先地位，但苏联在发展洲际导弹方面走过一些弯路。1957年时苏联作出一个根本性的决定，即不建立第一代洲际导弹的初级发射系统，而等待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模式出现再办。这就是说，在这以后的几年里，苏联的洲际导弹的发展将是相对缓慢的。苏联的外交政策是想利用一种表面的虚假的领先地位。赫鲁晓夫在这方面的做法是：让苏联电台和报纸援引西方对于苏联导弹能力夸张的说法，反过来再向西方报道，这样就越吹越大了。美国通过间谍飞机发现了赫鲁晓夫玩弄的把戏，他们发现在1959年苏联实际的导弹实力只相当于美国对其估计的3.5%。这也是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时采取强硬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苏联导弹那时还劣于美国。

由于片面强调核武器的作用，忽视诸军兵种协同的重要性。赫鲁晓夫在1960—1964年间，共裁减常规兵力240万人，并曾削减常规武器生产，还一度撤销了陆军总司令部。这些都对苏联的国防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

## 二、一面是紧锣密鼓的军备竞赛，一面是在关键地带接连不断的尖锐冲突

运河西东 中东是英法等老牌西方殖民势力的传统势力范围。埃及境内的苏伊士运河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是极为重要的战略通道。第二

次世界大战后，中东各国奋起反抗殖民主义，掀起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出现了一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

中东又是一个力量薄弱的战略地带。所谓关键是因为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所谓薄弱是因为该地区的阿拉伯世界不统一，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容易被大国利用和操纵。因此这里成为美苏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

1869年正式通航的苏伊士运河，是由埃及人民以牺牲12万民工的代价费时10年开凿成功的。此外，埃及当时还承担了运河投资总额的70%。但是这条具有重大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的运河长期为英法殖民主义者所控制，他们几乎攫取了运河的全部收益，并且是运河的主要用户。1952年，在“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下，埃及爆发了革命，推翻了法鲁克王朝。不久埃及共和国成立，纳赛尔出任总统。

在埃及共和国成立后，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便提到埃及政府和人民面前。埃及是英国的传统殖民地，英国一向认为运河的管理、维护和通航自由“关系到英国的存亡”，并认为如失去运河将使欧洲的经济受到沉重打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本身也要垮台。英国还担心，让埃及收回运河，可能在中东阿拉伯国家引起连锁反应，其他阿拉伯国家可能仿效埃及损害西方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利益。这会使纳赛尔在埃及和阿拉伯世界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所以英国坚持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际管理，保证运河的自由通航。

实际上，美国和法国在苏伊士运河问题上的担心和想法同英国大体上相同。美国一方面讲它在中东实行中立政策，另一方面说美国必须填补中东地区的“真空”。艾森豪威尔政府想以公正、中立的身分出现，趁机取代英、法在中东的地位，组织一个完全听命于美国的军事条约组织，由美国独霸中东这一战略地区。但是美国要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也面临着两难抉择。它既不能冒与英、法等盟国决裂的风险支持埃及收回运河主权，又不能反对埃及而与整个阿拉伯世界为敌并把阿拉伯国家推向苏联。美国的目的是在中立的幌子下排挤英法、控制中东和防止苏联染指该地区。在美国政府的干预下，1954年10月签订了《英埃关于苏伊士运河基地的协定》。根据协定英国军队将于1956年6月撤出埃及领土，埃及则同意在土耳其或其他阿拉伯国家受到外来攻击时，允许英军重新进驻苏伊士运河区。

1954年至1955年，美国政府着手组织中东地区的军事联盟。1955年2月，土耳其、伊拉克在巴格达签订了互助合作和防御条约，即巴格达条约。不久，英国、巴基斯坦和伊朗也加入了该条约。美国没有正式加入该条约。

埃及总统纳赛尔对巴格达条约表示反对，认为这个条约“旨在分裂阿拉伯世界，迫使它屈从于西方的意志”。纳赛尔于1955年秋加强了行动。埃及与叙利亚、沙特阿拉伯成立了联合司令部。黎巴嫩与叙利亚签订了防务协定。纳赛尔政府最初曾向美国寻求过援助。美国国务院明知埃及资金短缺，但坚持要埃及付给现金才肯出售武器给埃及。英法也拒绝向埃及提供武器援助。

埃及在向西方寻求援助无望的情况下，转向东方阵营。1955年9月，埃及宣布同捷克签订了军火贸易协定，通过易货贸易，以埃及棉花换取两亿美元的苏联武器。

此时的赫鲁晓夫已将其“和平过渡”理论发展为在第三世界进行“和平渗透”的新理论，正积极而谨慎地寻找可以捕捉的对象。苏联起初对埃及新政府持慎重观望态度。当发现埃及政府积极与英国进行斗争时，赫鲁晓夫高兴起来。他回忆说：“我们对纳赛尔刮目相看了。我们发现他的政府不是那

一类夺了权仍执行旧政策的新政府。不，埃及新政府念念不忘民族利益，因而应该受到我们的尊重和支持。我们要帮助纳赛尔继续对殖民主义者进行斗争。”纳赛尔与执行独立自主政策的南斯拉夫领袖铁托关系很好。当时苏联与南斯拉夫已经和解。铁托向赫鲁晓夫建议苏联对埃及的新政府给予支持。这是赫鲁晓夫转变态度的原因之一。

埃及向东方阵营购买武器后，英、美感到十分不安。艾森豪威尔认为，“武器交易”表明“中东第一次出现了严重的共产党渗透的证据”。杜勒斯派助理国务卿艾伦赴开罗要埃及取消与捷克的协定，被纳赛尔拒绝。艾森豪威尔想调解埃及、以色列争端。但是这一努力未能取得效果。调解无效后，艾森豪威尔又想采取分化阿拉伯国家、孤立埃及的办法，主要是要把沙特阿拉伯和利比亚拉向美国一边。他认为，“当埃及发现自己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如此孤立，除了苏联以外一时难以找到其他盟国时，它很快就会……愿意同我们一起为这个地区寻求一种公正体面的和平”，那时，“埃及就不大可能继续与苏联人勾搭”，埃及也就不会“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在没有解决办法的情形下，1956年3月艾森豪威尔总统召集杜勒斯等人开会，制定了一项《近东政策》备忘录。根据这项备忘录，杜勒斯希望避免与纳赛尔公开破裂，那样“会把纳赛尔无可挽回地投入苏联卫星国的地位”；但是要让纳赛尔知道。如果“像现在这样与苏联合作”，美国就不会给埃及以最惠国待遇。为了阻止埃及与苏联关系的发展，在1955年12月时，美国还与英国一起表示愿向埃及的阿斯旺水坝第一期工程提供7000万美元贷款。埃及在1956年7月17日接受了美、英上述贷款建议。但是纳赛尔在1956年5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月中旬，苏联外长谢皮洛夫访问了开罗。美国获知谢皮洛夫已经为埃及修建水坝提供了贷款。杜勒斯于是在1956年7月19日通知埃及驻美大使：美国取消对埃及的贷款。英国也宣布不提供贷款。

为了回击美国和英国，六天后即1956年7月26日，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了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法令。纳赛尔宣布：“我们将不期望英、美提供7000万美元的贷款……埃及将在没有任何外国压力下建设阿斯旺水坝。”他说，埃及将用运河每年2500万美元的收益作为建设阿斯旺水坝的资金来源。

对于埃及的这一行动，英法两国准备以武力收回运河区。7月31日，英国通知美国说，英国政府已作出“粉碎纳赛尔”的决定。此时，英国与法国已经准备好进行一次军事行动。

美国的方针是，通过谈判达成妥协，实现国际共管运河的目的，不同意英法以武力夺取运河区。艾森豪威尔还否决了美国军方支持英法动武的意见。美国与英法一起在1956年8月2日发表了三国政府声明，说运河是“国际水道”，“始终具有国际性质”，提出由“国际共管”运河的主张。在三国邀请下，1956年8月至9月在伦敦召开了两次会议讨论苏伊士运河问题，英、法、美、苏、埃及等24国参加。在第一次会议上，杜勒斯提出一个“四点计划”，建议建立一个管理运河的国际组织并设立一个管理机构，但不受埃及控制。这个建议被埃及拒绝。在第二次会议上，杜勒斯又提出“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方案，想“把使用国组织起来”，目标仍然是要实现“对运河实行国际控制原则”。这一建议再次遭到埃及的拒绝。

在谈判正在进行之机，英法避开美国，暗中勾结以色列准备挑起战争。以色列从1953年起就被埃及封锁了蒂朗海峡，它认为这次运河危机除了用军

事手段外别无其他选择。于是以色列国防部制定了以打通蒂朗海峡为目的的“卡达希”作战计划。同时，以色列还从法国购买武器，同法国建立了军事合作关系。

英国国防部早于8月3日就开始着手制定作战计划，起初，登陆地点选在亚历山大港，但艾登首相不同意，理由是距苏伊士运河太远。后来登陆地点选在塞得港。英法建立了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英国的凯特利将军和法国的巴尔若海军中将分别被任命为联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英国的斯托克韦尔将军和法国的安德烈·博弗尔分别担任联军地面部队司令和副司令。作战计划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作战，摧毁埃及的空军；第二阶段作战，登陆部队在海上待机期间，空军继续破坏埃及的经济和埃军的后勤基地，使埃及人丧失战斗意志；第三阶段作战，在苏伊士运河北端登陆，占领运河地区。

9月底，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达扬一行来到巴黎。英法同以色列协商后决定将开战日定为10月20日，但几天后又改变了。最后决定以军于10月29日开战，英法军队于10月31日开战。10月22日，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总参谋长达扬、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前往巴黎，与法国协商作战的细节问题。总参谋长达扬的设想是：以色列首先向米特拉山隘空投1个伞兵营。如果英法军队按预定计划开战，以色列军队就配合其行动正式转入西奈作战；如果这时英法军队不参战，以色列就撤回空降在米特拉的部队，并且可以向内外解释说这仅仅是一次袭击行动。法国首脑赞同以色列的计划，决定立即给以色列运去必要的车辆和60架飞机。稍后，英法以三国代表签署了这些通过协商决定的事项。

为了掩护这一正在策划的侵略行动，英法于1956年9月将苏伊士运河问题提交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对埃及政府采取行动，并于同月23日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美国对英法的这一行动是不满意的。在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安排下，英法和埃及在10月9日举行了三方秘密会谈，达成了下述六项原则协议：

保持运河的自由通航；尊重埃及的主权；任何一国不得因国内的政治问题影响运河的经营管理；由“苏伊士运河使用国协会”和埃及共同商定运河通行费用；运河通行费的相当部分应作发展之用；原苏伊士运河公司和埃及政府之间的争执应通过仲裁解决。

然而，英法随后又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了对运河实行“国际管理”及“使用国协会”享有特权的要求。这些要求因苏联的反对而被否决。英法表面上同意于10月29日与埃及重开谈判。但就在同一天，它们支持下的以色列对埃及发动了进攻。

10月29日凌晨，以色列军队对埃及发动军事进攻，第二次中东战争开始。以军以4.5万人分四路攻入埃及西奈半岛，占领了加沙地带和亚喀巴湾中的主要岛屿，到达了离运河东岸只有40多公里的地方。翌日，纳赛尔下令全国总动员，反击以色列入侵者。当天下午，英法向埃及、同时也虚伪地向以色列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停火并各从运河两岸后撤18公里，而由英法军队进驻运河区重要港口。英法声称，任何一方若在12小时内不接受上述要求，它们将用军事手段进行干预。以色列立即表示接受，埃及则在当晚宣布拒绝。英法便以此为借口，于10月31日从英国航空母舰和马尔他、塞浦路斯基地起飞的240架英法飞机，对开罗、亚历山大、塞得港、苏伊士等大城市和一些机场实施轰炸。英国海军还在苏伊士湾击沉一艘埃及驱逐舰。

英法入侵后，纳塞尔指挥军队从西奈撤入运河区，集中抗击英法，同时以沉船封锁运河，使英法军舰无法通过。英法大量的海军陆战队仍然远在马耳他，要在一个星期后才能到达，而在这段时间里形势已变得对它们不利了。

英法以的侵略，不仅遭到了埃及人民的坚决抗击，也遭到阿拉伯世界的同声谴责。美国始终不支持这次侵略行动。艾森豪威尔在10月27日、29日两次打电报给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要求以色列“不要采取可能危及和平的任何先发制人的行动”。29日晚9点，美国政府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声明说：“总统谈到本届政府和前届政府保证过要援助中东遭到侵略的受害国家。我们将遵守我们的保证。”但没有说明谁是受害国。艾森豪威尔在10月30日给英国首相艾登的信中表示担心，一旦英法开始侵略埃及的战争，就将使美英“两国政府陷入一种非常可悲的混乱状态”，两国将“无法……采取一致的行动”。当时艾森豪威尔正在积极争取连任总统，这也是他对英法的行动十分恼火的原因之一。11月1日，美国在联合国提出了一项议案，要求在埃及交战的各方立即停火，将军队撤回停战线后面。大会以64票对5票通过了这一提案，英法使用了否决权，且拒绝停火和撤军。美国遂中断对它们的石油供应。这时英法需要的中东石油已不能从堵塞的苏伊士运河去，而需要用拉丁美洲的石油，美国则切断了拉丁美洲的石油供应线。

英法对埃及发动进攻后，赫鲁晓夫认为这是苏联改善因波匈事件而受损的国际形象和扩大在阿拉伯世界影响的天赐良机。赫鲁晓夫立刻打电话给此时已遭贬的前苏联资深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想听听他对这件事的意见。

莫洛托夫：“我想我们应向美国总统建议，共同采取行动对付进攻埃及的侵略者……艾森豪威尔决不会同意与我们一起对付英法和以色列。”

赫鲁晓夫：“当然他不会同意，但是我们迫使他拒绝，就可以揭露他公开谴责侵略埃及的虚伪性。我们就能利用他所作来揭露他所讲的。如果艾森豪威尔真正反对侵略的话，那么他就应该接受苏联的建议共同保卫埃及的独立。”

赫鲁晓夫立即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由苏联外交部照会西方国家。11月5日，苏联在致美国的照会中强调指出，苏美两国应在联合国旗帜下采取共同行动。同时苏联也照会英、法、以三国总理，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行动。照会中说：“你们进攻埃及，因为你们知道埃及比你们弱得多，埃及没有多少军队，也没有大量武器。但是还有其他国家，他们完全有能力保卫埃及。”照会还向英、法、以三国暗示，苏联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如果必要，苏联准备干预；苏联不能保持中立，中东战火扩大的话，就会威胁苏联的利益；苏联打击英法侵略军不需要派遣舰队或大批飞机到它们的海岸，只需要用现代化的火箭就可以。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接到苏联的照会后，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说：“简直令人不能相信！俄国是在认真说话吗？居然要我们同他们一致行动对付英、法和以色列！不能设想！”

美国虽然不接受苏联的建议，但加强了对英、法、以三国的压力，并于11月6日命令美军进入紧急戒备状态。艾森豪威尔主要不是害怕苏联在中东采取军事行动，而是担心赫鲁晓夫诱使美国谈判解决中东问题，从而使苏联的力量打进这个地区。几个世纪以来，西欧一直在为不使俄国的影响渗透到这个地区而斗争。11月6日清晨，艾森豪威尔在电话中警告英国首相艾登，如果英国政府还想维持“美英团结与和平”的话，应“立即下令停火”，美

国“不能再等下去了”。

在四面楚歌的情况下，11月6日下午5时，英法被迫宣布于当天午夜停火。至此，英法动员了16万兵力、耗费3亿美元进行的侵埃战争终以失败告终。英国首相艾登被迫辞职。埃及人民粉碎了侵略，并迫使西方国家继续作出让步。到1957年5月，包括英法在内的有关各国最终都接受了埃及的运河国有化计划。

这场英、法、以侵略埃及的战争，使西方国家对苏伊士运河实行国际共管、重新控制运河的打算破灭了。中东地区各民族独立力量得到加强，埃及和一些阿拉伯国家加强了同苏联的联系。

艾森豪威尔的“力量真空”之说便由此而来。1957年元旦，艾森豪威尔在白宫会见新选出的国会两党领袖时，要求他们支持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一篇新宣言。他说：“我们是决心要维持西方在那一地区的权利的。在中东出现的真空必须在俄国人进来之前由美国来填补。”1月5日，艾森豪威尔向国会发表关于中东问题的特别咨文，建议国会批准向中东国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批准使用美国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这些请求援助的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发动公开武装侵略”。决议案经国会通过后，于3月9日由总统签署生效。这一声明即被称为“艾森豪威尔主义”。

随后美国就千方百计向中东扩张势力。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哈希姆王朝被卡塞姆将军推翻。卡塞姆倾向埃及、叙利亚，在国内与共产党合作，在国际上寻求苏联的支持。黎巴嫩政府对埃及影响扩大十分不安，要求美、英在48小时内对黎巴嫩进行支援。美国于7月15日派第六舰队到地中海东部，1万多名美军在黎巴嫩海岸登陆，还从冲绳将一个团兵力调至波斯湾。17日，英国两千余名伞兵进入约旦首都安曼。中东形势又趋紧张。美、英的行动遭到大多数国家的反对，迫使美、英不得不撤军。苏联在中东的影响则进一步加强了。美苏在中东的争夺从此进入白热化。

**海峡两岸** 美国对台湾早有图谋。早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正在顺利进行之机，美国就想把台湾据为己有。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出于反华反共立场和其称霸世界战略的需要，命令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并利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内战的继续加紧了对台湾的控制。

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拼凑反华包围圈的同时，与台湾当局签订了美蒋“共同防御条约”。台湾当局在同美国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后，加强了对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的袭扰。

1957年杜勒斯对记者说，如果中国以武力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那么我们将进行战斗”。同年4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美国将单方面禁止对共产党中国的一切贸易。”1957年6月28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的对中国政策的演说中说：“（共产主义）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台湾当局继续加紧对大陆及沿海省份的破坏活动，并在金门、马祖驻扎了10万军队，声称要反攻大陆。

1958年夏季，美国出兵黎巴嫩，遭到全世界的同声谴责。为了转移世界舆论对中东局势的关注，为了扩大对中国的威胁，艾森豪威尔政府积极鼓动

台湾当局在海峡两岸制造危机。

受台湾海峡日益紧张局势的困扰，毛泽东已失眠了好几个夜晚了。中央为此也多次开会，但难以形成最后的决议。因为台湾问题不仅牵涉到中国台湾当局的关系，还牵涉到美国。

8月9日清早，机要秘书送来了一份电报，电报说，美国海军参谋长伯克扬言说，美国海军随时准备像在黎巴嫩那样在中国大陆登陆。毛泽东看后，不由得怒火中烧。“美、蒋的气焰也太嚣张了。是可忍，孰不可忍？必须尽快给他们点颜色看看。”毛泽东一作出决定，立即把秘书叫来：“通知各位首长，马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正是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炮轰金门、马祖的决议一致得到通过。炮击金门是为了打击台湾当局的挑衅行动和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霸道行径，同时也为了间接针对这一时期赫鲁晓夫对美国的妥协退让。

1958年8月23日下午17时50分，解放军前线指挥员发出炮击命令。随着一串串红色信号弹的升起，2600余发炮弹顿时从不同方向落到金门国民党军阵地上。当时国民党军金门防卫总司令正召集军官，一面会餐，一面听“国防部长”俞大维训话。炮弹飞来，天崩地裂。俞大维立即趴在地上，过了片刻，他抓住胡璉的手臂说：“这里不安全，你跟我走！”此时俞大维身上已多处受伤，胡班看他血流满面，赶忙扶着他走。餐厅里的国民党军官听到炮声多数就地隐蔽，而听到炮声向外冲的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章杰、海军副司令赵家骧，都在翠谷湖岸的桥头上阵亡。金门防卫副司令吉星文正在外面视察，全身暴露在炮火下，被密集的弹片重创，三天后死去。解放军的第一群炮火，打断了金门国民党军所有的通信线路。作战指挥中心和炮兵指挥所与各个炮兵部队都失去联络。解放军炮击了约20分钟后，国民党炮兵才先后开始重炮还击。这次炮战共持续了85分钟，解放军共发射炮弹3万余发。8月23日的炮击，在解放军炮兵战史上是较大的一次炮战，从规模上看可以和攻克锦州、攻击天津、上甘岭战役和金城反击战中的炮战并列。后来有人评论：“与攻击柏林的炮火密集程度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次炮战在打击的突然性、组织的严密性上都有其独特之处，显示了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可喜进步。

8月23日的炮击震动了台湾乃至美国白宫。台湾当局一时摸不清解放军的意图，估计解放军会登陆金门，并有可能攻击台湾。蒋介石向艾森豪威尔紧急求援，要求美军迅速帮助防守金门。艾森豪威尔、杜勒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也摸不清中国炮击金门的战略意图是什么。从各种迹象判断，艾森豪威尔认为，解放军这次大规模炮击，决不只是为了要解放金门、马祖，而是要大举解放台湾的前奏。于是他下令将地中海美第6舰队的一半舰只调到台湾海峡和第7舰队会合。这样美军在台湾海峡的兵力就有航空母舰7艘、重巡洋舰和驱逐舰40艘。美第46巡逻航空队、第1海军陆战队航空队和其他好几支航空队也调来台湾。美第一批陆战队3800人已在台湾南部登陆。金门海域的战斗，一时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炮击金门持续10天后，金门出现严重的供应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9月3日晚，毛泽东突然提出，福建前线自9月4日停止炮击3天，以观各方动态。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领海宽度为12海里，适用于中国大陆及其沿海岛屿以及台湾、澎湖列岛和其他中国岛屿。

就在这一天，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总统秘书古德帕斯特一起就台湾形



势讨论对策，得出看法是：中国共产党的计划“起初旨在拔除中国国民党人在台湾和某些沿海岛屿的基地，甚至可能有更为远大的目的”。“如果金门由于攻被占或投降而丢失，将会沉重打击福摩萨的反共亲美政府的威信和军事能力……结果便可能出现一个鼓吹同共产党中国联盟和消除美国在岛上的基地的政府”。如果金门、马祖、台湾相继丢失，西太平洋的“反共壁垒”如“日本、大韩民国、中华民国、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将受到严重危害。“印尼、马来亚、老挝和缅甸的政府可能将完全处于共产党影响之下”。“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基地，也许甚至在冲绳的基地，都可能变得难以维持或无法使用，而具有巨大工业潜力的日本则可能落入中苏的轨道。这些事情不会立即发生，但可能在不多几年内成为现实”。这些后果会比中国共产党人“接管中国大陆发生的后果更加影响深远和更加不幸”。他们还认为，美国如对沿海岛屿干涉，就要准备“不得不冒更广泛地使用核武器的风险，甚至冒全面战争的风险”。

据此，杜勒斯于9月4日在罗德岛新港发表声明说：“美国负有条约义务来帮助保卫台湾不受武装进攻，国会的联合决议授权总统使用美国的武装部队来确保和保护像金门和马祖等有关阵地。”“我们已经认识到确保和保护金门和马祖已经同保卫台湾日益有关。”“美国已经作出军事部署，以便一旦总统作出决定时接着采取既及时又有效的行动。”声明表示，希望在台湾地区获得一项“相互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

中国8.23炮击金门、马祖的行动，曾事先通报了苏联政府。当时正与美国加紧搞缓和的赫鲁晓夫担心中国的行动会破坏美苏缓和与合作，甚至导致苏美直接冲突。在征得中国同意后，赫鲁晓夫派葛罗米柯于9月5日晚乘专机秘密访华与中国领导人会谈。9月6日下午，葛罗米柯在与周恩来会谈时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中国同志的立场和措施”。双方交换了中国政府的声明和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信件的副本。葛罗米柯认为，“这将是互相紧密配合和互相补充的两项重要的外交行动”。同日下午6时30分，毛泽东会见了葛罗米柯。9月初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邀请中国驻苏大使刘晓到克里米亚，请中国大使将下列苏方建议转告中国政府：苏联认为，为防止局势更进一步发展，苏联考虑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帮助中国制止美蒋侵略阴谋的实现。苏共中央认为，应在空军方面加强那一地区的力量，使之能够对美蒋海军起到威慑作用。过了10天左右，毛泽东答复赫鲁晓夫，对苏方建议婉言谢绝。

经过葛罗米柯秘密访华，赫鲁晓夫在得知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并不是就要武力解放台湾后，向美国表示了苏联坚决支持中国的态度。赫鲁晓夫在1958年9月7日和9月19日两次写给艾森豪威尔的公开信中表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苏联的侵犯”，“我们将完全履行我们自己所应承担的义务”，“否则，远东就不可能有持久和平”。艾森豪威尔认为赫鲁晓夫第二封信“是不能接受的”，将信退回苏联政府。

9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台湾形势和对美关系。这次会议确定了“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即台湾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谈不上。而解决台湾问题既要与台湾当局斗争，又要与美国进行斗争。这是为了一个问题而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斗争。

9月6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一方面重申“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另一方面周恩来又强调，“中国和

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美国一直企图把两件事混淆起来，以掩盖它对中国的侵略和干涉。这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在声明的最后，周恩来呼吁，“我们提议中、美两国政府坐下来谈判，限期指派大使，恢复被美国单方面中断了的大使级会谈”。

在摸不到中国底细的情况下，当天美国政府就表示欢迎周恩来的建议，并同意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1958年9月15日，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就在台湾海峡形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开始了。

就在9月4日在中国政府公布12海里领海后，在台湾当局的要求下，美国政府于9月7日派出军舰为国民党军运输船只护航，以缓解金门的供应困难。美舰和蒋舰只相隔两海里，由台湾向金门开来。叶飞急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命令：“照打不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叶飞又请示：“若美舰对我开炮，我是否还击？”毛泽东明白回答：“没有命令，不准还击。”当日中午12时整，美蒋海军联合编队抵达料罗湾，正在卸货之机，解放军即以突然密集火力攻击蒋舰及其运输船只。没想到解放军炮兵一开火，美舰丢下蒋舰不管，立即掉头向台湾方向逃去。这样一来，毛泽东便摸到了美国与台湾当局之间的微妙关系。的确，还在9月11日时，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就向艾森豪威尔总统说，参谋长联席会议“现在认为应当撤出金门、马祖岛”，他感到“蒋之所以拒绝这样做”，是因为“蒋希望促成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序幕”。

9月30日周恩来在中国国庆招待会上再次表示了中国政府收回台、澎、金、马的决心，同时重申了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之间在台湾地区的争端的主张。

同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台湾海峡局势和中美会谈说，他同意人们所说的“不要只是为了金门和马祖而发生战争”。他说，美国与台湾当局“都不能随便从条约地区对大陆使用武力”。“美国并不认为……承担在这些地区（指沿海岛屿）大规模地使用武力的义务是正确的”。杜勒斯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美国“不想承担这种义务”。“如果美国认为放弃这些岛屿不会对可能的保卫福摩萨……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我们就不会考虑在那里使用部队”。“如果有了停火，我们的判断就是，使这些部队继续驻扎在那里不是明智的，也是不谨慎的”。

中国政府注意到了杜勒斯9月30日的谈话。周恩来指出，杜勒斯的讲话“含糊地表明：如果中国方面实行停火，美国可以劝说蒋军撤离沿海岛屿。显然，美国基本上是执行一项从金门脱身的政策”。周恩来说：“现在的情况已经弄清楚了。美国知道我们不准备同它打仗，……我们也知道，美国不准备为金门而同我们打仗。”但是周恩来指出，美国想以蒋军撤离沿海岛屿“换取冻结台湾海峡的局势”，要中国“对台湾不使用武力，即承认美国侵占台湾合法化和‘两个中国’的‘事实上的存在’”。中国“不能因为只谈金、马，而换来美国占领台湾的合法化，换来所谓‘两个中国’的存在”。因此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讨论后认为，有必要改变原来收复金、马沿海岛屿的计划，“最好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美国继续干涉，有极大好处”，“美国想从金门、马祖脱身，我们不让它脱身，我们要美国从台湾撤军”，“我们可以谈谈打打，也可以打打停停”，“暂时不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我们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据此，中

国决定由国防部长发表一个告台湾同胞书以“加深美蒋之间的矛盾”。最后，“美国不劝蒋军撤走，我们就达到了目的”。

10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发表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公告，标志着金门炮击进入了新的斗争阶段，即以政治斗争、外交斗争为主的阶段，半打半停。

美国国务院则于10月8日发表声明说，由于中国已停止袭击沿海岛屿，美国暂停护航。杜勒斯抓紧中国停止炮击的空档，于10月20日去台湾和蒋介石会谈，目的是要使蒋同意放弃以武力手段进攻大陆，并“从沿海岛屿撤出几乎所有的守卫部队”，而美国则给蒋一些登陆装备，一旦今后条件具备，蒋仍可以有反攻大陆的能力。这样美国就可以避免卷入与中国的直接军事冲突。蒋介石也反对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拒绝从金门、马祖沿海岛屿撤退。但在美国的压力下，蒋接受了10月23日发表的双方联合公报中的第六款，即“……中华民国政府认为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乃其神圣使命”，“而达成此一使命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美国没有实现其将台湾与中国大陆完全分隔开来的目的，但使蒋介石同意对大陆不使用武力。10月25日，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今后单日不打炮，双日打炮。艾森豪威尔决定，只要中国在双日不打炮，“美国将不参加护航活动”。至此，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开始缓和。美国压台湾当局放弃沿海岛屿以使台湾与中国大陆分离固定化的企图为国共双方所击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美国所以在台湾问题上卷入中国的内政，是出于其对欧亚大陆上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围堵和称霸世界的需要。台湾海峡危机还表明，中国的事情只能中国人办，外人是靠不住的。苏联作为中国的盟国，只给予中国道义上的支持而不是实际援助。苏联当时只想着与美国搞缓和，生怕中国惩罚国民党军队会引起中美之战，从而把苏联牵连进来，所以才到中国来摸底。在中苏分裂以后，美国虽然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官方关系，但仍然在台湾问题上粗暴地干涉中国内政，而且在冷战结束后这种干涉有愈来愈烈之势。美国以世界霸主的心态揣度中国，把统一、繁荣、强大的中国看作是对其世界霸权的威胁特别是对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霸权的威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所作所为有着长远的战略考虑，这种考虑又是十分险恶的。

**神秘的“间谍黑小姐”** 从斯大林时代起，不友好的美国侦察机就在苏联领空飞行，有时甚至飞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上空。苏联最好的飞机和防空火炮都达不到间谍飞机的飞行高度。苏联最高军政领导人对此十分恼火和不安。1956年在苏联基辅上空，发现了一种造型新颖的美国新型侦察机，它被称为U—2飞机。

这种飞机是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凯利设计师设计的高空侦察机。1954年初，美国国防部召集专家审查通过了该机的总体方案。同年11月由艾森豪威尔总统批准生产，并命名为U—2飞机。

U—2飞机是喷气式飞机和滑翔机的混血儿，它充分体现了航空技术的精华。该机身材修长，阻力小，翼展宽，滑翔能力强。它从美国本土起飞，升高至3万米以上，辅之以滑翔方式可以飞越太平洋。最高时速约为每小时805公里，最大航程约为7242公里，续航时间约为10小时。机身上涂有黑色迷彩，故苏联人称它为“间谍黑小姐”。

由于负有间谍侦察的使命，U—2飞机装备着各种间谍侦察器材：特种摄

影机、磁带记录仪、各种电子侦察设备、雷达等。摄影机可在 24384 米高空拍照。照片上能区分出步行的人和骑自行车的人、着军装的人和穿便装的人。在大约 15240 米的高度拍摄时，从照片上能够读出报纸上的大字标题和贴在城市墙上的广告；在大约 9144 米的高空拍摄时，从照片上甚至能看到马路上的香烟头。

美国中央情报局得到 U—2 飞机后十分高兴。因为它等于为自己安装了特殊的、灵敏的眼睛和耳朵。U—2 飞机通常从挪威、西德、土耳其、巴基斯坦、日本、阿拉斯加和中国台湾等地的基地起飞，侦察苏联（包括中国）的空军基地、导弹发射台、潜艇船坞、工厂、铁路、公路、核试验场等。通过精密仪器接收苏联电台和雷达信号，并用四面转动的最先进的巨型照相机拍摄照片。U—2 飞机窃取了大量情报，光是照片就拍摄了数千张。这些情报揭示了苏联的机场、飞机、导弹、发射场、特种武器库、港口设施、潜艇建造、核武器生产、兵力部署等方面的秘密。U—2 飞机侦察到的情报一度占美国所获全部情报的 90%。

艾森豪威尔对于以 U—2 飞机侦察苏联领空还是有顾虑的。如果被打下来，很可能在莫斯科展出，从而给美国及艾森豪威尔本人的声誉造成不利影响。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坚持向苏联派出 U—2 飞机的必要性，并保证 U—2 飞机一旦失事，“苏联人也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装备，或者获得一个活着的驾驶员”。中央情报局的官员说服了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本人也认为 U—2 飞机“所获得的情报十分重要”，所以同意使用这种飞机继续对苏联进行侦察活动。不过艾森豪威尔要求，有关 U—2 飞机“每一次入侵，从计划至执行”都要报他批准。

苏联方面从 1956 年发现 U—2 飞机至 1958 年，对它毫无办法。因为 1958 年以前苏联防空部队主要装备的 3A—1 导弹集中部署在莫斯科周围，但这些导弹的射高达不到 U—2 飞机的飞行高度。接着部署的 3A—2 导弹发射高度够了，但制导系统不完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曾建议赫鲁晓夫不要下令击落它，以免苏美关系恶化。葛罗米柯认为，只要提出强烈抗议和警告，美国人就能停止这种空中侵扰活动。1959 年至 1960 年，赫鲁晓夫在外交方面遇到了麻烦，中国指责他的戴维营之行是出卖革命原则，赫鲁晓夫觉得很恼火。可能为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显示自己对西方是强硬的，赫鲁晓夫拒绝了葛罗米柯的建议。

艾森豪威尔为了不影响巴黎最高级会议的召开，在会议召开前 6 个月，曾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停止 U—2 飞行的建议，但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表示反对。于是艾森豪威尔批准了中央情报局 1960 年 4 月 9 日 U—2 飞机的一次飞行。这次飞行获得了苏联在乌拉尔以东正在建造第一个洲际弹道导弹基地的迹象。这对中央情报局来说是很大的收获。这之后，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和他的特别助理比斯尔请求批准再飞行一次。当时离巴黎最高级会议召开只有一个月了。艾森豪威尔又批准了，但限定在两星期内实施。总统秘书古德帕斯特将军在一份绝密备忘录上写道：“经总统同意，我通知比斯尔先生，可再进行一次行动，但必须在 5 月 1 日以前执行，5 月 1 日后不得行动。”

1960 年 5 月 1 日 8 时，苏联全国准备隆重庆祝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根据多年形成的传统要进行阅兵。苏军总参谋部常利用这一天来展示最新的导弹、坦克和歼击机，以显示军事实力。对于美国来说，这无疑是在窃取军事、政治情报的最理想的时刻。美国中央情报局下令 U—2 飞机执行

侦察任务。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空军驾驶员鲍尔斯中尉，从设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机场起飞去苏联上空，并预计在挪威的机场降落，全程 6000 公里。

鲍尔斯知道这是一次冒险的飞行。因为每到这样的节日，苏联战略火箭军的戒备很严。但是中央情报局给他的报酬太优厚了。另外，鲍尔斯还有一个个人计划：他想以参加 U-2 飞机飞行得来的报酬筹集资金，取得更有吸引力的“水星计划”资格。他的年龄、体重、身高和履历都符合宇航员的条件。他希望能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鲍尔斯此次的任务是：侦察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导弹发射架上的导弹、咸海以东火箭发射基地以及阿尔汗格尔斯克、摩尔曼斯克的海军和空军基地。

鲍尔斯驾驶 U-2 飞机飞行到乌拉尔地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时，被苏联防空部队发现，并立即命令萨弗洛诺夫中尉驾驶米格—19 升空追击，但未能成功。于是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比留佐夫元帅下令以导弹为主击落这架 U-2 飞机。苏军把一些高射炮、导弹发射架排成棋盘形，U-2 飞机无法逃避猛烈的火网。U-2 飞机进入火网后，第一枚 3A-2 导弹就把它击中了。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监听到苏联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激动的喊声：“命中了！命中了！”鲍尔斯在被命中后本来是完全可以轻易地死去以保守秘密的。可是这位年轻的美国人在关键时刻却选择了生。他有自己美满的家庭、漂亮的妻子，他没有勇气死。这样 U-2 飞机残骸、一盘 70 毫米的胶卷，连同鲍尔斯本人就成了苏联国土防空军的战利品。

苏联国土防空军总司令比留佐夫元帅得到报告后，怀着喜悦的心情急促地走向红场检阅台的中心人物赫鲁晓夫，向他献上了一份节日厚礼。

由于巴黎四国最高级会议即将举行，U-2 飞机事件给赫鲁晓夫出了难题。举行四国最高级会议是赫鲁晓近年来一直盼望的，如果公布击落了美国间谍飞机和俘虏了驾驶员的消息，使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知道几年来美国间谍飞机一直在苏联境内进行间谍情报活动，势必将使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后刚刚形成的一点缓和气氛荡然无存。这不但会危及巴黎会议的召开，而且可能使美苏冷战再度尖锐化。所以赫鲁晓夫决定对 U-2 飞机及其驾驶员被俘一事暂时保密。

U-2 飞机被击落时，美国是星期天，艾森豪威尔正和家人一起在戴维营休息。

U-2 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方面先后发表了 4 个自相矛盾的声明。第一个声明发表于 5 月 2 日清晨。当时美国方面推断鲍尔斯已经死了。为了掩盖事情真相，经过缜密的推敲，编造出并经总统秘密批准的托词，以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名义发表。其托词是：

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的一架科研飞机，于 5 月 1 日星期日上午 9 时左右（东部时间上午 3 时左右），在土耳其执行航空与航天局和美国空军的联合空中气象侦察任务时坠落在土耳其凡湖地区。

据飞行员报告，他在土耳其东部空域飞行时，机上的氧气设备出了故障。飞机是从阿达纳起飞的，任务是搜索晴空湍流的数据……

5 月 4 日，赫鲁晓夫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处理 U-2 间谍飞机事件。会上展开了激烈辩论，会议决定将在次日举行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公布

这件事。

5月5日，赫鲁晓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宣布苏联打下了一架深入苏联国土上空的美国间谍飞机。为了给艾森豪威尔保留面子，他把这一事件的责任推到美国的一些好战分子身上。他说：“美国统治集团中的某些人，迄今仍然不认为缓和紧张局势和通过谈判解决分歧是必需的，近来有影响的势力——以五角大楼为大本营的帝国主义分子和军人集团明显地变得活跃起来了。这些侵略势力主张继续保持冷战和军备竞赛。他们一直在进行赤裸裸的挑衅活动。”

艾森豪威尔政府为了给U—2飞机飞行打掩护，先后三次编造谎言，直到第四次国务院才不得不承认这次U—2飞机是根据“总统的命令进行的。美国先是由国家航空航天局发表声明，说由“一位平民”驾驶的“U—2研究飞机”，在土耳其上空为取得有关气象资料而坠落在上土耳其凡湖地区。当5月5日赫鲁晓夫宣布打下侦察机后，美国国务院说那架飞机可能就是美国国家航空与航天局的飞机。5月7日，苏联宣布U—2飞机的驾驶员已被活捉，美国国务院感到问题严重，含糊承认这是一架间谍飞机。最后，美国国务院又发表了五天内的第四个声明，承认U—2飞机对苏联的侦察是根据总统的授权进行的。声明暗示这种侦察飞行将继续进行，“直到取得防止突然袭击和侵略的一致性和有效的保证”。

艾森豪威尔在巴黎四国首脑会议即将召开的前夕仍然批准中央情报局对苏联进行U—2飞机侦察活动，并在事发后掩盖真相，是因为他相信了中央情报局的乐观估计，认为苏联无法打下U—2飞机。结果艾森豪威尔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在动身前往巴黎参加四国首脑会议前下令停止了U—2飞机对苏联的侦察活动，但不想公开宣布，也不准备道歉。

1960年5月16日四国首脑会议在巴黎举行。法国总统戴高乐作为东道主主持会议。会议一开始赫鲁晓夫便要求首先发言，他坚持“只有美国宣布它不再侵犯苏联边界，对过去做过的事表示道歉，并且惩罚那些直接参与这一行动的人，才有可能举行这次会议”。赫鲁晓夫还说，现在苏联无法接待艾森豪威尔，他的访苏应该推迟。艾森豪威尔则只肯表示“事实上，这种飞行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以后已经停止了，并且不再恢复”，“没有任何理由利用这次偶然事件来中断本次会议”。却坚持不道歉。

戴高乐对赫鲁晓夫的态度极为不满。他说，为了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四国进行了多方面的协商和准备，现在却因为一件并非重要的事情而难以进行下去，这真让人难以理解。戴高乐问：“谁知道法国上空现在有没有苏联卫星在通过？”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想从中调解，但没有任何效果。赫鲁晓夫退出了会场。

英美法三国首脑联合向赫鲁晓夫发出邀请，希望他能重新回到会议上。但赫鲁晓夫回复说，除非美国总统答应苏联提出的要求，否则苏联就不会再参加会议。结果这个会议还没有开就结束了。

赫鲁晓夫是四国首脑会议最积极的鼓动者，可为什么却在最后一刻不借让会议流产呢？这主要是U—2飞机事件在苏联高层内部引起强烈的反美情绪，认为美国佬是靠不住的。赫鲁晓夫本人则认为艾森豪威尔任期即将结束，没有什么作用了，他宁愿把缓和苏美关系的资本留给下一任美国总统。当时赫鲁晓夫估计肯尼迪可能当选，他对肯尼迪充满幻想。

艾森豪威尔对四国首脑会议是有所期待的。他希望能与苏联在裁军等领

域达成一些协议。1960年3月他写信给麦克米伦说：“在我看到最高级会议同意采取一些具体实际的步骤时，我将从中得到巨大的满足，”“这将是世界上的一线光芒，这个世界对互相怀疑、互不信任和军备竞赛所产生的紧张局势已经厌倦。”

5月23日，即艾森豪威尔从巴黎回来不久，继杜勒斯任国务卿的赫脱报告说，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要求继续U-2飞行，艾森豪威尔告诉他们，在他任内的最后8个月内，不会恢复U-2飞行。看来艾森豪威尔对U-2飞机事件是很不高兴的。他在5月末曾对自己的科学顾问基斯考夫斯基讲，最近几年，他的“力量是集中在结束冷战上，他感到他正为此取得进展，但是U-2事件把他的努力给破坏掉了。他感到在他任期结束前，没有什么值得他去做了”。

### 三、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后期，两大阵营内部的剧烈动荡，使一个阵营名存实亡，另一个阵营极大削弱

**东方阵营的动荡** 赫鲁晓夫发起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对东欧国家造成巨大冲击，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又严重损害了中苏关系。因此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出现了东欧动荡和中苏分裂。

1956年3月奥哈布继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后，便着手为所谓清洗铁托分子运动中受到牵连的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包括普遍提高工人的工资。但是，由于过去波兰被迫采取斯大林式的高压方式，积累了大量社会问题，这是一时无法解决的。同年6月28日波兹南1万多名工人举行游行示威，并发生了流血事件。

苏共中央断言这是美国策划的反苏反社会主义的事件，但波党中央则认为事件主要起因于波党中央和地方领导的官僚主义。8月哥穆尔卡在党内的地位正式得到恢复，担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则被要求回到苏联。这触痛了赫鲁晓夫的沙文主义神经，他决定进行干预。10月19日，波党八中全会刚刚开始，赫鲁晓夫未经邀请就率领“一队强有力的人物”闯进波兰。

因为波兰的机场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便不许赫鲁晓夫的飞机降落。机场方面得到波方有关指示允许飞机降落时，飞机已经在机场上空盘旋了1个多小时。

赫鲁晓夫一下飞机就对前来欢迎的波党领导人大声指责，双方在机场上就发生了激烈争吵。赫鲁晓夫坚持要直接去波党八中全会会场，遭到波方坚决拒绝，哥穆尔卡命令汽车司机直接把赫鲁晓夫一行送到国宾馆。

随后在国宾馆举行的会谈中，双方发生了尖锐分歧。国宾馆外是支持波兰党和政府的群众，赫鲁晓夫下令驻波苏军向华沙运动，波兰保安部队则在沿途设置了警戒。哥穆尔卡请求赫鲁晓夫下令苏军返回营地，赫鲁晓夫拒不同意。

哥穆尔卡坚定他说：“赫鲁晓夫同志，你现在撤回部队还为时不晚，否则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和不可逆转的事情。”

哥穆尔卡还当场宣布：“在大炮瞄准华沙的情况下，我们不会谈判，如果苏军不撤退，会谈就停止。”他宣称，如苏军不解除包围，他将立即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呼吁。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才下令苏联坦克停止前进，但不是返回他们的驻地。

当时华沙的广大群众在双方会谈的地点外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以支持哥穆尔卡及波兰代表团，准备自卫和抵抗苏军的入城。波兰公安部队把守着通往华沙的各条道路，一方面监视苏军的行动，另一方面准备发生武装干涉时进行抵抗。同时苏共代表团从罗科索夫斯基那里得知，波兰军队不会听命于他。于是赫鲁晓夫只得被迫放弃使用武力，下令苏军回到原来的驻地。

苏波双方直到 19 日深夜才终于达成协议，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将于近期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进行会谈。翌日凌晨苏共代表团离开华沙回国。

11 月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党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举行会谈。会谈发表的公报称，波苏两国的联盟“将在完全平等、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加强。同苏联人民和波兰人民有同等利害关系的苏波联盟，是它们的安全的可靠保障。这个联盟是巩固波兰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和保卫它的在奥得——尼斯河和平边界上的疆界的不可侵犯性的极其重要的因素”。

波兰顶住了苏联的压力，捍卫了自己的民族尊严和主权。同时波苏会谈的成功大大改善了波苏关系，确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原则。

**匈牙利事件** 苏共 20 大召开前，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党内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1953 年 7 月出任总理的纳吉虽然被撤消职务并被开除党籍，但其支持者始终没有停止反对以匈党第一书记拉科西为首的领导集团的斗争。赫鲁晓夫在苏共 20 大的报告为纳吉的支持者注入了新的活力，引发了后来的匈牙利事件。这是赫鲁晓夫本人没有料到的。

纳吉重申自己的观点，要求恢复党籍。一批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裴多菲俱乐部，竭力宣扬他们心目中的民主和自由，支持纳吉重新上台。1956 年 6 月底，波兰的波兹南事件发生后，拉科西通过公安部门逮捕了裴多菲俱乐部的成员，加剧了矛盾。苏联党和政府接到报警后，立即派副总理米高扬访问布达佩斯，迫使拉科西于 7 月辞职，而由格罗接替。

格罗上台后虽然采取了一些措施缓和国内的不满情绪，但同时又加紧批判纳吉的错误，进一步激化了国内矛盾。10 月 22 日裴多菲俱乐部、布达佩斯各大专院校学生团体联席会议就要求匈党开除拉科西、恢复纳吉的职务及苏军撤出匈牙利。次日布达佩斯发生了 10 余万人的群众游行。10 月 23 日深夜至 24 日凌晨，匈党中央和政府召开紧急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决定改组政治局，让纳吉进入中央委员会并出任总理。

10 月 31 日，再次前往布达佩斯的米高扬接受了纳吉等人提出的要求：立即从匈牙利撤军；匈牙利退出华约；匈牙利重新建立多党制政府，进行自由选举。

但是这一切并未使事态平息，匈牙利事件继续恶化。在此情况下，匈牙利领导集团发生分化。11 月 1 日，纳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宣布退出华约，请求苏美英法四大国保证匈牙利的“中立”。与此同时，卡达尔则前往苏联寻求支持。

实际上早在卡达尔来请求苏联以前，苏联方面就严密关注着匈牙利事件的发展。苏共中央主席团多次开会讨论匈牙利事态的发展，并得出结论：必须坚决制止匈牙利事件进一步恶化。赫鲁晓夫打电话问苏联元帅、华约总司令科涅夫：“如果指令你恢复匈牙利的秩序并击溃反革命，需要多少时间？”



科涅夫回答说：“三天，不会再长。”

“那么着手准备好。到发动的时候，我将通知你。”

11月4日凌晨，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新政府宣布要制止反革命势力，并请求苏驻匈牙利部队参预平暴。中午，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纳吉及其支持者到南斯拉夫大使馆避难。至11月15日，匈牙利事件基本平息。纳吉于23日离开南斯拉夫大使馆后被苏军逮捕，1958年6月由匈牙利最高人民法院处以死刑。

匈牙利事件不仅给匈牙利自身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使苏联的东欧政策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到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重新抬头。匈牙利事件还冲击了苏美的第一次缓和。美国在匈牙利事件过程中对匈牙利的反对势力极力声援，但是美国知道东欧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所以在行动上是非常谨慎的，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中苏关系恶化** 苏共20大使中苏两党产生了一系列原则分歧，这特别表现在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和平过渡两大问题上。1956年4月和6月，中共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文章，批评了苏共20大的观点。

在东欧发生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时，赫鲁晓夫迫切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领导人从巩固东方阵营的大局出发，也希望保持和稳定中苏关系。1957年两国领导人频繁地进行了互访，双方重申了两党、两国关系的重要性。

赫鲁晓夫在度过世界上一度出现的反苏危机后，就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搞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1958年4月，苏联国防部长致函中国，建议在中国领土上由双方合资共建一座长波电台，以改善苏联太平洋舰队的通信指挥系统。中方表示：同意建设电台，但费用由中国承担，主权属于中国，建成后两国共同使用。可是苏方在答复中仍然要求合资共建，实际上对中国要求拥有电台全部主权的立场不给予重视。

长波电台的事尚在争执中，又出现了联合舰队问题。1958年6月28日，周恩来写信给赫鲁晓夫，希望苏联在核潜艇的研制方面对中国给以新的援助。7月苏方以赫鲁晓夫的名义提出，希望与中国协商建立一支共同的潜艇舰队。当苏联驻苏大使提出这个问题时，毛泽东尖锐地问：“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苏联大使解释不清楚。毛泽东有些生气，谈话时情绪是激动的。

苏联大使把毛泽东的反应报告了莫斯科。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匆匆赶到北京与毛泽东会谈。赫鲁晓夫解释说，苏共中央没有讨论过长波电台问题，是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来的。当看到中国方面在主权问题上的坚定态度后，赫鲁晓夫同意中国拥有长波电台的全部主权。关于共同舰队问题，赫鲁晓夫推托说，苏联从未有过，也永远不可能有搞中苏联合舰队想法的影子，只是想共同研究两国海军的发展方向。此外，毛泽东还严词拒绝了赫鲁晓夫的中国向苏联提供海军基地，而中国海军可以在苏联获得同等权益的建议。这场风波虽然平息下来，但它在在中苏关系上造成的消极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毛泽东在1966年回忆说：“中苏关系闹翻是1958年，他们要控制中国海军，我们不干。”1959年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赫鲁晓夫再次来到北京。在会谈中，他抱怨中国炮击金门造成了美苏大战的气氛，并劝说中国领导人承担不用武力解放台湾的义务，实际上是要中国适应美苏搞缓和的需要。

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终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并拒绝援助中国研制核潜艇。同年7月中印发生了边境冲突，苏联不顾中国的解释，在公开声明中偏袒印度。这就向全世界公开了中苏分歧。1960年中苏展开大规模论战，苏联片面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合同，召回了在华帮助建设的全部苏联专家。接着苏联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中苏同盟形存实亡。

**西方阵营矛盾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美国是西方世界的超级巨强。但到50年代时，情况便开始有所变化。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力量有了明显增强。英国在1952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核国家。法国在1955年也决定研制自己的核武器。英法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遭到惨败后更加快了研制和发展核武器的步伐。英国于1957年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氢弹试验，法国在1960年在撒哈拉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爆炸。西欧加快了联合的步伐。

西欧各国的力量虽然有了明显加强，但与美苏两国相比，西欧任何一国还相差很远。面对美国的垄断资本，它们无法竞争；面对苏联的军事优势，它更是无法匹敌。为了加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抵抗苏联的军事优势，西欧国家加强了自身的联合。

正是在此背景下，1957年3月25日，参加欧洲煤钢联营的六个国家——法、西德、意、比、荷和卢森堡——在罗马举行会议，签署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该条约规定：各成员国逐步取消关税壁垒；实行人员、劳务和资本自由流动；建立共同的农业政策和运输政策；设置理事会、委员会、法院等机构以保证上述任务的执行。与此同时，六国还签署了《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条约》。这两个条约于1958年1月1日生效。这样加上原来的欧洲煤钢联营，西欧就有了三个共同体。

美国虽然从对抗苏联的根本利益出发对欧共体表示支持，但对它的“排外性”和发展为“第三种力量”的倾向感到担忧。美国一直企图把欧共体纳入自己的战略轨道。欧共体也加剧了英国与法国的矛盾。英国既不愿牺牲与英联邦国家的利益而加入欧共体，又不愿忍受本国产品在六国共同市场受歧视。作为一种对抗，英国于1959年11月联合瑞典、丹麦、挪威、瑞士、奥地利和葡萄牙组成一个七国“小自由贸易区”。西方国家内部矛盾有所发展。

60年代美国为了阻止法国研制自己的核武器，提出在欧洲搞“多边核力量”，遭到法国的拒绝。随着美国与法国矛盾的发展，法国退出了北约，西方阵营的裂痕进一步增大。

## 第六章 箭与橄榄的新乐章

随着美苏“戴维营精神”的破产，60年代初期美苏关系便再次陷入僵局之中。不过与50年代初期的尖锐对抗不同，这次僵局的特点是，双方一边频繁抛出橄榄枝，一边磨刀霍霍；时而走到战争边缘，时而搞些小缓和。

### 一、肯尼迪：“把我们的宝剑磨得更锋利些！”

1960年11月肯尼迪以微弱多数击败尼克松，当选为美国战后第三任总统。1961年走马上任。

肯尼迪出身名门，是位传奇式的人物。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舍身抢救战友而身负重伤，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战斗英雄。他曾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又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因其第一任任期未届满便遇刺身亡，更给这位总统罩上了一层悲剧和神秘色彩。

肯尼迪就任总统的1000天是多事之秋。这既是美国战后霸业走到顶点之时，也是走下坡路的开始。肯尼迪本人在外交思想上继承了从杰斐逊到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同时又继承了战后以反苏反共为核心的冷战战略思想和美国以“世界领袖”自居的使命感。二者结合起来，使以肯尼迪为首的一批美国精英分子把美国的“全球主义”扩张政策推到顶峰。

“灵活反应”战略 肯尼迪一当选总统，便利用就职前的72天物色人才，组成一个由“出类拔萃”的人物组成的班子。肯尼迪首先确立了文职人员掌握国防事务的传统，并设法把最高权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上，成为名副其实的最高统帅。他物色了麦克纳马拉任国防部长。麦氏也出身名门，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曾在母校教会计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美国陆军航空队延聘，他在那里以其全神贯注的工作精神、惊人的数学头脑和驾驭庞杂材料的能力赢得了声望。肯尼迪选中麦克纳马拉除了麦的精明能干外，还有两个原因：一是麦克纳马拉倾向民主党；二是麦早在1950年在哈佛大学当学生时就是“战略多元化的”积极鼓吹者，与肯尼迪的战略思想相吻合。用一名高级会计师出任国防部长是有象征意义的。

另外一个重要人物是《音符不定的号角》的作者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泰勒曾是艾森豪威尔的陆军参谋长，一直与艾森豪威尔的战略思想相左，主张“打赢小战争的手段”。肯尼迪任命泰勒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肯尼迪一上台就着手新军事战略。自从苏联有了核武器，美国就有了两种战略思想之争，即“战略一元论”和“战略多元论”之争。艾森豪威尔时期奉行“战略一元论”，主要依靠核武器搞“大规模报复”战略。50年代发生的许多事情证明，大规模报复战略使美国既不敢打全面战争，又不敢打有限战争，从而使这一战略走进了死胡同，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批判。

肯尼迪当参议员时就一再抨击“大规模报复”战略，称这为“马其诺防线心理状态”，是“依靠一种可能会垮台，或者可能永远也用不上的战略，但又阻止我们考虑其他的抉择”。认为对美国最可能发生的不是核攻击，而是苏联在第三世界进行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侵略。而对付这种性质的侵略，是不能用代价高昂的核武器的。

肯尼迪班子成员基本上都是“战略多元论”者。1961年1月6日，白宫安全事务副特别助理瓦特·罗斯托即向肯尼迪提出一项备忘录：“据我理解，面临的问题是，我们如何避免出现一种局面，迫使美国不得不在二者之间任

选其一：要么接受在世界舞台上蒙受巨大挫折；要么使用核武器。”文件批评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规模报复”战略，明确提出了打“有限战争”和对付游击战争的观念，并提出与苏联的裁军谈判应包括禁止越过“自由世界边界”向不发达地区运武器。

肯尼迪责令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美国的战略和军事力量进行重新审查。肯尼迪希望一个月内便完成这一任务。“我们正尽力把一项耗费毕生精力的工作压缩到二十天内完成。”麦克纳马拉说。不过他把这项工作比作一个建筑师未研究房屋建筑的基本概念，便设计新的房屋。果然一个月不到，麦克纳马拉就把国防部的报告送来了。

肯尼迪在与他的白宫班子和预算局人员举行的一连串会议上，几乎对国防预算的每一部分都仔细斟酌，作出了一系列重大修改。在此基础上肯尼迪于1961年3月28日向国会作了上任后的第一个国情咨文，其要点是：

“我们军备的首要目的是维持和平，而不是进行战争。……当今世界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能用军事手段解决的。无论是我们的战略，还是我们国民的心理，当然还有我们的经济，都决不能依靠永远维持一个庞大的军事体制……

我们的军备决不会在任何攻击中用来发出第一次打击。这样做并不是软弱而是有力量的显示。我们必须抵销任何可能会让侵略者得到的好处，办法就是……增强经过敌人第一次打击后依然存在下来的那一部分部队的力量……

我们的军备必须是充足的……不受强行规定的预算最高限额的约束……

我们的军备在任何时候，在战争时期或平时时期，都必须受到文职官员的最终控制和指挥……其中包括有关使用核武器或使小规模战争升级为大战的所有决定……

我们的战略武器和防御力量必须足以阻止对美国或我们盟国蓄意发动的任何核攻击……

我们的部队与盟国的部队联合起来的实力和部署，必须非常强大、非常有机动性，足以防止敌人通过有限战争不断侵蚀自由世界。这种作用应该成为我国海外武装部队的首要使命……

我们的防御必须既是灵活的又是果断的……我们的反应必须是适当的和有选择的……在确定时机、范围和目标时，可以进行周密的考虑并辨别各种不同的情况……

我们的防御旨在减少发生不合理的或事先未加考虑的全面战争的危险……”

在这篇国情咨文中，肯尼迪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的基本原则：以核力量为“盾”，以常规部队为“剑”，准备进行各种类型的战争，侧重进行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

首先是准备打各种类型的战争。“灵活反应战略”从美国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根据当时国际斗争的特点，把战争样式分为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该战略要求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以便在任何时间和地点，用适当的部队和武器打任何类型的战争。

肯尼迪政府认为，由于意外事件和判断错误，核大战是可能发生的，但对美国来说，“全面核大战”只能作为最后手段。美陆军1962年版《作战纲

要》指出：“全面战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冲突”，只有“当国家不能以其他方法实现自己的目标时”，才会进行这种战争。并指出，这“是敌对的强国或联盟使用一切可以使用的手段所进行的武装冲突。全面战争的特点是不受限制，而且双方都使用核武器袭击对方的本土”。这种战争爆发的形式可能是由小到大，逐步升级。美国军界就此提出的逐步升级理论认为：战争从危机到全面核大战之间区分为7个阶段、44个阶梯和6道门槛。即包括了战争由小到大，由特种战争到有限战争，由常规战争到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有限战争以致全面核战争的完整过程。这种理论的实质在于逐步增压、扩大战争，迫使对方让步，以达到不战而胜或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胜利的目的。

肯尼迪政府特别重视有限战争的作用。美陆军1962年版《作战纲要》指出：“有限战争的特点是，交战双方对于战争的一个方面或数个方面，例如目标、武器、地区或兵力等，有意识地加以限制。由于限制程度的不同，有限战争的规模、激烈程度和持续时间可能有很大的差别。”美国认为，有限战争可以迅速而有效地干预世界任何地方的局部冲突，可以迫使苏联作出一定的让步，可以保持国际局势总体上稳定，还可以使战争在美国本土以外进行。

特种战争也是美国推行新殖民主义的重要手段。所谓特种战争就是在美国军事力量的支持下，由美国出钱、出枪、出顾问，利用当地雇佣军替美国作战。这种特种战争主要是用来对付亚、非、拉地区的人民革命的。

其次确立了打“两个半战争”的常规战略方针。所谓“两个半战争”，即准备同时实施三场战争——在欧洲、亚洲各打一场规模较大的战争，同时在亚、非、拉地区打一场规模较小的战争。苏联是同美国争霸的主要对手，美苏之间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而欧洲是美国的重大战略利益所在地区，是美苏必争之地。因此，美国政府主张以苏联为对手在欧洲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肯尼迪政府当时还认为，美国在亚洲亦有重要利益需要保护，而中国是亚洲的重心，但中国尚未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所以中国是美国的次要对手和“潜在敌人”，中苏虽有矛盾，但中苏同盟条约还没有废除，两国仍有可能联合对付美国，所以美国政府主张在亚洲以中国为对手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由于亚、非、拉人民反对美国新殖民主义的斗争此起彼伏，美国政府主张随时作好在这些地区打一场规模较小的战争的准备。

再次是采取“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方针。60年代初，根据美苏核力量发展水平，肯尼迪政府提出的是“限制损伤”的核战略方针，主张在战争时用进攻性核武器先打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基地等军事目标，以减少对方还击时可能造成的损失。但由于打击军事目标所需的核武器数量和命中精度当时都达不到要求，因此1964年采纳了麦克纳马拉提出的“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方针。这一核战略方针的目的就是：通过使敌人看不到任何获胜乃至生存的前景，给予敌人营垒中任何一个通情达理的决策者以尽可能强烈的刺激，使他不致于发动进攻；具体他说，使美国在遭到敌核袭击后残存下来的那部分核力量，仍能够摧毁侵略国的城市和人口，能够摧毁对方余下的绝大部分军事力量。这种核战略方针的重要目的之一是核威慑，故亦称“相互威胁”核战略方针。在核力量建设规模上，新方针要求建立一支打城市目标的“第二次打击力量”，即在遭到苏联核袭击后仍能通过还击，一举摧毁苏联20%~25%的人口和50%的工业。

为了满足新战略所需的军备需求，肯尼迪废除了艾森豪威尔的“大平衡”

思想，打破了限制国防预算的思想。他在给麦克纳马拉的指示中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允许按事先武断规定的财政限额来制定战略或军备的水平”。他认为战略只能视外交政策的需要而制定，军备水平取决于美国安全和承担义务的需要。也就是说，为加强军备可以不惜财力。他在1960年曾说，防务费用和其他投资一样，“是以我们的金钱作赌博；但是如果不这样，就要以生命作赌博”。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肯尼迪在第一个军事预算咨文中，要求国会在1961年7月至1962年6月30日的财政年度中给军事拨款438亿美元，比上年度增加23亿，占总预算增加幅度的一半以上。到1963年军事预算达482.52亿美元，洲际导弹则由1961年的63枚增至424枚。据其亲密助手，《肯尼迪》一书的作者索伦森称：“在三年内，肯尼迪以增加预算170亿美元的代价，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强大的军备——也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规模最大、最迅速的扩军。用他本人的话来说，这使他拥有了一个可以行使‘从最大规模的威慑到最隐蔽的影响’的武器库。”

有了金钱保证后，肯尼迪首先致力于核扩军。自从50年代末苏联方面开发了洲际弹道导弹和发射了人造卫星以后，美国政界和军界就存在着“导弹差距”说。肯尼迪在竞选过程中更是以此大力攻击共和党政府措施不力。肯尼迪当选总统后，立刻对美苏之间的“导弹差距”进行评估，得出的结论是：从纯数量方面看，苏联是占上风的，美国拥有的远程导弹数量太少了；美国部署在苏联周边的朱庇特导弹已经过时，因此需要发展新型导弹。美国大力发展北极星潜射导弹和地下民兵式导弹。据认为这类导弹的优点是不易被对方击中，即使大部分被击中了还有第二次打击能力。究竟需要多少核武器才够用呢？麦克纳马拉根据各方面情报及对苏联能力的评估，确定了424枚洲际导弹的数字。

其次是常规部队建设。在肯尼迪看来，不论核优势有多大，都无法代替常规部队的作用。他在一次私下谈话中说，如果真要动用核武器，那不仅仅意味着孤注一掷，而且意味着最终失败——威慑力量的失败、外交的失败和理智的失败。肯尼迪认为美国不仅要以核武器慑止苏联在欧洲发动大规模进攻，而且要对付外围地区经常发生的对自由世界的侵犯。赫鲁晓夫在1961年1月6日的一次演说更坚定了肯尼迪的这一信念。赫鲁晓夫在那次演说中说，要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对新殖民主义的斗争，扩大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肯尼迪认为常规力量是对付这种挑战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而美国的常规力量尚不足以完成这样的任务。因此他决心下大力量建设常规部队。1961年的“柏林危机”和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使肯尼迪认为，最好的威慑力量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有机结合。他说：“有一艘驱逐舰停泊在警备区或有一师装备精良的士兵驻守在边界地区，这对于我们的安全也许比超越一切合理需求的、成倍增加的各种威慑武器更为有用。”

肯尼迪拒绝承认华沙条约组织在常规力量方面应该比北约占优势的观点。他说，北约人口比华约多一亿，经济实力比对方大两倍，兵员比对方多50万，还有能力于战时在中欧部署更多的地面部队和战术轰炸机。因此北约理应比华约拥有更强大的常规部队。肯尼迪借“柏林危机”大力发展常规力量。把征兵额提高到原来的两倍；国会迅速批准了动员25万一级后备兵员和国民警卫队，包括动员2个师和54个空军和海军航空兵中队。到1961年冬，美国常规部队增加了30万人，其中4万被派到欧洲，其余则进入随时待命状

态。同时加强了海运和空运力量，在欧洲的作战飞机增至 300 余架、坦克及其他战斗车辆增至数千辆。在和平时期如此大规模扩军很快招致反对和抗议。1962 年初驻欧洲的美国两个陆军一等兵受到军事法庭审讯，其中一个组织抗议集会，并且对指挥官的禁令置之不理，另一个代表 74 名伙伴写信给自己家乡的参议员，对使他们失业的肯尼迪的“政治策略”加以抨击。但肯尼迪本着“复活节周的精神”，下令释放了他们。

再次是发展特种部队。1961 年发生了美国干涉古巴的“猪湾事件”，这次事件是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经肯尼迪批准的。目的是武装干涉古巴革命，推翻卡斯特罗政权，但遭到彻底失败。肯尼迪大丢脸面。他从这次痛苦失败中得出教训：对付第三世界的反帝斗争核武器用不上，常规部队也事倍功半。为了对付这种挑战，需要发展特种部队和进行特种战争。1961 年 4 月 20 日，即猪湾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肯尼迪对美国全国的编辑们说，这场灾难的主要教训是，自由世界正面临着：“一场在许多方面都比战争更为困难的斗争……（这场）斗争……毫不惹人注目地在成千上万个村庄和市场上天天发生着……在全球各地的教室发生着。……军队和现代武器……主要是起了盾牌作用，在它的掩护下，颠覆、渗透和其他各种战术稳步地向前推进……并利用……渴求理想的人民的正当不满和表面上是合法的争取自决权的要求。”

肯尼迪决心大力发展特种部队。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本来是有特种部队的，但由于不重视而名存实亡。肯尼迪对特种部队进行了重组和扩建。由于西方没有关于游击战争的书，他就研读了毛泽东关于游击战的著作以及古巴的切·格瓦纳这方面的论述，并把这两种书定为有关军事人员的必读书。他把关于特种战争的事情由中央情报局转交给美国国防部。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泰勒将军的帮助下，肯尼迪克服了来自军方领导人的反对，在北卡罗来纳州布莱格堡训练了一支特种部队，装备与人员在短期内增加了五六倍。之后，海、空军也建立了专门的特种作战部队。海军发展两栖部队和水下破坏部队，并仿效越南渔船建立了一支船队，在越南战争中专门骚扰越南解放阵线的海上供应线。空军建立起支援丛林战争的运输机队以及称作“森林杰姆”的突击队。海军陆战队增加到 1.5 万人，全部接受游击战训练。国防院校的课程中增加了游击战和反暴乱行动的课程。另外，由于游击战的性质要与当地群众打交道，决定让特种部队普遍接受文官的训练，同时又让文职官员接受反暴乱训练；驻外军事顾问、武官与教练，都加强学习当地语言。

特种部队是肯尼迪的得意之作。他对其装备细节都亲自过问，下令都戴“贝雷帽”；指示以轻便胶鞋代替笨重军靴以适应丛林泥土地；后来又指示给胶鞋底打上铁钉以应付南越人民武装的铁蒺藜；还指示为身材矮小的南越军人专门设计更加轻便的战地收音机和步枪，等等。肯尼迪给特种部队的任务是，不但要执行军事任务，而且要执行文职任务。他们要能在丛林、乡村及敌后生活。据说肯尼迪经常引用毛泽东关于战士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的话，他知道游击战争的力量在于群众的支持，因此他原来的计划主要不是依靠大量美军投入直接作战，而是以少而精的专家派往各国训练当地人组成的游击队。当然，战争的性质决定了军民是否能建立起“鱼水关系”，在这一点上侵越美军是没有办法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发展特种部队是肯尼迪的一个精心之作。特种部队在越南战场上也的确发挥了一定作用。他们在南越抹去足迹，挖井，防止伏击，提高士气并组成反共阵地。“这些人的好处，

你说也说不尽，”在肯尼迪启动这项计划四年后，一个观察这场战争的人从战场上回国报道说，“不幸，在越南……绿色贝雷帽的战士很不够。”第四是民防措施。肯尼迪执政时期一个令人传为笑柄的措施是所谓民防。同他大部分观点不同，肯尼迪在民防方面的观点形成得太快了。他当参议员或总统候选人时都不曾谈及这个问题，在总统就职演说或国情咨文中也没有谈及这个问题。美国民防动员局长埃利斯公开要求分配给民防更多的经费，并让总统给民防以更多的重视。1961年5月25日，肯尼迪在向国会所作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中提出要建立核掩体，以便在核放射物威胁下“确保生存”，并将民防事项移交国防部，将民防局改为紧急战备局。两个月后，在关于柏林危机的演说中，肯尼迪强调作好进行核战争的准备。他说：“万一发生一次攻击，在核爆炸和巨火中未被直接击中的家庭仍然能够保存生命——只要他们听到警报后能进入掩蔽所，只要有那种掩蔽所的话。……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在今后几个月内，我希望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万一遭到攻击，他可以立即采取什么措施来保护他的家庭。我知道你们要求做到的也正是这一点。”肯尼迪的本意可能是提醒公众对核威胁给予重视，结果引起全国性的核恐怖。一时之间美国人人自危，争购掩蔽所。掩蔽所制造商趁机渲染核恐怖。科学家和冒牌科学家互相争论：在一场核战争中在有掩蔽所或没有掩蔽所的情况下有多少人能够生存下来，这些人必须在地下停留多长时间才能出来。牧师们争论说，人类的伦理观念究竟要求他们接受燃烧成灰的死亡呢，还是接受地下式生活。商人们马上出售生活用具箱、口粮袋、沙袋、潜望镜和预防放射性尘埃的衣服和药膏。父母提醒他们的孩子不要透露他们掩蔽所的地点。“依靠自己救自己”成了“不救别人，只保全自己”了。

肯尼迪政府缺乏一个全盘的掩蔽所计划，缺乏一个明确的掩蔽所政策，甚至缺乏正确地安排整个问题的权威性意见，这使混乱更加剧了。只有肯尼迪本人能提供权威性的意见，但他举旗不定，而他的顾问们意见又不一致。究竟建立家庭掩蔽所还是公共掩蔽所？国家应否为此拨款？眼见自己的两次讲话引起巨大混乱，肯尼迪保持沉默，没有再发表讲话，也不再作进一步解释。实际上，官方宣传的调门已经降低。1962年国会通过的一项立法只要求制订一个长期计划，由联邦政府推动在学校、医院、图书馆和类似的公共中心建造掩蔽所，费用由州和地方政府机构分摊。

掩蔽所狂热大概持续了半年多，随后就迅速退潮。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时人们又想起了它，有人赶紧往掩蔽所里储备食物，不过随后又消沉下去了。

肯尼迪对自己的讲话引起的混乱不愿承担责任，1962年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为自己辩解说：“太平无事时，谁也不感兴趣。……随后，等战火迫近——而我们毕竟保证不了战火不会到来……人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多采取一些措施？我认为应当趁现在就采取措施。”

## 二、挥动橄榄枝的高手

肯尼迪在处理外交事务上所花费的时间更多。在了解外交事务的细节、拟定可供选择的办法，以及在外交事务方面协调与国会的关系上他花费了大量精力。

肯尼迪认为外交事务中重要的课题是战争与和平和对苏联的关系问题。下面这些谈话反映了他的“辩证法”：



我们决不要由于恐惧而谈判，但是也决不要对于谈判感到恐惧。

——1961 年就职演说

在总统的盾形纹章上，美国之鹰的右爪抓着一根橄榄枝，左爪则抓着一束箭。我们打算对两者都给予同样的重视。

——1961 年第一篇国情咨文

我们的政策必须把坚定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使之达到为保护我们的重大利益所必要的程度，假如可能，便通过和平的手段，假如必要，则通过坚决的行动。……我们既然不想看到自由世界认输投降，我们就应竭尽全力以防止世界遭到毁灭。

——1961 年在北卡罗来纳大学

我们如果要维持和平，就必须勇敢地面对战争的危险。……外交和国防是不能相互替代的。……有抵抗暴力的意愿，而没有谈判的意愿，只会引起战争——有谈判的意愿，而没有抵抗暴力的意愿，只会招致灾难。……我们虽然自由地进行谈判，但我们决不会拿自由作交易。……总之，我们既不是“战争贩子”，也不是“绥靖主义者”，既不“强硬”，又不“软弱”。我们是美国人。

——1961 年在华盛顿大学

这些言行充分表明了肯尼迪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软硬兼施的策略。也是传统的美国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生动说明。当有人批评他说“你不能既当张伯伦，又当丘吉尔”时，肯尼迪以心脏有规律的张缩作比方回答说：“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同心脏一样——有收缩，也有舒张。”

肯尼迪注意到，美国与苏联都拥有在几分钟内摧毁对方的能力，并认为“这一点使问题的性质改变了。它改变了所有的答案和所有的问题。我认为许多人并不真正懂得这个变化。……到了那一天，发生了大规模的交锋，那末末日就来临了，因为你们在谈论的是……在头 18 小时里将有 1.5 亿人死于非命。”这相当于美国在不到 1 天的时间里经历了 500 场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柏林危机时他对全国说：

“在我的一生中，我国和欧洲三次卷入了大战，每一次双方对对方的意图都作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从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现在到了热核时代，任何一方对于另一方意图的错误判断，都可能在几小时内生成比人类历史上全部战争所造成的更为严重的破坏。”

肯尼迪认为要赢得冷战，关键不是打核战争，而是“让当今仍为共产党国家所控制的地区感染上托马斯·杰斐逊称之为‘自由病，的那种疾病’”。肯尼迪把美国与苏联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经济、科学和政治方面的竞争看成是长期的，是一个缓慢地使苏联及其他共产党国家“脱离共产主义，走向国家独立和自由”的演变过程。

基于以上判断，肯尼迪谋求制止苏联政权向外扩张，而不是制止苏联内部的哲学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展。1961 年他写信给赫鲁晓夫说：“贵国政府信奉的哲学是贵国自己的事，但贵国政府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则是全世界的事。”

为了缓与苏联的关系，肯尼迪提出了裁军、核禁试、和平利用空间及加强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等措施。

在裁军问题上，肯尼迪认为美国要抓住这面旗帜。在他看来，这是一面影响中立国和世界舆论的有力的旗帜。肯尼迪指示美国负责裁军事务的官员，不能让苏联人垄断“全面彻底裁军”这块招牌，美国人自己要举起这块

招牌。肯尼迪认为美国拥有技术优势，坚持在裁军中要有核查制度。苏联反对把这样一种制度引入裁军中，肯尼迪则始终坚持这一条。

为了维持“美国治下的和平”，肯尼迪比较重视操纵和利用联合国，把联合国作为推行美国政策的工具。苏联方面看透了这一点，在 60 年代初提出了一个改组联合国的“三驾马车”方案，即设立三个联合国秘书长，每一个代表一个不同的集团（东方、西方和中立国家），每一个有权否决其他两个的决定。苏联的目的不是控制联合国，而是希望改变联合国作为美国工具的局面。1961 年 9 月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因飞机失事而身亡，肯尼迪则面对空着的秘书长席位在联合国发表演说，抨击苏联的三驾马车方案。他说：

“哈马舍尔德去世了，但联合国继续存在。……不管填补哈马舍尔德先生的空缺会有多大困难，这个空缺由一个人来担任总比由三个人来担任好。即使是三驾马车的三匹马，也没有三个分道扬镳的马车夫……”

允许每一个大国去裁决它自己的案件，那将使这个和平总部成为冷战的场所。……作为大国之一，我们拒绝这样做。”

结果美国抵制了苏联的三驾马车方案，选举吴丹为代理秘书长。

肯尼迪在 1961 年向联合国发表的演说中，还提出在外层空间进行合作，这实际上也是美苏斗争的一个重要领域。肯尼迪提出“决不能让宇宙的寒冷地区成为更加寒冷的冷战的新战场”。并主张东西方合作“来创造科学的奇迹而不是使人看到科学的恐怖。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星球吧”。肯尼迪提出空间合作计划是因为当时美国在空间技术方面落后于苏联，美国想以此阻止苏联把外层空间军事化。这当然又遭到苏联方面的拒绝。

肯尼迪在竞选过程中就严厉抨击艾森豪威尔政府形成在空间技术上与苏联的差距的失误，并担心苏联在空间技术方面的成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苏联在各方面无可争议地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肯尼迪入主白宫后的 100 天，莫斯科于 1961 年 4 月 12 日宣布，宇宙飞行员加加林不到两小时就完成了环绕地球轨道的飞行。肯尼迪下令大大增加美国在空间技术研制方面的经费，并让副总统担任美国空间委员会主席，加速空间技术研制步伐。在肯尼迪的督促下，美国空间委员会确定了下列空间发展项目：更长时间的单人轨道飞行，双人宇宙飞船，空间轨道实验室，固定的宇宙中间站，绕过月球后返回地面的载人火箭，以及用于宇宙航行的全部可控制的飞机。美国科学家们向总统保证说，美国的这些空间项目在技术上每一项都比苏联领先。肯尼迪在听了科学家们的汇报后要求：“把我们的空间探索工作从低速转向高速。”在 1961 年 5 月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中，肯尼迪向国会议员们保证说：在这 10 年结束之前，要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通过对空间技术的拨款比 1961 年预算增加了 50%。1962 年的拨款又超过了 1961 年以前历年空间预算的总和。重大的新设施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及其他地方迅速建立起来。当有人批评肯尼迪把 200 亿美元巨额资金用于开发空间技术是冒险行动，应该把这笔钱用来解决美国穷人的贫困问题时，肯尼迪回答说，不管我们参加与否，太空的探索将继续下去，正如美国是以能量和远见立国一样，它在工业革命、现代发明和核动力等方面总是破浪前进，从而取得了世界的领导地位。因此这一代美国人也要立志成为“世界上领先的星际航行国家”。肯尼迪在赖斯大学所作的一次演讲中警告说：

“……我们不会听凭空间由敌对国家的征服的旗帜所统治，而应由自由与和平的旗帜来统治……”

为了加强与苏联对发展中国家的争夺，肯尼迪提出对外援助与和平队计划。在他看来，贫困是共产主义的温床，凡是没有摆脱贫穷的国家都是苏联容易渗透的地方，美国要扩大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就必须给这些国家适当的经济援助。他对反对他的国会议员们说：“我们每年花 500 亿美元去制止共产主义的军事扩张……尔后又舍不得花……不到这笔款子的十分之一去帮助其他国家……消除共产主义一直赖以滋长蔓延的社会动乱……对我们来说，这样去对付共产主义的恐怖是毫无意义的。”

肯尼迪别出心裁地组织了和平队，起初有几百人，后来发展到几千人。由他的妹夫施莱弗任队长。但是这项计划遭到了多方面的反对。美国自由派贬低它，保守派称参加和平队的美国青年为“垮掉的一代”；中立国对它感到憎恶；苏联则谴责它为间谍的外围组织。

为了对抗苏联及共产主义的影响，肯尼迪还提出并推行“争取进步联盟”。所谓“争取进步联盟”就是加强对拉丁美洲的干预，稳定美国的后院。美国自 1822 年颁布“门罗主义”起就把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院，不允许其他国家染指。可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成功后，在美国的后院里长出了“共产主义的苗子”，这被美国视为异类。另外，拉美的情况也十分复杂，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对此感到十分不安。

1961 年 3 月 13 日，肯尼迪总统在白宫召集拉美国家大使开会，发表了关于“争取进步联盟”的讲话。讲话的要点是要把美国的理想推广到整个西半球，抵制“再一次想把旧世界的暴政强加于新世界人民的外来势力”。为此他提出了 10 点计划，核心是要求拉美国家在 10 年内大力改革，在此前提下，美国愿意大规模出人、出钱、出主意，进行援助。

“争取进步联盟”的调子迎合了拉美人民民主改革的要求，一时之间使美国在拉美的形象有所改善。肯尼迪在访问拉美时没有遇到 1959 年尼克松访问时那种抗议和扔臭鸡蛋的情景。但是这是暂时的。因为拉美的情况十分复杂，是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的。古巴反对把联盟作为美国推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多米尼加、英属圭亚那、阿根廷、秘鲁都先后发生了军事政变，而美国对这些政变是不满意的。美国对有些拉美国家进行干涉引起了普遍不满。

对话与交流肯尼迪和赫鲁晓夫均认识到，核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因而都有缓和双方关系的愿望。赫鲁晓夫在给肯尼迪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中，把世界比作“诺亚方舟”，说上面所有的人，不论自以为属于“洁的”还是“不洁的”，都希望它不要沉下去。肯尼迪复信表示赞成这一比喻。双方同意加强对话，还有互相摸一下底牌的意思。

### 三、维也纳调情中的唇枪舌剑

1961 年 2 月 11 日，肯尼迪就美苏关系在白宫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腊斯克、邦迪和四个担任过驻莫斯科大使的专家：凯南、哈里曼、波伦和现任大使汤普逊。他们中没有人主张两国首脑应举行一次正式的“最高级”会议，认为最高级会议往往引起过多的希望，会使公众产生失望或紧张情绪。但会议同时认为，与苏联领导人进行私人的、非正式的会谈和举行认真谈判的最高级会议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会谈有助于总统估量一下赫

鲁晓夫，直接了解赫鲁晓夫对禁止核试验和其他问题的观点，获得判断赫鲁晓夫言行的第一手资料。于是肯尼迪让美国驻苏大使带回了由他签署的致赫鲁晓夫的信件。信中建议于当年春天在维也纳或斯德哥尔摩会晤，赫鲁晓夫对此表示同意。但是此后美苏关于禁止核试验的谈判陷入僵局，更主要的是发生了猪湾事件，美苏首脑会晤遂搁置下来。

1961年5月12日，正当肯尼迪筹访欧洲之际，接到赫鲁晓夫对他2月22日信件的正式复信。复信建议在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晤，并同意讨论裁军、老挝和柏林问题。肯尼迪喜出望外，于是在访法之后，于6月3日抵维也纳与赫鲁晓夫进行了两天的会谈。这次会谈没有预定的议程，因而也没有具体的成果。

双方的会谈是在轻松的气氛中进行的。肯尼迪掌握着会谈的主动权，他明确地提出议题，把扯离正题的讨论拉归本题，并迫使赫鲁晓夫作出答复。赫鲁晓夫的发言通常比较长，肯尼迪的讲话则比较简短。只有在一日三餐时，两位领导人才有机会闲谈。第一天，肯尼迪举行晚宴。第二天，赫鲁晓夫举行晚宴。

在这两次晚宴之间的那天晚上，奥地利政府在维也纳富丽堂皇的香布劳恩宫里安排了豪华的晚宴和宴会后的芭蕾舞演出。在招呼入座的混乱中，肯尼迪差点坐到赫鲁晓夫夫人的膝上，而赫鲁晓夫则几乎不断他讲幽默的话，并答应送给肯尼迪夫人一条乘过宇宙飞船的狗所生的一只小狗，这使总统夫人觉得很有趣。

在这些宴会上，谈话是轻松的。当肯尼迪点燃一支雪茄后把火柴丢在赫鲁晓夫的椅子背后时，赫鲁晓夫问道：“你想放火烧我吗？”肯尼迪答道：“绝无此意。”赫鲁晓夫笑了：“啊，你是个资本家，不是个纵火犯。”肯尼迪指出，赫鲁晓夫1959年访美时会见的那些工业界和金融界的大资本家没有一个在1960年投民主党的票。赫鲁晓夫回答说：“他们都很机灵。”当赫鲁晓夫说他佩戴的是列宁和平金质奖章时，肯尼迪笑了一笑，反唇相讥道：“愿你一直戴下去。”

会谈开始时两位领导人回忆了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会议上的短暂结识。肯尼迪提到赫鲁晓夫曾议论当时还是参议员的肯尼迪的年轻外貌，并说自己现在老了不少。赫鲁晓夫则对于自己是否讲过这话表示怀疑，因为他知道年轻人总想显得老成些，而老年人总爱显得年轻些。赫鲁晓夫还说，自己在年轻时，长得很年轻。常常由于别人弄错了自己的年龄而恼火，然而他22岁时头发就开始花白了，这样问题也就解决了。

会谈主要涉及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问题、老挝问题、禁止核试验问题和柏林问题，并因此发生了尖锐的舌战。

关于两种制度的和平共处。这个问题的会谈占去的时间最多，从会谈一开始双方就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尖锐交锋。对于在核时代美苏必须和平共处，尽一切努力避免核战争这一前提，双方是一致的。双方的主要分歧是对待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战争的态度。

赫鲁晓夫：杜勒斯想消灭共产主义。

肯尼迪：真正的问题是苏联企图把共产主义强加于人。

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并不是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人，只是相信共产主义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会取得胜利，这正如封建主义让位于资本主义一

样。

肯尼迪：历史的必然性并非表现为由少数人违反人民的意志去夺取政权，即使这被称为“解放战争”。意识形态的竞赛不应影响两国重大的安全利益，今天如果爆发一场新世界大战，美苏两国都将蒙受重大损失。历史上的许多战争是因为估计错误而引起的。

赫鲁晓夫：总统用不着反复使用“估计错误”这个词。总统的意思是说共产主义只应在共产党国家存在，而在其他地方发展就将被美国视为是苏联的敌对行为？美国总希望苏联像小学生那样双手放在课桌上坐好，但思想是没有免疫可言的。德国人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他们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苏联是反对通过战争或武力把思想强加于人的，但也反对干涉思想的自由传播。

肯尼迪：毛泽东可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赫鲁晓夫：不，毛泽东不会说那样的话。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是一贯反对战争的。但是苏联不能对每一次自发的暴动或共产主义倾向负责。古巴转而反对美国，是因为资本家集团支持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美国搞猪湾登陆只会使古巴更为担心，生怕美国把另一个巴蒂斯塔强加给古巴。卡斯特罗并不是共产主义者，但是美国的政策正在使他变成一个共产主义者。

肯尼迪：单是古巴并未被美国视为威胁，但卡斯特罗公开宣称他打算在西半球搞颠覆活动，这就很危险了。如果卡斯特罗是通过自由选举，而没有外来干涉的话，美国可能已经承认他了。如果波兰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一个亲西方的政府，苏联将作出何种反应呢？

赫鲁晓夫：总统这样谈论波兰对波兰是不够尊重的，波兰的选举制度是民主的。相反，美国支持反动的、不民主的政权——国民党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并镇压殖民地，这是怎么回事呢？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美国送给蒋的武器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来源，说明蒋是不得人心的。美国在建国过程中和建国后一段时间那么富于革命性，以至沙皇俄国拒绝承认它达 26 年之久。现在美国却拒绝承认新中国，这说明事情起了多么大的变化。美国吃了自负的苦。美国是很富强的，以致认为自己有特权，并可以不承认别人的权利。

肯尼迪：从台湾撤退美国军队和停止给予台湾援助将损害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地位。

赫鲁晓夫：这就证明中国应该为了台湾只得一战了。美国对和平共处的诚意是值得怀疑的。如果苏联要处在中国这样的地位的话，早就为台湾而战了。苏联在十月革命后就曾击退那些对它的领土进行同样干涉的更为强大的国家。正如殖民地的解放战争一样，为国家领土完整而战不是侵略战争，而是神圣的战争。

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关于和平共处的分歧表明：当时美国强调维持现存的“力量均势”，而苏联则强调和平共处并不妨碍思想传播的自由。那时两种制度的竞争是东攻西守，美国处于困守局面，力图维持现状。

关于老挝问题。肯尼迪提出，老挝爱国阵线得到北越的支持，应当让一个独立、中立的老挝自己解决问题，并对停火进行核查。赫鲁晓夫同意各自对老挝在自己影响下的一方施加影响，促其与国际监督委员会合作，实施停火。

关于核禁试问题。当时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赫鲁晓夫说，一年中进行超过三次以上的现场检查，就会被用来进行间谍活动，这是五角大楼一直向往的，当年艾森豪威尔总统提出开放天空计划就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赫鲁晓夫坚持把核禁试作为全面裁军的一部分来谈，并坚持联合国“三驾马车”方案。

关于柏林问题。这是会谈中最为严峻的问题。赫鲁晓夫能言善辩，肯尼迪也毫不退让。赫鲁晓夫重申如果西方不同意缔结对德和约，苏联将单独与东德缔结条约，这样就将解除现有的义务、占领权、通行权等等，西柏林将成为自由市，苏联及西方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在西柏林驻军。肯尼迪则说，西柏林不是老挝，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美国将寸步不让。他指责赫鲁晓夫的建议将在一夜之间使世界陷入大战深渊。赫鲁晓夫则频频以单独缔约相威胁，表示如果美国要为柏林而战，苏联也只好奉陪，并说最后期限是当年年底。后来肯尼迪回忆说，如果赫鲁晓夫在维也纳说的话都算数的话，世界早就爆发了一场核战争了。

维也纳会晤对双方来说都谈不上失败或胜利。这次会谈中每一方都想探索出对方的弱点，但谁都没有发现对方的破绽。赫鲁晓夫不为肯尼迪的言词所动，肯尼迪也并没有被赫鲁晓夫的强硬言论所吓倒。每一方都坚持自己的国家利益。不过这样的会谈仍然是有益处的。双方都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对方的立场和观点。双方都表示了和平共处的意愿。赫鲁晓夫对一名记者说：“我们分手时，各人坚持着各人的看法。”肯尼迪事后对维也纳会谈的评价是，“既没有计划也没有作出任何重大决定；没有收获，也没有假装获得任何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至少对话的渠道已经打开”，两位对美苏两国乃至世界和平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领导人都同意保持联系，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

的确在此以后，美苏通过各种渠道保持着联系。从1961年9月起在赫鲁晓夫发起下，两位领导人开始了一系列私人通信。通信是以一种十分神秘的方式进行的，由苏联的《苏联》杂志驻美国代表鲍尔沙可夫与肯尼迪的新闻秘书赛林杰之间秘密递交。这种通信即使在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也不曾中断。

#### 四、柏林又成为一个严峻的“考验胆量和意志的场所”

肯尼迪在当参议员时，对外交政策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亚洲和东欧，对柏林问题知之不多。为了对未来的斗争作好准备，他入主白宫不久，便请前国务卿艾奇逊准备一份有关柏林的特别报告。1961年4月，艾奇逊提出的一份中期报告警告说，危机很可能在当年发生，而盟国之间意见不一，中立国又帮不上忙，西方尚未作好有效对抗苏联切断地面通道的任何准备。报告提出，美国在西柏林要实现三个基本目标：西柏林人民有选择自己制度的自由。

只要西柏林人民有要求和希望，西方军队就应留驻下来。从西方经由东德的公路、空中航道和运河通往该市的通道应不受阻碍。艾奇逊所说的可能发生的危机，显然是指赫鲁晓夫一再宣称的，要限期结束目前这种不正常情况，单独与东德缔结和约。苏联的目的是在德国问题上承认德国分裂的现状，而西方反对东西德现状合法化、固定化。1961年6月维也纳会谈结束后，赫鲁晓夫向肯尼迪递交了一份官方备忘录。备忘录没有重申苏联所提出的年底期限问题，但指出两个德国可以讨论分歧的时间为六个月。

肯尼迪回国后即忙于为坚持西方在西柏林的权利而斗争。他的决定是，美国为此要不惜一切代价。同时他认为，为西柏林而采取坚定的立场，归根结底会减少发生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而在西柏林问题上屈服只会削弱未来美国防务的可靠性。7月间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起一篇这样的报道：苏联大使在离开华盛顿去就任新的职务时曾嘲笑说：“到危急关头，美国不会为柏林而战斗的。”肯尼迪只是干干巴巴地回答：“我们打算履行我们的义务。”

肯尼迪的第二个重要决定是对这次行动负起了全部责任。有几个月的时间，他一直埋头研究这个问题。他研究和修订应急的军事计划、常规力量的集结、外交和宣传活动的开展、预算的变动及经济战计划。他仔细考虑了每一个行动可能对柏林的士气、盟国的团结、苏联的不妥协及他自己的立法和对外援助计划的影响。他同盟国领导人、葛罗米柯和德国人谈话，随时关心所有的电报。

赫鲁晓夫显然认为西方不会为了西柏林的地面交通问题进行一场大战。因为西柏林完全被华沙条约部队包围着，华约部队能够轻而易举地把西柏林困死。美国过去搞“大规模报复”战略，其在西欧的常规力量不足，西方要采取行动的话，要么是打一场核战争，要么根本就不采取行动。赫鲁晓夫最担心的莫过于核战争。

肯尼迪从维也纳回国后，立即专心研究了北约和美国联合参谋部所制订的柏林军事应急计划。按照这些计划，如果发生封锁通道的情况，西方在调整公路上将进行一系列军事“试验”。可是由于西方没有在地面进行一场常规战争的打算和能力，这些小规模试探不足以表明认真的意图，而且必然受到苏联方面的遏制。这些计划还提出使用核武器，对此，肯尼迪批评说：“我们从小规模的军事行动立即进入相互使用核武器的行动，这当然意味着……我们也在毁灭本国。”这样，每一方都没有时间犹豫一下，进行商谈，重新考虑或者判断对方意图。

为了弥补这些缺陷，肯尼迪下令迅速在中欧集结武装部队，使集结起来的部队强大到足以使苏联方面相信，美国确实准备为柏林而战。只有这样，才能劝说赫鲁晓夫不要封锁柏林。同时肯尼迪准备发表措词强硬的讲话。

美国政府内部对肯尼迪提出的这些措施没有什么疑义。但围绕下列两个问题有不同的主张：一是总统是否应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二是在军事集结的同时是否需要立即建议进行谈判。

主张宣布紧急状态的有前国务卿艾奇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姆尼茨等人。他们的理由是，必须使赫鲁晓夫相信，美国并不止于常规战争，必要时是会冒核战争危险的。肯尼迪本人认为，在“猪湾事件”后美国需要重新赢得盟国信任，他害怕采取过分的行动将使他给西方盟国留下轻率好战的印象；全国紧急状态不是可以轻易宣布的，一旦宣布就将承担严重的义务；另外，为此需要的人力、物力、预算、税收的增加等，将影响美国的全球长期计划。另外，驻苏使馆及苏联问题专家也都认为，在加强军事部署的同时，与苏联悄悄解决，不引起盟国和世界的惊慌，才是比较妥当的。最后决定，不宣布紧急状态，不立即动员后备军，而是由国会授权总统随时可以动用后备军，增加军事预算32亿美元。与此同时，采取和平攻势，表示愿意谈判。

在美国方面就柏林问题进行多方面研究和准备时，苏联方面展开了行动。1961年7月2日，赫鲁晓夫告诉英国大使，只要6枚氢弹就可炸平英国，

9枚氢弹就可摧毁法国。随后他在另一次讲话中宣布，苏联将停止执行裁军计划，使国防支出增加三分之一。东德总理乌布利希也声明说，在东德与苏联签署和约以后，东德将关闭西柏林与西德之间的通道。这样曾经一度沉寂的柏林危机再度尖锐化。

肯尼迪很快对此作出强烈反应。他在7月25日发表电视演说，其态度十分强硬：

“西柏林已成为考验西方勇气和意志的伟大场所，已成为一个焦点，在那里我们所承担的庄严的义务……目前正同苏联的野心处于根本对立的状态。”我们不能，也决不会允许共产党人逐步地或者用武力把我们赶出柏林。因为履行我们对这个城市所作的保证，对西德的士气和安全，对西欧的团结以及对整个自由世界的信心来说，都是必要的。……这个城市的安全程度……同我们的一样，因为我们不能把它的安全同我们的安全分开。……我们将随时准备谈判，如果谈判会有帮助的话。但是我们还必须准备用武力进行抵抗，如果有人对我们使用武力的话。只作一手准备是会失败的。有两手准备就能有助于自由与和平的事业。……

“总起来说，我们谋求和平，可是我们不会投降。这就是这场危机的中心含义，也是你们政府政策的意图。在你们和其他自由的人们的帮助下，这场危机是能够克服的。自由能取胜，和平能长久。”

这篇讲话既是针对苏联，也是讲给美国的盟国听的。在柏林问题上，英国反对不经谈判就诉诸军事手段。法国正好相反，戴高乐认为谈判一开始，就会立即被看作是西方准备放弃西柏林的开始。

赫鲁晓夫在8月7日的电视讲话中对肯尼迪讲话作出答复，调子几乎一样强硬，表示坚持立场，如果发生核战争，由美国负责。8月13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突然行动，先是以华约缔约国政府的名义发表声明，建议东德在西柏林国界“可靠地堵塞对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破坏活动的道路”，“在西柏林全境四周……实行可靠的防卫和有效的监视”。当天午夜，东德派军队和警察占据了东西柏林分界线东柏林一侧的绝大部分过境点，拆毁了街道，设置了路障和铁丝网。到8月17日，一道混凝土墙建筑完毕。这样东西柏林的分界线就给封住了，只留下9个由军队把守的出入口。这一地区形势顿时紧张起来，西方一片抗议和谴责声。欧洲国家人民对此特别敏感，波兰和德国的人民纷纷囤积面包和盐。

美国政府内部就柏林墙之事进行讨论后一致认为，东德早就有关闭通道的力量，建造柏林墙是非法的、不道德的和近人情的，它结束了西柏林对东方作为橱窗和逃生之路的作用，可这并不妨碍西方长期强调的三个基本目标。因此柏林墙的出现并不是东西方进行战争的理由。肯尼迪最后决定作出某种反应，这种反应不是去威胁共产党人，要他们公开承认失败，而是使感到震惊的西柏林人恢复士气。美国除提出抗议外，还派副总统约翰逊专程访问西柏林，向西柏林居民发表讲话，并重申美国承担的义务。陪同约翰逊访问的克莱将军在1948年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曾负责过大规模空运，是西柏林人心目中的英雄。不久，克莱作为肯尼迪的私人代表重返西柏林，在那里呆了较长时间。

苏联为了显示实力，则于8月30日开始恢复了一系列核试验，包括在北极地区进行的千万吨级的核试验。10月上旬华约举行了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演习。肯尼迪针锋相对，增加驻欧部队和作战飞机的数量，并在意大利、土耳其



其新部署了 30 枚“雷神”式中程导弹。英法也增派了小规模支援部队到西德。北约在西德境内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一时间，欧洲和全世界都布满了战争阴云。苏联方面任命刚调离华约司令职位不久的科涅夫为驻柏林部队的司令，实际上科涅夫大部分时间都呆在莫斯科。科涅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有情报说西方国家部队准备用压路机来摧毁柏林墙。随之而来的是坦克和装甲车。行动时间定在苏共二十二大开幕的日子。赫鲁晓夫令苏联步兵部队集结在边界检查哨附近的支路上，并让坦克部队也埋伏在附近。10 月 27 日，美国的压路机、坦克、装甲车向边界检查站方向开来。当美国人开过来时，苏联部队平静地等待，甚至当美国的压路机开向边界时苏军仍不动声色。然后，苏联坦克突然从支路上开出来，迎着美国坦克开去，离美国坦克几十米时才停下来，双方的坦克炮对瞄着。10 月下旬天气非常冷，双方的坦克乘员通宵坐在冰冷的金属匣子里。28 日晨，科涅夫向赫鲁晓夫报告说，苏军和美军坦克手都轮流从坦克里钻出来取暖，但双方坦克炮筒仍隔一条边界互相对瞄着。赫鲁晓夫让科涅夫把苏军坦克从边界撤

回支路上去，并保证说，只要苏军坦克一撤回，美国人很快就会撤的。果然苏军坦克撤回约 20 分钟，美军坦克也撤退了。据苏军将领私下透露，如果在柏林墙修成后发生“任何不幸的事”，赫鲁晓夫是很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这表明当时的军事危机已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

双方谁也不想真正为柏林问题打一场核大战，因而双方在制造战争气氛、调兵遣将的同时，又都在寻找退路。双方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接触，会谈在纽约、莫斯科、日内瓦和华盛顿等地进行。在同年 10 月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不坚持一定要在 1961 年 12 月 31 日前缔结对德和约的要求。这意味着收回了规定美英法限期撤出西柏林的最后通牒。1962 年 1 月，肯尼迪在接见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时说，德国问题的解决可以再拖上 15 年。赫鲁晓夫不仅对此表示赞同，还进一步声称，西柏林问题的解决也没有最后期限。这样赫鲁晓夫一再鼓吹的割掉西柏林这个“毒瘤”的问题便不了了之。

数次柏林危机，前后持续了十多年，时而严峻，时而缓和，每次都濒临战争边缘却又转向了和平，令人惊心动魄后又如释重负。柏林问题成为美苏关系的反映。东西方，主要是美苏在意识形态上的不同和地缘利益上的争夺是柏林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柏林问题终于没有成为美苏之间的战争导火线则主要是因为双方都害怕战争，特别是核战争。

### 五、最危险、最惊心动魄的一次玩火是古巴导弹危机

1959 年 1 月，古巴在卡斯特罗领导下，推翻了美国的傀儡巴蒂斯塔的独裁统治，建立了古巴共和国。古巴新政府奉行激进民族主义政策，抵制美国的政治经济渗透，美国迫古巴就范不成，便于 1961 年 4 月 17 日，使用雇佣军发动猪湾事件，对古巴入侵，但被古巴军队在 72 小时内全部歼灭。

猪湾事件是美国的一大耻辱，是年轻的肯尼迪总统执政之初干下的一件蠢事。此后，美国虽然停止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活动，但却加强了对古巴的经济制裁，并迫使拉美国家和美国的西欧盟国均加入这一制裁行动。美古贸易从 1958 年的 10 亿美元下降至 1962 年上半年的 37 万美元，加拿大与古巴的贸易从 2700 万美元降至 200 万美元，拉美与古巴的贸易从 8200 万美元降至 2000 万美元。美国经济制裁使新生的古巴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古巴在国际上举目无亲，卡斯特罗不由自主地转向苏联。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起初对卡斯特罗政权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赫鲁晓夫说：“当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并率领他的部队进入哈瓦那时，我们对于他的政权将要奉行什么政治路线是没有概念的。我们知道有一些共产党人参加了卡斯特罗领导的运动，但是古巴共产党和他没有任何联系。”卡斯特罗起初是一个民族民主主义者，他的领导集团内部有许多重要成员不赞成走社会主义道路。正是美国对古巴的帝国主义政策使古巴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

从1960年起，苏联开始大量援助古巴。苏联向古巴提供了坦克、火炮、飞机等军事装备，并派遣了军事教官。猪湾事件发生后，苏联增加了对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这时赫鲁晓夫已把古巴看作苏联安在美国鼻子底下的一个钉子。在他看来，如果古巴被美国搞垮，就会对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和苏联在加勒比地区的威信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当时，无论赫鲁晓夫还是卡斯特罗都深信美国在猪湾事件失败后不会罢休，肯定还会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侵略。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美国这个世界霸主岂肯让古巴在自己的后院里独树一帜。当时美国的右翼势力正通过各种途径向肯尼迪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搞掉古巴。肯尼迪在这个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

用什么手段防止美国搞掉古巴呢？苏联的一贯方针是不卷入直接与美国的冲突，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威慑，使美国不敢动手。于是苏联想到了部署导弹。赫鲁晓夫自称，在古巴部署带核弹头的导弹的想法是他1962年访问保加利亚期间形成的。当时他被这一诱人的想法折磨得睡不着觉。一回到苏联他就与他的同事们商量开了。他的打算是在古巴秘密部署导弹，待美国发现时一切已经准备就绪，美国就不敢将其炸毁，因为总不可能一次全摧毁，而剩下的那一点就足以把纽约打得稀烂。他认为这是约束美国不敢发动对古巴军事行动的最好方法。另外，赫鲁晓夫认为，美国在苏联周围——土耳其、意大利及西德——都部署了可以打到苏联的导弹，苏联不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它也尝尝滋味。总之，在苏联方面看来，部署导弹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而且恰恰是为了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此外，当时苏美在柏林问题上的斗争虽然沉寂下来，但并没有完全结束。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也是为了与西方国家在德国及柏林问题的斗争上增加筹码，迫使西方在柏林问题上作出让步。

1962年7月，卡斯特罗访苏，达成秘密协议，在古巴部署中“程导弹、发射装置和伊尔—28型轰炸机。伊尔—28型轰炸机是苏联的第一代喷气式轰炸机，曾一度被誉为空中之神。不过到60年代这种飞机已经过时了，因为速度太慢，易被击落，难以飞越敌国领土，但很适宜防卫海岸。8月初，苏联导弹开始运向古巴，一切装卸、装置都是苏联人员亲自动手，不让古巴人插手，以防泄密。到10月中旬美国发现并提出抗议时，大部分导弹已按计划部署完毕，还有小部分尚在运输途中。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善的情报收集机构和最先进的侦察技术手段。这些技术手段包括地面间谍系统、海上电子侦察船、高空侦察飞机等。

苏联人员和大量船只进入古巴，很快引起美国方面的注意和怀疑。逃到美国古巴难民则不断向美国方面报道说，苏联把导弹运进了古巴。因此从苏联人员和装备进入古巴起，这一问题就成为白宫一系列会议和汇报的主题。肯尼迪下令加强对古巴和苏联船只的战略侦察。不过，肯尼迪认为苏联

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上向来十分谨慎，不愿意与美国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他不认为苏联会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弹道导弹，而倾向于认为苏联在古巴的行动是为了转移美国对柏林问题的关注。

1962年夏末，正在加勒比海巡逻的美国海军的电子侦察船“玛拉”号，从古巴岛附近意外地侦收到一种不寻常的辐射信号，这些被自动记录在磁带上的辐射信号立即送到华盛顿进行分析和评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电子战专家在数据处理中心经过技术处理后，惊讶地发现这种辐射信号竟是苏联带核弹头的弹道导弹的制导雷达的辐射信号。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收到了来自英国情报总部的情报。苏联国家特种研究委员会外事处副处长、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高级军官奥列格·潘可夫斯基上校向英方出卖情报说：“我们已经开始向古巴部署导弹了……”英方立即将情况通知了美国。

为了进一步验证这一可怕情报的可靠性，中央情报局派出U—2间谍飞机在古巴上空侦察飞行。8月29日，U—2飞机侦察拍摄的照片表明，苏联在古巴圣克鲁斯附近建立了一个地对空（萨姆型）导弹发射场和苏式中程轰炸机机场，而且正在架设远程导弹发射台。当8月31日美国照片译释人把照片送给肯尼迪时，肯尼迪认真地问道：“你能肯定这是进攻性弹道导弹吗？”这位译释人只得说：“目前还不能肯定。”

的确，U—2飞机8月29日拍摄到的照片没有提供有进攻性弹道导弹的证据，当时苏联的这种导弹尚未运进古巴。9月13日，肯尼迪只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警告苏联说：

“如果任何时候共产党在古巴的军事集结以任何方式危及或妨碍我们的安全……或者如果古巴有一天……成为具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苏联进攻性军事基地，那么，美国将采取不论何种非采取不可的措施来保卫它的盟国和它自身的安全。”

10月9日，肯尼迪总统批准了U—2飞机对古巴岛西端进行一次侦察。之所以选择西端，是因为想看看8月29日发现的这个萨姆导弹基地是否已可用于作战。由于天气不好，这次侦察推迟到10月14日才得以进行。这天晴空万里，U—2飞机从南向北飞过了古巴西部高空。当天晚上对拍摄到的胶片进行了审查、分析，同早些时候拍的照片进行了比较。第二天由美国政府情报网中特别高明的照片译释员再次进行了分析，在古巴的圣克鲁斯地区发现了第一个苏联进攻性中程弹道导弹基地的形迹。据判断，苏联在这里正在部署6个中近程导弹营和4个中远程导弹营，并在那里集结伊尔—28型轰炸机（1990年拉美社披露，古巴政府的档案馆里收藏的绝密文件记载，为了保护总计42枚中程导弹，苏联方面出动了4个机械化步兵团，1个海岸防卫队，另外还有2个直升机分队和1支空军部队。同时还部署了24枚萨姆防空导弹）。

10月16日上午9时，中央情报局局长邦迪赶到肯尼迪的卧室把这份重要情报交给了他。肯尼迪虽然对赫鲁晓夫的欺骗行为非常愤怒，并立刻意识到此事关系重大，但他还是认真听取了汇报，只是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色。此前他一直对苏联正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弹道导弹的说法持怀疑态度。

在美国方面加紧对古巴的侦察活动之时，苏联方面则利用各种场合说，苏联对古巴运送的都是防御性武器。9月12日，塔斯社发表公报说：

苏联政府授权塔斯社声明：苏联不需要为了击退侵略，为了进行报复性打击而把它的武器转到任何别的国家例如古巴去。我们的核武器具有很大的

爆炸力，苏联又拥有如此强有力的火箭来运载核弹头，因此不需要在苏联境外寻求基地。

肯尼迪得知苏联在古巴正在部署进攻性弹道导弹后，立即决定召开高级会议，研究对策。他亲自指定了一个专门小组，包括正副国务卿、正副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长、总检察长、财政部长、白宫安全事务委员会助理、新闻总署署长以及其他有关在职与退休的高级官员。以后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就组成了一个常设机构，称作白宫安全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并延续至今。这个小组在一星期内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日夜紧张地开会，商讨对策。肯尼迪每晚都听取小组的汇报。

肯尼迪在这些会议上指示说：第一、要拍摄更多的照片，一定要确定苏联在古巴还有什么活动。第二、参加小组的所有高级官员暂时都要放下所有其他工作，迅速而仔细地通盘考虑面临的危险和排除危险的对策。第三、要求所有与会人员在美国政府作出反应以前严守秘密，并强调说，任何过早的泄密都可能使苏联加速完成导弹部署和发射准备，或者在美国公众中引起不必要的惊慌。

小组首先对苏联此举的动机进行了分析和推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第一种分析：冷战策略。赫鲁晓夫可能认为美国人太胆小，不敢冒核战争的风险；一旦美国面对着已经部署好的导弹除了抗议之外不会采取别的行动，使美国在全世界面前显得软弱无力，使美国在其盟国中信誉扫地，增强苏联在拉美的影响；以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扼住美国的咽喉，迫使美国在西柏林问题上及美苏争执的其他问题上作出让步。

第二种分析：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圈套。如果美国作出反应，进攻小小的古巴，那么美国与其盟国的裂痕就会增大，联合国会感到震惊，拉美国家的反美情绪会进一步强烈。这时赫鲁晓夫就可趁机迅速进入柏林。

第三种分析：为了保卫古巴。赫鲁晓夫可能认为苏联在拉美有古巴这个据点太重要了，以致于要不惜任何代价防止美国搞垮古巴。运来导弹是为了对付美国的进攻和给卡斯特罗打气。

第四种分析：讨价还价的交易。赫鲁晓夫很了解古巴问题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所起的异常敏感的作用，他企图利用这些导弹基地在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或者在联合国中作为同肯尼迪交锋时讨价还价的有力筹码，逼肯尼迪在柏林问题上让步，或者迫使美国撤掉部署在苏联周围的弹道导弹基地。

第五种分析：减少导弹差距。赫鲁晓夫可能认识到苏联已不再拥有弹道导弹优势了，相反美国在从潜艇上发射导弹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苏联要发展战略导弹核潜艇花钱太多。如果在古巴设置基地，那么就能迅速地增加以美国为目标的导弹总数，这些导弹能越过美国的战略预警系统。这样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就能有力地弥补苏联与美国导弹的差距。

参加小组的人们还推测，苏联方面可能待导弹部署好后，在 11 月份公开宣布，接着要求召开一次关于柏林和其他问题的最高级会议。

肯尼迪认为苏联方面的动机最有可能是第一种，但不管是哪种，如果苏联的企图得逞，那么就会改变冷战双方的力量均势。因此他指示必须寻找良策挫败苏联的行动。

接下来参加小组的谋士们开始寻找良策。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方案。当时提出的方案主要有六个：

第一是不采取任何行动。有人建议说，美国已经长期生活在苏联导弹的威胁下了。如果美国把苏联这次在古巴部署导弹看得若无其事，就可以防止赫鲁晓夫夸大古巴导弹的重要性。所以没有必要对这件事那么重视。肯尼迪一开始就否定了这个方案。他主要关心的不是这些导弹的军事含意，而是这些导弹对全球政治均势的影响。部署在苏联领土上的导弹，与设在古巴的导弹大不一样，在古巴的导弹对拉丁美洲会产生巨大的政治和心理影响。如果美国对苏联的这次行动不作出有效反应，苏联就会得寸进尺。肯尼迪虽然希望把外交行动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但他反对把这事交给联合国。因为他认为当联合国对这件事进行马拉松式的辩论时，苏联就可能完成了导弹部署和发射准备。

第二种是对苏联施加外交压力并提出警告。可能采取的方式包括：呼吁联合国或美洲国家组织建立视察小组，或者在一次最高级会议上直接同赫鲁晓夫谈判。有人还提出可以拆除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来换取苏联拆除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由于采取其他方案会招致许多风险和障碍，参加会议的人们没有信心时便转回到这种方案上来。

第三种是同卡斯特罗秘密接触，利用这种方法使他与苏联人分开，并警告他说，如果不接受，美国就要毁灭古巴，而且苏联人也正在出卖他。这实际上是运用软硬两手离间古巴与苏联的关系。但是讨论的结果是，这次导弹事件实质上是美苏两个大国之间的一次严重对抗。部署在古巴的导弹由苏联人操纵和守卫，只有苏联对美国采取的对策作出反应才能撤走这些导弹。且不说能否离间古巴与苏联的关系还是个大问号，即使能够离间卡斯特罗与苏联的关系也于事无补。

第四种是实行封锁。其中包括增加空中监视和警告。

第五种是实行空中袭击。目标是摧毁导弹及其附属军事设施，可以事先发出警告，也可以不事先发出警告。

第六种是发动一次入侵，有的强硬人物甚至叫嚷：“开进去，把古巴从卡斯特罗手里夺过来！”对这一方案持肯定态度的人非常少。大家认为入侵是不得已而为之。那是最后一步，而不应是第一步；美军应为此作好准备，但目前必须采取克制态度；入侵很可能引发一场世界大战，或者招来苏联在柏林或其他地方采取报复行动。

此外，还考虑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派遣特使去会见赫鲁晓夫或要求国会对古巴宣战。不过当时主要讨论和比较的是上述六种方案。经过筛选，最后集中在空中袭击和封锁两种方案上。

美国飞机用常规炸弹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就能够突然而迅速地把导弹综合发射场消灭掉，这种外科手术式的袭击方案是很有吸引力的。起初包括肯尼迪在内的许多人都被这种方案迷住了。这种方案可以干净利索地解决问题，并给赫鲁晓夫一个下马威。与此同时，可以向美国公众说明情况，实行封锁或加强空中监视是为了防止今后出现新的设施。当时已经为肯尼迪总统撰写好了声明，要求国会召开紧急会议，同时在采取空袭行动的同时通知赫鲁晓夫，并建议召开一次美苏首脑会议。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与会者感到实施空袭方案有下列困难：

一是这种袭击既不可能通过几次出击在几分钟内完成任务，也不可能把袭击目标仅仅局限于发射场。参谋长联席会议坚持说，如果照方案设想的那样限制空袭，那是冒军方所不能接受的风险，打掉导弹基地不是小规模空袭

能够解决问题的，必须实施大规模轰炸。即使如此，也难以保证能彻底摧毁导弹基地和全部导弹。那样残存的苏联导弹可能会向美国本土发射核弹头。如果空袭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话，美国最后势必要进行军事入侵。

二是预先警告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司法部长说，不发警告而在星期日凌晨进行突然袭击，是“珍珠港事件的重演”，会作为大国进攻小国而载入史册。而要事先发出警告，苏联方面就可能先把导弹藏起来；赫鲁晓夫可能会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他会以牙还牙。

三是空袭肯定会杀死古巴人和苏联人。这就极有可能迫使赫鲁晓夫作出反应。如果他不作出反应，那对他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不仅影响他在苏联国内的地位和苏联同中国的关系，而且影响苏联与发展中国家的共产党的关系。美国方面担心，赫鲁晓夫在古巴导弹遭到空袭后，可能会下令向美国发射核弹头；在古巴的苏联战地指挥官也可能不等上面授权就命令用剩下的导弹向美国发射核弹头。

由于实施空袭方案有上述困难，这个方案逐渐被放弃了。最后把注意力转移到封锁方案上来。开始时支持这个方案的人很少。因为实施封锁所花时间太长，其他国家也会对美国封锁公海的通航自由表示异议。封锁是和柏林地面交通封锁联系密切的词，苏联可能马上对柏林进行封锁作为回敬。那时美国的盟国会谴责美国，并要求同时解除两个封锁，这样美国将一事无成。此外，如果苏联船只对美国的封锁不加理睬，那么美军可能被迫首先开火，这样苏联就可能在其他地方采取报复行动。

尽管封锁方案也不是万全之策，但与会者认为，这一方案与空袭相比，则是一个更为有限、更为低调的军事行动。它可以给赫鲁晓夫一种选择，只要他的船只避开，就能避免一切直接的军事冲突，至少它可以在不打一枪或不杀一人的情况下实行。这就不大容易招致苏联方面的军事报复。如果在加勒比海域发生军事对抗，美国占有天时、地利和海空军优势，而苏联不仅失去天时、地利，且其海军缺少远洋作战能力，难以与美军抗衡。赫鲁晓夫如果认清双方在加勒比海域的力量对比悬殊的话，就有可能让苏联船只避开，这就使美国的盟国对美国增强了信心，并使古巴人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主张封锁方案的人还争辩说，正因为封锁是有限的、低强度的军事行动，才更利于美军随着形势发展逐步升级。

确定实行封锁方案后，小组的人们就开始拟定行动细节。会议决定从最低一级行动着手，只对进攻性武器实行封锁，把防御性武器、粮食和其他供应品排除在外。对石油、原油等战略物资则留待下一步，视情况而定。对于万一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或者苏联在柏林采取全面封锁交通的报复措施，小组建议以原来准备好的应急计划加以处理。会议决定要把美洲国家动员起来，在得到三分之二美洲国家的赞成和授权的情况下实施。会议还考虑了美方给予苏联撤退进攻性导弹的交换条件：拆除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陈旧的“丘比特”导弹和放弃美国在古巴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这两个交换条件中前者可能引起西欧盟国的反对，后者则可能引起美国公众的反对，所以表面上美国不仅没有撤退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美军的迹象，反而增加了那里的力量。

在美国政府高层紧锣密鼓的对策选择的一个星期里，美国方面一切照旧，仿佛没有发生任何重大事情一样。肯尼迪照常进行竞选，照常出入各种公开场合，照常接见外宾。10月18日，他与出席联大后即将回国的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会谈了两个小时。葛罗米柯坐在总统摇椅旁边的沙发上，双方谈

论的主题是柏林问题。他们谈到了古巴问题，葛罗米柯责难美国对古巴进行干涉，肯尼迪没有回答，于是葛罗米柯看着发言稿读道：

“至于苏联对古巴的援助，我奉命表明，正如苏联政府已经做过的那样，这种援助的唯一目的是加强古巴的防御能力和发展其和平的经济……由苏联专家训练古巴人掌握自卫武器，这决不是进攻性行为。如果不是基于上述的目的，苏联政府就绝对不会提供这种援助的。”

肯尼迪仍然毫无表情，对葛罗米柯的表白既不表示赞成，也不表示反对。他没有露出紧张或忿怒之情。但为了避免对方误解，他重申了9月13日发表的针对古巴的进攻性导弹所提的警告，大声宣读了一遍。葛罗米柯没有作出任何反应，显然他没有领会其特殊意义。

在此以前，即10月16日，赫鲁晓夫在接见美国新任驻苏大使柯勒时，振振有词地为谣传的苏联在古巴把新的一个捕鱼港变成成为潜艇基地一事而叫屈，他说，他本想不公布设置这个港口，为的是他不希望在竞选期间加重肯尼迪的负担。并重申苏联在古巴的一切活动都是自卫性的。从苏联的立场来说，这也没有错。只是美国已经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并拟定好了对策，而苏联方面还蒙在鼓里，因此棋输一着。

在作好了周密的政治、军事部署后，10月22日下午7时，肯尼迪发表了经过精心准备的电视讲话：

“ 晚安，同胞们：

本政府像以前保证的那样，对苏联在古巴岛上的军事集结一直保持着最严密的监视。在过去一周里，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了这一事实，即一系列进攻性的导弹发射场目前正在这个不被监视的岛上兴建起来。设置这种基地的目的不可能是别的，正是提供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的能力……

由于引入这些能够突然进行大规模毁灭的大型的、远射程的和显然是进攻性的武器，古巴就急剧地变成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基地，这构成对整个南北美洲的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

多年来，苏联和美国双方都极其小心地部署战略核武器，从未打乱确保在没有重大挑战下决不使用这些武器的不稳现状。我们自己的战略导弹从未利用秘密和欺骗的手段运往任何其他国家的境内。……美国公民已经适应于在苏联境内或潜艇上所设置的苏联导弹瞄准下过日常的生活……

但是共产党人在一个众所周知同美国和本半球国家有特殊历史关系的地区，违反苏联人保证，无视美国和本半球的政策，秘密、迅速和一反常态地设置导弹的这种做法——突然地、秘密地决定，把战略武器第一次设置在苏联领土以外——是对现状作出蓄意挑衅的和毫无理由的改变。如果我们要朋友或敌人继续相信我们的勇气和我们承担的义务，这种改变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

20世纪的30年代使我们吸取了一个明确的教训：如果允许侵略行为不受遏制和不遭受反对地继续下去，最终必将导致战争。美国是反对战争的。我们也信守我们所讲的话。因此，我们的不可动摇的目标必然是，使这些导弹不致被用来攻击美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并使它们从本半球撤走或者消除掉……

我们不会过早地冒全球核战争的风险。在核战争中，甚至胜利的果实也是到嘴的灰烬，然而到了必须面对这种风险的时候，我们也决不畏缩。”

肯尼迪接着陈述了美国即将采取的初步措施。这些初步措施包括：隔离；

对军事装备的监视；下一步的行动；在对方使用这些导弹时美国将作出的反应；对关塔那摩基地兵力的加强；在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中采取的行动及对赫鲁晓夫和古巴人发出的呼吁。他说：

“我们目前所选择的途径，像所有的途径一样，是充满了危险的，但这是最合乎我们作为一个国家的特性和勇气，最合乎我们在全世界承担的义务的途径。自由的代价一向是高昂的，但是美国人向来为此付出代价。有一条途径是我们永远不会选择的，那就是投降或屈服的途径。

我们的目标不是推行强权，取得胜利，而是伸张正义；不是牺牲自由的和平，而是在本半球这里，以及——我们希望——在整个世界上，实现和平和自由。愿上帝保佑，这个目标将会实现。”

10月23日上午，负责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主持召开了美洲国家组织理事会会议，在墨西哥和巴西的支持下，对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分三部分进行表决，即：要求从古巴拆除和撤走一切导弹和其他进攻性武器；建议美洲国家组织成员国个别地和集体地采取一切措施，“包括使用武装力量”，以保证使古巴不再得到进攻性的军事装备，并防止导弹成为对美洲和平与安全的威胁；请求联合国接受美国的决议草案，并派遣联合国观察员前往古巴。当日美洲国家代表会议对美国是否应对古巴进行封锁进行表决，结果以19票对8票，1票弃权通过；在使用武装力量问题上17票对0票，3票弃权。当天下午肯尼迪立即发表《关于禁止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宣言》，以美洲国家组织决议作为依据之一，宣布：美国武装力量于10月24日下午2时开始，“制止向古巴运送进攻性武器及其附属物资”；国防部长为此将采取适当措施，使用美国海、陆、空军，并可视必要发出指令，在离古巴“合理”的距离内指定禁区和航道，任何驶向古巴的飞机和船只都可能受到拦截、检查。

接着美国积极寻求其盟国的支持。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国先后表示支持美国的行动。

10月23日下午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向安理会提出决议案，对苏联进行指控，逼迫苏联代表表态。美国的盟国对美国的决议案表示支持。非洲国家包括与苏联关系较好的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国代表表示，如果问题仅限于美苏之间而不是美古之间，他们就支持美国。苏联代表发表了一篇言辞激烈的声明，要求停止美国对古巴事务的干预，并建议由古巴、苏联和美国举行谈判，以求局势恢复正常。美国代表轻易地把苏联的决议草案挡开了。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提出一项建议：苏联停止运送武器，美国暂停海上封锁，以便获得时间谈判。美国认为这个建议不利于美国，肯尼迪致书吴丹表示拒绝。但是对吴丹要求美国总统向加勒比海域美国海军司令官发出特别命令，规定今后几天内“尽一切力量避免同苏联船只发生对抗”，肯尼迪表示同意。接着在安理会上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对抗，史蒂文森尖利地逼着苏联代表当场承认或否认在古巴存有苏联导弹，并出示有关导弹设施的最近空中摄影照片。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暂时休会，以便吴丹同美苏和古巴领导人再作商谈。安理会一直到危机过后才复会。

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实施海上封锁行动。10月24日上午9时，美国先后出动183艘军舰封锁古巴海面，50%的战略轰炸机载着核武器不断在古巴



上空盘旋，核潜艇也进入作战阵地。在古巴领海周围，美军设置了警戒线，把由中大西洋通往古巴的5条航道全部封锁起来。近百艘舰艇在空军和航空母舰的护卫下，驶入警戒海域，在距古巴东端300多公里的一条巨大的弧线上摆开，拦截和搜寻驶往古巴的船只。刚过1小时，就有两艘苏联船只驶到距障碍物仅几海里的地方，一瞬间战争几乎降临了。但10时25分，有人报告苏联船只停止不前了。10月25日这一天只放行了苏联油轮“布加勒斯特”号和东德客轮“人民之友”号。美国这样做的目的，用肯尼迪的话说，是“不想把赫鲁晓夫逼得走投无路”。双方没有发生冲突。10月26日，美国海军拦截了苏联租用美国建造的巴拿马货船，并登上船去检查。这是海军经肯尼迪同意后采取的行动。肯尼迪不愿在不必要的情况下拦截苏联船只，但他乐于选择苏联租用的非集团国家的船只进行检查。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显示美国说话是算数的，另一方面不给苏联太多的难堪。美国海军提出要到远洋上去拦截运送导弹的苏联船只，肯尼迪坚决拒绝采取这种强硬措施，他说要给赫鲁晓夫一个协调苏联高层内部意见、作出新决定的时间。报告说驶向古巴的20余艘苏联船只都在拦截线旁停了下来，有的改变了方向返回苏联。肯尼迪后来推测说，长期以来苏联军方对保密着了迷，不想冒险听任其导弹、核弹头和电子设备落入美国人手中，也不想让美国人拦截载有这些装备的船只。

海上对峙的危险虽有了缓和，但尚未结束。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大部分已进入发射状态。美国高层内开始讨论加紧封锁、增加低空飞行和对古巴采取行动等措施。不过肯尼迪还是拒绝匆忙行事，他只是命令美国空军加紧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进行进一步侦察。10月27日传来坏消息：美国空军在侦察中遭到地面炮火攻击，一架高空飞行的U—2飞机被苏联的防空导弹击落。事后查明，这是在基地上的古巴人民军上校违背苏军顾问的意图擅自作出的决定。同一天，在阿拉斯加上空飞行的一架美国U—2飞机因遇到航行上的困难而深入到苏联领空，在返回时遭到苏联大批战斗机拦截，但苏联飞机没有开火。连续发生的事件把危机推向顶点，双方都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美国的常规部队和核力量已在世界各地处于戒备状态。准备对古巴实施空袭的飞机及入侵的部队都集结在佛罗里达。肯尼迪的工作班子都集中在内阁会议桌开会，准备应付最严峻的情况。

当10月23日肯尼迪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并致信赫鲁晓夫后，赫鲁晓夫自知事情已经败露，克里姆林宫顿时陷入震惊和忙乱之中。两个超级大国是走向军事对抗，还是走向缓和，赫鲁晓夫和他的同僚大伤了一番脑子，草拟了致肯尼迪的信件，23日下午3时送往美国驻苏大使馆。在这封信件中，赫鲁晓夫指责美国的行动“对各国的和平和安全是严重威胁”、“粗暴违反联合国宪章”和“违反公海航行自由的国际准则”等。他把苏联在古巴驻扎军队和导弹基地说成是防御性的。当天早些时候，苏联政府发表严正声明，认为武力封锁古巴，对苏联船只进行拦截和检查，是赤裸裸的侵略行径，并警告美国：如果侵略者挑起战争，苏联将予以坚决回击。苏联国防部命令战略火箭军、防空军和海军舰队处于战备状态；华约武装部队总司令格列奇科命令华约武装力量提高战备等级。同日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命令古巴全军进入战斗状态。

肯尼迪研究了赫鲁晓夫的信，写了第二封信。信写得很短，主要强调两点：一是美国要向联合国提出古巴导弹问题；二是美国海军要对苏联船只进

行检查。24日，赫鲁晓夫再次给肯尼迪写信，该信一方面拒绝了肯尼迪的所谓海上检查的要求，另一方面批驳了肯尼迪信中发出的武力威胁。不过这封信也包含了这样意思，即如果美国同意不入侵古巴的话，苏联方面愿意在联合国的检查下撤走导弹。10月26日，苏联方面还通过驻美国大使馆参赞福明同美国广播公司电视记者斯卡利进行了会谈，传递了含糊的信息。这是一条非正式渠道。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第二封信答复的要点是：如果苏联愿意在联合国的安排下撤走导弹，美国将迅速取消实行的封锁并保证不入侵古巴。肯尼迪让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把这封信的副本递交给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并与他进行了会谈。关于罗伯特·肯尼迪与多勃雷宁的这次接触，赫鲁晓夫回忆，多勃雷宁向他报告说：

“罗伯特·肯尼迪困顿不堪。从他的眼睛里可以看出他已经好多天没睡了。他自己说已经六天六夜没有回过家。罗伯特·肯尼迪说：“总统处境严重，不知如何才能解脱。我们都处于很重的压力之下。也许就在这个时刻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主席写信。多勃雷宁先生，我们想请你通过非官方的渠道把肯尼迪总统给赫鲁晓夫主席的信件送到。肯尼迪总统恳求赫鲁晓夫主席接受他的要求并且请他考虑到美国制度的特点。即使总统本人非常反对发动对古巴的战争，但是会有一连串无可挽回的违反他意愿的事情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总统直接向赫鲁晓夫主席呼吁，希望他帮助解决这次冲突。如果这种局势再继续下去，总统就不能肯定军方是否会推翻他而夺取权力。美国军队可能会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于是，赫鲁晓夫于10月27日就给肯尼迪写了信，即第三封信。信中重申苏联设置导弹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古巴，制止对古巴的入侵和保证古巴自己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力。信中表示可以接受美国方面的提议，同意由联合国派人负责监督导弹撤走的情况。信中还要求美国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苏联保证不侵犯土耳其。但是肯尼迪认为，在苏联导弹放在美国门口的情况下，美国不能以撤出在土耳其的导弹作为交换条件。为了保全面子，他坚持要苏联先撤走在古巴的导弹。于是肯尼迪致信赫鲁晓夫，坚持让苏联方面先撤走导弹，并在信中警告说：如果古巴问题讨论同更大范围的欧洲和世界安全问题扯在一起，使时间拖延下去，那就必然会使古巴危机更加恶化，并对世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同时苏联大使也被非正式警告说，美国准备在29日上午开始采取行动（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确向总统不断施加压力，要求立即空袭和入侵古巴）。

赫鲁晓夫领会了肯尼迪的暗示，他在10月28日给肯尼迪的信中取消了撤除土耳其的导弹作为对等条件，表示将下令撤除在古巴的导弹，要求美国迅速取消封锁。为了争取时间他让塔斯社将此信公开发表。这是危机以来他写给肯尼迪的第五封信。肯尼迪立即发表声明，欢迎赫鲁晓夫的“具有政治家风度的决定”。

美苏的妥协标志着危机出现了重大转折，美苏两国领导人在危机关头选择了和平而不是战争。

就在10月28日这天，卡斯特罗就美苏关于古巴问题的协议发表声明，要求美国在解除对古巴的封锁之外，还必须作出下列保证：

- 停止经济封锁；
- 停止一切颠覆活动；
- 停止从美国和波多黎哥的基地上进行的海盗式的攻击；
- 停止侵犯古巴领海、领空的行动；

撤除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归还美国占据的古巴领土。

卡斯特罗的声明是对美苏妥协的不满。吴丹于10月30日访问了古巴，劝说古巴接受美苏达成的协议，卡斯特罗虽然表示接受，但仍然坚持自己提出的5个条件。

自11月初起苏联开始撤走导弹。依据协议，苏联把导弹作为舱面货物放在船上，在公海上接受美国海军船靠船的“肉眼检查”，这样美国人不必登上苏联船只，从而避免侵犯苏联的主权。

11月20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根据肯尼迪的指示，宣布解除对古巴的封锁。21日苏联也对危机中动员的军队下了“解除动员令”。至此，震动世界的古巴导弹危机得以结束，全世界人民为之松了口气。

古巴导弹危机是美苏进行全球争霸的产物。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霸权，到1959年，美国通过同40多个国家缔结双边和多边军事条约，在世界各地修建了1400多个军事基地。当美国不可一世之时，苏联大步赶了上来，赫鲁晓夫开始向美国的霸权挑战。在双方的争霸中，古巴是个重要的战略基地，双方都不肯丢失。这是引发导弹危机的深层原因。

这场危机得以控制是因为美苏两家都害怕核战争。肯尼迪说，“他（指赫鲁晓夫）与我是在同一条船上的”，“我们必须避免灭顶之灾”。这是双方能够达成妥协的根本原因。

美国之所以在这次危机中取得了有利于自己的妥协，是因为美国的力量优势和恰当地处理危机的艺术。美国在军事力量方面拥有优势，也占有地利。以肯尼迪为首的危机处理班子，综合运用政治、外交和军事多种手段，精心选择了对策，既置苏联于孤立、被动的境地，又给其保住面子的机会，终于得以逢凶化吉。

赫鲁晓夫对危机的处理便显得稍逊一筹。他在决定向古巴运送导弹时低估了对手，对如何应付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缺少对策，这是冒险主义；在导弹被发现后，面对美国的强硬态度，赫鲁晓夫便陷入惊惶失措之中，很快屈从于美国的要求，变成了逃跑主义。美国方面倒是过高估计了赫鲁晓夫及其在古巴部署导弹的行动，美国高层内部已经考虑过以撤走在土耳其的导弹和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作为交换条件。由于赫鲁晓夫过早向美国的要求屈服，美国也就不必再拿出自己让步的底牌。赫鲁晓夫力求避免与美国的核战争、避免由此可能引发的世界大战这一点并没有错，错就错在他过早向美国屈服，没有为苏联、古巴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应有的利益，使苏联和古巴蒙受了耻辱，长了美国这个世界霸主的霸气。赫鲁晓夫本人也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不高明的表现付出了高昂代价。古巴导弹事件是他后来被赶下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 六、阴云密布的天空露出一线阳光——《部分核禁试条约》

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签订了《禁止在大气层、外空与水下核武器试验条约》，简称《部分核禁试条约》。这是美苏达成的第一个有关核武器的协议。这个条约的签订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曲折的过程。这一条约后来又有100多个国家签署。

就部分禁止核试验达成协议的想法，艾森豪威尔最早于1959年就向苏联方面提出过，为苏联所拒绝。

肯尼迪在任参议员时就积极主张缔结禁止核试验条约。1960年作为总统候选人，他保证不首先恢复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也不恢复地下核试验，直到他花时间“用尽了一切合理的机会”去谋求达成协议为止。1961年在就任总统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曾透露已委派了一个特别小组来研究新的谈判立场，并起草一份合理的条约草案。

肯尼迪当选总统后在这个问题上面对两股力量的压力：一方面，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专家、部分军方人士特别是空军强烈要求恢复核试验。他们认为美国恢复核试验对于发展新的核武器是不可缺少的。他们担心苏联正在偷偷进行地下核试验。1961年2月参谋长联席会议敦促肯尼迪立即恢复核试验，并强调说如不恢复核试验美国就会失去核优势。同年7月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美国50%以上的公众支持恢复自己的核试验。面对来自国内的压力，肯尼迪下令做好恢复地下核试验的准备，但必须等到美国在禁试问题上作出了应尽的努力后才行。另一方面美国和国际社会要求裁军、反对核武器的舆论日益高涨。例如美国著名化学家、二战时曾在国防研究委员会任要职、1962年获诺贝尔奖的保林从1958年起就大声疾呼反对核武器，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签名运动。西欧各种和平主义者发起的核裁军运动规模也日益壮大。美国的亚洲主要盟国日本是核武器的唯一受害国，对这一问题特别敏感。日本每年举行一次反对原子弹、氢弹和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活动，矛头都是针对美国的。苏联自1957年提出禁止在大气层进行核试验的倡议以来，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居于主动地位。

肯尼迪为了兑现其竞选时的诺言，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求将原定于1961年2月7日复会的日内瓦会议推迟到3月21日，以便他能对美国在核试验问题上的政策进行彻底审查，此建议得到苏联方面同意。肯尼迪让前国防部长麦克洛伊具体负责这一事项。麦克洛伊所指定的一个由14名专家组成的小组提出了报告，报告提出在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四个主要问题上美国可以作出的妥协：

监察地震波问题。同意苏联有权视察美国作研究用的地下核装置的蓝图及核装置内部，以确定其是否用于非军事目的，并可视察过时的核装置。

同意苏联关于用于和平的核试验也在视察之列的建议。

关于每年视察的次数，苏联主张3次，美国主张20次，距离甚大，可考虑适当减少。

同意苏联关于完全禁止高空与外空核试验的主张。

肯尼迪同意了这一方案，并派迪恩为谈判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但美苏双方没有达成协议。双方的主要分歧是：西方坚持由一名中立国成员进行监督，苏联认为没有真正的中立者；美国坚持每年核查20次，苏联仍然坚持3次；西方坚持在苏联领土上设置19个侦察站，苏联只同意设置15个；在苏联境内的侦察站的人员，苏联坚持全由苏联人组成，西方坚持全由别国人组成。一个月后苏联正式拒绝了美英的联合建议。美国可能本来就没有指望苏联方面会接受，苏联的拒绝使美国找到了宣传借口，扭转了舆论认为是美国拖后腿的印象。

1961年8月30日，苏联宣布恢复核试验。苏联提出恢复核试验的理由是：西方对德政策；西方拒绝接受苏联的核禁试建议；西方不遵守1958年日内瓦专家会议的结论；美国的盟国法国全力发展核武器和进行核试验。声明还宣称，苏联将进行一系列超级炸弹和可以命中地球上任何目标的火箭试

验。9月1日苏联在大气层爆炸了一枚15万吨级的核弹。

在苏联恢复进行核试验后，肯尼迪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肯尼迪采纳了作出有节制的、慎重的反应的建议，目的是把全世界范围内的敌对情绪引向苏联，孤立苏联。美国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白宫在8月30日晚上发表声明，指责苏联的核试验是危及健康与和平的行动，也是苏联伪善与奸诈的证据。美国不得不“按照自身利益的需要作出决定”。

8月31日，白宫又声明说，苏联的行动“主要是进行原子讹诈，旨在用恐怖代替理智……不仅是试验核装置而且是考验自由世界的意志和决心”。这个声明还向美国国会、美国公众及美国的盟国保证说，美国的核力量是充足的。

9月上旬，美国声明说，亿万吨级的核弹对于摧毁军事目标来说是过于庞大了，美国也能够制造这种大当量的核弹，只是没有那个必要。

9月3日，肯尼迪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联合建议，美英苏立即禁止大气层核试验，以此向赫鲁晓夫施加压力。

9月5日，肯尼迪下令恢复地下核试验。这些试验很快就开始实施了。

在随后的几周里，肯尼迪在同不结盟国家会议发言人的谈话中，以及在向联合国大会的讲话中，指控苏联不讲信义，为美国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必要性与安全性辩护。并再次呼吁苏联停止大气层核试验。

当苏联的一系列核试验在11月2日结束时，肯尼迪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宣布美国将恢复进行大气层核试验。

1962年2月8日美英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将进行新的核试验，同时向苏联建议举行有关裁军的外长会议，进而举行首脑会议。3月1日肯尼迪向美国公众发表电视讲话。3月3日赫鲁晓夫表示将进行新的核试验，不过同意举行外长会议。4月25日美国在圣诞岛进行了自1958年以来新一轮大气层核试验，称“多米尼克毓”，共40次，时间长达6个月之久。美国方面认为有此必要，因为它担心苏联在反弹道导弹方面的进展会抵消美国的核优势。美国的这新一轮核试验进入了前沿技术，广泛应用了当时最新的计算机技术。

美苏新一轮核试验竞赛把核军备竞赛推向了新的高潮，双方都无意先停下来。但是广大无核国家强烈反对美苏的核军备竞赛，一些中立国家不断提出妥协方案，继续推动禁止核试验活动。它们的态度对美苏产生了一定的压力。

美苏双方新一轮核试验竞赛正在进行之时，赫鲁晓夫便在思考着苏联的军备政策。赫鲁晓夫知道，苏联要赶上美国已拥有的核优势，需要巨大的经费投入，而此时苏联的工业、投资和农业发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停滞，苏联人民对消费品需求的增加，这一切都迫使他放弃在军备竞赛中获胜的尝试，而不得不把更多的资源用在民用经济上。自1962年初起，赫鲁晓夫在致肯尼迪的信中就开始寻求和平相处的机会，寻求在控制军备方面取得重大的突破，以便加速苏联经济的发展。

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中取胜后也不敢掉以轻心。他自己认为在古巴这样的地方美国具有传统的优势，如果危机发生在柏林或东南亚结局就另当别论了。肯尼迪对中苏的分裂也并没有感到多少安慰。他仇视中国甚于仇视苏联，认为中苏的分歧是在消灭西方的方法上而不是在根本目的上，甚至认为

中国比苏联更危险。古巴危机后肯尼迪坚持认为全面核战争是根本没有意义的，同时也看到签订核禁试的可能性有所增加。肯尼迪急于与苏联签订核禁试条约还有另一层目的。他看到中国和法国都在积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都在力图打破美苏的核垄断。核武器的扩散对美国来说是危险的，美国就不能动不动对无核国家实施核讹诈了。肯尼迪还考虑过对中国采取行动，摧毁中国制造核武器的能力，并一再就此摸苏联的意见，希望与苏联联合行动，但没有取得成功。

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就一些重要问题达成了协议。一项是交换空间卫星发回的气象情报和其他情报协议。另一项是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热线”，以便在紧急时刻迅速而秘密地取得联系。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给肯尼迪写了一封陈述苏联核禁试立场的信件，美苏双方就此在美国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秘密会谈。苏联方面作出了重要让步，即同意每年在任何一个国家里就地震震动进行2至3次就地视察，肯尼迪同意把美方原来坚持的每年20次视察减少到8至10次，后来又减少到7次。双方在视察次数方面缩小了分歧。1963年1月苏联代表返回莫斯科向赫鲁晓夫作了汇报。肯尼迪也写信给赫鲁晓夫，再次表示真诚希望达成一项协议，并敦促苏联把视察次数同难以鉴别的地震次数联系起来，把苏联坚持的3次这一数目提高一些，以换取美国从7次这一数目降低一些。他还建议在日内瓦重开谈判。日内瓦会议于2月12日复会。

赫鲁晓夫拒绝考虑修改数字。他疑虑重重，不愿意要求部长会议提出一个仍然不能被肯尼迪所接受的新数字，就像肯尼迪不愿意劝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不再反对一个仍然不会被赫鲁晓夫所接受的新数字一样。日内瓦谈判再次陷入僵局。1965年5月，肯尼迪失望他说：“我并不抱有什么希望。”“如果我们今年达不成协议……我就会认为……魔鬼已经从瓶子里逃出来，我们再也不能把他捉回去了。……我个人一直摆脱不掉的感觉是：除非我们取得成功，不然的话，到1970年将会有10个核国家而不是4个核国家。……我认为那可能是最大的威胁和危险。……我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

当美苏会谈再次陷入僵局后，英国进行了巨大努力促使双方打开僵局。肯尼迪本人在1963年春未时，也采取了3个重要步骤，以软硬两手敦促苏联尽快达成协议。

一是肯尼迪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一起提议就禁试条约举行新的会谈，会谈地点可选在莫斯科。

二是为了缓和气氛以便达成协议，他未经国会磋商便决定等目前的一系列核试验结束之后，美国将不在大气层中首先恢复制核试验。但他拒绝暂停地下核试验，理由是在没有建立视察制度以前，苏联可能秘密进行地下核试验。

三是在美利坚大学发表演说。苏共中央委员会准备在6月举行会议，这时肯尼迪趁美利坚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之机发表演说，再次作出一个和平姿态。肯尼迪在演说中称：

“不是用美国的作战武器把美国式的和平强加于全世界……不仅仅为美国人谋求和平，而且也为全人类谋求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且也是永久性的和平。”肯尼迪还要求听他演说的人们用新的眼光看待苏联和冷战，抛弃过去的冲突和偏见，并把注意力集中在美苏两大国的共同利益上。他说，美苏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战争，这在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几乎是独一

无二的。……如果我们现在不能结束我们的分歧，至少我们可以帮助使世界安全地保持多样化。因为归根到底，我们之间根本的共同利益是，我们都居住在这个地球上。”肯尼迪还为美国的军备政策辩护，称美国的武器控制政策是非挑衅性的，并说美国避免在外交上威胁和触犯别人，美国希望联合国进一步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安全体系”，美国承认共产党国家人民对自己社会制度的选择。肯尼迪的这篇演说虽然充满了伪善的词句，但在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方面还是有几分真诚。

苏联方面对肯尼迪的演说作出了积极反应。苏联用 3000 多架发射机组成的无线电网对西方的广播进行干扰，但当美国之音用俄语播出肯尼迪的这篇演说时，苏联方面突然停止了干扰。赫鲁晓夫称这篇演说为“自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所发表的最伟大的讲话”。6月21日，苏联代表在国际原子能委员会上改变了原来不同意就“防止将和平核能转为军事用途实行国际监督”的立场，使美苏双方立场以接近了一步。

7月2日，赫鲁晓夫在柏林发表讲话，再次肯定肯尼迪的演说，表示同意关于全面禁试的建议，不过同时提出在签订禁试条约后，北约和华约之间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赫鲁晓夫还宣布苏联将停止干扰美国的对苏和对东欧广播。

应苏联方面邀请，美英派高级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会谈。

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为前驻苏大使、现任副国务卿哈里曼，英国的首席代表是科学部长黑尔沙姆勋爵。苏联首席代表为外长葛罗米柯。

在美国代表前往莫斯科之前，美国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准备：

肯尼迪就此作了专门指示。一是强调这是与苏联建立彼此信任关系的最后良机；二是强调美国谈判代表应该每天和总统保持联系；三是要采取严密的预防措施，不得过早泄露谈判立场，使成功的前景遭到破坏。

美国代表团就下列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决定了会谈中将采取的立场。一是禁止地下核试验是否应包括在未来的条约中。肯尼迪认为只要苏联同意实行就地视察，就可以把禁止地下核试验包括进去。如果苏联不同意，美国保留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的权力。二是是否应举行最高级会议来签署核禁试条约。肯尼迪认为不必举行最高级会议来签署这样一个条约，但如果赫鲁晓夫愿意举行的话，他也同意参加这样的会议。三是关于避免同时签订北约和华约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美国的立场是把这两件事情分开，因为这需要美国与北约国家进行大量复杂的协商。四是关于将来的核国家是否会同意这个条约问题。肯尼迪希望苏联压中国将来在这样的条约上签字。他还希望美国通过提出帮助法国进行地下核试验的建议，将能说服戴高乐将军在条约上签字。这充分暴露了美国与苏联一起推行核垄断的图谋。这个图谋因中国和法国都坚持各自的独立立场未能得逞。

哈里曼在赴莫斯科途中先访问了伦敦，与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私下会谈，获得允诺，凡遇意见不一致时，英国支持美国立场。原来美国担心英国达成协议心切，会表现出太大的妥协。现得此保证，哈里曼感到可以无后顾之忧了。

三国会谈于 1963 年 7 月 15 日在莫斯科正式举行。苏联对这次会谈亦十分重视，赫鲁晓夫亲自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并且有意制造轻松愉快的气氛。苏联提出了一个比较简短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美国和英国则提出了除地下核试验外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草案，双方进行了 10 天紧张的讨价还

价。主要争论的问题是：

是否缔结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问题。这个问题主要卡在核查上。苏联一度同意每年核查3次，后又退回反对一切核查的立场上。苏联方面强调，西方一旦进入苏联，就不可能不搞间谍活动，正如狗见了奶酪不可能不吃一样。美国则认为没有核查苏联不可能不进行欺骗。这样，从一开始全面禁试就被排除了。讨论很快集中到部分禁止核试验上了。

是否同时谈判北约与华约之间互不侵犯条约问题。美国谈判代表根据在国内得到的授权，原则上不反对同时缔结该约，但是主张在莫斯科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以免问题复杂化。经过一番争论后，苏联不再坚持把两项条约联系在一起，最后在公报中写进了这样一段话：

“三国代表团长讨论了苏联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之间缔结一项互不侵犯公约的建议。三国政府一致同意向两个组织中他们各自的盟国通报有关谈话的内容，并同他们就继续讨论这一问题进行磋商，目的在于达成一项对大家都满意的协议。”

事实上以后双方再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认真的讨论。

用于和平的核爆炸问题。西方提出的草案中原有一条：经过缔约国一致同意，并符合某些附加条款的前提下，允许在禁试的领域如大气层内进行用于和平的核爆炸。苏联反对设此例外，认为这会引起世人对缔约国诚意的怀疑。美国接受了苏联方面的立场。

缔约国在什么情况下有权退出条约的问题。美方原草案中写道，“如缔约一方认定某个其他国家进行的核试验足以危及其国家安全时”，得以按一定程序退出本条约。哈里曼明确告诉苏联，这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美国担心中国发展核武器会威胁美国的安全。苏联方面对此表示反对，美国坚持不退让，并一度作要退出会议的威胁。最后苏方同意写入，但措词改为“与本条约内容有关的非常情况”。事后美方分析苏联坚持避免提其他国家的核爆炸字样，是因为针对中国太明显，苏联宁愿让其他国家对中国施加压力，而不愿自己直接出面。

这项条约的实质内容就是，签约国承诺：一是不在条约禁止的领域内进行核试验；二是不纵容其他国家进行此类试验。

1963年7月25日莫斯科时间晚7时，美英苏三国首席代表举行正式签字仪式。8月5日下午4时在克里姆林宫的卡特林大厅举行了正式签字仪式。美方派出以国务卿腊斯克为首的代表团出席签字仪式，除腊斯克外，有6名政府官员和6名参议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出席仪式并讲了话。在条约上正式签字的是三国外长：腊斯克、葛罗米柯和休姆。

同年9月24日美国参议院以80票对19票通过了部分核禁试条约。10月7日总统正式批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在美国国会通过的第二天也正式批准条约。10月10日，美英苏三国交换文本，条约正式生效。

这一条约在肯尼迪和赫鲁晓夫的政治生涯中都是顶峰，也是美苏关系看来最有希望的时候。当时美苏双方都认为，部分禁试条约是走向全面禁试条约的第一步，实现了全面禁试就能导致美苏间的良好关系；美苏两国是世界的主宰性大国，美苏关系缓和，世界局势就可以缓和；美苏联合就可以阻止其他国家拥有核武器。



## 第七章 依然僵持

1963年11月约翰逊继被刺身亡的肯尼迪出任美国总统。次年10月赫鲁晓夫被他的同伴们罢官，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随着美苏领导人的更替，美苏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由赫鲁晓夫时期的一面大喊缓和一面危机迭起转入相对平稳时期。但是旧酒新瓶，美苏争霸的实质并无变化。第三世界的崛起，西欧、日本的复兴特别是法国退出北约，这些因素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霸产生了重要的制约作用。

### 一、“牛仔政客”和“技术官僚”导演的新一轮政策互动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城遭刺客暗杀，这对担任副总统不满三年能够不必经过竞选而继任总统的约翰逊来说完全是一种意外。约翰逊1908年出生于得克萨斯州中南部的斯通沃尔地区，1937年当选为众议员，1948年当选为参议员。1953年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共和党在参议院占据微弱多数时，约翰逊当上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两年后，民主党在参议院中期选举中获胜，约翰逊又确立了他的多数党领袖地位，从此使自己逐步成为国会山上的最有权势的人物。用《核时代的战争与和平》一书的美国作者约翰逊·纽豪斯的话来说，约翰逊“是个政治掮客，在华盛顿闯荡了30多年。……但他对于其管辖范围之外的大千世界知之甚少”。也许有一件事最能说明约翰逊的这种本质。他在1964年展开的总统竞选中以超过对手1500万票的优势击败共和党候选人戈德华特当选总统，而1968年3月12日却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预选中遭到严重挫折而被迫退出竞选。在美国人就历届总统政绩所作的一次评比中，约翰逊位列最差总统之列。

约翰逊继任总统之初，不可能即刻对白宫人马和内阁成员来个大换班。为了保持政权的连续性，他继续任用肯尼迪的一大批高级官员为他效命。他们当中有留任国务卿的“鹰派人物”腊斯克，继续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特别助理邦迪和继续担任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约翰逊在肯尼迪的葬礼举行之前曾对这批人说：“我比肯尼迪更需要你们的帮助。”但这些官员们对约翰逊并不放心。尽管约翰逊是个守口如瓶的人，但也易于冲动和过分轻率。留任的一位官员把他描述成一个“潜在的危险人物”。深得肯尼迪和约翰逊两位总统赏识的麦克纳马拉后来就因在越南问题上同约翰逊发生分歧而被迫辞去国防部长一职。

1964年5月22日，约翰逊总统在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说中首次使用了“伟大的社会”一词，这一提法很快就被用来代表约翰逊政府的施政纲领。他的施政纲领的要点是，对内提出“向贫穷开战”，发誓要建立“福利社会”。对外政策仍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所采取的基本方针的继续，即把美国的社会模式推广到全世界。他说：“一个伟大的民族的基础在于文明的思想、健康的身体和自由企业制度。”并宣称：“我们的事业是全人类的事业。”“我希望我们决不要忘记，我们缔造这个国家，其目的不是为我们自己服务，而是为人类服务。”这就是说，为了推行美国模式可以对别国大加干涉。1965年他更加露骨他说：“我们不是一个一心只想按照我们已经取得的成果行事的民族。既然边疆实际上已经打开，我们就这样干下去了。”也就是说，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正是他的政府后来武装入侵多米尼加和越南的思想根源。

在对苏政策上，约翰逊继续实行与苏联争夺霸权的政策，但鉴于苏联实力的增强，他被迫承认苏联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并谋求与苏联缓和紧张关系。美苏关系缓和出现了较前更为扎实的进展。但是两国之间的对抗是根深蒂固的，是两个帝国围绕世界霸权之争，所以两国在缓和关系的同时又在中东和越南发生了尖锐对抗。约翰逊政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对东南亚给予极大关注，并且使美国的对外政策越来越受越南战争的支配。1965年3月约翰逊在谈到他个人的目标时曾说：“我不想做建立帝国、好大喜功、扩张领土的总统……我要做一个帮助结束世界上弟兄间相互残杀的总统。”然而，事实上他却越来越重视军事行动。在他任职期间，驻越南的美军人数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大幅度上升，印度支那战争逐步升级。

约翰逊上台一年后，苏联政局发生重大变化。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宣布，鉴于赫鲁晓夫的年迈和健康恶化，中央决定满足他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选举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次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会议，任命柯西金为部长会议主席。

勃列日涅夫是赫鲁晓夫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却比他的恩师更逊一筹。他是个平庸人物，上台后便废除了赫鲁晓夫的一些改革措施，实行封闭统治，从而给苏联社会的发展埋下了祸根。他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鼓吹“有限主权论”，为进一步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制造根据，并于1968年公然派军队入侵捷克，镇压所谓“布拉格之春”。在中苏关系上，继续赫鲁晓夫的政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酿成了1969年严重的边境冲突事件。但在对美战略上，勃列日涅夫还是有自己的战略和策略的。他总结了前任教训，制订出以实力和美国对抗的战略。勃列日涅夫最信奉实力，他的争霸战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实力战略。上台初期，他趁美国陷身侵越战争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战略核力量，在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已有的基础上，仅5年的时间就达到了同美国的基本平衡。勃列日涅夫的对美战略是战后苏联对美战略的重大转折，其基础是苏联霸权主义已到了成熟阶段，而此时苏联的实力也有了很大改善。不过他上台执政的前5年，即60年代后5年，主要着眼于积聚力量，对美采取守势。70年代以后勃列日涅夫才展开了对美国的积极进攻。

勃列日涅夫的对美战略是一种政治、经济、军事等各种手段综合运用战略，共有四根支柱。

支柱之一是为夺取军备优势而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苏联历来注重制订长远发展规划。他上台时正是赫鲁晓夫的改革陷入混乱和苏联经济出现停滞之机，勃列日涅夫下大力量发展经济，使苏联经济驶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支柱之二是为麻痹西方而制定的缓和战略。这是对赫鲁晓夫和平共处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缓和战略实际上是苏联的一种政治谋略。目的是用缓和麻痹西方，利用缓和争取时间，加紧发展自己的力量，扩大与西方的经济交往，从西方获得更多的资金与技术，取得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支柱之三，为力争优势而制定的军事战略。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的军事战略有重大变化，既不同于斯大林时期只重视发展传统常规武器，立足于打常规战争，也纠正了赫鲁晓夫过分迷信核武器的片面观点。勃列日涅夫强调依靠军事实力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在大力发展常规力量的同时，加速发展核力量。他放弃了赫鲁晓夫把核大战当作战争唯一样式的观

点，认为战争样式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世界大战，也可能是局部战争。苏军教材明确指出，未来的战争样式可能有三种：一是常规局部战争，二是战区核战争，三是世界核大战。他强调全面发展军备。从准备打各种各样的战争的思想出发，把发展核与非核军备置于同等地位。国防部长格列奇科、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都是这一思想的有力支持者和坚决执行者。在戈尔什科夫领导下，苏联海军由一支近海海军发展为一支远洋海军，对美国的海上霸权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一时期苏联在继续支持打先发制人、突然袭击的速决战的观点的同时，也重视研究战争可能持久化的问题。认为与军事大国或国家联盟进行战争，不能指望战争会迅速结束，而应作持久打算。

支柱之四是迅速夺取战略要地而制定的地区扩张战略。这是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的事了。

## 二、核均势和核恐惧使美苏关系出现了有限缓和

这首先表现在高层接触的增多。1964年11月30日至12月19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美，同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就防止核扩散等问题先后举行多次会谈，并在联合国第19届会议上提出“关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限制军备竞赛的措施的备忘录”。在该备忘录中苏联建议采取以下措施：把军事大国的军事预算缩减10%~15%；缔结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协定；召开国际会议来签订一项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公约；销毁核武器；禁止一切核试验；就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达成协议等。1965年7月12日和11月7日，美国巡回大使哈里曼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曼斯菲尔德相继访苏，着重讨论越南问题。

1967年6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参加联合国讨论中东问题的特别紧急会议。这时美苏双方提出了柯西金与美国总统约翰逊举行会晤的问题。美国方面要求在华盛顿举行会晤，苏联则坚持在柯西金的住地纽约举行。作为一种妥协，双方同意在新泽西州南部的葛拉斯堡这个折衷地点。在会晤中，双方讨论了中东局势、越南问题、防止核扩散问题、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欧洲和西半球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在会晤中，柯西金认为，以色列应先从它在战争期间占领的领土上撤走，然后再作其他考虑；而约翰逊则坚持相反的要求。在越南问题上，美国要求越南北方必须首先作出重大让步，然后才能停止轰炸；苏联则坚持必须首先停止轰炸，然后才能进行谈判，葛拉斯堡会谈并未取得实际成效，但它使美苏两国保持了高层外交接触，同时也有利于缓和因中东战争而紧张起来的美苏关系。

其次表现在处理危机上的合作。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双方都认识到有必要在处理危机问题上加强合作，以免因偶然事件酿成大的战争灾难。双方同意在两国首都设置直接通信线路，即所谓的“热线”。1963年热线便已接通。

这一时期，世界上发生了多次重大危机。如1964年的塞浦路斯危机和东京湾事件，1965年的印度、巴基斯坦战争和多米尼加危机，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和约旦危机等。这些危机中有的并不涉及美苏之间的冲突，有的则涉及到了美苏之间的利害关系。在塞浦路斯危机中，苏联外长葛罗米柯曾建议塞浦路斯实行联邦制，遭到塞浦路斯和希腊的反对，而美国则对苏联的建议持讽刺态度。在越南和中东问题上美苏双方发生了尖锐的对抗。苏联就美国扩大对越南的战争多次发表声明予以谴责。但双方在处理危机时均十分谨

慎，以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特别是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双方还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合作，对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各自施加压力，从而导致了停火的实现。

再次是经贸关系的发展。60 年代后期美苏贸易关系有所发展。在 1966 年 4 月举行的苏共第 23 次代表大会上，柯西金强调要扩大东西方之间的交往，以便获得西方的技术。他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现在世界上正在进行的科学和技术革命要求有更加自由的国际接触，也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更加广泛的经济交流创造了条件，这一点正变得越来越清楚。”此后苏联迅速采取了旨在促进东西方贸易的行动，从而使苏联同西方的贸易急剧增加，从 1965 年的 30 亿美元增至 1968 年的 40 亿美元。

约翰逊政府对发展东西方贸易持积极态度，以此作为向东方“搭桥”政策的组成部分。1963~1964 年的美苏谷物交易在美国国内曾引起争议。肯尼迪在位时对此采取了谨慎小心的态度，约翰逊则支持这笔交易。由于他的上台，美苏谷物交易终于做成。

为扩大东西方贸易，约翰逊政府要求对限制东西方贸易的立法进行修改，并于 1966 年向国会提交了新的《东西方贸易关系法》。该法规定要修改美国在冷战时期的限制性贸易政策。为了能使国会方面通过新的贸易法，约翰逊任命了一个被称作米勒委员会的由实业、劳工和学术界著名人士组成的专家小组。1965 年 4 月，该委员会提出的报告认为，“在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中更加积极地以贸易安排作为政治手段的时机已经成熟。贸易应当纳入政治范围，应该根据机会和形势有目的地和系统地开展贸易或抑制贸易”。不过，美国并没有彻底修改把贸易与政治挂钩的政策，在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上仍然实行限制政策。美苏的贸易额仍然很小，1965~1968 年平均每年仅 1 亿美元左右，与两个大国的经济规模很不相称。同一时期苏联与其他西方国家的贸易却有了很大发展。

第四是军备控制的进展。继 1963 年美英苏三国签订了有限核禁试条约后，60 年代后半期美苏在和平利用空间和禁止核扩散等军备控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1963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所有国家都不要把大规模杀伤武器引向外层空间。按照这个决议，美苏两国开始草拟外层空间条约。条约规定禁止在外层空间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从事武器试验和建立军事基地；不得声称对外层空间拥有所有权或主权以及为宇航员建立保护措施等。条约还规定，所有缔约国为了和平目的可以利用月球和其他天体。1967 年 1 月 27 日，美英苏三国代表分别在莫斯科、华盛顿和伦敦签署“关于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活动所应遵守的原则的条约”（简称“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条约”）。条约是开放性的，各国均可参加，先后有 60 多个国家参加了这个条约。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核扩散开始成为一些国家所关切的问题。1958 年至 1961 年，以爱尔兰为代表的一批小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要求不搞核扩散的决议案。古巴导弹危机又使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对于在拉美禁止核武器格外关心。危机后不久，玻利维亚、巴西、智利等国即向联合国提出了一项决议草案，建议将拉丁美洲变成一个无核区。经过几年的谈判，至 1967 年 2 月，15 个拉美国家签署了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

美苏两国对核扩散的前景极为关注。早在 1962 年双方便已经开始就防止

核扩散条约进行私下谈判。1963年初，肯尼迪总统指出，到1970年可能有10个国家研制核武器，而到1975年，也许将有15或20个国家。据当时任助理国务卿的威廉·泰勒回忆，1963年肯尼迪为了压法国放弃发展独立核力量的计划，极力向访美的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强调中国拥有核武器的危险性：

“（肯尼迪）在欧洲，我们同法国之间，或者说，我们同我们的欧洲盟国之间竟然存在分歧，那实在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自从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已经不再存在苏联可能对欧洲产生军事威胁的问题了。……但是将来我们会碰到问题的地区……是中国。他说，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此他和戴高乐以及欧洲的其他一些领导人应该共同考虑一下：一旦中国成为一个核大国，他们将怎么办，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将会发生什么事情……这在将来对于人类，对于自由世界以及整个世界的自由都是巨大威胁。”

法国核爆炸和中国在研制核武器方面的进展使美苏进一步感到紧张。不过当时苏联的立场是：只要美国还在准备建立北约的多边核力量，美国的所谓防止核扩散就只能是一个骗局，苏联就拒绝讨论防止核扩散问题。

到了1965年，由于法国的坚决抵制，同时英国也不情愿，美国被迫放弃建立北约多边核力量的计划，这样就为防止核扩散谈判铺平了道路。在1966年和1967年的日内瓦18国裁军委员会会议上，以及1967年腊斯克国务卿和葛罗米柯外长的会晤中，美苏就条约草案达成一致。以后，草案又根据一些无核国家的意见作了若干修改。1968年6月19日，由美苏草拟的禁止核扩散条约草案为联合国安理会所批准。7月1日，美英苏三国签署了这一条约。至1970年3月5日条约生效时，签署这一条约的国家共有97个。

根据禁止核扩散条约的规定，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不得把核爆炸装置的控制手段转让给任何其他国家，也不得以任何方式援助或鼓励在其他地方制造这类装置，同时承担援助无核国家和平利用和发展核能源的义务。无核签字国则同意既不制造也不引进核武器。签字国还保证继续就停止军备竞赛进行谈判。由于美苏在保证措施方面存在分歧，条约未能就对拥有核武器国家进行视察作出规定。

禁止核扩散条约是美苏在军备控制方面迈出的一大步，也是美苏缓和关系的重要体现。但是条约没有触及美苏两国现有的核武器储备，也不妨碍它们使用和继续生产核武器。所以当时中国和法国拒绝签署这一条约，指出该条约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核大国的垄断地位。

美国对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态度十分积极。其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此时美国在战略武器方面仍然领先于苏联。1964年时美国拥有834枚陆基洲际导弹和416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而苏联的陆基洲际导弹为200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为120枚。这时美国战略武器已接近饱和状态，又因掌握了分导技术而开始把战略武器发展的重点转向质量提高上。美国方面清楚地知道，苏联在战略武器的数量方面赶上美国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希望通过谈判赶在苏联掌握多弹头技术之前把美国的战略武器优势固定下来。

二是苏联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令美国担忧。1964年11月，苏联在红场展示了它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不久苏联即开始在莫斯科周围部署这一系统。约翰逊政府认为，苏联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发展可能动摇美国的核威慑力量，并导致大量增加进攻性武器。

三是由于苏联开始实际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国会要求美国部署这

种系统的压力增大了。但政府方面认为这种武器既费钱又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反对部署这种武器。为减轻来自国会的压力，约翰逊试图劝说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开始谈判。

1965年12月美国向苏联建议开始战略武器会谈。当时苏联态度犹豫不决，其主要原因是：

一是苏联与美国的战略武器差距仍然较大。到1967年，美国拥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656枚，而苏联仅拥有460枚陆基洲际导弹和130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苏联方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战略武器实施冻结，将意味着把苏联的劣势固走下来。

二是当时禁止核扩散条约还没有签订。苏联担心西德获得核武器，所以明确表示在核禁试条约签订前不准备开始限制战略武器谈判。

三是在防御性战略武器上，美苏的看法不同。美国认为反弹道导弹会加剧军备竞赛，从而造成更大的不稳定。苏联则反对把防御性战略武器与军备竞赛相联系。自1965年起美国就试图建议苏联取消反弹道导弹系统。1967年约翰逊、麦克纳马拉曾向来访的柯西金建议苏联取消反弹道导弹系统。麦克纳马拉是这样解释美方立场的：

“主席先生，你必须懂得，对你们苏联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的恰当对策就是扩充我们的进攻力量。如果说，在你们搞起反弹道导弹系统之前，我们已经有了适当数量的进攻性武器以保持威慑的话，那么为了保持同样程度的威慑作用，面对你们的防御系统，我们就必须加强我们的进攻力量。苏联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必将导致军备竞赛的升级，这对我们双方都没有好处。”

柯西金听后勃然大怒，血液涌到脸上。他猛击桌子说道：“防御是合乎道德的，进攻是非道德的。”那次讨论基本上就是这样结束的。在那时苏联无论如何不准备讨论禁止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

苏联拒绝谈判后，美国国内就反弹道导弹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国会方面认为，为了对付苏联的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应当部署自己的反弹道导弹系统。陆军从50年代末就开始从事这一系统工作；最初是奈基一宙斯，以后是奈基X。因此国会于1966年授权和拨款1.679亿美元生产奈基系统。如果在全国部署该系统，可能要花费300亿美元。约翰逊总统和麦克纳马拉都认为，该武器系统造价高昂且成效不大，因此拒绝使用国会的拨款。

1966年12月6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副部长赛勒斯·万斯、参谋长联席会议诸成员，一同晋见约翰逊总统，让总统检查将在1967年2月提交国会的1968年财政年度国防预算。在准备研究的议程项目中有一项是参谋长们的建议，他们要求在预算申请中应包括生产反弹道导弹的经费。麦克纳马拉对约翰逊说，参谋长们以前提过这项建议，国防部对此是反对的。约翰逊轮流召见参谋长们，每一位参谋长都敦促批准反弹道导弹计划。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支持参谋长们的建议，而麦克纳马拉坚决反对。他对约翰逊说：“参谋长们的建议是错误的，绝对错误的。对苏联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恰当对策，不是部署一种被认为有漏洞的美国防御系统，而应当是面对苏联的防御采取行动，确保我们仍然保持威慑能力。参谋长们所建议的对策和保持这一威慑能力毫不相干。如果在苏联人部署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以前我们的威慑力量规模是适当的，那么考虑到我们未来导弹的损耗，现在就必须予以扩充，以确保我们的导弹在穿越苏联的防御系统后仍能以同现在一样的数量降落在

苏联的目标上。因此，对美国来说，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对付苏联的一种错误做法。”

约翰逊说，国会方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压力很大，而且国会已拨了款，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呢？麦克纳马拉说：

“我们可以这样办：在预算中列入少量的购置反弹道导弹的经费，但在预算说明书和我向国会的书面报告中写明，在我们尽一切可能同苏联进行一项协议的谈判之前，这些经费将不动用，也不作任何有关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决定。同苏联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将规定双方都不准部署反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而且都要对进攻性力量给予限制。”

美国对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进行多次试探失败后，国防部长和各军种参谋长便开会研究，认为必须扩充美国的进攻性战略武器。美国依靠自己的技术优势，研制出一种省钱的办法，就是发展分导多弹头运载工具。在每一个导弹上可安装不止一枚弹头。但美国人也担心苏联会照此办理，那就会导致双方的战略进攻武器迅速增加。所以美国一方面加紧研制分导多弹头运载工具，一方面尽力探索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经过一系列外交磋商，1968年5月，苏联终于宣布愿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谈判。促使苏联态度变化的原因是：

一是苏联缩小了同美国的战略武器差距，双方取得了大体的均势。这年美国有1054枚陆基洲际导弹，而苏联有800枚同类导弹。

二是禁止核扩散条约谈判结束，条约即将于1968年7月签署。

三是苏联在防御性战略武器问题上改变了原来的观点。1967年9月18日，麦克纳马拉宣布美国将部署一种小型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使苏联人感到担心，对苏联改变态度起了巨大促进作用。

四是苏联还有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考虑。谈判如果成功，苏联可以减轻军备压力，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美国承认苏联在军事、政治上的平等地位。

1968年7月1日，在禁止核扩散条约签订的当天，约翰逊便宣布美国已与苏联达成协议，不久将就限制进攻性和防御性战略武器开始谈判。8月份，美国提出希望通过一次首脑会晤来开始谈判进程。同月，苏联方面通知美国，苏联政府准备于9月30日举行美苏首脑会晤，以此来开始战略武器谈判。双方商定将于8月21日宣布这一决定。约翰逊对此寄予很大希望，认为有可能在自己任期结束前同苏联达成某些协议。然而，8月20日，即在决定宣布前一天，发生了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于是美国方面无限期地推迟了谈判，约翰逊的访苏计划也被迫取消。

1968年1月当选为捷克共产党第一书记的杜布切克迅速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勃列日涅夫认为这些改革是离经叛道。但宁肯拖拖拉拉办事的勃列日涅夫，仍像以往一样，继续掂量着各种危险和替换办法。他也知道武装入侵捷克会在东欧造成极大反响，并且给西方攻击苏联提供口实。美苏刚商定的进行战略武器谈判事项也将泡汤。所以他一直拖到8月中旬才决定武装入侵捷克。从军事观点看，苏军8月20日对捷克的入侵干得很漂亮的。但在政治上却是一场惨败。这次事件严重损害了苏联的国际形象，并使美苏军备竞赛加剧，冷战温度再次上升。

### 三、美苏冷战的独特韵律在60年代后期又

重复了一次：缓和与对抗同在美国侵越战争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就其干涉的根源来说，是美国决策者的一些基本观念和信念起了重要作用。这个信念的核心是维护并扩大美国的霸权地位，“遏制”共产主义。围绕这一核心产生了一些基本理论，其中历时最久、最具有地缘政治色彩的是多米诺骨牌论。它同美国人从3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教训”直接相关。1954年4月艾森豪威尔在记者招待会上首次用多米诺骨牌效应来说明阻止印度支那“沦陷”的必要性，从而使它成了流行多年的政治词汇。1956年9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其5612/1号文件中重申，如果东南亚任何一个“自由国家”被共产党控制，就将鼓励该区域其余国家的对共产党的和解倾向，由此将造成严重的政治、经济压力，并波及印度和日本。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是多米诺骨牌论坚定的信奉者。1965年11月，麦克纳马拉和腊斯克在正式建议向南越政权大量增加军事顾问和派遣战斗支援部队时，大谈美国在南越的利益，其中第一条就是南越的丧失将导致东南亚半岛其余国家和印度尼西亚走向亲共轨道，或正式并入共产党阵营。两个月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更是把菲律宾、日本、印度乃至非洲纳入南越“陷落”将造成的战略影响范围内。后来美国又把巴基斯坦、土耳其和希腊算在南越打头的多米诺骨牌系列之中。美国致力于侵略越南，当时很重要的目的是为了遏制中国。美国自其“扶蒋反共”的政策失败后，一直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中国又是个社会主义大国，美国特别恐惧中国扩大对东南亚的政治影响。把越南当作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推行美国式制度的试验场和政治橱窗。美国不仅要防止社会主义制度在越南开花结果，而且要培育一朵在第三世界土壤里生长出来的资本主义鲜花。这是肯尼迪执政时期决定美国越南政策的基本考虑。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史上，赋予一场地方性冲突以世界意义，据此显示美国的反应的，只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维持美国的威望、特别是美国力量的可信性，是在越南进行干涉和战争的全过程中始终起巨大作用的一个考虑。这就导致了一个恶性循环，受挫意味着威望受损，要维持威望便须投入更大的力量。越是到后期，美国就越明白在越南的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但为了保全面子，美国仍然硬撑着，寻求所谓体面的和平。

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逐步升级之时，正是中苏分裂和敌对关系形成之时。美国仍然对整个共产主义都持同样的敌视态度，并把对越南的侵略看成是遏制中国的关键。美国对中国的邻居大肆侵略，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安全，中国理所当然要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苏联对越南的支持则是出于维护其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权、与美国争夺东南亚这一战略要地和从南面包围中国的需要。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美国在南越就积极支持吴庭艳组建南越政权。吴庭艳，1901年生于顺化一个信天主教的大官僚家庭，曾出任过法国傀儡保大宫廷的内政大臣，不久即辞官乡居。1945年驻越日军曾邀请他出任保大傀儡政府总理一职，也被他拒绝。胡志明在越南八月革命后曾当面邀请他担任越南民主共和国内政部长，但遭拒绝。1951年秋，他前往美国，从此开始了依靠美国支持的政治生涯。在美国的约两年时间里，吴庭艳借助天主教会的安排，到处鼓吹只有依靠力求摆脱法国控制的越南民族主义才能战胜共产党人。1954年奠边府战役后，法国同保大政府签订“独立与合作条约”，吴庭艳认为时机已到，于1954年6月从已居住了一年的比利时抵达越南西



贡，出任保大政权总理，从此拥有了在越南南方统治的“权利”。不过当时他要实施统治还需要取得对他抱有敌意的法国当局的合作，而使法国允诺这种合作成了美国政府的事情。

1954年9月，美国与法国达成书面谅解：“法美两国代表同意，他们各自的政府支持吴庭艳先生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的、反共的和民族主义的政府。”同时作为对法国的让步，美国口头同意两国对吴庭艳的支持具有试验性质，如果这个试验不能在一定的期限内成功，就将另立代替者。美国与法国的这一谅解表明，美国一方面积极排斥法国在南越的势力，另一方面则对吴庭艳持保留态度。因为美国情报机构向美国政府报告说，吴庭艳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的施政要诀便是盲目仇恨法国人和不断要求美国提供援助。这样一个拙劣的领袖人物难以完成建立一个稳定和强大的南越政府的任务。

美国政府援助吴庭艳的第一项重大行动是推动“基督南下”，即用秘密手段煽动北越大量天主教徒迁往南越，以便为吴政权构筑政治基础。大约有90万人移至南方，相当于北方天主教徒总数的65%。

吴庭艳执政后致力消除打击法国殖民统治的政治基础，提高了自己在南越官兵和西贡市民中的威信。美国遂结束了动摇于扶吴与倒吴之间的不稳定政策。1955年5月，当时的国务卿杜勒斯强调：吴是唯一能挽救南越和抵抗共产主义革命的人物，美国必须全心全意支持他。随后对吴进行军事和其他援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向标榜致力民主自由建设的美国，却是在吴庭艳公开破坏日内瓦会议确定的通过普选统一越南的原则，建立了个人独裁的南越政权后对其进行大规模援助的。

1954年12月，美法两国代表签署备忘录，其中规定南越政府军的所有单位都由越南人担任军官和进行指挥；帮助南越改组和训练陆军事宜由美国军援顾问团团团长负责。这实际上是宣告美国即将取代法国控制南越政府军，并成为其主要组织者和训练者。美国军事顾问团起初为342人，后来美国不顾日内瓦会议文件的有关规定，组成了一个有350人的“装备回收与维护临时使团”（简称“装备团”）入越，以这种方式非法扩大军事顾问团。

1957年，美国再次以秘密方式扩大驻越军事顾问团，以从法军手中接过训练南越海空军的责任。至此，驻越美国军事顾问团已扩大至736人。

美国军事顾问团按照美军模式再造南越政府军，除在南越开办各类军事院校外，军事顾问团还将许多南越官兵送往美国和其他“自由世界”国家受训。南越军队按美军方式改编为7个野战师，总人数达15万人。1960年，美国官方人士称，美国已在南越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将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转变为了一支现代化军队。

自恃有美国的支持，吴庭艳在南越实行家族专制统治，被称为“东方黎塞留”。吴发动了大规模“除共运动”。到1961年底南越各监狱囚禁的政治犯已达15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越南劳动党人。在被囚禁者中许多人遭处决或被折磨至死。日内瓦会议结束后，中国和苏联都希望维持越南的和平局面。越南南方革命力量根据“越共”的指示，只能争取“和平的政治斗争”，目标是争取1956年普选的胜利。面对吴庭艳的大规模镇压，至50年代末，南方基层党组织、党员和进步群众不顾中央路线的束缚，开始以自发的武装斗争争取生存，并发展为较广泛的自发游击战。1959年，越南劳动党中央对原来的政策进行了一些修改，并开辟了“胡志明小道”和向南方成批输送干部。

久受束缚的南方革命洪流奔腾而出，很快突破中央限制。1960年9月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三大”，在南方问题上放弃了温和路线，将南方解放与北方建设置于同等重要地位，确立南方斗争的目标——推翻吴政权、建立人民政权。1960年12月成立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民解的军事组织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分为民兵、地方部队、主力部队三部分。

1961年至1963年是肯尼迪执政时期，也是美国对越干涉大幅度升级的时期。

肯尼迪十分重视“反叛乱”问题，把阻止共产主义势力在第三世界的兴起作为美国面临的最严峻任务。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就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声明发表演说。他在其中以古巴、越南和阿尔及利亚为例，颂扬了由殖民地人民起义发展至民族解放战争，说马克思主义者全心全意支持这种战争。赫鲁晓夫当时的这篇演说与其说代表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态度，不如说是以言词来应付中国等国共产党的批评和压力。然而这篇演说却给肯尼迪以极强烈的印象，被他视为主要威胁来自叛乱、颠覆和游击战的有力证据。

1961年1月肯尼迪就指示国务院，把在南越的“反叛乱”作为美国对外政策最优先的事务之一。不久他就授权增拨对南越军援4000万美元，以便使南越军队从15万人增至17万人，同时训练和装备3.2万保安队。肯尼迪还下令重新审查越南局势，并指定一名国防部副部长任关于越南的总统特别工作小组组长。10月，肯尼迪派以前陆军参谋长泰勒为首的调查团前往南越，就美国准备向南越派遣地面部队一事进行调研。11月3日，泰勒调查团正式向肯尼迪提出报告，其中除建议派遣战斗部队外，还主张采取其他一些干涉措施。主要包括：一是派遣美国武装直升机部队和提供大量轻型飞机，使南越军队具备最佳机动进攻能力；二是急剧增加驻越美军特种部队人员；三是急剧增加美国军事顾问，并使之成为一个“准战区司令部”；四是派遣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人员，援助对南越海岸与内河的警戒和控制等。泰勒调查团的报告得到了美国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美驻南越大使的支持。但国务卿腊斯克持反对态度，他主张只扩大对南越的军事援助。副国务卿鲍尔斯等人则主张谋求政治解决。肯尼迪断然排除了政治解决，并将鲍尔斯贬为“亚非拉事务巡回大使”。他也不同意派遣战斗部队，认为那可能导致北越大规模参战和中国介入。他基本同意国务卿腊斯克的建议，决定立即实施泰勒调查团除派遣战斗部队以外的建议。这个决定确立了此后三年美国顾问直接协助西贡政权作战，以打败乃至消灭解放阵线武装。这是美国干涉的重大升级，也是导致美国政府在越南越陷越深的关键步骤。美国在越军事人员由1961年的875人猛增至1963年的1.6万人。肯尼迪在作出决定时已经考虑到这些措施不能奏效的问题，因而没有排除今后派遣战斗部队和对北越实施轰炸的可能性。

一般把1965以前美国在南越的作战努力称为“特种战争”。特种战争的战略计划是以泰勒调查团报告和驻越军援顾问团“全国分区分阶段反叛乱计划”为基础的。根据这两个文件，战争的主要目标是：在中部高原地区发动攻势，阻断胡志明小道，消灭来自北越的“渗透者”；除掉越南南方革命武装的主要根据地——中部高原、西贡周围和越柬边境的解放区；摧毁其余地区的民解力量；确保业已平定地区的持久安全。战略打击的次序为：先平定西贡周围6省及昆嵩省，次平定湄公河三角洲及昆嵩以外的中部高原，最后

平定其余地区。

在这种类型的战争中美军主要运用了以下一些作战方式：

一是机载进攻。即用武装直升机运载南越地面部队实施快速打击，并且提供空中火力支援。

二是特种部队。1961年底至1962年年中，美国就向南越派遣了26个特种部队分遣队，部署在中部高原地区，履行旨在组织民团蚕食解放区的“民政”计划。

三是实施化学战。越南南方是美国首次进行大规模化学战的地方。根据华盛顿的原则规定和太平洋美军司令部制订的计划，化学战的目的是用落叶剂类药物“剥光”有利于北越“渗透”的边境丛林，杀灭解放武装所需的粮食来源。据美国军援司令部统计，1962~1964年被化学药物摧毁的植被共12.5万英亩。

四是投掷凝固汽油弹和“闭锁轰炸”。凝固汽油弹这种遭到联大决议谴责的残暴武器，竟是美国军援司令部的宠物。“闭锁轰炸”是指从空中对驻有或仅被怀疑驻有解放武装力量的村庄进行轰炸，造成大量平民伤亡。

五是“绥靖”。即用军事和政治手段把解放武装和农民隔绝开来，使解放武装成为无水之鱼。最重要的是“战略村”计划。所谓“战略村”就是把农民强行集中到由政府控制的一个个设防据点——“战略村”中去。为推行这一计划，美国与南越政权从中央到省、县、乡都成立了“战略村”建设委员会。美国军援司令部专门成立指导机构，进行监督。南越当局的一名高级官员后来承认，战略村类似集中营。

美国实施特种战争并没有促进美国与吴庭艳政权的相互信任，吴庭艳把无法控制的美国人看成是对自己统治的威胁，要求减少美国驻越人员，这引起美国方面的强烈不满。美吴矛盾加深促使南越政权同北越和民解进行秘密接触，以便试探“和平共处”的可能性。此时的美国面临三种选择：一是接受吴家兄弟统治的现状；二是撤出南越；三是等待、甚至促成倒吴政变。肯尼迪倾向于第三种选择。在美国的暗中支持下，南越军队的将领于1963年11月1日发动军事政变，政变部队按照周密制订的计划，迅速占领了电台、警察局、邮政总部和机场等要害部门，然后包围总统府。11月2日，吴家兄弟被逮捕和枪杀。杨文明上台执政。1964年1月南越原第二军区司令阮庆推翻杨文明，建立军事独裁，但西贡内部的混乱并未因此而结束。

约翰逊接任美国总统之时，正是南越局势日趋恶化之时。从约翰逊的信念、心理和性格及其决策班子构成看，他难以避免地会坚持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并将其不断升级直至发动大规模常规战争（即局部战争）。因为约翰逊承袭了美国战后全球干涉主义和全球遏制主义的基本观念。他在回忆录中曾就美国对越政策说明道：

“我关于历史所知的一切都告诉我：如果我退出越南，让胡志明穿过西贡大街，那么我恰恰做了张伯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的事情……”

一旦我们表现出有多软弱，莫斯科和北京就将火速前来利用我们的软弱。他们可能单独，也可能一起前来利用，肯定会来利用——或者通过核讹诈，或者通过颠覆，用正规军队或用其他方式……他们不可能拒绝利用这个机会来扩展他们的控制，填补我们撤离所留下的权力真空。这样就会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约翰逊宣誓继任总统后的48小时就开始召开会议，全面了解越南问题。

12月他又令正准备去欧洲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会议的麦克纳马拉取道西贡回国，详细了解越南问题。麦克纳马拉回国后向约翰逊报告说：“形势非常不好，除非今后两三个月里有变化，最近的趋势最好也不过是出现一个中立化的局面，而看来更可能的是出现一个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麦克纳马拉从西贡带回的计划草案，经五角大楼“反叛乱”专家克鲁拉克少将为首的一个部际委员会审议修改，成为著名的“34A行动计划”。1964年1月16日，约翰逊批准了该计划。“34A行动计划”自2月1日起实施，主要包括：运用U-2飞机和地面特务搜集北越情报；空投突袭小组进行破坏活动；派遣南越突袭队从海上进入北越沿海地区，摧毁重要的经济目标；派遣南越鱼雷快艇轰击北越海防设施，等等。

1964年3月，约翰逊再次派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前往南越。3月17日这两人在国家安全会议上作了汇报，并提出必须立即采取特别行动的清单。清单上包括扩大南越军队并改善其后勤供应；加强边界控制和对北越采取某种报复行动。当天约翰逊批准了麦克纳马拉清单中列举的12项行动并指示执行部门贯彻实施。

轰炸北越长期以来就是美国决策者心目中最后可用的一张“王牌”，只是因担心北越、苏联和中国会作出强烈反应而迟迟不敢实施。1964年初，南越军事形势的恶化使美国决策集团陷入强烈的悲观主义之中，要求着手轰炸北越的呼声随之高涨，并加紧了轰炸北越的准备工作。1964年6月1日，美国举行檀香山会议，驻南越大使洛奇、助理国防部长邦迪等人主张立即轰炸北越，会议确定了“逐步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6月20日，威斯特摩兰将军接任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6月23日，泰勒接替洛奇出任驻南越大使。但约翰逊尚未作出轰炸的决定，他要寻找借口和等待时机。不久他就借所谓“东京湾事件”命令美国空军轰炸北越。

7月30日夜，执行“34A行动计划”的南越海军突袭队乘美国炮艇，袭击了东京湾内两个北越岛屿——义安省海岸外的纽岛和清化省海岸外的循岛。北越立即致电印支国际监委会提出抗议，指出这一行动严重违背了1954年关于越南的日内瓦协议。当南越突袭队袭击纽岛和湄岛时，美国驱逐舰“马多克斯”号正北上东京湾，执行电子侦察任务。8月2日，该舰两次改变航线，旨在将北越鱼雷快艇群从搜索行动中吸引过来，以制造攻击事件。当天下午5时许，发现并追击“马多克斯”号的北越鱼雷快艇群在离海岸50英里处向该舰开火，“马多克斯”号在回击中击沉北越鱼雷快艇1艘。与此同时，停泊在附近海面上的美国航空母舰“提康德罗加”号出动舰载飞机，炸伤另外2艘。8月4日下午，约翰逊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立即对北越几个鱼雷快艇基地和荣市附近油库发动“报复性轰炸”，并且向国会提出给予总统广泛授权的决议案。当晚美国轰炸机从两艘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所定目标。经过60余架次轰炸，击沉或重创北越25艘鱼雷快艇，摧毁荣市附近绝大部分储油罐。这是美国对北越第一次武装攻击，标志着美国对越战争的严重升级。8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东京湾决议案”，该决议案的核心段落是：

“国会赞成和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击退对美国部队的任何武装进攻，阻止进一步侵略。

美国认为维持东南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其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与美国宪法和联合国宪章相符，并依照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

约之下承担的义务，美国准备按总统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援助求援保卫其自由的任何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成员国或保护国。”

东京湾决议案象征着美国承担了“不可逆转的义务”，美国开始越来越直接地进行越南战争；使美国行政当局获得了进行战争升级的最大行动自由；通过制造东京湾事件和欺骗公众，美国行政当局赢得了国会和美国公众的最大程度的支持。

1965年1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等人就主张使用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对越南采取更大规模的侵略行动。正当美国决策者们酝酿新的侵略行动之时，2月7日解放武装力量猛烈袭击了波来古美军基地，打死美军8人，打伤124人，摧毁美机10架。乔治·邦迪以一种“陆军元帅的精神变态”从西贡打电话给白宫，要求进行报复性轰炸，泰勒也致电华盛顿，说除进行轰炸外别无选择。当晚，约翰逊下令对北越进行报复性轰炸。邦迪在要求进行报复性轰炸时，还要求进行另一种轰炸——“雷鸣行动”。为此他向约翰逊提交的备忘录，以一种特别能打动约翰逊的语言谈论美国在越南的处境与利益：

“越南局势正在恶化，美国不采取新行动，失败看来就是不可避免的一一很可能不是在几周甚至几个月内失败，但必定在1年左右失败。现在仍有时间扭转局势，但并不多。

美国在越南赌注极高。美国的投资非常巨大，而美国的责任确凿无疑，在亚洲，甚至在其他地方的各种场合中可明显看出。美国的国际威望及其很大一部分影响，与越南问题有直接关系。没有办法把负担转移给南越人本身，没有办法通过谈判使我们自己从越南脱身……目前美国通过谈判撤退将意味着分期投降。”

在备忘录中，邦迪为促使约翰逊改变先稳定南越的政策，强调说明持续轰炸北越正是为了改善南越局势：

“即使这个政策（即持续轰炸北越——引者注）失败，它仍然值得实行。至少，它将抑制对我们没有尽力而为的指责，这种指责在许多国家，包括我们本国，将非同小可。此外，它在显示美国愿意在反叛乱中运用这种新的方式，这将为未来所有游击战冒险确立一个更高的价码，从而将多少增强我们遏阻此种冒险的能力。”

邦迪的备忘录对于约翰逊是个强有力的推动。2月13日，白宫通知美国驻南越大使和威斯特摩兰将军，在最近的将来对北纬19度线以南的北越军事目标进行持续轰炸。3月2日，“雷鸣行动”终于开始。104架美国飞机轰炸了广溪弹药库，19架南越飞机轰炸了邦村海军基地。自此至1965年底，美国就在北越上空进行了5.5万架次轰炸飞行，投弹3.3万吨，而这只是“雷鸣行动”的很小一部分。

“雷鸣行动”是美国侵越战争中又一严重的升级步骤，标志着美国的侵略行动已从南越扩大到北越，并成为导致美国地面部队侵入越南的关键因素。

美国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于1964年4月升级为局部战争，1965年3月美国地面部队开始大规模在南越登陆，并在4月15日直接参加对南越解放武装的作战。从此，开始了以美军为主并与各仆从军配合的局部战争阶段。

1965年4月和7月，美国向越南两次大规模增兵。关于第一次增兵，威斯特摩兰要求增派相当于两个师的美国地面部队，使驻越美军增至7万人，

而驻南越大使泰勒不同意大规模增兵。4月约翰逊综合多方面意见，决定向越南增派1.8万至2万美军。

第一次增兵后不久，即4月20日，麦克纳马拉、泰勒、威斯特摩兰等人在檀香山举行会议，讨论再次增兵。会议决定向约翰逊总统提议：增派美国战斗部队9个营及其后勤部队，使驻越美军从3.5万增至8.2万，外加南朝鲜和澳大利亚部队约7.2万余人。泰勒自知自己十分孤立，只得随大流。约翰逊很快批准了这项建议。6月南越少壮派军官发动政变，阮文绍上台执政。阮文绍请求美国增派10万地面部队承担作战任务。6月7日，威斯特摩兰向参谋长联席会议提议再次增派美军4万人。他说：

“我的想法基本是运用美国军队在反击和搜剿作战中打击北越——越共军队主力，从而使南越部队能集中于沿海人口稠密区、西贡周围和湄公河三角洲（从事绥靖）……”

我们一般应将美国军队集中在主要人口中心以外，可能在比较遥远的地区进行大部分战斗。”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威斯特摩兰的建议非常赞同，并在增兵问题上比威斯特摩兰更进一大步，于6月22日提出把后者建议的增兵数扩大一倍，使美国驻越部队达到44个营，总计18万人。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大力支持，并对约翰逊总统说，要使北越和“越共”相信不可能取胜，44个营是最起码的。约翰逊迟疑难决。7月22日，他同包括各军种参谋长和陆海空三军部长在内的五角大楼领导人单独会晤。这些人一致强烈要求向越南大规模增兵。海军作战部长麦克唐纳斩钉截铁地要求立即实施下列事项：一是增兵10万人；二是在1966年再增兵10万；三是把对北越的空中战争升级；四是征召现役和预备役兵员。全球遏制政策的缔造者之一、海军部长尼采进言：不打败“越共”，世界的面貌就会改变。但约翰逊仍然有所担忧。根据会议记录：

“总统：如果我们投入几十万人和几十亿美元，难道不会引致中国和俄国参战？”

约翰逊将军（当时的参联会主席——引者注）：不，我不认为它们会参战。

总统：麦克阿瑟当年也认为他们不会。

约翰逊将军：是的，但这同朝鲜不一样……

总统：然而中国有许多师可以开进来。不是吗？

约翰逊将军：是的，是这样。

总统：那么我们将怎么办？

约翰逊将军（在很长一阵沉默之后）：要是那样，我们就有另一场球要打了。

总统：我们必须考虑到他们会参战。”

这次会议后，约翰逊前往戴维营思考，这肯定是他总统任内思想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之一。7月26日他回到华盛顿，立即决定向南越增兵5万，另5万则在当年年底派出。随后驻南越美军节节增加，1966年底增至38.5万，1968年增至52.5万。这是美军在越南的最大兵力。此后便开始逐渐减少和战争降级过程。

1965年4月至1968年12月，这个以美军为主的局部战争阶段，是越南战争最残酷、最激烈的阶段。美国侵越局部战争阶段，大体上可分为在南越

的地面作战（“南打”）和对北越的空袭（“北炸”）两个战场。从战争全过程看，“南打”是重点，“北炸”是围绕“南打”而进行的。在具体做法上，有时突出“南打”，有时突出“北炸”。

“南打”战场情况：美军大规模入侵南越后，先是推行所谓“墨渍”战略，即：进驻岘港、朱莱、金兰湾、西贡等重要基地，随后对其周围进行搜索和“清剿”，建立“基地圈”，逐步向解放区渗透。1965年8月起美军开始抽调部分兵力远离基地作战。美军规模增兵后，便发动了1965~1966年的第一个“旱季攻势”，重点指向南部、东部、中部平原和西南平原。其作战意图是：集中机动兵力，寻歼人民武装主力；扩大占领区，改善美军和南越军所处的被动地位；打通交通线，特别是贯穿整个南越沿海平原的一号公路，改善后勤供应状况。但在人民武装的积极打击下，美军的作战意图没有取得成功。

美军在第一个“旱季攻势”失败后，再次向南越增兵，至1966年10月侵越美军已达32.8万人。随后从同年11月起，实施第二个“旱季攻势”。这次实行所谓“搜索与摧毁”战略，即以南越军和仆从军防守点线，集中美军主力部队进入远离基地的人民武装根据地和从北方南下的主要通道入口地区，进行长期反复的“扫荡”。企图消灭人民武装主力一部，摧毁解放阵线和人民武装的首脑机关；破坏根据地、蚕食解放区；堵死越柬、越老边境走廊，切断人民武装的外援。在第二次“旱季攻势”的6个月中，美军进行团级以上规模“扫荡”105次。对解放区的破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南越人民武装则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进行多次反“扫荡”作战，并趁美军进行“联络城扫荡”之机，在非军事区南侧开辟新战场，两次攻占南越北部重镇广治市，迫使美军抽调兵力北上驰援。美军第二个“旱季攻势”同样没有达成目标。

美军在第二个旱季攻势失败后，在威斯特摩兰将军的要求下，美国政府再次增兵南越，至1967年9月，侵越美军总兵力达46万人。威斯特摩兰调整战场部署，摆出实行南北夹击之势，发起第三个旱季攻势，企图通过这次攻势，集中兵力“摧毁越共主力”，进而基本解决越南战争问题。但南越人民武装在粉碎美军第二个旱季攻势后，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于1967年雨季刚结束便发起进攻，对南部的西贡地区、中部的越老边境和北部的九号公路进行了一系列进攻。1968年1~2月，在南越全境发动大规模的“新春攻势”，重点袭击包括南越总统府和美国大使馆在内的敌军政首脑机关、重要机场、电台和仓库等要害目标。

美军在三年的地面战争中不仅没有消灭南越人民武装，人民武装反而不断壮大。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因侵越战争久拖不决而争吵不休。约翰逊遂于1968年3月撤销威斯特摩兰的职务，由副司令艾布拉姆斯接任侵越美军司令。艾上台后开始收缩兵力，调整部署，重点加强西贡、岘港等大城市和17度线南侧的防御作战。

“北炸”战场情况：美国把在南越战场不能取胜的原因，主要归于没有切断越南北方对南方的支援以及中国和苏联对越南的支援。为了孤立越南南方战场，美国除破坏从越南北方通往南方的陆海空交通外，还对北越进行了大规模轰炸，以期削弱北越的战争潜力和抵抗意志。从1965年2月7日对越南北方的大规模空袭开始，至1968年10月31日约翰逊宣布“全面停炸”时止，历时3年另8个月。

1965年2月7日起至1966年5月，是空袭的逐步升级阶段，轰炸的重点是20度线以南地区。1965年3月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切断交通线计划”，美军突破20度线的界限，将空袭扩大到河内——老街和河内——友谊关铁路线以及河内、海防周围地区。到1966年春，北越在河内、海防以南的重要交通线已全部遭受过猛烈轰炸。

1966年6月至1968年3月进入全面轰炸阶段。美机轰炸了河内、海防的油料、工业和交通系统，并多次轰炸机场、水利工程和居民区。轰炸的强度大大增强，平均每天出动飞机300架次，最多1天达790架次。

1968年4月至10月为“部分停炸”到“全面停炸”阶段，约翰逊迫于政治、经济危机和国内外的压力，于1968年3月抛出了“部分停炸”方案。此后美机即集中轰炸19度线以南到非军事区的狭长地带。在越、美第28次巴黎会谈后，美国宣布从1968年11月1日起，“全面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和炮击，只是每天平均出动10架左右的各型侦察机对越南北方进行各种侦察活动。

美国对北越的轰炸1965年共出动飞机5万架次，投弹3.3万吨，1966年为14.8万架次，投弹12.5万吨，1967年为13.2万架次，投弹24.8万吨。到1968年10月下旬，美国空军已炸死北越平民5万余人。

北越在抗击美国的轰炸中，在中国和苏联援越部队的支援下，积极组织群众性防空斗争，对重要物资进行疏散和隐蔽，高射炮兵利用有利条件快打快撤，终于挫败了美军的轰炸，使美国空军付出了高昂代价。

尽管当时中国与苏联已公开决裂，但在谴责与反对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和侵略上，两国是一致的。两国还达成了通过中国铁路运送苏联援越物资的协议。1964年8月2日，美国制造东京湾事件后，中国政府在8月6日的声明中强烈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声明说：

“美国点起了侵略战火，越南民主共和国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动权力，一切维护日内瓦协议的国家也取得了支持越南民主共和国反侵略的行动权力。……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

1965年春，胡志明秘密来华访问，请求中国援越抗美。毛泽东对他说：“胡主席，你来自越南，我来自湖南，咱们是一家子嘛！有什么困难？要人有人，要物有物，你说。”

胡志明通晓汉语，他闻言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绘制着越南河内以北要抢修抢建12条公路的示意图。

1965年4月，中越双方分别由刘少奇和黎笋为代表在北京会谈，中国方面答应越方请求，同意派出部队进行援越抗美斗争。1965年6月中国第一批援越部队进入越南，此后中国的工程部队、铁道兵和高射炮兵先后入越作战，前后达数十万人。中国还向越南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军用和民用物资，有力地支援了越南的抗美战争。

随着赫鲁晓夫于1964年下台，苏联开始积极支持越南抗美战争。勃列日涅夫上台3星期便向访苏的范文同表示，苏联将增加对越南的支持，并保证在北越遭到美国进攻时予以支持。

1965年2月6日至10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领苏联代表团访问越南，与越南领导人举行会谈。在柯西金访问期间，美国空军于2月7日和8日对北越洞海市和永灵市进行轰炸，对苏联施加压力。苏联政府发表声



明，说苏联面对美国的这种行动，将不得不同自己的盟国和朋友一道采取进一步措施来保卫越南的安全和加强其防御力量。

1965年2月5日和2月10至11日，柯西金两次在北京停留，双方在会谈中谈到了对越南的支援问题。

苏美关系本身的发展也受到越南战争的影响，用勃列日涅夫1965年9月的话来说，由于美国在越南的行动，美苏关系“趋于冻结”。1966年苏联同越南在莫斯科签订苏联向越南提供无偿援助协定，苏联对越南的援助逐年增加。

中国和苏联对越南的援助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战争，使美国在亚洲打了又一场难以打赢的战争。

不过，当时苏联增加对越南的援助也有在越南政权内部培植亲苏势力，以便将来利用越南牵制中国的意图。

美国侵越战争不仅难以阻止南越局势继续恶化，而且使美国自身付出了沉重代价。

在南越战场的美军，士气低落，纪律废弛。在战场上，消极避战情况越来越严重，“保命回家”成了美国士兵的流行语。

美国侵越战争付出的财政代价十分高昂。据美国预算局估计，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1965年为1亿美元，1966至1968年分别增至68亿、201亿和270亿美元。从1965年起美国财政赤字连年增加，总计近400亿美元，超过以往19年的赤字总和。越战削弱了美国的经济地位。

越战影响了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1968年1月朝鲜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扣留了美舰“普韦布洛”号，约翰逊政府虽极为恼火，却因远东美军全部困在越南战场而不得不收敛往常的霸道行径。美国军费大部用于越战，无钱进行大规模国防科研和军事装备更新，受危害最大的是驻欧美军。由于没有财力大量发展核武器，美国逐渐失去了对苏联的核优势。苏联利用美国陷入越战之机，加强了在中东等地与美国的争夺。

越战激起了美国反战运动的兴起与高涨。反战运动与美国民权运动、学生运动和反文化运动密切结合、彼此激励，使美国社会陷入巨大动荡之中。侵越战争还直接导致了约翰逊竞选连任的失败。

“六·五战争” 60年代末期美苏在中东的争夺和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的冲突导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亦称为“六·五战争”。

热线是连接莫斯科和华盛顿的一项特种电传打字机线路。美国技术人员称之为“莫林克”。其用途是使苏联和美国领导人遇到严重危机时刻能立即相互通气。这条线路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不久，即1963年8月23日就安装好了，但除了试试它的有效性及在新年相互发些恭贺新禧的电文外，还没有按照其本来的用途使用过它。

1967年6月5日凌晨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进行突然袭击，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代表苏联政府急忙来到设在克里姆林宫的热线旁，要通了华盛顿：“我要约翰逊总统通话！”

在华盛顿，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按照以往的习惯，早晨7点便来到五角大楼上班。一会儿，作战值班室的将军打电话向他报告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要求在热线上通话。麦克纳马拉不解地问：“为什么给我打电话？”值班将军回答：“热线的终端设在五角大楼里。”

麦克纳马拉感到十分震惊。他担任国防部长已经三年了，从未使用过热

线，竟不知道热线的终端装置安在他的办公楼下。他立刻愤怒地对那位将军说：“我们每年的国防费数百个亿，为什么不拿出点钱来把线路接通到白宫去？你必须在15分钟内把线路接通到白宫！”。

麦克纳马拉打电话给约翰逊。此时约翰逊尚在熟睡中，夜间负责电话值班的空军军士说：“总统还在睡觉。”麦克纳马拉不客气地说：“这个我知道，你告诉总统，麦克纳马拉部长要求他醒来。”当值班军士把约翰逊叫醒后，约翰逊拿过话筒，用困倦和粗鲁的声音说道：“该死的，什么事啊？”麦克纳马拉说：“柯西金主席要你在热线上谈话，我怎么答复？”

约翰逊马上行动起来，召集国务卿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一起来到白宫的情况室接收来电，这时五角大楼的那位值班将军已想办法把热线接到了白宫。几分钟后，柯西金的信件就传了过来。

柯西金在信中表示了苏联对这场中东战争的关心。柯西金说，苏联政府愿意为实现双方停火而努力，并希望美国能够向以色列施加压力。约翰逊答复说，美国政府愿意施加一切影响以结束这场冲突，并对苏联也打算这样做感到欣慰。

这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既激烈对抗又尽可能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的一次生动说明。

1956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后，以色列认为自己没有达到战争目的，时刻准备重新挑起战端。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很深。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强调要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利。但美国为了维护自己在中东的霸权和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防止苏联向中东渗透与扩张，不愿过份得罪阿拉伯国家。更因为这时美国已深深卷入越南战争，无力在中东进行大规模战争。所以美国此时的中东政策的基调是在偏袒以色列的同时，尽力维护中东地区的现状与和平。

苏联利用阿以矛盾特别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急需军事和经济援助的机会，把自己扮演成阿拉伯人民的朋友，不断向中东渗透和扩张势力。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就成功地通过对埃及阿斯旺水坝的援建加强与埃及的关系。勃列日涅夫更是不遗余力向地中海、非洲和毗邻的印度洋地区内扩充势力，以建立一个牢固的中东基地。苏联领导人公开要美国从地中海撤走第六舰队，取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苏联向中东渗透和扩展势力引起美国极大不安。约翰逊政府担心，如果苏联真的控制了从摩洛哥到伊朗这一广大地区的海洋、石油和空间，那么，美国从社鲁门总统以来在中东取得的霸权将丧失殆尽。因此美国采取各种措施阻止苏联扩展势力。在中东这个利益交叉区和超级大国激烈争夺地带，中东每一次冲突和战争，不仅仅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间的战争问题，而且包含着苏联和美国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国之间面对面的冲突。1966年起中东地区形势又趋紧张，面临着深刻内部危机的以色列表现得格外具有侵略性。这年10月，沿着以色列和叙利亚边境的冲突开始升级。1967年4月7日，几十架以色列飞机闯入叙利亚领空，击毁了叙利亚的6架战斗机。5月15日，根据苏联方面转告的以色列即将进攻埃及的不准确情报，埃及宣布军队进入戒备状态。两天后又下令封锁蒂朗海峡，禁止任何以色列船只及向以色列运送战略物资的其他国家的船只通过，并要求联合国从西奈半岛撤出维持和平部队。联合国很快同意了埃及的要求，将维持和平部队撤出了西奈。5月19日，以色列下令全国总动员，战争危险陡然增大。这时美苏双方都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声称以色列侵略

者不仅会遭到阿拉伯国家联合部队的抵抗，而且会遇到苏联和所有爱好和平国家的反对。5月22日，约翰逊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提出采取联合行动，使局势缓和下来。电文说：

“以叙利亚为基地的某些人的作为使以色列日益不安，以及由此而来的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反应，这一切均使该地区接近于爆发一场重大的暴力行动。你我双方对该地区不同国家所保持的联系，可能会导致我们陷于困境，但我确信这决不是我们双方所希望的。我们彼此间的任何一方充分施加影响以缓和局势，其中也包括我们对联合国采取的行动施加影响在内的时机，我认为已经到来。”

5月23日美国在一项总统声明中，谴责埃及的纳赛尔总统封锁海峡是“不合法的”，“对和平事业有着潜在的巨大破坏作用”。同时，又重申支持中东地区所有国家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后一点实际上是偏袒以色列的，因为阿拉伯国家不承认以色列。

美国还积极联合西方国家，准备采取联合行动对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5月24日，英国外交大臣汤普逊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并提出了一项方案。该方案分两步：第一步是发表一个公开声明，邀请尽可能多的国家签署，重申自由通过蒂朗海峡的权利；第二步是建立一支海军特别舰队，由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海军舰只组成，冲破埃及的封锁，开放蒂朗海峡。美国和英国竭尽全力争取其西方盟国，但直到战争爆发的前一天，包括美国、英国和以色列在内总共才有8个国家同意这样做。其他几个国家是荷兰、澳大利亚、冰岛、比利时和新西兰。另外五个国家——西德、阿根廷、葡萄牙、加拿大和巴拿马——则还在继续研究美英的建议。

美国与以色列进行了多方面的外交磋商，试图阻止以色列发动战争。5月26日，约翰逊与来访的以色列外长阿巴·埃班进行了会谈。美国告诉埃班说，并没有可靠情报表明阿拉伯国家正在准备发动一场进攻。埃班问：“为了使蒂朗海峡重新自由通航，美国打算做些什么？”

约翰逊答复说：“美国的立场是一贯的，就是海峡的自由通航应得到保证。美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证开放海峡。美国将通过联合国来进行。如果联合国不行，那么以色列及其盟友，包括愿意同你们站在一起的美国在内，届时都会提出他们该怎么办的明确做法。”

约翰逊提醒埃班：“部长先生，关键是贵国决不能作为一个爆发任何战争的责任承担人。”约翰逊最后加重语气说：“以色列决不会孤立，除非它决心独行其是。”

埃班沉默不语，快到会谈结束时，他字斟句酌地问道：“如果我没听错的话，我是否可以告诉我们的总理，你们的立场是采取一切可能以保证（蒂朗）海峡和（亚喀巴）湾自由而不受损害地通航？”对此，约翰逊说就是这个意思。

5月28日，以色列内阁决定暂停军事行动，并通知美国说，在一两个星期内应保证海峡的国际通航。这就等于说，如果超过这个时限还不能使海峡通航的话，以色列将不顾美国等国的劝阻而向阿拉伯国家发动进攻。

在美国积极展开外交活动的同时，阿拉伯国家在积极寻求苏联的支持。5月25~26日，埃及国防部长巴特朗、外交部副部长费基访问苏联，同柯西金、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外长葛罗米柯就中东局势进行了会谈，柯西金虽然表示苏联支持阿拉伯国家的立场，但同时明确表示：苏联希望在中东避免一场战

争。

5月29~30日，叙利亚国家元首阿塔西对苏联进行了短暂的访问，请求苏联给予军事援助，苏联表示同意，但没有采取积极行动。

正当美苏为避免在中东迎头相撞而分别对以、阿双方施加压力时，以色列却加紧进行发动战争的准备。内阁已对开战问题进行了多次研究。5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出现了主张立即开战和主张48小时后再行决定两种对立意见。表决的结果是9票对9票，谁也没有压倒谁。最后，是以总理作出推迟开战的决定并通知美国的。

5月30日，埃及、约旦缔结了共同防御条约。这个条约连同1966年11月埃及、叙利亚签定的共同防御条约，使以色列面临三个方向的威胁。6月1日晚以色列组成各党派联合政府，主张立即开战的强硬人物在内阁中的比例增大了，并决定达扬出任国防部长。外交部不再对开战持异议。

6月3日这一天，发生了三件事，一件是伊拉克军队和埃及军队到达了约旦；一件是法国发表了对以色列武器禁运的声明；再一件是以色列收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给以总理的信件。信的内容是：“我必须强调，以色列有责任不采取敌对行动。以色列只要不独断专行，它是不会孤立的。……我希望以色列保持领土完整，我已告诉埃班外长，美国为确保以色列及其邻国的和平与自由，将尽可能地给予有效的支持。我还想强调同别国共同行动的必要性。……我们领导人在不单独行动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约翰逊还补充说，“以色列应采取的行动取决于它自己。”约翰逊这封措词含糊的信被埃班压了数天，以色列领导人从这封信中得出的印象是，即使以色列主动挑起战争，美国也不会把它视为非友好国家，在这种条件下，苏联就不敢介入。应该说，以方的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6月4日，以色列内阁经过7小时讨论终于决定开战。决心集中运用空军，实施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夺取胜利。

1967年6月5日凌晨，以色列借口埃及封锁蒂朗海峡，向埃及、约旦等国发动突然袭击。以军趁埃军开饭和军官上班前戒备松懈之机，集中使用200架飞机空袭埃及空军基地，两小时内便将埃军大部分飞机摧毁于地面。尔后又击毁叙利亚、约旦大量飞机。随后以色列出动22个旅的兵力实施多路闪击，仅4天时间就攻占了埃及的西奈半岛、约旦河西岸及耶鲁撒冷的约旦管辖区。第三次中东战争的大局已定。

战争爆发后，美苏两国都展开积极外交活动。两国都谋求通过联合国向交战双方施加压力。在美苏的推动下，6月6日安理会通过一项简短决议：“要求所有有关的政府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达到停火目的，结束所有在中东的军事行动。”

由于军事上的失败和受到苏联的压力，约旦和埃及分别在6月7日深夜和6月8日宣布实行停火。而以色列一面虚假表示愿意接受停火，一面调集重兵向叙利亚发动全面进攻，很快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通往大马士革的几条主要公路。

在中东危机期间，美国总统约翰逊和他的主要幕僚大部分时间都躲在白宫设有热线的情况室里。常常是一边吃奶油拌鸡蛋，一边研究来自苏联的信件。6月10日这天早晨，柯西金给美国总统发来措词强硬的信件，柯西金指责以色列无视安理会一切关于停火的决议。柯西金说，目前已处于一个“十分危急的时刻”，如果以色列不在此后几小时内无条件地停止军事行动，苏

联将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军事上的措施”。约翰逊对“军事上”几个字备感刺眼，让俄文翻译重新校译，看看是否译错了，当他得知译文是正确的后，顿时感到情况严重。约翰逊立即与助手进行磋商。他转向麦克纳马拉问道：

“第六舰队现在在哪里？”

麦克纳马拉拿起话筒，问了一下五角大楼作战值班室。然后回答说：“第六舰队在叙利亚海岸西面 300 海里的洋面上。”

“这些军舰通常航速多少？”

“大概每小时 25 海里。以通常速度计算，到叙利亚海岸，大概需要 10 ~ 12 小时。”

约翰逊决定对柯西金的强硬态度和苏联可能采取的行动作出反应。他告诉麦克纳马拉，命令第六舰队立即改变航向，开到离叙利亚海岸 50 海里洋面上（平时都在离叙海岸 100 海里处）。麦克纳马拉通过电话发布命令后，在场的众人表情严肃，默不作声。

约翰逊知道，美国调动第六舰队的行动苏联很快就会知道。他正是想让苏联人放弃采取军事行动的念头。当时，联合国对以、叙双方的停火调解已接近完成。于是，约翰逊又通过热线告诉柯西金，美国已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不久以就会宣布停火。这样柯西金才逐渐缓和了口气。

6 月 10 日以色列宣布停火，两天后叙利亚也宣布停火。实际上中东战争在 10 日这天即已结束，前后一共进行了 6 天。

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共动用了 27 万兵力，埃、约、叙三国动用了 30 万兵力。阿拉伯国家伤亡、被俘 6 万余人，损失飞机 450 架，丢失领土 6.57 万平方公里。而以军仅伤亡 3700 余人，损失飞机 30 余架。

阿拉伯国家所以遭此惨败，主要是由于在第二次中东战争后骄傲轻敌，又过份信赖苏联。苏联先是压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平解决争端，在战争爆发后因担心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而不敢采取军事行动，也没有给阿拉伯国家以切实有效的援助。而美国虽然曾对以色列施加影响，以使中东问题和平解决，但当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后却对以色列给以声援和实际援助，并对苏联要介入的表示作出强烈反应，从而慑止了苏联的行动，使以色列得以放手继续其成功的军事行动。

面对失败的惨景，阿拉伯国家的人民沉浸在一片痛苦之中。埃及总统纳塞尔的心情更加沉重。他在战争结束时发表电视讲话向人民请罪并要求辞职。他说：“战争失败了，我承担全部责任，我决定放弃在政府中的一切职务。我对不起人民，如果人民判我有罪，把我绞死在解放广场，我也心甘情愿，人民是有权这么做的。”这篇感人的讲话，深深打动了人民的心，他继续赢得了人民的信任。开罗成千上万的群众涌上街头，高呼“要求纳塞尔留任”、“打倒约翰逊”、“打倒柯西金”和“抗战雪耻，收复失地”等口号。

第三次中东战争对美苏在中东的影响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苏丹、叙利亚和也门在战争爆发后便宣布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美国在阿拉伯世界陷入空前孤立地位。苏联在中东战争中的表现使阿拉伯世界对其动机和能力产生了怀疑，从而削弱了苏联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战后阿拉伯世界想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以便报仇雪耻，但苏联在提供武器装备方面提出各种限制，并想趁机加强对阿拉伯国家的控制。纳塞尔曾多次抱病前往苏联请求援助，但苏联提出的条件十分苛刻，1970 年 9 月气病

交加，含恨而死。继纳塞尔任总统的萨达特终于作出了驱逐苏联军事顾问的决定。

第三次中东战争成为后来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直接诱因。不甘心失败的阿拉伯各国在这次战争后加紧战争准备，终于引发了 1973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虽然夺取了大片阿拉伯领土，但从此也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陷入更加紧张的境地。

## 第八章 第二次缓和

到 60 年代末，国际环境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虽然美苏仍是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但西欧、日本和中国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都有了新的重要发展。大国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调整，中苏同盟关系实际上已彻底破裂，西欧、日本对外政策的独立自主倾向进一步加强。就美苏关系来说，双方在战略核力量方面真正形成了大体的均势，美国已经丧失了多年来一直拥有的优势。同时，美国一直谋求充当“国际宪兵”，但其目标与能力、欲望与力量之间的矛盾变得越来越尖锐，苏联则主要为经济困难所缠绕，这促使双方都需要进行对外政策的战略调整。这一调整导致了美苏关系的第二次缓和。

### 一、“尼克松主义”为 70 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为“缓和”东西方关系开辟了道路

在 1968 年的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人理查德·尼克松以微弱多数击败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当选为美国第 37 任总统。

1969 年 1 月 20 日，尼克松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他步入白宫之时，面临着历史上许多美国人所未曾经历过的严峻形势。美国因越南战争的沉重负担以及国内经济、政治与社会危机的发展而走向相对的衰弱。为了使美国在力量相对削弱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住霸权地位，他同基辛格等人立即着手对美国的全球战略进行重大修订。

尼克松是战后第一个以政界核心人物、真正的职业政客的身份入主白宫的共和党人。在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他曾任两届副总统，多次作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特使出使国外，积累了丰富的处理国际问题和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早在 1967 年 10 月，尼克松就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论文指出，越南战争使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处于严重的紧张状态，今后亚洲的共产主义应由亚洲国家加以抑制，美国给予大力支持，但美国的国际宪兵作用肯定是“有限的”。他担任总统后，优先考虑外交事务，并且始终把制订对外政策的权力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1968 年竞选期间，他曾说过：

“我一向认为，这个国家在内政方面可以自治，无需总统。你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胜任的内阁来管理国家内部事务而已。你们需要总统制订对外政策。国务卿其实无足轻重。总统制订着对外政策。”

尼克松当选后，对内阁班子的任命体现了他的思想。在他任命的顾问和内阁成员中，无论在地位上或影响上首屈一指的当推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前哈佛大学教授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是来自德国的一名犹太籍移民。1938 年，15 岁的基辛格为躲避反犹太主义的迫害，随家人逃到美国纽约。二战结束后，进哈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他对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进行了深入研究，并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在其成名作《核武器与对外政策》一书中提出的所谓“有限战争”的战略思想曾经对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也因此成为美国外交政策思想库中的一位著名人物。基辛格对梅特涅的思想和他奉行的“均势”外交政策作过认真研究，从中得出了他对外交政策、均势政策、“国际秩序”以及所谓“和平结构”的看法，这些看法同尼克松政府以后推行的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1969 年 7 月 25 日，尼克松在关岛的一个军官俱乐部同随行记者举行了

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作了一篇不供直接引用的外交政策演说。尼克松说：

“我认为，时至今日，美国在同我们所有的亚洲朋友的关系方面，要强调两点：一，我们一定要遵守条约义务，例如根据东南亚条约组织对泰国承担的条约义务；二，就内部安全问题而言，在军事防务方面，除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的威胁以外，美国要鼓励而且有权利期待，这个问题将越来越多地由亚洲国家自己来处理，而且这样做的责任也由它们来承担。”

尼克松的关岛声明起初被人们称为“关岛主义”，立即引起了各方不同的反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曼斯菲尔德则称这次谈话为“尼克松主义”。它向人们发出的主要信息是：美国将不再卷入像越南战争那样的战争，并将减少在亚洲承担的军事义务，但同时将以新的形式对这个地区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

同年11月3日，尼克松对全国发表广播电视讲话，正式公布美国今后对亚洲政策调整的三项原则：

“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

“如果一个核国家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它的生存对我们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自由，我们将提供援助。”

“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我们将在接到请示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是我们将指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主要责任来提供其防务所需的人力。”

1970年2月，尼克松向美国国会递交的对外政策报告中，把“尼克松主义”的中心思想解释为：

“美国仍将参与盟国与友邦的防卫和发展。但是……美国不能也不会为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设想和拟定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策，承担全部防务责任。如果我们的援助能在某地显著生效，并且这样做对我们有利的的话，我们将会提供援助。”

报告强调，“尼克松主义”的三根支柱是“需要实力地位、需要伙伴关系和需要谈判的诚意”，即美国对其盟国改变家长作风，建立较为均衡的伙伴关系，以鼓励盟国承担更大的责任；对敌手采取灵活态度，进行对话或谈判，以实现力量平衡；无论对盟国还是对敌手，美国的政策都必须以实力为后盾。这就把关岛谈话从对亚洲的政策推广为全球政策，从一种国家安全政策推广为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处理盟友关系以及对苏对华关系的指导方针。

“尼克松主义”为70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这就是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美国仍将肩负大部的重担和责任，但要求其他国家必须比以前更多地分担责任。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

“在关岛宣布的尼克松主义，被有些人误解为一种将导致美国完全撤出亚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一种新政策的信号。在我回国后的一次例行的早餐会议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迈克·曼斯菲尔德就表达了这种错误的理解。一如我对我们亚洲各国的朋友所作的解释一样，我对曼斯菲尔德强调说明，尼克松主义不是一个使美国退出亚洲的方案，而是一个为美国继续留在亚洲并继续负起责任以帮助非共产党国家、中立国家和美国在亚洲的盟国保卫其独立提供唯一牢固基础的方案。”



“尼克松主义”使美国终于实现了结束越战的目标，摆脱了战争带来的沉重负担。而且它的实施还使美国缓和了同苏联的关系，打开了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的大门，从而使美国的对外关系进入了一个以“缓和”东西方关系和收缩美国海外力量为特点的新时期。

## 二、勃列日涅夫改被动防守为主动攻击，提出6点“和平纲领”

1964年10月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吸取了其前任的某些教训，并根据苏联经济、军事实力的发展，对苏联对外战略进行了较大幅度的调整，逐步形成了以称霸世界为目标的全球战略。

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以美国为主要对手，但其主要战略目标不再是赫鲁晓夫所追求的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而是力图超过美国，称霸全球，并且由过去以防守为主，转而采取进攻的态势。

在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中，有三条主要战线。苏联的战略重点仍在西线欧洲，在兵力和核武器部署方面把欧洲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强化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提出“有限主权论”和“国际专政论”，以确保对东欧的控制，同时通过军事威慑、政治缓和和经济贸易往来，争取西欧，分化欧美关系，逐步挤走美国势力。在东线亚太地区，大力加强军事部署，以排挤美国，威胁中国和日本，加紧拉拢越南黎笋集团充当苏联反华和推行南下政策的工具。在东西两线一时难以突破的情况下，苏联更加重视南线，特别是以“欧洲的软腹部”中东和非洲地区作为主要扩张方向，同时进一步打入南亚次大陆，控制南下印度洋的战略通道。勃列日涅夫的全球战略仍以军事力量为主要支柱，他不仅继续在核武器方面加紧追赶美国，而且大力发展常规部队。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重视推行缓和政策。1971年3月30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就美苏关系指出：“苏美关系的改善，将符合苏联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符合巩固和平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美国在世界各地的侵略行动。最近美国政府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其中包括在涉及苏联利益的那些问题上的立场更加强硬了。在美国对外政策中频繁出现的曲折，也使得同美国打交道复杂化了。看来，这种曲折也是与某些权宜的国内政策手腕有关的。

我们的出发点是，苏美两国之间关系的改善是可能的。我们对资本主义国家，其中包括对美国的政策性路线是，在实践中始终不渝地完全地实行和平共处原则，发展互利的联系，而同那些愿意在加强和平方面进行合作的国家进行这种合作，并使同它们的相互关系具有最大程度的稳定性。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我们所遇到的，是真正愿意在谈判桌上解决问题，还是企图推行‘实力地位’政策呢？”

勃列日涅夫还在报告中提出，苏联将“以积极保卫和平和加强国际安全的政策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并正式提出了6点“和平纲领”，即：

第一，消除在东南亚和近东的战略策源地，在尊重遭受侵略的各个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利的基础上促进这些地区问题的政治解决。

立即给予任何侵略行动和国际上的专横行为以坚决的回击。为此，也应当充分利用联合国的可能性。

不使用武力和不以使用武力相威胁来解决争端，这应当成为国际生活的法则。苏联方面建议同样持这种态度的国家缔结相应的双边的或地区性的条约。

第二，以最终承认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形成的领土变更作为出发点，在这个大洲上实现导致缓和紧张局势与和平的根本转折，保障召开全欧会议并使其成功。

为保障欧洲集体安全而尽一切努力。我们重申防御性的华沙条约缔约国共同表达的下述意愿：同时解除这个条约和北大西洋联盟，或者以撤销它们的军事组织作为第一步。

第三，缔结禁止核武器、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条约。

争取使大家在所有地方都停止核武器试验（包括地下试验）。

促进在世界各个地区建立无核区。

我们主张所有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裁减核军备，主张为此目的召开苏联、美国、中国、法国和英国五个核大国会议。

第四，加紧为停止一切种类的军备竞赛而斗争。我们主张召开世界会议来通盘讨论裁军的问题。

我们主张撤除外国军事基地。我们主张在那些军事对峙特别危险的地区，首先是在中欧，减少武装部队和军备。

我们认为，制定一些措施来减少偶然发生或蓄意制造军事事件的可能性，及其酿成国际危机和战争的可能性，是适宜的。

苏联愿意就削减军费，首先是削减各大国的军费的问题进行协商。

第五，联合国关于消除残存的殖民政权的决议应当得到彻底实施。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的表现应受到普遍的谴责和抵制。

第六，苏联愿加深同各国在各方面的互利合作关系，如果这些国家也希望这样做的话。我们愿与其他有关国家共同解决下列问题：保护自然环境，开发动力资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发展运输和通讯联络，防止和消灭最危险的和常见的疾病，考察和征服宇宙和世界海洋。

勃列日涅夫希望通过缓和政策，稳定欧洲现状，分化美、欧、日关系，引进西方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争取时间，夺取对美国的全面优势。

### 三、德国问题是美苏争夺的焦点，也是东西方关系的晴雨表。勃兰特推行“新东方政策”，揭开了东西方缓和的序幕

1969年，联邦德国（又称西德）举行大选，社会民主党领袖勃兰特获胜，组成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勃兰特上台后，正式宣布推行“新东方政策”，主要内容是：在加强与西方合作的同时，积极同东方达成谅解；承认战后欧洲现状，改善与苏联和东欧的关系；承认两个德国并存的局面，发展相互间的关系。“新东方政策”的提出，揭开了东西方缓和的序幕。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出台，有着特定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邦德国地位削弱，军事上主要依赖美国的保护，经济上需要美国的扶植，政治上作为战败国受到多方牵制，阿登纳时期政府基本上推行追随美国，向西方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同苏联、东欧关系处于严重对立状态。1955年，联邦德国虽然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很快宣布了“哈尔斯坦主义”，声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单独代表整个德国，不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又称东德），不同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交的任何国家（除苏联外）建立外交关系。到了60年代，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由于深陷越战“泥潭”，力量受到严重削弱，美在军事、经济上对苏的压倒优势逐渐丧失，在军事领域出现了“核恐怖平衡”，美苏在激烈争夺的同时，为避免迎头相撞，又谋求妥协，

这使阿登纳政府推行的对美一边倒的政策陷入困境。本来，德国问题是美苏争夺的焦点，也是东西方关系的晴雨表。但到 60 年代，美国开始寻求在维持德国分裂的情况下与苏联妥协，苏联则早在 50 年代就公开推行两个德国的政策，这使联邦德国领导人感到再也不能指望美国去彻底解决德国问题。当时任西柏林市长的勃兰特较早地注意到这个问题。他认为，不承认存在两个德国的现实和拒绝与苏联之外的“东方”进行交往与对话，只能使联邦德国继续处于冲突漩涡的中心，而且这种自我封闭也无助于德国统一的最终目标。他在 1962 年 5 月的社会民主党科隆代表大会上指出：“德国的分裂是希特勒主义的结果，是东西方冲突所造成的。因此，重新统一只有同东西方关系的改变联系起来才有现实意义。”从此，勃兰特开始设想新的东方政策，希望通过逐步接近来实现东方政策的转变。

1966 年 12 月，勃兰特领导的社会民主党参与联合执政，勃兰特出任副总理兼外长，使其新东方政策的构想有机会试行。在他的影响下，政府明确表示愿意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改善关系。1967 年 1 月，联邦德国与罗马尼亚建立了外交关系，打破了不与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除苏联外）建立外交关系的先例，第二年又与南斯拉夫实现了关系正常化。

在 1968 年 3 月召开的社会民主党纽伦堡代表大会上，勃兰特表示愿意尊重《波茨坦协定》划定的德国边界：奥得—尼斯线。这在改善与东方关系上又进了一步。但就在联邦德国向东方接近时，苏联出于其本能的警觉，怀疑德国的主动行动可能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场阴谋，企图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打入分裂的楔子。1967 年 4 月召开的欧洲共产党卡罗维发利会议宣布，在首先取得东德同意之前，东欧将不再与联邦德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重申与联邦德国关系正常化要以西方承认东德为前提。1968 年，苏联等华约六国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给新东方政策蒙上了一层阴影。苏联政府 1968 年 9 月 3 日还照会指责联邦德国为西方颠覆东欧的桥头堡，苏联舆论还扬言苏联有权根据《联合国宪章》与《波茨坦协定》对联邦德国进行干预，以防止“德国军国主义与纳粹主义的复活”。

勃兰特并没有对苏联的过激言行作出相应反应，而是从苏联的反应中更强烈地体会到联邦德国处于东西方冲突前沿的危险性，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德国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在社会民主党 1969 年 9 月大选获胜，勃兰特出任社会民主党—自民党联合政府总理后，勃兰特决心采取实际步骤大力改善与东方的关系。而此时，苏联由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使勃列日涅夫当政以来力求树立的和平形象受到严重损伤，西欧公众舆论开始重新评论北大西洋联盟的作用和美国在欧洲继续存在的必要性，而一些追随苏联的西欧共产党也在国内舆论和政治压力下谴责或疏远苏联。于是，勃列日涅夫又举起了缓和的旗帜，一方面发起新一轮欧安会倡议，另一方面积极着手修复与西欧国家的双边关系。由于勃兰特的新东方政策得到苏联的响应，因而进展很快。

1970 年 8 月，勃兰特访苏时与苏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它们之间的任何争端，并承担义务在欧洲安全与国际安全的事务中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两国保证“毫不保留地尊重所有欧洲国家在其现有边界内的领土完整和宣布“对任何国家都没有领土要求，并不在将来提出此类要求”。这个条约的签署消除了两国间长期存在的不信任，为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为联邦德国与其他东欧国家的关系正

常化扫清了道路。

就在勃兰特派巴尔前往莫斯科谈判的同时，又派国务秘书杜克维赴华沙谈判波德条约一事。1970年12月7日勃兰特又前往波兰，与西伦凯维茨签署了《关于两国关系正常化基础的条约》，确认奥得-尼斯线为德波边界，并重申两国的现有边界现在和将来都不可侵犯，双方保证无条件地尊重彼此的领土完整。签字之前，勃兰特特意到华沙无名烈士墓前献了花圈，并在华沙犹太区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酷屠杀的50万犹太人下跪致哀。在签字后的一次广播讲话中，勃兰特说：“波德条约结束了一段充满痛楚与牺牲的罪恶历史，在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分裂的家庭再次团聚铺平了道路，并使边界不再成为分裂的因素。”

西柏林问题一直是战后东西方冲突的一个焦点，也是美苏关系中最大的绊脚石之一。苏联与东德视它为长在自己腹中的一个“毒瘤”，反社会主义阴谋活动的策源地和桥头堡，曾几次动手想把它拔掉。美、英、法三国也不愿放弃这一重要据点，纵容和支持联邦德国对它行使“主权”。东西方在西柏林问题上的冲突曾数次把冷战推到热战的边缘。1948年的危机曾迫使西方对西柏林实施紧急空运。1958至1959年，赫鲁晓夫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单独订立对德和约。1961年的危机又使双方剑拔弩张，武装对峙，最后导致1961年8月柏林墙的建立。1969年西德议会决定于3月在西柏林举行会议并选举德国总统，苏联为此向美国提出抗议，东德政府也对西柏林采取了一些干扰措施。

尼克松上台后，苏联力图说服美国敦促西德当局取消其计划，但尼克松不仅拒绝了苏联的要求，而且下令增加在通往柏林的交通线上美国军事车辆的来往。2月27日，尼克松在西门子工厂的讲话中重申了美国对保卫西柏林承担义务。他说：“谁也不要打错了算盘：任何单方面行动，任何非法行动，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形式的压力，都动摇不了西方国家保卫他们作为自由柏林人民的保护者的正当地位的决心。”

为了给欧安会的召开创造条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美国表示存在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的可能性。1969年3月26日，尼克松致信柯西金，建议讨论柏林问题。柯西金在5月27日的回信中表示不反对讨论柏林问题，但是柏林的一切紧张局面，责任都在联邦德国。基辛格建议不要继续在美苏双边的渠道下把这个问题进行下去，他说：“我怀疑现在是仓促进入任何正式谈判的好时机。等到德国选举（下次议会选举定于1969年9月举行）之后，我们可以向波恩的新政府提出这个问题，然后再考虑是否继续同莫斯科谈判以及如何谈判。”

由于苏联没有从美国方面得到答复，于是转向公开舞台。1969年7月10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发表讲话，宣称苏联愿“就现在和将来如何避免在西柏林问题上的纠纷交换意见”。当时还是西德外长的勃兰特力主西方国家接受苏联建议，就柏林问题进行谈判。

8月7日，美、英、法三国通知苏联，它们愿进行探索性会谈。9月24日，苏联再次建议就柏林问题举行谈判。12月16日，美、英、法三国表示同意。1970年2月10日，苏联正式邀请三国代表于2月18日开始谈判。2月25日，勃兰特致信尼克松，要求早日开始谈判，并得到美国答复。3月26日，美、英、法三国驻西德大使和苏联驻东德大使开始就柏林问题进行会谈。

一开始，谈判进展缓慢，主要是各方都有各自打算。西德提出，除非缔

结柏林协定，否则西德—苏联协定不会得到西德议会的批准。苏联希望利用西德在东方政策上的利益作为在柏林问题上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则想通过柏林谈判把西德的“东方政策”纳入美苏缓和的轨道，又利用苏联在缔结柏林协定与欧洲缓和上的利益来提高它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的地位。后来，由于苏联与西德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谈判进程加快。1971年8月23日，四国就柏林问题达成协议。9月3日柏林协定正式签署。

柏林协定及其附件的主要内容是：苏、美、英、法四国“互相尊重各自的和共同的权利和义务”，“已形成的局面不得单方面加以改变”；苏联政府声明，西柏林到西德的过境将畅行无阻，并享受优惠待遇；西柏林不是西德的一部分，但可维持和发展柏林西区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的联系；西德官方不得在西柏林行使宪法职权，但可保留其联络机构；西德有权对在国外的西柏林人给予领事保护，可在国防组织中代表西柏林；西德签订的国际协定适用于西柏林；西柏林居民可同西德公民一样去民主德国和东柏林旅行；苏联可向西柏林美英法当局派出总领事馆和商务机构等。这个协定对西方来说为西德通向西柏林的通道提供了法律基础，对苏联来说则使西方接受了东德控制东柏林的现实，并排除了将西柏林作为西德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可能。

柏林协定的签订消除了通向东西方缓和的一个重要障碍，为欧洲安全会议和欧洲共同均衡裁军创造了良好条件，并推动了美苏首脑会晤的实现和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达成，从而推动了70年代正在形成的美苏缓和。

勃兰特宣布“新东方政策”后，两德关系也开始缓和。1970年3月，两德总理在爱尔福特举行首次会晤，5月又在卡塞尔再次会晤，尽管没有具体成果，但毕竟走到一起讨论问题。1971年5月，昂纳克继乌布利希担任东德党政最高领导，使两德关系进一步发展，并于1972年7月开始就一项基本条约进行谈判，并在当年12月与西德签署了《关系基础条约》，确认各自主权与领土完整，保证互不使用武力，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承认同属一民族和互不为“外国”的特别规定等。该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战后一直悬而未决的德国问题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安排，同时意味着东德的主权地位得到了西方的正式承认。1972年11月9日，苏、美、英、法四国联合声明，支持东西德加入联合国。次年9月，联合国大会同时接纳东西德为正式成员。

1973年12月，联邦德国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了《捷德条约》，宣布废除肢解捷克斯洛伐克的1938年《慕尼黑协定》，并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联邦德国又与匈牙利及保加利亚正式建交，完成了与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的整个过程。

作为欧洲产物的新东方政策，成功地解决了战后威胁欧洲和平的两个症结边界问题和德国问题，从而成为欧洲缓和中最重要和最有成效的组成部分，为欧安会的召开与欧洲局势的继续缓和创造了条件。

#### 四、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艰难起步，终于在长期僵持后达成了原则协议

早在1968年，尼克松就声称要在对苏关系方面，开始一个“从对抗走向谈判的”时代。但是在1969年初，尼克松政府并不急于同苏联进行战略武器谈判。说起战略武器谈判，早在1967年6月美国约翰逊总统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新泽西州的葛拉斯堡罗会晤时，美方就提出希望不久便能同苏

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谈判。到 1968 年，苏联开始对美国的主张作出积极反应。可是，1968 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拟议中的美苏战略武器谈判告吹。尼克松上台后，苏联重新恢复了对战略武器谈判的热情。这是因为，苏联认为美苏已经形成了核均势，有必要保持一个合理稳定的平衡。而且美国当时还没有反弹道导弹，尼克松政府在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上尚未作出最后决定，苏联在谈判中可能处于有利地位。另外，为使欧洲缓和进程继续下去并尽力减少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给美苏关系带来的损害，苏联迫切希望使谈判之门敞开。苏联还有一个考虑，由于中苏关系在 60 年代后期恶化，苏联试图通过战略武器谈判使美苏关系缓和，从而进一步孤立中国。对于尼克松来说，面临的压力是很大的。他十分清楚，不论在核武器或常规武器方面，美国和苏联是不可能永远有绝对均势的。首先，苏联是陆上强国，美国是海上强国。其次，美国的核武器固然比较好，但苏联的却比美国的大。此外，在军备的每一方面都占绝对优势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武器发展到一定水平，任何国家都有摧毁另一国家的能力。在超过这个水平以后，最重要的不是考虑如何继续增加武器的数量，而是考虑如何保持战略均势，同时要使对手了解，一次核袭击即使成功，也将是自杀性的。他想，从策略上考虑，美国需要反弹道导弹作为同苏联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因为，苏联人已经拥有一个反弹道系统，如果同苏联人谈判时没有这种导弹，就可能不得不放弃一些别的东西，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东西。尼克松的逻辑是，为了达成摒弃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美国必须拥有反弹道导弹系统。尼克松试图说服国会相信，关于反弹道导弹的表决所代表的，实际上是表明美国的战略武器是否可靠的一个合乎情理的转折点。

由于有关建立反弹道导弹方面的重大决定尚未作出，再加上尼克松执政之初在议事日程上的首要问题是结束越战而不是同苏联的谈判，所以尼克松政府虽口头上表示赞成战略武器谈判，但并不急于实现。而且，尼克松认为谈判必须有助于促使苏联在越南和中东等问题上采取克制与合作的态度，从而使美苏关系缓和在广泛的问题上取得进展，实际上是要把苏联其他方面的让步作为美国参加战略武器谈判的要价。

1969 年 1 月 27 日，尼克松在就任总统后举行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谈判的方式和时机要同时能促进悬而未决的政治问题取得进展。

2 月 6 日，基辛格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提出了“联系”原则，并解释说：“提出政治和战略环境的联系问题……是想全面处理和平问题，而不仅仅是在军事方面处理和平问题，和平是在各方面受到挑战的。”这个“联系”原则成了尼克松政府处理美苏关系的一项重要方针。但是这一原则在美国国内遭到指责和诸多批评。舆论和国会甚至要求尼克松政府作出单方面让步，以便尽早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议。这个“联系”原则实际上是尼克松政府故意推迟战略武器谈判的一种手法。苏联也对美国的“联系”政策十分警惕，指责美国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向苏联施加压力。就连尼克松政府要员也不满。国务卿罗杰斯、军备控制与裁军署长杰拉德·史密斯以及国务院内以驻苏大使汤普生为代表的一些高级外交官急于同苏联开始战略武器谈判，这使尼克松与基辛格大为恼火。

为了准备谈判，尼克松准备制订一项发展战略武器的计划，其中关于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和多弹头分导导弹的计划成了 1969 年美国国内在防务问题上争论的中心。很多人，包括艾森豪威尔在内主张把经费用在增强进攻能

力上。一些科学家和导弹专家还对反弹道导弹的可行性提出怀疑，认为它在技术上过于复杂，因而难以有充分的准确性，易于被苏联的各种反措施所击毁。在美国，反对建立反弹道系统的人还担心，美国的计划会引起新一轮军备竞赛，从而威胁到战略武器谈判。

尼克松的态度很坚决，并于1969年3月14日宣布了他建立反弹道导弹的计划。这项定于1973年完成的新计划修正了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哨兵”计划，并更名为“卫兵”计划。对于这场斗争，尼克松觉得可以很有把握地获得众议院通过，然而在参议院却胜负难卜，因为那里有力量强大的自由派。他说，这好比一场战争，如果要想获胜，就必须像打仗一样进行斗争。

为此，尼克松向国会派遣了大批白宫的工作人员，试图对议员做说服工作。尽管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国会的情况介绍会和其他一些会议上，极力阐明搞反弹道导弹的理由，但自由派的力量组织得很好，大体上能够控制公开的辩论。在表决之前，尼克松对手下人说：

“一定要让我们所有的人一直都呆在那里。别让任何一个人病倒。在表决结束以前，甚至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上厕所。”

8月6日是辩论和投票的一天，一开始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表决。表决是以对法案的三项修正案分别表决的形式进行的，只要这些修正案获得通过，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计划就将搁浅。结果，尼克松以微弱优势成功了。尽管胜负之差薄如刀片，但尼克松毕竟可以松一口气。在他看来，如果他在参议院的这场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斗争中失败了，就无法与苏联进行战略武器谈判。

多弹头分导导弹也是美国国内争论的问题。这种导弹是约翰逊政府时期重点研究和发展的战略武器新技术之一。由于多弹头分导技术可使美国的每枚陆基洲际导弹携带3个弹头，每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携带10个弹头，这样，尽管美国的战略导弹自1967年以来在数量上没有增加，它的威力却可以大大提高，从而能有效地对付苏联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和抵消苏联在洲际导弹数量上的优势。尽管多弹头分导导弹计划遭到国内部分人的反对，但尼克松政府不愿放弃这一优势。它不仅决定继续试验，而且决定部署多弹头分导导弹。

在制订战略武器发展计划的同时，尼克松政府还就美国的整个防务政策重新进行了审查和调整。在权战略方面，放弃了“确保摧毁”这个词，改而采用“充足论”的提法，战略核力量以集中在大城市的平民与工业设施为目标。在军事战略上，把原来的打“两个半战争”改为打“一个半战争”，认为中国不再被认为是一个主要的威胁，美国更担心的是苏联而不是中国。至1969年6月，战略武器发展计划的制订与防务政策的调整初步完成。于是，尼克松政府决定于7月底开始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进行谈判。

然而，苏联人此时已失去了年初的谈判热情，对美国的提议没有作出积极反应。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已决定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开始试验多弹头分导导弹，而且美国试图通过谈判压苏联在其他方面作出让步，所以苏联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谈判就有关问题举行了初步讨论。11月17日，首轮谈判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

当时，美苏在战略武器数量上大体处于均势：美国拥有陆基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656枚，战略轰炸机560架；苏联拥有陆基洲际导弹1050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约160枚，战略轰炸机150架。此外，苏联还拥有一处由64枚导弹组成的用于保卫莫斯科地区的反弹道导弹系统。

但在质量上，双方各有优势。苏联的优势在于：陆基洲际导弹的类型比美国多；洲际导弹能携带的投掷重量比美国的导弹大；并已经部署了一处反弹道导弹系统。而美国的优势在于：弹头数量多于苏联，陆基和潜射洲际导弹在技术性能上，特别在小型化、命中精度和多弹头分导技术上优于苏联；尽管尚未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但在反弹道导弹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战略轰炸机和潜艇比苏联先进；美国及其盟国在前沿基地上的核力量对苏联形成了包围圈。这种双方各具优势的复杂的武器结构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任务十分艰巨。

首轮谈判双方仅就各种问题交换了看法，并就工作计划达成了协议。双方商定 1970 年 4 月将再次会晤，并同意谈判在赫尔辛基和维也纳两地轮流举行。在会谈中，苏联希望使谈判仅仅限于给反弹道导弹规定限额，而美国则坚持谈判必须包括限制进攻性洲际导弹和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输工具在内。双方在战略武器的定义上也存在分歧。苏联认为，战略进攻性武器应包括所有能达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美在西欧和亚洲前沿基地上的核武器以及航空母舰上的机载核武器都应包括在内，苏以西欧为目标的中程核导弹和轰炸机不在这个范围之内。美国认为苏联的这一定义是要把美国的安全和西欧的安全分割开来，因此表示无法接受。

1970 年，美国国内又就反弹道导弹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务院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主张美国单方面作出姿态，暂停部署反弹道导弹，促使苏联进行认真的谈判。白宫和军方则认为暂停部署会削弱美国的谈判地位，从而破坏达成协议的前景，同时担心国会反对派会得寸进尺进而提出整个废除反弹道导弹。经过充分研究，尼克松政府于 4 月份确定将以两个方案作为谈判的起点。

一个方案是：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把两国陆基洲际导弹和潜艇发射洲际导弹限制在美国拥有的总数 1710 枚的水平上，并把双方轰炸机数目冻结为美国 527 架，苏联 195 架；反弹道导弹限于保卫双方首都（后称全国指挥部）或完全禁止这种导弹；禁止多弹头分导导弹，条件是苏联同意现场视察。这一方案主要得到了美国国务院、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的支持。

另一个方案在反弹道导弹方面的规定与上一方案相同，但在进攻性武器方面建议大大削减，将美国现有的 1710 枚洲际导弹总数在 7 年内每年减少 100 枚，直到 1978 年双方各保留 1000 枚为止。这一方案对多弹头分导导弹则未加禁止。该方案得到美国军方的支持。

从这两个方案可以看出，美国坚持将反弹道导弹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联系起来，用限制美国在反弹道导弹上的优势来换取削弱苏联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上的优势，同时力保美国在多弹头分导技术上的领先地位。

对于美国提出的方案，苏联表示接受将反弹道导弹限于两国首都的建议，但同时仍坚持要把能达到苏联领土的一切核武器都作为战略武器计算在内。在多弹头分导导弹问题上，苏联要求禁止部署和生产，但不禁止试验。因为在多弹头分导技术方面，美国已接近实际部署，而苏联尚处于试验阶段。

1970 年 8 月 4 日，美国在维也纳的第二轮谈判中提出了一项新的建议。要求双方把导弹和轰炸机都限制在一个双方商定的数目上，并把苏联的重型导弹限制为 250 枚。但苏联表示拒绝。11 月初在赫尔辛基的第三轮谈判中，双方的立场均无松动，谈判未获任何进展。

1970 年底，波兰国内局势发生动荡，苏联在东欧的地位正受到考验。而



美国由于同中国领导人正酝酿举行一次首脑会晤，它在对苏关系中开始握有一张新的王牌，谈判地位开始对美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于1971年1月9日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私人信件，强调如要达成协议，必须把进攻武器和防御武器联系起来。两周以后，基辛格会见了到莫斯科同勃列日涅夫进行长时间磋商后刚回来的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见时多勃雷宁建议在1971年夏末举行首脑会议，并表示有可能按美国提出的折衷办法商订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仅限制反弹道导弹的规定，加上在进一步谈判期间冻结进攻性武器的规定。然而3月12日，多勃雷宁交给美方一封复信，要求在1971年先达成一项反弹道导弹协议，然后再开始讨论限制进攻性武器。美国的态度也很强硬，继续坚持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同时进行的立场。3月26日，多勃雷宁从莫斯科收到了一项新的指示：苏方同意继续谈判，并在就反弹道导弹达成协议之后冻结进攻性武器。这是美方一直期待的消息，美国国会一些议员敦促总统立即加以接受。

但尼克松觉得，如果持这样的立场去参加最后阶段的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定要坏事。他认为，实现限制核武器的唯一有效方法是使苏联面对一项不可接受的方案，这就是美国将增加军备并决心使用这些军备。

4月20日，尼克松在内阁会议室里同一批共和党参议员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谈。他说：“如果要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取得成功，我们决不能在参议院里透露我们想同苏联方面谈判的内容。不然他们会说，‘我们何必继续进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呢，反正美国准备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了。’苏联人是迫切需要一项协议的，不过我们知道，他们只是从实力出发进行谈判，并且只尊重有实力的人；只要哪里有力量真空，他们向来是往哪里挤的。”

4月23日，苏联表示同意限制进攻性武器可在反弹道导弹协议达成之前进行讨论，但同时又提出反弹道导弹只限于在两国首都部署。

5月12日，多勃雷宁表示苏联不再坚持在首都部署反弹道导弹的主张，并同意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的谈判同时进行，从而使谈判僵局开始打破。

5月20日中午，尼克松出现在白宫新闻发布室的电视摄像机前，宣布美苏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原则协议。他说：“你们知道，苏美关于限制核武器的谈判陷于僵局已经一年多了。通过谈判，包括两国政府最高层的谈判，我今天宣布在打破僵局方面有了重要的发展。”接着，他宣读了同时也在莫斯科予以发表的声明。声明的措词是故意含糊的，只说美国已经同意把注意力集中在关于反弹道导弹的协议上，而苏联则同意关于限制进攻性武器的“某些措施”。这一协议满足了美国限制苏联在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的数量优势和削弱苏联重型陆基洲际导弹威力的愿望，而美国在战略武器质量上的现代化计划将不受束缚。美国的交换代价是接受了对反弹道导弹的限制。

## 五、美苏宣布将举行首脑会晤，完全出人意外，舆论称“永远令人惊异的尼克松从帽子里变出又一只兔子”

1971年8月10日，苏联正式邀请尼克松访苏。8月17日，美国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9月7日，两国达成协议，决定美苏首脑会晤将于1972年5月下半月在莫斯科举行。苏联方面还建议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为首脑会晤作准备。

说起首脑会晤，其间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的历程。早在1969年，苏联领

领导人首先采取主动，多次公开或私下表示准备同美国开始战略武器谈判并提出举行首脑会晤的想法。

苏联当时之所以对举行美苏首脑会晤表现出很大兴趣，与 60 年代末中苏关系的严重恶化有很大关系，苏联希望联合美国以遏制中国，并希望通过改善美苏关系来消除 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带来的消极影响。

但尼克松上任之初的首要目标是结束越战，因而对苏方提出首脑会晤的建议反应冷淡。尼克松对苏政策主张采用“联系”原则，要求苏联为改善两国关系而在广泛问题上付出代价。如果苏联没有采取比较实际的主动姿态，美方不愿对苏联的热情作出积极反应。尼克松政府当时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希望通过改善对华关系来推动对苏关系。因此，在中美关系尚未取得明显进展之时，他不希望美苏关系走得太快。

但到了 1970 年，由于尼克松在 1969 年外交成绩平平，国内反战运动蓬勃发展，使尼克松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政治压力。面对这种形势，尼克松希望美苏首脑会晤有助于平息国会和舆论的批评。1970 年 4 月，尼克松政府向苏联方面探询 1970 年举行首脑会晤的可能性。但苏联没有作出迅速反应。

直到 1971 年 1 月，美国表示同意讨论柏林问题之后，美苏首脑会晤才出现转机并开始加快步伐。但苏联仍回避确定会晤的最后日期，甚至还为举行首脑会晤提出了更高的要价。除了以柏林谈判作为会晤的条件外，苏联还要求美国在其他各方面表现克制，以免局势不利于会晤的准备和举行。

1971 年 3 月底起举行的苏共第 24 次代表大会进一步确立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地位。勃列日涅夫提出把“缓和”摆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并着重同美国改善关系。7 月 15 日，美国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公告发表，这使苏联对美苏首脑会晤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就在公告发表后 4 天，多勃雷宁在会见基辛格时表示完全赞成举行首脑会晤，并探询会晤能否在尼克松访问北京之前举行。苏联的用意是很明显的。

8 月 10 日，苏联正式邀请尼克松访苏。8 月 17 日，美国表示接受苏联的邀请。9 月 7 日，两国达成协议，决定美苏首脑会晤将于 1972 年 5 月下半月在莫斯科举行。苏联方面还建议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为首脑会晤作准备。对于美苏首脑将于 1972 年 5 月会晤的宣布，完全出人意外。《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社论标题是“永远令人惊异的尼克松从帽子里变出又一只兔子”。1971 年底爆发的印巴战争又使美苏两国关系蒙上一层阴影。美国曾暗示，若苏联不对印度施压以结束战争，美国可能取消首脑会晤。而美国加紧对越南北方施加军事压力又使苏联感到不愉快。1972 年 3 月 30 日，尼克松正在椭圆形办公室与基辛格谈话，这时基辛格的助手送来一张条子。基辛格看了以后说：“北越人已经越过非军事区发动了进攻。这大概是我们一直预料会发生的攻势的开始。”此后的几天，北越加大了攻势。这次行动的时机和规模，使包括尼克松、基辛格在内的大多数美国官员为之震惊。4 月 3 日，基辛格召集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1969 年春以来他处理危机的机构）开会，研究对策。4 月 4 日，美国作出了两项重大决定。第一项决定涉及苏联。美国政府认为，北越人要是没有苏联提供的坦克和远程大炮，根本不可能进攻南越。因此，美国决定冒点政治风险，是与拆穿俄国与北越的这次行动有关。为了不妨害预定在 5 月 22 日开始的美苏首脑会晤，尼克松决定对苏联的第一次指责不由基辛格在白宫提出，而由国务院发言人麦克洛斯基在国务院提出。当天，华盛顿特别行动小组上午例会后，麦克洛斯基来到新闻发布室，按照基

辛格的要求，点了一下苏联以武器支持北越人“入侵”南越这一“事实”。基辛格以为，对苏联参与入侵这件事，适当点一点，由国务院发表一次措词谨慎的评论，登几条消息，就够了。但是他想错了。国务院发表评论后，五角大楼和中央情报局也出来帮腔。报上出现头一批消息后，便促使新闻界进一步寻根究底。于是乎，什么苏美关系陷入危机啦，最高级会谈恐怕开不成啦，这类报道一时甚嚣尘上。

基辛格担心苏联领导人得到了错误的信号，从而影响首脑会晤，于是命令政府发言人降低指责俄国的调门。国务院马上按基辛格的指示办事，罗杰斯国务卿甚至矢口否认，说政府从来无意“公开指责”俄国人。但五角大楼却仍然忠于基辛格原来的命令。4月6日，穆勒海军上将在海外作家午餐会上指责苏联说，越南战争有了“新因素”，这就是苏联的坦克和大炮出现在南越。4月7日，国防部长莱尔德说，河内的先进武器有80%来自俄国，因此，莫斯科在帮助河内达到其战争目的方面起了“关键”作用。

基辛格这时正在同华盛顿某专栏作家共进午餐，一听到国防部长那番话，不禁勃然大怒：“他妈的，我对他说过不要讲，他还讲！”基辛格解释说，本来布置只由麦克洛斯基指责俄国人一次，公开批评就到此为止。他嘟哝着说：“莱尔德忘了他已经不是国会议员了。”

可是，三天以后，尼克松却亲自出马指责俄国人了。4月10日，总统在国务院为签署一项禁止使用生物武器的国际公约举行的仪式上讲话时，首先赞扬了俄国人在军备控制协议方面给予的合作，然后间接地批评他们鼓励北越的“入侵”。他强调说：“每一个大国都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即决不直接或间接鼓励别国对邻国使用武力，或进行武装侵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听后，急忙穿过外交接待室，坐上他的卡迪莱克牌汽车就走，对记者一言不发。

4月4日美国作出的第二项重大决定，主要是关于美国在军事上对北越入侵所作的反应。当天上午，五角大楼正式宣布，美国将“采取一切必要步骤保护还留在南越的美军”。于是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海空军力量开始以惊人的速度加强。在北越攻势开始后的一个月里，东京湾内就集中了6艘美国航空母舰，5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关岛的B—52机群增加到了近100架。泰国的乌塔保驻有53架B—52轰炸机和240架战斗轰炸机，岘港驻有113架战斗轰炸机。到4月底，共有1000多架美国军用飞机用于袭击印度支那各地的越南共军据点。

4月15日，尼克松总统批准了出动B—52飞机在周末轰炸河内和海防的计划，计划的代号是“自由走廊”。他要基辛格立即把这项计划落实，目的是要摧毁北越的一部分油库，迫使河内把攻势停下来。基辛格的一位助手解释说：“我们认为这是一项策略决定……既有政治作用，也有军事作用。我们要逼得北越人迅速决定，继续这次攻势是否值得，他们是否有使攻势继续下去的手段。”

在轰炸海防港时，有4艘苏联商船被炸伤。莫斯科提出抗议，说这是“侵略行动”，但是抗议中并没有包含明确的警告。中国也提出了抗议。美国发言人尖锐地反驳了这些抗议，指出只要停止在南越的攻势，轰炸也就会停止。如果攻势继续下去，那么用一位发言人的话来说，美国“准备轰炸北越的任何地方”。

尼克松对轰炸成功非常满意。4月16日星期六早晨，他说：“嘿，这个

周末我们真正给他们留下了名片。”但新的轰炸行动引起了国会和舆论的责难，但尼克松和基辛格好像不怎么在乎，他们不相信这次轰炸就构成了一种挑战，足以触发同苏联人的一场重大对抗。基辛格胸有成竹而批评者却一无所知的是：他即将秘密前往莫斯科，做尼克松访苏的前期准备工作。

## 六、基辛格秘密访苏前，参加了乔治敦名流的一个酒会，再次表演了“基辛格还在城里”的拿手好戏

就在美国恢复对北越的全面轰炸期间，多勃雷宁和基辛格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再次进行了高度机密的交换意见。基辛格交给了多勃雷宁一份精心考虑过的、旨在促进达成协议的妥协方案。这项方案的核心是，如果苏联同意在最后一揽子协议里把潜艇导弹包括进去，那么美国方面将允许苏联在这类进攻性武器的数量方面保持优势，条件是苏方必须淘汰其基本上已陈旧的 SS—7 和 SS—8 陆上远程导弹和一定数目的 H 级潜艇。

多勃雷宁认为这项妥协方案可能有助于打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僵局，也可能缓和由于越南问题而出现的日益紧张的局势，并认为基辛格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这位苏联大使进行了安排，让勃列日涅夫发出了邀请。

基辛格接受了这项邀请，他主要考虑的是解决越南问题，而不是安排最高级会谈。他想，如果尼克松总统能不顾北越入侵，就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提出一项合理的妥协方案，那么也许勃列日涅夫能就越南问题提出一项妥协方案。基辛格很自信，他能说服勃列日涅夫限制苏联对北越提供武器。

4月19日下午五六点钟，基辛格离开白宫，参加了乔治敦名流的一个酒会。他再次表演了“基辛格还在城里”的拿手好戏。他每次秘密出访之前，照例总要出头露面一番的。

一从酒会出来，基辛格就坐上白宫轿车，在夜色中飞速开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登上一架大型的总统座机。这里早已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4位官员守候在机上了。他们是：他的欧洲问题助理赫尔穆特·索南费尔特，越南问题专家约翰逊·内格罗蓬特，两名私人助理彼得·罗德曼和温斯顿·洛德。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也在机上，他也是秘密回国参加基辛格与勃列日涅夫会谈的。

10小时后，已是莫斯科的早晨，专机在伏努科沃机场通常为国内航线专用的要人停机坪着陆。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瓦西里·库兹涅佐夫在机场迎接基辛格。两人钻进黑色轿车，20分钟之后，开到了列宁山上的一所豪华别墅。这所别墅里住着克里姆林宫的几个首脑人物。

第一天晚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就预定第二天上午开始的与勃列日涅夫会晤的问题与基辛格交谈了两小时。以后接连三天，勃列日涅夫和基辛格在附近的一所专供秘密会谈用的政府别墅里每天至少要举行五小时的会谈。后来基辛格说勃列日涅夫其人“立场具体，目标具体”，“重实干不重哲理”，“办事干脆”，“精力充沛”，要求明确，也懂得如何使之实现。虽说会晤是为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作准备，但会谈至少有一半时间花在越南问题上。基辛格要求苏联减少对北越的武器供应，但没有得到勃列日涅夫的承诺。勃列日涅夫明确表示，虽然他可能认为北越人的做法愚蠢、鲁莽，但他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支持他们，因为河内是个“兄弟盟邦”，何况一旁还有个中国呢。基辛格反复强调，美国决不甘心在南越遭到军事失败，定要采取

“一切必要的步骤”阻止共产党取得军事胜利。但两人都明白，如果美国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势将造成苏美对抗，危及最高级会谈。

虽然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在越南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但是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却有所收获。基辛格就早先在华盛顿交给多勃雷宁的尼克松总统的妥协方案作了说明，令他高兴的是，勃列日涅夫第二天就受了这个方案。从此以后，任何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一揽子方案都包括潜艇导弹了。这是朝着达成协议迈进的一大步。除了越南问题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之外，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还广泛地讨论了从柏林到贸易等其他问题。他们都决心要为最高级会谈的成功奠定基础，以便在最高级会谈中能签署几个具体协定。

在这次访问的最后一天，基辛格同葛罗米柯专为准备最高级会谈一起工作了6个小时。关于卫生研究、环境问题、空间合作以及“海上事故”等协议的最后细节问题都得解决。还要安排记者采访、官员居住的旅馆房间，以及为尼克松夫人安排周到的参观日程，等等。基辛格返国之前，葛罗米柯陪同他巡视了一下总统和随行人员在最高级会谈期间在克里姆林宫的下榻处。基辛格认为布置得十分考究。

4月24日中午过后，基辛格离开莫斯科。第二天白宫宣布他去过苏联首都4天。记者们想知道，为什么要这样保密。齐格勒答称：“我们目前正处于国际关系中非常微妙的阶段。双方都认为，在有机会探讨彼此的看法以前，应当尽可能避免外界事前进行猜测和议论。”他提醒记者，1971年初以来，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就一直在交换意见。“最近几个星期以来，双方觉得更直接地交换意见是必要的”。

基辛格再次表演遁身术的消息，赢得了新闻界又一次喝采叫好。赖斯顿写道：“他扮演这样一个微妙而惊险的角色的技巧，在体力上和智力上都是无与伦比的奇迹。”基辛格却显得若无其事他说：“只要有鱼子酱，叫我干什么都行。”

5月1日，也就是基辛格预定动身去巴黎谈判越南问题的那天，尼克松接到勃列日涅夫的一封信，它使他更加担心，美国没有能够使苏联领导人相信美在越南问题上坚持立场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勃列日涅夫直截了当地要尼克松避免在越南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因为这样会破坏一次举行有成效的首脑会议的机会。

基辛格带着尼克松的新建议来到巴黎，他认为这项建议可以作为迅速解决越南战争的基础。如果北越人同意停火和遣返美国战俘，只要满足这两项，美国就同意在4个月内撤离印度支那。然而，基辛格又一次错误地估计了他的对手。北越谈判代表黎德寿轻蔑地拒绝了尼克松的建议。基辛格又灰溜溜地回到了华盛顿。他十分担心，他谈判失败的消息加上西贡在战场上的失利，将会迫使总统采取突然行动，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可能因此告吹。

## 七、尼克松在越南问题上“玩扑克赌博”，苏联表示“无意奉陪”

5月5日，尼克松召集基辛格、罗杰斯、莱尔德、穆勒、赫尔姆斯和康纳利等主要顾问在一起开会，研究在北越采取进一步行动的问题。尼克松总统极力主张在北越港口布雷，但是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到会的大部分人同意总统的看法，但基辛格却发表了与众不同的意见，他说：“虽然苏联供应了北越这次攻势所用的武器，但苏联政府并没有鼓励这次攻势，也不同意发

动攻势的时机。”基辛格主张不如用B—52飞机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尼克松同意加强轰炸，但不是代表布雷，而是补布雷之不足。在美苏首脑会晤问题上，大家都认为总统去莫斯科进行最高级会谈之行恐怕非延期不可了，有几个人（不包括基辛格）主张总统不如主动宣布推迟此行算了，理由是，当南越盟国的军事地位日趋瓦解之际，总统到莫斯科去是不明智的。

当天傍晚，尼克松总统带着几本黄纸本前往戴维营，整个周末他都在那里起草他的讲话稿，这篇讲话后来成了他那年进行的一场最大的赌博。他决定在北越所有的港口布雷。

5月7日晚，尼克松回到白宫，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基辛格，要他通知参谋长联席会议立即行动起来。

5月8日上午，尼克松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紧急会议。下午2时，尼克松打电话叫基辛格下达“行动命令”。夜幕初降时，尼克松把他那个17分钟的讲话稿定稿完毕后，召集内阁开了一次短会。他概括地谈了谈形势和他的决定。会上没有人提出任何意见。晚上8时，尼克松在白宫的罗斯福厅向国会领袖介绍情况。他说：“让我开门见山，把我不得已作出的决定告诉你们。”于是他把讲话稿的内容概括地谈了谈，列举了他不同意采取的几种行动，并解释了为什么他认为有必要在北越港口布雷。他要求他们给他支持。

在尼克松同国会领袖们会面的同时，基辛格正在他的办公室会晤多勃雷宁。他给这位苏联大使一份总统讲话稿，并强调指出，美国不想同苏联对抗，总统仍然希望按计划举行最高级会谈。

尼克松总统在晚上9时发表讲话。他说：“北越之所以有可能发动这次入侵，是由于苏联向河内提供了坦克、大炮以及其他先进的进攻性武器。这次入侵增加了共产党取得军事胜利的危险，同时使仍在南越的6万美军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

尼克松宣布美国将对北越采取强大的军事行动，他已下令采取的措施有：

一、“进入北越各港口的所有航道都将布雷，以阻止船只开进这些港口，并防止北越海军从这些港口进行军事活动。”

二、“美军已奉命在北越内河和它所宣布的领海水域内采取适当的行动，以制止运送补给品。”

三、“将最大限度地切断北越铁路和其他一切交通线。”

四、“继续对北越军事目标进行空中和海上袭击。”

尼克松接着公开了他最新的和平方案，也就是黎德寿5月2日拒绝了的那个方案。尼克松在讲话的结尾专门对苏联说了一段话。他说：“让我们，让所有的大国只帮助自己的盟友进行防御，不要帮它们侵入邻国。否则，和平事业，我们双方在这一事业中都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将受到严重危害。”

“我们两国在近几个月的双边谈判中已取得了重大进展。我们在限制核武器和贸易等许多问题上已接近达成重要协议。让我们不要走回头路而滑到前一个时代的阴影里去吧……我们正处于一种新关系的开端……我们准备继续建立这种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实现这一点，那么责任在于你们方面。”

显然，尼克松为了赢得从越南的“体面”撤退是准备不惜牺牲他的莫斯科最高级会谈的。几个月后，他还津津乐道他5月8日那个决定的重大历史意义。他对一批战俘的家属说，那是“我出任美国总统以来最难下决心的一项决定”。他解释说，美国当时“面临失败，我必须选择，要么承认失败而

乞怜于莫斯科，要么采取行动而力求化险为夷。我采取了行动”。

5月9日，在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召开了政治局紧急会议，以乌克兰代表彼奥特·谢列斯特为首的强硬派力主苏联政府取消最高级会谈并反击美国的封锁。勃列日涅夫反对摊牌。可是苏联官方对布雷一事没有公开发表评论。那天晚上，塔斯社发表了一条小消息说，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已离开莫斯科前往大马士革进行预定的访问。华盛顿的专家们认为，如果格列奇科估计将要发生一场重大的军事危机，是不会出访的。

美国国务院里一批苏联问题专家聚在一起研究苏联可能作出的反应。他们的结论是，俄国人不会取消最高级会谈。但是，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班子从来不把国务院放在眼里，所以对这条意见也就不加理睬。在白宫，基辛格的几名亲信放下了为莫斯科最高级会谈准备材料的工作。他们估计没有继续作这种准备的必要了。

5月9日上午11时20分，基辛格向记者解释总统的决定。他谨慎他说：“我没法预言苏联会作出什么反应。”那天傍晚，他对一位专栏作家说：“你知道，我在俄国问题上下的功夫比中国问题多50倍。我不希望最高级会谈流产。”

5月10日，基辛格打电话给多勃雷宁，邀请苏联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第二天到白宫来与总统一叙。他说，莫里斯·斯坦斯作为商务部长去莫斯科的时候，不是受到过柯西金的接见吗？最近勃列日涅夫还接见了美国农业部长厄尔·巴茨嘛。基辛格解释说，总统觉得同苏联外贸部长来一次“礼节性会见”挺合适。多勃雷宁认为这个意见好，但他不能立即回复，说要问问帕托利切夫再

给回话。当晚，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落实了帕托利切夫同总统见面的事。

多勃雷宁说：“是明天上午九点吗？”

基辛格答：“九点。”

基辛格告诉尼克松，他在最高级会谈问题上的赌博，“看来要赢了”。

5月11日，帕托利切夫和多勃雷宁比约定时间略早来到白宫。基辛格、彼得森和总统国际贸易问题顾问彼得·弗拉尼根迎接了俄国客人，随即一起到椭圆形办公室去见尼克松总统。

基辛格低声问多勃雷宁：“这次会见，可不可以公开宣传？”

多勃雷宁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妥。”

于是，基辛格把驻白宫的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请了进来，会见的气氛同平常一样亲切。尼克松同帕托利切夫闲扯了一阵语言问题后，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被请出了椭圆形办公室。接着，双方代表就促进苏美贸易的前景问题讨论了大约1个小时，其间谁也不提海防，谁也不提最高级会谈。

帕托利切夫回到苏联大使馆，就有一位全国广播公司新闻社的电视记者问他，总统预定的莫斯科之行是否“还在日程上”。帕托利切夫通过译员回答说：“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我不晓得你为什么非要问这个问题。难道你怀疑吗？”

帕托利切夫这句话成了一条重要的新闻快报，正巧这时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发表了一项正式声明，指责尼克松决定在北越港口布雷一事是对苏联船只航行的“不能容许”的威胁，“粗暴地违反了公认的航行自由原则”，苏联“要求”“立即”解除“封锁”。但声明没有发出最后通牒，也没有取

最高级会谈，看来，他们是在回避尼克松总统的挑战。一位苏联官员解释说：“尼克松在玩扑克赌博，我们无意奉陪。”

事实上，在塔斯社发布这项声明的同时，莫斯科的外交部官员正同斯考克罗夫特将军会晤，继续为最高级会谈进行技术方面的准备。



## 第九章 高潮迭起

美苏之间的缓和与高潮，主要体现在美苏之间一系列首脑会晤及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的协议、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召开等方面。当然，美苏对抗的基本格局并未因缓和而改变，“缓和”只是一种手段，是一种表面现象，骨子里还是争夺。

### 一、尼克松首次访苏，最突出的成果是签署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这次首脑会晤标志着美苏关系“缓和”高潮的到来

1972年5月17日午夜，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乘直升飞机前往戴维营，同尼克松商谈最高级会谈事宜。多勃雷宁在总统的这个休息地过了一夜，他是享受过这种礼遇的唯一的共产党大使。

5月6日上午，多勃雷宁同基辛格会谈，主要是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在这次会晤开始之时，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中尚有若干技术性问题有待讨论解决。当然，经过两年半的谈判，两国已就协定中的主要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双方都不会让这些技术性问题来妨碍协议的最后达成。何况，谈判已接近完成，能否达成最后协议关系到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个人切身的政治利益。对尼克松来说，他急需得到这样一个协定，以便缓和国内的批评，并在1972年秋季争取竞选连任。由于在结束越战方面尚未取得决定性进展，同苏联达成战略武器协定显得尤为重要。勃列日涅夫则早已把他自己的声望同缓和政策连结在一起，因此他必须在首脑会谈中取得重要成果。下午，基辛格又同美国国务卿罗杰斯会谈，主要是关于贸易问题。

5月19日，苏共中央再次在莫斯科开会。勃列日涅夫在会上强调需要对“苏美关系采取认真的现实的态度”。

5月20日，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离开华盛顿，途经奥地利的萨尔茨堡前往莫斯科。起飞以后，基辛格走到尼克松的机舱，兴高采烈他说：“这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外交成就！三个星期以前，谁都预言这次首脑会议要取消，可是今天我们却在赴会的路上。”

5月21日，尼克松在一家饭店里同奥地利总理布鲁诺·无赖斯基共进午餐。基辛格在一间临时用来举行记者招待会的房间里就最高级会谈发表讲话。他说，苏美两大国要是不学会在维护和平方面成为平等伙伴，就难逃核战争的浩劫，到那时，正如赫鲁晓夫说过的：“活着还不如死了好。”

关于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基辛格估计这次很有可能在莫斯科签订协议；如果这次不签，不久也会签的。

关于贸易问题，基辛格暗示，在最高级会谈中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但会有相当大的进展，到了夏天某个时候可望达成协议。

关于越南问题，基辛格承认，尼克松总统5月8日的布雷决定确实准备冒点风险，但他认为这不会妨碍改善苏美关系。

一位记者有礼貌地问道：“4月底实际上同勃列日涅夫谈过话的，究竟是基辛格还是尼克松？”基辛格答称：“我[同勃列日涅夫]谈话时，是代表总统谈的。”大家都笑了。然后基辛格自我解嘲地补充说：“我还没有狂妄到那个程度。是在朝那方面发展，但还不到那个程度。”

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问：“你是打算在这星期里点点滴滴地宣布呢，还是来个倾盆大雨，成批地发表协定呢？”

基辛格回答说：“我们打算点点滴滴地发表成批声明。”此语一出，大家都笑了。

5月22日下午4点，尼克松总统等乘坐的那架发出蓝白光泽的喷气机在莫斯科的伏努科沃机场着陆，当飞机滑入贵宾停机坪时，太阳已躲入低沉的云雾中，俄国农民称之为“蘑菇雨”的那种绵绵细雨开始下起来了。没一会儿功夫，雨过天晴。苏联主席尼古拉·波德戈尔内、总理柯西金和外长葛罗米柯率领一队苏联高级官员到机场欢迎尼克松总统。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向“空军一号”座机走去，机门一开，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帕特出现在机舱门口。随后就是例行的握手、检阅仪仗队和奏国歌的场面。

从伏努沃机场到克里姆林宫的路上，行驶着至少有50辆汽车组成的车队。尼克松、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乘坐一辆车身很长的黑色吉尔牌轿车。尼克松打量这辆苏联轿车，大体上相当于美国林肯牌轿车。他向外望去，一路只见一丛丛的白桦树，看不到尽头的是一排排式样千篇一律的新住宅。车队到了莫斯科城郊后开始进入列宁大街，大街两边站立着大约十万名表情看起来有些呆板的俄国人，其中少数人向尼克松等美国客人挥手致意，很多人拿着纸制的两国小国旗，但大多数人只是瞪大眼睛瞧着。不到20分钟，就进入了克里姆林宫，尼克松、基辛格和几个心腹被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围墙内的一所豪华寓所里，而罗杰斯则被送到离克里姆林宫只有五分钟走路距离的新建的俄罗斯饭店。

正当尼克松一行四处观看富丽堂皇的住处时，基辛格带来消息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在他的办公室迎候。对于首次会谈，基辛格和多勃雷宁事前已作了仔细安排。基辛格未被邀请参加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首次两小时会晤，不过他已向总统很好地介绍了这位苏联领导人的作风。

勃列日涅夫的办公室就是13年前尼克松第一次会见赫鲁晓夫的那个房间。同赫鲁晓夫一样，勃列日涅夫看上去和他的照片一模一样：脸部最突出的是那双浓眉，嘴角露出一副呆板的、带几分警惕的微笑。在他们两人看来，当13年前他们并肩站在美国展览会的那间厨房里的時候，谁也没有想到有一天他们会作为各自国家的领袖在一起举行首脑会议。

看到尼克松进来，勃列日涅夫起身上前与尼克松握手，并把尼克松让到屋子一边的一张长桌跟前，两人隔着桌子相对坐下，苏方的译员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坐在桌子的一头。此前，曾有人建议尼克松带一名国务院的翻译，但他知道苏霍德列夫是位高明的语言学家，英语讲得和俄语一样好，并且觉得，如果只有另一个人在这场，勃列日涅夫说起话来也许会随便一些。

勃列日涅夫的语气比较友善，但用的字眼很直率。他说：“我必须首先告诉您，在你们最近在越南采取行动以后，能如期举行这次首脑会议可很不容易。只是完全由于改善苏美关系和两国间就某些重大问题达成协议十分重要，才有这种可能。”

接着，勃列日涅夫谈到发展彼此之间个人关系的必要性和好处。他说：“苏联人民铭记着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名字，因为他是1934年给予苏联以外交承认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并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希特勒同盟的领导人。”

尼克松说：“我曾经研究过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以及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关系的历史，发现战争期间下级之间的分歧往往由于在最高一级达成协议而得到解决。我希望和总书记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关系。”

勃列日涅夫爽朗地回答说，“我当然非常高兴，我这方面是完全准备这样做的。”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给那些官僚去决定，我们就永远不会有有什么进展了。”尼克松说。

“他们只会把我们埋在纸堆里！”勃列日涅夫开心地大笑，把掌心往桌面拍了一下。

首次会谈仅仅是礼节性的，大约半个小时后，苏方在葛拉诺维持大厅举行了正式国宴欢迎尼克松一行。勃列日涅夫指定波德戈尔内致祝酒词。波德戈尔内说：“虽然世界某些地方仍存在严重复杂的局势，但我保证我的国家将致力于使目前存在的紧张局势从根本上转向缓和。”这显然是间接指越南战争。尼克松在祝酒词中，也针对越南问题强调说：“核大国有严肃的责任在任何危机中采取克制态度，并采取积极的行动避免直接对抗。”他还重申他在5月8日讲话中提出的要点说，这些核大国有责任“影响陷于冲突或危机的其他国家，使他们的行为放温和些”。

宴会结束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就星期二的会议议程商谈了差不多1小时。

5月23日上午11时，美国客人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葛罗米柯和多勃雷宁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尼克松决定一开始就定下打算在这次首脑会议整个过程中使用的那种坦率的调子。

“我想讲一点苏联朋友们可能由于客气而不愿出口的话，”尼克松说，“我知道我是以非常强硬、注重冷战和反共出名的。”

柯西金冷冰冰他说：“不久以前，我也听到过这种说法。”

“固然我对我们的制度有坚定的信仰，”尼克松接着说，“不过同时我也尊重那些同样坚定地信仰他们自己的制度的人。两个社会制度不同的大国一定是有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存和合作的。但是，靠脆弱的感情或者靠掩盖实际存在的分歧这种办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坐在桌子两面的人都点了点头。

当天下午，尼克松和基辛格同勃列日涅夫和他的美苏事务顾问安德烈·亚历山德罗夫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举行了两小时会谈，双方在核查等问题上还存在一些分歧。晚上，双方又举行了一次时间很长的会谈来讨论一个争执不下的重大问题，那就是苏联的新型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部署在离莫斯科多远的地方。在开始讨论的时候，勃列日涅夫就随便把双方几小时以前刚商定的数字减掉300公里。“关于反弹道导弹的问题”他说，“看来已经解决了。1200公里，我们同意。”

“是1500公里，”尼克松说。

“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把它放到中国去吗？”勃列日涅夫假装生气他说。

“可是，总书记总该觉得，我是从来不斤斤计较的。”尼克松回答。

“1500公里，行啊，”勃列日涅夫不错过抢先表白的机会，说道，“你要我们东移，我们现在就同意这样办。1200公里我们接受起来轻易一些，不过1500公里也行。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再谈了吧。”

原来双方早就同意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具体条款的有效期为五年，可是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勃列日涅夫突然问道，“为什么不规定为十年呢？干吗只定五年？”基辛格冷静地指出，原先苏方自己提出的有效期甚至还只有一年

半。

“我认为，这个暂时性的协定对我们和全世界说来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尼克松说，“我倒希望来个永久性的协定，不过我的任期有限到不了五年。在那以后，我就离开了，到太平洋游泳去了。说不定还在那之前呢。”

“总统先生，可别在那之前离开。”勃列日涅夫说。

星期三下午，双方举行了美苏联合探索太空协定签字仪式。之后，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一起走出房间，坐船游览了一下莫斯科河。回到别墅时，大家心情都不错。因晚宴的时间预定为8点钟，勃列日涅夫提议饭前再开一次会。

尼克松、基辛格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温斯顿·洛德和约翰逊·内格罗蓬特坐在桌子的一边，对面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苏霍德列夫。一连三个小时，苏联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非常激动地向美方发动凌厉攻势。

勃列日涅夫指责尼克松说：“我认为总统先生并不是真心努力结束战争，而是想利用中国人作为工具来压苏联人干预北越人的事务。您5月8日的决定是不是气昏了才作出那样有欠考虑的行动。我想，全体美国人民肯定不会一致支持越南的战争。……我当然不相信那些在越南死伤或残废的人的家属会支持这场战争。”

当勃列日涅夫说得差不多时，柯西金接过大棒继续说：“总统先生，我认为你过高估计了在目前情况下从实力地位出发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北越人也许是不会拒绝其他国家的军队开进去和他们一道作战的。”

尼克松听到这句话，显然有些坐不住了，因为柯西金等于说不排除苏联直接干涉越南战争的可能性。尼克松也很激动，说：“你们的这种威胁一点也吓不倒我们。不过，你不妨再说下去，把话说得具体些。”

“不要错误地以为我们说的话是威胁，你们说的话就不是威胁。”柯西金冷冰冰地回答。他说：“刚才我们只是对可能发生的事作一番分析，这比威胁要严肃得多。”

接着，双方围绕越南问题又争论了一段时间。直到晚上11时左右，宾主双方才上楼，那里有一席丰盛的酒菜。宴会上一片笑声，又是说笑话，又是讲故事，就好像刚才楼下那场唇枪舌剑的会谈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回到克里姆林宫时，已经过了午夜。基辛格和葛罗米柯马上开始就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中悬而未决的几个关键问题举行会谈。但苏方仍坚持美方所不能接受的主张。当晚，基辛格又花了几个小时试图订出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协议。会谈最后在清晨休会，问题还是处于僵持状态。

5月25日晚上，尼克松一行到大剧院观看《天鹅湖》的盛大演出。这是来访的贵宾必不可少的节目。看完芭蕾舞后基辛格和葛罗米柯继续会谈。第二天早晨基辛格向尼克松汇报说，他们已经尽最大努力就现实情况作了磋商，但休会时还是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后来，当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尼克松的套间里谈话时，多勃雷宁带来了一个消息，说苏共政治局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同意接受美方的最后主张。

当晚，尼克松在驻苏大使的官邸斯帕索大楼举行宴会，席间人人兴高采烈。勃列日涅夫显得颇为开朗。宴席上的主菜是冒着火焰的“烤阿拉斯加”。上这道菜的时候勃列日涅夫说：“瞧！美国人真能创造奇迹！居然有办法把冰淇淋点着了！”

照基辛格和多勃雷宁在最高级会谈前商定的日程，26日（星期五）应该是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签字的日子。基辛格当即提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大重要，不能草率从事；如果谈判需要更多的时间，那就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如果结束不了，就改到星期六或星期日，再不行，就是拖到下星期日也可以嘛。葛罗米柯的主张则不同，他认为协定必须在星期五达成。

星期五凌晨1时，基辛格提出了总统的修改方案。这个方案事实上接近于最后达成的那个协议。按照协议中提出的条款，俄国人可以拥有的绝对限额是62艘现代化导弹潜艇和950个发射架。而美国接受的最高限额是44艘潜艇和710个发射架。但是总统坚持，如果俄国人想要达到那个限额，他们得“替换”或者淘汰大约240枚老式的SS—7、SS—8和H级潜艇导弹。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就方案的利弊辩论了两个小时，但是葛罗米柯既不能，也不愿作出最后决定。这个方案还须提交勃列日涅夫。

星期五上午，勃列日涅夫召开了政治局非常会议，讨论尼克松的这个最新方案。会上显然没有什么争论。这位苏联领导人有充分的理由来说，尼克松已经作出了重大让步。从建议的限制战略武器协定的条款来看，俄国拥有的导弹和潜艇要多于美国，而且对那些导弹的分导多弹头化或扩充海空军力量未加限制。

在苏共政治局向勃列日涅夫开放绿灯时，尼克松和基辛格正在克里姆林宫的总统下榻处开会，准备承受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失败的挫折。上午11时，葛罗米柯打电话来问基辛格和索南弗尔特，可不可以到叶卡捷琳娜大厅同他和斯米尔诺夫会谈？会谈时葛罗米柯着重表示僵局已经打破，勃列日涅夫准备接受总统的妥协方案，但要作一些小的修改。最后，经过双方最高领导人同意，两位谈判家握手了。

晚上11时左右，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率领一大帮苏美高级官员进入克里姆林宫金碧辉煌的弗拉基米尔大厅，准备签署限制战略武器的一系列协议。在称得上庄严隆重的场面中，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的领导人在适当限制两国战略核力量的史无前例的协定上签了字。尼克松用随身的钢笔签字，勃列日涅夫则从笔架上挑了一支。他们在两套俄文和两套英文的协定文本上签了字，然后各自留下俄、英文本各一份。美苏首脑签署的协定称为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它的基本文件有两部分：一项为《美苏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它规定双方反弹道导弹系统部署限制为两处（1974年7月3日又修订为一处），其中一处是用于保卫首都，另一处用于保卫洲际导弹基地。每个系统配备不超过100枚反弹道导弹以及相应的雷达系统和反弹道导弹发射架。两国还保证不在地面、海上、外层空间进一步发展、试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双方同意不进行国际或现场监督，只规定用“非侵入式的”手段来监督对方。另一项为期五年的《苏美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规定双方的进攻性洲际导弹冻结在现有水平上，规定了双方战略武器的限额，双方战略导弹总限额分别为美国1710枚，苏联为2358枚；陆基洲际导弹美国可拥有1054枚（其中重型导弹54枚），苏联为1618枚（其中重型导弹313枚）；潜艇发射洲际导弹美国为710枚，苏联为950枚；美国拥有装载洲际导弹的潜艇为44艘，苏联为62艘。协定对战略轰炸机的限额未作规定。

第二天，尼克松一行飞往列宁格勒，参观了皮斯卡尔叶夫公墓，在纳粹围城里牺牲的几十万人当中有许多就埋葬在这里。年轻的女向导把葬在公墓

里的 12 岁姑娘丹娘的日记给尼克松看，并把其中叙述丹娘全家人如何相继牺牲的几段翻译给尼克松听。这位向导眼里含着泪，念到最后一句：“都牺牲了。只剩下丹娘一个人了。”此时，她已泣不成声了。尼克松也很为感动，问这位向导：“后来丹娘怎么样？”

她抹着泪水说：“丹娘也牺牲了。”

尼克松此后一直没有说话，好像还在回忆丹娘的故事。离开之前，他在来宾簿上写道：“向丹娘和列宁格勒的所有英雄们致敬。”

飞回莫斯科后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天，尼克松到莫斯科唯一的一座浸礼会教堂福音派浸礼教全苏理事会教堂去做礼拜。接着，尼克松利用空余时间草拟准备对苏联人民发表的电视广播演说。像在 1959 年一样，尼克松认为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可以不受苏联政府的删节或限制，向俄国人民介绍美国对各项国际问题的观点。

在演说里，尼克松谈到了无限制地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性，着重说明了美国争取和平的真诚愿望。最后尼克松描述了前一天参观列宁格勒公墓的感受：

“当我们为缔造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而努力的时候，让我们想想丹娘，想想全世界其他丹娘和他们的兄弟姐妹。让我们竭尽一切力量来保证使其他儿童不致遭受丹娘经历过的苦难，使你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和全世界的孩子都能友好地和太平地生活在一起，度过他们的一生。”

广播过后，勃列日涅夫对尼克松说，结束语使他热泪盈眶。

正式会谈结束后，尼克松预定要乘俄国飞机前往基辅，这是仿效从北京飞往杭州的那次安排。机场举行欢送仪式后，总统登上了一架闪闪发亮的苏联喷气式客机。全世界的电视观众看到总统挥手和进入机舱的情景。然而，飞机没有起飞，引擎坏了。柯西金、波德戈尔内和克里姆林宫的其他领导人打着黑布雨伞在雨中恼火地站着。等了大约 30 分钟，电视屏上的飞机影像突然变成了一片空白，原来莫斯科电视台被延宕事故弄得狼狈不堪，干脆停止播送了。

在飞机里面，满脸通红的苏联官员向美国总统解释说，有一个引擎没有发动起来。驾驶员花了差不多：小时设法发动引擎，但还是不行。于是决定改乘一架备用飞机。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登上飞机向总统道歉。尼克松苦笑了一下说，幸好在起飞之前发现引擎有毛病。基辛格显然很想缓和一下苏联方面的尴尬处境，他问波德戈尔内有没有听说过“事物的恶作剧规律”。

波德戈尔内茫然不解，回答说：“没有听说过。”

基辛格解释说：“是这样的：如果你把一片涂了黄油的面包掉在新地毯上，这时，涂黄油的一面是否朝下，就直接同地毯的价值大小有关。”

美国人都笑了，但是波德戈尔内显然没有听懂这个笑话。他那张圆圆的农民脸上毫无表情。基辛格想再举一例来说明他的“规律”。

基辛格盯着波德戈尔内的眼睛说：“如果你把一个钱掉在地板上，这个钱是越滚越远还是向你滚来，这也直接同这个钱的价值大小有关。”

波德戈尔内还是茫然，最后说：“我每次把钱掉在地上，钱都是朝我滚过来的。”

基辛格马上言归正传，他说：“我们该上另一架飞机了吧。”这时，女服务员把这架出毛病的飞机上的鲜花糖果都挪到备用飞机上了。这架飞机的引擎发动起来了。

第一次首脑会晤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会议的主要成就是达成了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这是美苏自 1969 年开始的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所取得的成果。勃列日涅夫称协定是“历史上第一个具体限制最现代化和最强大的武器的协定”。苏联外交部发言人称，“在国际关系史上很难找出其他通过谈判取得如此丰硕成果的例子”。协定在美国国内引起的反应总的说来是良好的，美参议院以 88 票对 2 票轻易地批准了协定。但是，协定的作用仍是十分有限的。由于它并未禁止质量上的改进，双方将利用协定所敞开的方便之门互相争夺质量上的优势。因此，协定的签订并不能制止军备竞赛，它只是使核军备竞赛从着重数量转向着重质量。

此外，美苏还签订了其他一些协定，包括《设立联合贸易委员会以鼓励扩大贸易的协定》、《卫生合作协定》、《环境研究协定》、《空间合作协定》、《技术合作协定》、《海事协定》等。最后，双方签订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文件，它规定了双方同意遵守的十二条行为准则。这个文件不仅涉及双边关系和减少核战争危险的措施，而且还规定双方在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中减少紧张局势和冲突，特别是减少那些可能使大国卷入的紧张局势和冲突。

首脑会议上达成的这些协议，确立了在几个不同的领域里加强彼此的关系和合作的模式。这次首脑会晤标志着美苏“缓和”高潮的到来，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奠定了基础。西方舆论称，美苏首脑莫斯科会晤和签署的文件，标志着苏美关系在发生“根本转折”。

## 二、勃列日涅夫访美，与尼克松又是“微笑”，又是“窃窃私语”，签署了一大堆文件

尼克松 1972 年首次访问苏联，被看作是美苏关系“缓和”的主要标志。此后，国际形势和美苏两国国内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缓和的方向发展。由于首脑会晤和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在美国国内得到了广泛支持，加上此前中美关系的重大突破，尼克松声望大增，终于在 1972 年 11 月的竞选连任中取得了压倒优势的胜利。勃列日涅夫则通过首脑会谈显示出了两个超级大国在国际事务中的“突出作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美关系解冻和尼克松访华的影响，勃列日涅夫因此巩固了在苏共党内的领导地位。

1973 年，尼克松在年度对外政策报告中对今后的美苏关系的任务作了说明：

“我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迈出了这重要的第一步，使我们两个国家都摆脱长久的对抗状态。我们已经从对抗走向谈判，接着又走向范围不断扩大的各种领域。这个开端给我们带来的希望，要求我们把它贯彻到底。

今后的这些任务，既反映了这过去的一年令人失望的方面，也反映了这一年取得的成功：

我们为限制战略武器所作的努力现在已进入第二阶段。我们可以在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努力。我们现在对彼此关切的事情的了解，比四年前增加了。我们已经有了共同语言，已经建立了研究各种问题的技术基础。而且，我们彼此对于对方的目标是认真的这一点，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尊重和信任。

但是，我们面临着一项严重的挑战：要求每一方作出保证，在这十年和以后的时间内限制它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这将需要作出一些彼此尊重对方的

基本安全需要的政治决定，并且需要有一种通过公平的、双方都满意的解决办法使相互的正当利益保持平衡的意愿。

在欧洲，苏美关系取得的进展是引起进一步变化的一种触媒剂。在过去几年中，东西方在欧洲的关系只限于双边关系，我们现在则正在举行由我们的盟国比较充分地参加的谈判。欧洲安全与合作问题或共同均衡裁军问题，是不能仅仅由美国和苏联来解决的。但是，我们和苏联都能够对这些问题取得进展作出重大的贡献，而这种进展由于表明缓和有着广泛的基础，是符合欧洲所有国家的利益的，从而又将增强我们双边关系发展中的良好势头。

在中东，美国和苏联也能够单独地或者共同地对和平作出贡献。我们每一个国家都起着不同的作用，有着不同的利益和概念。但是，我们在避免对抗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从这一原则出发，我们两国都能朝着由直接有关各方取得一项和平解决办法的方面施加影响。

在双边关系方面，我们可以指出，在最高级会议上已经取得的进展，虽然不像一些较大的政治问题那样引人注目，但是利用我们技术上的专门知识和创造性来为我们两国人民服务，可以为大家都带来持久的好处。

我们有机会和有义务把我们关于经济关系的各项协定的诺言变为现实。我们正在找出美国和苏联经济相互补充的一些领域。苏联拥有能够满足我们需求的某些资源，而我们也可以出口一些苏联希望进口的商品和产品。

一年以前我曾说过，已经把一种新的推动力，给予了为达到同苏联建立一种更加建设性的关系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这种推动力已经使我们跨过了新门槛。

现在，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时期，但是我们只是看到这个时期的初步阶段。以前有过一些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的时期，早些时候也有过永远结束冷战的敌对局面的希望，承认这些才是现实的态度。目前的事态趋势是可以逆转的；新的因素会出现；态度可以改变。在一个过渡时期，尤其可能是这样的。

过去，我们同苏联关系的改变是短暂的插曲，这部分地是因为这种改变反映了策略的动机，或者只限于气氛方面的改变而不是实质方面的改变。我们去年在最高级会议上确立的东西则是较为持久的。它的基础是涉及双方利益的牢固的、具体的成就。但是，要把达成的广泛的谅解变为具体成果，就需要耐心、艰苦的工作和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美国和苏联就可以从共处向广泛合作迈进，并对世界和平作出无可比拟的贡献。”

在美苏首脑会晤的推动下，欧洲缓和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2年11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欧洲国家多边会议作出了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决定。关于欧洲共同均衡裁军的探索性谈判也于1973年1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

在亚洲，越南战争于1973年1月结束，这为美苏缓和的继续发展清除了一个重大障碍。同时，中美关系的新发展对美苏两国的缓和也是重要的推动力。

在这种形势下，美苏双边关系又有进一步改善。继达成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之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于1972年11月在日内瓦开始举行。两国经济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双方签订了一系列的经济与贸易协定。为继续发展美苏缓和的形势以及出于各自的战略考虑，两国领导人都希望举行一次新的首脑会晤。

1973年2月，勃列日涅夫致信尼克松，表示希望举行最高级会晤。他说，



他期望签订不使用核武器条约；对中东问题进行有益的讨论；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进一步协议；签订贸易和经济协议以及在科技、卫生、和平利用核能等方面进行合作的协议；讨论两德之间的关系；就欧洲安全和欧洲共同均衡裁军举行会谈。

尽管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于举行新的首脑会晤非常有利，但美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却使 1973 年的首脑会晤出现了不良的兆头，其中最具消极影响的无疑是“水门事件”。因此尼克松把勃列日涅夫的此次访问看作是“对付马格鲁德在水门事件上提出的指责和迪安即将进行的作证的政治武器”，以摆脱“水门事件”的困境。此外，自首次首脑会晤以来，美国国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在制约美苏缓和方面形成了某种联盟。基辛格事后称之为如日食般罕见的会合。一方是自由派和美国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断定，向苏联限制极严的移民政策，特别是向有关苏联籍犹太人的移民政策提出挑战，现在正是好时机。另一方是保守派，他们一向反对缓和，甚至反对与共产党国家交往。1973 年 4 月尼克松向国会提出给予苏联以最惠国贸易地位的要求，这就更加促使两派有了共同点：自由派要求若通过此项法案必须以苏联放宽移民政策为条件；而保守派则希望根据缓和根本不是好东西的原则攻击此案。

5 月 4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苏，为预定 6 月举行的首脑会晤作准备。

基辛格抵达莫斯科后，被邀请前往伏尔加河畔扎维多沃村附近一个警卫森严的政府大院同勃列日涅夫会面。这里离莫斯科不到 100 里，相当于美国的戴维营。基辛格是第一个被邀访问这个园林胜地的西方人。大院的四周禅树成林，备有游泳池和蒸气浴室，苏联领导人有时到这里打猎散步。离扎维多沃不远有个人工湖，勃列日涅夫偶尔在湖上驾艇游乐。基辛格被安置在一座打猎住所里，靠近勃列日涅夫的别墅。

在四天逗留时间里，基辛格和勃列日涅夫达成了一系列的协议，准备勃列日涅夫同尼克松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公布。基辛格通过会谈发现，勃列日涅夫访美至少有两点考虑：一是寻求美国的援助来帮助度过经济困难，实现苏联现代化；二是急于巩固同美国的关系来抵消中美的修好。

赴美的前两天，勃列日涅夫想方设法通过美国的电视和报纸，把自己塑造成是个大西洋彼岸称兄道弟的老朋友的形象。他在莫斯科为 11 名美国记者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并花了三个多小时同他们一起参观克里姆林宫，纵谈他即将进行的访问。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第一次公开提到美国的水门丑闻。

他说：“我脑子里从来没有想过尼克松总统会由于水门事件而丧失什么影响。我去美国并没有打算利用水门事件对总统施加什么压力。如果我提到这个问题，那就太不像话了。”6 月 16 日下午，勃列日涅夫乘坐的一架四引擎的伊尔—62 喷气机在美军安德鲁斯空军基地降落。陪同勃访美的有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民航部长布加耶夫等。由于苏方的坚持，勃列日涅夫到达机场的仪式是非正式的，只有一小批记者在场采访。这同 1959 年尼基塔·赫鲁晓夫访美所受到的欢迎形成鲜明的对比。那次是礼仪隆重，美总统、显要官员、仪仗队全都出场，还有大规模的新闻报道。这次勃列日涅夫抵达时正下着霏霏细雨。在安德鲁斯机场主持欢迎仪式的美国国务卿罗杰斯说：“这是一场麦季雨，在美国算是一个很好的兆头呢。”勃列日涅夫微笑着说：“尼克松总统一年前抵达莫斯科时也曾遇到毛毛雨，我们说那是一场‘蘑菇雨’，这真是一种巧合！”勃列日涅夫把外衣披在肩上，

同等候在那里的苏联外交官和家属谈了几句，就去戴维营了。由于计划决定6月18日才正式开始最高级会议，尼克松已去佛罗里达州度周末。勃列日涅夫将在戴维营休息两天，以适应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的时差。在勃列日涅夫到达戴维营不久，尼克松即打电话给他，表示非常欢迎他到美国来。多勃雷宁在一个分机上当译员，但他还未来得及开口翻译，勃列日涅夫就用英语连声说：“谢谢你！谢谢你！”尼克松说：“乘喷气机的疲劳不是一下子恢复得了的，希望您尽量休息好。”勃列日涅夫说：“非常感谢总统先生考虑如此周到，为我准备了戴维营这样幽静而舒适的地方。遗憾的是，我的妻子未能同行。”尼克松说：“我和帕特期望两年之内在美国举行美苏第四次最高级会议，到时希望您能和夫人同来。”这时，美国国内对“水门事件”还沸沸扬扬，苏联人虽十分注意这件事，但很不理解。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他对美国人在整个事件上的做法，感到非常震惊。他称水门事件为“一团糟”，并说别的国家绝对不会容许人们作出如此公开揭露自己的事情来。

迪安在欧文委员会上的作证已延期到勃列日涅夫走后进行，但是迪安及其同伙以及欧文委员会的一些人士对水门事件进行揭露和指控之声仍不绝于耳。在勃列日涅夫到达的当天上午，《华盛顿邮报》在头版就有一篇报道透露：“某些人士”说，尼克松为了拼命保住自己，将抛弃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二人。这篇报道其实纯属虚构，其意图是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尼克松的白宫是一个极不讲道义的地方，尼克松可以为了保住自己翻脸不认自己最亲密的助手。

尼克松对这个头版刊登的报道非常气愤，为了澄清事实，他公开予以否认，没想到第二天该报却把尼克松的否认登到第五版去了。

6月18日上午将近11时，勃列日涅夫的汽车顺着弯曲的车道开到白宫的南门廊前停了下来。尼克松在欢迎词中说：“目前全世界都寄希望于我们即将举行的会议。”

勃列日涅夫的答词也很热烈：“我和随行的同志们准备努力工作，以保证我们与你们即将举行的会谈……我们将不辜负我们两国人民的期望，并有益于全人类的和平前途。”

在双方简短致词后，两国领导人走出去，到被雨淋湿的草地上检阅仪仗队。当检阅完前排仪仗队，正要回头检阅后一排时，勃列日涅夫抑制不住他激动的心情，向正在鼓掌和挥动美、苏两国国旗的群众热情招手，然后阔步走到他们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尼克松见状，通过翻译低声提醒他：仪式尚未完毕，勃列日涅夫这才罢休。

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第一次会议是秘密的，只有在1972年就曾是译员的维克托·苏霍德列夫在场。勃列日涅夫一开始就说：“我是代表整个政治局说话的。”言下之意，尼克松目前说话还能否算数。

尼克松说：“尽管国内意见有分歧，我也遇到一些麻烦，但我是代表大多数美国人说话的。”

在会谈时，勃列日涅夫显得很激动，几次都紧紧抓住尼克松的手臂，以强调他所阐明的论点。到勃列日涅夫阐明有关两国之间关系的看法时，神情变得极其严肃。他说：“我们知道就力量和影响来说，世界上只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国家真正管事。任何事情只要我们两国之间决定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即使可能不同意也不得不跟着我们走。”虽然他没有提到中国，但他显然想使这次最高级会议表明美苏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

尼克松回答道：“我承认，我们两个最突出的核超级大国，这是现实，但我们双方都有盟国。他们全是有自尊心的，我们做事绝不应漠视他们的利益，否则会把事情弄糟。”

12时30分秘密会议结束，这时双方其他参加会议的人进来了。勃列日涅夫引用了他后来在访问期间屡次引用的一句俄罗斯谚语。他说道：“我们常说‘生活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生活已引导我们得出结论：在我们两国之间；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关系。”然后他转向室内其他人宣布，他已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4年访问苏联，尼克松已愉快接受了邀请，全场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当晚在白宫为勃列日涅夫举行了国宴。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在蓝厅逐一接待来宾。来宾包括政治、商业、劳工各界领袖，其中有许多人在政治上是互相对立的，但在社交上都来到总统住所聚会一堂，欢迎苏联领导人。这显然给勃列日涅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使他感到有些惊讶。勃列日涅夫几次问尼克松：“他们都支持苏美新倡议吗？”尼克松说：“不仅是在这个大厅，而且是在全国，无论是哪种组织，绝大多数美国人都是支持苏美友好这个目标的。”

在第一轮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对于美国未能给予最惠国待遇表示失望，但他明白责任在美国国会，非尼克松总统力所能及。苏联并不准备对他们本国多弹头导弹的发展加以限制，所以勃列日涅夫仍坚持反对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就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达成协议。然而，他还是勉强地默然同意了尼克松提出的要求：以1974年底而不是以1975年为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达成永久性协议的最后限期。

在公开集会上，勃列日涅夫的举止热情洋溢。他像一个熟练的演员懂得如何占有舞台中心。在一次签字仪式上，他使劲举杯祝酒，结果把香槟酒溅到衣服上了，于是他用手帕掩面，故作窘态。在另一次签字仪式上，他带头演出了一出哑剧，装作要同尼克松比赛，看谁先签完各种文本。

6月19日夜晩，两国领导人乘“美洲杉号”游艇出游，然后坐直升飞机飞往戴维营，在那里继续讨论。尼克松送给勃列日涅夫一件皮茄克，上面盖有总统的印玺，下方一端印有“戴维营”字样，另一端印着“列昂尼德·I·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很高兴，在戴维营期间，他大部分时间都穿着这件皮茄克，与新闻界合影时也如此。为了纪念他访问美国，尼克松还送给他一件正式的礼物，一辆由福特汽车公司捐赠的林肯牌大陆型深蓝色小轿车，车内的座垫是黑丝绒面的，仪表板上刻有“特别良好的祝愿向您致意”的字样。

勃列日涅夫喜欢收藏各种类型的豪华汽车，见了这辆汽车眉开眼笑，毫不加以掩饰，并坚持要当场试车。

勃列日涅夫很熟练地坐在驾驶座上，双手握在方向盘上，仔细地看了一下各种仪表，然后热情地向尼克松做手势，要尼克松也上车。

总统正在上车时，总统的特工队长立即上前拦住了，说：“总统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您不能上！”

总统笑着说：“没关系，难道总书记就不怕死吗？”他示意特工队长不要阻拦，坐在了勃列日涅夫的旁边。

车开动了，沿着一条环绕戴维营的窄路而下。勃列日涅夫是在莫斯科的中心车道上畅行无阻地开惯了车的，所以车速开得很快。当行至一个坡顶时，看到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慢行，前有险弯”。尼克松以前驾驶高尔夫球车

下坡，由于怕在坡下急转弯的路上出事，也得踩闸。但勃列日涅夫在车快到斜坡时仍以 50 多英里的时速开车。尼克松倾身向前说：“慢点开！慢点开！”

但勃列日涅夫毫不在意。到达坡下时，他猛然急煞车，使车拐了弯，汽车轮胎发出尖叫声，尼克松出了一身冷汗。

试车完毕，他对尼克松说：“这辆车好极了。走得真稳。”

尼克松回答道：“你真是了不起的驾驶员。以我们刚才的速度拐那个弯，我恐怕永远也办不到。”

在戴维营举行的会议上，双方长时间地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问题、欧洲安全问题以及有关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之间军事力量对比的共同均衡裁军谈判问题。在这些问题中，最困难和最有意义的是有关拟议中的防止核战争协定问题。首脑会晤前，勃列日涅夫曾强烈要求美方同意签订一项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但是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签订这种条约的实际后果必然是被限制，至少也是不准使用核武器保卫盟国或本国的重大利益。

早在 5 月份，基辛格就拟出一个方案，部分地满足了苏联的建议，但并没有削弱一旦受到苏联袭击指望美国给予援助的盟国和其他国家。基辛格所建议的不是签订一项在发生战争时不使用核武器的条约，而是美苏双方不仅在彼此之间，而且在彼此任何一国和第三国之间都不应使用武力，并同意在使用核武器的危险迫在眉睫时彼此进行磋商。尼克松知道勃列日涅夫对此方案并不会感到完全满意，因为它并不妨碍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但从他的目的来说，有胜于无，于是他便同意了该方案。6 月 22 日，两国领导人在白宫东厅举行了正式仪式，签订了这项协定。6 月 22 日下午早些时候，两国领导人飞往加利福尼亚州。到达圣克利门蒂尼克松的住处后，尼克松带勃列日涅夫坐他的高尔夫球车去兜风。到这里以前，尼克松曾建议勃列日涅夫住在附近的海军陆战队彭德尔顿营基地长官的大房子里，但勃列日涅夫硬要和尼克松同住。

尼克松在圣克利门蒂的房子尽管很漂亮，但按苏联领导人的标准，就未免太小了。他们习惯于沙皇贵族的乡间住宅和别墅，而这房子的设备根本不适于接待国宾。朱莉和特里西娅的卧室是仅有的空房。因为特里西娅最近重新装饰了她的卧室，所以尼克松就把勃列日涅夫安排在那里。整个房间大约只有十英尺宽十五英尺长，特里西娅所选的墙纸上有柔和的淡紫色和蓝色相间的大花卉图案。把勃列日涅夫那样魁梧的人物安置在一间女性味十足的房间里，连尼克松本人想起来都觉得蛮有趣的。

在华盛顿和戴维营进行的会谈中，勃列日涅夫在中国问题上极其克制。但 6 月 23 日下午他毫不掩饰他的忧虑。他很担心美国正在考虑与中国人进行一些秘密的军事安排，可能要签订一项共同防御条约。

尼克松保证：“虽然我们同中国将继续交往，但我们绝不会同中国或日本作出任何违背我们在华盛顿刚签订的防止核战争协定精神的安排。”尼克松说：“我确实认为您对中国人的忧虑是没有道理的。”

勃列日涅夫则反问：“为什么没有道理呢？”

尼克松说：“我的判断并非根据我们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过的谈话，而是根据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而作出的。中国人要获得足以对苏联或其他主要核大国冒险采取侵略行动的核能力，至少需时二十年。”

勃列日涅夫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你的意见。”

“那你认为中国成为一个主要的核大国需要多长时间？”

勃列日涅夫举起双手摊开十指。起初尼克松以为他在做某种投降姿势，后来，见勃列日涅夫挺直了手指说：“十年，十年之后，他们就会拥有我们现在的武器。到那时，我们当然又向前发展了，但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明白：不能老这样下去。1963年，在我们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我记得毛泽东说过：‘中国人死了四亿，还有三亿。’这就是中国领导人的心理。”

会议结束时，勃列日涅夫尽管情绪显得很强烈，但他还是尽量用外交方式敦促美方不要同中国签订任何军事协定。他说：“1972年我们会晤时我没有提这个问题，但现在我有些担忧。我们无意进攻中国，但是如果他们与你们签订了军事协定，那就把问题搞乱了。”

讨论后，两国领导人参加了在游泳池旁举行的鸡尾酒会。来宾排成一行来见苏联贵宾，勃列日涅夫一一和他们握手，向来宾致意。尼克松致欢迎词后，勃列日涅夫说：“我在尼克松总统和夫人家里作客，感到非常幸运。”

接着，尼克松为客人设了便宴。餐厅只坐得下十个人，之所以有意安排这个非正式宴会，主要考虑是让客人感到随便一些。

尼克松在祝酒时说：“总书记曾告诉我他通常在大型的国宴上吃得很少，回家以后再同他的擅长烹饪的妻子一起吃夜宵。我认为我们家里举行的这次便宴，比我们双方都很习惯出席的正式官方宴会更有意义。总书记是与我们同住在一起的第一个外宾，他睡在特里西娅的卧室，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则合住在戴维和朱莉来探望我们时所住的那所待客的小屋里。大家相处得很融洽。”

尼克松说：“总书记先生，你可以看到，这房子不大，但它就是我们的家。在这种场合，我们的思想就离开政务，转向我们的家庭，转向可能远在他方的亲人。我希望我们的子女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成长，正如我确信你希望你的儿孙能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成长一样。你和我于去年和今年举行的会议皆有助于实现这个目标。我只希望将来世世代代的俄国人和美国人会像我们一样，在彼此家里会晤，这是由于我们彼此的情谊而产生的朋友之间的会晤，而并不是由于我们两国之间存在着分歧需要解决而举行的官员之间的会晤。因此我除建议为你的健康，为其他来宾的健康干杯外，更要为勃列日涅夫夫人，为你们的孩子和我们的孩子以及全世界所有的孩子干杯，因为我们相信，由于我们所做的工作，他们将有一个更加幸福、更为和平的未来。”

当尼克松的祝酒辞译出后，勃列日涅夫热泪盈眶。他感情冲动地离开他的座位，向尼克松走来。他伸出两臂，给了尼克松一个真正熊式的拥抱，然后建议为帕特和他们的孩子以及世界上所有的孩子干杯。

宴后，勃列日涅夫向其他来宾表示歉意，说他和总统夫妇要离开片刻。然后他将尼克松夫妇拉到一旁说：“我们已经交换了正式的礼物，但我还专为你和尼克松夫人带来了一样东西。”他送给帕特一条由他家乡手工艺工人用手织的围巾，对她说：“这件礼物很轻，但这条围巾的每一针都体现了苏联全体人民对美国人民怀有的友好感情，体现了我夫人和我对你和尼克松总统的友好感情。”

便宴结束时，勃列日涅夫说他感到累了，打算早点睡觉。尼克松陪他一起走到特里西娅的卧室门口，在那里道了“晚安”。尼克松自己也决定这天晚上早点睡，十点半左右就换了睡衣，躺在床上看书。

突然，尼克松听到敲门声。特工人员送来一封基辛格的信，说勃列日涅夫想要会谈。

尼克松立即叫人到他楼上的书房里生上火。接着自己就穿衣服，刚穿好，基辛格就进来了。

尼克松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基辛格答道：“他说他想要会谈。”

尼克松问：“这是由于他们睡不着觉的缘故呢，还是耍些什么花招？”

“谁知道他们搞的是什麼名堂？”基辛格耸耸肩回答道。

尼克松和基辛格走到书房不久，勃列日涅夫、多勃雷宁和葛罗米柯也来了。

“我睡不着，总统先生。”勃列日涅夫满面笑容地说道。

“这倒给我们一个毫不分心地进行会谈的好机会。”尼克松一面回答，一面坐在他的小沙发上。

接着会谈进行了三个小时，其情绪之紧张，几乎与在苏联人夏季别墅举行第一次最高级会议讨论越南问题时不相上下。这一次讨论的是中东问题，勃列日涅夫试图逼尼克松把根据阿拉伯人的条件所拟定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以色列。他不断重复说，为了解决中东问题，双方必须就一系列“原则”达成协议，即使是秘密协议也好。关于这些原则，他举例提出：以色列军队从它所占领土撤走；承认国界；船只可自由通过苏伊士运河；解决方案需有国际保证。

尼克松指出：“我没有办法同意任何一条这样的‘原则’而又不致损害以色列的权利。重要的是要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开始谈判。如果我们事先定下来将会引起争论的原则，双方就会拒绝谈判，这样一来，上述原则反而会适得其反。”

尽管勃列日涅夫的态度直率强硬，但由于双方意见分歧，未能取得共同点。对此，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于次日签署的联合公报并未使用外交辞令加以掩饰。关于中东问题只写了很短的一节：“双方在此问题上都阐明了各自的立场。”

6月25日，勃列日涅夫结束了他的美国之行，飞回莫斯科。

在第二次首脑会晤中，双方再次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问题。由于无法取得具体的突破，双方仅就战略武器会谈的某些原则达成了协议。首脑会晤的一项具体成果是双方签署了《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在无法达成战略武器协定的情况下，苏联认为，签署这样一个协定有助于继续保持缓和的势头。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文件：

《苏美联合公报》；

《苏美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

《苏美关于和平利用原子能协定》；

《苏美农业协定》；

《苏美关于世界海洋研究协定》；

《苏美关于运输协定》；

《苏美1974~1976年文化科学交流计划》；

《苏美关于所得税条约》；

《苏美航空议定书》；

《苏美关于（贸易）磋商的议定书》；

《苏美关于商务联系的议定书》；

《苏美关于接触、交流和合作总协定》。

会谈中，双方还讨论了中东形势、越南问题以及欧安会和共同均衡裁军等问题。

这次勃列日涅夫访美，受到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但评价不一。美苏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极力渲染会晤的“友好”气氛，宣扬取得的所谓“成果”。勃列日涅夫说，访问表明“人类已摆脱了企图加给它的‘冷战’的坚硬镣铐”。1973年6月29日，苏联发表的关于勃列日涅夫访美结果的公报，也宣扬首脑会晤“为发展苏美关系开辟了新的良好前景”，“为加强两国的互利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对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巩固普遍和平与各国人民安全作出了贡献”。基辛格认为，这次首脑会晤是“表明一个和平的世界正在出现的最好的象征之一”，“国际行动的新时代已经开始”。

然而，世界舆论也对首脑会晤的一些“成果”颇感担心，有的认为“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缔结了一种‘神圣同盟’”，试图“在一段时间内把全世界置于两个超级大国事实的监护之下”。实际上，两国首脑会谈表面上气氛“热烈”、“友好”，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又是“微笑”，又是“窃窃私语”，似乎关系非常融洽，但双方在实质性会谈中进行着“激烈的讨价还价”，两个超级大国的进一步接近并没有使斗争停止，而只是使斗争改变了形式。

### 三、“水门事件”使尼克松的谈判地位更加虚弱，尼克松与勃列日涅夫的第三次会晤不得不草草收场

第二次首脑会晤后，“水门”事件的阴云笼罩着美国国内政治舞台，它使美国政治生活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尼克松的政治地位继续恶化，对美苏缓和与美苏双边关系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尼克松政府内部在缓和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尼克松和基辛格为达成一项新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的努力遭到了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为代表的军方的阻拦。国会里以参议员杰克逊为首的反苏强硬派继续以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来干扰东西方贸易。

在国际上，缓和也遭到了一些挫折。1973年9月11日，智利阿连德总统在一次由美国暗中支持的政变中被推翻，苏联怀疑美国正在利用缓和在第三世界扩大它的影响。1973年10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实际上是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的一次较量，并使美苏关系一度陷入危机，人们开始看到缓和上空正在聚集的片片乌云。但是，缓和的势力还在继续发展。

1974年1月，苏联已同意公开宣布，预定于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第三次美苏首脑会晤。在尼克松看来，这个决定可能是苏联人相信他将在弹劾案中取胜的一种表示，或者是苏联人要表明不管谁当总统都有意让缓和继续下去。

其实，关于第三次首脑会晤最有决定性和最激烈的斗争，不是发生在莫斯科，而是发生在华盛顿。华盛顿反对缓和的势力的活动，随着会晤日期的临近，几乎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对于这股势力，尼克松很想有效地加以阻止，但是水门事件严重地破坏了他的这种能力。

3月24日，基辛格访苏为预定于6月底开始的美苏第三次首脑会晤作准备。在临行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对首脑会晤作了过分乐观的估计。他告诉记者，美苏双方在解决限制战略武器僵局方面已接近于实现“概念上的突破”。但是，苏联的消极态度给基辛格泼了冷水。双方在限制战略武器上的分歧并未缩小。

从第二次首脑会晤结束至1974年春，双方围绕进一步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日内瓦提出了许多建议和反建议，但进展甚微。在此期间，美国要求对投

掷重量和多弹头导弹作出限制，而苏联则继续要求限制美国在海外前沿基地上的核力量。在基辛格赴苏会谈中，苏联表示愿意接受对多弹头导弹规定不同数量限额的建议，但只允许美国的多弹头导弹比苏联多 100 枚。基辛格表示反对，还提出对陆基洲际导弹进行分项限制的建议，但遭到勃列日涅夫的拒绝。由于会谈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基辛格不得不从莫斯科空手而归。

6 月 20 日，美国召开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国防部长施莱辛格提出了五角大楼的建议。从这些建议及会上的讨论看，美国军界简直是抱着一条毫不妥协的强硬路线，即反对签订任何不能使美国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有限战略武器协定。

在争论双方都已陈述了自己的论点以后，尼克松总统插话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时机找出一个更加实际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国防部长施莱辛格的建议根本不可能被苏联接受，因此我们应该想法制定既符合我们利益又使他们能接受的办法。”

这时全场鸦雀无声，过了一会，坐在总统旁边的施莱辛格说：“可是，总统先生，人人都知道，在那次厨房辩论中你的辩才给赫鲁晓夫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如果您这次运用您的口才，完全可以使苏联接受这个建议。”

尼克松听了这句话非常气愤，当时脸色都变了。在他看来，施莱辛格的表演太过分了，也令他震惊。施莱辛格提出用总统的辩才就可以把他所提出的建议推销出去，这话实际上是对任何人的才智，特别是对总统的才智的一种侮辱。但从大局和自己身分的考虑，尼克松没有发作，以沉默表示不满和愤慨。

后来，副总统福特打破了施莱辛格发言后出现的沉默，把讨论转到更广泛的国防预算问题方面去。福特提议应该大大增加国防预算，以便能更好地跟苏联讨价还价。讨论进行了几分钟后，尼克松说：“我最关心的是不管谁继任总统，让他不用再像我在这五年半里那样为了反弹道导弹、巨大的国防预算、三叉戟潜艇等等进行这样艰苦的斗争。我们很可能会遇上这样一个人，他尽管口里大谈美国必须天下第一等等，但是一旦权势集团的报界在自己人当政以后无疑会提出和平主义看法的时候，他也就完全屈服了。”

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如果可能的话，应使苏联受到某种约束，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将来我们卷入一场无止境的竞赛，他们很可能会毫无限制，而我们却受到限制。”

尼克松还在会上说明，一个美国总统作出的决定跟苏联总书记作出的决定是非常不同的，言下之意是他的意见很难得到广泛的支持。他说：“我们可以肯定，苏联总书记的决定一定会也一定能够付诸实现。即使有公众舆论反对，他也不必要过多去考虑。可是，当美国总统作出一个决定的时候，从来也不能绝对肯定他的决定一定能够实行。这种肯定对不肯定的情况倒不一定会极大削弱我们实际的讨价还价的地位，但它却使我们在和苏联谈判任何交易的条件时必须得把这个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如果我们达成一个约束我们双方行动的协定，这就是说我们将在他们最终必然要做的某些事情上给他们以约束。而在我们约束自己的时候，很可能我们只是在某些反正我们不打算做什么的某些领域给自己一些约束而已。”

总统心里十分清楚，国防部里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意签订任何协定，是因为他们要尽可能地搞他们能搞的一切国防计划，他们不愿意受任何约束。对



于美国的国内情况，勃列日涅夫也很关注，并有些怀疑尼克松在国内问题上作出决定的能力。他很担心尼克松如果突然或意外地离职，会使他在自己的统治阶层中处于非常尴尬和容易受到攻击的地位。而且，为了缓和，他必须冒一定的风险。

1974年4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沃尔特·斯托塞尔向白宫发回一份报告，讲到在一次会见时勃列日涅夫看来特别担心美国的国内问题会影响美苏关系的进展。斯托塞尔在报告中说：“勃列日涅夫说他佩服总统所进行的反击，称之为政治家的一个特点，他对现在美国居然可以在总统缴纳税款的问题上跟他为难表示惊讶。他认为总统的反对派是‘没有头脑的’。”

4月11日，葛罗米柯来见尼克松，他第一句话就肯定地说：“尽管美国报刊上发表了反苏的报道和文章，苏联人仍然坚决支持缓和。”接着，在一种不寻常的表示个人关切的气氛中，葛罗米柯说：“我只是想对您说，尽管有某些众所周知的困难，但我对您能坚决顶住表示钦佩。我们是从人的立场对您表示钦佩。”

这次会见的其余时间，都花在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数目的争论上，双方都没有作任何让步。当尼克松送葛罗米柯走到西厅门口的时候，葛罗米柯说：“我们相信您一定理解我们希望您一定能来参加会议，希望不会出现任何波折。”

尼克松信心十足地说：“如果我们失败，后代将会诅咒我们，我们必须成功。”

6月25日，尼克松一行离开华盛顿，第一个停留地点是布鲁塞尔，尼克松在那里参加了庆祝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的仪式。尼克松想在跟勃列日涅夫一起坐下来之前，大大宣扬一下大西洋联盟持续不断的活力。他在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理事会作的正式讲话中说：“缓和时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机会，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危险。我们必须承认欧洲政治已经完全改变的事实。我们还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已不再是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实际动力；如果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打算生存下去，它就需要其他有效的动力使它团结起来。”

6月27日，尼克松的专机徐徐降落在莫斯科机场上，勃列日涅夫亲自来到机场迎接。当尼克松走下飞机时，勃列日涅夫大步走过跑道来欢迎。相当多的一群人获准站在栅栏后面挥舞着纸制的旗子，当车队前往克里姆林宫的时候，沿街也都有人群，这和1972年时的冷清形成强烈的对比。

尼克松到达不久，勃列日涅夫便邀请尼克松到他办公室去进行一次私下会谈。他告诉尼克松最近与特迪·肯尼迪和艾夫里尔哈里曼的会晤，他说他们两人都支持缓和。尼克松对他说：“在从现在到1976年这段时间里，你会晤两党的领袖是再好不过了，因为需要他们都来支持缓和。我们得让他们都稍稍清醒一些。”

勃列日涅夫说：“我一直注视着美国的政治局势，但我深信您的总统职位一定可以延续到1976年。”

正式会谈的第一天，美方提出了禁止核试验的问题。苏联人和以往一样，不同意制定必要的现场检查办法。在3月份基辛格先行访问莫斯科期间，苏联就提出“有限”禁止核试验的建议。根据这一安排，只要核武器的大小和威力不超过一定的限度，便可以试验。既然每个国家都能用地震仪测出违反规定的情况，那么就不必要有什么现场检查了。可就在这一天的下午，勃列

日涅夫突然提出：“你们不要再争论禁止核试验的限度问题了，还是在全面禁止核试验方面取得一致意见，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

这下子，尼克松懵了，因为谁也没有思想准备。由于没有办法能事先阻止这种节外生枝的建议，尼克松不得不采取一种非常坦白和实用的态度。尼克松回答道：“在我来之前，我们非常深入地讨论过这个问题，确实，我们参议院里有一些人赞成全面禁止核试验，就此我们设法商定一个较低的限度来对双方进行约束，这是我们能取得我们国会多数人支持的唯一可行办法。我们不能采纳全面禁止核试验的建议。”

在一阵舌战以后，尼克松说：“很坦白地说，在1976年即将来临的时候，在有关缓和的问题上，美国出现了十分滑稽的局面。那些在过去两年赞扬我们的缓和努力的人，现在与其说是为了哲学上的原因，不如说是为了党派斗争，却愿意看到我们的努力归于失败了。因此，如果我今天在这里毫不让步，是不会为自己招来敌人的。”

“我提出这些论点并不是为了表明我的立场仅仅是从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出发的。我愿意朝缓和的方向前进，是因为它对世界和平来说是不可缺少的，这也是我们常希望我们能达成并履行任何可能达成的协定的原因。”

“我现在处于一个奇特的地位，完全可以引导美国公众去支持缓和。我能对付我们的所谓鹰派，但是只能一步一步来，而且我决不希望这种做法受到阻挠。我希望它继续下去。”

尼克松指着大厅人口处那扇笨重的金色大门说：“当我们看到那金色的大门时，我们可以说我们全都想够着它。可是如果我们想一步就够着它，那是办不到的……”

这番坦率的谈话在一般的外交谈判场合是很少见的，这使在场的人都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勃列日涅夫说：“我得和我的同事们商议一下，然后再找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接着，双方就讨论尼克松一行最晚什么时候应该离开莫斯科的问题，因为尼克松希望在黄昏前到达克里米亚，以便能看到那边的乡村景色。接着，尼克松夫妇与勃列日涅夫一起从莫斯科飞往克里米亚，在黑海海边的雅尔塔郊区勃列日涅夫的别墅里继续讨论。两国首脑在去克里米亚的途中，勃列日涅夫在飞机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由于是用俄语，尼克松一句也没听懂。勃列日涅夫与夫人通了一会话后，把电话给尼克松说，“我妻子向您问好！”尼克松接过电话说：“Ochen Priatno。”这是尼克松刚学会的一句俄文问候语，是“非常高兴”的意思，看来这使勃列日涅夫的妻子非常激动。到达克里米亚的第一天，俩人向一所部分建在岩石里面的房子走去，房子的一边是许多面向大海的窗户。勃列日涅夫把这房子叫做海滨浴室。勃和尼走进去，脱下外衣，在其他人到来一起开全体会议以前，私下与尼克松会谈了一个多小时。

由于只有两个人谈话，所以要直率得多。勃列日涅夫第一次提出缔结美苏条约的新想法，别的国家也可以参加，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或是它的一个盟国受到攻击，每一个国家都要来保卫它。尼克松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转移了话题，说：“如果缓和在美国失败，那得势的将不是鸽派而是鹰派。我个人觉得，哪怕只是为了不让杰克逊和舆论界某些批评家有攻击的借口，您也应该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作出某种姿态。”勃列日涅夫似乎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想详谈，便从他的公文夹子里抽出统计资料说：“这里是一些统计数据，我将把它们交给多勃雷宁，然后让多勃雷宁把它们转交给基辛格。”

俩人的谈话无拘无束地从计划中的欧洲安全会议，谈到裁减核武器，也谈到了中东问题。当其他人来到海滨浴室一起会谈的时候，谈话又回到美苏双方在多弹头核导弹或称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问题上碰到的僵局。

“好吧，让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尼克松说，“因为，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现在也应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基辛格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能接受你们提出的数目。如果我们接受了，我们就要在一年内停止制造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与此同时你们却可以继续制造四年。”

基辛格说：“在美国，这就会被说成是我们接受冻结，同时却允许苏联赶上来。”随后提出了美国在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方面的反建议。这反建议没有完全像五角大楼所主张的那样过火，可是它为美国规定的数字比苏联的大得多。基辛格说：“我们对我们的自己的潜力的限制要比我们要求对你们的限制大得多。”

争论持续了约有一个小时。突然，勃列日涅夫隔着桌子望着尼克松，沉重地说，“总统先生，如果基辛格博士刚才提出的是你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最后意见，那我们就没有达成协议的基础。”

他马上又转身去接着与基辛格辩论，但没有结果。

次日早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一起乘车赴机场。他利用长时间坐车的机会再三在中东问题上向尼克松提出要求。他说，萨达特可能相信应把埃及放在第一位，纳赛尔却更依赖一种更强烈的泛阿拉伯主义情绪。尼克松没有向勃列日涅夫重述对萨达特的立场，尼克松认为萨达特是既明智而又灵活地站在那两个极端之间。尼克松说：“别让中东变成美国和苏联的巴尔干。在有许多更重要的问题可以把我们拉在一起的时候，再别让其他任何地方，东南亚、中东或加勒比地区成为分歧的所在，从而使我们陷入冲突。”在谈到宗教问题时，勃列日涅夫说：“美国人向哪个上帝祈祷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承认一切宗教。我们所关心的是它们拥护不拥护和平。”他再一次说明他对犹太人移民的政策。他说：“就我个人来说，我愿意让所有的犹太人都走，让上帝也跟他们一起去。”

勃列日涅夫说到核战争将会毁灭文明，他重复了赫鲁晓夫十五年前说过的话：我们必须记住，在这样一场战争中，白种人将被毁灭，只有黄种人和黑人将留下来统治世界。

在乘车途中，尼克松建议年底以前举行一次“微型最高级会谈”。勃列日涅夫热情地表示同意。尼克松说：“这个会议不在华盛顿或莫斯科开，而应在两地之间某个地方，也就是中途栈。”勃列日涅夫说：“既然如此，那就选在瑞士吧！”

尼克松接着说：“最最重要的是在今年年底以前达成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协议。否则的话，既然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国会就会努力朝着大大增加国防预算的目标前进。我提议基辛格在9月回莫斯科安排议事日程，然后您和我便可以在10月、11月或12月再会晤。我们必须原则上同意裁减军事武器。”勃列日涅夫用力地点了点头。

到达机场以后，勃列日涅夫返回莫斯科，尼克松夫妇飞往明斯克。根据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事先的约定，在尼克松夫妇去明斯克期间，由基辛格和葛罗米柯再作一次努力，以求在限制进攻性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当尼克松一行到达克里姆林宫的住房时，基辛格就来报告说，他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他说葛罗米柯尽扯些不相干的小事，显然他不能或者不愿意认真进行谈判。

为了能够没有拘束地谈话，尼克松和基辛格到室外开阔的院子里来回走着。他们都很担心，因为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只能空手回去，可是五角大楼最后一分钟所作的大转弯使他们不可能进行任何灵活的谈判。如果能带回哪怕是一个有争议的协议，也能说服公众舆论予以接受。基辛格说：“而且，这是一个比水门事件好得多的辩论题目。”尽管在限制战略武器会谈上感到失望，但基辛格认为即使没有签订限制战略武器的协议，第三次最高级会议仍是成功的，他对总统说：“现在不会对您进行弹劾了。”

“啊，亨利，”在准备回到楼上去的时候，尼克松说，“不管报界怎么看和政治上后果如何，我们只能按我们认为对的去做。你在极端不利条件的巨大压力下，取得了辉煌成就。你可以感到自豪。现在我们只能等着看事情如何发展。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力量。”

第三次首脑会晤提出有限禁止核试验问题、进一步限制反弹道导弹、在设法控制环境战和能源合作方面取得一致意见，决定两国增设领事馆，而且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口头上已一致同意在1974年年底以前召开微型最高级会议，以求在限制进攻性核武器方面达成协议。

在美国国内，有些人想把未能在进攻性战略武器上取得协议归咎于水门事件，然而，尼克松认为这次会议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尼克松在日记中写道：

“有人挑剔说，这次会议并没有上两次成功。主要的问题是，缓和过程在向前发展，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一劳永逸的和平是永远也得不到的，我们必须经常为和平而努力，这就是大国间这些连续不断的最高级会议必须进行的原因，尽管每次会议之后我们并没有重大的结果可以宣布。

我倾向于认为，在安排下一次最高级会议的时候，非正式的会谈更易于使问题取得进展。我认为正式会议全体大会取得成果最少，因为每个人都是在为记录讲话，是在制造记录。

当勃列日涅夫和我在汽车里或其他地方非正式会谈的时候，他都比和其他许多人一起坐在正式会议桌边时，显得更为直率得多。会议规模越大，谈话就越不自由。这对各种类型的社会来说都是如此，而对苏联和共产党国家则尤为突出。”

7月2日，第三次最高级会议的最后晚上，尼克松在美国大使官邸斯帕索大厦举行答谢宴会。勃列日涅夫看上去非常轻松。而且，勃列日涅夫夫人虽然一向也像大多数苏联官员的夫人一样，在众多西方客人的目光之下显得很不自在，这一次却也无拘无束地谈到她的家庭。尼克松在日记中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晚宴时勃列日涅夫抓住我的胳膊非常热情地和我谈话，首先谈到了我们将在两国之间举行的会议在所谓中途栈举行的最高级会议，其次谈到1976年以后他想见到我。他说，他估计在1976年以后他仍将当权，尽管我由于我国宪法的规定不能再执政了，苏联却总是欢迎我的。

勃列日涅夫的外孙女长得十分秀丽，他的女婿也很漂亮。勃列日涅夫夫人评论曾访问过俄国的特里亚娅说，她一跨出飞机，看上去简直像一朵冬天的白雪花。在谈话中，他顺便对我说到他的重孙一个女孩有1岁半了。勃列日涅夫夫人说这孩子十个月就会走路了。我说，跨出第一步是最艰难的。勃列日涅夫说，是的，真是这样。他说就拿他的重孙女来说吧，在走了第一步以后，现在要不摔交的唯一办法就是差不多老得跑。勃列日涅夫把这比作美

苏关系。

他有点装模作样地在钢琴上弹了几个音符，我便借这机会说，等他下次到美国时我们俩可以来一个二重奏。可是要使俄国上层分子对任何幽默话作出反应，特别是当 they 和一大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是十分困难的。作为个人他们可以很热情、友好，但一变成集体，他们马上就完全僵化了，他们必须先看看别的人有什么反应。

在莫斯科的最后一个早晨，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单独在勃的办公室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谈。尼克松反复强调：“我坚决认为我们应该争取在年底签订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协议，这样才使美国不致于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发展军备。”尼克松还极力主张彼此增加“更多的联系”，以便处理中东已出现的那类问题。

苏联人以隆重盛大的仪式和场面结束了第三次首脑会议。7月3日，双方就反弹道导弹系统签署了新的协定。鉴于双方均无部署两处反弹道导弹场地的实际需要，协定对战略防御武器作出进一步限制，把原先允许双方各部署两处反弹道导弹场地的规定改为一处。双方还签订了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条约禁止超过15万吨级的地下核武器试验。双方还就设法控制环境战以及就经济、技术、能源等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协议。两国还决定在基辅与纽约相互增设领事馆。会晤期间，尼克松邀请勃列日涅夫于1975年再次访美。

离开莫斯科时，出乎尼克松的意料，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波德戈尔内和柯西金全都上了尼克松的车和他一起驶往机场。勃列日涅夫坐在尼克松前面的折叠座上。一路上勃列日涅夫十分安静，大部分时间让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和尼克松交谈。在机场上举行了传统的告别仪式。接着，勃列日涅夫和尼克松转身向“空军一号”走去。

尼克松在日记中记述了与勃列日涅夫分别的场景：

在我走向飞机的时候，我说唯一遗憾的事是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去美国。他说事实上在我们驶往机场的时候，他有过同样的想法。我真是认为他有一种若有所失的感觉，对这次旅行的结束感到心伤。他一直盼望着举行这次会议为它制造舆论并希望会议会取得很大成就，而现在会议已告结束，他有点感到一切全落空了。

我想，他明白他这次并没有“得分”，但是会谈还是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已几次（包括宴会上的最后一次）谈到可能于11月在一个中立的地方召开一次会议。

我不知道这是否将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勃列日涅夫。有时候他看上去精神非常好，可是有时候又显得十分疲劳。他总是很晚才开始早晨的会议，常常在十点半或十一点。

我还有一个有些失望的感觉：我们竟没有能够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而且将来要取得协议看来也相当不易。

登上飞机后，我穿过机舱往后走，对大家说：“你看，咱们又到家了。”我想起1953年的那次出访，在几次极无味的中途停留后，我们每次一登上飞机，便都津津有味地吃一些很简单的食物，觉得它安全、干净。因而我们也常说：“你看，咱们又到家了。”我相信这次大家一上飞机也一定有那种感觉。

正如人们所预料的，第三次首脑会晤在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这一最重要的问题上未能取得进展。双方仅同意于1974年底召开一次“微型”最高级会

谈，以求在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达成协议。尽管如此，它对于使已经建立起来的美苏缓和进程得以继续下去并保持某种发展势头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三次首脑会晤前夕，美国国内的政治形势实际上已不适宜于举行一次首脑会晤。尼克松为“水门”事件所困扰。他的总统职务处于危机之中。这种形势使尼克松的谈判地位更加虚弱。人们根本不相信尼克松有能力同苏联就限制战略武器达成新的协定。在这种情况下，会晤只好在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情况下草草收场。1974年8月，尼克松的辞职使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又一次陷入前途未卜的深渊之中。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只能留待下届美国政府继续下去了。

#### 四、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召开，把欧洲缓和推向了巅峰

欧洲安全会议的召开是70年代继四国柏林协定之后，东西方在欧洲缓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使东西方缓和达到高潮。

欧洲安全会议全名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召开欧洲安全会议的主张早在50年代苏联曾经再三提出，但是这个建议同样再三地立即遭到拒绝。美国认为这显然是要阻止德国重新武装，阻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展，而且要阻止美国在欧洲起任何作用。在50年代，一些有头脑的政治家如乔治·凯南主张美国和苏联的军队从中欧脱离接触。但在东西方严重敌对的气候下，这些建议和主张都无法实现。

到了60年代，欧洲缓和形势的出现使召开欧安会的主张重新被提上议事日程。1966年7月，华沙条约国家发表了一个“加强欧洲和平与安全宣言”，要求召开欧洲安全会议。1967年4月，欧洲共产党议会也提出同样的主张。到1967年12月，西方国家政府受到国内的压力，要他们放松先前的反对态度。1968年6月，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雷克雅未克外长会议上发出了愿意同华沙条约组织讨论相互均衡裁军的信号。

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和华约国家在60年代中期一再提出召开欧洲安全会议。苏联的目的是想使西方承认战后欧洲国家边界现状，巩固对东欧的控制，同时通过欧安会促使东西方经济合作，引进西方的资金和技术，以利苏联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同时排挤美国在欧洲的势力。1969年3月17日，华沙条约组织的布达佩斯会议正式提出早日召开欧洲安全会议。会议要求加强政治、经济和文化接触；承认不侵犯边界，包括（东德和波兰之间的）奥得—尼斯分界线和东西德之间的边界；东德、西德互相承认彼此是主权国家；联邦共和国放弃它所要求的代表全体德国人民的权利；承认西柏林不属联邦共和国。

4月3日，多勃雷宁通过渠道把华约的这项建议提交美国。他甚至在提出这项建议时作出了一个让步。他第一次告诉基辛格，苏联不反对美国参加过去被称为“全欧会议”的会议。他还特别提醒基辛格注意，布达佩斯宣言没有再提过去历次宣言中的一项要求：解散欧洲的联盟体系，即同意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继续存在。

对于苏联召开欧安会的建议，美国一开始表示反对。而对于苏联主动作出的让步，美国则不以为然。基辛格在4月4日给尼克松总统的报告中指出：“任何一个认真地想在欧洲问题上取得进展的人都知道，我们必须是其中的一方；我们不应当使苏联认为，如果他们同意生活中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

他们就是给了我们什么恩赐。”

然而，苏联这种明显的和解调子在西方联盟内部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当时的意大利总理马里亚诺·鲁莫尔为出席艾森豪威尔葬礼来到华盛顿时对尼克松说，苏联的建议尽管有它的宣传目的，但是意大利的政局要求作出迅速的反应。勃兰特赞成举行欧洲安全会议，其理由是“这样可以使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合法化”。蓬皮杜认为这是避免德国单独主动向东方打交道而把它放到多边的轨道上来的一个办法。而英国政府首脑主张召开这次会议是把它看作是摆脱冷战的手段。

鉴于一些欧洲国家对召开欧安会有一定兴趣，为不致在北约组织中陷于孤立，美国开始考虑苏联的建议。基辛格向总统建议，完全拒绝苏联的建议会使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陷于孤立，但是美国要在具体的欧洲问题特别是在柏林问题上有了进展才能表示原则上同意召开欧安会。4月8日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中指出：“如果没有这样的进展，举行这样的会议大概会发现东欧国家同苏联僵硬的立场紧密地站在一起，而与会的西方国家却竞相寻找办法去‘打破僵局’。最后的结果……将是使最后解决欧洲问题的前景受挫。因此，我们的着眼点应当是，必须谈判具体的问题，必须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内部进行协商，以便使西方在这些问题上形成共同的立场。”北约4月份的部长级会议实质上采纳了美国的这一立场。

接着，多勃雷宁提出了华沙条约国家的建议：在1970年上半年举行欧洲安全会议。议程有两项：在欧洲国家的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扩大欧洲国家之间的贸易、经济、技术和科学的关系。但美国固守其既定立场，即在其他谈判特别是柏林问题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以前，美不同意开会的日期。罗杰斯国务卿带着对北约组织12月部长级会议感到满意的心情向总统提出报告：

“在欧安会和东西方关系问题上，我们已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意采取一种现实而慎重的立场，强调在我们同意召开欧安会之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需要有较好的取得有意义的成果的前景。我们还使联盟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动向东欧提出建议方面取得了协议，包括为谈判相互均衡裁军时采取何种立场的准备工作，支持在德国和柏林问题上提出的主动建议……那种为开会而开会的兴高采烈情绪是收敛起来了……”

在美国看来，通过所谓“联系原则”实际上挫败了苏联有选择的缓和战略。苏联想召开欧安会，但是除非在柏林问题上取得进展，否则他们就开不成。

1971年柏林协定的签署为欧安会的召开扫除了重要障碍。1972年5月尼克松访苏时，双方就召开“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达成协议。5月31日，北约国家发表声明，表示同意参加筹备欧安会的预备性会谈，从此欧安会进入了具体筹备阶段。

1972年11月，为召开欧安会而举行的多边筹备会议在赫尔辛基开始，会议制定了“赫尔辛基蓝皮书”，规定了会议的讨论范围、议程和会议的进行方式，决定欧安会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外长会议；第二阶段由与会国专家参加；第三阶段是由与会国首脑参加的最高级会议并签署决议。会议的议题为欧洲安全、经济合作、人员与文化交流三个“篮子”。尽管各方对举行这次会议有着不同的目的和打算，但到1973年6月，终于就召开正式的欧安会达成了协议。

1973年7月3日，欧安会正式会议揭开了序幕。除阿尔巴尼亚外的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等35国外长在赫尔辛基举行了第一阶段会议。这是欧洲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多边会议，主要是通过筹备会准备的议程和陈述各国的立场。从各国外长的发言可以看出，东西方之间的意图和立场相去甚远。苏联代表向大会提交的提案《关于欧洲安全的基础与欧洲国家间关系的准则的总宣言》提出，苏联的首要目标是要西方承认和接受欧洲的现状，即雅尔塔会议所确定的体制。它强调的是制定一些保证领土完整和边界不容侵犯的基本原则。而西方则对所谓的“第三篮子”问题更感兴趣，其目的在于通过东西方人员、思想、信息的自由交流，对东欧和苏联进行渗透，并强调这是促进相互信任、保障欧洲安全的基础，必须制定和实施具体措施。会议一开始，它们就向大会提交了152项有关“第三篮子”的提案，而在“第一、第二篮子”方面分别为2项和4项。英国外相霍姆公开亮明了立场：“除非‘第三篮子，中有许多鸡蛋，不然‘第一篮子’将是空的。”

第二阶段会议于9月18日开始，断断续续直至1975年7月21日结束。主要任务是制定欧安会“最后文件”草案。但由于分歧很大，斗争相当激烈。在讨论“第一篮子”的第一委员会的三个小组中，对10项有关原则进行了逐字逐句的长时间争论。如边界不可侵犯的原则，双方为最后文件中不到100字的有关条文相互僵持达4个月之久。苏联认为“不可侵犯性”应意味着现有边界永远不可改变，而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以武力改变边界，但不应妨碍一国通过自决和平改变其边界。这一僵局最后以一项妥协打破：西方同意不在“不可侵犯性”原则中提及和平改变问题，而苏联则同意在有关主权平等的原则中写入了边界可以“根据国际法和通过和平手段与通过协议加以改变”的条文。

争论最为激烈的是有关人道主义及其他领域的合作上。西方各国先后提出了40余项提案，涉及家庭团聚、亲属互访、联姻、体育等许多具体问题。苏联考虑到因无法拒绝讨论这些建议，采取加以界定的策略，由保加利亚出面，提议为“第三篮子”写个前言，确认这些方面的活动应以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和遵守有关国家法律与习惯为前提，于是双方在不干涉内政与尊重人权这两个原则孰先孰后、孰轻孰重上陷入了胶着状态。后来，一些中立国家提出了个折衷方案，建议在前言中只笼统地写上“充分尊重指导与会国间关系的那些原则”，而在有关主权平等的原则中写入尊重各国选择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自由和制定本国法律法令的权利，这样双方才同意进入具体问题的讨论。有关经济与科技合作的讨论进行较为顺利，尽管在最惠国待遇等问题上也有争执，但在发展互利经济关系的目标上比较接近，同时双方也意识到有关双边和多边贸易的一些具体问题并非在欧安会的范围内能解决的，因此并未过多纠缠，到1974年年底基本完成大部分的文件起草工作。

第二阶段会议总共进行了2000余次大小会议，其间还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国际事件，如1973年10月的中东战争和以石油危机为先导的西方经济危机、尼克松总统因“水门事件”而辞职等，它们给欧安会的进行留下了烙印。

1975年7月30日至8月1日举行的欧安会第三阶段首脑会议，是欧洲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35国的首脑出席了会议并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最后文件》，最后文件包括10项原则、7项条款和3项有关后续措施的规定。10项原则包括：主权平等，尊重主权所有国的权利；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边界不可侵犯；国家领土完整；和平解决争端；不干涉内部事务；尊重人权



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道德、宗教与信仰自由；人民的平等权利与自决；国家间相互合作；恪守国际法义务。

该文件虽然只有道义上的约束力而无法律效力，但对欧洲的继续缓和是有积极意义的。最后文件在某种意义上还具有和平协定的作用，确认了欧洲的边界与现状，这也有助于欧洲局势的稳定，把欧洲缓和推向了巅峰。

但是，在人们欢庆的主调下，还是听出一些不和谐的调子。英国首相威尔逊提出，欧安会的成就将由家庭重新团聚、不同国籍公民间的联姻以及记者与商人更好的工作条件来衡量，“拒绝人们的这种意愿并不象征着强大，而意味着虚弱”。而勃列日涅夫则对“第三篮子”问题说，“任何人都应该对其他人如何管理自己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只有有关国家的人民，而不是其他人，才有权解决它的内部问题和制定它的内部法律。”毕竟，最后文件是多种利益调和折衷的产物，吾方都各取所需，又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 第十章 缓和的衰落

1974年8月9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尼克松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辞职的总统，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副总统杰拉尔德·福特宣誓继任总统职位。尽管福特、卡特政府以及苏联一再重申缓和，坚持推行缓和政策，但由于形势的逆转，特别是安哥拉事件后，“缓和”势头就开始下滑。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缓和”完全陷入了危机。

### 一、在“非常特殊时期”上任的福特总统决心顶住压力，继续推进缓和进程

福特在宣誓就职时声称：“我是在美国人从未经历过的非常特殊的时期就任总统的。这是使我们苦恼和伤心的历史时刻。”

福特，1913年7月4日出生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城。福特出生后名叫小莱斯利·金。在他两岁时，他的父母就离婚了。他的母亲把他带到密执安州的大拉皮兹。在那儿，他的母亲同杰拉尔德·R·福特结了婚。杰拉尔德·福特收养了这个小孩，并给他取了自己的名字。老福特是位实业家，在他的影响下，小福特成了一个诚实、勤奋的人。在高中时，福特是全市和全州的优秀橄榄球运动员。进入密执安大学后，继续蜚声球坛。1935年他毕业后，又上了耶鲁大学。在那鲁大学他取得法律学学位，同时担任了橄榄球副教练和拳击教练。1941年，他取得法律学学位后，在大拉皮兹当律师。不到一年，他参加海军，在一艘航空母舰上服役两年。1946年他以海军少校的军衔退役，重操他的律师业务。

1948年，福特开始进入政界，在初选中击败了一位在任的国会议员，继而当选密执安州第五区众议员，出席第八十一届国会。在后来12次选举中，直到1972年，福特的票数从未低于百分之六十。在国会里，福特喜欢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国内事务中的温和主义者，财政事务中的保守主义者，外交事务中的地道的国际主义者”。1965年，他赢得了众议院少数派的领导权，他许诺说，每一个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将是“甲级队队员”。不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都支持尼克松总统提名福特接替斯皮罗·阿格纽而担任副总统。在他担任副总统的八个月期间，福特没能成功地起到他所想起的作用，“一位愿意在白宫和国会山之间起斡旋作用的人物”。因为水门事件的危险加剧，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事。不过，由于福特进行了广泛的旅行和演说，他自己成了全国一位新的代言人，使共和党人团结在他的周围。1974年5月，一个班子背着他开始筹划让他接替尼克松。直到1974年8月7日，他才获悉他很可能成为总统。

两天之后，福特当上了总统。对于他来说，这确实有些意外，也令他惊喜。1973年，福特成了第一位根据第二十五条宪法修正案的副总统，这次在水门丑闻之后又接任了第一位辞职的总统的职务。然而，福特面临的形势是很严峻的。他不仅需要解决他接受下来的一连串棘手的问题，还面临着恢复总统信誉的任务。当时，美国还在遭受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和能源危机之苦。在国际上，尽管缓和进程仍在继续，但已遭到美国国内日益增多的怀疑与批评。福特如何处理内政外交，不仅关系到总统的信誉，而且关系到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

福特长期在国会工作，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而且比

那些初涉政坛的领导人国际问题更加熟悉。然而，福特并不精通国际与安全事务，特别是缺乏直接从事国际事务的经验。可能福特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就在尼克松通知他准备辞职的当天，他要求基辛格继续留任国家安全顾问兼国务卿。

福特政府继承了尼克松政府对苏缓和的政策，决心继续推进东西方缓和进程。1974年9月19日，基辛格在参议院就缓和问题论证时发表了一篇经过精心准备的演说，表示福特政府将沿着缓和的道路继续走下去。

但是，福特入主白宫之时，美国国内反对缓和的势力还在增长。政府内部以国防部长施莱辛格为代表的一派仍然强调苏联的军事威胁，要求加强美国军事力量建设，反对在美苏战略武器谈判中作过多的让步。美国国会把批准包括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内的美苏贸易协定同苏联犹太人移民问题联系起来，对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进展并不满足。这使福特政府在对苏缓和问题上受到很大限制。

而美国国内的形势也使苏联对美苏缓和产生了怀疑。苏联领导人难以理解尼克松的垮台，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国内反对缓和的势力施加压力的结果。美国军方强硬派的好战言论也引起了苏联的很大不安。但苏联也重申，将坚持缓和政策，不过步子更为谨慎些。

## 二、由于苏联的重要让步，美苏达成了关于限制战略武器的海参崴协议，但这仅仅是一个“空头支票”

尼克松辞职前，曾与勃列日涅夫商定于1974年底再举行一次首脑会晤。福特就任总统前，就表示应当继续推动美苏最高级会晤。他表示：“任何可能控制武器竞赛的事情对整个世界都将是好事情。”

9月20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在白宫会见福特时提出举行首脑会晤，并暗示苏联愿意在新的限制战略武器条约问题上作出某种让步。

在这种情况下，福特政府决定，基辛格将在他的10月份的中东之行后去莫斯科，就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问题进一步磋商。为了使这一次磋商取得积极成果，美国在基辛格赴苏前一周向苏联方面提出一项具体建议，要求为双方战略武器总数规定2200的同等数量，并对双方的重型战略武器系统（包括苏联的SS—9陆基导弹和双方的重型轰炸机）规定一个数量为250的限额。美国之所以提出这项建议，主要是由于苏联在战略武器总数和重型导弹方面占有优势。

10月23日，基辛格抵达莫斯科。在会谈中，勃列日涅夫表示苏联愿接受以下两个方案中的一个：

第一个方案是，对双方战略武器发射器总数和多弹头导弹发射器总数规定相同的限额。苏方愿考虑两种办法：若战略武器发射器总数规定为2200，则多弹头导弹总数为1200；或者多弹头导弹总数为1320，则战略武器发射器总数为2400。

第二个方案，对双方战略武器的数量作不同的规定。经过双方讨论，结果是：在战略武器发射器总数方面，苏联为2400，美国为2200；在多弹头导弹总数方面，苏联为1100或1200，美国为1300。

在会谈中，苏联不同意美国对重型陆基导弹规定限额的建议，但表示可以推迟考虑将美国前进基地上的核武器和英法两国的核力量计算在限额内的问题。

苏联政府在这次会谈中体现出的灵活立场使美国大吃一惊，因为福特政府原估计苏联可能会在战略武器会谈中坚持强硬立场，特别是美国国会一直拒绝通过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美苏贸易法案，这使苏联对美非常不满。

基辛格从莫斯科发回的报告使福特非常兴奋，他电告基辛格，如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有可能取得重大进展，即同苏联方面安排一次 11 月份在远东举行的首脑会晤。

10 月 26 日，在基辛格离莫斯科回国前，双方宣布福特总统将于 11 月 23 日在苏联西伯利亚的港口城市海参崴与勃列日涅夫会晤。

11 月 23 日至 24 日，福特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工作会晤”。这是福特担任总统后，美苏之间的第一次首脑会晤。这次会晤的主题是讨论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试图达成一项为期 10 年的协议，为双方的战略武器数量规定一个最高限额。

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一项《关于进攻性战略武器的联合声明》，宣布双方达成了在今后 10 年内双方拥有的进攻性战略武器总数和多弹头导弹总数相等的初步的口头协议，并准备在一周内换文，由口头变成书面协议，以便在第二年签署。按照双方的初步商定，今后 10 年内，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包括陆基洲际导弹、潜艇发射洲际导弹和重型轰炸机）的总数均不得超过 2400 个，其中多弹头导弹运载工具不得超过 1320 个。这个限额远远超出美苏两国当时实际拥有的数量。双方还商定，最迟在 1980 年和 1981 年底前开始就 1985 年以后进一步限制和尽可能削减战略武器进行谈判。

为达成海参崴协议，苏联方面作出了重要让步，那就是同意对双方战略武器规定相同的限额，而同时又不把美国前进基地和部署在西欧的能袭击苏联本土目标的核武器系统计算在双方同意的总限额内。美国政府认为，相同数量的方案既限制了苏联在战略武器数量上的优势，又使美国处于领先地位的多弹头导弹数量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从而能满足美国军方的要求并得到公众的最大支持。而美国作出的让步主要是，允许苏联保留威力特别巨大的重型洲际导弹，并同意将美国占有很大优势的重型轰炸机计算在总数内。但是，苏联要求美国停止生产三叉戟潜艇和取消 B—1 轰炸机计划遭到美国的坚决拒绝。基辛格在海参崴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称：“这个协议是一个重大突破！”福特总统也对在海参崴协议基础上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持乐观态度。他对勃列日涅夫说：“我相信我们已取得重大进展。我希望我们会晤的势头将继续下去，这样到明年，我们就能最后完成我们在这里业已取得的进展。”

然而，这个协议并非一项正式的协定，它仅仅是以联合声明的形式发表的有关未来条约的一个纲要，为了把口头协议变成书面协议，双方共同准备一个备忘录。但是，在起草备忘录的过程中，双方还存在重要分歧，主要有两点：

一是关于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问题。美国在巡航导弹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苏联对此十分担忧，提出如轰炸机载有射程超过 600 公里的空对地导弹，则这种导弹不论是弹道导弹或是巡航导弹都应计算在 2400 的总限额内。美国则认为，计算在总限额内的空对地导弹不应包括巡航导弹而只包括弹道导弹。

二是关于苏联“逆火式”轰炸机问题。美国认为它是具有洲际飞行能力的战略轰炸机，应计算在战略武器总限额内；而苏联坚持认为这种轰炸机仅

仅是一种战区武器系统而不是洲际轰炸机。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美国同意在备忘录中去掉“弹道”一词，笼统地称为“空对地导弹”，这样实际上把远程的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放进了限额内。同时，美国决定“逆火式”轰炸机将不被包括在战略洲际武器内，备忘录仅仅一般地提到重型轰炸机，而没有对其作出硬性规定，也未列举具体型号。这样，原定在海参崴会晤一周内完成的备忘录迟至12月10日才达成一致。

福特作出让步，原本是想12月10日向参议院通报会谈情况时使双方就备忘录达成一致，然而福特的让步在政府内部遭到强烈的反对。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坚决反对把美国的远程空中发射巡航导弹包括在限额之内，并坚持要把苏联的“逆火式”飞机包括在限额内。军方的强硬立场使福特政府非常为难，福特不得不指示美国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代表团坚持原先的立场。

而基辛格要求国会支持在海参崴协议基础上达成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强调若不如此，将给美苏关系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并指出，如果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像美苏贸易协定那样捉摸不定，“苏联只能得出结论，认为同美国的政治缓和在美国国内面临无法克服的困难”。

1975年1月和2月，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决议支持海参崴协议。由于它非正式协定，因此无需经参议院批准。福特政府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上终于取得了一项重大成就。

海参崴首脑会晤后，美苏两国在日内瓦的谈判团开始加紧磋商，以便尽快制订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975年1月31日，双方代表团开始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然而，谈判是十分艰难的，一开始分歧就十分严重。关键的分歧还是巡航导弹问题和苏联“逆火式”轰炸机问题。此外，双方在核查问题上也发生争执。美国强调对多弹头导弹的限制进行核查，苏联则认为没有必要制订特别的核查措施。双方还相互指责对方使用掩盖物妨碍核查。

7月31日，在赫尔辛基的美苏首脑会晤中，双方在讨论地下核试验的核查和多弹头导弹计算规则时取得积极进展，但在巡航导弹和“逆火式”轰炸机问题上，分歧仍然没有解决。

9月，美国又向苏联方面提出一项新的建议。其主要内容之一是：在2400的总限额之外，为美国的FB—111轰炸机和苏联的“逆火式”飞机以及双方射程在600至2000公里的海上发射巡航导弹规定一个300的限额。这一建议因明显对苏不利而遭到苏联的拒绝。到1975年底，苏联在安哥拉的军事行动又为战略武器谈判设置了新的严重障碍。美苏首脑会晤计划一拖再拖。基辛格原定12月的莫斯科之行也因美苏在安哥拉的对抗而取消。

1976年初，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形势非常严峻。不仅美苏围绕协议仍然存在严重分歧，而且福特政府内部对此也争论激烈。但是，双方对于在福特任期的最后一年达成协议仍抱有希望。勃列日涅夫希望能在战略武器谈判上取得进展并宣布举行美苏首脑会晤，以宣扬他缓和政策的成就。福特考虑已到了选举年，授权基辛格再作一次最后努力，以挽救作为福特政府主要外交成就的海参崴协议。

1976年1月，基辛格携带两项得到福特授权的建议赴莫斯科。谈判自1月20日至23日举行。一开始，基辛格向苏联提出的是一项得到五角大楼赞同的建议。这项新方案同意将空中发射巡航导弹计算在限额内，但在巡航导

弹射程问题上，提出除潜艇发射巡航导弹的射程限制为 600 公里外，其他巡航导弹如空中发射、水面舰只发射和陆基巡航导弹的射程限制为 2500 公里；建议规定所有在 1977 年 10 月后生产的“逆火式”飞机作为重轰炸机计算在 2400 的总限额内，而在此之前生产的大约 120 架“逆火式”飞机将不计算在限额内；建议提出以苏联现有的 SS—19 导弹的投掷重量为界线，凡超过 SS—19 投掷重量的将被算作重型导弹并计算在重型导弹的分项限额内；允许掩体容量从 1972 年临时协议规定的 10% ~ 15% 扩大到 35%。

在谈判中，苏联同意建议中对重型导弹所作的定义和对导弹掩体容量所作出的限制，但是在巡航导弹射程问题上仍坚持对其射程实行更严格的限制；在“逆火式”飞机问题上，仍坚持要求不把这种飞机计算在限额之内。鉴于苏联实际上对第一项建议持否定态度，基辛格不得不提出美方事先准备好的第二项建议。这项建议是福特不顾军方的反对而授权基辛格的。建议要求：至 1980 年 10 月，即在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到期和第二阶段协定生效后三年，将战略武器 2400 的总限额减到 2300；巡航导弹射程限制维持第一项建议的规定不变，但水面舰只发射巡航导弹在部署上将限制在 25 条船上，每条船不超过 10 枚；“逆火式”飞机可不计算在 2400 的总限额内，但在到 1981 年为止的五年内，其数量将限制在不超过 275 架的水平上，并对它的部署与使用作出具体限制。

然而，尽管苏联在空中和潜艇发射巡航导弹问题上同美国达成一致，但它仍坚持水面舰只发射的巡航导弹和陆基巡航导弹的射程限制为 600 公里。在“逆火式”飞机问题上，苏联仍然不同意把它计算在总限额内。

基辛格的莫斯科之行虽然没能使美苏双方完全弥合分歧，但双方都作出了让步，谈判取得了部分进展。基辛格怀着对最终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从莫斯科回国，他认为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看来已十分接近达成协议”。但是，美国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对在莫斯科达成的一致持保留态度，认为它超越了以前一致同意的立场。

由于军方的强大压力，福特在 2 月份不顾基辛格的反对，在巡航导弹与“逆火式”飞机问题上又提出了一项新的过渡性的解决办法，美国实际上从原来立场上“后退”。勃列日涅夫 3 月 17 日直截了当地否定了美国的建议，谈判陷入僵局。

基辛格为了挽救局面，希望福特能重新考虑其立场。但福特表示，“尽管我并不愿意，但不能不得出结论，我们无法在 1976 年达成协议”。福特的态度以及美国军方的强硬立场使基辛格争取最后达成协议的希望化为泡影。

从 1976 年 3 月起，由于福特主要精力忙于国内竞选活动，美苏之间的高层谈判实际上已停止，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被搁置起来。

### 三、美苏在安哥拉的严重对抗，迫使福特政府放弃使用“缓和”一词，缓和实际开始走下坡路

福特执政初期至 1975 年，美苏缓和尽管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但总体上仍在发展。但到了 1976 年，形势开始逆转，缓和开始走下坡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安哥拉的对抗则是一个重要标志。他们各自支持安哥拉内战的一方，竭力维护和增强自己在南部非洲的地位，削弱对方在第三世界的影响。由于美苏卷入的不断升级，这场危机曾发展成为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一次严重对抗。

这次危机的背景是由安哥拉内战引起的。安哥拉位于非洲西南部，北连扎伊尔，东邻赞比亚，南靠纳米比亚，西濒大西洋，面积约124.7万平方公里。早在中世纪初期，安哥拉还分属刚果、恩多戈、马塔姆和隆达四个王国。1482年，葡萄牙开始对沿海一带征伐，于1560年侵入恩多戈王国，1857年建立罗安达城，并以此为中心进行奴隶买卖。在1884年至1885年的柏林会议上，安哥拉又被划为葡萄牙殖民地。1922年葡萄牙占领安哥拉全境。1951年葡萄牙将安哥拉改为“海外省”，派总督进行统治。50年代中期以后，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简称“安人运”）、安哥拉民族解放阵线（简称“解阵”）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简称“安盟”）等先后成立，开始进行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人运”从60年代起就一直得到苏联的支持，从70年代中期后又得到古巴的支持。“解阵”是三派军事实力中最强的一派，主要得到扎伊尔、美国和中国的支持。“安盟”是从“解阵”中分裂出来的，它奉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方针，主要得到中国的支持。

1975年1月15日，安人运、解阵和安盟同葡萄牙政府达成关于安哥拉独立的《阿沃尔协议》，一致同意立即组成三方联合过渡政府，并将于1975年11月11日宣布安哥拉正式独立。1月31日安三派抵抗组织同葡萄牙当局共同组成过渡政府。

然而，自1975年2月起，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继续援助安哥拉各派，从而激化了安哥拉内部的派别斗争。从2月起，实力最强的“解阵”在美国的支持下，向“人运”发起军事进攻。自3月起，苏联对“人运”加紧军援，以增强与“解阵”对抗的能力。5月份，古巴向“人运”派遣了230名军事顾问。7月9日，安哥拉爆发激烈战斗，内战迅速扩大。“解阵”与“安盟”开始联合，但由于“人运”在军事上获胜，力量对比开始转向有利于“人运”。

安哥拉形势的变化引起了美国的担忧，美开始研究和拟订关于安哥拉问题的秘密行动计划，并批准拨款，向“解阵”进一步提供武器。7月中旬开始，扎伊尔和南非开始卷入安哥拉内战，支持“安盟”和“解阵”。8月初，南非正规军进入安哥拉。

鉴于“人运”的部队在战斗中受挫，形势不利，古巴在与苏联协商后作出了干涉安哥拉的重要决定。9月底至10月初，古巴派遣了第一批700名军队赴安哥拉。苏联则开始为古巴空运军队。截至12月底，古巴在安哥拉的军队人数达7000人。由于古巴军队的大批到来，“人运”击退了扎伊尔和南非军队的进攻，在军事上暂时扭转了被动局势。

苏联和古巴大规模介入安哥拉内战，使美国对安哥拉危机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基辛格一再发表谈话，指出苏联的干涉是“严重的事情”，美国对此“不能不表示关心”，并警告苏联，若继续干涉安哥拉，“将不可避免地威胁到（美苏之间的）其他关系”。福特也批评苏联的行为“无助于缓和的继续”，“同缓和的目的和目标不一致”。美国一面指责苏联和古巴的干涉并把苏联的行为同缓和以及美苏关系联系起来，一面则加紧支持“解阵”与“安盟”，以阻止苏联与古巴支持下的“人运”在安哥拉掌权成功。

1975年11月11日是预定的安哥拉独立日。这一天，敌对双方分别宣布安哥拉独立，并组成了各自的政府。苏联当即致电“人运”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宣布予以承认。至1976年初，大多数非洲国家承认了“人运”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

而此时，福特政府的安哥拉政策在国会遇到强大阻力。1975 年底和 1976 年初，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了禁止援助安哥拉的提案，从而使美国无法继续用秘密援助的办法来影响安哥拉局势。国会的决议束缚了福特政府的手脚，客观上鼓励了苏联和古巴对安哥拉的干涉，从而加速了“人运”在苏联和古巴支持下的胜利。至 1976 年 2 月底，“人运”在军事上已取得完全的主动。它几乎控制了安哥拉所有的重要中心。3 月份，安哥拉内战实际上已结束。“人运”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安哥拉危机是 70 年代中期在缓和条件下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一场严重的对抗，最后以苏联、古巴的胜利和美国的失败告终。从这一次较量可以看出，尽管美国仍然对苏联实行遏制，但它不得不更多地处于守势，美国正继续走向相对衰弱。苏联正处于力量上升时期，它利用美国在越战后的困难处境在第三世界谋取扩大势力范围和影响。

美苏在安哥拉的对抗改变了许多人对苏联在缓和条件下的行为的看法，促进了美国国内反对缓和的呼声的高涨。最后，福特政府不得不放弃使用“缓和”一词，从而加速了缓和的消亡。

#### 四、《美苏贸易协定》的废除，使美国失去了诱使苏联推行缓和政策的胡萝卜

扩展美苏经济关系是美苏缓和的“物质基础”。由于苏联国内经济困难，增长率下降，科技落后，很想借西方的科技优势发展经济，因而一直要求美国在贸易上给予它最惠国待遇。尼克松执政时曾要求国会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以此推进美苏关系。1972 年 10 月，两国首脑签订的贸易协定包括了美国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的条款。但围绕给苏联最惠国待遇问题，美国国内斗争激烈，尼克松政府与国会的分歧也加大。反对与苏联缓和的保守派势力与自由派势力联合，阻挠批准《美苏贸易协定》。1973 年，众议院通过了尼克松政府提出的包括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条款在内的贸易改革法，但这项提案在参议院却被搁置起来。美国国会里一些主张对苏持强硬态度的人士以此向苏联施压，要求苏联大大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

福特就任总统后，面对美苏缓和受挫的形势，决定寻求与参议员杰克逊达成妥协，以打破美苏贸易僵局。1974 年 8 月 15 日，福特在会见杰克逊等几位关键的参议员时答应将同苏联谈判，希望苏联继续放宽犹太人移民政策，以满足杰克逊等人的要求。其实，在尼克松时期，苏联为了获得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苏联在犹太人移民问题上已经作出了很大让步，苏联犹太人移民已由 1968 年的 400 人增至 1973 年的 35000 人。考虑到勃列日涅夫在公开场合一再坚持犹太人问题是苏联内政，福特和基辛格主张通过秘密外交、幕后谈判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既满足杰克逊等人的要求，又避免苏联丢面子。

1974 年夏秋之交，福特政府、参议员杰克逊和苏联方面就犹太人移民问题开始了一场紧张复杂的三角谈判。但是，杰克逊的要价不断抬高。5 月份，美国对苏联犹太人移民数额提出的目标是每年 45000 人。8 月，福特会见多勃雷宁时，苏联甚至表示愿意接受 55000 人的数字。然而到 9 月份，杰克逊开始要求增加到 60000 人，甚至还提出过 75000 人的数额。而且，杰克逊要求得到苏联方面的书面保证，而苏联在此问题上坚持不让步。

后来，福特政府提出一项建议，通过福特或基辛格和杰克逊之间交换信



件的方式来表示苏联的保证，但要求把致杰克逊的保证信列为机密文件，而杰克逊则要求公开所有信件。苏联方面表示接受交换信件的方式，但强烈反对把私下交易公开化。

9月19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伊利诺斯民主党参议员史蒂文森提出的进出口银行法案修正案，要求进出口银行对苏联的贷款在四年内不得超过三亿美元，同时还规定每笔贷款的期限为两年。

该修正案给美苏贸易谈判设置了新的障碍。福特和基辛格为了说服国会，扭转僵局，私下同国会内少数关键人物频繁接触。经过一系列幕后交易，福特政府和杰克逊于10月18日就犹太人移民问题达成了一项两封信的协议，同意将苏联保证犹太移民与发展对苏友好关系相联系，使给予苏联最惠国待遇和进出口银行贷款依赖于苏联扩大犹太移民数目。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杰克逊将此作为他个人的政治成就大加宣扬。他说：“今天达成的协议是在人权领域里的历史性谅解，苏联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完全转变了，基本上满足了我的要求。这次协议的达成是我取得的从未有过的成功。”

对于杰克逊的做法，苏联十分恼火。苏联再次谴责美国国内的“冷战残余”，表示不会向那些反对缓和与反对改善苏美关系的人所提出的越来越高的要求屈服。10月26日，葛罗米柯在给基辛格的信中，谴责美国把美苏贸易与苏联扩大犹太移民问题相联系的做法。

12月18日、19日，美众参两院分别以280票对96票，71票对24票通过了《贸易改革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在苏联政府保证在18个月内履行美国国会提出的让苏联犹太人在更多地“自由移居国外”的条件下，向苏联提供最惠国待遇，否则，国会将撤销此种待遇。同期，国会通过史蒂文森、杰克逊提出的修正案，规定对苏联的贷款4年内不得超过3亿美元，还禁止进出口银行为产自苏联的能源产品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贷款。对此，苏联作出了强硬反应。它发表声明，否认它曾为得到美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保证放宽移民政策。葛罗米柯甚至表示，1975年被批准离开苏联的犹太人移民将减少。至此，福特政府的最后努力已无济于事。

1975年1月4日，福特总统批准了《贸易改革法案》。1月10日，苏联政府通过美国，指责该法案违反了1972年《美苏贸易协定》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苏联决定废止《美苏贸易协定》，并将归还约6.6亿美元的借款与给苏联最惠国待遇联系起来。1月14日，美国政府也宣布《美苏贸易协定》不能生效。

《美苏贸易协定》的废除，使美苏贸易重新陷于停滞，美国也失去了诱使苏联推行缓和政策的胡萝卜。

1976年又是美国的大选年。在许多次初选中以及1976年的共和党的会议上，福特击败了难以对付的保守党对手、原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罗纳德·里根。总统选择了堪萨斯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多尔为他的竞选伙伴。民意测验表明，福特在竞选开始时是居于劣势的被提名者。选举结束后，福特以几乎前所未有的姿态与他的继任人合作，保证了顺利的过渡，然后离开了华盛顿。

## 五、卡特一上台，便宣布以“新的世界秩序”外交战略取代过去的“均势”外交战略，在地区冲突上提出“以水灭火”

1977年1月20日，吉米·卡特上任，他是美国独立后第三个世纪的第

一位新总统。在就职演说中他宣称：

“我们知道‘多些’未必就是‘好些’。即使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也有其公认的局限性。我们既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也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总起来说，我们必须以为了共同利益而牺牲个人的精神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把事情做好。”

吉米·卡特，1924年10月1日生于佐治亚小镇普兰斯附近。卡特早年是在农场度过的，生活充实、愉快，尽管闭塞但并不寂寞。他写道：“我们一直不愁吃，经济不拮据，但也无钱糟踏。我们觉得同大自然很亲密，同我们家族成员很亲密，同上帝很亲密。”

童年时，卡特就懂得辛勤劳动，在田野或农场里干些杂活。在进小学以前，吉米·卡特就下定决心，将来要上安纳波利斯的美国海军学院。高中毕业后，他在一所二年制的专科学校上了一年；在佐治亚工学院上了一年；后来他以一名大学二年级学生的学历进入海军学院，1946年毕业，在全班820名毕业生中名列第59名。

1946年7月7日，卡特与普兰斯的同乡罗莎琳·史密斯结了婚。1962年，卡特准备竞选佐治亚州的参议员，但由于其对手在投票中作弊，因此，在通过一段冗长的法庭辩论之后，他才有了席位。两年之后，卡特很轻松地获得了连任。1966年，卡特竞选佐治亚州的州长，但却败给了一位鼓吹种族隔离主义的对对手莱斯托·马德奥克斯。1970年，卡特再次参加州长竞选时，终于获得了胜利。依照法律，到1976年，卡特不能再继任州长，于是他决定竞选总统。

在大约18个月的时间里，卡特和罗莎琳跑遍了美国各地，对人演讲，同人握手，力图使卡特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各种各样的面孔，形形色色的问题，以及这样那样的观点，还有那形式多样的民意测验，把他俩弄得晕头转向。尽管竞选州长的情形仍历历在目，但相比之下，这次的规模则要大得多。

卡特努力竞选，在电视上与福特总统进行了三次辩论。他以50.1%的普选票数赢得了一次票数十分接近的选举，他同福特的选举人票数之比是297：241。作为一名南方候选人，他赢得了除弗吉尼亚州外原南部联邦所有各州的选票。而且，他多得的决定性票数都来自黑人选民。

根据原来由“三边委员会”所制定的一套政治主张，卡特于1977年初当政伊始便宣布以“新的世界秩序”外交战略取代过去的“均势”外交战略。卡特政府在外交上十分倚重“三边委员会”，它是卡特外交的思想库。在卡特政府担任要职的人员中有19名来自三边委员会，其中包括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国务卿万斯、国防部长布朗、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等人。“三边委员会”是一个民间的国际组织，由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1973年7月主持成立，由来自北美、西欧和日本“三边”世界中一些有钱有势和有广泛联系的人物组成。卡特本人未上任前就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并积极参与其活动。

这个“新的世界秩序”战略大大改变了美国对外政策的轻重缓急次序。它的核心是美日欧的三边联合，其次是强调与第三世界的“南北关系”，再次才是与苏联的“东西方关系”。它认为只要能同西欧、日本及第三世界搞好关系，就比较容易解决苏联问题。

在美苏关系上，卡特认为美国同苏联有“共同利益”，要扩大合作面，缩小竞争面；在军事上主张同苏联达成裁军协议来限制苏联的扩军势头；在

经济上要求给苏联贸易最惠国待遇；在地区争夺上，强调“以水灭火”，反对针锋相对地“以火灭火”。1977年5月22日，卡特在圣母玛利亚大学第一次系统地阐述美国外交政策时，宣称“西方同苏联发生冲突的威胁已不那么尖锐”，“美国现在已经摆脱了对共产主义的过度恐惧，这种恐惧曾使我们采取以‘以火灭火’的对策，如越南战争，结果失败了，而从未想到采用‘以水灭火’这种更好的办法。”卡特提出的“以水灭火”是指苏联直接或间接用军事手段把一个国家夺过去，美国则在今后依靠自身经济技术优势，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把失去的地盘重新夺回来。

卡特政府实际上是继续推行有限的缓和政策，但美国国内对此有不同的反应。不少人认为总统对苏让步过多，连力主“缓和”政策的国务卿万斯后来也指出，美国政府“对缓和所抱的期望膨胀到了不现实的程度，而对美苏关系中的竞争性质却没有给以应有的重视”。白宫安全委员会主任布热津斯基主张采取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把第三世界看成是东西方斗争中越来越关键的竞争地区，主张美国应该对苏联在那里的行动与其他问题联系起来，阻止苏联在第三世界扩张势力。

卡特反对将美苏之间的缓和同苏联的国际行动联系起来。在卡特看来，所谓的“联系”只能是宣传中的一种策略，不会收到任何应有的效果，而真正的威胁是核武器的破坏力。他还认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否则不仅苏联的扩张势头不会受到限制，苏联的实力反而会得到加强，美国的声誉和维护和平的形象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谈判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就成了卡特政策对苏外交的一个重要问题。

## 六、费尽周折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签署后，卡特和勃列日涅夫热烈地亲吻，可是美国一直拒绝批准该条约

卡特政府认为在美苏关系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核军备竞赛，因此他把同苏联达成某种限制战略核武器协定，看作是美国对苏关系中压倒一切的任务。他就职伊始就通过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了关于两国首脑会晤、禁止杀伤卫星、普遍禁止核试验、导弹试验事前通知对方等一系列建议。

1977年1月26日，卡特致信勃列日涅夫，提出了一些有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SALT）的建议，并希望极早举行首脑会晤。2月1日，卡特首次会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双方商讨了各种削减核力量的方案，卡特希望能把巡航导弹和“逆火式”飞机的问题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分开，并仅仅限制数量，其余问题以后再谈判。美国的意图是通过谈判削减苏联的陆基弹道导弹，并阻止苏联实现导弹多弹头化。但当时在美国政府内部，存在有明显分歧的两派：一是以万斯和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保罗·沃恩克为首的缓和派，力主就限制战略武器迅速达成协议，并以此为契机扩大美苏双边关系。二是以国防部长布朗和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为首的强硬派，不仅主张在限制战略武器问题上不能轻易退让，而且要对苏联在其他方面的扩张作出坚定反应。面对这种形势，卡特极力在这两派之间寻求平衡。

2月25日，勃列日涅夫在回信中坚持SALT应把空对地巡航导弹算入战略总数之内，而“逆火式”轰炸机应完全从协议中排除出去。苏联意在保持《临时协定》中进攻性武器数量和投掷重量的优势地位，阻止美国部署新型

战略核武器。

3月28日，美国国务卿万斯开始访问苏联，在与葛罗米柯谈判时提出三种方案：一是待“逆火式”飞机和巡航导弹问题作出决议后再达成协议，SALT的其余问题以前任总统的承诺为基础；二是将所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削减到2000枚，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的洲际弹道导弹从1320枚削减到1200枚，重型洲际弹道导弹限制为150枚，巡航导弹的射程限制为1500公里；三是如果苏联拒绝前两种方案，则将两者折中。

葛罗米柯同万斯进行了一系列会谈，相当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葛罗米柯用手头掌握的大量数字和事实向万斯解释道：“美国政府的主要要求就是，苏联必须消除一半‘重型’导弹（陆基洲际弹道导弹），这种要求不仅是不能接受的，而且是荒谬的。我们坚决反对动摇苏美经巨大努力所达成的海参崴协议的基础。应该维护这个基础，使其免遭破坏，并且要在此基础上最终缔结苏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第二个协定。”

3月31日，在莫斯科为苏联和外国记者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葛罗米柯又公开重申了苏联的原则立场，并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了声明，作了相应的解释。这次会谈，双方仅达成两国外长5月在日内瓦继续会谈的谅解。

4月10日，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长扎米亚京在电视台表示，苏联愿在美国遵守海参崴协议的前提下“迁就”美国立场。5月17日，葛罗米柯抵日内瓦同万斯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进行会谈。万斯说，双方已就新条约达成总的协议，但仍存在一些重大分歧。主要是：发射系统的总数究竟应是2250枚（苏联立场）还是2150枚（美国立场）；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应是1320枚（苏）还是1200枚（美）；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的限额是写入条约中（苏）还是记载在会谈纪要中（美）；载有空中发射的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是否应计算在1320枚这一总数中（苏）还是再定一个250架的限额（美）；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运载的重型导弹是否应进一步限制为190枚（美）；是否应对“逆火式”飞机再定出一个250架的限额（美）；禁止新的洲际弹道导弹是只适应于多弹头分导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的洲际弹道导弹（苏）还是适用于一切洲际弹道导弹（美）。

9月3日，白宫发言人证实1972年的限制战略武器协议于10月3日期满时，双方将不谋求延长该协议。9月22日至23日，葛罗米柯访美，就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行谈判。同葛罗米柯一起去白宫的还有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格·马·科尔尼延科、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当葛罗米柯穿过几间卡特助手们办公的房间后，走进了美国总统主持召开政府会议的大厅。万斯、布热津斯基和美国驻苏联大使马尔科姆·图恩已经在那里等候。不一会，卡特总统笑眯眯地走进来，热情地向苏联客人问候。

会谈由葛罗米柯先发言。他说：“我甚感满意的是能有机会同您，总统先生本人，讨论一些重要问题，首先是同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有关的和有待解决的问题。”

苏方向卡特阐述了苏联对解决这些问题的立场，请总统促使这些问题能取得一致意见。

卡特代表美国方面指出：

“我们愿意努力加快已进行多年的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的准备工作。”

但是，在同总统继续会谈中，当说起具体内容时，则十分明显，求得互

相谅解可不那么简单。当会谈进行一段时间后，卡特把一组塑料制成的礼品式的导弹模型拿了出来并把它们放在桌子上。模型中一排是苏联导弹，而另一排是美国导弹。他首先展示了苏联的两个导弹模型，其“身高”明显超过美国最大的导弹。他用手指敲了敲这两个模型后说：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这个。”

卡特同其他的前任美国总统们一样，把限制苏联的核潜力作为首要任务，并同时力图保持美国主要核打击力量不受损害。在白宫会谈的时候，总统常常同周围的助手们相互交换意见。这时，葛罗米柯等人出于礼貌，尽量不去倾听他们之间的谈话。会谈持续了3个多小时。会谈结果还是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有所进展。然而，远远没有克服所有的分歧。但双方重申决心把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继续下去，并表示在新协定谈妥前不采取与原协定不相容的行动。

由于美苏两国在苏联“逆火式”轰炸机与美国巡航导弹是否应列入战略武器运载工具最高限额之内等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SALT 陷入旷日持久的讨价还价之中，经过约300次会谈，直到1978年7月两国才开始彼此作出较大让步。从1979年1月5日起，万斯同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在华盛顿举行会谈，5月9日，万斯终于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历时七年之久的SALT 已达成协议。

6月8日，白宫新闻发言人宣布：卡特正式决定研制MX大型机动陆基分导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此举的目的，一在安抚军方，二是争取国会强硬派对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支持，三是给维也纳美苏首脑会晤准备点筹码。6月14日，美苏谈判代表完成条约的文件起草工作，并在日内瓦草签。6月15日，美苏两国首脑在维也纳举行会晤。

为了隆重地签署第二阶段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苏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同各自的外交部长及国防部长一起来到了维也纳。

在签字之前的会议上，卡特提出一个有关条约生效的问题。他宣称：

“双方当然应该按规定批准条约。”

苏联代表团这样表示：

“这个已经准备就绪的条约对维护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是如此重要，应该毫不拖延地使其完全生效，也就是说苏联和美国的立法机构应毫不拖延地予以批准。条约应该完全有效。”

1979年6月18日。霍夫堡宫。隆重庄严的环境。各大厅金碧辉煌，签署条约的时刻即将来临。法律专家们已不止一次地检查过条约文本里的句号和逗号。在霍夫堡宫雷杜特大厅举行了签字仪式。双方代表团团长拿起笔，坐好之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当他们还未欠身站起时，葛罗米柯向身边的苏联国防部长德米特里·费奥多罗维奇·乌斯季诺夫问道：

“你看，他们会不会亲吻？”

“不，”乌斯季诺夫回答，“没有必要亲吻。”

“说不准，”葛罗米柯回答说，“虽然我同意，不一定要做这种姿态。”

但是，卡特表现出来的主动性使俩人都感到愉快和惊讶。条约签字后他们亲吻了，大厅里掌声四起。

签订的这个条约要比在它之前签订的临时协定（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大大前进了，它包括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各个方面，并架起通往进一步

限制和削减核武器的桥梁。

SALT 条约包括序言、一项有效期到 1985 年 12 月 31 日为止的《美苏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一项有效期到 1981 年底为止的《议定书》、一项指导下一阶段谈判的《美苏关于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原则和指导方针的联合声明》以及若干附件。该条约的主要内容是：

1、确定了双方战略武器总限额：对双方战略武器总数规定的最高限额为 2400 件，从 1981 年初开始进行削减，到 1981 年底降到 2250 件。条约禁止再建固定的洲际导弹发射架，禁止把轻型洲际导弹发射架或旧式洲际导弹发射架改装成现代化重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架。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不列入总限额内，但勃列日涅夫作出书面保证：“苏联不打算使其活动范围扩大到能袭击美国领土上的目标”，并“不提高其现在的年产量（30 架）”。

2、确定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的限额和构成。双方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发射器加上携带巡航导弹的重型机（射程在 600 公里以上）总数不超过 1320 件。在这个限额中，双方分导式多弹头陆基和潜射弹道导弹限定为合计 1200 件。其中双方多弹头陆基弹道导弹发射器总数不得超过 820 件（其中重型洲际导弹限定为 308 件）；携带远程巡航导弹的重轰炸机不得超过 120 架。

3、规定改进战略武器质量的限度。条约有效期内，双方只能制造和部署 1 个新品种的洲际导弹；现有洲际导弹的弹头数量不得增加；发展中的陆基洲际导弹子弹头不得超过 10 颗；发展中的潜射导弹子弹头不得超过 14 颗；发展中的空地导弹子弹头不得超过 10 颗，每架重轰炸机携带的远程巡航导弹平均不得超过 28 枚，现有重型轰炸机只准携带 20 枚；1981 年底前禁止部署机动洲际导弹和空地弹道导弹或进行飞行试验；禁止部署陆上或海上发射的远程巡航导弹；禁止发展诸如由水面舰只或海底发射的弹道导弹等技术上可行而尚未部署的新武器系统。

4、规定相应的核查办法。核查将由各自的侦察卫星和其他侦察手段进行。双方同意不对此进行干扰，不采取有意的隐蔽措施，不将有关新武器试验数据编成密码。为便于核查，禁止苏联生产、试验和部署 SS—16 洲际导弹，因其所用部件与 SS—20 机动中程导弹相同，一旦部署，两者难以区分。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SALT 条约仍是限数量不限质量的条约。首先，该条约在数量上只做了一些对军备无实际意义的限制，总限额规定得很高，分导式多弹头限额还向上平衡。根据条约，苏联须将现有战略武器拆除大约 250 件，但由于苏联战略武器已进入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为特点的新阶段，即使不规定限额，苏联也需要继续减少数量。而且削减数量还可以通过不计入总限额的“逆火式”轰炸机得到补偿。美国当时有战略武器 2206 件，还需向上平衡。条约规定的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限额 1320 件，远远高于当时美国已有的 1046 件和苏联的 750 件。第二，条约对提高质量起不到任何限制作用。条约对导弹的爆炸当量、提高命中精度、改进制导系统等未加限制。在一项有效期到 1981 年底为止的《议定书》中，规定禁止试验和部署机动型陆基导弹，禁止部署射程超过 600 公里的陆基和海基巡航导弹。但是，《议定书》并不禁止研制机动型陆基导弹，也不禁止研制和试验射程超过 600 公里的陆基和海基巡航导弹。可以说，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不能限制核军备竞赛，只不过为以后的竞赛制定新的竞赛规则罢了。

条约签署后，美国国内围绕是否批准该条约问题发起一场大辩论。在参议院内，不少人对条约是否对美国有利表示怀疑，一些议员指责美国政府让

步太多，不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要求对条约进行修正。有的议员则把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作为支持条约的条件。支持派认为，条约基本上是公平的，某些方面甚至对美国有利。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各派势力展开激烈争论，问题最后归结为：如果卡特政府同意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参议院将批准条约，否则就把这个问题推迟到 1980 年大选年去解决。

1979 年 12 月，卡特总统为确保条约批准，授权五角大楼提前制订 1981 财政年度军事预算和 1981 ~ 1985 年的五年军事预算，把军事开支的实际增长年率从 3% 提高到 5%。同时，卡特还同北约盟国商定，从 1983 年开始在西欧部署美国潘兴 式导弹和巡航导弹，加强抗衡苏联的实力。

然而，正当批准 SALT II 条约的条件逐渐成熟时，苏联军队 11 月 27 日突然大规模入侵阿富汗，美国政府和国会借此理由推迟对 SALT 条约的最后表决。1981 年里根执政后，认为该条约对苏联有利，拒绝批准条约。但美苏双方都表示将继续遵守条约规定的限制，直到美苏达成新的协议为止。

## 七、卡特标榜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对苏展开强大人权攻势

人权问题自“冷战”开始一直在美苏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历届政府在不同程度上都把人权问题作为处理其对苏关系的重要方面，而战后最直接、最明确地向全世界宣布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核心原则的则是卡特政府。卡特上台后，由于苏联的扩张态势逐渐加强，他感到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缓和政策并未能有效地制约苏联，也未能防止美国霸权的进一步衰落，因此他和布热津斯基十分强调“人权外交”，企图恢复美国外交中的所谓理想主义精神，扫除因霸权衰落而带来的悲观主义情绪，增强美国在全球意识形态中的地位。这一时期美国政府不仅对苏联及东欧各国频频发出人权攻势，而且将“人权外交”引入到处理第三世界事务的更加广阔的领域。

卡特在竞选总统过程中就匆匆提出，美国应成为维护国际人权的“灯塔”。他明确表示，他不会像他认为前几届政府曾经做过的那样，忽视苏联践踏人权的行径。

卡特在就职演说中宣布：“我们的道义感决定了我们明白无误地偏向于那些和我们一样坚持尊重个人人权的国家。”以后他在多次公开讲话中一再强调，“对于人权所负有的义务”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基本信条”，人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和“灵魂”，“树立美国理想主义的榜样，是处理外交事务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和现实的态度，道德原则是行使美国武力和扩大影响的最好基础”。他的助手万斯、布热津斯基、财政部长布卢门撒尔，甚至卡特夫人，遇到适当机会也在宣扬美国的“人权外交”。紧接着，美国政府官员和舆论界开始宣称，卡特的人权外交是美国外交的新阶段。人权外交成为美国在缓和时期加紧与苏联争夺霸权的一种新策略。

尽管卡特政府以改善对苏关系为首要目标，但是从一开始就因公开支持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而与苏联关系出现紧张。1977 年 1 月 21 日，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著名核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通过一名律师把一封信转交给卡特总统，说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境遇恶劣，敦促总统为他们说说话，并列出了正受迫害的 15 名政治犯名单。美国国务院当天发表了一项支持声明，公开赞扬萨哈罗夫教授的大胆行动，称他是“一位坦诚的人权斗士”。

1月27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就苏联政府恫吓萨哈罗夫或不让他发表意见的企图对苏联发出警告。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就此事打电话向万斯提出抗议，认为这是干涉苏联内政。

1月30日，卡特从宾夕法尼亚归来时对记者说：“在这里我要说明的是，国务院的声明是在没有事先取得我的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但这项声明反映了我的立场和态度，而且如果由我亲自发表这项声明，就可能产生更大的鼓舞力量。”

2月1日，卡特在同多勃雷宁举行会谈时说，美国将不改变国务院为萨哈罗夫辩护的立场，但又称这种做法不是对苏联提出批评。

2月3日，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苏联对待人权的政策、它的国际行为同贸易经济关系和武器控制谈判之间“没有关系，我认为这些问题都是重要的问题，应该把每一个问题都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来谈”。因此，美国一方面谋求与苏缓和，另一方面又以人权问题为口实带领西方盟国对苏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苏联对于美国的人权攻势十分恼火，于2月3日逮捕了苏联最活跃的持不同政见者之一亚历山大·金兹伯格，并在4日下令驱逐经常报道持不同政见者情况的美联社记者。美国立即采取报复措施，第二天就决定驱逐塔斯社驻华盛顿记者。美国国务院还在2月7日就金兹伯格被捕一事发表声明，表示对此事的严重关注。卡特总统还在2月17日亲自复信给萨哈罗夫。萨哈罗夫收到回信，如获至宝，他在公寓里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向记者展示卡特的亲笔签字，于是各报刊又大肆宣传，苏联对此极为不满。2月17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会见美国副国务卿，提醒美国注意不利于苏美关系积极发展的言行。2月25日，勃列日涅夫在给卡特的信中强烈反对美国的人权政策。

3月1日，卡特与副总统蒙代尔不顾苏联事先的劝阻，在白宫接见苏持不同政见者弗拉基米尔·布科夫斯基。同一天，苏外交部召见美国大使图恩，声明美国无权干涉苏联内政。

3月2日，美国参议院以92票对零票通过了一项反对苏联侵犯人权的决议，抗议苏联最近殴打、关押和折磨想获得移民签证去和家人团聚的苏犹太人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3月21日，勃列日涅夫在讲话中就此指责美国干涉苏联内政。

11月2日，万斯就苏联表示要对待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实行最严厉的纪律惩处一事会晤多勃雷宁，表示关注。

1978年7月25日，美国以苏审讯持不同政见者夏兰斯基和奥尔洛夫等为由，推迟美国高级官员去苏联访问，接着卡特政府指责苏联和捷克虐待国内的批评者，试图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苏联进行调查，并要求大量增加对美国之音和自由欧洲电台的投资。

卡特一再声明“人权外交”要与美苏缓和分开，“希望苏联领导人能够理解”。但事实上苏联认为这是粗暴干涉其内政的行为，并导致了美苏关系的恶化。卡特自己也承认，人权问题“确实在我们之间造成了紧张气氛，并妨碍了我们更和谐地解决一些别的分歧”。卡特也意识到，仅仅以人权外交为核心，并不能取得效果，因而在执政后期对苏的人权攻势相对减弱。

八、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美苏关系的严重倒退，敲响了第二次缓和



## 的丧钟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缓和的结束。

阿富汗是一个位于亚洲中西部的山地内陆国家，面积65.2万平方公里，是苏联“南方战区”的一部分。南方战区对苏联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苏联一直想在这一地区实施分阶段的战略推进，以实现在印度洋寻求暖水港和出海口并切断欧洲和远东联系的战略。控制阿富汗是苏联实现南下战略的重要步骤。苏联在阿富汗苦心经营多年，对阿富汗已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控制。1978年4月，苏支持阿人民民主党军官发动政变，夺取政权。1979年9月，阿人民民主党内部总统阿明上台后试图摆脱苏联控制，声称要与美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苏担心失去对阿富汗的控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并进行战争准备。苏联同时认为，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由于美国因人质问题卷入了与伊朗的争端，美国愿意采取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很小，西方国家因根本利益没有受到侵害也不会有强烈反应，占领并控制阿富汗易于取得成功。苏军经过精心策划和周密准备，终于发动了对阿富汗的侵略战争。1979年12月27日晚7时30分，先期在喀布尔机场空降的苏军空降师经过集结整顿，在克格勃的配合下，迅速占领阿首脑机关、国防部、电台等要害部门。苏军经与总统卫队和首都驻军激战4个小时，击毙总统阿明，逮捕了政府重要官员，解除了政府军抵抗部队的武装。苏军将B.卡尔迈勒扶上台并宣称阿富汗发生政变，苏军“系应邀进入阿境”。12月28日，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电贺卡尔迈勒，祝贺他担任人民民主党总书记、革命委员会主席和总理。此后不久，苏军集结在边境的6个师分东、西两路对阿富汗发动钳形攻势。在边境地区苏军只遇到阿军轻微的抵抗。为保障地面部队主力的推进，苏军还动用了前线航空兵团进行空中支援。1980年1月2日，进行地面主要突击任务的东路集群第360摩步师一个团和担任辅助突击的西路集群第357摩步师主力在坎大哈会师。一周内苏军基本完成对阿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占领，并控制了阿富汗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与伊朗的边境要地。至此，苏军基本实现对阿富汗的占领。苏军占领阿富汗，遭到了阿富汗各族各阶层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广泛的反抗，也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12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发表电视讲话，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第三次为接管他国进行干预；苏联对阿富汗的干涉是苏联在四十年代占领伊朗阿塞拜疆以来第一次对一个穆斯林国家采取冒险行动；并说他已写信给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警告他，苏联如果不停止对阿富汗的军事干涉，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此前数小时，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行动提出了正式抗议。同日，北约理事会和欧洲共同体九国分别召开会议，进行紧急磋商。英国、加拿大、联邦德国、法国、瑞典、挪威、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伊朗、埃及、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等国一致谴责苏联的军事干涉，要求苏联立即撤军。12月30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求苏联当局立即停止对阿富汗的侵略和干涉，撤出一切武装部队。

12月31日，美、英、法、联邦德国、意、加拿大六国政府代表紧急集会，讨论对策。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说，六国将重新考虑同苏联的双边关系。同日，卡特对美国广播公司记者发表谈话说：“勃列日涅夫对我说，苏联是应阿富汗政府的邀请进入阿富汗的，这显然是虚假的、是骗人的。因为在苏联制造的政变中被杀的阿明总统是不会发出这一邀请的，而卡尔迈勒

显然是被苏联军队带进去的，或者在政变时还未进入阿富汗。从这件事上，我对俄国人的看法发生了非常急剧的变化。”

1980年1月4日，卡特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说，对苏联入侵阿富汗，“全世界不能袖手旁观，不能允许苏联采取这一行动而不受惩罚”。他宣布对苏联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召回美驻苏大使和要求参议院推迟辩论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禁止向苏联出售先进技术和其他战略项目；不再提供苏联根据五年协定超购的1700万吨粮食（按1975年10月苏美五年粮食贸易协定规定，美国每年可向苏联提供600万吨至800万吨粮食，但1979年苏联粮食大幅度减产，苏联商得美国同意，计划从1980年从美国进口2500万吨粮食，比原协定最高额超出1700万吨）；严格限制苏联在美国水域捕鱼的优惠待遇；推迟执行两国在对方互设领事馆的计划以及一些文化和经济交流计划。美国还宣布将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粮食和其他援助，以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对此，塔斯社立即发表声明，指出卡特的讲话“充满了‘冷战，的词藻’”。

1月8日，卡特下令取消美国在基辅和苏联在纽约互设领事馆的计划。商业部长克鲁茨尼克宣布，从1月7日起，美国向苏联出口农产品或其他国家把美国农产品转口给苏联，都必须得到有效的出品许可证。运输部长戈德施密特宣布，预定在1月8日举行的美苏讨论环境问题的第十二次特别小组会议暂停举行，下月举行的讨论航海制度的会议也将推迟。美国已通过正在美国白令海捕鱼的苏联14艘拖网渔船立即离开的决议。民用航空局限制苏联航空公司班机每周只能飞往美国两次（原先是冬季每周三次，夏季每周四次）。美国铝业公司宣布，不再参与计划在苏联萨彦斯克地区兴建炼铝厂的工程项目，即不提供价值1亿美元的尖端技术设备。

1月9日，卡特下令至少在一个月时间内吊销向苏联出售高级技术和战略商品的所有的现有许可证。原定1月10日举行的美苏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推迟。1月20日，卡特致函美奥委会，要求抵制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21日，卡特在国情咨文中宣称，苏联最近采取的行动使美国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挑战。从1月4日起，世界一些国家相继对苏联入侵阿富汗采取一系列抵制措施。

5月9日，卡特在一次讲话中重申美国“在侵略面前，不可能照常同苏联打交道”，但如果苏联“改弦易辙”，则“改善关系的途径是畅通的”，“同苏联缓和仍然是美国的目标”。5月16日，美新任国务卿马斯基与葛罗米柯在维也纳举行阿富汗事件以来苏美首次高级会谈。6月12日，卡特向民主党纲领委员会谈及美国对苏政策时，概括为三点：一是力促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二是同盟国共同加强“阻止苏联进一步侵略的能力”；三是谋求尽可能迅速地批准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10月，卡特致函勃列日涅夫，警告苏联对波斯湾地区的任何侵犯就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导致了美苏关系的严重倒退，美苏之间的第二次缓和实际上因这起事件而告终结。

## 第十一章 全面争夺

1981年1月20日，美国共和党保守派代表人物罗纳德·里根宣誓就任美国第40任总统，这位打着对内“振兴经济”、对外“重振国威”的旗帜入主白宫的新总统开始对苏联奉行强硬政策，推行“现实主义、实力加谈判”为主要内容的对苏方针，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力图改变美国在70年代同苏联进行全球争夺的不利局面，努力恢复美国在西方乃至整个世界的霸主地位，并把盟国纳入同苏联争夺的轨道。从此，美苏冷战进入新的时期。经过80年代前五年的较量，美苏战略攻守态势发生变化，美国取得了对苏优势。

### 一、里根政府提出“以实力求和平”的口号，强调“苏联在哪里干涉，就在哪里同它对抗”

里根上台时，美国在国际上处于十分不利的态势。而苏联步步进逼，1979年末出兵侵占阿富汗，威逼印度洋，伊朗和尼加拉瓜的亲美政权相继垮台。特别是52名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的外交人员成为人质，使这个超级大国蒙受奇耻大辱。

在国内，美国经济在70年代后期持续陷入滞胀，1980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3.5%，而国民生产总值却实际下降0.2%。

五角大楼领导人告诉里根，苏联在核武器和常规力量上远远超过美国，每年花费在武器上的钱要比美国多50%。而且，美军的薪水少得可怜，一些征募入伍的已婚男女都够接受社会救济的条件。许多军人以服役为羞，只要一离开岗位，便赶紧卸下军装，穿上便服。

得知这些情况，里根颇多感触。他认为要对付苏联，必须从实力地位出发，大力加强国防，“以实力求和平”。他告诉参谋长联席会议，要采取一切行动使男女军人重新以穿军服为荣，要达到在军事上领先于潜在敌人的目的。

在人事上，里根任命的国务卿黑格和国防部长温伯格都是对苏强硬派。黑格是军人出身，西点军校毕业，参加过朝鲜和越南战争，在尼克松政府中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参与了许多重大外交和军事决策活动。曾任陆军副参谋长、白宫办公厅主任、欧洲盟军总部最高司令。任命黑格为国务卿，被认为是对苏发出的一个强硬的信号。苏联《真理报》借美国舆论之名说，这一任命是美国军国主义倾向的进一步加强。

里根一上台就大幅度增加军费，相继提出开支总额达15000亿美元的1982~1986年的5年防务计划，和一个耗资1800亿美元的增强战略核力量的6年计划。

1981年1月29日下午5时，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首次拜会新上任的国务卿黑格。他由于在美任职时间最长而成了驻华盛顿的外交使团团团长，享有一种特殊地位，每次到国务卿办公室交涉总是驱车直奔国务院大楼的地下车库，然后乘坐非公用的专门电梯直通第七层国务卿的办公室。这个特权唯有多勃雷宁一个大使独享，其他驻华盛顿的150名大使都得乘车到国务院所在的C大街的主门前下车，步行穿过大楼前厅，然后乘公用电梯上楼。然而这一次，黑格取消了多勃雷宁的这一特权。当多勃雷宁的汽车来到地下车库，工作人员告知必须从主门前下车，多勃雷宁心中很不是滋味，只得退回C大

街国务院大楼主门前。

这次会见是礼节性的，但多勃雷宁从一开始受到的冷遇到黑格在会谈中的表情和态度，感到里根政府对苏联持敌视态度。他直言不讳地说：“初次的印象往往是最深刻的，如果苏联领导人竟然形成了里根政府敌视苏联的态度，那是十分不幸的。”“美国不是敌视苏联，而是受到苏联种种过度行为的伤害，因而信心十足地下定决心准备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动。苏联领导人必须懂得，为了今后双方的利益，必须作出改变了。”黑格在1981年6月声称：“苏联在哪里干涉，就在哪里同它对抗。”他在6月答西德《明镜》周刊记者问时，把里根政府初期的对外政策概括为四点：首先，恢复军事实力；第二，着手重建与盟友的健康关系；第三，理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第四，稳定国内经济形势。于是，一场新的冷战又拉开了序幕。

## 二、美国在裁军问题上实行拖延政策，苏联加大“和平攻势”

由于里根推行以实力促和平的政策，所以政府的基本思想是：在“重整军备”和“振兴经济”这两个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之前，不同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或者其他高级会晤，只能显示强硬姿态，逐步扭转美在全球同苏争夺中的不利态势。美试图凭借优越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同苏联开展军备竞赛，迫使苏联在吃不消时认真进行谈判。针对美国的这一意图，苏联频频发动“和平攻势”。1981年2月23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第26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要求苏美双方就当前两国关系的状况在一切级别上进行对话，并称“决定性的环节是最高级会晤”。他还提出了“八项和平倡议”，包括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以及华约和北约达成延缓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协议等。

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在会见黑格时作了某些谨慎的暗示：苏联对重开控制核军备与西方谈判感兴趣，但对里根评价苏联领导人的那些刺耳的话感到不悦。

里根得到这个信息后，让黑格通知多勃雷宁大使：“我的话意思非常明确：白宫已经有了新人，对苏联采取的是现实主义的态度，直到他们行为规矩为止，别指望像以前那样为所欲为！”但他也不得不考虑控制核军备谈判和改善美苏关系。最后，里根决定给勃列日涅夫写一封私人信。他在担任州长时和勃列日涅夫有过一面之交。里根一直倾向于取消卡特政府时期对苏联实施的谷物禁运。谷物禁运对美国的农场主比对苏联的伤害更大。里根并不想对苏联作无条件的妥协，但取消谷物禁运也就表明准备与苏联改善关系的诚意。同时，也向盟国表明，作为自由世界的领袖，在缓和冷战紧张关系方面愿意采取主动。

黑格赞同很快恢复与俄国人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但反对较早地进行高级会晤。他反对对俄国采取和解举动，反对取消谷物禁运，认为这是给俄国人一个错误的信号。里根理解黑格的意图，但认为取消谷物禁运毕竟是利大于弊。

里根告诉黑格准备给勃列日涅夫写一封私人信，但黑格实际上不愿意总统来写此信，他说，如果总统要给勃列日涅夫写信，可以由国务院代办。

里根很快感觉到，黑格不想让内阁或白宫其他人插手外交事务。黑格不希望总统干预制定外交政策，他认为这是他的地盘，仅由他本人制定和完成对外政策。

里根非常尊重黑格，仰慕他作为北约首脑的成绩以及他在尼克松时代积

累的从政经验，正因为如此，才挑选他为国务卿。但黑格也有性格弱点，为了维护他的地位和管辖范围，固执、傲慢，在政府内惹是生非。里根遭到枪击那天，副总统乔治·布什不在白宫，黑格立即宣称由他负责日常事务。甚至在副总统回到华盛顿后，他仍坚持应由他而不是乔治·布什负责日常事务。这使其他内阁成员很为气愤。他们说，黑格好像有权坐在椭圆形办公室，并相信这是宪法赋予他的权力。

里根告诉黑格，尽管他反对，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取消谷物禁运，并决定给勃列日涅夫写一封私人信，目的是联络个人感情，同时国务院起草一封正式信，两封信同时发出。国务院把里根的信拿去修改，以一些傲慢的外交辞令把原有的想法淡化了，似乎这信不是里根写的。里根把他们修改的信再修改一遍，基本上保持了原来的风格。1981年4月24日，两封信同时寄出了。在正式信中，里根说：“苏联政府高级官员一再声称，一国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体系形式赋予苏联以特殊权利，实际上是责任，以确保一种特殊的政府方式。我坦率地告诉您，美国断然拒绝任何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机构章程的宣言。声称有特殊‘权利’，无论怎么解释，都不能损害另一国确定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国家主权。”

提到美苏可能的高级会晤，里根说：“只有精心准备和合适的国际气候才能进行，我认为这种条件现在并不存在，因而宁可把这么重要的会晤推迟一些日子。”

里根在给勃列日涅夫的私人信中写道：

总书记先生，我写此信时就想起了10年前我们在萨克拉门托见面的情景。当时我是加州州长。您与尼克松总统进行了一系列会谈。这些会谈引起了全世界的极大关注，和平与良好意愿近在眼前。

在会见时，我问您是否想到全世界成千上万的人们的期望取决于你们达成的决定。

您用双手握着我的手，向我保证您是清楚这点的，且立志要以整个身心和全部智慧去实现人类的梦想与愿望。

全世界的人们仍在期待着。的确，全世界的人们，尽管种族、肤色不同，都有着共同的愿望。他们有着把握自己命运的尊严，有自己作出选择的自由……

仅仅是我们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哲学，不同的政府政策就要阻碍我们认真考虑全世界人们的切身利益问题吗、一个普通的苏联家庭是否已经意识到苏联把自己选择的政府强加给阿富汗人民就会生活更好呢？古巴人民因其军事独裁者将统治安哥拉生活会得到改善吗？

你们却解释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反对美国的领土扩张的野心，美国的帝国主义计划及美国对你们领土和新兴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种指控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足够的证据表明，在美国有能力控制世界又不危及其自身时它并没有这样去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是唯一未受战争毁坏的工业大国。我们的军事力量处于顶峰，只有我们拥有最新武器——核武器，我们完全有能力把它发射到世界各地。如果我们寻求控制世界，谁还能反对吗？但美国走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道路。我们把我们的国力和财富用于重建战争毁灭的世界经济，包括援助曾经是我们的敌国。我认为把美国指控为犯了帝国主义之罪或试图以武力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别国是毫无根据的。

总书记先生，我们对消除两国人民实现他们崇高愿望的障碍漠不关心，这应该吗？有些障碍源于政府的目标，而这些政府的目标与两国人民的真正需要和愿望格格不入。

正是在这种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精神指导下，我决定取消谷物禁运。或许这一决定有助于建立某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实现有意义的、建设性的对话，以利于我们履行共同的义务，获得持久的和平。

几天后，里根收到了勃列日涅夫的回信。他说他也反对立即进行高级会晤的计划，拒绝接受里根关于苏联领导人的评价，指责美国使冷战持久化，他认为美国没有权利告诉苏联人能或者不能在世界别的地方做什么。

里根任命了积极主张扩充军备的强硬派组成美国军备控制和裁军署的领导班子。这三个主要成员是裁军署长尤金·罗斯托，军控谈判特别代表爱德华·罗尼和欧洲中导谈判的美方首席代表保罗·尼采。这个班子组成后，苏联《真理报》指出，这些人是“反对裁军的凶恶敌人”。西德《明镜》周刊说，“偏偏选了两只黄鼠狼来照看鸡群”。

1981年7月14日，黑格国务卿在纽约美国外交政策协会发表了一篇全面阐述里根政府军控政策的讲话，提出了军控政策的6项原则：

(1) 军控是安全政策的工具，而不是这种政策的代替物。

(2) 军控协议必须是真正加强安全的协议。

(3) 在谋求军控时必须把苏联在全世界的一切作为记在脑中，这种“联系”办法并非美国政策的创造，而是生活的现实。

(4) 军控协议必须是以互惠为基础的均衡的协议。

(5) 军控协议必须包括有效的核查手段和检查与监督各方遵守协议的机构。

(6) 美国的战略必须考虑所有各种武器控制过程和各种武器体系，而不仅仅是那些还在谈判之中的。

勃列日涅夫1981年6月30日在莫斯科会见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时，甚至急切他说“苏联恨不能明天就坐下来就限制欧洲核竞赛问题开始谈判”。考虑到苏联“和平”攻势很强，更加上美国国内舆论和西欧盟国的和平呼声，美国很难拖而不谈。于是，黑格和葛罗米柯在纽约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后在1981年9月24日一起宣布：1981年11月30日美苏将在日内瓦举行限制欧洲中远程核武器谈判，美方首席代表为保罗·尼采大使，苏方首席代表为尤里·克维钦斯基大使。

### 三、欧洲中导谈判失败，美国和西欧加紧新导弹部署，苏联以牙还牙

说起欧洲中导谈判，有着深刻的背景。1977年苏联在欧洲本土开始部署先进的SS—20中程导弹。这种导弹可带三个分导式核弹头，射程5000公里，采用固体燃料，机动性强，精确度较高，可以打击整个西欧。1977年苏部署的SS—20导弹和弹头分别为10枚和30颗；1978年为70枚和210颗；1979年为140枚和420颗。当时，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因缺乏相应的力量，对苏联在欧洲战区核力量的优势日益担忧。美国军控和裁军署署长尤金·罗斯说：“在苏联战略核力量已取得同美国的均势的情况下，苏联可以凭借在欧洲战区乃至整个全球范围内中程核武器上的垄断地位，对西欧和美国的其他盟国进行核讹诈，甚至还可依靠其占绝对优势的常规力量，无止境地追求扩张，而不必担心美国的报复。”1979年1月，西方国家召开首脑会议，一致同意

在西欧部署正在研制中的美潘兴 型和陆基战斧式巡航导弹。12月12日，北约外长和国防部长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会议，通过了一项有名的“双重决议”，即一方面决定使北约的战区核力量现代化，另一方面建议美苏就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问题举行谈判。如果到1983年底以前谈判达不成协议，美将从1983年底到1988年底用5年时间在西欧分阶段部署572枚陆基中程导弹，其中潘兴 型108枚，巡航导弹464枚。这两种导弹，特别是潘兴 导弹，比苏联的SS—20导弹机动性更强，命中率更高，如果实现了部署，苏联在欧洲中程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将被打破。在西方作出“双重决议”后，苏联到1980年年中表示愿意“谈判欧洲中程核武器”。同年10月，美苏开始就限制中程导弹问题举行预备性会谈，”但未取得进展。

里根政府一上台就下定决心在欧洲部署新的中导，实行战略核武器的现代化。但是自1981年下半年起，西欧掀起了一场声势空前浩大的反核和平运动，各地的群众示威游行此起彼伏，他们高呼口号：

“不要核武器！”

“要和平，要中立！”

“美国佬滚回去！”

.....

与此相适应，美国国内也出现了要求“冻结核武器”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浪潮，在这种背景下，美同意在日内瓦举行正式谈判。1981年11月18日，美国总统里根在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电视演说，呼吁双方都销毁在欧洲的全部中程核武器。他宣布，如果苏全部拆除部署在欧洲的SS—20中程和SS—4、SS—5短程导弹，美将放弃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的计划，从而使双方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均为零，这一方案被称为“零点方案”。对于这个方案，国防部长温伯格坚决支持，而黑格国务卿不大赞成。他认为北约需要有新导弹去对抗苏联的威胁，还认为这没有为同俄国人的讨价还价留下足够的余地。他建议在提出“零点方案”时，应当表示美国愿意考虑让双方都在欧洲留下一些中程导弹。在里根看来，黑格的建议带有灵活性。但是他很清楚，作为谈判者，先把手中底牌亮出来决不是精明之举。他认为，如果一开始就宣布要消除欧洲的全部中程核武器，然后又暗示说自己可能愿意都保留一些这种核武器，那样甚至在谈判开始之前就泄露了谈判立场。他说：“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从欧洲完全消除所有的中程核导弹武器，而且，在全世界面前宣布这一目标，将是一个主动的姿态，展现给苏联人、我们的盟国、涌上街头的西德人民以及其他我们认为想要削减核武器的人。”最后，里根决定抛出“零点方案”。

苏联早在1981年2月由勃列日涅夫提出一个方案，要求美苏将中程核武器冻结在原有水平上。此方案由于明显对美不利，在美苏首轮谈判中苏方提出后遭拒绝。美“零点方案”提出后，苏认为这是美企图以一纸计划换取苏单方的裁减，而且不包括英、法的核力量和美“前沿基地系统”，故予拒绝。苏联经过两个多月酝酿抛出一个反建议，即“分阶段裁减”方案，这是由勃列日涅夫在接见社会党国际代表时宣布的。其内容是美（包括西欧盟国）、苏各自将部署在欧洲的约1000件中程核武器进行分阶段、对等裁减。第一阶段作为过渡，到1985年各裁减三分之一，分别保持600件。第二阶段到1990年，双方再减三分之一，各保持300件。该方案旨在以苏一方去平衡美、英、法三方，等于把美国核力量挤出欧洲，故遭美反对。

1982年夏，在5月份开始的第二轮谈判临近结束之前，苏联代表团团长克维钦斯基大使告诉尼采：苏联计划在夏天对苏联在中程核武器谈判上的政策进行回顾和审查，他个人认为，在审查结束之前，谈判立场尚未确定之时，双方应争取在谈判中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7月17日，美苏谈判代表团团长在森林中散步时，美方团长尼采提出一项方案：美方放弃部署潘兴型导弹（108枚），并把计划部署西欧的陆基巡航导弹减少到75枚。作为交换条件，苏必须大量拆除SS—20导弹，使导弹总数减为75枚，即双方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平衡在75：75水平上。但这个方案被两国政府所否定。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安德罗波夫继任。安德罗波夫于12月21日在苏联建国60周年庆典上提出“对等削减”方案：如果美国不部署新导弹，苏愿意将它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减到162枚，即与英、法现有的导弹总数相等；如美接受这一建议，苏还准备销毁一部分裁减下来的导弹，将另一部分移到乌拉尔山以东打不到西欧的地区。美国认为，这一方案实质上企图将美国中导力量挤出欧洲大陆，故未对此作出反应。

美国在拒绝苏联2个裁减方案后，为了显示裁军诚意，决定从“零点方案”后退，于1983年3月30日提出“临时协议”方案：双方就中程导弹达成一项临时协议，规定双方均以弹头为计算单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大幅度削减中程导弹的弹头数量，美国则根据苏联削减后的情况，向西欧部署同等弹头数量的中程导弹，“零点方案”仍作为谈判的最终目标。

对此方案，安德罗波夫于5月3日表示可把弹头作为计算单位。但苏认为此方案从总体看是“零点方案”的翻版，因而不能接受。

1983年9月6日，美苏限制中程核武器的谈判开始第六轮也是最后一轮的会谈，双方的斗争更为激烈。美国为争取国际舆论，大肆揭露苏联的威胁，坚定西欧国家的决心，但实质上已转入实际部署中导阶段。苏联则竭力以恐吓和威胁来动摇西欧国家部署的决心，同时着手采取对应美国部署的新措施。

9月26日，里根在联合国大会讲话上又提出“逐步削减”方案：如果苏联同意在全球范围内对中程导弹实行削减和限制，美国可以不要求在欧洲部署的中程导弹与苏在全球部署的中程导弹数量相等，但美国要保留在其他地区部署的权利。

对此，安德罗波夫于同年10月27日在答《真理报》记者问时提出3项补充措施，表示苏愿意将它部署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减少到140枚，使弹头总数与英、法保持同等水平。如果双方能就此达成协议，苏愿意停止在东部地区部署SS—20导弹，并建议美苏就中程飞机的限额和限制对象进行协商。

接着，美国代表尼采于11月14日在谈判中提出，双方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的中程导弹弹头最多不得超过420颗，在此限额内还可作区域性限制。

尽管方案不断翻新，但各自的出发点和立场均无改变，相互否定对方的方案，双方存在着严重分歧，如均势与非均势之争、裁减中程核武器的种类、英法核力量是否列入谈判范围、裁减限额和计算方法等。双方都想通过谈判削减对方，壮大自己。苏联的意图在于通过谈判阻止美国在欧洲部署潘兴型和巡航导弹，保持自己在欧洲战区的核优势，并在美国与英法之间打进楔子，引发它们之间的矛盾，离间美欧关系。美国的意图在于通过谈判迫使苏联大幅度裁减SS—20等陆基中程导弹，打掉它的战区核优势，加强与英、法两国的团结，共同抗衡苏联。正是由于双方分歧严重，意图各异，且互不让



步，谈判以失败告终。

谈判失败了，美国和西欧加紧新导弹部署的实际步骤。英国议会于 1983 年 10 月 31 日通过关于在年底前部署美国巡航导弹的决议。11 月 14 日，第一批巡航导弹 16 枚抵达英国的格林汉康芝空军基地。11 月 16 日，意大利众议院通过决议案，重申坚持北约的“双重决议”，将有 16 枚巡航导弹部署在意大利西西里岛的科米索。11 月 22 日，西德议会也通过了赞成部署美国新式导弹的决议。

苏联也以牙还牙，针锋相对，于 10 月 24 日宣布，准备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新的战役战术导弹系统 SS—21 导弹、SS—22 导弹、SS—23 导弹。这些导弹只需 3 分钟就可打到西德。与此同时，苏联还集中精力做西德的工作，力图阻挠西德议会通过部署美国导弹的决议，但是没能成功。

1983 年 11 月 23 日，苏联宣布退出美苏日内瓦限制欧洲中程核武器的会谈。

#### 四、“星球大战”计划是宣传“宇宙盾牌”，还是铸造“宇宙之剑”

1983 年 3 月 23 日，美国总统发表电视演讲，核心内容是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系统，防御核导弹的进攻。里根首先展示了 4 张卫星拍摄的照片和一些图表，说明目前苏联加强进攻和防御力量的速度，在某些重要方面打破了美、苏两国之间的均势。他强调，面对苏联军事力量日益强大的威胁，美国的进攻力量必须现代化；接着便宣布美国要加紧研制空间武器，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系统。他说：“我呼吁诸位科学家们：过去，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核武器，但是今天，希望你们能把自己伟大的才能用于和平，给我们找出使这些核武器丧失威力而成为落后于时代的废物的办法来！……如果我们能够制造出可拦截和摧毁飞行中的战略核武器的高级防御武器，就可以对未来抱有更加光明的希望。”在解释为什么要拟定“战略防御倡议”时，里根说：“核战争是打不赢的，因此绝不能打核战争……”

由于核武器令人生畏的破坏力，我们必须谋求另外一种遏止战争发生的手段。这在军事上和道义上都是必要的。应当有一种更好的方法来加强与和平与稳定……为保障本国人民的安全，最可靠的途径是提高对侵略的威慑力，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理论上，防御系统和威慑政策是一致的。对洲际弹道导弹，以前没有有效的防御手段，然而，近年来在弹道导弹防御技术方面的进展有可能建立真正有效的非核防御，最终提供更好、更稳固的威慑基础。”

里根宣布：“我已决定为实现这个目标迈出重要的一步，下令制定一个全面深入的研究计划，我们将着手进行一项可以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业，而战略防御倡议就是为实现这一构想迈出的关键一步。”很快，美国国会中的一些议员和新闻界便将“战略防御倡议”称为“星球大战计划”。“星球大战”原是一部美国科幻故事片的片名，1977 年风靡全国。这部电影描述了宇宙星球间惊心动魄的一场战争：圣诞之夜，美国太空司令接到敌方“杀手卫星”击毁美侦察卫星的信号，他立即发出一号警报，把被袭情况直报总统和国防部。总统立即下令进行迎击和报复，于是美国的战争机器紧急开动：战斗机编队立即起飞，向敌低轨道卫星发起攻击；各种导弹呼啸而出；激光武器、粒子束武器等各显身手……里根在演讲中描述的对付苏联核袭击的前景颇像电影中描写的那样，因而很快就贴上了“星球大战”的标签，在美国

国内引起强烈反响。由于新闻报刊的极力渲染，里根的这一演说几乎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新闻，并传播全球。它揭开了美国太空战略的帷幕，使美苏军备竞赛进入一个新时期。

里根自称：“这项计划并不是科学家们想出来的，尽管他们也积极参与，并为其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但在里根形成这一思想过程中，美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发挥了重要作用。

爱德华·特勒 1908 年 1 月 15 日诞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26 年赴德国卡城工学院学习，获得化学工程硕士学位，后来到慕尼黑大学深造。1931 年，他到德国哥廷根大学，在著名科学家玻恩手下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他被纳粹德国驱逐出境后，经伦敦逃往哥本哈根，1935 年移居美国。后来一直从事核武器的研究工作，为美国研制成功原子弹和氢弹作出了重要贡献，并先后获得艾伯特·爱因斯坦、国家科学奖等多种奖赏。里根总统对他非常器重，1981 年任命他为总统的科学顾问。防御性核武器是特勒长期以来力求实现的目标，他设想：将小型核弹设置在宇宙空间，利用核爆炸诱发强大的激光击毁来袭导弹。早在 1962 年，他所著的《广岛的遗产》一书就写道：“如果能在苏联的导弹到达美国的目标之前将其击落的话，该多好呀！”1976 和 1980 年里根参加竞选总统时，特勒等人向他灌输战略防御的主张，劝他提出发展反弹道导弹武器和民防体系的倡议。里根听取了这一建议，在竞选活动中始终反对“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主张利用美国现代科学技术的优势，研制新一代核武器，以达到保护美国国土和威慑的目的。

而在里根上台初期，美国正在对“确保相互摧毁”的核战略进行重新评估和研究。美国统治集团和军事家们认为“确保相互摧毁”并非十分满意，存在许多问题：一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和平是不可靠的，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双方领导人头脑的明智。而且一旦有人丧失理智或其他偶然因素导致核战争，就将造成无法挽回的恶果。第二，维持这种和平的代价是把本国亿万居民交给对方作人质，因此广大人民不可能有真正的安全感，一直生活在恐怖的威胁之中。第三，恐怖平衡长期下去，只要任何一方在进攻武器技术上取得新的突破而获得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并能在一次核打击中几乎全部消灭对方的核力量时，另一方就必将面临严重的核威胁，因而和平局面没有保证。鉴于这种分析，美国军事家认为，必须寻求新的战略理论，确保美国的安全。由 30 多位著名战略家、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的“高边疆”（High Frontier，指宇宙空间）研究组经过 7 个多月的调查研究，于 1982 年 3 月正式发表了《高边疆国家的新战略》报告，指出当前美国必须当机立断，抛弃以往恐怖平衡的理论，利用科技优势，确立以空间战略为主体的新国家战略。

这个报告借鉴历史经验，强调了空间战略对争霸世界的意义，提出用“确保生存”战略取代“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组建包括太空基地在内的严密的战略防御体系，阻止大规模的核攻击。这个报告的主持者格雷厄姆将军指出：“‘高边疆’不单纯是一项军事战略，而是适应美国及其盟国经济、政治和安全需要的一项真正的国家战略。”

尽管美国政府没有正式宣布将“高边疆”报告提出的空间战略作为新的国家战略，但也看到了空间的意义和建立战略防御体系的必要性。1982 年 7 月，里根发表空间政策讲话，强调要利用空间为国家安全服务。

1982年9月，美国总统里根及其高级顾问召见特勒，听取特勒关于利弗莫尔研究所研制第三代核武器和用以击毁敌导弹的新设想。2个月后在白宫科学技术委员会研讨会上，特勒作为该委员会成员，再次重申其战略防御的观点。特勒认为：美国必须建立一种能够转移或破坏苏联来袭核导弹的坚固防御体系，否则同苏联的核冲突将是不可避免的。

10月10日，特勒在威奇塔举行的美国民防协会年会上，以一种权威的口气说：“防御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你们能够得到真正有希望的武器系统。如果你们在这方面有足够新颖的设想，不要使自己的思路只限于像中子弹这样明显的方法……”特勒主张研制的这些有希望的武器系统指的是三种：一是能探测、攻击敌洲际弹道导弹的空间站；二是空基激光和粒子束武器；三是先进的反弹道导弹。

此后，特勒又以总统私人朋友和科学顾问的身分，多次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里根总统密谈，里根终于同意采纳特勒绞尽脑汁设计的战略防御模式，并强调要用当年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和“阿波罗登月”计划那样的方式研制战略防御武器。

然而，就在里根总统酝酿提出“战略防御倡议”期间，美国国内军政界支持者甚少。甚至在他发表电视演说之前2小时，除了他身边少数几个人之外，很多人都对总统的战略防御系统的设想知之甚少。但里根已下定决心在美国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他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官员谈过几次后，就让助手准备关于新空间导弹防御体系的电视演说讲稿。里根和他的亲信都很清楚，如果事先将演说的内容通告华盛顿的官员们，就会有一半官员打电话来请求总统放弃这个演说。于是，总统讲话一公布，立即在全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3月30日，特勒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说：“里根先生明确表示，依靠报复性攻击遏制力量已不是对进攻性武器的回答。变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为相互确保生存战略才是里根先生希望达到的目的。……倘若尖端技术被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目前笼罩在世界上的气氛将被扫荡殆尽，代之以无须为尖端技术流入哪个国家而提心吊胆，真正合作的气氛占据统治地位，从而奠定和平的基础。”

特勒在评述里根总统的演说时说：“里根总统的建议就像当年罗斯福总统发出研制世界第一枚原子弹的命令一样。”特勒曾是“曼哈顿工程”的参与者，而现在已成为炮制“星球大战”计划的关键人物，被西方新闻界誉为“星球大战之父”。4月18日，里根发表电视演说后不久，签署了当年第6号国家安全指令，要求国防部在10月底以前完成两项工作：一是评价有效的反导系统在美国及其盟国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二是确定一项长期的研究和发​​展计划，以便最终消除核导弹造成的威胁。同时，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了第85号国家安全指令，为贯彻总统的建议提供了行政保证。

为执行总统的指令，美国国防部、能源部立即采取措施，组建了许多执行研究机构，集中了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同年4、5月间，国防部组织了数十名有关专家进行分析、研究工作，其中有战略家、经济学家、技术专家等，成立了“未来安全战略研究组”和“防务技术研究组”。经过几个月的认真研究和论证，他们认为：用现在可以预见的先进技术，研究并探索新的反导途径，建成先进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可能的。

在美国政府内部，还成立了一个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威廉·卫·克

拉克负责的高级部际小组。这个小组在总统演说后第三天就受命从事战略防御研究工作。经过论证，该组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美国有能力发展所需要的反导技术，应及早制订和实施战略防御计划。

10月，国防部向总统和国会提出了新的反弹道导弹研究计划——“战略防御倡议”。计划的实施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可行性研究阶段，从1983年3月至90年代初，主要从技术上研究要搞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否现实。如果现实并决定发展这种系统，则进入以下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系统发展阶段，从90年代初至2000年，进行反导系统的工程发展。第三阶段为生产和逐步部署阶段，从1995年至2005年，开始生产并逐步部署反导系统。第四阶段为完成部署阶段，从2000年至2010年完成全面部署工作。美国试图建立一个以太空定向能武器为主、以动能武器为辅、空间武器和陆基武器相结合的多层综合反弹道导弹系统。按照预想，这一预计耗资1万亿美金的防御系统拟于21世纪初全面完成实战部署，届时苏联成批发射的弹道导弹99.9%将被拦截。

11月30日，里根就国防部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召集会议，讨论了包括反导技术、战略方针等重大问题。此后，里根总统又与盟国领导人就此计划进行了磋商。1984年1月6日，里根总统签署了第116号国家安全决定指令，正式批准了“战略防御倡议”。国防部内成立一个集中管理反弹道导弹研究工作的机构——

战略防御局，由美国国家宇航局副局长、空军中将詹姆斯·亚伯拉罕森为战略防御局局长。该局从1984年4月15日正式办公起，成为美国政府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的强有力机构。

6月下旬，美国国会批准了里根提出的1985年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其中包括“战略防御倡议”的预算经费15亿美元。“星球大战”计划成为美国历史上花钱最多、涉及面最广的一项庞大计划。

面对美国决定建立大规模宇宙反导系统，苏联进攻性战略武器的威慑力势将随着“星球大战”计划的逐步实现而递减，因此，在里根的倡议提出后，苏联领导人及有关团体和人士就大造舆论，表示坚决反对。里根发表演说后的第三天，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就指出，美国战略防御计划的目的是进行第一次打击，是要苏联在美国核威胁面前解除武装。1983年4月10日，苏联240名科学家发表声明说：在核战争中不存在有效的防御手段，实际上也不可能建造这种防御体系。同年6月20日，塔斯社发表评论指出：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武器都会大大增加地球上爆发战争的可能性。

1985年初，前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说：“‘星球大战’计划使用‘防御性’这个术语，不过是玩弄字眼。从其实质来说，这一概念是进攻性的，更准确他说是侵略性的。”而戈尔巴乔夫在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则宣布，美国“宣扬宇宙盾牌，而实际上是在铸造宇宙之剑”。

苏联在揭露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实质的同时，采取针锋相对、以攻为守的方针与之对抗。由于苏联的国力不可能像美国那样把大量投资和技术力量集中于建立太空防御系统，因而它决定把对抗措施的重点置于增强战略核力量的改进上。在继续稳步地发展太空武器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和提高战略核武器的突防能力，并为进攻武器补充防御手段，加强其生存能力，争取在90年代中期以前，用先进的系统取代目前部署的战略核力量。

至苏联解体前，苏联科学家已研究了几十种反措施。空军少将苏里科夫

说，已拥有能够有效反击“星球大战”计划的一切手段，既可以采取进攻性的反措施，也可以采取防御性的反措施。

由此看来，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将美苏军备竞赛扩展到了外层空间。颇具戏剧性的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由于脱离美国的战略实际、技术实际和财政实际，再加上形势的发展变化，逐渐陷入困境。10年之后的1993年5月，克林顿政府经过重新审查和研究，宣布结束历时10年、耗资350亿美元的“星球大战”计划，并提出新的反导弹防御计划，原来监管“战略防御计划”的国防部战略防御局也改名为弹道导弹防御局。这一轰动一时的战略计划终于走进了死胡同。

### 五、裁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大打“方案战”，五轮会谈未果

1979年6月美苏达成的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规定，双方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运载工具总限额1981年1月1日起减至2250件。但条约签署后，由于美国国内有争议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事件等原因，美参议院未予批准。里根上台后，认为该条约有“致命缺陷”，主张另订新的条约。而苏联表示希望在以往两个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再进行新的谈判，以保持自己的有利势头和限制美国战略武器的发展。

由于里根政府一开始对军备控制持拖延政策，所以直到1981年11月18日才发表他的第一个裁军声明，除了提出裁减中导的“零点方案”外，还表示希望在1982年尽快举行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

1982年5月9日，里根在其母校尤里卡学院为纪念他从那儿毕业50周年所举行的集会上发表了一篇著名演说，提出东西方关系的五项原则：军事均势、经济安全、地区稳定、裁减军备和举行对话，并再次邀请苏联人正式进行削减战略武器谈判。为此，里根提出了一个“分阶段裁减”方案。他建议：第一阶段把美苏战略导弹（包括陆基洲际导弹和潜地导弹）的弹头削减三分之一，各减至5000颗，其中陆基导弹弹头不超过二分之一，即2500颗。同时，把各种弹道导弹的总数削减到一个同等的最高限额，这个限额应低于美国现有导弹总数的一半。第二阶段把双方导弹的投掷重量减到低于美国现有水平的同等最高限额。

里根之所以作出主动姿态，主要是因为里根政府在推迟谈判方面赢得了时间，政府已经制订了加强核威慑力量的长期计划，而且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可作为长期讨价还价的基础。

1982年5月里根写给勃列日涅夫一封信，建议于该年7月底之前恢复在日内瓦举行的军备控制会谈。他在信中写道：

“我的看法是我们以往在限制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尚不能完全达到对它们进行削减、均衡、核定的标准。核武器所具有的令人畏惧的破坏力使我们两国都切实感到，我们要倾全力去减少乃至消除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这样做既是出于我们的实际需要，也是出于我们必须履行的道义。这是35年来我国在限制核武器方面向前迈进的一大步……现在，我们在为减少核战争威胁的努力过程中站在了又一个历史关头。”

虽然勃列日涅夫所作出的反应并不热烈，但他还是同意进行新的会谈。他在回信中写道：“限制战略武器的进程被长时间中断并非是我方的过错。……根据您5月9日的演说来判断，美国对进行谈判所持的立场只能使人们对美方意图的严肃性产生忧虑，甚至怀疑。”

里根一边读这封信，一边在信纸边缘上草草写下对他的话的反应。在上一段中所摘引他的一句话的下边，里根写道：“他不得不哄骗。”

在勃列日涅夫所写的“美方在其为自己勾画的现实的基础上所谈论的‘实质性削减，自然将是仅对苏方实行实质性削减’”这一段话的下边，里根写道：“因为他们拥有的最多。”

勃列日涅夫写道：“这种单方面削减的唯一结果将是军力平衡现状的颠倒和对据说是美方渴望得到的那种稳定状态的打破。”

“不会有误解，总统先生，这并不是一种实际的立场，也不是一条达成协议的途径。除此之外，如您所知，并不仅是我们持有这种观点。”（这里显然是指欧洲裁军运动）勃列日涅夫建议立即对双方拥有核武器的数量进行冻结。“照我们的看法，达成这样一条协议将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条件，也有助于达到目标。总统先生，我愿请您认真考虑这一建议。”（里根在页边上的批语是：“我已经认真考虑过了，这是要用一只苹果换取一座果园。”）

勃列日涅夫继续写道：“苏联人民您可以误解我的话将坚决支持这样一个协定。”针对这句话里根在页边写道：“他们怎么会知道？他们已多年不能得知真情了。”在信纸的底边里根写道：“他真是个笑柄。”

尽管苏联对美国提出的方案不赞成，但同意谈判。5月31日，美苏双方共同宣布，关于限制和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定于6月29日在日内瓦举行。

1982年春，里根在联合国和尤里卡学院等场合针对苏联的直言引起了很大反响。他在讲话中提醒勃列日涅夫：“对于你们想要做些什么事我们是心中有数，在你们谋求世界统治权的过程中，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无所反应。”里根试图发出信号，表明美国愿意对任何地区的为反对共产主义争取自由而战的人民提供支援。这就是那项后来被一些撰文者称之为“里根主义”的政策。一些国会议员和报刊的专栏作家断言总统已决心把美国拖入一场同苏联人的核战争。当时欧洲和美国国内正在发起一场冻结核武器的运动。他们把里根描绘成一个渴望拔出装有核弹的六轮枪，为世界带来末日而行事鲁莽的牛仔。

1982年6月在凡尔赛参加最高级经济会议时，里根应邀去向英国和西德的议会发表演说。他想公开宣布他绝非是在拿世界末日开玩笑。他说：“在一场核战争中不会有胜利者，这样的战争是绝对不能打的，但是，在我们能说服俄国人把他们的手指从扳机上松开之前，我们必须让他们意识到西方世界绝不会无限度地容忍另一个国家的罪恶行为，但是，为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使自己能在实力地位上同俄国人进行谈判。”“我们的军事实力是维护和平的先决条件。”接着，他竭力为其实力政策辩护：

“但是，我们要把话说清楚，我们要保持实力，但绝不希望去使用它。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中最后的决定因素将不是炸弹和火箭，而是对人们的愿望和主张的检验，是对决心和意志的考验，是我们所遵奉的价值观，是我们所抱有的信念，是我们为之而献身的理想。……如果历史能教会我们一些什么的话，它使我们懂得的正是在不利的现实面前进行自欺欺人的幻想是最愚蠢的。今天，在我们周围可以看到那些可怕困境对世界末日的预言，反核示威，以及一场西方国家为了保卫自己而不得不违背意愿参加的军备竞赛。同时，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强权势力欲在全球范围制造颠覆和冲突，以便进一步对人类意志进行野蛮践踏。那么，我们的方针到底是什么呢？世界文明是否肯定要在场原子战争灾难中毁于一旦呢？自由能在极

权主义的恶魔面前忍气吞声、麻木不仁而衰亡吗？”

1982年6月29日，美苏关于限制和裁减战略核武器的第1轮谈判在日内瓦举行，苏联提出一个基本上是“冻结”的方案，其内容是美苏双方冻结战略核武器的生产和部署，限制它们现代化，然后在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基础上进行裁减，到1990年以前把双方的战略武器（包括陆基导弹、潜地导弹和重轰炸机）从原条约规定的2400件减至1800件，约裁减25%。

在1983年6月8日举行第4轮会谈时，美苏各自抛出一个新方案。里根的方案除坚持战略导弹弹头仍按美国提出的“分阶段裁减”方案外，建议对战略导弹运载工具的限额予以放宽，即把限额由原850枚放宽到1200枚，而携带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的限额则为400枚，同时在削减投掷重量以及重型轰炸机是否放在第二阶段谈判等问题上采取灵活态度。苏联的方案是：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和携带巡航导弹的重型轰炸机的限额由原条约规定的1320件减至1200件，其中潜地导弹为400枚，陆基导弹为680枚，重型轰炸机为120架。由于双方立场遇异，谈判未取得进展。

在1983年10月5日第5轮会谈前夕，美国又提出新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美苏每年至少把各自的战略导弹弹头销毁5%，直至双方核弹头减至5000颗为止。同时，美苏每增加一颗战略导弹弹头，都需销毁更多的原来拥有的弹头。此外，战略轰炸机和它所携带的巡航导弹，可与战略导弹一起裁减，不需要分两步走。美国新方案的实质在于限量而不限质，是为了便于美国武器的更新。据西方透露，美国的设想是美苏每增加一颗新的陆基导弹弹头，必须销毁两颗老弹头，而每增加一颗潜射导弹弹头或机动的单弹头，只须销毁一颗或是一颗半老弹头。这显然有利于美而不利于苏，因为苏联的陆基弹头占弹头总数的70%，而美国由潜艇和轰炸机发射的导弹弹头占弹头总数的80%。双方在武器更新后，美国要销毁的老弹头肯定要比苏联少，因而新方案立即遭到苏联的断然拒绝。

从1982年到1983年，美苏关于限制和裁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一共进行了5轮，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双方的主要分歧是：

第一，苏联主张以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为基础作进一步削减，美国主张放弃该条约，推倒重来。美国认为这个条约允许苏保留全部重型陆基导弹，不包括苏“逆火式”轰炸机，不限制导弹弹头和投掷重量是有“严重缺陷”的，要重新订一个新条约取而代之。

第二，美国主张重点裁减苏联拥有优势的陆基战略导弹，苏联主张多裁减美国拥有优势的潜地导弹和重型轰炸机，对方均不接受。

第三，苏联主张战略武器谈判与欧洲中程核力量谈判不可分割，美国反对互相联系，认为将要部署的中程导弹是战区核武器，与战略核武器不是一个范畴。

第四，在核查问题上，双方也存在很大分歧。

1983年12月7日，第5轮会谈宣告结束，美方建议于1984年2月初复会进行下轮谈判。苏联宣称，由于美国在欧洲部署新式导弹而引起的“全球战略形势的变化”，苏联有必要回顾和审查谈判中的全部问题，乃拒绝提出复会日期。日内瓦谈判遂告中断。

## 六、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南朝鲜客机，引发美苏外长一次激烈的交锋

1983年8月31日格林威治时间18时30分左右，一架自纽约飞往汉城

的南朝鲜 007 号航班客机在苏联远东极为敏感的领空为苏方所击落，机上乘客连同乘务人员共 269 人全部遇难，其中包括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和其他 60 位美国人。这一事件是当时美苏尖锐对抗形势下的产物，而美苏双方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同样反映了双方的严重对抗立场，并进一步恶化了双方关系。

当时，里根正在加州度假，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惊。事件发生后，苏联一开始矢口否认击落客机的事，但根据日本空中交通控制器监听到的苏联飞机用无线电与地面联络的内容看，里根很快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安德罗波夫承认苏联战斗机击落一架大型客机，但这是正当的，因为南朝鲜航空公司的波音 747 客机飞越苏联领空，是替美国执行“间谍飞行任务”，苏联有权捍卫领空安全。

里根被惹怒了，决定缩短度假时间，提前返回华盛顿。飞机一着陆，里根总统立即召集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开了一个特殊的夜间会议。在会上，里根决定要求盟国加入美国采取的对苏制裁行动，同时要求苏联向遇难者家属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失。

根据美国方面对事故有关细节的分析，他们判断：这架飞机机组人员由纽约市起飞，中途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加油，在飞往汉城的途中，显然没有把计算机正确安装在自动导航系统上，致使飞机偏离航线，朝北飞向苏联领空，而不是往日本方向飞行。越往前飞，他们的错误航向偏差越大，而机组人员明显没有意识到他们犯了错误。他们传送回地面的信息，也表明他们并不知道苏联飞机在太平洋上空追踪他们。

9 月 4 日早晨，里根在椭圆形办公室召见了国会的主要领导人。里根让人播放了一盘窃录有苏联飞行员讲话内容的磁带，飞行员说，他正在启动飞机上的空对空导弹系统，开始把雷达天线瞄向目标，然后发射导弹。这一切结束后，飞行员说：“我的目标被击落了。”

9 月 5 日，里根先在书房修改由白宫讲演撰稿人送来的一份有关这一事件的讲演稿。里根采用了其中的几个段落，但大部分内容是重新写的，这样就能够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一“野蛮行径”的看法。随后，他换上了一套蓝西装，向全国发表了讲话。他说：

“明确无误，这一攻击不仅是针对我们或者是南朝鲜，这是苏联在与世界对抗，公然违背指导一切人民之间的人类关系的道德准则。这是一种野蛮的行径，出自于一个肆意践踏人权和生命价值，不断进行扩张，以图控制别国的社会……我们不应该被这种毫无人性的暴行所震惊。让我们回想一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以及遭毒气弹攻击的阿富汗村庄。如果这次残杀和随后表达的言行是为了恐吓的话，那么他们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这了对这一事件作出反应，美国对苏联国家航空公司在美国的着落权采取了一些新的限制，同时还中止履行同苏联的部分双边条约。

苏联在雷达跟踪了两个半小时后将这架客机击落，并坚决拒绝对这起事件承担任何责任。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瞬间传遍了全世界。各个国家性质不同的反应接踵而至。华盛顿的反应最为神经质，并且前言不搭后语。美国的某些集团有意地利用这一事件来加剧局势。他们掀起了一阵诽谤苏联的浪潮。

美国各个部门的代表竞相散布很多相互矛盾的虚假消息。美国政府亲自出马，扮演了低毁苏联的主要诽谤者的角色。仅这一个事实就很说明问题。

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马上就可看出，华盛顿实际上是在为自己的飞机



辩护，只不过在飞机上贴上了南朝鲜的标签，这一反苏挑衅的真正策划人、指使这次被用于军事侦察目的的飞机的正是美国有关部门。这一挑衅行动失败后，它的组织者又利用这一事件来煽动军事狂热。”

这件事发生后几天，即9月8日，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参加国外长级代表马德里会晤最后阶段会议召开。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一开始就感觉到会议的气氛异常紧张，他面临很大的压力。会前，许多记者向他提问：“这次会议上将会发生什么事？马德里会晤结果会怎样？”

葛罗米柯没有直言回答，而是明确表示：“想破坏这次会议的只有那些根本不想召开这次会议的人，虽然他们正在掩盖自己的这种意图。”

部长们开始发言了，他们就会议所面临的问题阐述了各自代表的国家的政策。多数北约国家的代表发言支持美国散布的关于飞机事件的看法。一些代表说，这次事件是可悲的、惨痛的，但却明确表示，他们不相信五角大楼和美国特工部门所作的解释。

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发表了对苏强硬的讲话。

葛罗米柯立即反击：“这次飞机侵犯苏联边界，是军事侦察性质的蓄意挑衅。我以苏联领导人的名义宣布，苏联拥有守卫自己边界的神圣权利，不允许任何人侵犯而不受惩罚。这是它的主权。其他国家也有同样的权利守卫和保卫自己的边界。”

美苏代表发言之后，紧张气氛可以说达到了最高点。然而会谈并没有就此夭折，美苏两国外长还将按计划举行双边会晤。原来预计，这次会晤将就苏美关系问题和诸如限制战略核武器及欧洲核武器谈判的进程等重大问题认真交换意见，但由于飞机击落事件使得会谈的主题出现了重大变化。

第二天，舒尔茨一开始就拿苏联内部的人权问题大作文章，攻击苏联政府和苏联领导人。葛罗米柯说：“讨论这一题目毫无意义，因为谈的这些纯属我国内部事务。”

然而舒尔茨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再次重复了关于人权问题的话。说完后，好像觉得分量不够，又补充了一句：“我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总统委托我说的。”

葛罗米柯尽力克制住心中的不满，说：“我们不打算同任何人讨论我国的内部事务，至于说您作为国务卿所接受的委托，那么，它不能约束我，我作为另一国的代表没有义务听从美国总统的指示。您终究不会自己和自己讨论这些问题吧？我们还是走出这个小房间，到另一个房间去，我希望，我们在那里能够讨论苏美关系和国际政治的重要问题，让我们的顾问们也参加，这样不是更好些吗？我们事先正是这样商定的。”

舒尔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到另一个房间去，开始进行较大范围的会谈。苏联方面出席这一会谈的有外交部副部长弗·格·科姆普列克托夫和译员弗·姆·苏霍德列夫，美国方面有总统苏联事务特别助理杰克·梅特洛克，副国务卿里查德·伯特和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瑟·哈特曼。

双方刚坐好，舒尔茨就开始谈判飞机事件，而对葛罗米柯提出的会议议程只字不提，并再次强调，这是总统的指示。

葛罗米柯毫不客气地打断了舒尔茨的讲话，说：“您企图按照在华盛顿早就拟定好的蓝本行事，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应当讨论诸如苏美关系、与核武器问题有关的欧洲局势和日益紧张的世界局势等重大问题。”

舒尔茨似乎并不买帐，继续攻击苏联击落客机事件。葛罗米柯不得不直

截了当地声明：“如果美国国务卿要回避讨论重要问题而企图把整个会谈归结为宣读华盛顿关于飞机事件的声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您就没有可谈的题目了，可以认为我们的会谈到此就结束了。”

见葛罗米柯摊牌了，舒尔茨连忙声明：“里根政府是赞同与苏联进行建设性对话的。”

“既然如此，我们就应当谈论双方感兴趣的重大问题，而不是一方无休止地发表对某一事件的声明！”葛罗米柯说。

一番唇枪舌剑之后，双方终于商定会谈按原定议程继续进行下去。

葛罗米柯说：“我们的主要任务在于修整苏美关系，缓和由于美国在两国关系中以及在全世界的行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

接着，葛罗米柯就核军备问题阐述了苏联的立场。他说：

“关于飞机问题好像是头号问题的说法是臆造的。实际上，全世界面临的头号问题是防止核战争。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当然，如果他神经正常的话，不认为正是防止核战争问题才是全人类最迫切的任务。

现在世界正滑向一个十分危险的边缘，离它越来越远。显然，苏美两国对于防止核浩劫负有重大责任。我们认为，美国应该以新的方式来评价它所肩负的这一重大责任，总统和他的政府不应像过去那样看待对外政策事务。所有旨在遏制军备竞赛、限制军备竞赛的建议都被拒绝了，更不用说关于削减核军备的建议了，难道这不是事实吗？不管苏联为此提出多少建设性建议，美国都不假思索地予以拒绝。这样的事例实在太多了。

苏联领导认为，苏美两国应当积极地促进消除核浩劫的威胁。况且，在这方面我们两国在过去已经通过了共同的正式文件。它的条款要求我们两国朝着这一方向采取行动。”

舒尔茨坐着一言不发，似乎在认真听着。

“苏联正在为此而坚定不移地作出努力。即使是在复杂的条件下，对话也是可能的。这话听起来可能会使人感到奇怪，但就连我们这次会晤也表明了这一点。再不好的对话也比打仗好。

我们还怀有一线希望，但愿美国政府还没有放弃这样的想法、即必须通过谈判寻求解决争议问题的办法。不能允许今年笼罩在世界上空的乌云突然爆发一场浩劫。这样的浩劫对于大家、对于美国、对于我国、对于全世界将意味着什么，这一点美国了解得丝毫也不比我们差。”

葛罗米柯继续说：“我提醒您注意苏美关系中的一件事例。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莫斯科时，通过谈判两国得出一个结论，即应当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国际问题的办法，并确实进行了寻找。是的，让我们回忆一下，尼克松时期进行了寻找。堆积如山的武器和整个国际局势要求我们珍惜一切有助于架起和平桥梁的东西。因此，我们呼吁美国总统和您——国务卿，带着责任感去寻求协议，利用一切可能性，以使我们在停止核军备竞赛和裁军问题上的立场相互接近。”

接着，葛罗米柯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美国打算在西欧部署新式导弹核武器的愿望得以实现，那结果又会怎样呢？因为苏联不会睡大觉，我们将努力恢复平衡，而且一定会做到这一点。那时的世界将变得更加脆弱，因为这种平衡将建立在更高的水平之上。这就是美国实际上会导致的局面。我和您有责任说明本国的立场，并向本国领导人报告每一方提出来讨论的那些建议。”

舒尔茨回答说：“你应该知道，没有人比里根总统更忠于和平的思想。他为裁减军备所提出的建议是合理的。”他列举了大量论据来说明美国的立场，后来话锋一转，重新谈到南朝鲜飞机事件，企图在这个问题上挑起辩论。

葛罗米柯立即阐述苏联的观点：“既然您又重提这个问题，那我也要郑重声明。我们认为，你们进行了大规模的反苏活动，而且是经过事先策划的活动。美国的声明不能驳倒我们这一观点。试问，这里所说的那架飞机怎么会偏离公认的原定的空中走廊达 500 公里呢？并且不是偏向国际水域一侧，而是偏向苏联国界一侧，侵入苏联领空纵深，飞行两个多小时呢？”

我要提醒国务卿先生，你们声明避而不谈这样一个事实，即飞机是在苏联远东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地区上空飞行的。为什么这架飞机在苏联领空不听从警告信号和要它降落的要求呢？这些信号和要求是完全符合国际法和我国法律的。这架飞机拒不遵守国际法准则和苏联法律。而所有与此有关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些准则和法律，就像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律一样。”

见舒尔茨没有回答，葛罗米柯继续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指责美国政府组织反对苏联的罪恶活动。飞机事件并不是反对苏联的个别敌对行动。同时，我们还坚决反对现在已成为美国政府惯用语的那些字眼，即坚决反对对苏联、对我国社会制度的谩骂。”

这次会谈就这样结束了，葛罗米柯后来说，这是他同科德尔·赫尔到舒尔茨等 14 位美国国务卿谈话中最激烈的一次交锋。

## 七、加勒比海的小岛国格林纳达爆发军事政变，触动了美国的“神经”，美军导演了一幕“牛刀杀鸡”的把戏

1983 年 10 月 13 日，位于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国格林纳达爆发了军事政变，以政府军司令奥斯汀为首的一伙军官，占领了总理府，手无寸铁的莫里斯·毕晓普总理遭到软禁。19 日，数千群众在首都圣乔治游行支持毕晓普，并将毕晓普解救出来。随之，这些人与政变者发生冲突，毕晓普又重新落到政变者手中，当天便被秘密处决。20 日，军方接管政权，并成立了以奥斯汀为首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格政权落入到亲苏联和古巴的强硬派手中。

而在美国白宫，关于格林纳达局势的会议正在秘密进行。这是里根任总统以来秘密程度最高的一次会议，参加者除了总统、国务卿和国会领导人外，只有里根的几位高级助手。

靠墙的地方挂起了一张南加勒比海地图。即使在这张放大了 250 倍的地图上，格林纳达仍然显得渺小，似有若无。在地图的下方，还有一行提示性的文字：格林纳达，距美国 3000 公里。人们不禁要问，美国这么一个具有世界头号军事和经济实力的超级大国，为什么会小小的格林纳达那样感兴趣呢？

原来，格林纳达虽小，陆地总面积为 344 平方公里，但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位于加勒比海东部的小安得列斯群岛南端，西濒加勒比海，与巴拿马运河遥遥相对，东临大西洋，扼加勒比海出入大西洋的东部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格林纳达独立后，成为英联邦成员国，由统一工党执政。以埃利克·盖里为总理的统一工党政府奉行亲西方和亲美的政策，引起了在野党“新宝石运动，”的不满。1979 年 3 月 13 日，该党发动政变，推翻了盖里政府，成立了以莫里斯·毕晓普为总理的新政府。该政府在外交上奉行向苏联和古巴“一边倒”的政策，大量接收苏联和古巴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引

起美国的极大不满。美国认为，格林纳达如果被苏古完全控制，由格林纳达、古巴和尼加拉瓜三国的机场构成的“铁三角”将使作为美国传统“后院”的中美洲加勒比海地区处于苏、古作战飞机的威胁之下，美国海上运输线的畅通和本土的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由此，美国不断向毕晓普政府施加压力，试图推翻格林纳达的亲苏古政权，将其纳入“民主”国家之列。

在美国的压力下，毕晓普开始采取措施缓和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1983年6月7日，毕晓普还亲自访问美国，并与美国达成一项“谅解”。但是毕晓普的上述行动引起了政府内部以副总理科尔德和政府军司令奥斯汀为首的亲苏古“强硬派”的激烈反对，最终导致了政府军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毕晓普政权。

格林纳达的政变给里根政府出兵提供了借口。为了做到“师出有名”，里根政府陈述了三条理由：一是保护在格林纳达圣·乔治大学的几百名美国学生；二是保护在岛上的英国总督；三是根据原总理毕晓普合法政府的请求和加勒比6国政府的紧急请求。其实，美国的战略企图是力求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推翻政变政权，扶植亲美新政府，同时慑服其他中美洲国家亲苏古的政治势力，以对抗苏联和古巴在中美洲的“渗透”和“扩张”。

为实现这一企图，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代号为“暴怒行动”的作战计划，出动地面部队8000人、海空军1万人、飞机230架、航空母舰2艘，其他舰船13艘。而格林纳达仅有陆军2000人。21~23日，美海军“独立”号航母编队和“关岛”号两栖攻击舰编队隐蔽驶抵格岛海域，在该岛周围50海里范围内建立了海、空封锁区。

1983年10月25日清晨4时30分，美国舰载航空兵对珍珠机场实施航空火力准备。5时，来自84—1陆战队两栖戒备大队的400名海军陆战队从集结于珍珠机场以东水域的“关岛”号两栖攻击舰搭乘直升机，直接在珍珠机场跑道上登陆。经2小时战斗，美国便完全控制了珍珠机场。

5时30分，一场激烈的战斗在格林纳达西南部的萨林斯角机场打响。美“独立”号航母出动A—6、A—7攻击机对萨林斯角机场实施火力压制，不等守军喘过气来，又由武装直升机护送本身就具有攻击能力的AC—130武装运输机进行人员空降。特种部队和驻本土及巴巴多斯的第82空降师各2个营控制机场后分兵两路向圣乔治推进。

格军大部溃散，但正在帮助修建机场的古巴人却顽强抵抗。但两个机场失守之后，格岛之战的胜利格局就基本确定了。26日，美军攻占格军要塞弗雷德里克堡，27日攻占军事要地里蒙奇山监狱。至28日下午，美军经激烈巷战后占领圣乔治城，战斗结束。

从整个战争过程来看，呈现一边倒的趋势。美国在战争过程中始终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并最终以很小代价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对格林纳达的占领，达成了战略目的。而格林纳达方面处处被动，处处挨打，8天之内就落得个丧权辱国的局面。战争结束，美军仅有18人阵亡，90人受伤，损失直升机10余架。格军亡40余人，被俘15人，其余逃散；古巴人亡69人，伤56人，被俘者达642人。

这场战争是以大凌小的侵略战争，遭到了包括美国的西欧盟国在内的世界多数国家的一致反对，美国的国际形象大受损害。但是这场体现现代样式岛屿作战的战争，是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是一场代价小、收益大的速决战。美军战前准备仅4~5天，反应快速，发

挥海空军优势封锁、控制格林纳达的领海和领空；海军陆战队、空降兵和特种作战部队登陆和空降后，快速突击，速战速决，在战略指导上有许多成功经验。美军三军出动，上有卫星、现代化作战飞机和各种直升机，下有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水面舰艇、坦克和各种装甲车辆，有大量的精确制导武器，有先进的 C<sup>3</sup>I 系统等。而格林纳达方面既没有飞机、舰艇，也没有坦克、大口径火炮，其高技术装备几乎等于零。格美对抗，实质上相当于拿棍棒的人与拿着自动步枪的人打仗。

美国占领格林纳达后，扶植原英国总督保罗·斯库恩上台组织新政府，新政府上台不久便限令古巴外交官离境，宣布与苏联、利比亚断交。随后，英联邦派出多国部队进驻格林纳达，美军在 11 月 6 日全部撤出，格林纳达重新纳入美国的势力范围。

## 八、美苏战略攻守态势发生变化，苏联走向衰落，“美国的领导地位业已恢复”

在整个 70 年代，苏联大力扩充军备，利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及其后的“越南综合症”之困境，积极对外扩张，直至 1979 年年底派遣 10 万大军入侵阿富汗而达到高峰，当时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战略态势可说是苏攻美守。然而，自里根上台后，战略攻守态势开始发生变化。

苏联由于推行侵略扩张，使它开始走向衰落。长期的军备竞赛使经济处于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1981~1985 年苏联第 11 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在政治上，勃列日涅夫后期，贪污腐化盛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病故，苏联领导几乎处在软弱无力的时期。而在国际上也是危机四伏，处境孤立。它有中国问题、阿富汗问题、越南问题和波兰问题等久拖不决，美国国务卿黑格在 1981 年就指出，苏联出现了明显的历史性衰落的迹象。

而美国恰好相反，经过 1981 年和 1982 年经济调整和加强军备，美国处境得到较大改善，西方国家比较团结。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苏政策更加积极主动。1983 年 6 月 15 日，国务卿舒尔茨在参议院外委会发表一篇经过里根总统批准、全面阐释美对苏政策的声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美苏在国家利益和价值观上存在着对抗，同时又在避开一场大战上有着共同利益。

(2) 美国的对苏政策既不是简单的遏制，也不是单纯的缓和，而应是“超越遏制与缓和”，即承认苏联已是全球性超级大国，尊重苏联的合法安全利益，同时又把对苏政策建立在加强西方实力、增进西方各国间相互的凝聚力和坚决抵制苏的冒险行动的基础上，不是使苏联被套在所谓的“相互依赖之网”中，而是要使苏联慑于其侵略会招致的明显风险，认识到克制乃是其唯一的选择。也就是说“大棒”应重于“胡萝卜”。同时，还要致力于“鼓励苏联制度逐渐向更加多元化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演变”。

(3) 加强盟国对苏政策的共识，重建美苏之间的战略平衡，使东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不致让苏联捞到军事技术上的好处和经济上的补贴，以及增加对那些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世界国家以军经援助，通过这些办法造成一种不利于苏联进行侵略扩张的国际气候。

(4) 同苏联进行谈判和对话，对话的四项议程包括人权、军控、地区冲突和双边关系。

美国对苏联的攻势是全方位的。在军事和军备控制问题上，美国采取强硬立场，中导条约谈判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相继告吹，美国于1983年3月抛出“星球大战”计划，并按计划于1983年年底在欧洲开始部署新型中导。1983年10月，美军入侵格林纳达速战速决。这几件事在声势、心理上和战略态势上给予了苏联很大的打击。

在意识形态领域，里根政府咄咄逼人。1982年6月，里根出访法国、意大利、英国、西德4国，6月8日，在英国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讲，直接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公开邀请苏联同美国进行思想和价值观的竞争，还公开提出要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民主，制定一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扔到历史的垃圾堆”的向自由和民主进军的长远规划。

1983年2月23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了一项为全世界“推进民主”而申请6500万美元拨款的法案。当天，舒尔茨在众院外委会的国际活动小组委员会上作了一个说明。他明确指出：“民主乃是一种很重要的、革命的力量，支持民主的发展是我国人权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对民主的支持不应该是隐蔽的，相反应为提供这种支持感到自豪。”这个推进民主的计划主要是面向拉美、非洲和亚洲，但同时也要针对“东欧和苏联”，希望促进苏东地区向更加开放、富于同情心和人道的社会演变，并最终走向民主。

而且，美国加强了同欧、日同盟的团结与合作，改善了美中关系，增加对第三世界一些重点国家的军经援助，使苏联更加孤立。但是，美国在中东的攻势遭受了重大挫折，导致美撤出黎巴嫩部队。

1984年4月6日，里根在一次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说中说：“美国被视为一个没有方向盘的超级大国、一个听任世界形势摆布的国家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美国的领导地位业已恢复。”在80年代前五年的美苏较量中，可以说美国取得了优势。

## 第十二章 戈尔巴乔夫“旋风”

美国同苏联开始第三次缓和，主要是苏联采取主动的结果。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后，认识到苏联经济已经出现停滞，苏联的科技水平同西方存在着巨大差距，苏联的军费开支给苏联经济造成了沉重负担。在这种形势下，苏联不应也不能继续同美国进行军备竞赛和在世界各地同美国进行对抗和争夺。为了力争尽早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保持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使苏联能在世界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戈尔巴乔夫认为苏联必须刻不容缓地在国内实行改革。为了保证在国内实行改革，就必须有个缓和的国际环境。戈尔巴乔夫多次强调，缓和是实行苏联国内改革的先决条件。出于这些考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在国内实行“加速发展战略”和在对外政策上要实行“新思维”。“新思维”的核心就是缓和苏联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的关系。正是“新思维”掀起了戈尔巴乔夫“旋风”，推动着戈尔巴乔夫不断作出缓和和改善苏联同西方，特别是同美国关系的努力。里根在第二任期内则开始着重应付戈尔巴乔夫的和平攻势，以实力为后盾，通过对话和谈判使苏联让步，以实现遏制和削弱苏联的目的。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4次正式最高级会晤。这些会晤基本表明了里根第二任期内美苏关系已经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并取得一些具体成就。虽然缓和是美苏双方的共同需要，但总的说来，苏联的需要更大，也更为迫切，因为苏联的处境比美国更加困难。

### 一、克里姆林宫换了新主人，里根通过频繁通信揣摩着这位新主人的“脾气”

1985年3月11日，因苏联领导人契尔年科逝世，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凌晨4时，里根被人叫醒，得知这一最新消息。他马上考虑是否该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直觉告诉他，不用去。

上午9时，里根与舒尔茨在办公室见面，舒尔茨认为总统应该去，并与里根争执起来，但里根坚持不去，让舒尔茨当天晚上与布什副总统同行。

鉴于苏联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一个个去世，里根问夫人南希：“如果他们排着队在我面前死去，我可如何同俄国人打交道？”但他打定主意，决定早日与这位苏联新领导人相识。布什前往莫斯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时，里根让他带去了发给戈尔巴乔夫的邀请信，请他来美国出席首脑会议。

里根在信中写道：“您可以确信，我将与您及其他苏联领导人在严肃的谈判中合作，这是我本人的承诺。本着这个精神，我愿邀请您，在您认为方便的时候，能尽早来华盛顿访问。我知道极早收到答复是不太可能的。然而，我想让您知道，我期待着这个能使我们两国以至国际社会受益的会晤。”

里根没有想到，戈尔巴乔夫两星期后就回了信。戈尔巴乔夫感谢里根委派布什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说他有义务召开首脑会议，但地点不必在华盛顿。戈尔巴乔夫在信中说：

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但是，我们相信这不是相互仇视的原因。每种社会制度都有生存权利，它不应以暴力和军事手段来显示其优越性，而应与另一制度在和平竞争的大道上相互竞赛。所有的人民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而不需别人从外部将其意志强加于他们，并干涉他们的内政。我们相信，这是国与国之间关系唯一公正健

康的基础。我们方面，完全是以这种方式，一直力争与美国以及别的国家建立相互关系。另外，苏联领导人确信，我们两国无疑还有一个共同的利益：不能引发核战争，它将对对方造成灾难性后果。双方在制定方针政策时，都应时常想起这一点。

我相信，本着这种态度，以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为依据，并以尊重另一方权利和合法利益为基础，我们可以为已走上真正改善关系之路的我们两国人民以及全世界作出很多贡献。

我们意识到，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开始着手处理事务时，让我们自己和别人都能看到并感觉到，两国的目标不是加深分歧和激起敌意，相反地，两国都是为着和平稳定的发展前景而制定他们的方针，这将有助于两国间产生更加信任的气氛。这不是一件轻易的工作，而是件微妙的工作。因为信任是特别敏感的事情，是双方真心实意的感情的接纳。以下情形就不能加深信任，比如，某人讲话好似用两种语言：一种用于私下交往，另一种，正像他们所形容的，是讲给听众的。

相互关系的发展将通过寻找解决共同利益中难题的实际办法得以顺利进行。如我所料，您也同意这种看法。

我们相信，应在所有问题，国际的和双边问题上都以此办法行事。任何难题都可以解决，当然只有在相互同意的基础上，这就意味着找到了合理的妥协方法，主要的标准是：双方在国际事务和两国之间的问题上，任何一方都不许为自己要求特殊权利或优势。

无论涉及我们关系的问题有多么重要，或如何以各种形式影响双边关系，处于中心位置并应优先考虑的事是安全问题。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会议，应引起我们俩人高度注意。显然，我们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关注在那里将要讨论的问题。从这点来说，我不打算对会谈发表意见，它们仅仅开始。然而，我将要说，你们所发表的或正准备发表的关于会谈的声明，将引人注目。

我希望您明白并赞赏我们对会谈所持的严肃态度，我们坚定的愿望是，会谈产生出积极的结果。我们将会一贯坚持关于这些会议的宗旨和目标的协议。事实上，1月间我们已经就此问题达成一致意见，这是一个巨大成就，应给予精心对待。

我希望，总统先生，您能从这封信中感觉出苏联领导人，包括我本人在内，准备积极地找到改善我们相互关系的共同途径。

我认为此信已清楚表明，我们对最高级接触予以极大的关注。

因为如此，我对您所表示在我们之间举行个人会晤的想法持积极态度。而且，这类会晤也不必签署重要文件，不过是就相互利益达成协议。假如那时能达成协议，可在会谈中使之正式化。重要的是，它将在平等及考虑彼此的合法利益的基础上谋求相互理解的会谈。

至于会谈的地点，我感谢您邀我访问华盛顿。但是，我们最好下次再谈及会谈地点和时间的问题。

M·戈尔巴乔夫

1985年3月24日

里根收到信后，感觉到戈尔巴乔夫将会像任何一位苏联领导人一样强硬。于是，他指示协调改善与苏关系的国家安全计划组的人员，在与苏联人接触时将像以往一样强硬。他还要走着看，因为他已向戈尔巴乔夫发出首脑会晤的邀请，“球”现在戈氏的“半场”，如何表现只能看下一步发展。

3月末的一天，天刚亮，里根就被唤醒，被告知一件事：阿瑟·尼科尔森少校，这名37岁的驻东德美军军官在东德勘察边境设施时，被苏联哨兵开枪打死。在少校已被击倒后，那个哨兵还继续射击，使美军人员无法接近少



校做紧急救护。1 小时后苏联军医到达时，少校已死。几天后，奥尼尔与众议院的共和党领导人鲍勃·米歇尔一道组织两党议会代表团对少校的被害表示抗议，并指责苏联继续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造反者。里根在信中说：

我相信目前在美苏关系上出现了新机会。我们必须利用这些机会。您知道我的看法是，在我们关系的各个领域，包括人道主义的、地区性的、双边的及军备控制等问题中都有这类机会。为巩固其稳定性，没有什么问题比我们在日内瓦召开的军备谈判更重要了。我方谈判人员遵照灵活机动交涉的指示，与你方人员共同起草协议，旨在大幅度削减核武器，并朝着我们共同的目标——消除核武器前进……

在寻求新的机会的同时，我们必须谨慎地避免可能严重破坏我们两国关系的事件发生。尼科尔森的悲剧，在我国许多人看来，只是苏联的军事行动威胁我们良好的努力，扰乱在我们之间形成的一种长期可靠的更具建设性的双边关系的最新一例。

我想让您知道，我们共同采取步骤以防止这种悲剧的再度发生，这对我本人也至关重要。我希望您将利用您的权力阻止这种事件再次发生。

正如您所知，我期望着在双方便利的时候与您个人会面。我也坚信，正像您在信中提到的，我们可以提供一种重要的政治性动力以促使我们两国关系朝着更具建设性和稳定性的方向发展。

让我重申我们通信的重要意义并以之为结束语。我将在下封信里更详尽地回复您的来信。我们在力图建立我俩及我们两国更牢固的关系时，我希望在将来的通信中，我们能继续地坦诚相待。

罗纳德·里根  
1985 年 4 月 4 日

随后，苏联发表声明，说他们已命令其在东德的哨兵不得对美国人使用致命武力。但几乎在同一时间，戈尔巴乔夫会见丹尼尔·奥尔特加时允诺苏联继续对桑地诺分子提供财政支持；美国则宣布对尼加拉瓜实行贸易禁令。5 月，美国商业部长麦克·鲍德里奇前往莫斯科，商讨扩大两国贸易的可能性。里根捎信再次提醒戈尔巴乔夫，说美方仍然对改善关系充满希望，期望莫斯科方面在真正缓和关系之前能采取积极行动，从允许苏联的犹太人和受迫害的基督教徒移民，到停止苏联在中美洲地区的干涉。在鲍德里奇带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里根写道：“虽然我相信目前我们可以作出些事情来促进贸易，可是如果我们的相互关系在其他方面没有相应的改善，我们相互间的贸易关系能否有根本性的转变就令我怀疑。”

虽然戈尔巴乔夫拒绝来华盛顿出席首脑会谈，但他同意于 1985 年 11 月在日内瓦与里根会面。

1985 年 9 月 27 日，苏联新任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华盛顿会见里根，转交了戈尔巴乔夫给里根的信：

亲爱的总统先生：

我愿意在你我之间相互交流各自的一些想法和所关心的事情，特别是交流对即将来临的我们的个人会晤的看法，并继续这种通信。我认为你我双方都非常重视这次会晤，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将要讨论的议题已清楚地摆明。它们都很重要。

当然，我们两国间的差异不小，对许多基本问题的态度也不同。所有这些都是事实，但同时，现实又是，不管我们是否相互喜欢，我们两国都要共处。假如事情演变到军事对

抗，这将是两国乃至全世界的灾难。从您讲话中看出，总统先生，您也把美国与苏联之间军事冲突视为不允许之事。

所以，也就是说，阻止核战争和消除核战争的威胁，是我们共同的，也因此是根本的利益所在，是迫切之事。我相信，以此为主要手段，它将有助于我们两国关系的实质发生重大改变，使其具有建设性和稳定性，这也有助于从总体上改善国际政治气候。我们应该在 11 月会议之前及会议上和会后的阶段进行这方面的工作，这是我们双方关系中的核心部分。

我们相信，关于此事有相当多的机会。我与您的会晤可能是促其实现的良好因素。看来，我们可以真正地在禁止核战争的问题上达成明确的谅解。实际上，没人能在这种战争中成为赢家。我们能够坚定地声明：反对谋求军事上的优势；反对试图侵害另一方合法的安全利益。同时，我们相信、如果各方清楚地表明各自在削减军备行动中的打算，及对终止军备竞赛并防止它在空间进行所要采取的实际行动等等，都将有助于相互谅解。这种谅解，将表示双方决定沿着消除战争威胁的方向前进。在这个中心议题上达成协议，将使双方更加容易相互谅解，对其他问题的解决也有帮助。什么是首先予以重视的措施呢？自然是与关于核武器和空间武器等复杂问题的解决有关联的措施。

达成空间非军事化协定，是通往彻底削减核武器的唯一道路。我们赞成坚定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决心寻求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认为，在此领域里，双方应全力以赴地行动，而不是拖延。如果到和您会面时就已经取得一些积极成果的话，那将是件可喜的事。

谈到你在 7 月 27 日信中的一些看法，我愿意指出，我们曾几次明确表明对美国发展空间攻击武器和大规模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观点。这不是基于情感或主观的观点，而是基于对事实和现实的估价。

美国执行这项计划就将无法解决核军备问题，它只能使此问题恶化，它对限制和削减核军备的进程将产生消极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我们两国各自或相互合作的努力，我们能够作出许多事来减慢军备竞赛，最终停止竞赛，这种竞赛主要是指关于核武器的。仅仅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没有别的意图。我们已单方面采取了一些实际步骤。

总统先生，你我双方相当清楚，从现存核武器及正在改进的新型核武器的威力这一角度出发，终止核爆炸是何等的重要。所以停止核试验是向光明方向所迈的一步。因此，我们作出决定，停止一切核爆炸，并呼吁美国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请您在不带成见的情况下，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很明显，从目前我们双方所拥有的核军备水平来看，共同停止核试验不会损害任何一方。

所以，假如是出于真诚愿望来终止核军备竞赛的话，那么对共同暂停核试验就不应有异议，而且它将带来巨大益处。美国仍有时间作出正确决定。想像一下它的意义有多大，而不仅仅是对苏美关系而言，但是，暂停核试验，当然还不是解决防止核战争问题的根本方法。

为了完成这个目标，关于如何解决这些相关联的复杂问题，将成为在日内瓦两个代表团间谈判的主题。显然，谈判结果对于我们能否成功地中止军备竞赛及全面消除核武器将起决定性作用。遗憾的是，日内瓦会谈的形势令人担忧。

我们将从各种角度，非常全面地再一次审视在日内瓦能做些什么。我想向您提出下面这个方案：双方同意完全禁止空间进攻型武器，并对各方的核武器实行真正的根本性的削减，比如说削减 50%。

换言之，对日内瓦会谈议题，我们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不仅核军备竞赛要停止，而且核对抗的水平也要极大地降低，同时，要防止在空间的军备竞赛。那么战略稳定性就将极大地加强，相互信任将有效地增长。我相信，苏联与美国所采取的这一

步骤，能鼓励别的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参加到核裁军队伍中来。你在一封信中也指出了这一重要性。我们从现实主义的观点意识到，问题的根本性解决需要时间和努力。然而，我们深信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首先是使我们的政治态度在本质上相一致。

其次，在这种政治态度一致的条件下，在促进这些目标实现的具体方法上达成共识很重要，内容包括终止发展空间进攻型武器，冻结目前已拥有的核武器数量，并禁止发展各式新型核武器。

还有，主要的现实方法将包括在双方同意的数目上，解除战略武器的战备状态并予以拆除……共同承担不在那些非核国家使用核武器这一义务，不再增大核武器的贮存量，也不用新式核武器更换部署在别国的那些旧式核武器。

自然，欧洲的中程导弹问题也需要解决。我想再次强调，苏联所赞同的根本解决方法，就是我们在日内瓦提出过的，苏联在欧洲地区所保留的弹头数量将不多于英国和法国拥有的弹头量我们同意关于裁军中军备限制的实际措施倡议，应当包括有相关的、共同同意的核查措施……

我没有试图把限制武器和缓和军事紧张的方法列出一个详尽无遗的条目。也许还有其他的方法。我们很感兴趣听取美国方面就此的提议。重要的是双方要准备应建立有益的基础并以建设性的方式来行动。如果可能的话，首脑会议也可以包含这个内容。

总统先生，我对我们两国面临的中心问题予以特别关注，此中原因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然了，我们并不轻视地区性问题及双边关系问题的重要性。我设想，谢瓦尔德纳泽与舒尔茨将会本着使我们立场更接近，更为良好，和找到现实的解决方法的态度，来全面地探讨这些问题。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外交部长与您及国务卿会晤的进程中，并通过在日内瓦、斯德哥尔摩和维也纳的会议所作的积极工作，还有通过外交途径的相互交往，使我们有可能在我与您会晤之前，创造出使会议有成效的局面。

我们相信，这些准备工作和你我会晤时讨论的结果能在适当的联合文件中反映出来。假如您同意，我认为这样做是值得的：要请我们的部长们来决定如何使最后文件的准备工作得到最佳组织。

戈尔巴乔夫

1985年9月12日

里根给戈尔巴乔夫的回信概括了美国在日内瓦会议前夕的主要立场。下面是信的摘要：

亲爱的总书记先生：

正如我10月24日在纽约对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所讲的，我非常认真地考虑了您9月12日的来信。您所提出的问题很重要，您提出的想法在许多方面很有意思，我打算在回信之前详尽地研究它们。

您在信中所提到的许多独特的观点已经或将要由我们双方在日内瓦军备控制谈判会上由代表团讨论，或是由双方的外交部长商讨。在此信中，我将集中谈谈我所认为的在您所提问题中的最重大议题。

您在信中建议我们应当为不允许发生核战争和其他引导我们的基本原则而达成谅解。谢瓦尔德纳泽外长从此已就我们的考虑提出了特定的语言，正如我曾多次声明，核战争无赢家，也不能发动核战争。这确实是我的观点。所以我委派舒尔茨在下星期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的会议上讨论此事项。

因为我们所讲的话及其他内容可能将出现在日内瓦发表的文件上，我认为我们对言辞

的极为慎重的斟酌是很重要的，而以往总是用极为模糊或浮夸的语言来论事，您信中提到的我们之间关系竞争方面，这一切都不能继续下去。

如果我们想要避免随后的误解和失望，我们自己的目的就应当是清晰的，并且是建立在具体基础上的目的。我相信，在我们一直讨论的，和与即将到来的会议有关的领域中，有牢固的共同点。我希望在日内瓦会议期间，这个共同点能够扩大。国务卿舒尔茨在莫斯科时将准备具体讨论您的想法。我相信您将发现我们确实准备合理地分担职责以确保我们所召开的是富有成效的会议。

我想谈谈，关于您对我们以前在日内瓦举行的武器控制谈判的提议的回复，您信中也预示过，而且您的代表团随之在日内瓦把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我们在过去的一个月里评价了你们的反提案。我于 10 月 24 日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已讲过，在即将到来的几星期里我们需要寻求建立一种真正的平等交换的进程。

为了促进这个进程，我以您的提案中的积极部分为基础，批准了一项新的全面的提议，并把双方的立场连接起来。我已要求我方的谈判人员扩大现有的范围，以便使你们的专家能完全理解我方的态度。这项新提议涉及到日内瓦谈判所有的三个领域。它的关键在于倡议彻底地、稳定地削减战略进攻武器以及关于中程导弹系统达成一项单独的协议。它们沟通了美国与苏联的思想。我们还提议，双方提出保证使他们的战略防御计划现在以至将来均限制在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内。这种保证可当成依照条约条件解决双方分歧的方法。

关于战略武器，美国同意制定削减 50% 的战略进攻性武器的目标。我们的提议基于：50% 这一数字是双方平等的数字，它能促进稳定。关于中程核武器，我们也寻求双方的共同点。我坚信最佳的结果是双方全面消除中程导弹。在我们的最新提议中，我们也是与你们的方向一致的。关于防御和空间问题，为了对防御更加信任，我们现在必须开始为一个合作转变而建立一个框架，我们愿意看到为完成这个转变的更加成熟的对话。我们已决定了自己的态度，对核武器和空间武器问题提出相互可接受的解决方法；考虑进攻与防御的相互关系；对您和你方谈判人员所认为重要之事予以关注。我相信这个新的提议，将为我们所面临的关于核武器和空间领域的大量复杂的问题，取得直接和真正可行的进展奠定基础，我期望能与您本月在日内瓦探讨这个问题。

在日内瓦我们还有机会对我们关系中的其他领域进行探讨。如果我们将能宣布在地区性和双边性的问题上取得特定的进展，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我希望国务卿舒尔茨的莫斯科之行，能推进未来的几个星期内的进展速度。

最后，允许我再次声明，我期待着我们的会晤，我衷心希望我们将能使我们两国在未来的年代里少一些对抗，多一些合作。我本人将不遗余力为此而努力。

罗纳德·里根

1985 年 10 月 31 日

11 月初，舒尔茨在莫斯科与戈尔巴乔夫面谈了 4 个小时，讨论日内瓦面临的议题。

## 二、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进行了结识性和试探性的会晤，双方试图建立新的关系

1985 年 11 月 15 日，里根在飞往日内瓦的前夜，向全国发表讲话，他说：

“我们正处在历史的特殊时刻，面临制定通往 21 世纪和平进程的独一无二的时机。我希望在日内瓦，戈尔巴乔夫与我能开创一个进程，在我们离去后，我们的接替者和我们两国的人民将它继续下去。美国在日内瓦的目标不

仅仅是避免战争，还要加强和平；不仅仅是防止对抗，还要着手除掉引起对抗的紧张根源；不是掩盖相互的分歧，而是承认分歧并且坦诚地讲出来；不仅仅是在两国领导人和外交官中鼓励交谈，而且鼓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对话。自从核时代出现后，每位美国总统都寻求限制和终止危险的核武器竞赛的方法。实现这个梦想是我的最大心愿。”

11月16日早晨，刚过8点，里根一行乘“空军一号”飞离安德鲁空军基地。在日内瓦，里根一行驱车前往临时住所索叙尔大厦，这是位于日内瓦湖畔的一座美丽的别墅，是由卡里姆·阿迎汗亲王夫妇租给里根在首脑会议期间使用的。临窗眺望，别墅前的草坪广阔，湖面景色壮观。

第二天，里根参观了费勒·多别墅，双方领导人的第一次会谈将在这座拥有20间房子的大别墅内举行。这是进行私人会谈的最佳地点。

11月19日早上，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了第一次会谈，按计划，这次会谈是历时15分钟的两人间一对一的相互认识的会面。但会谈延续了将近一个小时。在会谈中，两位领导人发表了各自的看法。随后，双方的军备控制专家们开始了发言。利用这个空隙，里根向戈尔巴乔夫提议：两人到湖边小屋去呼吸新鲜空气，再谈谈，里根刚说完，戈尔巴乔夫已一跃而起。

两人来到小屋，壁炉里的火苗噼啪作响，他们面对面坐在壁炉旁的软椅上。里根曾经考虑过向他建议以名相称，美国的代表团在经济首脑会议时用过这种方式，但美方专家说，戈尔巴乔夫不大可能在第一次见面时欣赏这种不拘礼节的姿态，所以里根称呼他“总书记先生”。

里根首先开口，他说：“我俩境遇奇特。你瞧，我俩都出生在各自国家的偏僻村镇，两人都出身贫寒。现在是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两位可以带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

同时，里根还说：“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唯一的两位可以给世界带来和平的人。我认为，为了走向真正的和平，我们要利用这个天赐良机，彼此建立起人际间的信任和信心。”

里根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听译员翻译时，点头表示同意。

在熊熊炉火边，里根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中确信，苏联领导人对于美国及其核武器库有着由来已久的恐惧。里根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对核武器有着垄断地位，但从没有为侵略或对别人施加影响的目的而使用过它们，因为美国不是扩张主义国家。我们没对任何民族或国家抱有不良企图；我们建立起核导弹力量只是为了对苏联的进攻产生威慑效果。”尔后，双方开始辩论战略防御计划。

里根说，这是在反弹道导弹条约所允许的范围内的，一项研究发展无核防御的项目，假如它能成为对付导弹的有效防御系统，它将改变世界。

里根说：“不知过多少年我们才能知道它是否有可行性，但是，如果它具有可行性，美国将会坐下来与别的国家商量如何使用它。向苏联人打开它的试验室，并把它的研究成果送给任何国家。那样，就可确保整个世界免受核屠杀。”

里根越说越兴奋：“我们面临的选择只有一个，要么达成削减军备的协议，要么继续军备竞赛，我只得对您讲，假如要搞军备竞赛，您必须知道您无法赢得这场比赛，因为我们不会允许你们保持优势。”

一个多小时之后，双方都认为该是回去的时候了，沿着小径走向主楼。

走到一半路时，在停车场中央，里根拉住戈尔巴乔夫，因为他预感现在

机不可失，他邀请戈尔巴乔夫前往华盛顿，参加下一届首脑会议。

戈尔巴乔夫不仅接受了邀请，还请里根去莫斯科出席第三届首脑会议。两人进入会场落座后，谁也没提此事。会议结束后，里根对美方人员讲，两人已经同意召开另外两届首脑会谈。

11月20日，在日内瓦，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代表团住处主持正式会见。当天晚些时候，在双方代表团全体人员出席的会议上，双方再次面对面地谈到战略防御计划的问题。戈尔巴乔夫没有多费言辞，当里根提出分享此计划的研究成果，并对苏联人开放实验室，使他们看到它不是为进攻而设计时，他暗想这完全是在撒谎。

戈尔巴乔夫坚持认为：没有任何国家会这样做。他还向里根表示，如果美国政府坚持战略防御计划，苏联也会迅速采取对策。

里根谈到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戈尔巴乔夫回复道：“我本人是从收音机广播里听到这件事的，在这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他还表明他对这场战争不负任何责任，也没多大的热情。

那天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和里根讨论如何书写会议结束时所发表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将表示双方都赞成谋求削减50%的核武器。

11月21日，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发表了联合声明。

里根通过这次接触，认为戈尔巴乔夫是近五年来最终遇到的“可以与之交谈的苏联领导人”。这次会晤，彼此对立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相互接受访问邀请和双方承诺永远不打核战争，同意把美苏进攻性核武器各削减50%的原则，并谋求达成一项中远程核武器的临时协议；签署了推动双边关系的一些具体协议，例如1985~1988年两国科学、教育和文化合作与交流计划，美苏分别在基辅和纽约设立总领馆的协议等等。

美国国务卿就这次会晤评论说：“就其讨论的时间之长、内容之深，以及其直率程度和广泛性而言，确实超出了我的任何预期。”

这次首脑会晤虽然在重大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几年来一直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的那种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有了一定的缓和。

### 三、戈尔巴乔夫千方百计想打掉美SDI计划，并出价很高，但里根就是不肯“卖”

在戈尔巴乔夫按照“新思维”调整苏联的外交政策时，首要目标是推进美苏军备控制谈判。在他看来，这种控制有助于减少苏联面临的外部威胁，节省苏联经济建设急需的资源，建立稳定的东西方战略关系。

1985年1月7~8日，舒尔茨和葛罗米柯在日内瓦经过15个小时的艰难谈判，最后商定：双方将组成各包括三个小组的代表团，分别就太空武器、战略核武器与中程核武器问题进行谈判，而且三个方面问题的谈判和解决是相互关联的。

3月12日，美苏军备控制谈判在日内瓦正式恢复。由于美苏双方各自的态势，双方对谈判的态度和立场迥异。美国坚持从实力地位出发，向苏联施加压力，以求达成有利于己的协议，既要坚持搞SDI，继续在欧洲部署新式中导，加速生产MX洲际导弹，又要力求苏联削减其对美威胁最大的陆基重型多弹头洲际导弹。苏联努力的重点是在空间领域，力图阻止或至少推迟美国的SDI计划。

由于双方立场相差较远，谈判徘徊不前。同时，苏联发动凌厉的外交攻

势，把攻击目标牢牢对准 SDI，宣传说谈判之所以陷于僵局，完全在于美方的僵硬立场，并提出了单方面的建议和主动行动，如先宣布在半年内暂停在欧洲部署中导和暂停实施其他反措施，呼吁美国也采取类似行动，继而提出只要美国停止实施 SDI，苏将同意将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削减 25% 或更多。

7 月 29 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自 8 月 6 日（原子弹轰炸广岛 40 周年纪念日）起至 1986 年 1 月 1 日止苏将单方面停止任何核试验。如果美国也仿效，苏联的停试还将继续下去。

9 月 1 日，戈尔巴乔夫在接见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谈话时由笼统反对 SDI 退为要求 SDI 的研究必须限制在基础研究内，即实验室研究的范围内。

美国则针锋相对，在继续战略核武器现代化的同时，加速推进 SDI 的研究和试验，并于 1985 年 3 月正式向北约成员国及日本、澳大利亚和以色列发出邀请，共同参加 SDI 的研究。针对苏联的宣传攻势，美国则强调 SDI 的防御意义，揭露苏联早就在进行类似的试验，特别是在高能激光武器和粒子束武器方面。

1985 年 9 月底，苏联在第三轮谈判中提出裁减战略核武器的具体方案，而且裁减的幅度约达 50%。美国对此立即表示欢迎，予以肯定。

11 月美苏日内瓦首脑会晤时，双方同意把美苏进攻性战略核武器各削减 50% 的原则。

1986 年，戈尔巴乔夫连连发出和平攻势，提出了在 15 年内（即在 2000 年之前）分三个阶段裁减和彻底消除核武器的全面纲领。5 月和 8 月，苏联第二次和第三次宣布单方面延长暂停核试验期限，直至 1987 年 1 月 1 日。此外，苏联还建议里根专门就核禁试问题在近期举行会谈，呼吁同时解散华约和北约；明确提出把苏美在欧洲的中导削减为零和同意进行国际核查，包括就地核查的建议，以及从完全反对 SDI 的研究和试验改为同意美国可在实验室范围内进行研究和试验。

然而，里根坚持高要价立场，不把 SDI 作为谈判筹码，而且核试验要继续进行。就在苏联暂停核试验的 1985 年 8 月 6 日至 1986 年底，美国进行了 19 次地下核试验。与此同时，里根抓住双方基本同意的战略核武器削减 50% 和欧洲中程核武器可削减到零的原则不放，企图迫使苏联在如何实现这些原则的具体裁减方案上讨价还价，打掉与 SDI 挂钩的原则。这样，由于双方立场的差异，1986 年美苏在日内瓦进行的又一个三轮裁减战略核武器谈判始终未能达成协议。

1986 年 10 月 11 ~ 12 日，美苏首脑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会晤。会谈主要在里根、戈尔巴乔夫、谢瓦尔德纳泽和舒尔茨四人间进行，外加双方翻译。

戈尔巴乔夫试图把会谈的内容限制在军备控制上，但里根从一开始就再次提出苏联拒绝让它的公民移民一事，也不让那些分离的家庭重新团聚的问题。里根还提到苏联继续颠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径，如阿富汗问题，但戈尔巴乔夫只是听着，没有做任何解答。

里根从口袋中拿出一个记有 1200 名希望离开苏联的犹太人名单，交给戈尔巴乔夫，说：“你们的人权政策妨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还有，你们为什么违背约定没有购买美国的 600 吨谷物？”

“这主要是因为油价下跌，我们用于购买小麦的美元减少，因而无力负担这笔开支。”

在会谈的第一天，戈尔巴乔夫原则上接受消除欧洲中导的零点方案和里

根关于 10 年内消除所有弹道导弹的建议。

在讨论中，里根建议：“削减核武器的第一阶段计划应该是各自销毁 50% 的导弹，同时允许继续进行导弹防御系统的研究。如果‘战略防御计划’达到了可以实验的水平，那么，到时，我们将允许苏联观察员到现场观察。如果这些实验表明这个系统是有效的，而且只要我们都已销毁了各自的 50% 的导弹，我们就开始销毁剩余的所有导弹，我们两国可以共同分享所有‘战略防御计划’的技术。”

戈尔巴乔夫说：“你所说的只是一厢情愿，你们的战略防御计划是对我国安全的严重挑战，因此我们强烈反对这个计划。”

里根说：“我们将遵守《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并同意在 10 年内决不单方面部署这一系统。”

第二天是个星期天，原计划只给会谈安排半天的时间，中午之前结束。双方一致同意由美方专家草拟的有关在星期六达成协议的报告。接着便开始第二轮会谈。

里根说：“除核导弹外，我们还将努力削减以致最终销毁其他种类，包括轰炸机在内的核武器。”

戈尔巴乔夫保证要加强对相互问都能接受的核查程序。

里根又谈到：“我们不能消除在欧洲的短程战术导弹，因为它们是构成北约抵御比它强得多的华约常规武器侵袭的主要威慑力量。”

戈尔巴乔夫则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大幅度削减常规武器。”

听到这个话，里根和舒尔茨都大吃一惊，因为这是美方坚持的达成核裁军协议的先决条件，没想到在这次会晤中苏联会主动提出。

到中午时分，原定的截止时间已经到了，然而两方似乎都忽视了时间，继续在交谈着。直到夜幕降临，一切都已成定局时，戈尔巴乔夫作出了又一个惊人之举。他面带微笑他说：“所有这一切当然都取决于你是否愿意放弃‘战略防御计划’。”

里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勃然大怒：“我已经反复重申‘战略防御计划’不是讨价还价的筹码。我已告诉过您，如果我们发现‘战略防御计划’是实际的和可行的，我们将及时把这一信息通告您和其他任何人，以便核武器能够得到销毁。现在，即便我们在此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您的这种做法，你所置的障碍，一切都毁了。”

要想让我们放弃研制开发抵御核导弹的防御系统是不可能的。如果你希望销毁核武器，那为什么急于废除抵御核武器的防御系统呢？像‘战略防御计划’这样的无核防御系统，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

.....”

翻译一段一段地翻译里根带有明显情绪的话，然而戈尔巴乔夫似乎没有留神听，只是坐在那里微笑。

当里根说完后，戈尔巴乔夫说：“尽管你说了这么多，但我仍然不相信你们会允许其他国家使用‘战略防御计划’系统。”

里根再也控制不住了，他认为苏联人让他到冰岛来的唯一目的就是扼杀“战略防御计划”，因而愤愤他说：“会谈到此结束。舒尔茨，我们走。”

当里根走近汽车，准备离开雷克雅未克时，戈尔巴乔夫说：

“我不知道我本来还能做些什么？”

“我知道，您本来可以说‘是’。”里根说。



当天晚上，里根在日记中写道：

他希望找到能够扼杀“战略防御计划”的语言。尽管他出价很高，但我还是不肯卖。这一大就是这么结束的。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我做得完全正确。我曾保证，我决不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事实上我也没有这样做。但是，这意味着我们未能就削减战略武器达成任何协议。他努力使自己显得愉快，我却是气得要发疯，并表露在外。好啦，现在该轮到作出回答了。我相信，当他明白世界是怎样作出反应的时候，他将改变主意。

#### 四、美苏首脑华盛顿会晤，签订了销毁全部中程导弹条约，这是美苏核裁军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1987年2月28日，戈尔巴乔夫出人意料地在一项声明中提出了一项裁减欧洲中程导弹的新建议：苏联不再坚持将欧洲中导与战略核武器、太空武器挂钩的原则立场，把中导问题从“一揽子解决”中分离出来，以雷克雅未克会晤的谅解为基础，单独就消除中导同美国达成协议。苏联还允许苏在亚洲、美在本土各保留100颗弹头的中导。这一让步使冰岛会晤以来陷入僵局的军控谈判出现转机。

苏联之所以作出如此重大的让步，既是对形势的重新认识，也有其战略考虑。1987年初，摆在戈尔巴乔夫面前的形势是：本国经济状况没有实质改善，改革阻力很大，在外交上戈氏的和平攻势和灵活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苏联的形象和处境，但未能取得重要突破。而且，美国总统里根的两届任期到1988年即将届满，如果不能在1987年达成核裁军的某种协议，那么由于美国新旧政府交接，可能裁军问题又要拖两三年时间，这对于迫切需要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戈尔巴乔夫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苏联作出的重大让步，使中导谈判进程大大加快。

由于苏联的这一方案是里根五年前“零点方案”的翻版，所以美方很快接受，并于3月初在日内瓦美苏第7轮核谈判中提出了美方关于消除中导的条约草案。

4月13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苏，重点讨论中导问题，戈尔巴乔夫提出欧洲“双零点方案”，即美苏双方在5年内除了拆除各自在欧洲的中导外，还全部消除各自在欧洲的中程导弹，并表示愿意将此写入中导协议。经过美国对西欧国家做的大量工作和6月份西方七国首脑威尼斯会议之后，里根在6月15日向全国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明确肯定了欧洲“双零点方案”，同时提出在全球范围内消除美苏所有的中、近程导弹（包括苏拟在亚洲部分、美在本土部署的各100颗中导弹头），并建议将此内容写进中导条约文本。这实质上是全球“双零点方案”。由于苏执意在亚洲部分保留100颗中导弹头，企图以此压美消除其部署在亚洲地区的核武器，而美态度强硬，以上述武器系统不属于谈判范围拒不让步，致使美苏中导谈判再次出现僵持局面。

7月21日，一度停滞的谈判又出现转机。戈尔巴乔夫在回答印尼《独立报》总编提问时作了让步，同意全球“双零点方案”。他宣布：“苏联决定准备消除部署在亚洲地区的全部中导，条件是美国也这样做，同时对中程导弹也要消除。”

7月28日，美国正式答复苏联，同意全球“双零点方案”。8月25日，美国提出新的核查建议，适当放宽了核查措施，基本上符合苏联立场。8月26日，西德宣布同意消除72枚美制潘兴IA导弹，满足了苏联的要求。经过

美苏外长 9 月中旬华盛顿会晤后，美苏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苏就全球范围内消除中导问题达成原则协议；里根、戈尔巴乔夫将在秋天举行第三次会晤；两国外长将于 10 月下旬会晤，以确定中导条约草案最后文本，并安排首脑会晤日期及有关事项。

1987 年 12 月 7 日下午，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乘坐的蓝白相间的伊柳辛—62 飞机在安德鲁空军基地徐徐降落时，戈尔巴乔夫心里明白，国内成千上万的同胞正注视着他，看看他们的领袖在美国人的聚光下将如何表演。这是继 1973 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之后第一位访问华盛顿的苏联领导人。美国人最感兴趣的是将有机会亲眼目睹这位在苏联掀起了旋风的人物。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这次会晤，除了签署最近达成的中程核武器条约以外，正式议题限于削减战略武器、地区性问题和人权问题。除此之外，戈尔巴乔夫还想通过闪电般的亲切友好的会见、电视露面，甚至热情握手等方法向美国人民兜售他的政策。

“访问开始了。”戈尔巴乔夫和赖莎走下飞机，向前来迎接他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说，“让我们充满希望，上帝会帮助我们。”

就在这天早些时候，戈尔巴乔夫曾在英国停留两个小时，在牛津附近的诺顿皇家空军基地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会谈后，撒切尔夫人热情地赞扬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改革。她告诉一位苏联电视台记者说：“英国举国上下沉浸在欢乐中，对他的到来感到欣喜万分，对两国之间的友谊感到欣慰。”

14 辆小汽车组成的车队载着总书记和随行人员驶往华盛顿闹市区。也许是为了让这位苏联领导人和他的夫人适应时差，第一天晚上没有进行最高级会谈。但是戈尔巴乔夫夫妇在苏联大使馆与苏联官员共同进餐、交谈。

12 月 8 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和赖莎乘坐一辆巨大的苏联轿车来到白宫。在南草坪上举行了礼节性的欢迎仪式。第一轮会谈之前，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里根拒绝回答记者提出的任何问题。但戈尔巴乔夫似乎急于向美国新闻界表态。当记者问到他是否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军备控制建议时，穿着流行式灰线条服装的戈尔巴乔夫说：

“我认为政策不是由‘出乎意料’组成的。特别是涉及苏美两国的重大政策的制定，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在此基础上作出双方共同承担义务的决定。”他还圆满地回答了其他几个记者的问题，但都没有实质性内容。最后，他对告别的记者们说：“我想，你们已经从我这儿得到了许多情况。”

在接下来的 30 分钟面对面会谈中，里根一开始便提出了人权问题。他说：“我很高兴地看到一些苏联的犹太人获准离开苏联，然而其他更多人想移民他国也应获得准许。你们不允许你们的人民自由移居国外，你认为作为移民国家的美国会如何看待这一事实吗？”里根总统是指上周华盛顿 20 万名示威者强烈抗议苏联歧视犹太人一事，他想告诉戈尔巴乔夫，如果不能理解美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两国关系的改善便无从谈起。

戈尔巴乔夫生气他说：“我今天不是站在被告席上，你也不是原告，你根本无权在这里谈论苏联的内政。你们总是唆使受过高等教育、极有才华的苏联公民离境出国，造成苏联人才严重外流，我们是不会答应的。”

尽管在人权问题上双方未取得进展，但美国官员认为，苏联人愿意讨论这个分歧本身就意味着进步。

两国首脑面对面会谈后，会谈范围扩大到美苏高级官员。双方同意组成两个工作小组，一是军备控制小组，由美国总统顾问鲍尔·尼采和苏联总参

谋长谢尔盖·阿赫拉梅耶夫为联合主席；

二是解决所有其他问题的综合组织，由美助理国务卿罗珊·里奇韦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别斯梅尔特内赫共同负责。

下午 1 时 45 分，两位领导人重又出现在白宫东厅，这是首脑会谈的高潮：正式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全部消除欧洲和世界各地的中程核武器。这项经过 6 年谈判后签订的条约要求苏联销毁 1752 枚导弹，美销毁 859 枚，并确立严格的现场检查程序。在签字仪式上，两位领导人热情洋溢，兴高采烈。签约之前，里根说：

“中导条约不仅消除了整整一个级别的核武器，而且还化干戈为玉帛。我们很欣赏一句古老的俄罗斯格言：‘把相信转变为信任还需要行动。’”

戈尔巴乔夫善意地打断了他，说：“您已多次重复这句话了。”

当 200 多名客人的笑声消失后，里根会心地笑笑，对戈尔巴乔夫微微一鞠躬，说：“我喜欢这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

“我们只能希望这个开创历史的协议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有效的相互关系的开端，它使我们能够继续探讨解决我们面临的其他紧迫问题，如战略进攻性核武器，欧洲常规武器的平衡问题，世界各地的具有破坏性、悲剧性的地区冲突，以及尊重人类和上帝给予一切人们的天赋权利。”里根接着说。

戈尔巴乔夫说：

“对世界每一个人尤其是我们两个大国来说，放在桌子上的这份条约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避免一场大灾难的威胁。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共同创造一个无核世界，给我们子孙后代开创一个美好的、无忧无虑的不再由于一些破坏性武器而浪费资源的世界……祝愿 1987 年 12 月 8 日这一天将被载入史册，把人类从核战危险与日俱增的时代带入和平共处的时代。不过，由于今后的谈判道路荆棘丛生，互赠桂冠还为时尚早。”

两位领导人在厚厚的两套文件上先后 8 次签上自己的名字。美国保留的副本用暗蓝色带束扎，苏联的则用暗红色。签完字后，两位领导人交换了笔，站起来握手。这时全场热烈鼓掌。坐在前排的南希对赖莎说：“我们也应该握手。”赖莎微笑着与她握了手。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一共签署了四份文件：一是共有 17 条的条约正式文本；二是关于相互提供有关各自中导情况详尽资料的谅解备忘录；三是关于消除中导程序的议定书；四是如何进行核查的议定书。根据这些文件的规定，双方要在条约生效后三年之内销毁全部中程导弹，一年半内完全销毁中近程导弹；条约生效后立即禁止所有射程为 500~5500 公里中短导和中导的生产 and 试验；销毁实现之后则将禁止一切有关这种导弹的部署、储存、修理和生产的设施；双方可相互进行十分严格的核查，包括在对方国土上，特别是生产或装配导弹的工厂，派驻常驻核查小组，进行为期 13 年之久的核查；对原部署、储存、生产的场所以及销毁情况均可进行就地核查或突击核查。为了让苏方能对美在北约 5 国部署的中导和美方能对苏在民主德国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的中导进行核查，美国与英、意、比、荷、西德分别签订了专门协定，苏联则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类似的协定。

根据双方提供的资料和条约规定，美方应销毁中导 689 枚，中短导 178 枚，合计 867 枚；中导弹头 689 枚，中短导弹头 178 枚，合计 867 枚。苏联应销毁中导 910 枚，中短导 926 枚，合计 1836 枚；中导弹头 2210 枚，中短

导弹头 926 枚，合计 3136 枚。

从这个数字看，无论是导弹还是弹头，苏联要销毁的比美国多得多。条约之所以能签署，是双方让步的结果，但苏比美让步多。苏联的让步主要有：同意将中程导弹从一揽子解决中分离出来单独解决；同意英、法导弹不计算在欧洲核平衡的范围内；同意按全球性“零点方案”解决中导问题；在美国和西欧要求在消除中导时必须消除苏占优势的中近程导弹的情况下，同意“双零点方案”；由原来反对现场核查，只同意用本国手段（卫星）核查，转而同意进行严格的监督，包括现场核查。

而美国的让步主要有：由原来声称西德的潘兴 IA 导弹及弹头属于第三国不在消除之列，转而同意消除西德潘兴 IA 导弹及弹头；放弃了准备把潘兴式导弹的一节改用作生产潘兴 1B 导弹的立场，放弃了只销毁巡航导弹的构架和弹翼，而保留其弹头、导航系统和发动机的立场；放弃了要苏联先削减、销毁到与美国同等数量导弹的立场，同意双方第一阶段同时削减销毁到同等数量。

中导条约的签订，是由于形势发展和美苏互有需要所致，销毁仅占双方核武器的 4%，并不影响双方的基本军事实力，不损害双方安全，也不影响其超级核大国的地位。但是这是自出现核武器以来美苏达成的第一个真正裁减核军备而且是一整类级别核武器的条约，突破了过去双方一直坚持的均衡裁减的原则，为尽可能实行低水平的均等而开创了谁多谁就多裁的先例，其影响是深远的。

12 月 9 日上午，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大使馆会见 9 名美国国会领袖，其中 4 名参议员将最终决定中程核武器条约的命运。总书记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裁军是当前世界最重要的问题。尽管我们已经在条约上签了字，但是要提防国会可能作出危及中导条约的‘最后决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也可能不会顺利通过该条约，我们也有保守分子，他们因循守旧，墨守成规。他们需要改变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不可能占上风。尽管我们不可能很快改变这一切，但改革势在必行。”

参议员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认为，戈尔巴乔夫从阿富汗撤军的时间表将是对条约大力支持的佐证。戈氏回答说：“我们不打算呆在阿富汗，只希望在我们撤离后这个国家保持不结盟。”

加利福尼亚民主党参议员惠普·艾伦·克兰斯顿说：“我坚决支持中导条约。请问总书记先生，怎样才能加快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速度？”

“您应该知道该做什么！苏联正在发出‘振动’，我们需要你们的‘共振’。”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罗伯特·多尔当时是对中导条约抱骑墙态度的关键人物，他对戈尔巴乔夫说：“有些共和党人想先用点时间研究一下这个条约，然后再决定是否支持它。”

戈尔巴乔夫当时认为，他很可能入选白宫接替里根，而且在以后参议院辩论中起关键作用，对能否通过中导条约至关重要，所以当会见结束后他把多尔请到旁边单独谈了 10 分钟。临别时，戈尔巴乔夫微笑着祝愿多尔在总统竞选中交好运。多尔显得很自信；“谢谢，我正在取得胜利。”或许是与戈尔巴乔夫的接触与交谈，以及中导条约的最终文本使多尔想通了，几天之后，他与里根一起出现在白宫新闻室，宣布正式支持这个条约。批准条约的主要障碍扫除了。

上午 10 时 30 分，里根总统邀请戈尔巴乔夫到他的书房进行只有双方译员参加的非正式交谈。双方提出了“星球大战计划”这个难题。里根说：“我们将继续进行研究，这对搞清这个计划是否可行是必需的。如果可行，我们将部署这种武器。”

戈尔巴乔夫全神贯注地听里根讲完后，说：“总统先生，做您想做的事情。如果您最终认为成功了，那就部署这种系统吧！要问我的看法，我认为您在浪费钱财。我认为它不可能成功。但如果那是您想要做的事，尽管去做好了。”

听到这里，里根有些不解，戈尔巴乔夫补充道：“我们已朝另一个方向发展。我们有权维护我国的利益，我们认为这些措施既省钱又有效。”其实，戈尔巴乔夫这话的意思，一是告诉美国，苏联不可能对你们研制“星球大战”系统无动于衷，并正在研制自己的防御系统，并保留采取任何对策的权利；二是暗示美国，“星球大战”问题不必在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中解决。尽管戈尔巴乔夫仍反对这一计划，但他不想让它破坏华盛顿首脑会谈，像在雷克雅未克那样。

在告别仪式上，里根称这次首脑会谈“获得了明显的成功”，两国领导人“怀着完成使命的心情离开了谈判桌”，戈尔巴乔夫致答词说：“总的来说，这次访问与我们的期望相符。今天，美苏两国更加接近加强国际安全这一共同目标，但还没有达到这个目标。任重而道远，必须只争朝夕！”

华盛顿高级会谈是戈尔巴乔夫一生中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他带着外交上的成功凯旋而归，他的权力也得到了巩固，并提高了他在国外的威望。当他的车队进入东柏林时，成千上万的民德人向他欢呼，欢迎他的到来，热烈拥护中导条约的签署。

## 五、访苏期间，里根做梦也不会想到，戈尔巴乔夫会让他给莫斯科最优秀的青年们大讲“人权”、“自由”和“民主”

1988 年 1 月 25 日，里根在第八次国情咨文中表示，希望在任期内完成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工作，以使美苏双方都能减少各自瞄准对方的弹头。他指出：

“我们最近签署的中程核力量条约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将削减核武器，并且建立了军备控制史上最严格的核查制度，其中包括好几种形式的一通知就进行的现场核查。我今天提交了这项条约，同时我要求参议院提出意见并且批准这项将成为里程碑的协议。

除了中程核力量外，我们还即将达成一项甚至更重要的削减战略武器协议，这项协议将使美苏远程导弹或战略武器削减一半。但是，我要说明：我们的做法并不是为了达成协议而设法达成协议，而是要达成真正能加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我们盟国的国家安全的协议。我们决不会为了同苏联人达成协议而使我们的安全或盟国的安全遭受风险。与其签订一项糟糕的协议还不如不签订协议。”

4 月份达成了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协议，苏军自 5 月 15 日起开始撤出阿富汗，并预定 3 个月内撤出 50%，9 个月内全部撤完。

美苏预定 5 月底举行的首脑会晤前夕，美国政府为争取国会批准中导条约进行了艰苦的努力，国会进行了 4 个月的审议，70 次听证会，舒尔茨本人就作证三次，政府一共回答了 1300 个问题，参议院终于在 5 月 27 日以 93:5

的压倒多数批准条约。而此时里根一行已启程，批准的文本用飞机运往莫斯科。当里根总统在芬兰临时降落时，得知参议院通过中导条约的消息，总算松了一口气。因为此前数个星期里根和戈尔巴乔夫都在为在莫斯科能否完成条约批准书而坐卧不安。

5月29日，里根和南希抵达莫斯科，这是里根第一次访问苏联，第四次与戈尔巴乔夫会谈。

在第一轮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向里根表达了发展苏美贸易的愿望。里根早有准备，他说：“发展苏美贸易的障碍之一是美国国会里有许多人和其他许多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不应该与苏联做生意，因为在苏联没有人权可言。最近，移居美国的外国人给我写信，信中有一段话：美国人来自世界各地，一旦他踏上美国的土地，他就会以一种世上独特的方式被融合在美国。住在法国、德国、日本的人不一定就能成为法国人、德国人或日本人；但不管他来自世界哪个地方，一旦他来到美国，他就会成为美国人。不知您对此有何感想？”

戈尔巴乔夫只是倾听着，没有进行激烈反驳。接着，里根又谈到了苏联的宗教信仰问题和移民问题，他说：“我敢肯定贵国许多嚷着要离开苏联的公民，如果您给他们以宗教信仰自由，他们也并非一定要离开苏联。他们口头上说想离开苏联，但他们是苏联人，我相信他们会像其他人一样爱国。如果政府允许他们重开教堂，自由地礼拜，他们也许就留下来。贵国也可保留一批人才。”

不过，里根也对苏联正在发展的变化感到振奋，并希望这些变革能够在苏联制度下作为法律固定化。

里根与戈尔巴乔夫一共进行了三次正式会谈，主要成果有：举行中导条约批准书的交换仪式；发表联合声明，详细叙述在军控、人权、地区形势和双边关系四项议程上所取得的进展；签订了两国对地下核试验进行联合核查的协议，它使美苏于1974年签订的限制地下核试验条约和1976年的和平利用地下核爆炸条约能够迅速得到正式批准；关于相互通报洲际导弹和潜射导弹发射情况的协定；交换关于延长美苏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进行科学和技术合作协议的照会等。

美苏两国首脑原来希望在莫斯科会晤时能就削减50%战略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但因其数量大，种类多，牵涉广，要在短期内达成一项为双方都能接受并可公正核查的协议，确非易事。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打算，不过，双方的立场已比较接近，同意将各自的战略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和核弹头分别减至1600件和6000件；陆基和海基导弹的核弹头限制在4900枚，其中重型陆基导弹的运载工具154件，核弹头1540枚；还同意制定严格的核查措施。但是在一些问题上双方还有较大分歧，如苏联坚持在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基础上签订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而美国主张将两者分开单独签约；在如何计算海基巡航导弹和空基巡航导弹问题上，双方都想保存自己占优势的部分；有关核查问题还有许多细节问题意见不一。

在这次首脑会晤中，人权问题被提到议事日程。里根大讲人权，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举起联合国的人权宣言、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关于人权的规定以及美国的宪法和民主体制等几面旗帜，向苏联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大讲宗教自由，向苏联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公然打气说：作为普通人中的一员，我来到你们中间是希望我所作的一切能给你们以力量……

当我们通过外交途径来推进人权时，你们却成年累月地冒着失业、失去家庭、失去一切的风险，用你们的生命来推进人权。戈尔巴乔夫一方面认为美国 and 苏联各有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应强加于人，另一方面也同意就此问题同美国进行讨论，从而改变了以往那种认为人权就是各国内政拒绝进行讨论的立场。双方甚至讨论了就人权问题成立一个议事机构的可能性。苏美首脑莫斯科会晤发表的联合声明指出：“总书记和总统详细地讨论了人权和人道问题。两国领导人讨论了这方面不断扩大的和越来越具体的苏美对话，一致认为，对话应当在各个级别进行，以继续取得具体的进展。双方指出，这种对话的目标应该是最充分地保障人类个人的权利、自由和尊严，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接触，积极地交流精神、文化、历史和其他方面的成就，在两国之间多一些相互谅解和尊重。”

5月30日晚上，戈尔巴乔夫夫妇邀请里根夫妇、舒尔茨夫妇到他那坐落在莫斯科郊外乡村树林中的家里共进晚餐，给里根一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舒尔茨为此写了一份备忘录，纪录了当时的情况：

#### 总 统 备 忘 录

执笔人：舒尔茨

趁脑子还没忘，我想把今晚戈尔巴乔夫一家，谢尔瓦德纳泽一家请您和总统夫人、我和奥碧共进晚餐的情况向您汇报一下。他们在这座由沙皇时代的宫殿改成的乡间宅邸里举办的这次晚宴可算是我们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值得告诉我们的后人。

我对这次晚宴的第一印象是谈话很活跃，又显得很轻松。戈氏看起来要和您比试一下，看谁讲的笑话多，甚至连赖莎都不停地给我们的话题加着“作料”。他们几乎未提及上午那艰难的谈判或是一些老的争论。戈尔巴乔夫夫妇和谢尔瓦德纳泽夫妇确实在努力使之成为一个愉快的晚上。他们似乎很愿意延长一些时间。

我对戈氏就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表现出的沉痛心情深为感动。他表示这是一场大悲剧，耗去数十亿卢布，需要大量人们的不倦努力才能勉强弥补。他似乎确实是在担心，一旦核电站成为常规战争的目标（不用说核武器了），那将会酿成多大的灾难啊。就像罗伯特·盖尔博士在他的书中描写的那样，戈氏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事故当作一个“最后的警告”。很明显，从那晚，切尔诺贝利事故在戈氏的脑海里产生了强烈的反核意识。

戈氏对你们的共同努力表现出非常的自豪，称中导条约将造福整个世界。戈氏夫妇在评论苏美关系及全世界各新闻机构对莫斯科首脑会议的报导时，对一些西方新闻媒介编造他们夫妇个人的一些故事表现有些愠气。戈氏看来更愿意与我们谈论一些地区性的问题。他讲的那个笑话说因为巴西的一支球队穿上了类似佐治亚人穿的衣服，所以他们的美国对手们就大发脾气，这对他自己本国的民族问题倒是个讽刺。

最后，戈氏夫妇在那晚上披露了一些他们的个人情况。他们都是芭蕾舞剧的爱好者。他们回忆起学生时代他们站在最上层楼座看舞蹈表演时的情景都觉得好笑。戈氏还透露他与宗教有联系的仅有的两件事是：他小的时候受洗（他都记不清了）和最近与苏联宗教领袖的一次会晤。他说他从未利用过他的法学学位，赖莎却为他的成功生活作了强烈辩护。赖莎对您说：国家领导人的责任与负担是多么的重。他们对苏联的地大物博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在我看来这是真诚的，不是吹嘘。总之，总统先生，这次晚宴是您与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四次首脑会议的一次高潮。奥碧和我为能参加此晚宴感到十分荣幸。

在访苏期间，里根做梦也不会想到，戈尔巴乔夫会让他给那些莫斯科最优秀的青年们演讲。这可给了里根一次绝好的机会，里根一直在鼓吹民主和

自由，这次莫斯科之行的一项突出任务就是大讲人权，宣扬美国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他在演讲中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宪法，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只是政府发布一些文件或通告，告诉人民他们可以做什么。美国也有一部宪法，但与其他所有的宪法不同，因为它是由人民告诉政府，政府能够做什么。美国宪法中最重要的字眼就是：我们人民。它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自由。

……

你们这一代人生活在苏联历史上最令人振奋、最富有希望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渴求自由的第一声低语就引起了激动的气氛，心灵随着希望的节奏而加快，长期压抑下的精神力量渴望博取自由。我想起了果戈里在他的《死魂灵》近于结尾处的著名诗句。他把他的国家比作飞快的三套车，问它要到哪里去。但他写道：‘没人知晓他奔向何方，只留下一片悦耳的铃声在空中回响。’我们不知道这次旅行的结果将是什么，但我们相信，苏联的改革一定会实现。在1988年5月春天的莫斯科，我们可能希望：自由就像托尔斯泰墓前碧绿的树苗一样，最终将在你们的人民和文化这片沃土上开花结果。我们还可能希望这开放的新的悦耳铃声不断，坚持下去，让我们的世界充满和解、友谊与和平。”

这次会晤在削减50%战略核武器问题上未能取得突破。虽然在空射巡航导弹问题和核查机动导弹问题上取得重要进展，但在太空防御和海上发射巡航导弹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

里根回到华盛顿后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感谢信，感谢戈氏的盛情款待，并对两国关系的进展表示高兴。戈尔巴乔夫在回信中也有同感，他说：“确实，我们在莫斯科的首脑会议不仅取得了富有意义的政治成果，而且还具有了一个令人鼓舞的人际交往的成果：不仅我们个人方面彼此喜欢，而且我们两国人民之间有了更热情的关系以及更为正确的相互了解。所有这些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美、苏对话的意义。”

## 六、戈尔巴乔夫在联大讲话时宣布单方面大幅度裁军，算是送给美国新总统的“圣诞礼物”

1988年6月28日至7月1日，苏共召开了第19次代表会议，重点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戈尔巴乔夫领导下的苏联改革，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但各个时期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1987年侧重于制订经济体制改革的综合配套方案，那1988年更为引人注目的是政治体制改革。第19次代表会议通过的7项决议为今后政治改革规定了基本方针和主要目标，戈尔巴乔夫在会议报告中，把国内改革同苏联“对国际事务采取的立场”联系起来，进一步明确对外政策必须为国内经济改革和发展服务。戈尔巴乔夫指出：

在评价战后苏联对外政策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在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周围制造非常局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集团对社会主义持公开侵略态度。军事威胁对我们来说是个经常性的因素。这个因素直到现在也没有消除，苏联同自己的盟国一起对此以及对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明确的心理战，不能不作出反应。

然而，在吸取过去的教训时，不能不承认，行政命令方法也遍及对外政策领域。有时甚至最重要的决定也是少数人在不经过集体的、全面的讨论和



分析的情况下作出的，有时也同朋友们进行应有的协商。这就导致了对国际事件和其他国家的政策作出了不符合实际的反应，有时甚至作出了错误的决定。遗憾的是，往往并不掂量人民对某一行动方案将付出什么代价，这一行动方案可能导致什么结果。

为了回答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世界发出的核挑战，必须努力达到同美国的战略平衡。这种平衡已经达到了。但是，在把巨额资金和注意力集中到同帝国主义对抗的军事方面之后，我们没有经常利用世界发生的根本变化所开辟的政治机会，以确保国家安全，降低紧张程度和加强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谅解。结果让别人把自己卷入了军备竞赛，这对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国际地位不能不产生影响。

然而军备竞赛已经接近危急关头。在这一背景下，我们进行的历来有利于和平与裁军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开始丧失它的说服力。如果说得更尖锐些，那就是不改变这种发展逻辑，就可能真的陷入军事对抗的边缘。

这就是为什么不单要完善，而且要坚决更新对外政策的原因。

9月底，为了在组织上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重大人事调整。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政治局委员葛罗米柯等5人退休，提升4人为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并选举普戈为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决定成立6个直接由政治局领导的委员会，即社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农业政策委员会、意识形态委员会、国际政策委员会、法制政策委员会、党的建设和干部政策委员会。10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决定由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通过这次调整，戈尔巴乔夫本人身兼党政第一把手，大大加强了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改革力量为主的领导核心。

戈尔巴乔夫深感目前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技术上都难以同美国竞争，苏联经济不堪承担同美国进行长期的军备竞赛。苏联在70年代实行进攻性战略，扩大干预世界各地的地区性冲突，结果背上了沉重包袱，也急需加以收缩。所以，戈尔巴乔夫从军备控制到地区冲突都对美国作了许多让步。

正当1988年行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突然决定访问纽约。从12月6~8日的三天访问日程中，主要有两项活动：一是到联合国发表演说，二是同美国现任总统里根和当选总统布什会见。戈尔巴乔夫选择里根即将卸任，布什已经当选但尚未入主白宫的时机前往纽约，表面上看是向里根道别，博取美国人民的好感，实际上主要的还是结识新总统布什，以期把美苏对话继续下去。

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的演说中，出人意料地宣布将采取重大的裁军步骤。他说：

今天我可以向你们说，苏联通过了关于裁减自己武装力量的决定。

在今后两年内，其人员将减少50万，将大大减少常规武器数量。这种裁减将以单方面方式进行。这与根据维也纳会晤的权限而进行的谈判无关。

根据与我们华约盟国的决议，我们决定在1991年之前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撤出6个坦克师并解散它们。

还将从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军队集群中撤回登陆突击兵团和许多其他兵团和部队，包括登陆渡河部队连同武器和军事装备。

驻扎在这些国家的苏联军队将削减5万人，而在装备方面将减少5000辆坦克。

将对暂时留在我们盟国领土上的全部苏联军队进行改编。军队结构将与

今天完全不同，在从军队中撤除大量坦克后，军队结构将逐渐变成单纯防御性的。

与此同时，我们将削减苏联欧洲部队的军队兵员和武器数量。

在我国这一部分和在我们欧洲盟国的领土上，苏联武装力量将减少 1 万辆坦克，8500 门火炮，800 架战斗机。

在这两年内我们还将大大减少我国亚洲部分的军队集团。根据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达成的协议，临时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的相当大一部分将返回祖国。

我们还将把我国的防御能力保持在合理的和可靠的足够水平上，使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侵犯苏联及其盟国的安全的野心。

虽然苏联裁减部分军队并从东欧和蒙古部分撤军的计划酝酿已久，但戈尔巴乔夫选择这一特殊时刻采取这一行动，有着深刻的背景和自身意图。

从外交上看，苏联急欲深化缓和进程，谋求主动有利地位。由于苏联国内改革阻力很大，因而戈尔巴乔夫力图在外交上有新的建树。在战略武器谈判一时难以取得突破，而欧洲常规裁军谈判将于 1989 年开始的情况下，苏联宣布裁军 50 万意在推动欧洲常规裁军进程，促进以中导协议为标志的东西方缓和。这样，既可以保持同美国对话的势头，又为改善同西欧国家关系创造了条件。

苏联在经济上力图减轻军备负担，加速改革步伐。据西方估计，苏联每年实际军费开支高达 2000 多亿美元，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16%、政府支出的三分之一。苏电子工业产品的大部分，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产品的三分之一，冶金产品的五分之一以及化工和能源产品的六分之一都为国防服务。苏联单方面裁军决定不仅有助于缓和资金匮乏、劳力短缺的矛盾，而且有利于消除西方国家对苏联的顾虑，以便从西欧获取资金和技术，更好地为加速国内经济改革服务。

苏联在军事上贯彻落实“纯防御”军事学说，以图降低东西方军事对抗水平。戈尔巴乔夫当政后，反复宣扬苏联军事学说的“纯防御”性质。苏单方面裁军一则向西方显示诚意，二则促进西方也采取类似行动，推动国际裁军进入现实的轨道。美国和西欧历来对苏联的裁军建议最为敏感。这次苏的决定更直接涉及美国和西欧利益，因而戈尔巴乔夫的联大讲话立即受到西方国家的欢迎，被认为是朝东西方缓和方向迈进的“重要一步”，也是送给美国新总统的“圣诞礼物”。撒切尔夫人认为此举是“向着欧洲力量平衡迈出的重要一步”。科尔说：“它为欧洲实现常规武器平衡提供了机会。”密特朗称，这“有利于和平与力量均衡”。与往常不同的是，这次西欧基本上无人公开怀疑戈尔巴乔夫的诚意，也鲜见有人指责苏联是在搞宣传。

美国对戈尔巴乔夫裁军决定的反应谨慎。一方面，里根总统和舒尔茨国务卿对此表示欢迎，认为是“有意义的一步”，另一方面又认为即使到 1991 年苏联兑现了戈氏的裁军诺言后，欧洲常规力量“依然极不对称”。而对于即将上任的布什政府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挑战。布什曾明确表态，他当政后将把裁军重点放在常规裁军方面，而苏联这一主动行动无异于把球踢到美国一边。

12 月 7 日中午，戈尔巴乔夫同里根总统和当选总统布什会晤。双方广泛地讨论了苏裁减常规军备、人权、地区冲突、化学武器和苏联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雷达站等问题。此次会晤气氛融洽。里根表示支持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改

革，并称此次会晤是两国迄今已取得成就的延续，下届政府将继续这样努力。戈尔巴乔夫则希望苏美合作关系能在布什任职期间变得更加密切。舆论界认为，这是一次里根向布什“传递火炬”的“具有连续性的小型首脑会晤”。

## 第十三章 伙伴关系

布什上台后，对苏联继续坚持里根政府的实力地位政策，但更多地采取政治和经济手段来推动美苏关系的发展。布什政府时期，美苏之间对话更加深入和经常化，双方在继续竞争的同时，努力进行合作，双方关系中取得了比里根时期更多的具体成果，在一些利益大体一致的问题上甚至建立了合作和伙伴关系。由于苏联国内局势的动荡，美苏关系曾一度出现波折，但双方合作关系并未受到很大影响。美国在两国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日益明显。

### 一、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不只是一要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且要促苏演变

布什于 1989 年上台后，戈尔巴乔夫继续在国内进行改革，在国外贯彻其“新思维”，不断提出进一步改善东西方关系和美苏关系的建议。起初，布什虽然口头上欢迎苏联国内的改革和变化，但对戈尔巴乔夫心存疑虑，难以断定苏联改革的后果对美究竟是祸是福，因而采取既不支持也不干扰，静观待变的方针。布什在 1 月 27 日就任总统后举行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还表示，他完全同意“冷战尚未结束”的观点。

为了了解苏联变化的“全部含义”，审查对苏政策，布什总统指令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为首的外交顾问班子对美外交政策进行回顾和审查。4 月下旬，布什的外交顾问班子提交了对苏政策回顾报告。这个报告认为，从意识形态上说，西方“已赢得冷战”，苏联对美和西方的威胁减少，但苏联改革步履维艰，东欧局势动荡，前景难以预料；西欧国家主要是联邦德国要求迅速对苏开放，将给美欧关系带来新的问题；今后美面临的主要威胁将来自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的挑战。因此，美今后外交政策的重点应是在经济上维护美国作为头号经济大国的地位，在政治上应付苏联和东欧的局势。

布什在完成“对苏政策回顾”后，于 1989 年 5 月 12 日在得克萨斯州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了题为“苏联的变化”的演讲，提出了对苏联实行“超越遏制”的新战略。接着，5 月 21 日，布什在波士顿大学发表题为“欧洲的未来”的演讲，5 月 24 日在海岸警卫队学院发表《90 年代的安全战略》的演说，反复并进一步说明了“超越遏制”战略。这些讲话反映了美对苏政策的显著变化。布什声称，自杜鲁门政府以来的遏制战略“发生了作用”，现正接近于战后两种观念即暴政和冲突与民主和自由之间的历史性较量的尾声，90 年代美国的目标比简单地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要大得多，美国寻求的是“使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

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主要是因为布什政府认为美国对苏实行的遏制战略已经成功，现在戈尔巴乔夫的对内对外政策已使苏联处在一个“根本变化的状态中”，而且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系列裁军倡议，这对美国和西方十分有利，美国不应错过这一大好时机。布什政府认为现在是对苏联提出“超出遏制阶段进而为 90 年代制定一项新政策——一项充分承认世界各地以及苏联本身所发生的变化的政策的时候了”。布什强调，今后的对苏政策不只是一要遏制苏联的扩张主义，而且又限于遏制，要促苏演变，目标是“欢迎苏联回到世界秩序中来”，其实质就是将苏纳入西方体系。

为了对苏联实行“超越遏制”战略，布什还提出苏联应当采取以下积极

步骤：

- 一是减少军事力量；
  - 二是放弃勃列日涅夫主义，保证支持东欧和中欧各国自决；
  - 三是同西方合作，争取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地区冲突；
  - 四是实现持久的政治多元化，尊重人权；
  - 五是同美国一起解决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
- 可以说，超越遏制是布什政府对苏政策的总纲领。

## 二、马尔他会晤和华盛顿会晤，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减少对抗、增加合作的新阶段，美国掌握了主动权

布什提出“超越遏制”战略大约4个月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于1989年9月21日至25日访问了美国，同美国国务卿贝克在怀俄明州举行会晤。双方广泛讨论了军控、地区冲突、人权和双边关系，达成了有关军控等方面的原则协议。苏联在军控上对美作出了很大让步，如机动洲际导弹可以不受限制等。双方还就苏联的国内形势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两国外长商定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定于1990年春夏之交举行他们之间的第一次首脑会晤。两国外长会晤后发表的声明中说，两国的共同目标是“建立一种更为稳定的建设性的持久关系”，这种关系将使“开放性和合作不断替代不信任和竞争”。

10月，贝克连续三次发表关于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讲话，强调美苏持久改善关系的前景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光明。他在讲话中指出：“现在的对苏关系有了一个历史性的机会，美国可以超越对苏联的遏制，把战后冷战年代的恩恩怨怨置于一旁，以改善超级大国间的关系，让它更加稳定、更少反复。我们的任务是寻求符合美苏双方利益的互利关系的持久立足点。”他还强调，美国希望苏联的改革，包括对美苏关系的改革能“取得成功”，“因为我们相信改革会带来一个侵略性较少、使用武力克制和不那么敌视民主的苏联，改革可能使苏联的行动有利于我们的利益”。贝克的讲话意味着布什政府的对苏新政策开始付诸实施，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0月31日，布什总统在白宫记者招待会上以低调宣布他将同戈尔巴乔夫于12月初在马耳他举行一次非正式的首脑会晤，当时确实令人感到意外。布什采取这一主动行动，有他的考虑。他虽在5月间提出了“超越遏制”的新战略，但他谨慎从事、静观待变的态度遭到国会和舆论的批评。10月以后，东欧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特别是继波兰、匈牙利之后，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局势的剧变和柏林墙的开放，使布什认为采取步骤的时机已经成熟。布什强调，这一决定是在看到苏联国内变化和东欧形势的新发展，并同西方盟国领导人商量后作出的。11月22日，布什总统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向全国发表感恩节电视讲话时表示，在即将跨入90年代的时候，希望苏联同美国一起推倒“通往自由新世界”的最后一个障碍。

在马耳他会晤前夕，布什希望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主要了解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戈尔巴乔夫的处境及他领导的苏联国内改革的进程、前景；二是苏联对东欧剧变能容忍到什么程度。美国还希望苏联在解决地区冲突中给予美国合作，布什还说他要把美苏之间达成任何军备控制协议同苏联在地区冲突中的表现联系起来，暗示苏联目前在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和阿富汗等地区冲突的行动严重影响它在美国公众和国会中的形象。如果苏联不改变其形象，美国国会就不会批准美苏之间达成的军备控制协议。

12月2日至3日，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港口的一艘客轮上如期举行了一次非正式会晤。在这次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并没有提出新的倡议，而布什却采取主动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16项建议，其中包括：商定两国首脑第一次正式会晤的时间、地点；两国外长1990年1月在莫斯科会晤时讨论加速包括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在内的几项军备控制谈判进程；双方开始谈判一项贸易协定，如苏联向国外移民法能正式颁布，苏可获得贸易最惠国待遇；在下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于1990年结束后，考虑让苏联在关贸总协定中取得观察员地位；美国将研究取消对苏高技术出口限制的可能性；美苏联合要求2004年奥运会在柏林举行；从1991年开始美苏交换1000名留学生等。

尽管这是一次非正式会晤，但由于这次会晤是在国际形势发生迅速而深刻的变化，东欧正经历急剧变革的情况下，由布什建议举行的，因而这次会晤对美苏建立新关系具有转折性的意义。会晤的主要成果是：

第一，双方同意在1990年6月举行正式会晤。此前，两国外长在1月就军控问题进行预备性谈判，争取首脑会晤时能首先缔结削减50%战略核武器条约。同时争取1990年缔结削减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促进早日缔结全面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以及缔结有关限制地下核试验的条约。

第二，美国允诺扩大美苏经济合作。双方讨论了苏联的经济困难，这在战后美苏首脑会晤史上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布什表示愿意在经济上给予苏联援助，并同意给予苏联以最惠国待遇和支持苏联以“观察员身分”参加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美国的这些许诺使戈尔巴乔夫感到满意，戈说“其中含有许多积极因素”。阿尔巴托夫说，“布什实质上宣布华盛顿已停止了对苏联的经济战”。

第三，双方对东欧局势变化和德国统一问题深入交换了看法。双方表示不干涉东欧国家的改革进程，并设法保持东欧局势的稳定。布什向苏联表示，美国不会利用东欧局势充当寻求好处的对手，而是希望作为提供帮助的朋友欢迎苏联的改革，美国的目标是想看到这股历史潮流的“扩大、加深和持久”。同时，布什对外界“强行干预东欧形势的任何企图”提出警告。戈尔巴乔夫则向美国承诺，不对东欧进行军事干预，也不会用武力镇压本国“以和平方式表达政见的持不同政见者”，但明确表示不允许东欧国家的任何反苏活动或利用东欧动荡的局势危害苏联的安全利益，不愿意让东欧国家退出华约组织，也不希望它们从经互会分离出去。在德国问题上，苏联强调，“人为地强行推行德国统一，只会使欧洲现有进程复杂化”。美国则强调统一的进程必须符合四个条件：实行自决原则；要在西德继续同北约和欧共体保持联结的条件下实现统一，不应以中立换取统一；统一应是和平、渐进的过程，要有利于欧洲的全面稳定；承认欧洲各国现存边界。双方还同意保持华约和北约两大军事集体的存在，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其作用可逐渐从军事为主转为以政治为主，并可讨论经济问题。

但双方在讨论中也存在一些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地区冲突问题上。美国对苏联在中美洲所起的作用表示不满，而苏联则表示，它遵守不运进武器的诺言，但无力作更多的事，同时要美遵守不干涉原则。在军控问题上，苏提出应研究裁减双方海军力量以及消除舰载战术核武器问题，但美国表示拒绝。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马耳他会晤时海上风暴象征美苏关系未来的道路将是“不轻松和不平坦的”，“还有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障碍”。

从马耳他会晤的情况看，主动权已转到了美国总统手中。前几年，戈尔

已乔夫在外交上对美国频频发动“和平攻势”，每次首脑会晤都抢先提出若干使人大出意外的建议，置美国总统于被动应付的地位。但这次，不仅会晤的举行由布什倡议，而且布什事前准备充分，会晤一开始就提出 16 项建议，置戈尔巴乔夫于被动地位。这次会晤表明，美苏双方都淡化互为主要对手的争夺关系，而增进合作的因素。会晤中，双方强调，不再以对方为敌，两个超级大国应该进入“合作而不是竞争的新时代”。苏联外交部发言人之一佩尔菲利耶夫说：“在我们看来，马耳他会晤的主要结果是，我们两国坚定地走上了联合努力，寻找解决现代文明面临的各种问题之办法的道路。”苏联外长激瓦尔德纳泽在这次首脑会晤后说得更直截了当：“苏联准备放弃以前占上风的认为苏美之间关系永远是敌人之间关系的观点。苏联准备同美国进行合作，其中包括军事方面的合作。”他强调，马耳他会晤中戈尔巴乔夫向布什表达的这一思想，乃是“首脑会晤的世界观的突破……对于揭示这次会晤的重要性具有中心意义”。这次会晤的结果表明，美苏关系开始进入一个对抗趋于减少而妥协与合作有明显发展的新阶段。

马耳他首脑会晤后，美苏双方出于各自的需要，都努力维护缓和和改善关系的势头，加上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相互摸底，彼此了解加深，双边关系中务实性增强。1990 年新年伊始，戈尔巴乔夫和布什分别向对方人民发表电视新年贺词，戈希望 1990 年成为真正的和平年。布什称，美苏要加倍努力来铸造一个和平与自由的新世纪。1 月 31 日，布什通过美苏热线电话向戈尔巴乔夫通报他将在国情咨文中宣布的有关军备控制的建议。两位领导人在电话中表示要进一步加强相互理解和协作的气氛。这是布什担任美国总统以来首次通过热线电话与戈尔巴乔夫交换意见。

2 月 7~10 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苏，与戈尔巴乔夫和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讨论了裁军和地区冲突问题。3 月，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参加纳米比亚独立庆典时在温得和克会晤，讨论了德国统一、安哥拉内战以及苏联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的局势等。但美苏关系在立陶宛要求独立等问题上出现一些紧张。4 月，苏外长谢瓦尔德纳泽访美时，要求美方理解苏对立陶宛事件的立场。而布什警告说，苏在立陶宛使用武力将对美苏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苏联在削减战略核武器问题上也出现反复，使得原定年中首脑会晤时签订该条约成为泡影。就在首脑会晤前，双方还互相指责。布什声称，双方“存在巨大分歧”，可能妨碍首脑会谈。戈尔巴乔夫强调，西方不要因他忙于国内改革而趁机“混水摸鱼”。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华盛顿举行了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销毁化学武器、核查地下核武器、和平利用核能、发展双边贸易和文化交流等多项协议，保持了美苏“在马尔他开始的进程”。两位领导人还提出了美苏首脑会晤经常化和每年举行一次的设想。戈尔巴乔夫说，苏美之间的“敌人形象已成为过去”，苏美关系成为“伙伴关系”已为期不远。布什在这次会晤之后的一次讲话中，不仅说这次会晤是“非常有成果的”，而且称赞戈尔巴乔夫是位“致力于改革和开放的苏联新领导人，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能本着坦率的精神讨论摆在桌上的每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证据，证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然而舆论认为，这次会晤“成果不小，分歧也大”。分歧主要在于：美坚持统一后的德国仍为北约成员国，而苏联强烈反对；美支持立陶宛自决，而苏坚持认为这是苏内政，应根据苏宪法程序解决；尽管签订了贸易协定，

但美一直申明，只有苏先通过了允许自由移民的立法，美才会把这项协定提交国会批准；在裁减战略武器问题上，双方也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争执不下。

华盛顿会晤表明，减少对抗，增加合作已成为美苏关系的基本趋势。同时，由于苏联国内情况不断恶化，戈尔巴乔夫的领导地位日益虚弱，美国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前途越来越成为一个问号，苏联在美苏关系中已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 三、海湾危机的爆发，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战后第一次在重大地区冲突问题上站到了一起

1990年8月2日凌晨，沉睡中的科威特被一场恶梦惊醒了：海湾军事大国伊拉克在集结10余万兵力的基础上，出动5个师的精锐部队，在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突然越过伊、科边境，直奔科威特首都而来。

科威特军队仅有2万余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来不及组织有效的抵抗，防线很快被伊军突破。几个小时后，伊军攻入科威特城并包围了埃米尔王宫。当日下午4时伊军基本控制了科威特全境，埃米尔国王乘直升机逃脱，其弟法赫德亲王则在保卫王宫的战斗中阵亡。

伊拉克在对方毫无准备、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公然吞并科威特，就像晴天霹雳，极大地震惊了世界，并引发了二战后世界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海湾战争。这场战争是在东西方关系缓和，两极格局走向瓦解，各种力量分化组合的大背景下发生的，对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产生了深刻影响。

号称“巴比伦雄狮”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之所以断然采取入侵行动，有着复杂的背景。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伊、科两国围绕主权和边界问题存在争端。伊拉克对科威特觊觎已久，1961年科威特宣布独立时，伊拒不承认，并陈兵边界，企图武力占领，因遭英国干预和其他阿拉伯国家反对，才于1963年承认科威特独立。80年代末，随着两伊战争的结束和美苏关系的缓和，伊、科之间的矛盾突出起来。伊拉克希望解决长期困扰它的出海口问题，要求科威特免除伊在两伊战争中欠下的巨额债务。1990年7月，伊拉克在向科威特提出一系列要求遭到拒绝后，下了以武力吞并科威特的决心。8月2日武装占领了科威特全境。

8月2日，伊拉克入侵的当天就激起了一片谴责的声浪。联合国安理会应科威特政府的要求举行紧急会议，通过了1990年第660号决议，要求伊拉克立即无条件地将其入侵科威特的全部军队撤至入侵前的位置，并呼吁伊科两国立即举行谈判解决争端。美国也迅速作出反应，布什总统要求伊立即无条件从科撤军，并明确宣布：“我们决心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卫我们在海湾的长期而重要的利益。”同时下令冻结伊科两国在美国的财产，禁止同伊拉克的金融交易和贸易往来。8月3日，美苏外长紧急磋商后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伊拉克无条件撤军，“宣布暂停向伊拉克供应武器”，认为必须“采取一切措施”制止伊科冲突。

此后，美苏两国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保持密切接触，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就制裁伊拉克问题上采取一致行动。正如美联社的评论指出，这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和苏联第一次在一个重大的地区冲突问题上站到了一起”。

为了专门讨论美苏如何处理海湾危机中继续协调行动的问题，应美国政



府的要求，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于9月9日在赫尔辛基举行会晤，讨论海湾危机以及在新形势下加强美苏合作等问题。

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再次呼吁伊拉克从科威特无条件撤军，恢复科威特合法政府和释放所有人质”。双方还表示，“只要危机存在，美苏就将联合起来反对侵略”，并致力于“共同研究制订地区安全结构和促进和平与稳定的措施”。在会晤时，布什主张必要时对伊拉克动用武力，戈尔巴乔夫则强调和平解决危机。会晤后，双方领导人都强调美苏正开始建立“新的关系”和实行“新的合作”。

9月11日，布什在向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说时说，赫尔辛基会晤标志美苏之间“新的伙伴关系已经开始”。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表示，“这次会晤开辟了通向一种新的合作形式和增加信赖的道路”，“我们实际上正进入一个新时代”。国际舆论也认为，赫尔辛基会晤是两个超级大国在解决地区冲突方面进行合作的“里程碑”。9月底，美苏外长在纽约会谈，协商加强双方在海湾危机中的合作等问题。

美国为了迫使伊拉克撤军，决定采取大规模军事部署行动，为必要时采取军事打击行动做好准备。根据这一精神，负责中东地区防务的美军中央总部拟定了“沙漠盾牌”行动计划，拟分两个阶段向海湾地区部署部队。第一阶段用3至4个月时间（17周）部署24万人的部队及其建制装备，以使该地区美军和其他出兵国家部队兵力达到同伊军大致相抗衡的水平。第二阶段将视形势发展继续增兵，以使兵力达到足以将伊军赶出科威特的水平。第一阶段部署，又将根据伊军有可能在短期内向沙特发动进攻的形势，首先在沙特的朱拜勒和宰赫兰一线部署快速反应部队和空中打击力量，建立机动防御，采取“以空间换时间”战略，挡住伊军可能的进攻，保证后续部队陆续抵达和部署。

美国为何要如此大动干戈呢？长期以来，海湾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海湾地区是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赖以生存的主要能源供应基地。80年代末期，美国进口石油的20%、西欧的35%、日本的70%都来自这一地区。由于这里的石油经由海上运输，所以海湾通往世界各地的运输线又被西方称为“生命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这里组织军事联盟，建立军事基地，防止苏联在该地区扩张。1958年伊拉克爆发民族主义革命，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成功，使该地区亲西方的联盟解体，伊拉克和伊朗相继脱离了西方轨道，只剩下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等海湾西岸产油国仍与美国保持着良好关系。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直接触动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根本利益，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提出了挑战。

伊拉克的侵略行径也遭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同时也为美出兵海湾提供了借口。美国出兵海湾的战略目的是：控制海湾石油资源，维护西方的经济命脉，巩固其超级大国地位；长期驻足海湾，在中东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新秩序”；制服地区强国伊拉克，保持海湾地区力量均衡，维护美国全球利益。伊侵科当天，美“独立”号航空母舰即奉命驶往海湾。8月6日，美国总统布什下令实施“沙漠盾牌”行动，向海湾部署军队。

联合国安理会亦通过要求伊无条件撤出科威特并对伊实施贸易禁运等决议。美国以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名义建立多国联盟。英、法等38个国家出于不同的目的派遣20余万人的战斗部队或支援部队，日本等10多个国家向美国捐款540余亿美元。

罕见的军事大调动开始了。10多个国家军队组成的多国部队从四面八方向海湾集结，真是大军云集，战将如林。开战前夕，多国部队总兵力为69万（其中美军45万人）、坦克3500余辆（其中美军2000余辆）、装甲车3000余辆（其中美军2200辆）、作战飞机5000余架（其中美军2000余架）、舰艇250余艘（其中美军140艘），部署在伊拉克—科威特周围地区，对伊军呈包围态势。多国部队总指挥、美军中央总部司令N·施瓦茨科普夫上将通过“联盟协调通信与一体化中心”，与阿拉伯联合部队司令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苏尔但中将协调行动。多国部队的作战企图是：以连续不断的高强度空袭，摧毁伊拉克的战争潜力和战略反击能力，震撼其士气民心，重创其地面部队，瘫痪其防御体系，尔后在海空军支援下出其不意的地面进攻、快速坚决的纵深穿插和迂回包围，将伊军主力歼灭于科威特北部和伊拉克南部地区，迫使伊拉克接受联合国有关决议。与此同时，给以色列以足够的军事援助，以免以色列卷入战争，导致多国联盟破裂，给伊可乘之机。

伊军总兵力120万人、作战飞机770余架、坦克5800余辆、装甲车5100余辆、火炮3.8万余门、地对地导弹800余枚。在南部战区（伊科战区）部署有43个师约45万余人（司令部在巴士拉），并在科沙边境地区构筑了包括两个防御地带的“萨达姆防线”；其共和国卫队8个师为战略预备队，部署在伊科边界以北地区。在北部战区部署有2个军约17~18个步兵师，以备美军在土耳其方向开辟第二战场。在中部地区部署有1个军3个步兵师。另有1个师和4个旅（含共和国卫队2个旅）部署在首都巴格达周围。伊军由总统萨达姆·侯赛因直接指挥，其战略企图是：以藏避炸、保存实力，以有限反击拖住对方，以导弹袭击分化瓦解多国联盟；依托既设阵地，发挥兵力优势并利用日益严酷的气候，使战争长期化、复杂化，最终迫使多国部队撤出海湾，以永久占领科威特。

美国是多国部队的主力军。

海湾成为世界性阅兵场，又是现代化武器的大展厅。

双方大军对峙，怒目相视，横刀相向。外交官们奔走如梭，使尽各种招数，力图平息事端，勿动干戈。但是，由于伊拉克拒不从科威特撤军，联合国安理会特别会议于1990年11月29日通过第678号决议，授权联合国成员国在伊拉克于1991年1月15日之前仍拒不执行有关决议的情况下，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执行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但该决议通过后，伊拉克表示拒绝接受。

1991年1月9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在日内瓦举行战前最后一次会晤，但是，双方都认为没有妥协余地，会谈没有取得结果。1月16日美国东部时间上午10时30分，开战。

1月17日当地时间凌晨2时，海湾大地突然颤抖起来，多国部队的空袭开始了。成群的飞机一批接一批起飞，直扑巴格达，投下成千上万吨炸弹，“战斧”导弹也拖着火舌腾空而起，飞向既定目标。美国的激光制导炸弹，一炸一个准，命中率很高。伊拉克防空炮火像节日礼花一样灿烂夺目，但未能击中几架美军轰炸机。在天亮前的几轮轰炸中，伊拉克仅有的两架预警飞机和大部分防空雷达被摧毁，这使多国部队的飞机此后能自由往来，掌握了制空权。

伊拉克空军飞机只要起飞拦截，便难得生还，因此大都逃往伊朗。但是苏联人造的“飞毛腿”导弹还是逞了一下威风，伊拉克三天一枚，两天一发

发射过去，竟搞得多国部队惶恐不安。最受气的是以色列，伊拉克一吃亏就拿“飞毛腿”攻击以色列。以色列总理沙米尔何时受过这种窝囊气！他不断叫着要还击，却被美国人按住手脚不让动弹。以色列一开火，麻烦就大了。美国拒不向以色列提供电子通讯密码，以色列飞机便不敢飞往战区。因为没有密码会被当成敌方飞机打掉。于是伊拉克继续发射“飞毛腿”，打得有滋有味。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将“飞毛腿”斩断不少，但到底不能万无一失。

空中战役包括战略性空袭、夺取战区制空权和为地面进攻做好战场准备。11天后，多国部队已完全掌握制空权。进入第三周后，空中行动的重点转入科威特战区。至2月23日，多国部队共出动飞机近10万架次，投弹9万吨，发射288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和35枚空射巡航导弹，并使用一系列最新式飞机和各种精确制导武器，对选定目标实施多方向、多波次、高强度的持续空袭，极大地削弱了伊军的C3I能力、战争潜力和战略反击能力，使科威特战场伊军前沿部队损失近50%，后方部队损失约25%，为发起地面进攻创造了条件。

尽管此前苏联一直积极支持美国提出的一系列制裁伊拉克的步骤，但当美国决定要对伊拉克动武后，苏联却拉开了同美国的距离。在美国即将对伊拉克打响地面战斗的关键时刻，戈尔巴乔夫于2月18日向来访的伊拉克外长阿齐兹抛出了一项新的和平倡议。主要内容是：伊拉克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多国部队停止军事行动；苏联保证伊拉克政权和边境安全；解除对伊拉克的封锁和制裁；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巴勒斯坦问题和其他中东问题。随即，苏方将该建议内容通知美国。

布什接到这个建议，很不高兴，并在36小时后发表讲话，拒绝了苏方的建议。而此时在海湾前线，多国部队发动地面进攻的准备已经就绪，只等一声令下了。

21日，伊拉克外长阿齐兹再次访问苏联，就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问题与苏联达成八点协议。这使得布什政府大为恼火。布什认为苏伊和平建议附加了一些不能接受的条件，限定伊拉克必须在23日中午前撤离科威特。

23日，苏联又提出经伊拉克同意的6点和平计划，建议立即停火，在停火后的第二天伊拉克开始撤军，撤军在21天内完成，互释战俘和取消对伊拉克的制裁等内容。布什政府认为，苏联单独同伊拉克达成和平方案，目的在于破坏美国的中东战略，拯救萨达姆和同美国争夺中东。而苏联政府认为，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战争，是为了完全消灭伊拉克的军事实力和国家机构，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在战争结束后的安排中享有特权地位。美国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强调，伊拉克应按照美国的“最后通牒”撤军。西方国家和其他反伊联盟国都支持美国的立场，称伊如不无条件撤军，地面进攻不可避免。

但伊拉克声称，对此通牒“不予理睬”。

2月24日当地时间4时，以美军为主的多国部队发起地面进攻，海湾战争进入最后决战的阶段，也称“沙漠军刀”行动。多国部队在沙科、沙伊边界约500公里正面上由东向西展开5个进攻集团，很快攻入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内。伊拉克大军已在长期的狂轰滥炸之下元气大伤，斗志衰退，加之指挥不当，兵败如山倒，仓皇撤退，损失惨重。

26日清晨，巴格达电台宣布，萨达姆总统已下令伊军从27日起撤退，撤至1990年8月2日以前的位置，伊军迅即崩溃。

2月28日，布什总统宣布从当天早上格林威治时间5时停止进攻性作战行动。规模空前的海湾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

对于美国对伊拉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苏联政府官员和官方报纸不断提出质疑和批评。在海湾战争爆发的当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说：“我们懂得使用大量军队和现代化军事技术装备的战争，对阿拉伯人民、对美国人民、对整个国际形势孕育着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对未能避免军事冲突深表遗憾。”

2月7日，苏外交部发言人丘尔金称：“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不能允许海湾战争升级和扩大。”2月15日，苏《消息报》发表评论称：“沙漠风暴是沙漠大屠杀，美国在这场战争中，强迫别人服从自己的路线，想怎么打就怎么打，并用共同的委托加以掩饰。”2月23日，苏国防部长亚佐夫发表谈话说：“我不想为萨达姆辩解，但美国也超越了安理会的授权。”2月26日，苏国防部发言人茹尔边科少将对记者说：“多国部队展开的地面军事行动，已经超出了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实质上变成了摧毁伊拉克这个国家。”

对于苏联的批评和指责，美国官方基本不予理睬，而是按照既定的战争计划行事。在发动地面进攻前夕，也就是苏联批评美国最激烈的时候，美国公开表示，苏联在海湾的目标与美国大不相同，美国“决心按照盟国的条件和时间表结束战争”，这实际上把苏联抛到了一边。

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期间，美拉苏建立联合解决地区争端的合作关系，打破了过去各支持一方进行军事、政治对抗的局面。海湾战争后这种合作关系仍然保持，并有新发展。如在阿、以和谈问题上，美不仅不排斥苏，还拉苏一起成为中东和会的两个发起国。苏则不遗余力，积极劝说阿拉伯方面接受美倡导的中东和会方案。正如西方评论所说，尽管有分歧，但苏在中东已成为美国的一个伙伴。不过，苏联由于内外交困，与美相比，它并不是一个平等的伙伴，而只是美国在地区冲突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配角而已。

#### 四、《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签署，苏联和华约在中欧的常规力量优势丧失，北约实现了多年的愿望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谈判是中欧裁军谈判的继续和发展。中欧裁军谈判是1973年1月31日开始的，这是由以美为首的北约和以苏为首的华约之间“关于中欧共同减少部队和军备与有关措施的谈判”（简称中欧裁军谈判）。这一谈判至1989年2月2日结束，历时15年，共进行了7轮谈判，开了493次全体会议，但未取得具体成果。究其原因，主要是分别以苏美为首的华约和北约都把·417谈判作为一种斗争手段，利用它限制削弱对方的军事力量，而力保和增强自己的军事优势或强点。进入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美苏关系的缓和，双方对开始商定的裁减目标已不以为然，尤其在苏美削减战略核武器和消除欧洲中导谈判开始后，双方感到即使达成两大集团中欧驻军90万人的最高限额协议，裁减的军备和部队也很有限，不会使欧洲形势比目前更稳定更安全。在这种形势下，北约和华约的中欧裁军谈判终于作为一次失败的谈判而载入史册。早在1986年6月，随着苏联对外政策的调整和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推行，苏联为了打破欧洲常规裁军的僵局，卸掉军备重负，由华约向北约提议重新举行全欧常规裁军谈判以取代中欧裁军谈判，北约表示赞同。1987年2月17日，在欧安会的授权下，北约和华约23个国家的代表开始举行全欧常规武装力量谈判的预备性会议。双方就会

谈的主题、目的和方法、范围和适用地区、裁减对象和原则、情报交换与核查、与欧安会的关系、达成的协议的性质以及会谈的程序、地点和经费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这次预备会议于1989年1月19日结束。经过2年的讨价还价，双方就拟订削减欧洲常规武器会谈的谈判条款达成协议，即“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谈判授权文件”。主要包括：

第一，规定新的谈判名称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谈判”。

第二，谈判目标是“将通过建立常规武装力量（包括较低水平的常规武器和军备）的稳定和可靠的平衡来加强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消除不利于稳定与安全的不平衡，实现常规力量“低水平均衡”；使北约和华约只保留用于防御的力量，最终使双方都不具备“发动突然袭击和大规模进攻的能力”。这些目标将通过“采取裁减、限制和重新部署之类的重大军事措施和实行同等的最高限额及有关措施来实现”。

第三，裁减的范围和适用地区由中欧裁军谈判时的“中欧地区”扩大到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与会国的整个陆上领土，包括与会国的所有欧洲岛屿领土，以及苏联亚洲部分的高加索地区和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

第四，参加谈判的国家为23个“拥有主权的独立国”，即北约和华约的全部成员国。

第五，裁减的对象和内容，是两大军事集团的常规武装力量及军备，包括陆、空军常规力量及军备和除常规能力外还具备其他作战能力的常规武器，即“双用途武器”，不包括核武器、化学武器和海军。

第六，裁减的原则为“不对称”地裁减，即有优势的方面先削减，待到“平衡”后再“对称”裁至商定的“低水平均衡”，这些步骤完成后再遵照“防御性原则”重新部署武装力量。

第七，规定“将通过严格的核查制度检查遵守协议条款的情况”。双方应交换详细情报，以便对所涉及的武装力量能力作出有意义的比较，并为核查工作提供基础。同时还规定，欧安会范围内的北约和华约23个谈判国在每轮谈判期间，至少要两次向欧安会报告情况，还要向欧安会其他12个成员国提供双方的情报和通报他们的工作和可能取得的成果，并与它们就谈判进展情况交换看法等。

1989年3月6日，欧洲常规武装力量谈判在维也纳开幕，同时召开的还有欧洲安全、信任措施和裁军会议（欧安会）。华约7国和北约16国代表参加谈判，欧安会35国外长出席了开幕式。在会议开幕式上，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分别代表北约和华约提出了各自的裁军主张。华约提出了三阶段方案：第一阶段（到1994年前）在两三年时间内双方将各自的“对稳定最具破坏性的武器和兵力，如攻击机、作战直升机、坦克、装甲车等减到目前弱方的水平，消除“不平衡”和“不对称”，然后在此基础上再减10%~15%。

第二阶段（1994~1997年），继续用2~3年的时间，双方按均衡裁减的原则再各裁减兵力和武器的25%，约50万人。

第三阶段（到2000年），确定北约和华约常规力量及军备的“最高限额”，并将双方兵力重新部署为纯防御性力量。此外，在两大军事集团边界沿线建立一条低水平军备的“特别区”，从这一地带撤出、削减或限制部署进攻性常规武器，限制在该地带的军事活动，并从这一带撤出战术核武器，把它们部署在射程达不到对方领土的地方。华约还主张实行最严格的监督与核查，

包括就地检查、空中观察和在交通线上设立检查点等。

北约的方案主要是“4点计划”和“6项准则”。

“4点计划”的要点是：要求美苏驻欧军队削减为27.5万人；每方的作战飞机将比北约现有力量减少15%；直升机也作同样处理；1993年前实现裁减目标。

“6项准则”包括：

第一，双方将部署在欧洲的坦克、火炮和装甲运输车削减到使其总额相当于北约目前水平的95%左右。最高限额为，坦克4万辆，火炮3.3万门，装甲运输车5.6万辆。

第二，任何一国拥有上述三类武器的数量，每类不得超过上述限额的30%。

第三，任何一国部署在本土以外的上述三类武器的最高限额分别为：坦克3200辆，火炮1700门，装甲运输车6000辆。

第四，按不同的地区规定武器部署的不同最高限额，而对欧洲中部前沿地区须规定更严格的最高限额。北约把欧洲分为四类地区。一类地区为中欧，含联邦德国、比利时、荷兰、卢森堡、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该类地区每方的武器限额为：坦克8000辆，火炮4500门，装甲运输车11000辆。二类地区含一类地区和英国、法国、意大利、丹麦、匈牙利以及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白俄罗斯和喀尔巴阡等3个军区。该类地区武器限额为：坦克10300辆，火炮7600门，装甲运输车18000辆。三类地区含二类地区和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苏联的莫斯科、伏尔加河沿岸和乌拉尔等3个军区，该类地区武器限额为：坦克11300辆，火炮9000门，装甲运输车2万辆。四类地区含三类地区和冰岛、挪威、希腊、土耳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以及苏联的列宁格勒、敖德萨、基辅、北高加索和南高加索等5个军区。该类地区武器限额为：坦克2万辆，火炮16500门，装甲运输车28000辆。

第五，对驻外国的部队应规定共同限额。

第六，应有“硬性”核查措施，包括现场核查及给核查人员更大的行动自由等。

从上述方案可以看出，两大集团在裁减的原则、共同限额、建立监督核查措施等方面有不少相似或接近之处，但第一轮谈判也反映出双方的分歧多于共同点。主要分歧有：第一，华约主张陆、海、空的兵力和武器装备都要纳入裁减范围，而北约只同意裁减三类武器，即坦克、火炮和装甲运输车。第二，华约要求分三阶段大规模裁减，而北约只同意裁减到相当于华约建议的第一阶段水平，认为进一步裁减可能影响保卫北约领土的防御能力。同时双方对现有常规力量的估计有很大差别，北约认为华约占有很大优势，华约应大幅度裁减。而华约认为双方兵力大体相当，武器装备各有长短，双方应先裁减自己优势部分，然后均衡裁减。第三，华约提出低水平军备地带的建议，北约认为这个方案会导致削弱北约的“前沿防御”及使联邦德国部分地区非武装化，因而不愿接受。从第一轮谈判看，华约希望通过大规模裁军削弱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而北约希望削弱华约的地面常规力量优势，保持北约的海、空优势，坚持美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5~7月，9~10月，11~12月，双方分别举行了第二、三、四轮谈判。在谈判中，为了尽快达成协议，双方尤其是苏联和华约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积极灵活的态度，不仅接受了北约“非对称裁减”的裁军原则，而

且不断作出妥协和让步。华约先是接受了北约关于两大军事集团在坦克、火炮、装甲运输车上的“充分消除不平衡”的要求，同意较大规模削减这些武器；后又接受了北约关于把双方的坦克和装甲车分别限定在 20000 辆和 28000 辆的建议，这样，华约将裁减的坦克数量是北约的 10 倍以上；华约最后还同意北约在 23 个谈判国每一国的限额和裁减区划分上的主张。

同时，美国和北约在东欧剧变、苏联动荡和两德统一的新形势下，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希望早日签约，因而对华约的让步尽可能作出响应。如美国在 1989 年 5 月提出的裁军建议同意把军队人员、武装直升机、作战飞机列入裁减范围。

1989 年底，当第四轮谈判结束时，双方在把坦克、火炮、装甲车、作战飞机和直升机的裁减等项列入未来协议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到 1990 年 5 月 14 日至 8 月 10 日的第七轮谈判也就是最后一轮谈判结束时，华约和北约决定裁减和规定限额的 5 种常规武器中的坦克、火炮、装甲车的定义和裁减、限额的问题已基本达成协议，但在作战飞机和作战直升机的最高限额、条约实施的监督和核查方面还存在一些分歧。

1990 年 9 月 12 日，美、苏、英、法和东德、西德召开了“2+4”会议，签署了《关于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规定统一后的德国不得生产、拥有核武器和化学武器，并在 3 年至 4 年内将德国的军队减至 37 万人。这样，苏联进一步解除了裁军的顾虑。10 月 3 日，美苏两国外长贝克和谢瓦尔德纳泽在纽约会晤时最终商定了双方火炮和直升机的最高限额，从而为签署裁减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

1990 年 11 月 19 日，在巴黎欧安会首脑会议上，22 个谈判国（此时两个德国已统一，东德不复存在）的首脑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其他 12 国首脑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出席了签字仪式。条约由序言、正文 23 条和 8 个议定书组成，主要内容是：规定了北约和华约各方在欧洲“从大西洋和乌拉尔”的地理范围内 5 大常规武器装备的最高限额——坦克 20000 辆，装甲车 30000 辆，火炮 20000 门，作战飞机 6800 架，攻击型直升机 2000 架。其中三种武器正规部队的限额是：各方作战坦克 16500 辆，火炮 17000 门，装甲车 27300 辆；制定了任何一个缔约国拥有上述 5 种军备的限额均不得超过该集团此种武器总限额的三分之二；规定了中欧区、中欧扩大区、欧洲侧翼区、大西洋—乌拉尔区 4 个裁减区域正规部队军备的限额；规定了监督检查和削减销毁的办法等。条约规定削减分三个阶段进行，不迟于条约生效后 40 个月完成，即第一阶段（条约生效后 16 个月内）削减应削减总数的 25%；第二阶段（条约生效后 28 个月内）削减应削减总数的 60%；第三阶段（条约生效后的 40 个月内）完成全部削减工作。

《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签署是美苏及东西方裁军谈判史上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反映了美苏各自的战略需要。对于苏联来说，庞大的常规军备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包袱，常规军费占整个军事开支的 80% 左右，要削减军费主要是常规裁军。而且，苏联的常规力量在西方看来是一个主要威胁，通过裁军有助于苏联维持和发展同西方的关系，促进缓和的发展。对美国来说，因美国花在欧洲的军费占其全部军费开支的 60%，因而希望通过欧洲裁军减轻财政困难，同时在政治上有利于搞好与欧洲盟国的关系，也有利于缓和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以便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对西欧来说，削减在欧洲的军事对抗水平，消除苏联的常规力量优势，符合欧洲的安全利益。

当然，这一条约之所以能签署，主要还是苏联作出重大妥协和让步的结果。根据条约规定，苏联和华约应削减的武器和技术兵器数倍于美国和北约，在所要裁减的 5 种武器中，按集团最高限额规定，北约总共只削减 5%，而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则要分别削减 26% 和 41%，为北约削减的 5~8 倍。削减任务完成后，苏联和华约在中欧的常规力量优势丧失，使苏联对北约发动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大大降低，实现了北约多年的愿望。

这一条约的签署虽对美苏关系的缓和和欧洲局势的稳定有促进作用，但其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条约只对武器的数量进行了限制，未能对质量作出任何限制，未能对保留下来的常规武器的现代化作出任何规定，因此签约各方仍可放手继续研制、发展更先进的常规武器系统。条约也未能制定出兵员限额，两大军事集团仍保留了巨大的军事潜力。

## 五、美苏签署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尽管步子并不大，但推动了美苏的裁军势头

1991 年 7 月 31 日，美苏在莫斯科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从而使历时 9 年、经过 15 轮艰苦谈判的美苏战略武器会谈告一段落，这是继中导条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之后，美苏在裁军领域的又一重大突破。

1990 年美苏华盛顿首脑会晤期间，双方已就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主要条款取得一致，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仅剩下少量的技术和措词问题有待最后解决。双方指示各自在日内瓦的谈判小组加速工作，尽快完成条约文本的最后准备，以争取 1990 年底正式缔约。但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在处理波罗的海三国发生的骚乱等国内问题上的政策转向强硬，美苏双边关系变冷，美苏原希望 1990 年年底正式缔约未能如愿以偿，首脑会谈被迫推迟。

尽管苏联一直希望与美国早些签约，但美国一再指责苏联违背了欧洲常规裁军条约，并将苏联的违约行为与战略武器会谈联系起来，放慢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谈判的速度，使会谈陷入僵局。

1991 年 4 月 24 日，苏联中央政府与 9 个加盟共和国就联盟条约达成协议，戈尔巴乔夫取得叶利钦支持。随即，一度冷淡的美苏关系转暖，战略武器谈判出现希望。4 月 25 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宣布，他在与苏联外长当天的会谈中，双方在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解释上的一些分歧已经消除，从而为双方签订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扫清了道路。5 月 11 日，戈尔巴乔夫在与布什的电话交谈中，双方都认为，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尚存一些技术问题，“并不构成麻烦”。但此后两国谈判代表进行了艰苦的讨价还价，两国首脑也多次电话交谈、捎口信、互致信件，以及外长间的会谈，进行磋商和谈判。直到 7 月 17 日，布什和戈尔巴乔夫会晤后才宣布，两国就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剩下的技术问题最终达成一致，并商定两国首脑 1991 年 7 月底在莫斯科会晤正式签署该条约。

7 月 31 日，美苏终于签署了长达 700 多页的条约文本及相关文件，规定双方战略核武器各削减三分之一，就各方所能部署的战略核力量的数量规定了相同的最高限额，并就各方弹道导弹的总能力规定了相同的最高限额。条约规定，每方部署的战略核运载工具总数不得超过 1600 件，苏应削减 36%，美减 29%。每方部署在 1600 件战略核运载工具上的弹头总数不得超过 6000 颗，苏减 41%，美减 43%。部署在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或海射弹道导弹上的弹



头不得超过 4900 颗，苏减 48%，美减 40%。部署在 154 枚重型洲际弹道导弹上的弹头不得超过 1540 颗，苏减 50%，美国没有这种核力量。条约还规定了减少弹道导弹携带弹头的数量，对发展新型弹道导弹的限制，对重型洲际弹道导弹的限制等内容。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第一次规定双方将战略武器作较大削减。据推算，条约生效后 7 年，美苏部署的战略核运载工具将分别减少 29% 和 36%；核弹头将分别减少 43% 和 41%；弹道导弹弹头将分别减少 40% 和 48%。这对于加强美苏之间战略的稳定和相互信任，减少核战争的危险具有重要意义。

该条约的签署是美苏关系不断改善的产物，同时也有助于今后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美国总统布什在签署条约仪式上说：“在美苏关系日益友好的时候，这个条约既是因又是果。更重要的是，条约使美苏朝着驱散半个世纪以来笼罩在两国之间的不信任阴云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通过建立相互信任，我们铺平了通向和平的道路。”

戈尔巴乔夫在布什为他举行的宴会上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是推动美苏关系前进的因素。我确信，苏美做了现在可以说是最好的，而且对于今后前进来说又是必要的一件事。”

当然，该条约仍有很大的局限性。第一，美苏双方仍将继续保持庞大的核武库。条约规定，每方保持核弹头的最高限额为 6000 枚，但这种规模仍具有非凡的“超杀能力”。据美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估算，美苏各有 400 枚核弹头就足以摧毁对方。第二，条约虽对核武器质量的改进作了某些限制，但双方为今后更新核武器留了“后路”，可根据需要改进各自的核武器。华盛顿军备控制协会高级分析家洛克伍德说：“条约对武器更新几乎没有限制。双方仍然可以试验和部署隐蔽性较强、命中精度较高、杀伤力较大的导弹和飞机。”第三，条约不仅未把双方所有类型的战略武器包括在内，而且即使被列入削减范围的各个项目，除苏联的战略核武器投掷重量和 SS—18 重型导弹这两项外，其余各项的削减幅度都只有 20%~30%，远未达到双方原来所说的 50%。因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条约迈出的步子并不够大、不够快，远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水平。但是，它毕竟是美苏之间削减战略武器的重大成果，因而还是值得欢迎的。

条约签署后，美方曾暗示，美不打算短期内进一步削减战略核武器。但是在苏联“8·19”事件后，美国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在核裁军方面采取了更加大胆的行动。9 月 27 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电视讲话中提出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单方面核裁军倡议，其中包括：消除美国安置在世界各地的所有陆基短程核武器，即战术核武器，把所有核炮弹和短程弹道导弹弹头运回美国并销毁；美国所有战略轰炸机立刻脱离警戒状态；使根据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将要销毁的洲际弹道导弹脱离警戒状态；将停止“和平维持者”移动式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制工作和小型洲际弹道导弹中移动式部分的研制工作；取消目前为战略轰炸机制造一种短程核攻击导弹的代替物的计划；美苏尽快达成协议，消除两国所有多弹头洲际弹道导弹。

10 月 5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就布什的上述核裁军倡议作出正式答复，提出：苏联销毁所有核炮弹和战术导弹上的核弹头，取消各部队防空火箭上的核弹头并销毁其中一部分，销毁一切核地雷；苏联重型轰炸机不再进行战斗值班，机上核武器安放在军队仓库内；停止研制用于苏联重轰炸机上的改进型短程核导弹；苏联停止研制机动小型洲际弹道导弹；取消 503 枚洲

际弹道导弹的战斗值班，其中 134 枚是多弹头的；已经从战斗编制中撤出 3 艘核导弹潜艇，还将撤出 3 艘核导弹潜艇；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 7 年削减期满后，苏联战略核弹头的数量不是条约规定的 6000 个，而是 5000 个；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生效后，立即着手进行削减二分之一战略核武器的谈判；从 10 月 5 日起，单方面暂停核试验一年；将苏军人数减少 70 万。

美国提出的倡议和苏联的对应措施，增强了美国和苏联的裁军势头。但彼此间的戒心仍然存在。舆论认为：“虽然布什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裁军倡议在主要目标上是一致的，但他们作出的允诺分别侧重于对自己国家有利的方面。”

后来，由于苏联的解体，裁军谈判便由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与美国进行。

## 第十四章 冷战终结

苏联和东欧国家普遍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导致局势严重动荡，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竭力推波助澜，使东欧各国政权相继易帜，华约组织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最终走向解体。柏林墙倒塌后，两德加快了统一的步伐。北约在失去对手后也调整了自己的战略和任务。可以说，东欧剧变、两德统一、华约解体、北约调整战略是美苏冷战逐渐走向终结的重要标志，而苏联的解体则给冷战最终划上了句号。

### 一、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推行，使东欧各国政权相继易帜，两极格局赖以存在的一根重要支柱在东欧剧变的冲击下倒塌

东欧是指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华沙条约组织的国家。正是这些国家与苏联结成了东方集团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期对峙，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冷战。但是，随着东欧一些国家相继实行多党制和政治多元化，东欧国家政权相继易帜，从而使构成两极对抗之一的东方集团开始瓦解。

在东欧诸国中，波兰统一工人党是第一个失去国家政权的东欧政党。1988年12月和1989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届十中全会，决定继续在波兰深入政治改革，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以及有条件地承认团结工会为合法组织。此后，政府与团结工会进行谈判，并达成举行圆桌会议的具体协定。从2月6日起，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团结工会、各政党以及社会团体、教会、群众组织的57名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开始举行，至4月4日闭幕，决定团结工会合法化、增设参议院、6月举行议会选举、设立总统职位等。

在1989年6月份举行的议会选举中，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获胜并上台组阁，得到了议会中按比例分配的299席，但在完全自由选举产生的参议院中却未获一席，许多著名的波党活动家，如总理拉科夫斯基、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和中央书记巴卡等纷纷落马。这样，波党在组成新政府的过程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而团结工会除得到在议会中按比例分配的161席外，还在参议院获得了100席中的99席，取得明显优势。

7月9~11日，美国总统布什正式访问波兰，对波兰正在进行的经济和政治多元化改革深表赞赏，同意波兰延期5年偿付已到期的所欠美国的10亿美元的债务，并宣布了新的援助波兰的6点计划。美国此举极大地鼓舞了团结工会，并促使波兰政局急转直下。

7月19日，经新的议会投票，波党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以微弱多数当选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接着，议会在8月2日选举波党政治局委员基什查克为总理。但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对总理的任命表示强烈反对，随后又主张由团结工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组成新政府，并宣称“要么全部，要么全无”，拒绝与基什查克组建新的内阁。虽经激烈斗争，但基什查克不得不于8月17日宣布放弃组阁的努力。雅鲁泽尔斯基接着提名团结工会顾问马佐维那茨为总理，议会在8月24日通过。9月12日，新政府组成，在23名内阁成员中，团结工会占12席，而统一工人党仅得4席，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分别占4席和3席。这样，在东欧国家中出现了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12月29日，波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删去了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和波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条文，并将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

和国。

19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十一大”，宣布该党解散。9月，迫于国内局势的压力，原定任期6个月的雅鲁泽尔斯基总统向议会提出缩短总统任期，并提出提前选举新的总统，两天后议会就通过了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的决定。12月9日，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在第二轮选举中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波兰局势的剧变使当时的东欧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并引起了连锁反应。

匈牙利是继波兰之后第二个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家。从1989年初开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围绕1956年事件的性质及达吉的个人功过是非等问题发生分歧。2月，社会主义工人党提出了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政治主张。匈牙利准备推行多党制，得到苏共领导的支持。1989年3月，匈牙利总理内梅特在访问莫斯科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向他表示苏联对匈牙利选择多党制不会有异议。稍后，戈尔巴乔夫对来访的匈党总书记格罗斯重申了同样的保证。

5月8日，匈党中央鉴于卡达尔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卡达尔1989年7月6日去世，数十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解除了他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委员的职务，在随后6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涅尔什出任主席，而执掌实权的中央主席团则由涅尔什、内梅特、波日高依和格罗斯等4人组成，至此大权便全落入激进改革派的手中。

从6月13日起，社会主义工人党、“民主论坛”等反对派政党和各社会组织开始举行3方圆桌会议。格罗斯在会上表示，匈党将和其他政治力量一起，共同建设一个能体现人民意志的社会主义法制国家，而反对派则声称他们参加会议，并非是为了分享政权，而是让匈牙利人民通过大选来决定究竟应由哪种力量来掌握国家大权。7月，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对波兰的访问后又来到匈牙利，公开为匈牙利的改革打气，并宣布援助匈牙利的7点方案。9月18日，圆桌会议结束，达成了取消社会主义体制和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导等初步协议。

10月7日，在匈党十四大上，由波日高依等人倡导，成立了匈牙利社会党，并通过了党纲。而不同意该行动的部分党员则宣布社会主义工人党依然存在，同时，“卡达尔协会”宣布将成立匈牙利共产党。至此，匈党完全分裂。

10月18日，匈牙利国会通过宪法草案，取消了关于马列主义政党领导作用的条文，将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共和国，确定将实行“议会民主”和“多党制”，并使匈牙利同时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价值。第二天，美国官方即对匈牙利国会的决定表示欢迎，众议院通过了向匈牙利和波兰提供8.37亿美元的经济援助的法案。一位众议员毫不掩饰他说，此举是为了“在东欧推翻共产主义”。

在1990年春举行的匈牙利全国大选中，“民主论坛”获胜，社会党败北，沦为议会中的第四大党。“民主论坛”主席安托尔组成新政府，社会党无人入阁。

民主德国政治危机的一个重要起因是公民外逃。自1989年5月匈牙利开放奥匈边境后，不断有民主德国公民越过边界逃往西方。9月，匈牙利公开允许滞留在与奥地利交界地区的数千民主德国居民前往联邦德国，又有数万民主德国公民由此大批逃亡国外。就在公民外逃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于10

月6日前来参加民主德国建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用教训的口吻宣称：“真正的危险在于对生活没有反应。那些摸到生活和社会脉搏的人便不必害怕。”这番话极大地鼓舞了对政府不满的人，就在他到达的次日，莱比锡爆发了有7万余人参加的游行示威，他们一面叫喊“戈尔比！戈尔比！救救我们”的口号，一面攻击昂纳克和其他民主德国领导人。

鉴于局势越来越紧张，德党中央于10月18日宣布昂纳克辞职，政治局委员克伦茨继任总防委员会主席。克伦茨上台后，立即对反对派作出一系列让步，承认9月中旬成立的“新论坛”为合法组织，并与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柏林星期日对话”活动。11月3日，又宣布民德将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进行全面的改革。但人民的不满情绪继续增长，游行示威规模扩大，强烈要求政府下台。11月7日，民德部长会议的44名成员被迫辞职。8日，德党中央政治局18名委员也宣布集体下野，随后组成了以克伦茨为首的新的政治局，但其中的4名成员不久又被迫下台。11月9日，民德政府宣布开放东西柏林边界，10日晚拆毁柏林墙，13日又进一步开放边界，当天便有数十万人涌入西德。17日，组成了以统一社会党人莫德罗为首的联合政府，此后民德局势急转直下。

12月初，在德国统一社会党十一中全会上，克伦茨以及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总辞职。居西出任党的主席。这是1989年发生的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居西出任主席后，宣布实行党政分离，德国统一社会党更名为民主德国社会党，放弃了宪法赋予该党的对国家的领导权。在1990年春的大选中，民主德国社会党失利，为德梅齐埃上台以及为民德并入联邦德国创造了条件。

在东欧局势动荡特别是民主德国政局突变的影响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面对反对派的不断进攻，节节败退。1989年11月17日起，捷克各地相继爆发由反对派组织的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11月19日，捷克的12个反对派组织联合组成“公民论坛”，借群众运动加紧向捷共中央和政府施加压力。11月24日和26日，捷共两次召开非常中央全会，捷共领导改组，雅克什被迫辞职，由乌尔班内克出任总书记，此后局势一发不可收。乌尔班内克上台后，立即承认“公民论坛”，并允诺重新评价1968年华约出兵捷克事件。11月29日，联邦议会批准修改新宪法，取消了有关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款。在1990年6月的大选中，“公民论坛”击败捷共而上台。而在捷克局势变化过程中，捷克和斯洛伐克民族之间矛盾也不断加深。1990年3月29日，国名定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4月又改名为捷克和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

1993年1月1日，正式分裂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

1989年初，当东欧局势动荡的前兆已经显示出来时，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日夫科夫仍以十分自信的口气宣称：在保加利亚除保共，不会有什么别的执政党。但保加利亚毕竟不是在真空中，它无法长期置身于东欧事变之外，更无法摆脱苏联政局演变的影响。1989年春，保籍土耳其人大量外逃的事件使一向平静的保加利亚局势变得动荡起来。到7月初，约有10多万保籍土族人外逃，造成保加利亚东北部和东南部劳动力严重缺乏，不少工厂关门、商店停业。在这种情况下，保政府下达“和平时期动员令”，严禁保籍土族人离境。10月16日，由欧安会35个成员国参加的欧洲环境保护会议在索菲亚召开，这为保加利亚各种反对派力量提供了一个活动的机会，一些反

对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开始组织抗政府活动，但没有酿成严重危机。

然而，在 11 月 10 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上却发生了意外的人事变动，日夫科夫被解除总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会的职务，长期担任外长的姆拉德诺夫出任总书记一职，后又出任国务委员会主席。10 月 7 日，10 个反对派组织联合建立“民主力量联盟”，不断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向保共中央施压。面对反对派的攻势，保共中央开始让步。1990 年 1 月，保国民议会作出关于在宪法中取消共产党领导作用条文的决定，保共十四大虽仍保留了党的名称，但却放弃了多年坚持的一些马列主义的原则。4 月 3 日，保共领导又决定将党更名为社会党。在 6 月举行的大选中，“民主力量联盟”主席热列夫当选为总统。不久，社会党也失去了对政府的领导，保加利亚政权彻底易帜。

罗马尼亚西部城市蒂米什瓦拉市于 1989 年 12 月 16 日爆发了反政府的大游行。政府在出动军队后才控制住局势。西方国家对此事大肆渲染，法国《解放报》称在冲突中共有 4000 余人丧生，意在激化矛盾，挑起更大的事端，但事后调查证实死亡 97 人。罗共总书记齐奥塞斯库对这一事态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仍按计划于 18 日出访伊朗。20 日，蒂市又爆发大规模的骚乱和冲突，并迅速波及全国。21 日中午，匆匆赶回国的齐奥塞斯库在首都群众大会上号召全国人民保持镇静，共同平叛。但当天下午，布加勒斯特市内发生严重骚乱，次日军队倒戈与保安部队发生激战，齐奥塞斯库见局势难以控制，携妻子乘直升飞机外逃。22 日晚，前罗共中央书记伊利埃斯库宣布成立由 39 人组成的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全部政权，立即受到西方各国及苏联的欢迎。25 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秘密处决。1990 年罗马尼亚虽有多种反对势力在活动，而且西方大国对罗马尼亚剧变后的政治格局并不满意，但救国阵线委员会基本上控制了全国的局势。在 5 月举行的大选中，伊利埃斯库当选为总统，救国阵线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占有优势，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罗马尼亚局势保持了相对稳定。

阿尔巴尼亚原为华约国家，由于经济状况不断恶化，加上受东欧剧变的影响，政局也出现严重动荡，其政权于 1991 年 3 月落入民主党手中，该国政权从共产党手中丢失。

南斯拉夫作为东欧一个长期保持政治独立的国家，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并未受戈尔巴乔夫改革和周边国家局势变化的影响。直到 1989 年底，南共联盟领导才宣布在国内实行多党制，此后各种政党像雨后春笋般出现，政局开始动荡。自 1990 年 4 月至 12 月，南斯拉夫的 6 个共和国先后举行议会选举，结果除塞尔维亚社会党（前南共联盟）和黑山南共联盟在两共和国取胜外，其他 4 个共和国的议会多数均为民族主义政党获得。随着克罗地亚共和国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宣布独立，南斯拉夫局势急剧动荡，并引发了大规模的内战，内战又导致了南斯拉夫的最终解体。

东欧国家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发生了惊人的突变：共产党和工人党先后成了在野党；社会主义的旗帜被抛弃；民主德国随两德的统一从政治版图上消失……由于社会主义东欧的剧变，动摇了华约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在这种背景下，苏联在东欧有关国家的要求下，不得不宣布从东欧撤军。

## 二、柏林墙的倒塌为两德统一打开了大门，而两德统一标志着战后欧洲

以德国分裂为基础、苏美分治的“雅尔塔格局”的解体

德国统一问题历来是牵动欧洲全局的十分敏感的问题。由于德国在 20

世纪的头 50 年内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和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所以，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些反法西斯的主要国家就开始酝酿如何处置德国，不给它东山再起的机会。在 1943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2 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以及 1945 年 2 月 4 日至 12 日雅尔塔会议上，一致决定分割德国，不允许它再次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战后，由于苏美关系迅速恶化，他们都把分割德国作为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德国一步一步走向分裂。1949 年 5 月 23 日和 5 月 30 日，西方国家占领区和苏占区先后公布宪法，9 月 20 日和 10 月 7 日分别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德国最终分裂成两个国家。

根据波茨坦协议，美、苏等国对恢复德国统一负有责任，但围绕德国统一问题展开了尖锐复杂的斗争。美、英、法三国曾多次提出通过在国际监督下举行全德自由选举实现德国统一；而苏联多次提出先由两个德国平等协商，成立全国临时政府，尔后举行全德选举。双方虽都按自己的意图提出统一德国的建议，但他们实际上都反对德国统一。特别是 1955 年西德、民德分别加入北约、华约两大对立军事集团后，美、英、法和苏联四国更认为德国统一问题遥遥无期。随着东西方冷战的加剧和两德经济差距的扩大，东德从 60 年代起逐渐放弃统一旗帜，从 1961 年 8 月 13 日起在东、西柏林间筑起一道高墙并全面封锁两德边界，断绝两德来往。西德一贯坚持统一目标，但在 60 年代以前认为自己是德国人的“唯一合法代表”，拒不承认东德。自 1969 年勃兰特上台后虽认为两德不互为外国，但承认东德是“拥有同等主权的国家”，逐步扩大两德人员往来和发展经济、贸易、科技、文化等。

80 年代后期，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局势相继发生变化，东德也受到很大冲击。1989 年 10 月 7 日，东德庆祝建国 40 周年时，几乎在东德各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打出了要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口号。10 月 18 日，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因健康原因”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克伦茨当选为第一书记。11 月 9 日，东德在逃往西德的人越来越多，国家面临大动乱的情况下，被迫宣布开放柏林墙和西德的边界，允许东德人只凭身分证即可前往西柏林和西德。

11 月 28 日，西德总统科尔趁势提出统一德国的 10 点计划。但民德领导人强调该计划“不符合现实”，无视“两个德国的主权和独立性”，统一问题“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民德公民中当时赞成统一与反对统一的人数也不相上下。美、英、法、苏四大国和其他西欧国家也大多认为德国统一“为时尚早”。但由于东德的经济、社会形势不断恶化，群众和一些新成立的党派要求统一的呼声很高，东德总理莫德罗在 1990 年 1 月 30 日访苏时，戈尔巴乔夫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来了个急转弯。他对莫德罗说：“德国统一问题并非出乎意料，德国统一是毫无疑问的。”这实际上为德国统一开了绿灯。莫德罗回国后，于 2 月 1 日提出统一德国的四阶段方案。该计划未提保持民德的“主权”和“独立”等问题，明确主张先与西德组成条约共同体，尔后建立各自拥有一定主权的邦联，再向邦联机构移交权力，最后举行全德选举，成立一个政府，首都设在柏林。从最终目标和主要步骤来看，这个计划与科尔计划没有太大的区别。在方案提出的第二天，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宣称莫德罗提出的统一构想是“从现实出发的”，苏联赞同其中的许多方面。这反映出苏联和民德已由坚持反对统一转而积极支持统一。

2 月 10 日，戈尔巴乔夫同科尔在莫斯科单独会谈时，以明确的语言表示

赞同德国统一。塔斯社在报道时强调：“戈尔巴乔夫指出，现在在苏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对下述问题不存在分歧，即必须由德国人自己解决德意志民族的统一问题，由他们选择以什么样的国家形式、在什么样的期限、以何种速度以及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实现这种统一。”科尔当天在记者招待会上十分高兴地宣称：这是他此次访苏的“历史性成果”。2月13日，科尔在波恩又公开对戈尔巴乔夫“最终打开了走向德国统一的道路”表示“感激”。15日，科尔又发表讲话：“我们感谢戈尔巴乔夫总书记，他以及他的国家的深刻改革使苏联的对外政策有了新的方向、新的活力和新的思维，现在这种新的思维也在改变着苏联的德国政策。美国总统布什也高度评价戈尔巴乔夫同科尔的会谈表现出了“真正的灵活性”。

2月13日，美、苏、英、法四大国外长和两德外长利用出席渥太华北约和华约“开放天空”会议的机会，共同制定了“2+4”方案，即先由两德解决内部统一问题，再由两德同四大国一起解决外部问题。这表明四大国均认可“德国人有权统一”，“德国的命运首先由德国人自己决定”。

3月18日是民主德国举行大选的日子。对于这次大选，西德十分重视，科尔总理希望通过这次选举能在东德产生一个“民主、合法的有行动能力”的新政府，尽快推动德国统一。为了对民德施加影响，科尔于2月7日宣布成立自任主席的“德国统一内阁委员会”，由外交、经济、财政、司法、农业以及劳动和社会等部的部长任委员，加强对统一问题的研究、部署和领导，同时动员全国各行各业同东德建立对口合作，加强统一攻势。在东德竞选期间，科尔在一个半月内6次到东德参加主张尽快统一的基民盟的竞选大会并发表演讲，直接为基民盟拉选票。

民德的这次选举，共有24个党派参加竞选，投票的选民近1200万，占全国选民资格人数的93.2%。选举结果，基民盟以得票40.8%获胜，而获胜呼声很高，主张分阶段逐步实现统一的东德社会党失败，只得票21.8%；民社党得票16.3%。就在选举结果公布后的第三天，基民盟主席德梅齐埃、德国社会联盟主席贝林和民主觉醒党主席埃佩尔曼三人联袂前往波恩，同西德总理科尔商谈组阁和德国统一问题。

4月12日，民德新政府宣誓就职。它是由基民盟、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联盟、德社盟和民主觉醒等5党组成的大联合政府，基民盟主席洛塔尔·德梅齐埃出任总理。新政府成立后，立即拉开了两德之间一系列部长级会晤的序幕。4月18日，两德的内政部长首先在波恩讨论内部安全问题，商定加强两个部门协调合作和人员交流。紧接着，双方的财政部长、劳工部长、农业部长、交通部长、邮电部长、环境部长和发展援助部长等分别会晤，大大促进了两德经济、货币和社会联盟的建立，使德国统一进入了实质性的具体落实阶段。

4月24日，两德总理科尔和德梅齐埃在波恩首次会晤，就当年7月1日实现两德货币联盟达成谅解。西德政府满足了民德提出的工资按1:1汇率兑换的要求，对领取养老金者也提出了民德认可的解决办法，在以1:1汇率兑换存款的数量上双方作了妥协。

5月5日，两德和苏美英法四大国外长在波恩举行首次“2+4”会议，讨论德国统一问题。会议虽然只举行了一天，而且主要是各方阐述各自的观点和讨论以后会议的程序问题，但它的目标是要取消战后以来四大国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因此被认为标志着德国问题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四大国



再次确认了德国人有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进一步为德国统一开了绿灯。为此科尔总理高兴他说：“对实现全体德国人的自决权来说，再也不存在什么障碍了。”会议提出了一个基本上与两德“内部”统一速度大体相适应的解决“外部”问题的时间表。据西德外长根舍宣布，下一轮会谈将于6月上旬在民德首都柏林举行，主要讨论在欧洲建立“恰当的安全结构的办法”。第三轮会谈定于7月下半月在巴黎举行，议题是解决边界问题，并决定邀请波兰与会。拟于9月初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轮会谈主要议题是柏林地位以及在柏林驻军问题。此后还将在华盛顿和伦敦举行会谈，初步预计整个“2+4”会谈11月份结束。由于两德“内部”统一的迅速推进，在解决与统一有关的“外部”问题上，两德越来越接近为一体，从而使“2+4”会谈实际上变成“4+1”，即以两德和西方三大国为一方与苏联为另一方的会谈。这种谈判地位显然对苏联不利。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谈判，两德于5月12日就建立“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一揽子条款达成协议，形成第一个“国家条约”。条约明确规定，从7月1日起统一两德货币，东德人的工资、养老金、奖学金、租金等反复支付的费用及部分存款按1比1发放西德马克，其余一律按2比1折算，西德的联邦银行同量取代东德中央银行，主管两德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在东德全面开始实行西德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奉行私有化、自由竞争及商品、劳力、劳务和资金自由流通原则，直接引进西德的主要经济法规；按西德模式在东德建立独立于国家财政的社会保障制，实行养老、失业、医疗、工伤事故等四大保险。5月18日，在波恩总理府绍姆堡宫的原阿登纳办公室，西德财政部长魏格尔和民德财政部长龙贝格正式签署了该“国家条约”。科尔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个条约的签字之日也就是“一个自由、统一的德国诞生之时”。德梅齐埃称，条约的签署使两德统一的进程不可逆转。该条约的签署和生效（7月1日）标志着东德从此放弃国家经济和财政主权，为完成两德统一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7月6日，两德开始就实现政治统一的第二个国家条约即统一条约进行谈判。8月23日凌晨，东德人民议院经过通宵辩论最后作出10月3日加入西德的决议，这对统一条约的谈判成功和签署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德国统一的内部进程，带动了有关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的解决。从1989年12月至1990年10月初，西德领导人同四大国特别是美、苏领导人多次接触。在这些会晤、会谈中，西德保证将坚定地留在北约和忠于德美联盟，取得美对两德统一的充分支持和推动；强调德国不会走特殊道路，减轻西欧国家对两德统一的疑虑和不安；针对苏联因担心失去东德后自己的安全得不到保障而坚决反对德国统一后加入北约的态度以及苏在经济、财政上的需要，西德果断决定大幅度限制德国的武装力量，答应推动北约改变战略和结构，向苏提供120亿马克的无偿援助和总计近100亿马克的无息或低息贷款等，促使苏在7月15日和16日科尔访苏时同意德国统一后“自由决定其联盟归属”。

1990年9月12日，两德与四大国外长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最后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条约规定，赞同统一后的德国享有对内对外的全部主权，有权自由决定其联盟归属问题；鉴于欧洲国家和人民对德国统一的疑虑和不安，两德保证今后走和平发展道路，将在三四年内把德国的武装力量裁减45%，减至37万人，不拥有核、生、化武器，制止纳粹势力抬头；统一后的德国只包括目前边界以内的两个德国和整个柏林，确认奥得—尼斯河为波兰西

部边界，德国人现在和将来不得对其他国家提出任何领土要求；驻扎在东德地区的苏军在 1994 年年底前全部撤离，在此期间归属北约指挥的德国部队不得进驻该地区，之后可以进驻，但不得携带核武器和核运载工具，其他国家的军队任何时候都不得进驻东德地区，美、英、法驻柏林（西）的部队的数量和装备在 1994 年年底之前不得超过现有水平。10 月 1 日，四大国外长在纽约发表联合宣言，宣布从 10 月 3 日两德统一之日起终止四大国对德国的权利和责任，让统一后的德国获得主权。

12 月 2 日，德国举行统一后的首次全德大选，以科尔总理和根舍外长为首的联盟党和自民党获胜。统一后的德国面积 35.7 万平方公里，人口 7850 万，成了除苏联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

从 1989 年柏林墙开放和 1989 年 11 月 28 日科尔提出统一德国的 10 点计划，到 1990 年 10 月 3 日民德加入联邦德国实现统一，仅仅一年时间。两德之所以迅速实现统一，其根本原因在于德意志人民在雅尔塔体制下经受了近半个世纪的民族分裂后，怀有强烈的统一国家的愿望。其次是德国东西部经济差距增大，促使原民德人民产生了通过统一改善经济和生活现状的强烈期望。另外，科尔政府抓住时机积极推动也是德国快速实现统一的重要原因。从外部条件来说，四大国特别是美苏政策的调整也是两德统一不可缺少的因素。布什政府在马耳他会晤时还主张德国统一进程不能加快，但到 1990 年初美就明确支持统一，并要求统一后的德国固定在北约内，这是美国维持北约，从而维持美在欧洲地位的最好途径。戈尔巴乔夫从 1990 年 2 月坚决反对两德统一转而支持两德统一，此后在德国联盟归属等问题上做了让步，基本上按西方的条件解决了德国统一的外部问题。德国《欧洲文献》主编蒂斯在评论苏联的政策时写道：“苏联玩弄德国牌已晚，而且苏联受短期考虑的重大影响，促使苏联具有妥协的愿望。”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指出：“苏联改革的基本目标是缩小苏联和欧洲的差距。莫斯科领导人很清楚，没有德国的相称的援助，苏联改革不会成功，苏联领导人也明白德国的分裂不符合苏联这一根本利益，相反还构成障碍，所以苏联推动了德国的统一。”而德国的统一又打断了雅尔塔体制的中心环节，促进了美苏两极格局的解体。

### 三、东欧剧变，使华约走到了“路的尽头”。这个与北约对峙几十年的强大军事集团“不战”而散

1991 年 2 月 25 日，华沙条约组织政治协商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在布达佩斯开会。根据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前些时候提出的建议和各成员国预先磋商的意见，会议通过一项议定书宣布，从 1991 年 3 月 31 日起终止在华约范围内签订的军事协定的效力，解散华约所有的军事机构，同时停止一切军事行动。4 月 1 日华约军事组织最终解体，接着，华约联合武装部队司令卢舍夫下令解散联合司令部、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华约作为军事集团的历史至此正式宣告结束。

华约的解体是国际形势发展特别是 80 年代后期东欧剧变的结果。华约原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苏联、匈牙利 8 国组成。1968 年 9 月 13 日，阿尔巴尼亚宣布退出该组织，民德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德国统一后退出华约。80 年代后期，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华约开始谋求与北约共同裁军。1986 年 6 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表了公报和《呼吁书》，首次建议北约和华约至 90

年代初在从乌拉尔到大西洋的整个地区裁减常规力量 50 万人，即各裁减 25 %。

1987 年 5 月，华约 7 国首脑在柏林首次发表《关于华约缔约国军事理论》文件，强调华约国只要求足够防御实力，奉行防御战略。

1988 年 7 月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华沙举行会议，发表关于减少欧洲武装力量和常规武器谈判的声明和公报，呼吁北约国家在当年就削减欧洲武装力量问题开始谈判。10 月，华约外长委员会举行会议，发表了“关于加强欧洲信任与安全措施和裁军措施”的声明，首次提出召开一次包括所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参加的各国首脑会议，共同讨论削减欧洲常规武器和部队规模问题。

1988 年 12 月，戈尔巴乔夫在联大讲话时宣布，苏联决定在两年内单方面裁军 50 万，将在 1991 年前从东欧国家撤出 6 个坦克师并拆除相应的军事设施。接着，匈牙利、波兰、民德、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5 国相继宣布单方面裁军，裁军幅度从 5% 至 17%，而罗马尼亚早在 1986 年就单方面宣布裁军 5%。

1989 年 7 月 7~8 日，华约 7 国首脑在布加勒斯特举行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发表了《争取稳定、安全和无核、无化学武器的欧洲》的声明和会议公报。会议决定部分地改组华约领导体制，增设秘书长，协调华约的政治外交行动。12 月 4 日，华约 7 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听取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通报马耳他会晤情况。参加会晤的波兰、匈牙利、民德、保加利亚、苏联 5 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宣布 5 国“1968 年 8 月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的干涉，应予谴责”。同时，苏联政府还就这一问题发表单独声明，承认当时作出出兵的决定是“错误的”。

1990 年 2~3 月间，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两国签署了撤军协议，规定到 1991 年 7 月 1 日前苏应从捷克、匈牙利领土上撤出它的全部驻军。3 月，华约 7 国外长在布拉格举行会议，这是东欧各国政局发生剧变后召开的首次华约外长会议。会议讨论了德国统一、欧洲安全和波兰西部边界等问题，认为两个德国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统一，但各国对两德统一的方式，统一后德国的归属等问题的看法有较大分歧；支持波兰提出的关于确认和尊重波兰西部边界的建议等。这次会议还认为，在东欧局势发生剧变的形势下，华约和北约两个军事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存在是必要的。

但是，随着东欧形势的突变，华约组织赖以存在的共同战略基础发生动摇。华约作为冷战时期集团对抗的产物，其成员国一直奉行联合对抗北约的共同军事战略。1990 年东欧国家纷纷举行多党制大选后，新上台的当权派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各自的国情调整了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如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军事上已不再以西方和北约假想敌，将其军队职能明确限于保卫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范围内，并开始改革其兵力部署原则和调整军事部署。罗马尼亚将军事战略定义为“全民防御”战略，波兰则确定了“全方位防御”战略。这些国家的军事战略调整表明华约的共同战略基础已被各国所摒弃。而且，随着两德的统一，苏联从东欧撤军，华约联合武装部队处于解体状态，而且东欧各国收回对本国军队的指挥权，其军队不再服从华约联合武装部队司令部的统一指挥和调遣，不再参加华约的联合军事演习。作为华约最高决策机构的政治协商委员会和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国防部长委员会等主要机构，由于东欧各国政权的易手而使各国在华约内部在很多重大问题上难以取

得一致或作出决策，主要机构已很难发挥作用。由于形势的发展变化，华约成员国普遍要求尽快解散华约。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早于 1990 年 6 月提出要退出华约，后来他们虽表示暂留在华约。但不再参加华约军事组织。波兰起初欲借助华约对付统一后的德国对它的威胁，但在德国确认德波现有边界后，波兰立即转而要求解散华约军事机构。

1990 年 6 月 7 日，华约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主要讨论了华约的前途问题。会议发表的一项声明说：“与会国认为需要重新考虑华约的性质和职能，主张建立新的全欧安全体系和建立和平与合作的统一的欧洲。”会议决定成立政府全权代表临时委员会，它的任务是向政治协商委员会提出改造华约的具体建议。9 月 25 日，民主德国退出华约组织议定书签字仪式在柏林举行。10 月 3 日，德国统一，民德正式退出华约。

10 月 24~26 日，苏联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访问北约总部，他是第一位访问北约总部的苏最高军事领导人。他在同北约军方人士会谈时说，华约已不再是一个军事组织，并宣布已从捷、匈撤出了所有核武器，同时大幅度削减了部署在原民德地区的核力量。

11 月 13 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会见来访的北约最高军事领导人维格莱克·艾德将军和约翰逊·高尔文将军，双方强调应发展北约和华约之间的伙伴和信任关系。11 月 19 日，北约和华约的 22 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巴黎签署了《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并发表《22 国联合声明》，宣布冷战结束，两组织不再是敌人，它们将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1991 年 1 月苏联向波罗的海沿岸加盟共和国派兵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三国进一步要求苏联尽快解散华约所有军事机构。三国首脑还于 2 月 15 日在匈牙利首都协调立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态度也由主张华约自行消亡到先解散其军事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华约组织特别是军事组织实际上已无法维系，解体势在必行。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主动建议召开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特别会议讨论解散华约军事机构问题。1991 年 2 月 25 日，政治协商委员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波兰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以及华约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卢舍夫大将，参谋长洛博夫大将。会议一致通过关于从 1991 年 3 月 31 日起终止在华沙条约范围内签订的军事协定的效力和取消华约条约范围内的军事机构和结构的议定书。会议还通过了华沙条约缔约国的声明。声明说，考虑到欧洲发生的深刻变化，为了实施政治协商委员会 1990 年 6 月 7 日莫斯科会议的决议，华沙条约缔约国作为主权平等的国家，决定在 1991 年 3 月 31 日以前取消华约组织的军事机构和结构。这将本着欧安会巴黎最高级会晤所达成的协议精神，进一步降低欧洲军事潜力，并从集团安全结构过渡到全欧安全结构。

3 月 31 日，华约联合武装力量参谋长洛博夫对记者发表谈话，希望各成员国继续以新的形式进行合作，以便进一步发展睦邻关系。他说：“华约军事机构的解散，绝不意味着我们不再是伙伴了。希望我们的关系将首先在双边基础上，其中包括在安全和军事技术合作问题上得到发展。东西方之间军事对抗水平的降低，才使华约缔约国作出这项决定成为可能。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出现了着手建立全欧安全模式、拟定出彻底走上非集团结构的途径的可能性，从而也就开辟了把军事政治同盟彻底改造成政治同盟，以致完全取

消集团的前景。”

华约军事组织的解散，必然严重影响到它的政治组织。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华约国家也普遍认为政治组织已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它快走到“路的尽头了”。1991年7月1日，华约政治协商委员会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首脑级会议，会议签署了解散华约组织的议定书，并通过了一项联合公报。议定书说，作为华约缔约国，注意到欧洲发生的、意味着结束欧洲的对抗和分裂的深刻变化，考虑到新的局势，打算积极发展在双边基础和多边基础上的彼此间关系，决定促进向全欧安全结构逐步过渡，根据1990年11月欧安会巴黎最高级会晤的协议，达成下述协议：1955年5月14日在华约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1985年4月26日在华沙签署的关于延长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效力的议定书，在本议定书生效之日起停止其效力；本议定书各方声明，它们彼此之间没有同华沙条约有关的任何财产要求。

华约解体，导致了支撑两极格局的一根支柱的倾倒，它是美苏冷战终结的一个重要标志。

#### 四、华约没有了，北约成了“无对手的拳击家”。然而，作为冷战产物的北约仍要寻找存在的理由

华约的解体对北约产生了重大战略冲击。北约和华约都是欧洲冷战时期的产物，两大军事集团长期以来都以互为对手而存在，它们既相互对抗，又相互依存。华约组织的解体使北约失去了对手，成为一个“无对手的拳击家”，自然影响到是否有必要存在的问题，甚至有人提出应以新的安全体系如欧安会来取代北约。

早在1990年7月5日和6日，北约首脑会议根据形势的急剧变化，调整了该组织的对苏战略。会议通过的伦敦宣言反映了北约成立以来所发生的最为深刻的变化。伦敦宣言的主要内容是：第一，建议华约国家与北约国家发表联合声明，宣告不再互为敌手，相互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北约将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武力”；建议华约国家与北约国家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邀请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东欧国家领导人到北约理事会发表讲话。第二，北约的“前沿防御”战略将由“缩小编制的前沿存在”政策所取代，减少对核武器的依赖，使之成为“最后的作战手段”。第三，建议在年底举行的欧安会首脑会议上签署第一个欧洲常规裁军协定，届时将对统一后的德国的兵力加以适当限制。在苏联采取对等行动的条件下，北约将从欧洲消除全部核大炮。第四，建议至少每年举行一次欧安会成员国首脑会晤或部长级会议，建立欧安会秘书处、监督选举机制、防止冲突中心以及议会代表机构等。

12月6~7日和17~18日，北约16国国防部长和外长相继举行会议，深入讨论了北约军事战略调整和职能转换等问题。外长会议发表的公报表示：北约作为西方集体安全的保障机制必须继续存在，并可发挥某种政治作用；安全与稳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单凭军事手段获得，因此，将继续加强联盟的政治分量；为维护和平，北约必须在可预见的将来保留适合自身安全需要的最低限度的核力量和常规力量；美国应积极参与欧洲的政治和继续保持其在欧洲的军事存在。

1991年1月4日，北文曲洋议员大会年会在伦敦举行。除北约组织成员国外，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的代表团也应邀参加

了会议。这次会议就北约的前途展开了辩论，共有三种意见：一是北约组织由于对手消失也就没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二是由欧安会接替北约的责任；三是北约组织不但不能解散和削弱，而且要变得更加灵活，更加政治化。

大部分与会者支持第三种意见，主要理由是：第一，苏联仍是一个核大国，具有超过北约组织的常规兵力；第二，只有北约组织有能力在现场核查裁减武器的进程；第三，西欧仍需要一体化的防御体系，而欧安会不可能承担这一任务。

2月7日，北约组织成员国大使秘密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重点研究在苏联军事威胁减退的形势下，北约应在多大程度上介入像海湾战争一类的局部战争。北约成员国普遍认为，需要把北约作为对付苏联及东欧不稳定的军事组织，北约的军事力量应减少规模，增加灵活性，并能处理任何方面对北约成员国领土的威胁。

4月11~12日，北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通过了建立一支新的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并提交5月底召开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审议。计划规定，北约应有三种主要的军事力量：主要的防御部队；反应部队；增援部队。其中反应部队包括立即反应部队和快速反应部队，前者可在一周之内调往受威胁的地区，后者可以晚一点调动。反应部队的建制可以大到军的建制，一个军可包括2~5个师，1个师通常有1.5万名官兵。

5月28、29日，北约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这次会议着重研究了新的国际形势和北约组织调整军事部署问题。会议认为，欧洲和北约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但由于苏联仍然保持强大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苏东地区局势还很不稳定，再加上世界其他地区的各种“危险”，北约依然面临着危险和威胁。因此，北约需要保持可靠的威慑力量和有效的共同防务，以对付“对盟国领土构成的任何威胁”。为此，北约正在改变集体防务的安排，即将完成制定新战略的工作，为重新形成北约组织核力量和常规力量态势提供牢固的基础。

9月12日，北约成员国高级官员研究制定冷战后新战略的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据报道，在苏联“8·19”事件后，北约成员国在制定新战略方面存在较大分歧。美国主张只对规定北约今后的政治和军事目标的政策文件作些“微调”。而法国、德国主张作大的修改，德国还希望删去文件中指明“苏联是西方头号军事威胁”的那一部分。这次讨论的结果将提交11月北约首脑会议审议。

11月7~8日，北约组织首脑会议在罗马举行。会议一开始，由于法国等欧共体一些国家主张建立欧洲独立防务，引起美国与欧洲国家的激烈争论。法国总统密特朗宣称：“法国仍厕身于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之外，北约联盟并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可惹恼了美国总统布什。布什在听到密特朗的发言后，在他已经准备好的发言外说了一席话。他说：“美国不会因为不可能而放弃它在欧洲的责任、利益及地位。如果你们的最终目标是独立建立自己的防御能力，那么今天该是讲出来的时候了！”“我们认为，不可能有别的组织能取代联盟为我们的防御和欧洲的安全提供保护。”

这次首脑会议最后通过了两个重要文件：《罗马和平与合作宣言》和《联盟新战略概念》。这次首脑会议还就苏联局势发表声明，“热烈欢迎”苏联及各共和国之间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性事件，并准备根据以下原则同苏联和各共和国建立关系：第一，苏联各族人民要通过和平与民主的手段决定它们

未来的关系，各级当局“应当尊重国际准则和国际义务”，“必须保障人权，包括充分尊重个人和保护属于少数派的个人权利”。第二，苏联和各共和国采取一切必须行动确保苏联所签署的国际协议，尤其是减少战略武器条约、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防止核扩散条约、生物武器公约受到尊重、批准和实施；第三，伴随政治变化的应是“经济自由和建立市场经济”，北约成员国“随时准备支援”各共和国实行“朝向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并将向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支援”；第四，希望苏联和各共和国的领导人与当局表明，对这个声明中所重申的价值观念和原则的“承诺”。但是，法国总统密特朗不同意发表上述声明，认为这是一份“令人吃惊、从天而降的文件”，其中大部分不属于北约的权限。他指出：“我们不是联盟以外国家的总督或教师。我们没有一项福音主义的使命。”

北约军事战略的根本变化是战略指导思想和战略目标的变化，即从以前对付苏联、华约发动突然袭击的大战为主，转变为应付来自多方面的危机为主；原来重点准备欧洲大战，现侧重准备应付局部冲突；作战思想从“前沿防御”变为“机动防御”。防务重点由中欧地区为主改为谋求具有“从北极到地中海”全方位应付危机的能力，比以前更重视南北两翼，尤其是南翼地区；在军事部署上由前沿部署转为保持“前沿军事存在”等。这次军事战略调整，既是对欧洲形势发展变化的一种反映，也是受美国军事战略调整的影响。1991年初，布什政府拟定了美国新的军事战略，将防务重点从对付苏联的全球挑战转向针对地区性局部冲突。北约新战略基本上反映了布什政府军事战略的基本思想。

12月12~13日，北约组织国防部长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对正在解体的苏联可能出现未来的权力斗争表示关注，对苏联军队和巨大的核武库今后如何控制表示担心。美国建议北约国防部长应同前华约国的国防部长举行会议，帮助改编前华约国所属的军队，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国的赞同。会议拟定了精简北约军事机构的方案，同意拟定北约在成员国以外军事行动的“全面应急计划”等。

12月20日，北大西洋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布鲁塞尔举行。与会者有北约组织16国外长和俄罗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等东欧9国外长或代表。这次会议是根据11月北约首脑会议的决定，为使北约组织与前华约组织成员国的接触制度化而举行的。会议发表的宣言强调，合作委员会将力图使北约组织和东欧国家之间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并力图建立一种“欧洲持久的和平新秩序”。

在华约瓦解之后，北约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进一步反映了两极格局的终结。

## 五、苏联的解体，标志着美苏冷战终于划上了句号

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以及“新思维”，不仅促使东欧发生剧变，而且使苏联局势也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决定修改宪法第六条，苏联由一党制国家转变为多党制国家得到法律的确认；确立了总统制，选举戈尔巴乔夫为总统，国家权力中心正式从苏共中央政治局转移到总统和总统委员会手中。苏联的经济改革方针紊乱，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出现战后首次负增长，人民生活状况急剧恶

化。更为严重的是，继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后，俄罗斯和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也发表“主权宣言”，把本国法律置于苏联宪法之上，动摇了苏联社会主义联盟的根基。

1990年年底召开的第四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采取了取消向最高苏维埃负责的部长会议，提交全民公决；决定加速“主权苏维埃共和国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等措施，力求稳定局势。但波罗的海三国拒绝参加条约的制定工作；有些共和国表示不准备在新联盟条约上签字。

1991年3月初，苏联联邦委员会公布了根据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彻底地实行联邦制”、建立“真正的主权国家联盟”的原则制订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新条约草案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规定每一签约国都是主权国家，在各自领土上拥有全部国家权力，但共和国的行为不能损害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利益和联盟的整体利益。联盟拥有国防、外交、预算等权力。由于该草案综合了白俄罗斯、哈萨克斯等国起草的7份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其基本精神得到了大多数加盟共和国的认同。3月17日，尽管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6国当局抵制在境内的投票活动，但全民公决还是在全苏如期举行。共有80%拥有投票权的选民参加了投票，其中76.4%的多数赞成保留联盟，维护苏联统一。

但是反对联盟的势力也在发展。2月9日，立陶宛举行全民公决，90%的公民赞成独立；3月3日，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分别举行全民投票，70%以上的公民赞成独立。4月9日，格鲁吉亚发表独立声明。还有近10个自治单位相继自行宣布升格为加盟共和国。反对派还以鼓动罢工、组织游行集会为手段，对政府施加压力。

鉴于危机日益加深，苏联议会于4月23日以压倒多数通过苏联内阁提交的《反危机纲领》的基本原则，议会责成政府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纲领进行必要的修改，同时要求苏联总统和政府立即着手实施。5月15日，苏联内阁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反危机纲领》草案。与会者尽管有分歧，但多数赞成纲领基本方针，同意进入实施阶段。

然而，就在苏联议会通过《反危机纲领》的同时，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却与9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在新奥加廖沃城会晤后发表了另一个调子的联合声明，即“9+1声明”。声明同意在新联盟条约中大大削弱中央权限，决定让立陶宛、拉脱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摩尔多瓦、爱沙尼亚6个共和国“有权独立解决加入联盟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允许他们独立，声明还规定，新联盟条约签署后，应通过新的苏联宪法，然后举行联盟政权新机构的选举；取消原国名中的“社会主义”一词等。这项声明，实际上是戈尔巴乔夫撇开苏联最高立法权力机构的决定和大多数苏联公民在全民公决所表达的民意，对叶利钦等领导人妥协让步的结果。这项声明发表后，尽管苏联国内局势表面上比较平静，但联盟却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危机。

6月12日，叶利钦在首届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当选为俄罗斯总统。接着，“激进派”人物波波夫和索布恰克分别当选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现称圣彼得堡）两市市长，反对派实力大大增强。7月20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发布了意在排挤苏共的在俄罗斯国家机关实行非党化的命令。身为苏联总统和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虽对此不满，但考虑到与叶利钦的合作关系，并未采取实际措施消除该命令所产生的后果。

苏联局势的动荡和经济危机的加深，严重影响到戈尔巴乔夫的声誉和威



信。为了缓解危机、戈尔巴乔夫把希望寄托在西方强国上，指望能从西方得到大量援助渡过目前的难关。7月初，戈尔巴乔夫带着旨在推行私有制、放弃国家干预、迅速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哈佛计划”会晤了西方7国首脑。尽管7国首脑与戈尔巴乔夫达成了6项协议，但在对苏财政援助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却搁置起来，使戈尔巴乔夫空手而归。

7月，戈尔巴乔夫总统与参加“9+1”会晤的9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再次会谈，就联盟前途和新联盟条约草案进行讨论。最终，在戈尔巴乔夫作出重大原则让步，各共和国权限得到扩充、把国名改为“主权共和国”的基础上定稿，并定于8月20日起开始签署。

8月19日，即在新联盟条约签订的前一天，爆发了著名的“8.19”事件。这天凌晨6时5分，当戈尔巴乔夫正在克里米亚休养时，塔斯社却发表了一个令全世界都震惊的消息：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宣布，鉴于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欠佳，即日起由他本人履行总统职务。不久苏联政府又宣布：自19日凌晨4时起，在苏联部分地区实行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并成立由代总统亚纳耶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等8人组成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该委员会宣布接管国家政权。紧急委员会在“告苏联人民书”中指出，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向死胡同，苏联人民的命运已处于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声明呼吁苏联公民支持该委员会使国家和社会摆脱危机的努力。

事情发生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立即宣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发布的一切命令和决定都是“非法的”，号召举行总罢工。同时，俄罗斯领导人还要求在24小时内安排叶利钦同戈尔巴乔夫会晤，要求废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各项决定和解散该委员会。莫斯科市和列宁格勒市市长都发表声明，宣称拒绝执行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支持叶利钦。一时间两种政治势力形成了严重对峙。

而此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也对苏联政局表现了极大的关注，美国总统布什19日发表声明，谴责“苏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是违背宪法的政变，称他已向叶利钦保证，美国将支持恢复戈尔巴乔夫的权力，并说苏联事态如此发展下去将影响美国援助苏联的立场。据报道，“8·19”事件发生后，美国国防部下令战略部队及一些前沿基地部队进入“高度战备状态”，以防不测。欧共体也于19日表示，由于苏联局势出现新的变化，欧共体可能考虑暂停或终止对苏联的经济援助。

但到了8月21日，形势又发生了突变：苏国防部宣布撤回奉令实施紧急状态的部队；莫斯科卫戍司令宣布首都的宵禁将解除；部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飞往克里米亚会见戈尔巴乔夫。21日晚，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说，他已完全控制着国家局势。国家紧急委员会所有成员随后被宣布解除职务，除普戈自杀外，其余7人相继被俄罗斯政府下令拘留。

8月23日，叶利钦发布命令，停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并把苏共和俄共的全部财产统归俄罗斯政府管辖，苏共中央大楼被查封。同一天，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共和国也宣布苏共为非法，或公开禁止其活动。许多地方苏共组织被迫改变了名称和宗旨。8月24日，刚恢复行使总统职权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要求苏共中央自行解散。

“8.19”事件后，苏联加速走向解体，继8月20日爱沙尼亚宣布独立后，至8月底的10天之中，又有拉脱维亚等8个国家宣布独立。一些尚未宣布独

立的也准备独立。9月2日，苏联第五次非常人代会召开，会上宣读了戈尔巴乔夫和10个共和国领导人的声明，即“10+1声明”。这次会议决定取消1989年5月根据苏联宪法选举产生的苏联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的立法机构——最高苏维埃，由愿意参加联盟的共和国重新确定和派出代表组成的两院制议会取代，原来的总统制也改为由总统和愿意加入联盟的共和国领导人组成的国务委员会。9月6日，新成立的苏联国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决议，批准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脱离苏联独立。

10月1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8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在莫斯科签署了主权共和国经济合作条约，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乌克兰没有签约。条约规定要保留卢布作为统一货币系统的共同货币的作用，参加国要履行苏联所有的对外经济义务并奉行一致的经济政策。但由于缺乏政治约束力，该条约很快成为一纸空文。

而随着戈尔巴乔夫权力的削弱，叶利钦等人迅速扩大自己的权力和影响。11月16日，叶利钦宣布10项总统令，接管了中央财政金融部门的权力，剥夺了联盟的重要财源，掌握了联盟的货币大权。西方国家看到戈尔巴乔夫大势已去，开始把原来对共和国与中央一视同仁的“双轨政策”逐步过渡到支持各共和国独立的“一边倒”政策。12月1日，乌克兰共和国就脱离联盟和选举总统举行全民公决。此前，美国表示，如果乌克兰独立，美国国会将尽快予以承认。投票结果，99.85%的选民赞成独立。乌克兰的独立，对于戈尔巴乔夫尽力拯救苏联、组建新联盟的计划是一次致命打击。

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领导人背着戈尔巴乔夫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会晤，三方在会后发表公报称，三国已共同签署了由三个国家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协议，其中宣称：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苏联的法律和一切准则在三国已不再适用。这个决定使戈尔巴乔夫签订新联盟条约的努力最终成为泡影。12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就此发表讲话称，苏联的崩溃为西方提出了一个“历史性的挑战”，那就是如何帮助前苏联帝国“实现民主和经济自由”。紧接着，贝克访苏，先会晤俄罗斯外长，后会见戈尔巴乔夫，此举无疑反映美对苏政策重心的转移。戈尔巴乔夫深有感触他说，对苏现阶段负责任的不仅是苏联，也包括美国。

明斯克公报发表后，原苏联中亚5个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领导人表示，愿意成为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平等创建国。12月21日，除格鲁吉亚和波罗的海三国外，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首脑在阿拉木图举行会晤，正式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并把苏联已不复存在和独联体不设总统职位的决定通知了戈尔巴乔夫。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正式宣布辞职。布什与戈尔巴乔夫通了最后一次电话，布什赞扬戈氏使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当日19时32分，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69周年即将来临之际，在克里姆林宫顶上飘扬的苏联镰刀和锤子国旗徐徐下降。19时45分，一面俄罗斯的红、蓝、白三色国旗升上克里姆林宫。从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历史宣告终结，美苏冷战也划上了句号。

## 结束语 走向多极

两极格局的终结，是以苏联、东欧剧变和苏联、华约的解体为主要标志的。但旧的格局打破后，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世界正处在新；旧格局交替的过渡时期。这里简要地分析一下新旧格局过渡的特点和过渡时期的国际形势，并对未来多极化格局作一展望，算作全书的尾声。

### 一、这次新旧格局过渡的主要特点

**和平过渡** 与以前格局过渡相比，这次世界格局和秩序的变动不是一场世界大战的结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新的世界格局——“凡尔赛体系”和“雅尔塔体系”，都是经过战胜国中大国的幕后密谋，通过一系列国际会议的讨价还价，签订有关条约，从而把战胜国的意志强加给战败国，实现格局转换的。而这次新旧格局过渡，是经过长时期的“冷战”较量引起的。对苏联，尽管西方国家施加了种种压力和影响，但它终究是通过其国内各种政治力量的斗争、妥协来实现的。

**动荡过渡** 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后，各种战略力量正经历着消长盛衰和新的分化组合，一些大国之间还没有建立稳定的相互关系。而被美苏争霸所掩盖和抑制的民族、宗教矛盾、政见分歧等日益暴露，致使地区武装冲突此起彼伏、持续发展。因而，在向新格局过渡时期，尽管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但天下并不太平，局部动荡将持续发展。

**竞争过渡** 两极格局解体后，美苏之间和两大集团之间的全球性军事对抗已不复存在，各国综合国力的竞赛将越来越突出，而且日趋激烈。世界主要国家为了在未来多极化格局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都把增强自身的综合国力作为国家战略的核心。在这场竞争中，各国均以发展经济为基础，经济领域成为综合国力竞赛的主战场；新科技革命成为带动各国综合国力增强的火车头；重视军事安全，把军事手段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手段。

**长期过渡** 新格局之所以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主要是因为：第一，这次格局过渡是以和平方式进行的，新格局终归要通过世界主要力量之间的长期较量、斗争、妥协才能实现。这就决定了新；旧格局的交替必然是一个渐变演化、曲折反复的过程。第二，两极格局瓦解后，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建立新格局的过程必然是新旧势力反复较量的过程。

在以上几个特点中，以和平方式改变格局是最根本的特点。它决定了新旧格局转换的动荡性、竞争性和长期性。

### 二、过渡时期国际形势的基本走向

在从旧格局被打破到新格局形成的过渡时期，国际形势总的特点是缓和与动荡并存，竞争与合作交织。其基本走向不仅影响世界各国的战略调整，而且影响到未来新格局的形成。

#### （一）世界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世界并不安宁

冷战后，两大军事集团的对抗成为历史，世界开始进入一个从整体上相对稳定的和平时期，而且这种相对稳定的态势还将持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

第一，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的对抗已不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进一步减小。前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由于战前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

相对立的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矛盾激化而引起的。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华约的解散，全球性的军事对抗烟消云散，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也失去了昔日强劲的军事竞争对手。当前的大国之间还不致重新走向全面对抗和恢复冷战，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对立的军事集团，也尚未形成儿国实行军事联合对付一国的战略基础。而且，随着高新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应用，一方面加大了战争的破坏性，另一方面又成为制约大战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世界各国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增强综合国力，普遍希望保持国际局势的稳定，一般不再把扩军备战定为基本国策或置于国家战略的首位。为了发展，各国都需要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因而希望用和平手段而不是用战争手段解决彼此间存在的争端。

第三，世界新的安全机制的逐步建立，有助于世界缓和形势的持续发展。两极体制下，世界安全是建立在东西方军备竞赛和军事均势的危险基础之上的。冷战后，原来的安全机制不再起作用，因而建立新的安全机制成为许多国家维护自身利益和争取安全的现实需要。联合国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它在冲突各地广泛开展了维持和平行动，这对推动对抗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进行和平谈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以经济利益为纽带的地区安全机制发展迅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洲安全和合作组织、亚大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并非全部是专门的安全组织，但在经济发展与安全问题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其安全职能与作用无疑将日益增强和突出。西欧联盟从“军事论坛”性质向实体性欧洲防务组织过渡，亚大也在酝酿建立新的安全机制。这些安全机制从总体上说有助于世界形势的缓和。

第四，地区冲突大多趋向政治解决，有的已经取得历史性突破。地区热点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反映了当今世界和平的大势和人民的愿望，是国际战略形势总体缓和的主要标志之一。

但另一方面，原有的格局被打破后，国际战略形势也存在许多不稳定因素：世界主要国家之间都在进行新的战略调整，相互关系尚不确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认为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表现出一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架势，肆意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以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插手一些地区的冲突，甚至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致使一些地区冲突久拖不决，严重危及地区稳定；一些地区武装冲突时有发生，影响地区稳定。1991年共发生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28次，1992年24次，1993年34次，1994年38次，1995年37次，1996年约30次。从发展趋势看，地区冲突的政治解决仍是大势所趋，但由于引发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根源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因而地区冲突仍将呈此消彼长、此起彼伏之势，有些热点虽暂时缓解或得到政治解决，也不能排除出现反复的可能。

**（二）美、俄、中、日、欧等力量中心在发展过程中既合作又竞争，协调和合作是大国关系发展的主流，但利益矛盾与争夺也十分复杂**

冷战结束后，美、俄、中、日、欧盟五大力量是影响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因素，它们为在构筑面向21世纪新型国际关系中占据有利地位，都在设法发挥各自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优势，力图阻止不利于己的力量组合。它们都在协调彼此间的关系，建立了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合作关系或实现和平共处。随着世界经济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依赖，以及人类面临诸多全球性问题的挑战，大国之间加强了协调与合作，以解决彼此间的矛盾、分歧以及全球性、地区性问题。俄罗斯决定与北约建立和平伙伴关系，寻求西方国

家的大量援助，而西方国家要求俄在政治、安全上与西方采取一致行动。西方国家之间尽管矛盾在上升，但由于共同的政治、经济制度和价值观，政治上有共同目标，经济上互为主要投资和贸易对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关系中协调与合作的一面仍是主要的。

但大国之间的合作包含利害矛盾，特别是美俄之间以及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有所加剧。俄罗斯已把重振大国地位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俄罗斯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摩擦增多。在北约东扩、建立新的欧洲安全机制、解决地区冲突等问题上，俄与西方国家的矛盾和斗争有时还十分尖锐。西方国家由于外部对抗消失，内部矛盾也就更加显露，有时还很激烈。如美日欧贸易争端激化，美欧在欧洲安全合作机制、解决地区危机等问题上矛盾也很突出，其实质是争夺对欧洲事务的主导权。但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一般不至于导致全面的对抗。

### **（三）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集团化进一步发展，经济竞争更加激烈和尖锐，经济已成为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认识到，世界形势的总体缓和，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谁能成功地利用这一机遇重振经济，增强综合国力，谁就能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因此，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在致力于发展经济，并出现适度增长。世界经济合作与集团化取得明显进展，欧盟进一步扩大，并决定向东欧扩展；北美自由贸易区已正式运转；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决定到 2005 年建成美洲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已就实现投资和贸易自由化达成一致，经济合作进入新的阶段。

新的产业革命和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区域化进程，将每一个国家都强制性地纳入了竞争行列。美、日、欧在经济上正形成三足鼎立局面。它们之间围绕保持科技优势和获得在世界经济中的有利地位而展开更加激烈的科技战、贸易战、金融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围绕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仍很尖锐。发展中国家之间对资金和市场的竞争也在增加。这些情况表明，经济因素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最关键的因素。

### **（四）各国相继调整军事战略，裁减军队数量，提高军队质量成为各国军事建设的大势**

尽管世界主要国家更加重视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但它们并没有忽视军事的作用，而是将军事力量作为综合国力竞争中的重要因素之一。越来越多的国家认为，军事实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形势下，军事力量尽管已难发挥其传统的纯军事作用，但与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相结合综合运用，可以产生独特的效果。在这种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相继进行军事战略调整，其主要特点是：

在战略指导思想，由过去侧重应付大规模战争甚至世界大战转向应付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世界主要国家都强调防止地区危机升级、避免地区武装冲突爆发、遏制局部战争扩展和蔓延，以维护本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制定了“地区防务战略”，遏制其所谓的现实和潜在对手，将消除和解决地区性威胁作为其军事战略的首要目标，北约确立了“新战略概念”，其核心内容是增强处理危机的功能，重点防止和控制地区性冲突，以确保北约盟国的安全和欧洲的稳定。俄罗斯新军事学说也强调俄罗斯面临的主要威胁是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此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也都将应付地区性冲突作为军事战略的关注重点。

在建军方针上，裁减军队数量，注重质量建军已成为世界性的潮流。美国计划到 1999 年，陆军从 14 个师减少到 10 个师，国民警卫队师从 8 个减少到 5 个，海军航空母舰从 13 艘减少为 12 艘，空军从 28 个联队减少为 20 个联队，海军陆战队从目前的 18 万减少为 17.4 万人。俄罗斯军队每年都进行了大幅度裁减，1994 年武装力量人数减少 38.5 万人，到 1995 年初编制内的总人数为 192 万左右。法国继续调整军队编制规模，削减三军兵力，计划在 1985~1993 年法军总兵力已裁减 10% 的基础上，到 2000 年再裁减 5%，由目前的 60.99 万人（含文职人员）减到 57.95 万人。英国、德国、日本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裁减军队规模和数量。裁减数量绝不意味着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恰恰相反，各国在裁减军队数量的同时，注重优化部队结构，特别是重视快速发应部队建设，提高应急机动作战能力，并以此作为质量建军的重要环节，不断把战斗力提高到新的水平。

在武器装备发展上，各国在裁减和淘汰陈旧武器装备的同时，不断增加高科技投入，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有些国家虽然军费预算有所降低，但是武器装备发展费却呈上升之势。有的国家为了发展高新武器装备，军费开支还出现了回升的势头。美国 1995 财年的国防拨款比 1994 财年增加了 28 亿美元，并要求为今后 6 年再追加 250 亿美元的预算。法国要求在今后 6 年内，军事装备费持续增长，装备费总额约 1020 亿美元，平均每年实际递增 0.5%，重点落实现已投入与其他欧洲国家合作研制的项目，如勒克莱克坦克，戴高乐号航空母舰等。欧共体集资 160 多亿美元用于高技术开发，促使军事现代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各国在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上，都强调根据本国国情和财力状况，突出重点，分清轻重缓急，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水平。

在大国裁军的同时，一些地区性国家扩充军备呈上升趋势。如亚大地区的东盟国家、中东地区的一部分阿拉伯国家等，其军事战略逐渐从依靠大国安全保护向“自主防务”转变，大幅度增加国防开支，购买或自行发展高技术武器装备，竞相发展国防力量，造成地区性军备竞赛加剧，这也是造成地区局势不安宁的一个重要原因。

各国军事战略调整的主要内容包括重新确定现实和潜在的威胁、重新确定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确立战略方针和作战方针、调整军队建设方针和重点、调整军事部署等。这次调整是在国际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特定背景下进行的，调整的幅度、广度和深度均是二战以来所少见的，对国际战略形势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五）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联合国的作用仍相当有限，西方大国往往利用联合国推行新干涉主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面临严峻挑战**

冷战的结束为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近几年来，联合国在世界冲突各地广泛开展了维护和平行动，总的来说，联合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调解地区冲突等问题上起着一定的作用。但是，联合国维和行动只是解决冲突的一条较好的途径，而不是医治冲突的万应药方。如果离开维和行动的宗旨，不适当地扩大维和行动的任务和轻易改变某些行之有效的维和指导原则，就会使一些维和活动陷于困境。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偏离公正与和平解决的原则，插手一些地区冲突，利用联合国对外进行军事干涉，大大增加了解决冲突的难度。如在波黑，北约、美国多次空袭塞族阵地，向塞族发出最后通牒，结果不仅没有使战火平息，

反而使战乱进一步扩大。

联合国维和行动之所以面临困境，除了传统的维和机制难以适应冷战后错综复杂的现实情况，以及财力和人力有限等因素外，主要的原因在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往往被个别大国所操纵和利用，甚至成了它们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因而维和行动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难以严守中立原则，更多地采取“授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的行动，中立维和陷入了武力维和的误区。目前，联合国维和行动面临诸多挑战，如怎样按照联合国宪章的要求“合法”开展维和行动问题，维和部队的指挥权与协调权问题，怎样防止被大国所利用和控制的问题，怎样避免干涉主权国家的内政问题，维和经费紧缺等问题。这些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联合国维和行动就难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到 21 世纪初期，国际形势总体缓和的趋势将继续发展，但国家之间特别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将越来越突出，竞争与合作、对抗与对话并存；世界经济形势将有所好转，亚大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将持续高速增长，各国更加重视亚大地区，但世界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经济竞争与贸易摩擦日益激烈；地区冲突将持续发展，多数热点地区将走向政治解决，但也不能排除出现反复或出现新乱的可能；围绕裁军以及增强军备透明度等问题，世界裁军领域既有妥协与合作，也存在矛盾和斗争；各国仍将重视军事力量建设，追求质量的军备竞赛也相当激烈；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将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上发挥作用，联合国维和行动有可能实行改革和改进。

### 三、不可逆转的多极化趋势

两极格局终结后，较为明朗和相对稳定的世界新格局尚未正式形成，世界新格局的形成将经历一个复杂的渐进过程。尽管各国普遍认为，世界新格局将由多极而不是单极构成，但究竟将由哪几极组成，有着各种各样的预测。有的认为，21 世纪将建立一种全球性力量对比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主角的将是美国、西欧、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在某些问题上还要加上伊斯兰国家。有的认为，21 世纪全球将出现“大国群体体系”：美国支配下的北美、一体化的欧洲、日本和中国居突出地位的东亚、印度称雄的南亚、横跨北美和中东的穆斯林新月形地带，其中，北美、欧洲、东亚三大群体将起决定性作用。而国际上较为流行的看法是，在未来多极化的世界格局中起主导作用的将是五大力量中心或五极，即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和中国。我们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要成为世界格局的一极，需要有较强的综合国力，特别是经济、科技实力和军事力量，而且要有较大的国际影响力，能够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发挥重大作用。从世界主要力量的情况及走向看，美、俄、欧、中、日五大力量已初步奠定未来多极化格局的基础，多极化格局的雏型已经显现。

美国难以筑成单极世界，但仍将是世界多极中的重要一极。冷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妄图实现充当世界霸主、领导全球的战略目标。从布什的“世界新秩序”到克林顿的“扩展战略”，都反映出美国企图建构单极世界的野心。但是，长期的冷战拖垮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也削弱了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美国长期充当“包围遏制苏联”的主力 and 先锋，穷兵黩武，到处扩张，到处干涉，海外驻军百万，军事基地和海军舰队遍布全球五大洲四大洋，将大批财力物力和最先进的技术

投向军备竞赛，使美国元气大伤。冷战时期，美国爬上西方世界盟主的宝座，对西方国家摇旗呐喊，发号施令，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当时拥有举世无双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但冷战后，美国已无足够实力驾驭西方，驾驭世界。其企图称霸世界的企图遭到世界主要国家的抵制和反对。美出台制裁古巴的赫尔姆斯—伯顿法，遭到其西方盟国及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强烈反对和抵制。针对美国要求盟国共同参与对伊朗和利比亚等国实施经济制裁的做法，欧、日、加等也作出激烈反应，强烈谴责美国的贸易制裁政策。俄罗斯在北约东扩等问题上与美国尖锐对立。欧盟与美国在波黑问题、中东问题以及建立未来欧洲安全格局等问题上明争暗斗。1996年，对美国打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世界多数国家都表示谴责，这和五年前的海湾战争相比，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可见，美国企图建立单极世界只是一厢情愿的梦想。当然，美国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尚有雄厚的军事、经济、科技实力和政治影响力，没有哪一“强”可与之抗衡，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仍将是世界上综合国力强、影响力大的大国之一，仍将是世界多极格局中的重要一极。

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国，俄罗斯虽然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并为国内经济困难和政局问题所困扰，但无论如何其潜力不可低估，它在未来世界格局中仍将是重要的一极。从政治上看，俄罗斯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甘心屈居美国的“二流伙伴”，积极维持其大国地位和影响。它极力维持在独联体内的“领导地位”，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虽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但拉开了一定距离，在一些利益攸关的问题如北约东扩问题上与美国针锋相对；积极开展全方位外交，与中国、日本、韩国等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从经济上看，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大部分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工业发达，科技实力较强，资源丰富。一旦俄经济走出低谷，俄原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得以巩固和充分发挥其潜力，俄罗斯仍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从军事上看，无论从核武器和常规兵力看，俄罗斯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军事强国，是在军事上唯一能与美抗衡的国家。

欧盟将作为世界格局中的重要一极出现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西欧诸国在联合以图存、图强的过程中，曾经经历了40余年曲折动荡的道路，这使西欧各国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只有不断推进本地区的联合、协作与一体化，欧洲国家才有希望、有作为。冷战后，西欧国家的“欧洲意识”进一步增强，特别是欧共体发展为欧洲联盟，标志着欧洲建设已从单一的经济一体化向政治、经济和防务全面一体化方向发展。在美国实力相对削弱、从欧洲大量撤军及美国国内孤立主义抬头的新情况下，欧洲人在安全上的独立自主倾向也明显发展。海湾战争和前南战乱使西欧国家认识到，完全依靠美国来维护自己安全的时代已经过去，只有在推进经济政治联合的同时，推进军事和防务联合，建立统一的防务机构和军事力量，才能切实地维护欧洲的利益。根据欧洲联盟条约规定，西欧联盟已成为欧洲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执行机构，它正在向欧洲防务实体转变。欧洲国家还希望通过改革北约不断加强北约内的欧洲支柱，促进北约向欧洲化方向发展。欧洲国家希望最终建成由欧盟为领导的、以西欧联盟为核心的、包括中东欧国家及波罗的海三国在内的欧洲新格局，建成“欧洲人的欧洲”。尽管建立一个政治、经济、外交和国防上统一的欧洲，仍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但欧盟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将占有重要地位。

日本以经济实力为后盾，加快争当世界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步伐。早



在 1990 年 1 月，日本首相海部俊夫致信美国总统布什，明确提出：“必须以日、美、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日益壮大，日本加快了争当世界政治大国的步伐，并成为日本国民的普遍愿望。为此，日本积极参加国际事务，努力改变战败国的形象和对美国的从属地位，谋求成为美国的“平等伙伴”；在美日贸易问题上，不断对美说“不”；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积极参与亚太事务，大力加强对华、对俄外交，加紧拉拢东盟等。日本争当军事大国的动向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日本借加强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推动日本自卫队建设，并利用维和使自卫队走出海外，军费开支一直居世界前几位，国内不断有人企图否认、篡改、美化侵略历史，军国主义势力抬头，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的高度警惕。可以预料，日本将成为未来多极化格局中的一极。但是，日本在多极化格局中的地位仍相对有限。这是因为，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不会放任日本无限制地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进而对自己构成挑战和威胁；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地少人多，资源有限，国力发展受到很大影响；亚洲许多国家对日本的侵略历史记忆犹新，对日本的动向保持高度警惕，日本想在亚洲当头可能只是一种幻想。

中国发展势头良好，“怎么样也算一极”。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少数国家之一，在大国中则是增长最快的，国家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政局将保持稳定，经济持续增长，国民生活不断改善，国际地位将日益提高。美国未来预测专家约翰逊·奈斯比特说：“中国的崛起是 20 世纪末叶改变世界格局的最重要的经济力量。”邓小平早在 1990 年 3 月就断言：“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之所以能成为未来多极化格局的独立一极，主要是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虽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相当落后，但综合国力仍居世界前列；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际上有广泛的影响；中国一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中国的发展、强大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世界和平也有利，所谓“中国威胁论”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是别有用心；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上有一定的发言权。可以说，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任何国家也不可忽视和替代的，是多极化格局中的独立一极。当然，在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才能逐步接近和赶上西方。到新格局大体形成时，中国可能还是多极格局中较弱的一极。

多极化虽出现加速形成的趋势，但毕竟还未正式形成。世界主要大国仍在进行深层次的战略调整，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及相互关系还未完全定位，多极化格局形成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变数，因而，未来多极化格局是否就是五大力量中心或五极，尚需继续观察。不过，多极化作为一种历史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由于各国在国际上所处地位不同、利益不同、政治观念不同，所以各国对多极化的态度也不同。有的是推动力，积极适应这个潮流，推动多极化的发展；有的是唯我独尊，企图“一统天下”，阻碍多极化的发展。但是，不管你的力量有多大，即使号称世界第一的超级大国，若想逆潮流而动，必将受到历史的无情惩罚和嘲讽！

（本书前言、第一至第七章由程广中撰写，第八至第十四章、结束

语由汪徐和撰写)

